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将之战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将之战

听涛起雄心，誓荡扶桑儿

初到南京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芦沟桥事变。

这时，身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正在古都西安，进行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奔走呼号。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等会谈，并将会谈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经同意后复电转告何应钦呈报在庐山的蒋介石。

经过多次谈判和斗争，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终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如日本继续进攻，就只有奋起抗战。8月初，蒋介石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邀请中共代表参加。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议期间，他们多次发言，并接触各方人士，广泛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战主张，积极推动发展抗战的大业。叶剑英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的讨论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政略与战略”问题的长篇发言。

叶剑英首先对中日战争中的敌我力量、国际因素以及战争发展进程，作了分析和估计。他说，我军战略重点若放在上海，即使取得胜利不能扭转全局，如果将重点放在平绥线，则可转移全局，并能破坏敌人的整个计划。战争将是持久的，我们不仅要动员国内力量，而且要大力争取国际援助。

叶剑英谈到战略和战术问题时说：“我们虽然主张战略上持久战，但是战术上仍然应当采取攻势，以求速战速决。战略上虽然取内线作战，但战术仍然应取外线作战，随时包围敌人。所以，我们要打集团防御战争、广大游击战争和广大民众的运动战。”

叶剑英在发言中，还谈到武装民众、政治工作、粮食补给等问题。他强调，进行宣传鼓动，做好动员后的巩固工作，发动儿童妇女鼓励亲人上前线……

叶剑英的发言博得一片掌声，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会议上的公开亮相，进行统战工作，共产党在南京逐渐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在会议期间，叶剑英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同南京党政军各界要人以及冯玉祥、刘湘、白崇禧、龙云、张发奎、黄琪翔、黄绍竑等各地将领，会晤交谈，积极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从接触中，他亲自感到，南京主战空气越来越浓，主和者不得人心。对于蒋介石的抗战态度和军事部署，也有了进一步了解，心中有了数。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这一天，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就同国民党谈判条件向中共中央提出四点建议：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红军立即改编，争取主动；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催促南京发表红军改编后正副指挥的任命。

在朱德离开南京去西安后，叶剑英继续协助周恩来奔走于国民党军政要员之间，积极开展团结抗战工作。他们多次同何应钦、蒋鼎文等会谈。

一天，何应钦举行家宴，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大家正在用餐，电话铃突然响起来。何应钦接完电话后回到席边，高兴他说：“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委员长说要坚决抗战啦！”

周、叶当即说道：“如果蒋先生真能坚决抗战，那当然是一件大好事。”

何应钦接着说：“敌人在上海都打我们了嘛，我们还不抵抗？”

叶剑英说：“如果不抵抗，大家都要当亡国奴了！”

国共双方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会议，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的十一人的中央军委，叶剑英为军委委员。随后，中央军委发布八路军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八路军总部正式委派参谋长叶剑英为八路军驻南京的代表，李克农为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办事处就设在南京中央路傅后岗66号（现为青云巷11号）。在这座二层楼房里，叶剑英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活动，坚持贯彻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既坚持原则性，又掌握灵活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一时期，叶剑英还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各界人士，就陕甘宁边区，海南游击区的发展、太原失守后的战略部署以及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等问题，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

根据党中央指示，叶剑英就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9月下旬，叶剑英和博古与国民党代表经过谈判，商定将南方八省区我游击队的主力编为一个军。11月21日，叶剑英和叶挺面见蒋介石提出有关新四军的编制、经费和武器配备等问题。当时，在南京“首都反省院”关押着一大批中共党员和革命同志。“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各阶层民众一致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压力，释放了一批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刑期较短的政治犯，但对一些“重要的政治犯”却不予释放，“八·一三”之后，日军飞机轰炸南京，“释放政治犯”的呼声越来越高，监狱难友强烈要求出狱，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和叶剑英想方设法了解监狱难友情况，多次进行交涉，营救被关押在南京几个监狱里的难友。

8月18日，他们驱车来到“首都反省院”。叶剑英翻看“犯人”花名册，发现曾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同学的夏之栩和比较熟悉的熊天荆、王根英三位女同志的名字，立即向院长提出要先见她们。

三位女战友披头散发走出来了。

周恩来、叶剑英望着久别的受难同志，勉强笑着说，“你们还认识我们吧！”

夏之栩等见到久别的亲人，激动得流下热泪，连忙说：“认识，认识，我们怎能忘记周副主席、叶参座呢！”

叶剑英走过去，和夏之栩亲切握手，说：“小夏，你受苦了！”

寒暄一阵之后，周恩来、叶剑英问她们：“这里有多少人？男同志多少？女同志多少？”她们约略算了一下大概关有100多人，男的多，女的少，很多人改了名字。

周恩来、叶剑英转身向陪同在一旁的监狱反省院长说，先保她们三人出狱。随后提出要去看其他难友。在监狱的大礼堂里，同大家见了面，向难友们表示关心和问候，简要地讲了讲国际形势和国共合作的问题。叶剑英告诉大家，很快接大家出去，参加抗日。难友们热烈鼓掌，高兴得跳起来。

夏之栩等三位战友出狱后，又详细汇报了其他一些同志关押的地点，列出名单向国民党当局要人。经过狱外强有力的营救和狱中斗争相呼应，一批又一批的“政治犯”终于相继出狱了。总共500多名难友从国民党监狱中救

出。其中有共产党员钱瑛、刘宁一、师孟奇、彭镜秋、黄文杰、王鹤寿、刘顺元、郑绍文、曹瑛、赵希愚、谭天度、肖桂昌、顾玉良、周云德、陈曾固、喻屏、陈春林、熊有清、陈霖、何洛等同志。这批入狱后，大部分经西安转送到延安，一部分送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办的训练班学习，少数就地分配了工作。后来，这批同志中的少数人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大多数在建国以后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

老共产党员谭天度被捕后判刑十年，释放出狱时，兴奋异常，赋诗一首：

“吉凶祸福非前定，屈伸苦乐亦无凭。
昨夜乌云犹盖地，今朝举目见天青。”

多年来，他每当想起南京监狱那段生活，总是感激周恩来、叶剑英解救之恩。

辗转武汉

抗战的形势急剧发展变化着。历时三个月的淞沪大会战结束，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直逼南京。

1937年11月下旬，叶剑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同办事处人员一起撤离南京，抵达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当时这里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设在汉口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办事处虽然只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一个小小的政治机构，但却像大海中的一座灯塔，在黑夜里放射着光芒。当时国民党办的《抗战》杂志曾有一篇署名“实甫”的文章这样写道：“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叶剑英很忙。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

叶剑英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紧张地工作着。

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驻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21日，国共双方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问题达成协议，叶剑英为委员会成员。23日，叶剑英出席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的联席会议。会后，叶剑英与周恩来、叶挺、项英等商谈，25日，新四军办事处在汉口正式成立。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随着战争形势的日趋复杂，叶剑英在武汉的工作更加紧张繁忙。他身处同国民党谈判交涉的第一线，既要出席中共代表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商议有关军事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又要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谈判有关共同的政治纲领以及团结抗战、边区地域、政府组织、军队扩编、财政供给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还要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商谈救国救民的大事。按照党内分工，他还要向党中央随时报告战事进展情况，并提出各种建议，同时，参与领导中南、华南地区中共地下党组

织的工作。广州失陷前，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尹林平请示长江局，要求加强农村工作，建立农村小块游击区，组织和扩大工农武装，准备打游击战。负责军事工作的叶剑英立即复电同意，并作了具体指示。

叶剑英在国民党军界尤其是在上层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一些真心抗日、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们都十分愿意找他交谈，听取这位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意见。3月上旬，桂系将领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特意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自己的住处，商谈五战区对日作战方略等有关问题。白崇禧走后不久，周恩来、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这些建议为李、白两人欣然采纳，客观上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周恩来、叶剑英还会见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对谢在广西的工作作了明确的指示。他们还派张友渔等加强同程潜的联系工作。

对叶剑英这一段的工作情形，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回忆说：“在武汉，叶剑英工作比较忙，同各方面的接触很多，派干部到新四军，动员一些青年学生去解放区，利用各种机会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不但桂系的，其他各系的工作都做。当时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除周恩来以外，有声望的是叶剑英。与他相识的人很多，这一有利条件使他在统战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那个时候的工作方法，是在一起吃顿饭，在一起谈谈，说说情况就把事办了。还有海外华侨的工作，叶剑英做得很多。抗战中，海外华侨捐献了大批钱物。叶剑英同宋庆龄、何香凝他们的关系也是很亲密的。”

在武汉期间，叶剑英公开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演讲，宣传和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坚持抗战的影响。他先后同国际友人伊文思、斯诺、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史沫特莱多次交谈，宣传抗战，争取国际支援。

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他在欢迎会上热烈致词，并亲切会见阿尔泰·爱德华、柯棣华、卓克华等，感谢印度人民支援中国的抗战事业。后来，柯棣华不幸牺牲，叶剑英细心照料他的亲属。柯的妻子郭庆兰回忆此事，写道：“我刚到延安，中午，叶剑英派人来请我和印华去他那里。我过去没见过他，自感衣帽不整齐，又带孩子，不免有些拘束。我去时只见他和夫人都在屋子里等候我。叶剑英只穿着一身普通军装，当即迎上前来和我紧紧握手，我抱着印华坐在饭桌旁边，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饭和菜。印华伸手便要抓着吃，我真有些不好意思。他笑着说：‘没关系。’并招呼我吃饭，他的夫人还帮助喂孩子。我的心情这时才平静下来。叶参谋长说，1938年他在武汉就认识了柯棣华大夫。当时，他曾亲切接见过医疗队全体成员。爱德华是队长，柯棣华是最年轻的两位医生之一。他说，柯棣华医生很活泼，肯学习，还会说几句中国话，在欢迎大会上唱过《义勇军进行曲》和《马赛曲》，使那次欢迎大会显得很活跃。他说，那时柯棣华等坚持要去延安。最后他和周副主席只好表示同意。我听到后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又抱过印华，逗得孩子直笑。看到他对下级干部如此平易近人，亲切可爱，实在使我感动万分。他看着孩子对我说：‘孩子可不胖呀，你是护士，应该把他喂得很好。一定要带好孩子，将来印华要回到印度像他爸爸一样，为印度人民服务。’”

广州、香港、澳门行

1938年初夏，日军向武汉进逼，危及广州，5月，叶剑英利用去香港就医机会，在广州停留，与地下党负责人云广英等取得联系，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同时，以合法身份同国民党军政界及各界友好人士接触座谈，促进统一战线工作。5月2日，他应邀去广州中山大学和广雅中学看望师生，发表演讲。在中山大学，他应学校萧冠英先生之约演讲《中日战争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根据广大师生最关心、迫切需要弄清的六个问题，一个一个地作了回答。

叶剑英结束他的演讲说：“中华民族正如一叶扁舟漂流于革命的高潮中，她最后或能够达到独立自由幸福的彼岸，抑或中途沉沦于苦海，这种命运，是操在我们民族自己的手上，而看我们是否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来决定。”叶剑英的演讲，切中时弊，合情合理，风趣幽默，听众十分满意，爆发一阵阵掌声。广州报刊纷纷转载，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叶剑英在中山大学演讲之后，应有关人士和报刊记者、编辑的邀请，召开了一次有香港记者出席的招待会。

招待会于上午9时开始，叶剑英作了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一位记者递上纸条提问：“叶总在中山大学演讲的结束语说，中华民族正如一叶扁舟漂流于革命高潮中，他最后或能达到彼岸，或就此沉沦下去，全靠我们民众的努力来决定。这话不好理解，似乎话中有话，不知指的是什么？”

叶剑英看了纸条，微笑着用广州话说：“画公仔不要画出肠，要让大家去想嘛。如果一定要答复，虽然抗战胜利的客观条件存在，如不发挥主观精神，就会沉沦下去。最重要的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当然要人民支持，人民还是决定浮沉的。”

有记者问：“叶总谈离开广东十年的感想，似乎未讲出真情。叶总是‘前度刘郎’，就有许多感触才是。”叶剑英站起来复述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遇赦回京重游玄都观时写“前度刘郎今又来”这首诗的故事，然后严肃他说：“现在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此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不去考虑大局，不搞好全民团结，不努力去争取抗战胜利，而像一些旧诗人那样计较个人恩怨得失，那就不配作炎黄子孙！”他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宽广胸怀和伟大气魄，使与会者深为敬佩。

5月5日，叶剑英应爱国民主人士黄慎之先生的邀请，乘船至顺德碧江，专程看望广雅中学师生们。这所著名的中学原在广州，因避空袭转移到农村。这里风景秀美，环境幽雅，倒是一个办学的好地方。

那一天，校长黄慎之得知叶将军等驾到，早早带领教师、同学到码头排队迎候。

上午10时，一艘小火轮伴着和煦的东风，迎着阳光，徐徐驶进碧江靠岸。在一片掌声中，叶剑英将军身着中山装，风度翩翩，与郭沫若夫妇一行人下船，走向人群。

叶剑英不顾旅途劳顿，到校以后，没有休息就步入一所由旧祠堂改建的“振响楼”，向集合在那里的广雅中学全体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全校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

叶剑英用纯熟的客家话分析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精辟地阐述抗战的基本条件，最后谈到中国抗战的前途，语重心长他说：“我们中国正处在民族革命的浪潮中，不是得到自由，就是在波涛中沉没。但是，这个命运是由

我们去决定的。青年同志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希望各位努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努力前进！”

叶剑英整整讲了两个小时，才在全场听众阵阵的热烈掌声中，走下讲台。他又关切地询问学校的情况，才和大家一一握别，缓步走到江边，乘上小火轮，向广州方向驶去。

叶剑英在广州小住期间，出席了他在国民党军的故旧和梅县同乡、同学、亲朋好友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他题词署文，诗歌酬答，激励抗战斗志。

有一次，叶剑英的同乡、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曾其清设宴招待叶剑英，并邀《抗战大学》主编陈华和他的女朋友廖琼（中山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作陪。曾其清请来嘉应菜馆的厨师温哥做菜，别有风味。开席不久，青年诗人蒲风到来。曾其清请蒲风入席，共同畅饮。蒲风带来他出版的一批诗作，于是话题很自然地转到诗歌上面来。

叶剑英对蒲风说：“看样子你还未到三十岁，就这么丰收，真不简单。”

蒲风说：“请叶总多多指教。”

叶剑英说：“我看写诗著文，不光要求数量，更需要注意质量。现在为抗战工作忙，要节省时间和纸张。”

大家点头称是。

接着叶剑英说：“听说你们中有人不主张旧瓶装新酒，要把旧瓶子摔掉，是么？”

蒲风说：“是有这样主张的人，但不是所有诗坛的人都是这样。我认为可以模仿旧形式，用民歌时调进行宣传 and 锻炼自己。但从方向上讲，我们主张发展新诗歌，旧诗歌框框太多，太呆板，不易学，不易懂。”

叶剑英庄重他说：“我看旧瓶子不能丢，至少在目前不能丢。新瓶旧瓶可以并用嘛。比如演戏，不光要演白话戏，也可以演客家外江戏、粤剧、潮州剧，不光要演《三娘教子》，也可演《子教三娘》，还有不少群众欢迎旧的，为什么不可新旧并存呢？鲁迅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写得多么好啊，旧瓶装新酒，装得好会又香又醇。”席间蒲风送他已出版的一批诗作给叶剑英，叶剑英选了《茫茫夜》、《儿童亲卫队》和《明信片诗》三种，并说：“明信片诗短小精干，很适合战时的实际，战时要有倚马可待的诗文。你们摇笔杆子的，应多在这方面努力，为抗战救国多作贡献。”

过了几天，蒲风对陈华说：“那天晚上见了叶总，受益非浅，叶总不仅精通武略，而且精通文艺，对诗歌有很深刻的见解。”陈华说：“这点我早就知道了。叶总不仅是将帅之才，而且是政治家和诗人。你看他给《抗战大学》的题词和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多么富有文采和诗意啊！”

不久，叶剑英离开了广州去香港就医。在那里，他秘密到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与廖承志，潘汉年交谈，指导工作，并通过同乡旧友，动员各界爱国人士捐款支援抗日。

奔走于长沙、南岳、桂林

叶剑英从香港返回武汉不久，日军发起对武汉的全面进攻。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实行紧急疏散。

叶剑英根据中央指示，组织办事处分批撤离，安排撤退后的善后工作。25日凌晨，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他和周恩来从容离开，辗转到湖南长沙。

叶剑英和周恩来在长沙，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召开的军事会议，接洽各界友好人士商谈抗战救国事宜，出席湖南省长沙市各界会议，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和八路军在敌后抗战的战绩，动员广大军民坚持抗战。同时，会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商谈协助国民党军进行敌后游击战问题，叶剑英受张的邀请，同意担任省高级顾问指导游击战。

在长沙期间，叶剑英继续协助周恩来筹备组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改善项英与叶挺的关系，加强与新四军的工作联系。

就在周恩来、叶剑英等日夜为抗战奔忙的时候，蒋介石密谋“焦土抗战”“火烧长沙”。11月12日那一天，叶剑英忙了一天，夜里刚睡下，猛然从梦中惊醒，见四周已是一片火海。他赶快喊周恩来，急忙撤离。

一场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使长沙市遭到浩劫，城毁人伤，惨不忍睹。周恩来、叶剑英严厉批评国民党的所谓“焦土抗战”的政策，一方面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出拨款救灾、清理街道、安置灾民的建议，另一方面组织八路军办事处人员返回长沙动员民众，进行善后救灾。

长沙大火之后，国民党军撤出长沙。叶剑英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转移到衡阳。1939年，他奉中央之命，参与国民党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回顾渺无际，天风吹我衣。

听涛起雄心，誓荡扶桑儿。

这四句诗就是他登南岳祝融峰时所作，表达了坚持抗战、挫败顽敌的坚强意志。

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参加训练国民党军官的一个创举。

在游击干部训练班，叶剑英先担任训练班副主任（主任为汤恩伯），后来蒋介石自己兼任训练班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后由李默庵继任），叶剑英改任副教育长。叶剑英不但参与制定教育计划，组织中共方面派去的教官做好教学工作，还亲自主讲战略、战术、论持久战，以及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等课程。听他讲课的人很多，有时多达一两千，课堂容纳不下，就在广场上讲大课。不仅学员们听，就连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将领，还有戴笠派的军统人员都赶来听讲。当时来听讲的还有南岳寺庙的和尚。他讲的“游击战争概论”尤其受欢迎，每次上课学员们都要求延长时间，下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意走。由于他的出色演讲，被誉为“游击战争战略家”。李默庵回忆说：“训练班主修的游击战课程，由于中共代表团的诸同志在叶剑英的领导下，热忱执教，甚得好评。尤以叶亲自主讲的课程，因他经验丰富，且善于辞令，讲授深入浅出，更受欢迎。叶所讲授的游击战的军民关系像鱼和水一样一刻也不能脱离的比喻，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叶剑英等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教，扩大了中共和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很多国民党军官和叶剑英等接触后，才弄清了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真相，认识到共产党人不仅不是“魔怪”、“野人”，而且是最文明最讲道德、最有理想的革命者。学员当中有好些人接受中共的主张，在抗日战争中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在反摩擦斗争中，持消极和中立态度，以至主动向我们提供情况；在解放战争中，纷纷率部起义，帮助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好事。

在第一期学员毕业时，举行实地练习，在大操场里讲评后，大家感到快要分别了，有些依依不舍，于是很多同学拿着自己的笔记本，要求叶剑英签名留念。他接过每个人的本子，根据不同对象，题上“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路是人走出来的”，“要做大事，不做大官”等寓意深刻的警句，并签上他自己的名字。毕业后，大部分同学都热烈地响应叶剑英号召，愉快地奔赴抗日最前线。

叶剑英在训练班期间，曾专门到衡山寺院动员佛门弟子参加抗日，组织“佛教抗战协会”、“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并与著名法师暮笏、演文、巨赞等谈禅论道。1939年5月上旬，“协会”正式成立时，叶剑英前往祝贺，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著名演讲。他从“佛教与现实问题”说起，讲了“为保卫自己的道场而奋斗”“本着佛教精神死而无悔”“佛是普度众生挽救民众”等问题。他说：“你们的成立宣言，也写得很明白：佛告诉我们说：‘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是甚么？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是不是众生？当然是的，而且是同一炎黄子孙，生死相共，我们要普度众生，首先就要从解放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入手。同时一切普度众生的工作，要看重众生，不要着重个人，要看重现在，不要妄想将来。做到这一步田地，就是‘无我’了，无我精神就是革命精神，也就是佛的精神。”他借用演文和尚的话说：“‘做一个人不容易，做一个和尚更难。’我们做一个人，要勇敢地放在革命的熊熊火焰中去焚化身体，才会反映出自己的灵魂。现在在前线作战的将士，用自己的血肉，去换取民族的自由，死而无悔，这就是革命精神，也就是佛的精神。”他最后引用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作为演讲结束语，他说：“站在革命的火焰面前，要自己首先跳进去，才能显现出伟大灵魂的光辉。”

叶剑英的演讲在宗教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重庆——“虎穴坚持神圣业”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重庆成了中国抗战时期的陪都。1939年6月上旬，叶剑英奉命来到这座山城，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军事部长，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领导下，继续进行统战工作，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倾向和反共摩擦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以斗争求团结。

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设在红岩咀十三号。办事处还兼管曾家岩周公馆的日常事务工作。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参谋长会议，要在会上专攻八路军，制造舆论，进行军事动员，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此时，叶剑英胳膊被摔伤，有的同志劝他不要去。叶剑英觉得这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自己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不能不去，而且要准备应付一场恶战。

这一天，山城重庆笼罩在连绵阴雨之中。叶剑英身着军服，佩带中将军衔，用绷带吊着摔伤的胳膊，正气凛然地出席了会议。

果然，会上气氛很是紧张。会前，蒋介石对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讲什么内容，都作了精心安排，矛头指向八路军。

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一开始讲话就指责说，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没有

完成任务，是第十八集团军造成的。他们游而不击，制造磨擦，袭击友军，包庇叛军。对这种破坏抗战的事，要进行查处，以整肃军纪军令。他在说这话时，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坐在台下的叶剑英。

此时，叶剑英仪态从容，凝神听着，表面上很平静，心里正准备在适当时机进行反驳。

蒋介石可能也看出了这一点，自己讲话后特别规定：“只有集团军参谋长以上军官才有权发言，每人发言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

按照预先安排，天水行营参谋处盛处长、第二战区楚参谋长、冀察战区黄参谋长、第八战区章参谋长、第十战区周副参谋长、第三十四集团军罗参谋长等相继发言，群起攻击第十八集团军“袭击友军”、“掩护叛军”、“制造磨擦”、“破坏政权”、“强征粮食”、“滥发钞票”等等，以致造成冬季攻势不能完成。蒋介石、何应钦自以为得计。会议前两天，叶剑英只带耳朵听，面对国民党的围攻，泰然处之。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叶剑英看诬蔑攻击的发言都讲完了，随即要求发言，作《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讲话。

叶剑英针锋相对地集中讲了作战和磨擦两大问题。

在作战问题上，主要讲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我军如何按照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艰苦奋斗，并获得巨大战果。

他列举大量事实，特别引用国民党军委会印发的对敌伪广播材料，说明十八集团军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冬季作战任务，而且完全是按照最高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行事的。十八集团军英勇的作战行动、光辉战绩，同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消极抗战、望风而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的谰言，揭穿了蒋介石以冬季攻势作战失败而加罪于十八集团军的阴谋。

叶剑英接着讲关于磨擦问题。他列举了国民党各战区参谋长关于共产党军队所谓“制造磨擦”事件，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一一作了有力的回答和驳斥。揭露国民党军队与伪军“沆瀣一气”，共同进攻十八集团军的真相。

叶剑英始终彬彬有礼，器宇轩昂，不慌不忙地按照预定计划慷慨陈词。当演讲超过三十分钟时，军委会参谋长刘斐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报告说发言的时间到了，立即下了“停讲令”。这时叶剑英故意向蒋介石说：“委座，我还没有讲完，怎么办？”蒋介石见叶剑英给他出了个难题，无可奈何，只好破例他说：“请讲下去吧！”于是，他继续讲下去。当讲到国民党张荫梧等勾结日伪进攻十八集团军的罪行时，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大声质问说：“有这回事吗？”叶剑英说：“有！”马上把缴获的张荫梧等和日伪军勾结的信件、命令、通报拿出来，一件一件宣读，并把这些铁证当众交给蒋介石看。蒋介石没有料到叶剑英皮包里藏着那么多法宝，且当面示众，弄得他狼狈不堪，直摸脑壳。叶剑英越讲越有劲，许多人越听越同情十八集团军和共产党，抱怨国民党顽固派竟干出这种丢人事。广大听众认为叶的长篇报告，理直气壮，事事有据，处处有理，听到了许多过去不懂的大道理，了解了很多过去不知道的真实情况。一些进步人士更是笑逐颜开，暗中叫好。叶剑英讲演结束时，全场活跃，纷纷起立，连蒋介石、何应钦等人也不得不跟着大家站了起来。这时一看表，叶的精彩讲演整整讲了一个半钟头。

会议结束后，叶剑英立即向南方局作了汇报。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曾家岩、周公馆顿时一片欢乐。秦邦宪高兴他说：“参座，老将出马，大败蒋

家。这可是一个大胜仗。”董必武称赞这次讲演是“叶剑英舌战群儒”，并多次说起这是叶剑英对革命的一大功劳。七大以前，毛泽东在叶剑英呈报来的这篇讲演稿上作了批示：“叶剑英同志 1940 年 3 月在全国参谋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得到广大的同情。”

叶剑英在中共南方局期间，曾经担任统战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并负责军事组工作。军事宣传是党的整个宣传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每逢重要节日和抗战纪念日，叶剑英便组织军事组人员开展各种活动。

他经常出席各种讲演会、纪念会，发表抗战救国言论，同时为报刊撰写了许多文章，谈形势，论战略，宣传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介绍敌后游击战和全国军民抗战的战绩、经验，驳斥某些诬蔑中华民族抗战的谬论，影响深广。

1940 年，德国希特勒进行闪击战，国统区谣言四起。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组织撰写《论闪击战》一文，在《新华日报》上连续发表，驳斥了闪击制胜论，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1940 年 10 月至 1941 年 1 月，在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前后，叶剑英协同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领导和团结国统区的抗日力量，采取各种方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在收到新四军被围的告急电后，叶剑英立即找国民党代表交涉，多次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提出抗议，强烈要求制止围攻新四军。事变发生后，叶剑英组织军事组，连夜赶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广为散发，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屠杀和罪行。

叶剑英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带领南方局的同志在受国民党特务监视包围的极其艰难的境况下，“虎穴坚持神圣业”，进行有利有理有节的顽强斗争。

当时，军事统战工作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交朋友活动。叶剑英同国民党的许多领导人，包括军队中的高级将领都有广泛的接触和交往，以他特有的胆识和才智同国民党人士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与斗争，有效地促进了统战工作的发展，被誉为中共外交战线“三骑士”之一，同周恩来、董必武齐名。

在延安最高统帅部

1941 年 2 月，叶剑英告别周恩来，结束了长达 4 年之久的国统区的统战工作，从重庆飞抵延安，回到最高统帅部，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作战和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谋略和建议，成为毛泽东、朱德在军事上的得力助手。

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敌后军民的战略战术有许多新的发挥和创造，叶剑英十分重视这些宝贵经验，组织参谋部的同志及时了解情况总结上报，并且以军委名义转发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推广实行，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他还组织力量收集国内外有关战争情报资料，编辑出版《作战周报》、《国际资料》等，并定期召开作战情况汇报会，向中央军委首长及各根据地、各战区领导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陈赓、罗瑞卿等提供情况和经验。他提议，在各根据地、各战区以及新四军建立情报网和联络基地，设立气象观察所，以利于作战的指挥和部队的行动。

审时度势，精心运筹，是叶剑英多年来从事参谋部领导工作的一大特点。

他参与中央军委对日作战的指挥，主持战略问题研究会，制定战略行动方案，经常提出带有决策性的意见，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肯定。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形势十分严重。对敌军动态应当如何估计？侵华日军主攻方向是北上配合德军进攻苏联，还是南进？对此，延安总部参谋人员和国内外的军事家看法各异。叶剑英全面分析研究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和日本的国情，认为日军南进的可能性大，因而我们作战指导思想的侧重点，要放在对付日军南下上，并将这一意见上报给中央，供决策参考。他的意见被党中央采纳，并被后来的战争进程所证实。

在考虑对日军作战的同时，叶剑英还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阴谋活动，协助毛泽东、朱德等制定反磨擦的斗争和方针、政策，取得了胜利。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集结四五十万军队，准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大举进攻。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已深入敌后对日作战，陕甘宁边区兵力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个以智退敌的政治宣传战方案。他建议使用中共掌握的军事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阴谋，以为退兵之计。中共中央采纳这一方案，除调部队准备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外，决定大力开展宣传战。结果，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计划，又一次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发展，抗战圣地延安成为我国抗战和革命的中心，吸引来大批国内知名人士和新闻、文化工作者，叶剑英总参谋长经常受党的委托，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延安总部，向各方面人士介绍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情况。

英、美等国为了最后战胜德、意、日侵略者，特别是为了打败日本，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力与物力，利用我党、我军、我敌后根据地强大的有生力量。英、美等国，尤其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和需要，于1944年3月向我提出要求，派英、美、加、澳等国的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我解放区了解我军力量及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我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目的是为了使我能配合反攻日本。

中外记者团于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10日下午5时，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设宴款待中外记者们。叶剑英参谋长代表朱总司令致欢迎词：“这次记者团在参观的过程中，对于我们的各项工作予以指教，并欢迎大家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参观。”叶剑英讲话后，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孔昭愷代表中国记者讲话。然后举行盛大音乐会，演奏了《同盟国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和各种民歌。

在毛泽东主席会见中外记者团之后，6月22日，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报告。叶剑英在报告中分敌、伪、友、我四个方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截至1944年3月前抗战七年来的基本情况，宣读了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伟业而献出了生命的国际友人的名单，并对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的许多援助表示感激。报告以有力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派遣军队对我根据地进行攻击、包围、封锁，派遣成千特务进行破坏等恶劣作法，最后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

这是一个高水平的报告，中外记者听后反映十分强烈。有的外国评论家说，叶的报告“掷地有声”，是“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中共高层意见

于一身的谈话”。

叶剑英的报告通过中外记者的笔传播到中国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以后，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特别是对国民党已深感失望的美、英等国家的一些政府要员与高级将领，更加关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

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后一个月，在史迪威将军的大力提议和赞助下筹建起来的、并且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坚决支持的美军观察组开始分批到达延安。观察组组长是美国陆军中有名的“中国通”戴维·包瑞德上校，下设四个小组。

7月22日下午，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乘坐的一架美制C—47型运输机飞临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迎接。

观察组到延安后，8月3日上午，叶剑英向他们全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情况和部队的编制、组织装备等情况，比向中外记者团所介绍的更为详尽，引起对方极大兴趣。包瑞德上校不时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叶剑英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会谈中有问有答，气氛十分融洽。叶剑英谈话结束时，美军观察组成员全体起立，包瑞德上校致词说：“今天，叶将军所作的报告是很有趣味很有价值的，我们能听到叶将军的报告是很荣幸的。叶将军，你以这样充分的对我们的信任来作报告，我向你保证，对你报告的这些材料，保证以很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待之。”

正式会谈之余，叶剑英还特意到包瑞德住地去看望他，同他亲切交谈。双方还在友好气氛中交换了一些情报和军用品。时隔二十五年后，包瑞德在他撰写的回忆录《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中，这样写道，“叶剑英是一个个子较高、英俊精干的人，衣着始终整整齐齐。他是广东客家人，讲话带有广东口音。总的来说，他的介绍是客观的。”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活动之后，在叶剑英的精心安排下，分小批赴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考察，历时四个半月，行程二千英里。

（范硕）

一箭双雕，刘伯承用兵如神

这是抗日战争前期发生的一场国民党军观摩八路军实战的战斗，是由国共双方高级将领讨论抗击日军九路围攻引起的。

刘伯承说，请诸位吃过早饭进入观摩阵地，十一时半就可以吃到日本人送来的“午餐”

1938年3月24日至28日，在沁县小东岭，国共双方军队高

级将领在一起举行了一次作战会议。八路军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刘伯承、徐向前、徐海东、薄一波、朱瑞、李达等；中央军和晋绥军参加会议的有第三军军长曾万钟、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第一六九师师长武士敏、第九十四师师长朱怀冰、骑兵第四师师长王奇峰，还有山西新军决死纵队一、三纵队领导等三十多人。这一天，兼山西战区东路军总司令朱德主持会议。朱德说：“诸位将军，民族危难之际，国共两党高级将领聚在一起，商讨抗日大计，这是一件难得的大事，可庆可贺。鸦片战争以来近一百年，中华民族有着同外来侵略看作斗争的优良传统。今天，国共两党依靠这一优良传统进行的平型关战斗、忻口防御战、正太线防御战、太原会战，是国共两党军队并肩战斗，密切配合进行的。尤其是忻口战役，是一次两党军事合作的模范。在战斗中互相配合默契。周恩来副主席组织八路军和民众抢救友军伤病员，许多八路军的血流进了友军官兵的血管里，这种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是战胜日寇的最强大的武器。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忘记了旧怨。有人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我今天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互相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在山西战场，由于两党军队的团结合作，搅乱了敌人的进攻计划，迫使敌人陷入处处挨打、欲退不可欲进不能的泥潭中。”

朱德继续说：“从一二九师在神头岭战斗缴获的敌人信件和文件、地图得知，华北日军第一军香月清司为配合徐州台儿庄的作战，决定对晋东南地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围攻。他们以第一八师团为主力，纠集第十六、第二十、第一九师团及酒井旅团各一部，再加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一共十个联队三万兵力，由榆次、太谷、洪洞、邢台、平定、涉县、长治、屯留等地，分九路向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扑来，实行所谓广大广大地开展，压缩压缩地歼灭的作战原则，妄图把我们的主力合击消灭在辽县、榆次、武乡地区。我们如何对付敌人的九路围攻呢？诸位将军可以畅所欲言。如今两党合作，爱国是一家，是一家就不说两家话，请大家不必拘谨，大胆直朱德介绍了形势和敌情后，大家对任务和方针进行了讨论。彭德怀发言说：“国共两党军事上分工，国民党担负正面战场作战，共产党担负敌后游击任务，这是两个相互依存、相对独立的战场。山西八个月的抗战事实证明，这种分工是恰当的，是相互需要的。正面战场需要敌后战场的配合，敌后战场也需要正面战场的配合。如果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无从顺利开展游击战，敌后游击战起到了钳制正面战场敌人的作用。要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必须纠正单纯阵地防御战的观点，坚持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用游击战出其不意地歼灭行进中的敌人。还有四件事，必须立即要做的：一、必须改造旧的政权，

成立以工农为主体的抗日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二、军队要实行战时政治工作。三、要武装民众，发动游击战。四、对俘虏和汉奸的政策要具体详细。”

左权在发言中说，“八个月的对日作战经验告诉我们，敌人最擅长也最喜欢打声势浩大的进攻战，而我们就不能打单纯防御性的阵地战。如果打单纯防御战会使敌人的兵器技术优势得到发挥，使我遭受消耗和损失。因此，反九路围攻，要尽可能实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要想方设法避实就虚，在敌翼侧或侧后机动，如果在正面袭击和突击，正符合敌人的企图，不仅劳而无功，反会遭受很大损失。”

左权话音刚落，一位年约四十多岁的中将高声说：“报告朱将军，我发言。”朱德抬头一瞥，微笑着说：“啊，是赵寿山军长，请讲。”

“刚才听了朱将军、彭将军、左将军的报告和发言，顿开茅塞，受益匪浅。”赵寿山一字一句他说，“我同意朱彭左三位将军的见解，对付敌人的九路围攻，必须采用灵活战术，尽量避免单纯呆板的阵地防御战。我军在娘子关战斗中失利的原因之一，就是战术不灵活，部队调不开，拥挤在一起，正好给敌人的大炮飞机发挥了优势。我感到八路军的战术比较灵活，虽然打的小仗多，但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今天歼灭敌人三百，明天歼灭敌人五百，几个小胜仗加起来就是大胜仗了。我们很想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可惜思想不统一，又没有教材。今天，八路军的游击战专家刘伯承将军来了，我提议，请刘伯承将军介绍游击战经验，诸位将军意下如何？”众人点头称好。

刘伯承摆摆手，说：“赵军长过奖了，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帮助，我们一二九师在晋东南才打了一些胜仗，仅仅是开了一个头。但战争实践是面镜子，我们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部队在战斗结束后不准备打增援部队，有时只知突击而不顾巩固阵地，还有步炮协同不好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战斗中克服。”

“刘将军不仅运筹帷幄，料敌如神，而且品德高尚，打了那么多胜仗，只字不讲战果，讲问题却讲个没完没了。”武士敏讲到这里，解开衣扣，说：“刘将军指挥的战斗，打得干脆漂亮，在我们这些游击战的外行看来，简直是‘押宝’的战斗，命中率达到百发百中。就连日本人也称神头岭战斗是典型的超一流的游击战术。伏击部队伪装得极其巧妙，在发起战斗前，一千多日军一个没发现两旁的几千人马。战斗一打响，日军步兵没展开，骑兵还没上马，炮还没架起，就像一个大雪球掉进油锅顿时不见了。”说到这里，他伸出大拇指说，“刘将军打仗真神，快介绍介绍经验。”

接着，李家钰、王奇峰也提出要刘伯承介绍经验。这时，朱德对刘伯承说：“伯承，友军对游击战那么感兴趣，你就说说吧！”

刘伯承见推辞不了，说：“承蒙诸位将军错爱，那我就说几句，我把游击战划分为游与击两个概念。游是用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为拖垮敌人和消灭敌人创造条件；击是用来发挥我之特长，避开敌人的长处，以便打垮敌人。但是光游不击不行，光击不游也不行，应当是游中有击，击中有游，拖打兼施，至于游击战的战术动作，我基本概括为袭击、伏击和急袭三种。还有一种叫吸打援敌。这是袭击与伏击的混合运用，所以基本上称三种，又统称为袭击。如何理解这四种游击战术？袭击，就是敌人缩营后，我们乘其不备主动攻击；伏击，就是预先埋伏好，等敌人进入伏击圈，当然伏击并不是守株待兔，有时要主动钓鱼；急袭，就是牵住一部分敌人，吸引

另一部分敌人增援，在增援部队必经道路上伏击。”

“刘将军，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如何使用这四种游击战战术？”武士敏提出。

“要正确使用和掌握这四种游击战术，关键要做到八个字，”刘伯承扬起浓密的眉毛，抬头稍稍环顾四周，见不少人在低头记录，喝了一口茶，说，“有的人提到游击战，觉得游来游去挺容易，但实际做起来又挺难的。我认为关键要做到八个字：秘密、迅速、坚决、干脆。何谓秘密？就是兵力、部署、企图和行动要十分隐秘，要使敌人毫无察觉。何谓迅速？就是一举一动相当快，甚至能在几分钟内消灭敌人，使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来不及发挥作用。即使敌人援兵到，我已解决战斗转移他处，何谓坚决？就是一到战场，就站稳脚跟，用炸弹、刺刀，果敢、勇猛地冲，该杀就杀，把敌人压下去，直至战斗胜利。如果不坚决，钝刀杀鸡，敌将硬起来，反击溃于我。何谓干脆？就是打起来一刀两断，快刀斩乱麻，不拖泥带水。我的话完了，供大家参考！”刘伯承话音一落，顿时响起一片掌声。

这时，赵寿山苦恼他说：“刘将军，我们有时碰到被敌人‘包饺子’的情况，一不小心就被敌人吃掉了。如果被敌人包围，如何组织部队突围，请再介绍这方面的经验。”

“被敌人包围是常见的事，”刘伯承用微笑的目光看着赵寿山，“指挥员必须冷静观察，寻找机会，一旦有时机，果敢组织突围。去年12月，我师在平汉路、正太路、同蒲路沿线破铁路，袭击据点，搅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驻太原日军第二十师团师团长田川岸文三恼羞成怒，亲自挂帅，指挥步兵两千人，飞机三架，一个骑兵连，附平射炮、曲射炮十门，12月22日起，从平定、昔阳、榆次、和顺、太谷等地，分成六路以马蹄形的阵势，包围正在正太路破路的七七二团。在头一天，田川岸文三就派特务着中国服装，混入我军活动区域，还派飞机侦察。特务在寿阳的羊头崖，大摇大摆地出来活动，企图诱我出击，然后包抄我们的侧背。我们没有上当。22日拂晓，六路敌人进入预定地点后，开始对七七二团包围袭击。敌人的尖兵分队，也着中国军服，抓了本地人给他们带路，用刺刀逼他们沿途杀人放火。我们发现敌人企图，命令七七二团在内线沉着应战，寻机突围，又命令外线的七六九团、汪支队、秦赖支队配合作战。22日，七七二团在松塔同敌人激战一天，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天黑了，我们利用敌人不熟悉地形的弱点，留一小部分在原地继续同敌人周旋，大部兵力从敌人之间的结合部突出包围圈。但是，拂晓时刻，敌人发现我们突围，又调整部署，在南北军城又将七七二团包围了。七七二团白天利用有利地形同敌人磨时间，天一黑，我们组织数十支小股部队到处袭击，敌人在山区三转两转，便分不清东南西北，七七二团又从敌人之间的结合部突出了包围圈。可笑的是，天亮后敌人发现包围的不是八路军，而是他们自己人。敌人被拖得精疲力尽，不得不草草收场。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就像在家门口打仗，有群众支持，再加熟悉地形，再强大的敌人都可以征服，秘诀很简单，就是要有决心，要有智慧。”刘伯承说罢，又是一片掌声。

这时，坐在武士敏旁边的九十四师师长朱怀冰，一副城府很深的样子，掐灭手里的香烟，对刘伯承眨了两下眼睛，皮笑肉不笑他说：“刘将军讲得好，兄弟一直洗耳恭听。刘将军真是名副其实的游击专家，可惜的是，我们没有亲眼目睹，如果能亲眼目睹一次，那兄弟就口服心服了。”朱怀冰说到

这里，抬头看看其他人的表情，察觉到自己说得有点不礼貌，便改口说，“刘将军对我刚才的话不必介意，我很想亲眼目睹你指挥打仗的风采，也给诸位一饱眼福，如有机会，那该多好啊。”

刘伯承知道朱怀冰是不怀好意，气得想说没说出来。心直口快的彭德怀也察觉到朱怀冰的心迹，却先开了腔，说：“朱师长想亲眼目睹刘伯承指挥打仗，这事不难，因为到处是鬼子，到处可以摆战场，不过今天已是28日了，敌人马上要九路围攻，你看能不能推迟几天？”

“不必推迟。鬼子围攻还有七八天时间，能不能就在这三天之内，或者3月31日这一天，怎么样？”朱怀冰目光狡黠地望着彭德怀，“具体地点在涉县、东阳关一带，你们看怎么样？”

彭德怀觉得有点为难，因为马上敌人要九路围攻，还要研究反围攻作战计划，于是用征求意见的口气，对刘伯承说：“你看朱师长的要求如何，能否答应？”刘伯承和徐向前、李达交换眼色后，坚定地说：“朱师长的要求我们答应了，而且日期不变，具体地点一是要侦察，二是要保密，暂不确定，30日晚上正式通知。”

“这是友军对我们的督促，”朱德对其他几位国民党将领说，“其他几位将领如有兴趣，也可同朱师长一道观战如何？我们总部人员自始至终陪同。”

“好！”其他几位齐声叫好。

“诸位将军，”刘伯承说，“具体时间确定在31日早上，请诸位七时半吃过早饭进入观摩阵地，九时开始战斗，十一时战斗结束，十一时半就可以吃到日本人送来的午餐。”

一向沉默不语的曾万钟惊叫道：“刘将军成了诸葛孔明了，越说越玄了，由日本人送午餐？日本人从什么地方送来？”

“是的，叫日本人送午餐，”刘伯承说，“这天的午餐由日本人从东京送来。”

邓小平在研究作战部署时说：我们这一仗要一箭双雕。一方面给友军做个打游击战的榜样，一方面扰乱日军的九路围攻计划。

会议在继续进行，刘伯承、徐向前、李达为了准备友军观战，连夜赶回师部，和政委邓小平、参谋长倪志亮研究商量。邓小平说：“我们打好这一仗要一箭双雕，一方面给友军做一个打游击战的榜样，一方面扰乱日军进攻潼关、西安、陕甘宁边区计划。当下日军正向黄河各渡口攻击，我们打一个较大的伏击战，就能迟滞敌人的行动。”说毕，来到地图前，指着涉县东阳关地区公路，说，“据侦察员到这一带侦察，敌人来往汽车不断，几乎每天都有几十辆，甚至上百辆。我们可以在响堂铺设伏。这是比较理想的伏击地方，这里公路沿小河床而过，路南是高山，悬崖峭壁多，不易攀登，路北是起伏高地，谷口多，便于隐蔽和出击，在这儿打把握比较大。”

细心的刘伯承用手指在东阳关、响堂铺、涉县三者之间比划了一下，略思片刻，说：“就这么定了，为了迅速干净歼灭敌人，打援力量减少，伏击力量增加。”转脸对李达说，“命令七七一团、七六九团为第一梯队，七七一团为右翼队，七六九团为左翼队，七七二团为第二梯队，集结于冯家沟，负责东阳关方向游击警戒，阻击可能由黎城、东阳关来援之敌，掩护伏击部

队后方安全。七六九团抽出四个连到椿树岭，河南店之间，阻击可能由涉县来援之敌。”说到这里，转脸对邓小平说，“你和向前在师指挥所，我和李达到现场指挥如何？”

“你要陪友军将领观摩，责任也不小，他们可能提出不少问题要你回答。现场指挥我去！”徐向前说。

刘伯承推推眼镜还想说什么，邓小平摆摆手说：“不用争了，向前担任前线总指挥，我也去敲敲边鼓。就这么定了！”顿了顿，对徐向前说，“向前，这次友军来观摩的将领，不少是你黄埔军校的同学，这一仗要打得干净利索，以我们坚定抗战的决心，推动他们为抗战作贡献。你对作战计划如有修改，还可以调整。”

“我领会你的意思，”徐向前说，“计划很好，补充一点，就是伏击部队要尽量向路边靠，既能隐蔽，又要在步枪的射程之内。”

一切安排就绪后，邓小平、徐向前来到伏击部队，进行战前动员。一二九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这个部队的干部战士都熟悉他。徐向前在队前一站，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个个肃然起敬，静心地听他讲话。徐向前问：“同志们，我们四方面军的光荣传统是什么？”

“英勇杀敌，所向披靡！”战士们的回答，震撼着山谷，震撼着大地。

“同志们，英勇杀敌，所向披靡的传统，要在抗战中发扬光大。现在的局势起了巨大变化，敌人已经‘饮马黄河畔’，我们八路军和一部分友军留在敌后坚持抗战。几十万友军留在敌后，抗战信心不足，又不会打游击战。邓政委号召我们，要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以积极行动推动友军，给友军做一个榜样，影响和帮助他们打游击。明天的响堂铺战斗，我们要打出一流水平！”

3月31日上午七时半，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带着友军观摩将领二十多人，来到杨家山顶端，隐蔽在观摩阵地距公路只有两里路处，这里不用望远镜也能看清楚公路两边的情况，他们看了好一会，不见动静，也看不到一个战士。朱怀冰焦急地对朱德说：“请问总司令，还有半小时就打仗了，你们部队怎么还没到呢？”

“朱将军别心急，”朱德胸有成竹地微笑说，“不会唱空城计的。”

大约过了十分钟，东阳关方向隐隐约约传来汽车马达声，又过了十分钟，一辆汽车开过来了，朱怀冰陡然惊叫道：“哎呀不好，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我们离鬼子太近，如果鬼子子弹打过来怎么办？飞机来丢炸弹怎么办？炮弹打过来怎么办？”

“朱将军别慌，我们观战保证是有惊无险，这里距公路两里路，步枪子弹打不到这里，鬼子的炮来不及架，我们就叫他们上西天了。”刘伯承又反问道，“你们指挥打仗难道看不见鬼子，听不到枪声？”

“是啊是啊，”朱怀冰边点头边颤抖着说，“听到枪声还了得啦，鬼子打到面前来不及撤退怎么办？”说到这里，指着路边说，“你看，鬼子车队前两辆小汽车停了。”刘伯承抬头，果然见两名鬼子军官从小汽车上下来，举着望远镜四下张望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现，便向后面车队挥挥手，示意他们不用怕，继续前进。朱怀冰又叫嚷：“怎么不开枪呢？鬼子要溜了，再不打就没机会了。”此时，他见没人理睬他，也就不吭声了。大约过了一百辆汽车，后面又来了一百辆汽车。就在这一霎那，突然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接着路两边冒出无数火光，迫击炮、机关枪、步枪一齐发射。又响起一阵嘹亮的冲锋号，只见从路两旁的山沟、田边，突然跃出无数伏兵，如猛虎下

山般冲向公路。汽车上的鬼子有的应声倒下，有的跳下车子钻进车底下仓促应战。鬼子开始抵挡一阵子，后来渐渐不支，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不到两小时，大部分鬼子连枪、炮都没来得及用就丧了命，二百辆汽车冒起了弥天黑烟，这段蜿蜒公路顿时成了火龙，变成侵华日军的火葬场。

朱德在回答国民党军将领的“大惑不解”时说：“我这个总司令和我的师长们还没有你们的班长薪金多。我们打胜仗，是因为加强对官兵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

战斗结束，徐向前来到观摩阵地，向朱德报告战果：歼敌四百多人，烧毁汽车二百辆，缴获各种枪支四百多支，俘虏三个日本兵，还有堆积如山的各种罐头。

友军将领听完战果，个个赞叹不已。曾万钟惊奇地叫道：“八路军的游击战真是名不虚传啊！”这时朱怀冰又神气起来了，厚着脸皮以事后诸葛亮的口气对朱德说：“我早就说过八路军能打仗嘛，我对刘伯承的游击战服了。前几天我讲的话，有点不太好听，请朱将军包涵。”这时，突然有人喊道：“开饭了！”人们的眼光向山下看去，只见十多个战士抬着几筐刚缴获的食品罐头上山来了。观摩的友军将领们见到花花绿绿的各种食品罐头，乐得像小孩似的。他们每人分得五个有猪肉、牛肉、水果的罐头，还有两盒牛奶饼干，两条富士牌香烟。徐向前说：“诸位将军们，这就是东京送来的午餐，大家别客气，不够再到我这里拿。”

正当大家拿着罐头吃午餐时，赵寿山来到朱德面前，说：“今天有幸大开眼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不过小弟有一难题大惑不解，不知当问否？”

朱德笑着说：“赵军长，早几天开会时，我就说过如今抗日爱国是一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何难题尽管说。”

“今天这一仗打得漂亮，除了刘伯承将军足智多谋，料事如神，还有士兵英勇杀敌。不过——”赵寿山顿了一会儿，接着问，“今天这几千士兵为何如此勇敢，一声令下，就如猛虎下山？有句老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战前，你们是不是给每位士兵加发了几十块大洋？”

“没有！”朱德摇摇头，苦笑着说，“我们的经费少得可怜，南京政府给我们的经费一个师只有三万元，还不如你们一个营的经费多呢。”

“可是，我们三十八军作战前也反复讲，而且冲锋前军官还提着枪在背后督战，但士兵仍然提不起神，这是什么原因？”

“赵军长，此事一言难尽。提到钱，我告诉你还不一定相信，我这个总司令和我的师长们还没有你们的班长薪金多。我们打胜仗，是因为我们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红军的光荣传统，八路军继承了红军的政治工作传统，加强对官兵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激发了他们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

“哦——”赵寿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后来，应友军的要求，八路军总部派人友军培训了大批政工干部。

（胡兆才）

彭德怀临危受命，掌帅印抗英援朝

1950年10月4日上午10时左右，从北京飞来一架草绿色军用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从飞机上走下两名客人，都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工作人员。两人下机以后，立即乘车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大楼。当他们急促地来到彭德怀的办公室时，发现他正在埋头审阅关于西北经济建设的一大堆文件。来人向彭德怀敬礼后说：“主席请你立即坐飞机去北京开会。”彭德怀惊奇地问：“我已接到周总理的电话，但不知开什么会这样急？”来人说：“我们也不清楚。周总理只是对我们交待说：飞机到西安，接彭老总来北京，一分钟也不要停留。”彭德怀迟疑一会说：“我总要向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同志打个招呼吧！”来人又催促说：“那就简单交待一下后赶快去机场！”彭德怀立即把西北局秘书长常黎夫找来，交待了几句，又把张秘书叫到跟前说：“你把西北各省报来的三年经济恢复计划方案和各种资料统统带上，马上跟我坐飞机到北京开会。”张秘书立即照办。就这样，他们连换洗的衣服也来不及到宿舍去取，就随北京来人乘车去机场了。

飞机上午11时左右起飞，12时30分左右在太原机场降落加油。在机场上，彭德怀遇见了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和苏联顾问沙契柯夫。沙契柯夫听说是大名鼎鼎的彭德怀，非要拉他共进午餐不可，因此飞机迟至下午2时30分才由太原起飞，下午4时左右，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他们走下舷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李科长已在机场等候多时了。

汽车直接把彭德怀送进中南海大门，停在“丰泽园”门前。当他来到颐年堂门口时，周恩来迎了出来，握住他的手说：“彭总，会议在下午三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待你。”彭德怀随周恩来进入颐年堂，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都先后站起来和他握手。毛泽东说：“彭老总，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在朝鲜已开始向“三八线”以北进攻，大家正在讨论我国是否出兵援朝的问题，请你也谈谈意见。”彭德怀坐定之后，立刻感到会议的气氛非常严肃，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由于他脑子里装满了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这样的紧急会议毫无思想准备，所以只好侧耳静听。他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才知道中央政治局对出兵援朝问题有分歧；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其理由是：（一）我国经历了几十年战争的破坏，战争创伤急待恢复，而财政又十分困难；（二）国内还有一百万国民党残余部队急待肃清；（三）台湾和沿海部分岛屿尚待解放；（四）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新建的政权也不巩固；（五）我军的武器装备与美军装备相比十分落后，又无制空权和制海权；（六）由于长期战争的艰苦生活，有些干部战士产生了和平厌战的思想情绪等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认为现在我国的情况是困难重重，出兵援朝应慎重从事。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时写道：“总之大家认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毛泽东主席一面听大家发言，一面接连地吸烟，在散会之前，毛泽东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今天休会后，大家回去再认真考虑考虑，明天下午继续讨论。”

散会后，毛泽东向彭德怀走过来，说：“德怀同志，对出兵援朝问题，你有什么高见，今晚好好睡一觉，明天上午请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先交换一下意见好吗？”彭德怀答道：“我等你的通知。”

毛泽东为什么要急于和彭德怀单独交谈呢？因为他已得到斯大林的通知，苏联不准备出兵。如果中国也不出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必将灭亡，美军就要进到鸭绿江边，将对中国造成很大威胁。因此，中央书记处于十月二日就拟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援朝。但这次出兵援朝，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风险很大。我军是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而敌军既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又有高度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我军的武器装备与敌相比悬殊甚大，志愿军入朝后，能否大量消灭美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站稳脚跟，这是关系到国威军威的大事，所以必须挑选一位在党内军内具有高度威望又能指挥大兵团作战的高级指挥员来负责。中央书记处认为林彪原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司令员，现在集结在鸭绿江边的几个军都是东北的部队，而朝鲜北部的地形特点和气候条件与我国东北地区也相近似，所以由林彪担任志愿军司令员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毛泽东紧急把林彪召到中南海，向他说明中央的意图。林彪一听顿时精神紧张，脸色苍白，他强调出兵援朝应慎重考虑，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美国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36门，美国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我军入朝既无空军也无海军，在敌我武器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林彪不主张出兵，实际上是掩盖他内心的恐惧。他的意见并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毛泽东一言不发，只是接连地吸烟。林彪又接着说，他最近身体虚弱多病，每晚失眠，怕风、怕光、怕声音，如果率军入朝作战身体支持不了，难以指挥作战，他希望中央对志愿军司令员一职，另物色人选。林彪的态度使毛泽东深感失望，但是出兵援朝已迫在眉睫，尽快选定志愿军司令员是当务之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想起了尚远在西安的彭德怀。今天下午他已赶到北京，但他在会上没有发言，毛泽东还不知道他对出兵援朝的态度，所以要约他第二天上午个别交谈。

10月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警卫处将彭德怀送到北京饭店3楼309号房间休息。当他带着疲倦的身躯跨进房间后，看见的是一盏盏耀眼的花灯，映照着红彤彤的地毯，高大的穿衣镜树立在一排金丝绒沙发中间，这位长期住惯了茅屋、土炕的他，对此真感到不习惯。晚饭后，他站在阳台上，凝视着长安街上来往的车辆和人群，在灯光照耀下，一幅“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大标语格外醒目。这时警卫员小郭推门进来：“首长，你今天太累了，早点睡吧？”彭德怀回到房间，脱下外衣，躺在沙发床上。已是夜深人静，除了风吹落叶的声音外，四周一片寂静。这本来正是酣睡的时刻，而这位具有忧国忧民品性的“彭大将军”却两眼注视着雪白的天花板，毫无睡意。“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毛泽东今天在会上讲的这四句话，在他头脑里反复回荡，使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1968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期间回忆当时的心情写道：“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不习惯，此福享不了，于是把被褥搬在地毯上，还是睡不着。我想如让美国占领朝鲜，与我国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我把主席的四句话，反复思念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拥护主席这一英明的决策。”凌晨三时左右，住在隔壁的张秘书一觉醒来，发现彭德怀的房间还开着灯，想劝他早点睡，可是推门一看，吓了一跳，看见彭德怀奇怪地坐在地毯上，床上的被

褥、枕头等都落在地毯上，张秘书惊奇地问：“你怎么从床上掉下来了？”彭德怀不理他，随后把手一甩说：“你睡你的觉，别管我。”因为政治局的会议是绝密的，张秘书对会议内容毫无所知，所以对彭德怀这样的举动感到莫名其妙。张秘书又问：“你今天太累了，是不是请医生来看看。”此时彭德怀有些烦躁说：“我没病，你赶快回去睡觉。”张秘书虽在彭德怀身边工作多年，但像今天发生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彭德怀这样反常的举动，直到10月8日才揭秘。

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即10月5日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来到北京饭店彭德怀的房间，两人交谈了半小时后，即同车去中南海。这是毛泽东特派邓小平来接彭德怀的。当他们来到毛泽东的庭院时，毛泽东从室内迎出来，彭德怀上前同毛泽东握手，看见他疲劳而浮肿的双眼，问道：“主席，你昨晚没睡好吧？”“你想想我能睡好吗？吃了三次安眠药也没睡着，咳！已经好几夜没睡了。”彭德怀接着说：“我昨晚也是几乎没睡，我对你最后讲的四句话反复考虑，对朝鲜现在的处境也很焦急，我这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有些个人的观点也想和你谈谈。”毛泽东高兴地让彭德怀坐在沙发上，说：“老彭，现在美军正在越过‘三八线’北进，关于我们是否出兵问题，今天下午政治局还要继续开会讨论。昨天的会上大家摆了很多困难，我们确实存在一些困难，甚至是严重的困难，但是怎样战胜和克服困难，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不知你彭老总是怎么考虑的？”彭德怀坦率地说：“昨晚我几乎没有睡觉。反复考虑，你最后讲的几句话，我体会到这是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如果只强调困难一面，不同美军进到鸭绿江边的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难保，我国东北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经过反复对此考虑后，我拥护主席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听完后，微笑着点点头，兴奋地说：“好哇！还是你彭老总战略远见，看来你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我的意见啰！”然后他仰躺在沙发上气愤他说：“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眼前，看不到将来，更有人被美国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不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吗？”彭德怀接着说：“大家摆的困难情况也是事实，但美国也有困难，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长……我们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扬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优良战斗作风，就可战胜敌人。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兵力是24万人，武器装备几乎都是美国的；我军只有25000人，只占敌军兵力的十分之一，武器落后，弹药缺乏；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人口稀少，为什么能打败胡宗南？就是一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二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靠我军优良的战斗作风。现在我们已取得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只要在战略战术上不犯重大错误，我们就有信心战胜美国侵略军。”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完彭德怀的话后，高兴地用手捶了一下沙发：“你分析得很对，看来咱俩是想到一起了。现在美军正向平壤逼近，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已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朝鲜情况十分危急。金日成再次来电要求我国尽快出兵援助，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不能再举棋不定了。”此时，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侧过身试探地说：“老彭，带兵入朝和美国军队作战要冒很大风险，你看派谁挂帅合适呢？”彭德怀急问：“我听说中央不是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毛泽东立即紧锁双眉，叹了一口气说：“原先准备派他去的，因为从各方面考虑他比较合适，可是前几天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精神有些紧张，一再说身体虚弱，睡眠不好，怕光、怕风，怕声音，难以

接受任务。”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后说：“现在朝鲜的战火很快就烧到我国的大门口，我们必须马上出兵，既然林彪不肯去，中央的意见，这副重担，还是请你彭老总来挑，这是一场比保卫延安更艰苦更复杂的战争，不知你身体情况怎样？你考虑有什么困难？”此时室内呈现出短暂的沉寂。片刻之后，彭德怀两道浓眉一扬，郑重地说：“主席，我这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面带笑容，亲切而高兴地说：“还是你彭老总能顾全大局，中央有难，挺身而出，这样我就放心了。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讨论，谈谈你的观点和意见吧！”

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彭德怀经过考虑后作了发言。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第二天下午中央又在颐年堂开会，在其他同志发言后，我讲了几句。我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军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

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显然早已心中有数，他立即用手敲着桌面说：“我认为彭老总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我们当前确有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如果还是犹豫、退缩、担心、害怕都没有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即出兵援朝。至于由谁挂帅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提议由彭老总率领志愿军入朝。”毛泽东的发言，立刻惊动了会场，使严肃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以尊敬的目光投向彭德怀。他立刻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回忆彭德怀临危受命的情况时写道：“彭德怀同志在会上的坚决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要和彭德怀、高岗共同研究出兵方案，故留下彭、高两人一起吃晚饭。在晚饭前，彭、高两人在南海畔，迎着金秋十月的微风缓缓散步，高岗拍着彭德怀的肩膀说：“老总啊！你真不愧是彭大将军，至今还不服老。”其实，他已有五十多岁，且患有直肠溃疡病，经常大便出血，但他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从不考虑个人的问题。晚上，毛、周、彭、高四人共同研究了志愿军出兵的初步方案。为了加速准备工作的进行，毛泽东指示：彭、高二人8日飞沈阳传达中央的决定，周恩来8日飞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苏联空军支援和武器装备供应问题。对其他一些问题，也作了初步研究。彭德怀离开中南海已是6日凌晨3时。他回到北京饭店后，没有上床睡觉，而是躺在沙发上吸烟。张秘书知道他平时不吸烟，一旦他吸烟必有重大问题在思考，走过去轻声说：“我今天把带来的三年经济恢复计划已分送中央首长和有关部门。我们明天怎么安排？”彭德怀沉思一会说：“明天你给我几个侄儿、侄女们的学校打个电话，让他们请两天假到我这里来玩玩，我想看看他们。”

10月6日，旭日东升、曦光临窗。警卫员轻轻推开彭德怀住房的门，发现这位两夜没合眼的首长竟躺在沙发上睡觉，于是顺手拿起毛毯盖在他的身上。可是由于彭德怀头脑里装满了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是似睡非睡，稍有动静就醒了，他突地站起身来，用手揉了一下两眼，就去洗脸、吃早饭，因为今天上午，他要到中南海参加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的军委扩大

会。会上确定立即组建志愿军司令部，志愿军分批更换武器装备，以及出兵时间、后勤供应等一系列问题。彭德怀参加了一整天的紧张会议，回到北京饭店已近深夜。张秘书迎上前说：“我把孩子们都接来了，他们正等待你回来。”彭德怀推开房门，见大孩子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伯伯回来，几个幼小的却早已在床上睡熟了。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特急命令称：“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进攻，籍以保卫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现将东北边防军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彭德怀于8日清晨和高岗乘飞机冒雨飞抵沈阳。翌日，他在志愿军军以上高级干部动员会上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然后说：“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是机械化部队，并有空军和海军的支援，进攻速度很快，我们力争在敌军攻占平壤之前渡江作战。中央派我担任志愿军司令员，也只是三天前才决定的。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各军要克服一切困难，在十天之内，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

10月10日，彭德怀获悉“联合国军”十几万人在大量飞机、坦克的支援下，已于9日全部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朝鲜人民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人民军立即放下武器，停止作战，无条件投降。彭德怀心急如焚，他顾不上吃饭，让警卫员带了一袋馒头干，急忙乘火车连夜赴安东（丹东），到志愿军第一线部队视察。当他得知敌人正分兵多路向中、朝边境猛烈进犯时，为使志愿军在地面兵力上占绝对优势，彭德怀急电毛泽东：“原拟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师，恐鸭绿江桥被炸毁后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将4个军、3个炮师全部集结江南待机歼敌，改变原定计划，妥否盼示！”毛泽东当即复电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对第一次战役取得胜利起了关键作用。

彭德怀这次率兵入朝，面临的是新的战场，新的敌人。为能达到知己知彼，以获初战胜利之目的，他本想于11日过鸭绿江会见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商谈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问题。但此时毛泽东突然来电称，苏联空军暂不出动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并令他和高岗速回北京面商。10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对是否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彭德怀发言说：“空军在战场上只能起辅助作用，要战胜敌人还要靠地面部队，我们过去没有飞机支援，不是也打败敌人取得胜利了吗？”毛泽东最后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敌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也要立即出兵援朝。

10月16日，彭德怀自北京飞抵安东（丹东），主持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宣布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同时布署各军渡江方案。关于入朝后的作战行动，他强调指出：“过去我们在国内采取的作战方式，在朝鲜战场上不一定适用，因此在战术上必须灵活机动，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形式，如敌人来攻，要坚决顶住，一旦发现敌人弱点，即从侧翼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将敌包围歼灭。我们不死守某一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阵地。”彭德怀根据一些指战员的思想情绪，特别强调：“入朝作战要有长期艰苦的打算，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绝不能违犯纪律。”

10月17日，“联合国军”开始围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19日彭德怀和高岗再次被召回北京，毛泽东针对朝鲜局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给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下达出兵命令如下：“4个军及3个炮师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到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彭德怀乘飞机返回安东当天（19日）黄昏，在部队渡江之前，他便带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乘车驶过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他想尽快和金日成会谈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行动。不料当天敌军已攻占平壤，金日成转移新的地址，经过多方联系后，于21日晨抵达金日成指定的会谈地址昌城郡一个小山村大洞。上午九时，彭德怀在我国驻朝鲜大使馆参赞柴军武陪同下，和金日成在一间农舍中开始第一次见面，会谈。金日成首先代表朝鲜劳动党中央和全体朝鲜人民感谢毛泽东主席对朝鲜人民的支援，并热烈欢迎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助朝鲜人民作战。彭德怀说：“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经过反复讨论后，决心出兵援朝。中国志愿军先头部队共有4个军12个步兵师和3个炮兵师约25万人，现正分批过鸭绿江入朝作战。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我又致电毛主席速调两个军尽快入朝，这样第一批志愿军将有6个军约35万人。根据敌军兵力和装备情况，为保证有充足的预备队，我们准备再调6个军作为第二批入朝参战。”金日成听后高兴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感谢中共中央对我国的大力援助！”彭德怀又说：“志愿军入朝后，能否在朝鲜站住脚，我看有三种可能：一是大量歼灭了敌人，站住了脚；二是歼灭了部分敌人，双方僵持下去；三是又被敌人打了回去。当然，我们力争第一种可能。”当彭德怀问朝鲜人民军当前情况时，金日成说：“现在我们只有3个师的兵力且大部是新兵，主力部队被敌人隔在南方现在正向北撤退中。”彭德怀听后很惊奇地说：“根据敌人正疯狂北进和人民军的现状，我们原计划在平壤至元山线以北构筑防御阵地阻敌北进的方案已难实现，因人民军难以阻击敌人攻势，而志愿军是徒步行军，在敌人大批飞机轰炸下，只能是白天隐蔽，夜间行军，因此难以抢占预想阵地。现在敌已攻占平壤，正疯狂向北进攻，我刚到朝鲜，情况还不熟，为了使中、朝两军共同打击敌人，希望金首相住在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随时协商处理作战方面的重大问题。”金日成沉默一会说：“目前我国正处于危难之时，我们还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我还要和各国驻朝使馆保持联系，他们都已撤到鸭绿江边，因此，我不便住在志愿军司令部，我拟派内务相朴一禹同志住在志愿军司令部，有什么重大问题，可以通过他和我联系。”彭德怀听后虽感到失望，但也不再勉强。金、彭简单会谈即告结束。

彭德怀19日晚提前过江入朝后，由于载电台的汽车未及时赶到，使他上不通中央，下不联部队，对前线战况一概不明。他只看到大批美军飞机从空中飞过，听到远处不断传来剧烈的爆炸声，他急躁地一会在茅屋内踱来踱去，一会又跑到山坡上去观察情况。但他看见的却是大批扶老携幼、身背包裹向北逃难的人群。他失望地回到屋内，气呼呼的坐在土炕上说：“我现在真正成了光杆司令了！”不过，他们位于山沟内，人少目标小，也给他们带来了幸运。彭德怀1968年回忆当时的处境写道：“我与金日成会谈时，问他当前敌情，金答：还在德川附近，离此约二百里。其实敌军异常骄横，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敌先头部队已由德川窜到我与金日成会谈的大洞东北方向的桧木洞，已绕到我们住的大洞后边去了，我志愿军一部刚过江不远即与该敌遭遇，

我与金日成幸免被俘。”

彭德怀根据敌军冒进态势，立即给毛泽东和邓华、洪学智等发急电提出：“我军目前应迅速控制妙香山、杏川洞线及以南构筑工事，保证熙川枢纽，隔离东西敌人联络，异常重要……”毛泽东当即给邓、洪、韩等发电称：“敌进甚速，请照彭电立即用汽车运一部兵力去占领妙香山，杏川洞，先运几个营去也好。”并指出，“此次是歼灭敌人争取出国作战第一个胜仗的极好机会，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

10月23日夜晚，天空乌云密布，白雪覆盖着大地，彭德怀走出茅屋，又爬上山坡去观测敌军炮声的方向。突然警卫员跑来向他报告说：“咱们志愿军已经来到了！”彭德怀走下山坡一看，有两名志愿军干部跑过来向他敬礼：“报告司令员：我们是四十军一一八师的师长邓岳和政委张玉华，我们全师13000人已经到达这里，但我师和军部电台还未取得联系，敌人情况不明，现在听到东南方向有炮声，请司令员指示我师到哪里去作战。”

彭德怀立刻高兴地紧握着他俩的手说：“你师已来到前线，太好了！这几天我手下没有一个兵，当了几天光杆司令，甚是着急呀！现在敌人正向北冒进，至今还未发现我志愿军入朝。根据远方的炮声是温井方向，情况很危急，你师马上顺公路向东南方向隐蔽前进，占领温井以北有利地形埋伏起来，要形成一个口袋，让敌人钻进来，然后突然开火，猛打猛冲，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狠狠打击一下敌人的气焰，这是志愿军出国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赢！”两人同声回答：“请彭总放心，我师坚决打好这一仗！”立刻率领全师向温井方向跑步前进。24日志愿军副司令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率司令部人员和彭德怀汇合。根据朝方的建议，志愿军司令部人员全部进入大榆洞金矿。这时邓岳来电话报告：一一八师已占领了阵地。彭德怀亲自给邓岳打电话说：“你们千万注意隐蔽，大胆地把敌人放进来，猛打猛冲将敌全部歼灭！”

25日上午，西路敌军先头部队500多人，乘汽车大摇大摆地沿温井公路向北冒犯，钻进了——八师的伏击圈。该师立即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突然猛烈开火，枪声杀声响成一片，战士们一齐冲向敌阵，敌人企图调头逃窜，但已成瓮中之鳖。战斗两小时，就将这股冒进之敌全部歼灭，缴获汽车、大炮等大量物资。同一天，另一股敌先头部队数百人，乘汽车从东线进犯到鸭绿江边的楚山附近，并隔江向我国边境开炮射击，彭德怀得知后急令刚刚过江入朝的志愿军将其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后，将该敌歼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0月25日歼灭了两股敌军，取得了首战胜利，扭转了朝鲜十分混乱的局面，稳定了人心，使志愿军在朝鲜站稳了脚跟，为此后大规模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彭德怀决定将10月25日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隐蔽渡江后，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突然对冒犯之敌以迎头痛击，但这一惊人的消息，并没有及时传到美国五角大楼。“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也根本不相信中国军队已进入朝鲜，于是他仍按计划指挥东西两路十几万军队在几百架飞机和坦克、大炮的支援下，继续向鸭绿江方向进攻。

10月26日，彭德怀根据敌军向鸭绿江进犯的形势，立即给各军下达了作战命令：“敌军北犯，仍无顾忌，正分途北进中。敌在没发觉我军入朝作战前，将仍会向北冒进，因而造成了我军以运动战方式歼敌之机会，你们应当争取创造歼敌之良机，以求得打几个胜仗，将敌气焰打下去。”

当天下午，彭德怀召开志愿军党委紧急会议，他根据敌军主力部队都集中在西线进攻的情况，提出将志愿军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五十、六十六等五个军约二十几万人布署在西线，以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围歼敌人。东线因山高林密，敌军兵力少，由四十二军率两个师利用山地阻击敌人，保障西线志愿军在运动中歼敌。

26 日夜，彭德怀又电令西线各军应避免主要道路隐蔽前进，待机歼敌。要求各军集中兵力向敌军侧后大胆穿插迂回，采用分割包围的战术，结合正面突击，歼灭冒进之敌。这时向西线进攻的美、英等“联合国军”约十万人，已先后攻占了朝鲜北部城市博川、云山、温井、熙川等地，正分为数路向鸭绿江进犯。美国国防部为鼓励敌军迅速攻占鸭绿江边，一再宣称“中共军队进入朝鲜的消息尚未证实”，又称：“至今还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中国军队会入朝参战。”美国五角大楼的错误判断，为志愿军对敌发起突然攻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自 10 月 27 日开始，在朝鲜北部方圆几十公里的地域内，十几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分散冒进的敌军发起突然反击。各军根据彭德怀的指示，采取迂回、包围、穿插分割的战术与敌军展开激战。那些盲目乐观、傲气十足的敌人，本以为胜利就在眼前，在突然遭到志愿军的打击后，个个惊慌失措，丧魂落魄，丢掉武器，四处逃命，但却逃不出志愿军的包围圈。志愿军战士前堵后截，猛打猛冲，打得敌军一片混乱。在几十公里的战场上，到处都是敌军丢弃的坦克、汽车、大炮和尸体，麦克阿瑟曾大肆吹嘘要在 11 月占领鸭绿江边的美梦，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突然打击下彻底破灭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朝鲜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仓促入朝参战的。由于彭德怀根据敌情的变化，适时灵活地改变作战方案，命令部队敢于近战，敢于夜战，发扬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自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3 日共歼敌 15000 多人，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重大胜利。

（张希）

打击日伪顽，杨得志威震冀鲁豫

彭德怀给一万银元

马蹄得得，北风呼呼。

杨得志骑在马上，凛冽的寒风扑打着他单薄的棉衣，从他的耳边掠过，凉凉的，但身上却出了汗，湿湿的。即使如此，他还是加鞭猛催，让马跑得再快一些。警卫员紧紧地跟在身后。

见到彭老总就有办法了。杨得志在心里对自己说。

自从对“牛毛司令”分别采用打击和争取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也引起了日寇的注意，他们纠集顽军卢冀之部，企图在定陶、曹县一带包围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一举歼灭之。杨得志指挥部队跳出日伪顽军的包围圈，转移到了湖西地区。入冬之后，他在微山湖边上的一个小村里，组织部队筹备过冬的物资。

这天，崔田民急急地从单县赶来，下了马就对杨得志说：“中央军委从延安发来电报，说冀鲁豫地区的战略位置重要，要我们作长期打算，在这里进一步扩大部队，发展和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

作长期打算，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杨得志沉吟道：这就是说，中央改变了原来交给我们的‘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的任务。”

崔田民说：“是这样的。”

杨得志说：“这是中央对我们的信任，但任务改变了，会带来新的问题，工作必须跟上去才行，尤其是部队过冬的吃饭和穿衣。”

杨得志的想法是非常实际的。这时的冀鲁豫支队已发展到17000多人。开始，国民党直南专员丁树本和八路军搞统一战线，补给一些钱、粮和其他物资。他成了亲日派后，不但一点东西不再给八路军，还不断搞摩擦，制造更多的困难。人民群众的生活本来就够苦的，哪里还有粮食供给部队呢？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真睡不着觉。”杨得志说着，转向崔田民，问：“你看怎么办？”

崔田民一时也说不出好办法。他的两道浓眉紧皱，显然也在为此事发愁，听到杨得志的问话，又沉思了一会，试探着说：“我听说彭老总现在在内黄，你是不是找他一下？”

这也是个办法。杨得志心里想着，嘴里说：“好。就这么办！”

就这样，杨得志踏上了去内黄的路，他要找彭德怀帮他解决面临的困难，心里当然着急……

由于长时间奔跑，马身上已浸出汗水，急促喷出的热气，顿时化成缕缕白雾。杨得志稍稍放开缰绳，马跑得慢了一点。一阵冷风吹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这时他才想起，已经一年没有见到彭德怀了。他很尊敬这位八路军的副总司令，佩服他指挥打仗的本领，也仰慕他的为人。所以，当崔田民一说去找彭老总，他就立即动身了。

从住地到内黄总共二三百里路，杨得志紧赶慢赶到达内黄，找到了彭德怀的住处。

呈现在杨得志面前的，是一户农民的破草屋。屋内，土炕上铺着一张旧席子，炕头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床薄薄的旧被子。彭德怀盘腿坐在炕上，正同几个干部谈话。

杨得志感到不便上前打扰，就悄悄站在一边等着。他看到彭德怀没戴帽子，大概因为好长时间顾不上理发的原因，原来的短发变得很长了，不过胡子刮得很干净，满脸红光，额头上的皱纹格外显眼。

又等了一会，看着谈话差不多了，杨得志才走上前：“报告彭总，我来了！”

彭德怀抬起头，眼睛一亮，很快下了炕，握住杨得志的手说：“啊，是得志呀！一年不见了，大家都好吗？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大家都好。”杨得志顾不上多客套，说：“我们那里形势发展很快，现在已有17000多人。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那些‘牛毛司令’，消灭了一部分，也争取了一部分，建立了一些抗日政权和群众抗日组织。部队士气很高，信心很足……”

彭德怀高兴地赞扬说：“你们搞得不错嘛！”

“形势是不错，可也有伤脑筋发愁的事呀！”杨得志赶忙说。

“发什么愁呀？”彭德怀的话总是不多，简短而又抓住要害。

杨得志说：“17000多人，要吃，要穿，要用，都没有着落。冬天又来了，怎么能不发愁呢？”

彭德怀向来很严肃，脸上很少有笑容。听完杨得志的话，他绷着脸说：“噢，17000多人的‘大军’，吃穿用没有着落，这是个大问题，让我也得发愁呀！”

说到这里，彭德怀停了下来，看着杨得志一会，笑眯眯他说：“这么说，你是从微山湖赶来向我‘讨鱼税银子’的啰？”

杨得志也笑了：“你说准了，就是找你要钱、要粮、要东西来了。你是我们的副总司令嘛！”

彭德怀收敛了笑容，背起手，默默地走着。在门口，他停住脚，两眼凝视着前方，两手插在腰间的皮带上，如同一尊魁伟的雕像。

杨得志目不转睛地看着彭德怀，心里惴惴不安：是不该向他提困难吗？是我的要求让他为难了吗？他会怎样回答我提出的要求呢？

过了好长时间，彭德怀才说：“困难哪，得志同志！你困难，我也困难，现在各个根据地几乎都相当困难。我们‘财神爷’供给部的腰包里，据我了解也没有多少‘油水’可挤呀！”

杨得志的心猛地一沉，这回大概要空手而回了。不过他相信，彭德怀说的都是实话。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对于八路军的副总司令，面临的困难当然更多更大。

突然，彭德怀转过身，笑着说：“可我也不能让你这个一万多人的支队长白跑一趟。怎么办？我批一个条子，你去找供给部的同志，让他们给你一万块钱吧。数目不多，一个人还摊不到一块。这些情况你要向各级干部讲清楚，还是要像在井冈山、在中央苏区一样，一靠自力更生，二靠从敌人那里夺取！那个歌是怎么唱的？没有吃没有穿，敌人送上前嘛！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嘛！”

彭德怀说完自己先笑了，在场的人都笑了，杨得志的笑则是若有所思……

“怎么样？”杨得志一回到部队，崔田民、卢绍武见了面就急切地问。

“给了一万块钱。”杨得志说，“这可是彭老总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拿出来的。他要我告诉大家，现在各个根据地几乎都相当困难。克服困难的办法，一是自力更生，二是从敌人那里夺取！”

崔田民和卢绍武一齐点头。

杨得志坚定地说：“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向上伸手了！没有别的办法，还是得去找敌人要！”

“那我们就打一次汉奸，一些民愤大、又有钱有物的汉奸。”崔田民说。

杨得志说，“打谁呢？”

点绍武说：“打‘高二穷种’，怎么样？”

这是一个汉奸的绰号。他虽然名为“高二穷种”，实际上地多、粮多、钱多，一点也不穷。他盘踞在单县西南青堌集一带，和日寇相勾结，家里挂着两面日本旗和日本授予他的委任状、指挥刀，依靠日军的势力，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虽然半身不遂，却霸占三十多个年轻妇女做他的姨太太，群众恨透了他。

“对，就打他。”崔田民说。

杨得志说：“打这样的汉奸，既可以为民除害、解气，也可以解决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就打他！”

决心下定之后，他们经过充分准备，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趁敌没有防备，乘夜攻进镇子内，捉住了“高二穷种”。

第二天，部队先押着这个大汉奸游街示众，发动群众揭发他的罪行，然后通知他家里的人拿钱来赎他的命。

“要多少钱？”“高二穷种”家里人问。

部队说：“7万块银元。”

“高二穷种”家里人说：“拿不出这么多钱呀！”

部队说：“拿不出我们就杀掉他！”

很快，“高二穷种”家里人送来了7万块银元，领回了“高二穷种”。

当一些战士和群众不理解时，崔田民解释说：“我们这次打‘高二穷种’，一是教训教训他，煞煞他的威风，二是解决我们的经济困难。我们共产党、八路军说话是算数的，如果他继续当汉奸，帮助日本人欺压中国人，我们随时都可以惩处他！”

有了7万块银元，部队用它买粮、买布、买棉花，发动群众赶做了17000多套棉衣。

以“挤”对“挤”

杨得志手握电话听筒，凝神地听着。他的动作很轻，连自己的喘息也极力控制，唯恐发出响声。因为他是偷听电话，要防止被人家发现，所以只能听不能说，一点声音都不能有。

这是丁树本的声音。这是那个伪县长的声音。杨得志边听边在心里说。

丁树本是河北人，据说曾在冯玉祥的部队里当过书记官，后来被国民党任命为直南专员兼保安司令。杨得志到冀鲁豫后和他接触过。开始的时候，他的表现还不错，愿意抗日，对八路军的态度也好，还给些钱物供应。不久他就投靠了日本人，越来越反动，最后竟挥动屠刀，杀了不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有人提出要狠狠地教训他一下。当时杨得志想，表面上他还是和我们合作的，要打就必须打得有理，打痛他。可他有两万多部队，每县还有人数不等的保安队，要打痛他并不容易，所以一直没有下决心。

决心虽然没有下，但杨得志的心里却始终在考虑对策，寻找时机。前些

天，他听说濮阳与东明县之间有一条电话线从这里经过，是丁树本的，就让电话兵把线搭上，直接接到他屋里的电话机上。每次听到电话铃响，他就拿起电话。今天拿起听筒，听出是丁树本和东明县伪县长在通话，就听了起来。

简短的寒暄之后，丁树本问：“你们那里怎么样？”

伪县长说：“不好啊！日本人经常来，共产党、八路军建立了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他们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丁树本沉默了一会，说，“我们这里本来很好，他们来了，日本人才来‘扫荡’，弄得到处乱了套。”

“这还不算。”伪县长说，“丁司令，我看他们是借抗日为名，行招兵买马、扩大实力之实呀！”

“是这样的。”丁树本点着杨得志、崔田民、卢绍武的名字，泼口大骂起来，什么“假抗日”、“游而不击”、“共匪”等词都用上了。从声音可以听得出来，他是十分仇恨共产党八路军的，甚至可以听得到咬牙切齿声。

杨得志的心里非常气愤。他紧紧攥住听筒，眼里喷出怒火。这就证明他们表面说的那些“联合抗日”、“欢迎前来”的话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他真想大喊一声：“住嘴，你们这些反动分子！怎么能说日本人的‘扫荡’是我们招来的呢？”但他还是努力控制住自己，心里说，要冷静，冷静，冷静，听听他们再说些什么！

这时，电话里传出伪县长的声音：“得想想办法呀，要不然，这里就不是我们的了！”

丁树本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们继续下去的。我已和其他各县的县长商量过了，联合起来，把他们挤走。一定要把他们挤走！”

“如果他们不走呢？”伪县长不无担心地问。

“那就挤垮他们！”丁树木愤愤地说，“各县要一条心，坚决地把他们挤垮挤走……”

丁树本和东明县伪县长结束通话好长时间，杨得志才猛地放下电话，大声喊道：“通信员！”

三个大队的主要干部都来了，他们的目光集中在杨得志的身上。他让干部一齐来，肯定有什么重大的行动。通过这段时间的实践，他们已经完全信赖他们的支队长了。

杨得志扫视过在座的人，说：“从听丁树本的电话上知道，他们想要‘挤’走、‘挤’垮我们，请大家来研究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对付。”

人们知道，过去部队不止一次提出要教训丁树本，杨得志总说要打得有理有利，但就是不说具体的。现在，他们听得出来，杨得志虽然保持了向来的平静语气，但从他加重“挤”字的口吻，看到了他胸中的愤慨，猜想他已经下定了要打的决心。

“打！”有人说，“他不抗日，想来对付我们，我们就不能客气了！”

“凭我们现有的兵力和群众基础，打丁树本还是不成问题的。”另一个人说。

也有人用担忧的口气说：“他们会不会把破坏抗日的罪名加在我们的头上呢？”

沉默。人们看着杨得志，等待他的最后决定。

“打是要打的，不过得讲究方法。”杨得志说，“人家是要‘挤’我们，我们就给他来个以‘挤’对‘挤’。怎么样？”

这个办法，很容易理解，可具体怎样做呢？人们并没有去想，因此仍然看着杨得志，等着他继续往下讲。

杨得志看出了这一点，稍稍停顿一会，说：“他们现在还打着‘联合抗日’的旗子，我们也不能丢掉这个旗子。怎么办呢？那就是将计就计，用‘联合’的名义，派部队到直南的南乐、清丰、濮阳、东明、长垣等五个县去驻防，看准时机，各个击破。”

“这个办法好！”人们一齐说。

思想统一了，办法也有了。会后，冀鲁豫支队立即向南乐等县派出了部队，有的县一个连，有的县一个营。

很快，各个县的情况都汇集到杨得志的面前：“八路军到达后，各个县的顽军头子开始时都很紧张，后来看到八路军纹丝不动，慢慢又恢复了正常……”

根据这一情况，杨得志再一次强调：“要沉住气，不要暴露我们的意图，一方面麻痹他们，一方面摸清楚他们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做到心中有数。”

又过了一些日子，驻各县的部队又报告说：“顽军麻痹了，情况也侦察清楚了……”

看来到时候了。杨得志想着便去找了树本“摊牌”，揭露他妄图依靠日军“挤走”、“挤垮”八路军的计划。

丁树本当然不承认有这样的计划，说杨得志是无中生有，是制造借口破坏抗日。

杨得志严厉他说：“谁抗日，谁破坏抗日，各自的心里都很明白，老百姓也看得清清楚楚！”

丁树本也不相让：“这里是我们的地方，你们根本就不该到这里来！”

“好吧，”杨得志弦外有音地说，“对于不抗日还打八路军的人，我们一定要严惩他的……”

杨得志的话，迅速变成了行动。已经做好了准备的部队，在同一时间里，从几个县同时发起突然进攻。丁树本虽然有二万多人和五个县的顽军，由于没有准备，等到发现八路军的行动时，已经措手不及了。在八路军的强大攻势下，有的溃散，大部分被歼灭。丁树本眼看无力抵抗，只得领着千把人逃往豫西，连大衣和图章都未来得及带，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

战斗结束之后，杨得志心头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自从春天以来，已讨伐了顽军石友三、高树勋和卢冀之等部，如今又将丁树本部打败，并逐出了冀鲁豫地区。现在，这冀鲁豫地区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里了。

中共中央北方局得到报告后，立即决定建立冀鲁豫军区，统一领导这个地区的抗日武装，任命杨得志为司令员、崔田民为政委、卢绍武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直南、豫北、鲁西南三个军分区。

讨顽的胜利，军区的成立，既使杨得志喜悦，又使他感到肩头担子的沉重。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在这残酷、复杂、多变的对敌斗争中，要经得起艰苦环境的考验，也要经得起不断胜利的考验。军区成立之后，他在和政委崔田民交谈时，又说起了王凤鸣。王凤鸣是一个红军干部，参加过长征，战斗中负过伤。到湖西地区后兼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在那里，他支持和参与大搞“肃托”运动，整了不少党政干部。罗荣桓亲自去处理此事，严厉地批评了他。他当时表面接受，可没过多久，他竟然连夜逃跑，投降敌人当了汉奸。

谈到王凤鸣，杨得志感慨地说：“经不住考验就会这样。我从六八五团

到三四四旅上任时，他还和我一路同行过呢。”崔田民说：“所以他给你发电报呀！”

原来，王凤鸣参与大搞“肃托”时，曾打电报给杨得志说，鲁西南地委以下的不少干部是“托派”，要杨得志将其“逮捕起来交我们处理”。杨得志接到电报后就和崔田民商量，认为一是不能怀疑自己的同志，二要记取历史教训，三是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绝不能这样做。因此，他们一面向上级写报告反映情况，同时给王凤鸣回电表明自己的意见。

“连罗荣桓政委的话他都不听，还能听我们的意见？”崔田民说。

“是啊！”杨得志说，“我们到湖西时还当面跟他谈过，要吸取中央苏区‘肃托’的教训，以及陕北地区对刘志丹同志等错误处理的教训，可他就是听不进去……”

崔田民非常理解杨得志此时提起王凤鸣的用意，便说：“是呀！我们能够站住脚，能够对付‘牛毛司令’，能挤走顽军，完全是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支持。任何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一点啊！”

“对！还是要按党的政策办！”杨得志说着，抬眼望望长空。万里蓝天，几朵白云飘浮，一只雄鹰飞过……

反日军大“扫荡”

薄薄的雾气笼罩在冀鲁豫大地上，春季还是很冷的。杨得志和崔田民、卢绍武几位冀鲁豫军区领导人聚在一起，研究“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杨得志等人是在豫北卫河东岸的内黄地区得到“皖南事变”的消息和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处理这一事变的命令、谈话及指示的。愤怒、悲痛的情绪翻腾在他们的胸中，几天都无法平静下来。是啊，在新四军中，杨得志有许多老战友，他们的音容笑貌总是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但残酷的斗争磨练了这位血性男子，他很快平静了自己的情绪，用更努力的工作来缓解心中的悲痛，用指挥部队打胜仗来发泄对敌人的愤怒。

“最近一段时间，部队中出现了一些急躁情绪，对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同志怀有悼念之情，这是应该的，但有些同志每天都想着如何报仇，急于报仇，恨不得现在就把反动派消灭掉，这是不应该的。要有长期坚持的思想。”崔田民的讲话低沉而有力。

“对，应该避免这种急躁情绪，坚持长期斗争，尤其是在一些指挥员身上。”

杨得志说着，想到了一年之前，那是经过13天时间反对日军“扫荡”后，中央军委发电征求他们的意见，是留在原地坚持斗争，还是到苏北地区发展根据地。他和崔田民、卢绍武一方面感到这是中央的体谅和爱护，一方面感到这块根据地是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用血汗换来的，不能离开，就发电给中央，请求留下来。想到这些，他说：“一定要让同志们明白，我们应该坚决按党中央的指示办。我建议，各部队在抓紧时间向部队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外，应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要教育全体指战员，现在形势恶化了，在抗日根据地被日、伪、顽蚕食分割、封锁的情况下，要把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巩固和坚持下去，只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以斗争求生存，在斗争、生存中求发展，对敌人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迎

接更加残酷的考验。”

“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会助长日寇的侵略气焰。”卢绍武说，“敌人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扫荡’，我们必须作好准备。”

“好，就按照我们商量定的办。”杨得志最后说，“大家分头下到各个部队，了解情况，教育部队要学习好、训练好。应当看到，敌人给了我们悲痛，也就同时给了我们力量！”

果然不出所料，1941年4月12日，日军即从内黄到清丰、濮阳、浚县、滑县一带的沙区（亦称黄泛区）内，开始了极其残酷的、疯狂的大“扫荡”。

杨得志得到敌人大“扫荡”的情报后，迅速赶回驻在濮阳以西的军区指挥中心。这时，国民党“剿共第一路军”李英部约二千余人，正向濮阳地区疯狂地进攻。杨得志以二纵队主力一部投入战斗。二纵队的部队进入战场后，与当地民兵紧密配合，很快打败了敌人的进攻，并组织部队投入了反击。就在二纵队即将打垮顽军时，预先集结隐蔽在内黄、五陵集、白道口、滑县、濮阳等地的日军主力三十五师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以及伪军共约一万多步骑兵，在一百多辆汽车、坦克和二十余门重炮的掩护下，分五路向沙区中心地区猛扑过来。

时近傍晚，一望无际的黄泛区里，沙尘弥漫，遮天蔽日，日伪军坦克和汽车的隆隆声穿透沙尘，越响越近。

“司令员，敌人上来了。”通信员急忙跑进指挥所。

“怎么办，司令员？”身边的参谋问。

“不要慌，出去看看。”杨得志拿着望远镜走出房子，登上一处高坡，崔田民、卢绍武也和他在一起。

杨得志举起望远镜，看到四周日、伪军的坦克、汽车和骑兵蜂拥而至。远的相距五、六公里，近的不到三、四公里。转眼之间，敌人发起猛烈的炮击，炮弹接连不断落在杨得志周围的村庄、田野、沙岗和树林中间，弹片如雨点般向四处飞溅开去，滚滚的浓烟遮住了天空中最后一抹余辉。

看到这种情形，杨得志回头对崔田民、卢绍武说：“从敌人的进攻队形看，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军机关就在这里。如今，他们是机械化，我们只有两条腿，突围是来不及的。部队和机关应该就地隐蔽，待机转移。”

“只能这样了，你快下命令吧。”崔田民说。

“好！”杨得志说：“由我在前，崔政委居中，卢参谋长在后，我们分别率领机关和部队先在附近枣树林中隐蔽起来。”

命令一下，部队迅速集结，并利用烈火硝烟的掩护撤到了沙岗中的枣树林里。

夜幕开始降临，由远而近的日伪军，边用机枪扫射，边向前推进。走在前面的伪军，因为没有日军的庇护，不敢贸然进入林中搜索，只是停在原地，等待日军大部队的到来。

杨得志在林中看到这一切，迅速带领部队借助黑夜和大风的掩护，从两路敌军的中间穿插到濮阳西北地区。接着，又转移到内黄东北面靠近敌人守备空虚的据点休息了两天，最后顺利到达山东省范县西北的观城，突破了日军的“铁壁合围”。

夜晚，杨得志看望部队后回到指挥部，四团政委孙仁道正在那里等待向他汇报情况。

“老孙呀，这次四团担负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伤亡一定很大吧！”杨得志首先关切地问道。

孙仁道没说话就泪流满面。原来，担任掩护的二营，在近百倍日伪军的合击中，经过反复地冲击，只有五连的部分人冲出了重围，六、七两个连的二百名官兵都没有冲出来。两天后，派去的侦察员回来说，那里全被敌人占领了，看到不少干部战士的尸体，六、七两个连的人，一个活着的也没有找到。

“战场上我们的武器不少，可没有一件是完整的……”孙仁道哽咽着说。

杨得志的眼睛也湿了：“二百多个同志啊！”

孙仁道用手抹了一把眼泪，激动他说：“司令员，让我们打回去为战友们报仇吧！”

杨得志非常理解这种心情，在许多次战斗后，看着牺牲的战友，他也是恨不得立即就去报仇。即使此时，他激动的心情也难以抑制，但他还是迅速地使自己冷静下来，说：“老孙，回去告诉大家，要很好地向六连七连的同志们学习，要化悲痛为力量……”

说到这里，杨得志说不下去了。孙仁道似乎理解了司令员的心思和感情，他一句话也没说，郑重地敬个礼，转身走了。

一直坐在屋里的崔田民，也随即站起身来，对杨得志说：“整个部队的情绪波动很大，我下去看看！”

“不。”杨得志说，“你暂时不要走，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吧。”

话音刚落，参谋长卢绍武和几个团干部一起走了进来。杨得志说：“同志们，大家研究一下，怎样把日寇赶出沙区，保住我们的根据地。”

人们开始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

“攻他们的一路！”

“打他们的侧后！”

“多面出击，把敌人搞个顾此失彼，尔后，打它的回头！”

杨得志一边听着大家的意见一边思考。从大家的谈话中他发现了一点，在部分领导干部头脑中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那种无可指责的激动和急于报仇的情绪。但是，躁兵必败呀！想到这里，他说：“敌人这次大‘扫荡’，可以说是倾巢出动。这样一来，他的后方必然空虚。因此我提议，暂时绕开敌人的主力，直捣他们的老窝。他们的老窝不止一个，我们要一个一个敲打，目的是逼着他们分散兵力，以便我们在运动中杀伤他们。在中央苏区打过仗的同志还记得敌人军官的一句话吗？他们说：‘中央军是肥的被共军拖瘦，瘦的被共军拖垮，才被打败的。我们这次还用这个老办法，拖一拖日本鬼子，你们看怎么样？’”

“好！老杨，你这个主意可行。”崔田民第一个表态说，“如果我们用主力同敌人的主力相对抗，很容易与敌人拼消耗。避开敌人主力，声东击西地在他们背后插上一刀，不几天，敌人的主力自然会后撤。”

杨得志说：“根据目前情况，就将第一个攻击点放在豫北边上靠近鲁西南的清丰县。这里敌人的守备不足，而且离敌人‘合围’我们的地区较远。我预计用一部分主力攻城，其余部队分散打据点，端敌人的炮楼，炸他们的碉堡，多夺取一些物资，不让他们安宁。我们在他们的老窝里搞得越厉害，他们就会越快地撤出沙区。”

各团团长的离开后，杨得志站在窗前，望着满天的繁星，自言自语道：“不

知道边区的人民怎么样了？”

崔田民站在他的身旁说：“是啊，这次人民群众可受苦了！”

由于杨得志的正确指挥，日军来势汹汹的大“扫荡”，仅用九天的时间就被粉碎了，日、伪军被八路军赶出了沙区。

杨得志率领部队回到边区，看到被日本帝国主义“三光”政策蹂躏的土地，屠杀的无辜群众，心情分外沉重。他建议军区党委及冀鲁豫地委、各分区的政府机关联合召开大会，制定整治边区、发展边区、巩固边区的各项措施，使冀鲁豫边区很快从痛苦中站立起来，去迎接更加严酷的斗争和光辉的未来。

煞顽军气焰

1941年的冀鲁豫军区，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由杨得志和苏振华主持，在山东观城东南的红庙村，召开了第一次全区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时的冀鲁豫军区，是由原来的冀鲁豫军区和鲁西军区合并而成的，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卢绍武任参谋长（后为阎揆要），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

红庙村距黄河故道不远，周围树木成荫，土岗环绕，十分隐蔽。时值夏日，天气很热，但从黄河那边吹来的微风，带着丝丝清凉，令人有说不出的舒畅。晚饭后，杨得志和苏振华漫步在青纱帐里，一边走一边说着话。

“老杨，这次全军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开得不错，同志们的干劲都很足呀！”苏振华说道。

“是呀！”杨得志高兴他说，“这次会议，通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今后的工作会有很大帮助！”

苏振华说：“大家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看来已经结成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了。”

爬上一个高坡，杨得志说：“不过，现在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呀！根据总部传来的情报，在欧洲，德军在主要战场上对苏联取得了一些胜利，整体战局上处于暂时的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日寇的气焰。”

“对！”苏振华赞同地点点头，“尤其是一些伪、顽军队，一看到日本人气焰高了，也随着猖狂起来，近来对我根据地的侵扰也增多了，特别是那个打着‘游击日军’旗号的孙良诚更是嚣张得很，要教训教训他！”

“好！咱俩想到一块去了！”杨得志大声说，“就拿这个孙良诚开刀，煞一煞他的反共气焰。”

10月上旬，杨得志带着教三旅、教七旅和教四旅共五个团的兵力，由观城出发，经范县、郸城到达山东省巨野县地区，准备同孙良诚打一仗。

已到秋天的沙区，由于天气异常干旱，并不像往年那样到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杨得志独自一人坐在司令部里的地图面前，静静地沉思着。

“报告司令员，教三旅代旅长王秉璋、政委曾思玉奉命来到。”

“好呀，你们来得好快哦！怎么样，这次准备打孙良诚的主力段海洲部，同志们怎么想呀？”杨得志开门见山地问。

“同志们都憋足了劲，准备教训教训段海洲这小子。”王秉璋急冲冲他说道。

“是呀，司令员，我们早就该打孙良诚这个顽固派了。”曾思玉接过王

秉璋的话头说，“段海洲在孙良诚的命令下，居然敢侵占我们边区的土地，和他谈判要他退出边区，他竟说要退各退一半。哼，根据地是我们打出来的，他们不去打日本，却来这里抢掠人民财产，安的是什么心？这次不能让他们跑掉了！”

“是呀，你们说的对，就是不能让他们把人民的财产抢走。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好。”杨得志停了一下，继续说，“这一次三旅的任务很重。根据情报，段海洲按孙良诚的命令，现在正进到巨野与定陶两县之间的柳林集、楚楼、黄庄、曹楼等地，处在我三个旅的中间地带。敌人虽然进到了我们的包围圈里，但要一口吃掉它，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次我们采取两翼夹击、中间突破的方法，准备连续战斗几次，争取在这一地区消灭段海洲部。打垮孙良诚的这个主力，三旅的中间突破任务很艰巨，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

“请司令员放心，三旅保证完成任务！”王秉璋、曾思玉齐声说道。

围歼段海洲部的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看到三旅的进攻速度没有预计的那么快，杨得志带着警卫员急匆匆来到三旅的指挥部。这时，一发炮弹在身边不远处爆炸了，机灵的警卫员迅速用身体挡在杨得志的面前。杨得志一把推开他，大声喊道，王秉璋，部队进攻的速度太慢了，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柳林集？”

王秉璋揉着发红的眼睛，懊恼他说：“敌人在镇外的沙坡和树林旁边修起了三道工事，都很坚固，几次冲锋都没有上去。”

杨得志迅速下达命令道：“把你们的部队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正面用火力压制敌人，第二梯队从右面绕到敌人的后面选择攻击点打到镇子里去，第三梯队从左面绕过镇子，直接奔袭楚楼。让曾思玉和副旅长跟着去，你在这里指挥。”

说完，杨得志又回头对跟来的参谋说：“给七旅和四旅发报，让他们对所夹击之敌不要打得过紧，但要时刻注意他们的动向，不要让敌人有一兵一卒增援柳林集和楚楼。”

杨得志的部署，被一丝不苟的执行着。战斗进行得虽然仍很激烈，但战场的主动权逐渐掌握到了八路军的手里。战斗开始五天，王秉璋率领三旅攻下了柳林集，并按照杨得志的指示，迅速将部队挺进到了楚楼一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段海洲的指挥部及主力部队包围在楚楼。

为配合围攻楚楼，杨得志又命令七旅及四旅攻打黄庄及曹楼的敌人。经过五天的激战，使其部队被迫龟缩在黄庄及曹楼镇中，不能救援楚楼镇。随后，杨得志又赶到楚楼前线，对各个旅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从现在的情况看来，由于三旅一部的行动迅速，敌人的阵脚已经乱了。经过前十天的四次战斗，敌人在黄庄、曹楼的部队不敢离开其所筑阵地，怕被我军在运动中歼灭，盘踞在楚楼一带的敌人，由于得不到外援也失去了斗志，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向敌人发起总攻，七旅和四旅各抽出一部配合三旅对楚楼进攻，对黄庄、曹楼的敌人要注意他们动向，不要让他们跑掉，但也不能把包围圈缩得太小了，要知道困兽犹斗的道理。”

深秋的清晨已有了微微的凉意，黎明的光还未穿透密密的薄雾，楚楼附近的枪声就响成了一片。八路军战士们犹如下山的猛虎，英勇地向敌人的阵地冲去，子弹从他们的耳边飞过，有几个战士倒下了。站在指挥部里的杨得志看到这一切，心里猛地一颤，对身边的通信员吩咐道：“去告诉王秉璋，

要尽量减少伤亡。”

战斗仍在继续着，枪声、炮声、喊杀声、火光绘出了一幅图画。

“报告司令员，王旅长已经带着部队打进敌人的指挥部，楚楼一带的敌人已经被我军消灭了，一部分残敌正在败退，王旅长已命令部队分路追击，务必全歼，十九团还俘虏了敌军的政治主任。”作战参谋对杨得志报告道。

“好，命令三旅除留一部分部队打扫战场和追击残敌外，主力部队迅速向黄庄靠拢，配合七旅夺取黄庄。告诉王旅长，要一鼓作气拿下黄庄和曹楼。”杨得志兴奋他说。

作战参谋向部队传达命令去了，杨得志在指挥部里对着摊开的地图仔细地查看着。

“老苏，在金乡城北的羊山镇有敌人的自卫团总部，距离这里有四十多里地，敌人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在同孙良诚部主力激战之时，突袭这个自卫团总部。既然段海洲的主力部队已被歼灭，乘敌人还不清楚这一消息，我想让三旅派一支小部队奔袭这个总部，捣毁它，怎么样？”杨得志对苏振华说。

苏振华对着地图沉思片刻，说：“可以，但部队的行动一定要快，迟了怕敌人会有防备。你就下命令吧！”

杨得志一挥手，迅速向三旅下达了新的命令。三天后，七旅和四旅分别在三旅的配合下，歼灭了躲在黄庄和曹楼的敌人，被派去捣毁敌自卫团总部的三旅一部也胜利返回。这一仗前后打了二十多天，共歼敌一千余人，俘敌六百余名，缴获武器450多件，迫使孙良诚向成武县以西退去。杨得志除留七旅一部分主力外，自己率领大部队迅速返回南乐。

按农村时令，杨得志带部队回到南乐时已是“三秋”大忙季节了，可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庄稼见长不见收，玉米、高粱杆子长得还可以，穗子上的粮食却没有几粒。收不到粮食，秋耕秋种又难，这不仅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且对部队影响也很大。人民有我们，人民富我们富，我们是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啊！杨得志想着这句话，在房间里踱着步子，思考着解决问题的方法。

“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崔田民拿着一份报告走进房间，对杨得志说：“刚接到五、六分区的报告，他们那里严重缺粮，而且不只这两个分区缺粮，其他分区包括主力部队也开始闹粮荒了。在目前，我看这比日伪顽对我们的威胁还要大哩！”

旁边的苏振华也说：“现在各部队都有了钱，可眼下群众自己还填不饱肚子，让大家到哪里买粮食呢？供给部的同志曾提出到敌占区去买，但我想也不那么简单，因为敌人对我们封锁很紧，要去买，就得有武装保护，要打仗。仗可以打胜，粮食的解决却没有多少保证。”

“要不就这样，把地方党、政领导同志请来一起研究研究。”崔田民建议道。

冀鲁豫行政公署副主任段君毅被请来了，杨得志将部队严重缺粮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段君毅沉思了一下，说：“沙区今年旱灾最严重，几乎颗粒无收。咱们虽然管不着老天爷：但可以动员群众。我们已经要求其他县支援沙区，五、六分区的缺粮问题，我们一定设法解决。”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自古讲兵马未到，粮草先行，部队饿着肚子打仗总不是个事，我再和各县同志商量商量，尽量为部队多筹集些粮食，不然不但今冬的日子不好过，我这个行署副主任也得‘辞职’了。”

杨得志感激地对段君毅说：“感谢你们，只要有地方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部队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能挺过去。粮食我是得找你这‘父母官’要，但筹粮不宜太多，不能过重地增加群众负担。不然，我这个当司令员的也于心不安哪！”

段君毅笑着说：“军队是群众的命根子，这个道理，老百姓心里是透亮的。当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就是我们尽上十二分的力，也很难完全满足部队的需要。所以说，我们只能给部队一点小小的支援！”

几天后，民一旅旅长朱程气喘吁吁地跑来对杨得志说：“司令员，行署给我们搞的粮食被高树勋的部队抢走了。”

“怎么回事？”杨得志着急地问。

“我们押粮刚路过清丰县的宋村，五十余车粮食全被盘踞在那一带的高树勋的部队给夺走了。我们交涉了几个小时，据点里的顽军就是不交出来。”

“胡闹！”杨得志大声说道，“这是人民群众勒紧裤带，一粒一粒省下来支援子弟兵的，他们竟敢截留！朱程，你给我把宋村包围起来，限时要他们把粮食交出来。过时不交，就武力解决！”

夜里，朱程又急匆匆地跑到杨得志面前，激动他说：“司令员，他们就是不把粮食交出来。这样不行，还是得打，你不下命令我自己去打，打完了回来你处分我！”

杨得志略微考虑了一下，说：“这样吧，你先回去掌握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我同政委研究后再通知你。不过，你要记住一条，没有命令绝对不许开枪！”

凌晨三点，杨得志正和苏振华研究如何处理高树勋部劫粮这一问题，忽然收到情报，高树勋命令以八路军围困宋村驻军为由，派两个团的兵力进占了清丰东南的东北庄。

欺人太甚！杨得志大声说道，随即对参谋说，命令南下支队和教三旅的七团，迅速集合！

夜晚，月色朦朦，寒风阵阵，杨得志带着部队从南乐县东的陈村出发，赶到清丰县的东北庄。随着他的一声令下，部队向驻在这里的高树勋的两个团迅猛地发起了攻击。经过三天的激战，毙敌六百余人，俘敌二百余人，给了高树勋一个沉重打击，逼其退出了根据地。八路军不但夺回被抢走的所有粮食，还使冀鲁豫边区得到了巩固。

（纪学、吴也）

四保临江，肖劲光壮怀激烈

1946年冬至1947年春，长白山下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城，蓦地成为国共两党争夺较量的焦点，它就是临江。

运筹七道江

白山黑水之间的11月，已是隆冬。几个马拉的爬犁，将东北局新任命的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和政治委员陈云，接到了临江。

这正是南满根据地最困难的时候。国民党为实现其占领全东北的战略意图，实施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调集8个师10万余人，向我临江为中心的南满根据地全力进攻，企图将立足未稳的我军赶进长白山冻死、饿死、困死，然后转兵北上，歼灭北满我军。此时，南满敌军压境，步步紧逼，辽东军区已被迫放弃了安东、通化、辑安等重要城镇，主力军三、四纵队不足4万人，被压缩在长白山脚下的临江、长白、蒙江、抚松4个小县境内，饥寒交迫，三面受敌。

“形势严重得很啊！”原辽东军区负责人肖华在向肖劲光和陈云汇报情况后沉重他说。

肖劲光估计到了南满的危重局势，但估计不足。

一个月前，辽东军区四纵队在新开岭地区全歼敌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俘敌6500余人，显示了南满我军的战斗力。东北局根据敌“先南后北”的战略部署，决定采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方针，加强南满根据地的领导，坚持南满，巩固北满。此时此刻，肖劲光和陈云是奉东北局之命来坚持南满的，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南满在扭转整个东北局势中所担负的责任，但目前南满形势的严峻，使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首先扭转南满的局面。

肖劲光和陈云分头到部队和地方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肖劲光在作战科听了敌情通报：情况危急，敌人8个师的兵力已从宽(甸)桓(仁)、通(化)辑(安)、梅河口三个方向包抄过来，前锋抵达通化。

“部队准备如何迎敌？搞出作战方案了吗？”肖劲光问作战科长岳天培。

“报告司令员，有一个防御的方案，还有一个撤退的方案。”岳天培说。

“撤退方案？拿来看看。”肖劲光已经听肖华说过，领导干部中思想不太统一，有部分同志认为无法坚持就地防御，为了保存实力，主张撤过松花江，与北满主力会合。

“第一步撤至长白山，三纵、四纵撤向松花江，地方部队留在长白山打游击，我已派张参谋去长白山的十一条大沟作了勘察，转移用的爬犁都准备好了……”

肖劲光未露声色。他刚来，还未取得发言权。

他来到四纵队。这支刚刚在新开岭打败敌二十五师的英雄部队，现在还没有得到补给。他见到了纵队领导胡奇才、韩先楚、贺晋年。

“司令员，部队缺武器弹药。”

“部队缺冬衣，战士们身上绑的是草啊，冻伤已发生。”

“伤员得不到治疗，没有医药……”

“我想知道的是部队还有没有战斗力，有没有士气？”司令员说。

“那当然，”韩先楚说，“打二十五师多过瘾啊，战士们一提打仗，手都痒痒。只要能补充上武器、弹药就行。”

“好！”司令员满意地点点头，他认为，一个部队如果没有了士气，那就什么都完了。相反，有了士气，有了革命英雄主义，就是无往而不胜的基础。

肖劲光又踏着没膝的雪来到拐磨子指挥所，他听张参谋说，这里有一个独立七师，是以三五九旅的一部分为骨干扩编的，当时在地方部队纷纷哗变、逃跑，吃、住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始终坚持着。

“打电话让师长来一下。”

独立七师师长彭龙飞来了，他浑身披着冰雪铠甲，眉毛胡子上全是冰，带来一身寒气。

“报告！”声音是颤抖的。

“彭龙飞同志。”肖劲光走上前去，握住那冻得发紫的双手，彭龙飞极力想控制住抖动，但怎么也控制不住格格作响的牙齿，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快来烤烤火。”司令员一阵心酸，拉着彭龙飞坐在火盆边，“怎么，部队没有大衣吗？”

彭龙飞低下了头，没说话。只见他一件破棉袄，一顶破棉帽，脖子上围着一毛巾，脚上踏着一双靰鞡鞋，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实在抵挡不住啊。

“部队都穿上棉衣棉裤了吗？”一个师长冻成这个样子，肖劲光已感到部队缺衣少穿的严重情况。

彭龙飞“哇”的一声哭了，他挽起裤腿，露出了里面绑在腿上的靰鞡草：“司令员，部队百分之三十的人没有棉衣，百分之八十的没有棉裤，没有房子住，露宿在冰天雪地，没有钱，吃不饱，已经有几十个战士冻伤，非战斗减员多啦，部队这样下去怎么行哟……”这个钢铁的汉子，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从未掉过一滴眼泪，而今天在首长的亲切询问下，再也忍不住了。他是指挥员，是战士的父母官，他心疼他的战士们啊！

多好的部队！他们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天底下哪有这样坚强的军队，哪有这样吃苦耐劳的官兵！

“张参谋，”肖司令员的声音有些沙哑，“你立即回军区，到管理处拿五十万圆北海票，连夜赶回来，给彭师长解决一些困难。”

张参谋领命骑马奔回军区。

司令员留彭师长吃了饭，详细地了解了部队的情况。临走，他对彭龙飞说：

“要咬牙挺住，我们要坚持，要准备打仗，在战斗中尽快改变这种困难局面。”

这一夜，肖劲光彻夜未眠，彭龙飞的样子不时浮现在他的眼前。是啊，美式装备的敌人大军压境，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机关及其主力部队三、四万人被压缩在长白山脚下，仅有23万人口的4个县要担负这么多军队的支前工作，本来就很难了，加上土匪特务、伪警察、地主武装到处活动，不少干部被杀害，地方武装哗变……群众尚不完全了解我们，不敢与我们接近，使我军的处境更加困难。

“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几倍于我的敌人，部队怎么坚持？”他自言自语他说。是的，这种局势如若不尽快改变，部队要垮，根据地也会垮，东北的整个局势将会更加严峻。但要改变局势，契机何在呢？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肖劲光与陈云分别召开各种座谈会，逐个找军区机关和部队领导干部谈心。他深深感到，天寒地冻，衣食困难，根据地缩小，敌人嚣张……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形不成“武松的拳头”，没有“打虎”的决心。敌情严重，撤退是不行的；消极防御也是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要变被动为主动……第一必须统一全体干部的思想，第二必须用战争改变形势！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在他的脑海中初步构成了。

他决定在七道江村召开师以上干部的军事会议。会前肖劲光找到陈云。陈云主管南满分局的工作，忙于整顿地方各级组织，发动群众。此时又正在发烧生病，躺在木床上，那单薄的身子显得十分虚弱。

“战争改变形势，这很好。内线中的外线作战，听起来很有辩证思想。要多做思想工作，给大家打打气，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坚持南满。”陈云谦虚他说：“军事上我不内行，有关具体的作战问题你就大胆地决定吧。”

七道江会议上，肖司令员首先把以军事反“清剿”为主，积极防御，跳出敌人包围圈，深入敌后，以有力的外线作战伺机消灭敌人的作战方案公之于众。他说：“南满一定要坚持，但要有拉锯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像武松打虎一样，来它几个回合……”

“武松打虎，嘻嘻……”人们骚动了。

“拿什么打虎呀？没吃没喝的。武松打虎也要在‘三碗不过岗’喝他十八碗呀。”

副司令员程世才是个直筒子，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南满不能坚持了，再这样坚持下去，就要到鸭绿江去喝水，到朝鲜去留洋了。我们应当保存实力。”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肖华发了言。他也同意先撤退一下，保存实力然后再反攻打回来，因为环境太险恶了，应该考虑必要的退却。

这些是有代表性的意见，而且这种意见占了多数，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对整个形势的认识有片面性。也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同意肖劲光司令员的意见，主张长期打算，坚持南满，以战争改变形势。

讨论和争论持续了近两天，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此时，作战科长送来了敌情通报：“敌先头部队已到梅河口。”时不我待，肖司令员立即命令三、四纵队的师长们马上返回部队，做好迎敌作战的准备，政治委员留下，带回决议。

形势逼人，必须从速决断，肖劲光立刻给陈云挂电话，向他汇报了情况，陈云当即表示马上来七道江，一起与师以上干部们扯扯，拍板坚持南满。

12月11日，重病中的陈云躺在担架上，冒着刺骨的风雪连夜赶到七道江，会上他作了至今使人难忘的讲话：

“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牛，牛头牛身于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下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会进退两难；假如我们松了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会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因此，抓牛尾巴是个关键。只要我们守住南满，就不会失去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敌人的大批部队，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去打北满。根据敌人在南满的兵力部署，我们坚持南满，死死抓住牛尾巴是完全可能的。”

陈云的话虽不多，但意味深长，最后他强调说：“南满一定要坚持，三、四纵队都留下，一个人也不走，要坚持到胜利。”

在斗争的关键时刻，陈云一锤定音。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从

此一场威武雄壮的四保临江的活剧鸣锣开场。

这场壮烈剧目的导演就是肖劲光。

一保临江

1946年12月17日，国民党集结了一九五、一八二、九十一三个师的兵力向临江进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郑洞国亲临指挥，前方指挥所设在通化。南满战局的帷幕骤然拉开。敌人重兵从三面以绝对的优势向我军包围过来，而我军一步解围的妙棋已如期开始运行。

肖劲光亲自到准备出击敌后的四纵队作战前动员。

“同志们，你们担负着围魏救赵的任务。目前局势是严重的，敌人气焰很嚣张，我们要避开敌人的锋芒，就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外线去打敌人的屁股，在他的身后闹个鸡犬不宁，让敌人不得不分兵，从而给内线作战创造条件。这就是内线中的外线作战，防御中的进攻作战，矛盾的统一。同志们，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一步走成功了，南满这盘棋就活了。”

决策足智多谋，而成功与否还要看决策的执行人。12月18日，四纵队的十、十一、十二3个师分别组成3个挺进纵队，分3路越过梅（河）辑（安）铁路和公路，向西、北两个方向跃进，跳出内线，插入敌后，向国民党后方守备重点宽甸、桓仁、凤城、赛马等地及安沈铁路两侧进行远程奔袭。四纵队不负众望，跳出敌包围圈10天，连连出击告捷。

“宽桓公路以东地区已被我军收复。”

“八河滩、大清沟以北地区已被我军占领。”

这一步棋出其不意，乱了敌人的方寸，敌人不得不分兵两个师调过头来应付四纵队。此时，北满我军又一下南满作战，逼敌人又调出一师北上。这样一来，南满正面敌人的压力便大大减轻了。

肖劲光亲自指挥着留在临江地区的三纵队进行内线作战。他虽身经百战，指挥过千军万马，但此次作战他却感到有些紧张。因为他刚到南满，敌我情况还不十分了解，特别是对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各级指挥员的素质、部队的作战特点等心中还没有数，他只有在战斗中去熟悉了解情况，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他将三纵队战斗力最强的七师部署于四道江、五道沟、下四平、旱葱沟，作为第一道防线，节节抗击，杀伤敌人，在三岔子作最后抵抗；将八师主力集结于红土崖三道阳子一线，阻敌主力东进，并配合七师作战；同时将九师部署于凉水河子、金川、老岭一线进行运动防御，保证主力侧后安全。第一期作战完全实现了预期作战目的，部队进一步集结于热水河子、杨木桥子、热闹街、头道崴子一线。

1947年1月1日，国民党一九五师与九十一师换防，并掩护其东调，一个新的歼敌方案又在肖劲光司令员胸中孕育成熟。

“准备车子，今天和我一块去七师。”肖劲光对作战科长岳天培说。

从七道江到拐磨子，路非常难走，没膝的大雪，几次使汽车抛锚，快晌午了才到了七师。

七师师长邓岳是个有仗打就不要命的人，政委李伯秋是个大学生，十分聪明、能干。肖劲光准备再次让七师担负最艰巨的任务。

岳科长把军用地图铺在桌子上。

“四纵队出击已经奏效，成功地调开了敌人，北满我军一下江南，又吸引了一部分敌人，现在该我们啃骨头吃肉了。”肖劲光边说边走到地图前，顺手拿起一支铅笔。

“目前的敌情是这样的，敌人企图巩固通辑线，一步一步封锁我们，敌二师占了辑安，一九五师出动至六道沟门，企图掩护九十一师向桓仁南调。我们首先要打掉六道沟门的一九五师，切断通辑线，争取控制一块地盘，然后主动向通化以北转移，实施机动作战。”

部署很周密，然而敌人也很狡猾，我三纵队在头道崴子与敌稍一接触，敌便察觉到来者不善，拔腿就跑，我军只歼敌一小部。收获虽然不大，但通辑线被我切断，辑安敌二师倾巢向北调动。

“打掉敌人的二师。”肖劲光下了决心，随即签发了一个周密的运动作战命令，其要旨是：外线作战的四纵主力进攻辑安，调动敌二师回返，敌二师一旦后顾南返，七师便在杨木桥子发起攻击，八师于天桥山截击残敌，九师向通化警戒。

战斗一打响，敌二师果然调头向南，七师便于杨木桥子与其展开了一场激战。肖劲光驱车赶往八师警戒地天桥山，看到八师正埋锅造饭，尚未出动。肖劲光火起来，他摔掉大皮帽子，光着脑袋大喊道：“你们师长在哪里？”

八师师长左叶跑步前来。

“怎么搞的？七师在啃骨头，你们等着吃肉？马上集合部队，用最快的速度迂回到敌人背后。放跑一个我拿你是问。”左叶一个立正，转身跑了。总算没有贻误战机。

1月19日，通化国民党一九五师一个团孤军深入青沟子地区的小荒沟。三纵队七师再次抓住战机，向敌人发起猛攻。战斗从当日黄昏打到次日拂晓，敌军抵挡不住，企图趁天未明之际，向北逃窜。七师全面展开，对小荒沟形成封锁和包围，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战斗又从拂晓到中午，双方呈胶合状态，仗打得十分艰

苦。

指挥所内，肖劲光坐不住了。“马上，去小荒沟。”肖司令员与作战科长岳天培和作战参谋张伯禹跳上汽车。

汽车加大油门，在崎岖的山路上疾驶，颠得人都要跳起来，司令员还是嫌慢。

“肖司令，前边就是小荒沟了。”岳天培说。

“怎么回事？枪声不密集？”肖劲光在车里站起身来，拿起望远镜四处了望。车继续往前开，转过山沟，便看到四处弥漫着浓浓的硝烟，狼藉的尸体，多是敌人的，七零八落的三八大盖、美式步枪、机枪到处可见，但却不见我们的部队。

“我们打胜了？”肖司令员自言自语他说。

“再往前开，向有枪声的地方追。”

司机回头看了看作战科长，此处离战场已经不远了，再往前去是很危险的。作战科长示意开车，司令员的脾气他们都是知道的。

车继续向前飞驰，一会儿便碰上了救护伤员的救护队。

“你们的指挥所在哪里？师长在哪里？”肖劲光停车大声地问。

伤员艰难地抬起身来，指了指前边的方向，他也说不清楚指挥所在哪儿，战场瞬息万变，哪有固定的地方啊。

肖劲光急了，到现在还未摸到七师的情况，更不知战斗的胜负如何。

“开车，快往前开！”他大声命令着。

终于在路上碰到了骑马向师指挥所赶去报告情况的七师政委李伯秋。

“嘿！李伯秋啊！可找到你了，你们都跑到哪里去了？战斗情况怎么样？”肖劲光从车中探出身子大声问道。

李伯秋翻身下马，一身风尘，他把皮帽子往上一推，满是汗水的额头冒青热气，异常兴奋地举手行礼：

“报告司令员，仗马上就结束了，敌人被我军全歼，部队正在打扫战场，师长还在前边，让我回师部找电台报告，因追击得太急，电台都没带上。”

“好哇！”肖劲光一屁股坐在车座上，“太好了，太好了。”他如释重负，这一仗终于打胜了，他感到十分高兴。

一保临江首战告捷。

二保临江

1947年的新春将至，南满大地处在战前的沉寂之中。辞旧迎新，部队抓紧时间过年。肖劲光、肖华、程世才、吴克华、唐凯、沙克等人一起去陈云处拜年。

小屋里暖烘烘的，他们席地而坐，陈云的夫人于若木端上了瓜子和稀有的糖块。

“嗨，哪来的糖块哟？”肖华手快，拿起一块剥开就吃。

“金日成同志送来的。”陈云和蔼地笑着，“朝鲜同志赞成我们坚持南满，我们在这里扎根不走，他们也感到安全，我们两家隔江呼应，相互支持嘛。”

肖劲光向陈云讲述了他们的作战计划。

“敌人这次是五个师，来头不小，我们准备全体出动了。”肖劲光扫视了一下程世才、吴克华等人，说道。

“是的，大家都准备到第一线去。”程世才说。

“好啊，好啊，”陈云笑呵呵他说，“我们越打信心越足，越打越团结，越团结力量就越大。”他停了一下，“我是姜太公稳坐钓鱼台了，我这钓鱼台稳不稳可全看你们的了。”

众人哈哈大笑，虽然战事迫在眉睫，但将军们却很乐观，因为实践证明，坚持南满的斗争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可能的。战争把他们的心连在了一起。

然而，就战争的现实来说，不能不说是残酷的。

这是南满最冷的季节。俗话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在这里一九、二九冰冻三尺，三九、四九冻掉鼻子。一保临江期间，部队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作战，不少战士没有棉衣、棉裤、棉鞋，不得不裹着毯子打仗。行军是雪深没膝，宿营时鞋袜和脚都冻在一起脱不下来。打仗时爬冰卧雪，饿了吃冻得硬邦邦苞米饼子，渴了抓把雪吃。小荒沟一仗，冻伤400多人；挺进敌后的四纵队，冻伤679人。战斗太艰苦了，而且还未等休整补充装备和兵员，敌人第二次向临江大举进攻又开始了。

小荒沟战斗后不足十天，一道又一道的情通报送到肖劲光司令员手中。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为实现其侵犯计划，保住通化这一前进基地，调整部署，纠集了五个师的番号，三个师的兵力，再次向临江进迫。

1月底，在辽东军区司令部指挥所里，作战科长又送来了敌情通报：“敌五十二军一九五师由通化先期出动，企图由北迂回六道江，配合二师、新二十二师向临江进攻；二七师驰援一九五师；暂二十一师向金川、蒙江地区扫荡。”

“敌一九五师孤军深入了，司令员。”作战科长说。

“是啊，这可是块肥肉哟。”肖劲光面向墙上的地图，在认真地思索着。

“敌二七师在什么位置？”

“在新宾，”作战科长回答说，“此处离敌一九五师的位置有两天的路程，如果敌二师、新二十二师增援一九五师，最快也得赶两、三天的路。”这位二十多岁的作战科长，思想敏锐，他已摸到了司令员的作战意图，迅速地向首长提供所需要的情报。

“好！机不可失。”肖劲光兴奋他说，“我们立即部署，先吃掉一九五师这块肥肉。如果吃得顺口，再回头吃掉增援的二七师。集中三纵全部兵力，突击点选在敌人的侧后。”他用红笔在地图上重重地圈一个红圈，“高丽城子。”

“马上出发，去高丽城子看地形。”

“司令员，大雪没膝，汽车开不动了。”

“那就骑马。”

一片银色的世界。他们骑马走在没膝的深雪中，北风不时地卷起冰雪迎面向他们打来。山梁沟壑非常难走，有时马都不能骑，只好下马步行。山梁上，沟壑中，到处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脚印。

战场选定，方案作好，肖劲光此时已是胸有成竹。他骑马来到临江陈云处。这些日子他一直在前线奔走，现在新的一仗已部署就绪，他要找陈云谈谈。

“胸有成竹啊，劲光同志。”陈云笑了，“这一仗打好了，敌人的气焰就可以打下去，我们的信心就可以进一步增强。”末了，陈云郑重他说：“劲光同志，我说过了，军事上我是门外汉。你是司令员，你们研究好就大胆地干，不要这样来回跑了，费时费力的。”

肖劲光心里很感动。这些日子以来，他们相互支持，相互信任，配合默契，度过了极其艰苦的日子，这种在战斗中结成的友谊是多么难得，多么可贵啊！他觉得，正是有这种支持和信任，他才能这样信心百倍地去战斗。

战斗按照预定方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月30日，四纵队十一师再次插入敌后，向宽甸、桓仁、辑安三角地带挺进，以迷惑和牵制国民党军。十师则积极向通化之国民党新二十二师压缩，做佯攻通化之势，于六道沟门、铁厂子、四道江、五道江一线构筑工事，阻击敌二师北援，配合正面作战的三纵队行动。

2月5日拂晓，三纵队各部将孤军深入的敌一九五师包围于高丽城子，并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此一战，自称“常胜军”的一九五师遭到沉重打击，我军共计毙、伤、俘敌3000余人，缴获汽车13辆，马车50台。

2月6日，协助敌一九五师作战的国民党新六军二七师一个团由新宾孤军进入三源浦，肖劲光司令员随即命令三纵队歼灭该部，命令四纵队十师向通化压缩，围城打援，保证三纵队背后安全。此一战斗进行了14个小时，毙、伤、俘敌1600人。担负围城打援的四纵队也获得了重大胜利，仅东北流通券就缴获了4500余万元。

二保临江，又获全胜。

三保临江

二保临江后，毛主席向党内发表的《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一文传达到辽东军区，毛主席关于“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的论断极大地鼓舞了两战两胜的部队指战员，一个“再立新功”的热潮在三、四纵队兴起。

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又在纠集一切可能机动的兵力向临江地区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其长官部司令杜聿明亲自出马，坐镇通化指挥所，调遣五个师的番号，近四个师的兵力，部署第三次进攻。

此时此刻，肖劲光司令员也在做着迎战的部署。他带着作战科的三、四个人乘吉普车顶风冒雪来到了三道江。雪越下越大，没膝的雪陷没了汽车轮子。他们还要去八道江，只好下车换马行走。翻过高高的山梁，到达八道江时，已是深夜了。

他们宿在四纵十师的一个炮兵营里。张参谋是个细心的人，他派了岗哨，亲自到马厩里查看了明天准备继续勘察地形的那五匹马。

这里离敌人太近了，不能不提高警惕。

清晨，远处传来清脆的枪声，惊动了正在雪地中踱步的肖劲光司令员。

“有情况，”迎面跑来的张参谋紧张他说，“司令员，赶紧回去。”

“晤。”肖劲光大步流星，“敌人不远了，通知炮兵营赶紧向后撤，不要和敌人正面接触，不要暴露我们的作战意图。”

“是。”张参谋飞跑而去。他先对担任警戒的警卫员喊了一声：“马上备马，准备撤退。”接着又到炮兵营传达了肖司令员的命令。回来的路上，他和急急赶来的警卫员撞了个满怀。

“张参谋，”警卫员急红了脸，眼里还噙着泪水，“大、大洋马跑了。”

“什么？！”张参谋急了。昨天弃车换马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找了匹日本大洋马，因为肖司令员身材高大，如果骑本地马脚要刮着雪地，走长了路可受不了，再说马也要有足够的力气才行。这样，肖司令员就骑那大洋马，其他人都骑的本地小马。

“怎么搞的？”张参谋急得不知说什么好，撒腿跑回马厩一看，果然，其它四匹马一字站着，唯独少了司令员的大洋马。

张参谋牵过一匹马，飞身上去，直奔正在撤退的炮兵营。

“张营长，快快，卸下一门炮，把那匹大黑马给我。”他追上炮兵营营长，顾不上说明原因，上去就拉住炮车卸马。

幸好早上的大雾帮了忙，使他们安全地撤了出来。好险啊，仗还没打，差点把司令员送给敌人。

1947年2月13日，三保临江的战斗打响了。

敌人来势汹汹，以七十一军九十一师为进犯主力，企图进占高丽城子后，向八道江实施主要突击。第六十军暂二十一师为左翼，企图占领柳河县大沟通、鹿尾林后，向八道江迂回。五十二军二师为右翼。另以一九五师守备通化，新二十二师机动。

针对敌人进攻意图，肖劲光司令员下达了周密的作战计划：以全歼敌暂

二十一师一个加强团为第一步作战目的；以歼灭敌九十一师为第二步作战计划；此后伺机扩大战果。

2月18日凌晨3时，我三纵队七、九两师对大通沟、鹿尾林的敌二十一师发起突然袭击，全歼其加强团，圆满实现了第一步作战目的。随即，七、九两师转兵南进，会同八师在高丽城子聚歼敌九十一师主力。此时，担任阻击和打援的四纵队十师主力在通化东北也向三纵队靠拢。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四纵十师一度被分割，处于敌人两面夹击之中，师长社光华在指挥战斗中光荣牺牲。但十师的顽强阻击为内线作战的三纵队赢得了有利的作战态势。在连续八个昼夜的战斗中，南满我军共毙伤国民党军1500余人，俘敌498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00余门，各种机枪、冲锋枪、步枪近2000枝，汽车21辆，满载军火的弹药大车350余台，胜利完成了第二步作战计划。

此间，北满我军“二下江南”作战，有力配合了南满三保临江的作战。

敌人第三次进攻临江的锐气已被彻底摧毁，而辽东我军又在肖劲光司令员的指挥下转入第三步作战计划，捕捉战机，不断扩大战果。在这一阶段实施的整个28天中，辽东我军连续收复了辑安、金川、柳河、辉南、桓仁5座县城和重要据点50余处，总计歼灭国民党军14000余人，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南满的军事斗争形势已由敌攻我守、敌我拉锯向敌退我进转变，部队装备、兵员、给养都得到很好的补充，地方政府陆续转回原地，随军工作团进入新收复地区，开始恢复人民政权。

肖劲光将军预期的“战争改变形势”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

四保临江

敌人不甘心失败。

第三次临江战斗后，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司令杜聿明致电南京，同时派副司令郑洞国赴南京去见蒋介石，要求增加两个军，妄图趁我北满主力回师松花江北之机，挽回南满败局。杜聿明采取挖肉补疮之术，由吉林、长春、察南、热河、冀东等地拼凑了11个师的番号、20个团的兵力，组成三个进犯集团，向临江地区发动了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的第四次进犯。

1947年3月底，第四次保卫临江之战再次揭幕。

作战室在紧张地工作着，机要科的灯光彻夜通明，指挥所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而重任在肩的指挥员肖劲光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新的作战方案即将上报东北局了，等东北局回电同意后，即可部署。这将又是一场恶仗，敌人将十几个师的番号，七个整师的兵力都压向临江，其中还有特从热河调来的王牌军八十九师，看来敌人真是孤注一掷了。而我们部队只有四个主力师，连续作战，休整和补充还很不足，每个师平均只有六千余人。从兵力上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他和陈云商量，决定召开一个分局和军区干部会议，进一步分析、研究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统一思想。

“要解决部队中的几个思想问题，处理好几个矛盾。”肖劲光自言自语他说。他闭上眼睛，部队两个多月的作战情景，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要理出个头绪。

“胜利与牺牲。”现在部队有怕伤亡的思想，必须讲清，保存自己就要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就要付出代价，付出牺牲，要用局部的牺牲去换取全局的胜利。要解决为了保存力量，而怕必要的伤亡的思想，这是第一个问题。

“啃骨头与吃肉。”一个战役中，必须有几个啃骨头的硬仗，不啃骨头就吃不上肉，骨头啃掉了，肉才能更好吃。要解决战斗中只想吃肉，不想啃骨头的本位主义思想，要发扬啃硬骨头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肖劲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把思路理清楚，他坐起身来，点上灯，从炕边拿过纸，把这几个问题简单地拟了个提纲。他要在干部会上首先讲讲这些问题，把思想统一起来。战争不仅仅是斗勇，更是斗智。战争是活生生的辩证法，只有懂得革命辩证法的指挥员才能驾驭战争。

第二天天刚亮，肖劲光就起身了。他从炕灶里边打了一盆热水，在一面小圆镜前认真地刮着胡子。

“报告！”机要员小唐走了进来，送上一份东北局的急电。

肖劲光用毛巾擦了擦手，接过电报，“昨天晚上那份发给东北局的电报发出去了？”他顺便问了一句。

“可能发出去了。”小唐回答。

“可能？”司令员不满意了，“发出去了就是发出去了，没发就是没发，什么叫可能？”

“已经发出了。”小唐更正了自己的回答。

“是嘛，这就对了。要记住军事上不允许用可能、大概之类的话，特别是你们机要参谋人员，任何模棱两可的回答都可能给指挥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当天下午，肖劲光收到了东北局拍来的回电。他看完电报显得非常高兴，因为东北局同意了他们的作战方案，并重申了坚持南满的方针。

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干部会议开得颇有特色，会议中心贯穿一个思想，就是坚决地打。用陈云的话说就是，准备付出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的代价，把敌人牵制在南满。要准备打大仗、恶仗、硬仗，只要有利于全局，南满作出的牺牲是有价厚的。

“作这样的决定后不后悔啊？”陈云在会上反复问大家，“不后悔就要准备承担责任啊。”

“没什么可后悔的。”程世才说。

“决定了就不后悔。”肖华也说。

“不后悔。”吴克华表态。

“不后悔。”

“不后悔。”

大家一一表了态。

“好！”陈云把桌子一拍，诙谐他说，“我们学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矩，再次成交啦！”

在同敌人决战的前夜，首脑会议的气氛是这样的轻松，因为他们坚信，靠着党的坚强领导，靠着指战员的团结一致，英勇战斗，胜利一定属于自己。

“好，我再讲讲战斗的具体部署。”肖劲光走到地图前。“这次我们是捉蛇先捉头，集中我军七、八、九三个师的兵力，先打红石镇之敌主攻部队，就是刚从热河调来的，气焰嚣张的八十九师

这一仗，思想准备是充分的，军事部署是周密的，在肖劲光司令员的指挥下，我军以高昂的斗志，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争取了先机：先敌展开，

先敌占领阵地，先敌进攻。首先集中了七、八、十等三个主力师的优势兵力，打红石镇的八十九师。在兵力部署上，采取以七师一部迂回敌后，断敌退路；以八师主力和十师一起，由东向西进攻敌八十九师；九师则控制湾头镇阻击敌暂二十二师增援，保证正面部队作战。结果八十九师被我军全歼，俘敌 2000 余人。蛇头被打掉，敌军便乱了阵脚，在我军分头出击下，敌各路人马一触即溃，加上北满“三下江南”的宏伟气势，四保临江再传捷报。这一仗，从我部署兵力到战斗结束只用了 3 天时间。共歼国民党军 14000 人，而我军付出的代价却极小极小。一保临江，敌我伤亡之比是 3 : 1；二保临江为 4 : 1；三保临江为 9 : 1；四保临江则为 14 : 1，从而彻底粉碎了东北国民党军“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进犯方针，结束了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将军领兵，贵在方略。四保临江这一著名战役，是肖劲光将军军事生涯的浓重一笔，也是其军事指挥艺术的代表之作。这一战役的胜利，将敌南满这只虎，死死地拖住，使之欲罢不能，欲去不得，而只能渐渐被拖瘦、拖垮，为东北战略态势的转变起了关键的作用，从而成为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战略转折点。而肖劲光将军的指挥艺术，也与四保临江战役一起，永远彪炳于我军的史册。

（张炜）

深谋兵家赞，津门捷报传

跻身东野最高层

1945年8月，150万苏联武装力量从远东的双城子到西伯利亚的赤塔长达4000公里的战线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中苏边界，向日本侵华关东军发动猛攻。

在苏军进驻东北的部队里，有一位名叫“王松”的少校。王松何许人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亚楼。1938年，他受党中央委派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苏德战争爆发后，即加入苏军，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斯大林曾亲自接见了。由于他拒绝加入苏联籍，只给他授予少校军衔，分配到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一方面见习军区机关参谋工作，一方面对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工作实施指导。

刘亚楼阔别国内战场七八年，一回来就跻身于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前身）的最高层，任参谋长之职。

刘亚楼到任时，东北的局势正在急剧恶化。东北局鉴于四平战役失利，被迫撤往哈尔滨，决定利用这段宝贵的停战时间养精蓄锐，扩军备战，建家立业。刘亚楼的到来，无疑给建“家”工作增添了力量。

刘亚楼到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狠抓司令部的建设，把司令部建设成为高效率的领率机关和首长的得力助手。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机关缺乏基本建设，参谋人员不仅奇缺，而且大多缺乏参谋业务的基本常识，部队就连一张完整的作战地图也没有，自然也难以发挥司令部机关应有的效能了。

刘亚楼上任仅两个月，“东总”下属各级司令部就在他那雷厉风行且卓有成效的作风中得到了“实惠”：由于组建了地图科，办起了印刷厂，印出了第一批军用地图，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刘亚楼还着手成立一所测绘学校，训练绘制军用地图的专门人才，以彻底解决军用地图之需。

为了加强参谋队伍的组织建设，提高参谋人员的业务素养，刘亚楼从各部队中抽调百名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干部，先后开办3期参谋训练班。参训班既学军事又学政治，学期6个月，考试合格者，将他们充实到各级司令部机关，为民主联军各级司令部机关参谋队伍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刘亚楼处理完一天的工作之后，晚上便拿起一本俄文版的《红军参谋业务条令》，一边阅读原文，一边口述中文，要身边的参谋轮流记录，记完后送他审阅，稍加整理后，很快就印成书，发到全东北民主联军团以上各级司令部，参谋人员人手一册，作为参谋业务学习的教材。刘亚楼还亲自筹划召开了两次参谋工作会议，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

刘亚楼在东北期间，主要是以其卓越的军事才智为主帅出谋划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946年121月中旬，联军总部制订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北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敌人”的作战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刘亚楼协助林彪部署和指挥了历时3个月的“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战役。

对于作战，刘亚楼有一种兴奋感。他已经有8年没有亲自带兵上战场了，他渴望自己能够重上第一线，可是他清楚地知道，身为指挥机关的首长，主要的任务不是亲自带兵冲锋陷阵了，而是要掌握敌情我情、上情下情，为主官下指挥决心提供依据，尔后再把决策首长的指挥决心变为部队的行动。

东北战场地域辽阔，交通发达，敌我情况变动十分迅速，刘亚楼非常重视这一特点。为及时准确地掌握部队情况，他要求各级司令部要把部队的行动情况及时上报。

一个称职的参谋长，不仅要了解敌我双方部队的素质、作战特点、主官姓名、内部关系、武器装备、兵员新老成份和战斗与非战斗人员比例，还要洞察作战地区的地形特点、交通情况、机动能力、群众条件、气候影响等等。当刘亚楼准备好这些材料，呈送给指挥员时，林彪曾作如此称赞：“我们有了一个得力的司令部。”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后，联军南满、北满部队协同作战，统一行动。东北形势骤变，攻守之势易手。联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越打越精明

1947年，民主联军连续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均获大胜。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只能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了。

冬季攻势结束后，东野展开了以普遍提高部队政治觉悟为目的的政治整训和轰轰烈烈的大练兵运动。刘亚楼根据东北战场的形势发展，建议以“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为目前的工作方针，林彪、罗荣桓很重视这一建议。

在刘亚楼的建议下，东总召集主力纵队主官、参谋长开会，探讨四平攻坚战的经验教训。

“夏季攻势形势很好，连续歼敌，节节胜利，最后进攻四平，敌情就不甚了解。甚至连一张四平城市地图也没有。工事怎么样？到底有多少敌人？七十一军的主力到底被歼了多少？众说不一。老实说，我们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就发动了进攻，结果碰了大钉子，打了莽撞仗。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宋江‘三打祝家庄’，前两次损兵折将，第3次把敌情、道路都弄清楚了，并和内部取得了联系，很快就打下来了，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借鉴。”刘亚楼在会上开门见山他说。

“四平攻坚从战术方面来说，当时我们大家只求‘快’，求‘猛’，工作做得不细致不深入，决心定得过快。刘参谋长讲的‘敌情、地形不够明朗，打早了’的分析是对的。”纵队司令员邓华说。

“除了对敌人实力估计不足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忽视了自己的先天不足。”刘亚楼说，“这次战斗是我们在东北第一次实打实地进行攻坚战，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一些部队整营、整团地发起攻击，部队密集展不开，火力不易支援，在敌人密集火

网中伤亡惨重。在战场上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当然要用鲜血付学费了。”

“参谋长，我们部队进行城市攻坚，还是用野战、运动战一套战术，缺乏经验。你有没有什么法宝啊？”一纵司令员、四平攻坚战前线指挥李天佑大着嗓门说。

“法宝没有，经验倒有一条，还是来自六纵十七师的。”

“十七师？”六纵司令员陈光感到意外。

“在整个四平攻坚中，六纵十七师伤亡最小，进展快，战果大。我要他们写个专题性的总结上报总部，对他们以连为单位，分编

火力组、爆破组、突击组、支援组4个组，互相掩护，互相配合的具体做法很感兴趣。在此基础上，我把连队的四种战斗编组形成一个

整体，加了一个‘队’字，起名叫‘四组一队’。”

林彪对刘亚楼总结出来的“四组一队”战术非常欣赏。后来

“四组一队”成了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之一，毛泽东对这些战术也是肯定的。国民党军界高层认为，在解放战争中，东北我军的战术水平最高。东北我军在黑土地上由弱变强，越打越精明，是与这些战术原则分不开的。

在作战指挥方式上，不同的指挥员，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林罗刘”指挥作战，特别是打运动战，大多数场合是直接指挥到师的。重要战斗，有时还“越级”直接指挥到团。打仗时，有的师在哪儿，纵队不知道，但“林罗刘”知道。有时兵团正在执行第一封电报指示，师里已经按照变更命令的第二封电报行动了。实践证明，这种指挥方法是卓有成效的，它没有按部就班一级一级往下传令，而是根据兵贵神速、瞬息万变的特点在作战中争取时间、捕捉战机，它对我军迅速定下使用部队的决心直至争取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养成高度集中统一，密切协同，克服一定程度的游击习气，适应大兵团作战要求，也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就要求司令部必须熟悉各部队的特点、指挥员的素质、每支部队的战斗力。因此，这一指挥方法，给司令部带来了大量繁重、细致的工作。为了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使总部掌握到师、指挥到师成为可能，刘亚楼要求部队必须严格执行报告请示制度，养成以最快速度逐级上报的习惯，说明部队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在做什么。刘亚楼到东北后，为了培养部队以前所没有的这种良好习惯和战斗作风，进行过反反复复的教育。对于哪个部队应报告而没有报告的，刘亚楼马上命令总部电台发出询问信号，督促上报。

对“五整一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和大练兵，刘亚楼更是全身心投入的。和中外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将帅一样，刘亚楼看重军事训练的地位，尤为重视模拟实践中军队所面临的临战状况，搞适应性训练。

战术训练，以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即“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等战术为内容。这些战术原则，比较抽象，刘亚楼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把它形象了、具体了、明确了。

林彪只考虑战争决策，对练兵这些具体事都交由刘亚楼等人负责。于是，练兵场上，时常可见到刘亚楼的身影，时常可听他发表的意见。

“过去我们尽打野战，野战变攻坚，是门新功课，不练不行，为了战时少流血，平时就该多流汗。要从头练、赶紧练、反复练、认真练，总部是下了狠心的。”刘亚楼督促部队按总部要求练兵，不管好天气还是坏天气，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不能终止训练，更不允许有不重视训练的思想存在。

过去我军火炮很少，基本是单一步兵作战，指挥上也比较单纯简便。进入东北后，我军缴获了不少火炮。随着战局的发展，炮兵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兵种，如何指挥炮兵作战，便成了一个突出的新问题。当时为解决炮兵初建中的这些问题，总部先后下达了5个命令，这些命令的内容都是刘亚楼事先和炮司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协商拟定的，刘亚楼为炮兵的建设投入了很大精力，耗费了不少心血。

在这次大练兵中，特种兵纵队（炮司）司令员朱瑞特地请刘亚楼作一场炮兵使用问题的专题报告。

4月20日至5月20日，东北军区召开由纵队、师两级军事主官参加的高级干部军事会议。会上刘亚楼作了炮兵使用问题的专题报告，系统他讲述

了炮兵的使命与任务，火力计算问题、炮兵进入纵深问题、炮兵的火力运用、炮兵的指挥、步炮协同等 11 个问题，既有理论又有实际。与会者听了，都非常满意。会后根据林、罗指示，将刘亚楼的“报告”印成小册子，分发到部队，作为炮兵运用的准则和炮兵建设的依据。在辽沈战役以及尔后的入关作战中，小册子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期近半年的整军运动和大练兵，使我东北百万大军不论在技术上、战术上，都得到了空前提高。

逐鹿白山黑水

东北野战军由准备打长春，转变为南下北宁线打锦州，中间经过了相当复杂曲折的过程。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还有罗荣桓、刘亚楼等给林彪反反复复做了不少工作，这是众所周知的。通常情况下，只要战役的决心定了，总的作战意图和作战部署明确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兵力调动、调整。可是在此之前，东野的决心是打长春的部署，当时野战纵队绝大部分还在沈阳以北、四平、长春附近。由此南下攻锦，百万大军千里迢迢、浩浩荡荡地调动，能否隐蔽决战企图，出敌不意，攻其不备，达成战役的突然性，这是关系到整个决战命运的重大问题。

如果说，定下战役决心主要是由司令员、政委定夺的话，那么，战役决心的贯彻、组织与实施，则是由参谋长来唱主角了。

在作战部署时，刘亚楼说：“为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战役发起的突然性，需要迅速隐蔽完成兵力部署的大调动，这至关重要。使敌人发觉我攻锦战役开始的时间，晚一天就增加一分突然性，我们也就可多争取一天主动，也就多增加一分取胜的可能性。”

“这样大的战役行动，完全不被敌人发觉，可能吗？”罗荣桓问。

“当然不可能。但战役初期，对全战役有一定影响和最容易引起敌人警觉的几个行动，争取出敌不意，则是可以做到的。”

“说下去。”林彪来了兴趣。

“我军前一段由于对长春采取了积极行动，并公开扬言‘练好兵，打长春’，客观上起了示形于敌的作用，使敌人认为我将首先攻打长春的可能性最大。这样我军南下北宁线，保持一定程度的秘密，以取得战役发起的突然性，则是有可能的。”

“哈，完全有可能。”罗荣桓说，“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秘密，势必影响部队兵力部署的调动。如果慢了，敌人发觉了，就可能跑掉，或者相互干扰。”

“是的。”刘亚楼指着地图说，“特别是锦州方向，锦州以北的义县是锦州的屏障，敌暂二十师驻防，属锦州九十三军建制，可能增援，也可能撤回锦州；锦西距锦州仅 30 公里，近在咫尺，且敌兵力较多，如向锦州收缩，则对我攻锦不利；还有，我军打锦州，华北傅作义以及沈阳、长春之敌会不会增援？增援可能有多大兵力？这些我都考虑过了，一方面，在组织部队南下时保持一定程度的秘密，另一方面，从具体敌情出发，快速调整完部队。”

“参谋长，你有何高招啊？”林彪沉默许久后，开口了。

“首先展开大规模的战役佯动。摆出攻打长春的态势，迷惑敌人，隐蔽我军主力南下作战的行动企图。具体做法是：临时抽调出几个独立师，白天编成大部队，由四平附近向长春方向开进，并开放各级电台，收发电报，下

达作战任务，夜间乘火车返回原地。连续数日，浩浩荡荡地大调动，似乎要攻打长春，实为声东击西，致长春守敌不敢轻举妄动。”

“此计甚妙。”罗荣桓边听边点头。

“其次，隐蔽下达部队的行动命令。我们的密码通信虽然十分可靠，但仍应采取万无一失的措施。所有行动命令，由司令部派参谋人员到有关部队口头传达，秘密组织实施。”

“这种做法，可能会给部队首长造成不理解，但为了保守行动秘密，还是可行的。”林彪沉思片刻说。

“再次，无线电台全面佯动。师以上的无线电台，在部队开始行动后一星期内，仍留在原驻地，照常和野司电台保持联络。在部队开进过程中，除原在锦沈附近活动的部队外，一段时间内，暂不和野司联络。”

刘亚楼说完，看了看林、罗，见他们都在听，便继续他的高论：“第四，迷惑敌机白天的空中侦察。我军应夜行昼宿。一旦遇有空情，部队立即原地向后转，表示北进。”

“兵不厌诈嘛。”

刘亚楼最后说：“为了实现快速机动，北线部队南下采取以火车运输的方式。”

“这个很新鲜，利用铁路向前线大规模、远距离地输送部队和装备，这不仅在东北，在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上也是第一次！我们共产党人总是善于创造第一的。铁路输送确实既迅速安全，又严格保密。只是首次组织这种输送，部队、铁路双方都缺乏经验，组织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罗荣桓接过了话茬。

“我已和护路军司令员苏进同志研究了车运计划与保障措施，向部队和铁路双人提出了详尽而具体的要求。”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听了刘亚楼的介绍后，罗荣桓高兴地连声说。

林罗首长的赞同，并没有使刘亚楼心头轻松，相反他更感觉这场战役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他以近似挑剔的眼光重新审视了刚才作过的计划，觉得还是可行的。只不过，除此之外，还能不能再开辟一条渠道，更为有力地保障计划的顺利进行呢？他又一夜

苦思。

第二天晚上，大雨滂沱，一辆美制吉普车在雨中风驰电掣地朝哈尔滨大直街驶去。在一家住所门前，车停人下。

“103大驾光临！”哈尔滨市委领导汪金祥、陈龙高兴他说。

刘亚楼紧握着两人的手，没有客套，没有寒暄，就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要东北野战军迅速组织以锦州为主攻目标的辽西战役的电报，以及东总的作战部署，尔后热情洋溢地说：“我首先代表总部表扬你们和邹大鹏同志，你们的情报准确极了，长春的敌人几次想要突围，他们突围的方向、兵力，甚至哪部在前，哪部殿后，哪部在两翼，你们都搞得清清楚楚，还都是提前送到，所以他们突哪里，我们就堵哪里，一打一个着。你们真不简单。”

刘亚楼对哈尔滨市委社会部的情报工作确实是满意的，他称之为“一把隐秘利剑”，并说这把利剑的作用不亚于一个纵队。市委社会部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形势下，建立了一支精干的情报队伍，有的打进了国民党哈尔滨党部和党务办事处，有的则潜在国民党军统组织内部，基本上掌握着几方面敌人的活动情况。

“总部需要我们做什么？”得知东北大决战即将开始，汪金祥、陈龙语气有些急切。

刘亚楼拿起桌上的笔，只几笔就勾划出了东北的战略图，目示两人：“你们看，在辽西一带我们只有一部兵力，要打这一仗，就得从北满、东满、西满向辽西调兵。近百万大军调到辽西走廊，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且还不能让敌人摸清我们的攻锦意图。一旦敌人识破我们的这步棋，就会在铁岭、新民、彰武、阜新一带横加阻止。战线在此地一拉开，我们就无法靠近锦州。这样一来，辽西会战的设想就难以实现，也就无法完成中央的部署。”

汪金祥、陈龙一齐望着刘亚楼，没料到，打好这一仗，还有一个天大的问题横在面前。

“野司虽然做好了兵力调动的一切准备，但如果被敌人阻止在辽中一带，近百万大军不能按时抵达锦州外围，这一切都将变成空话。”刘亚楼皱起眉头接着说，“这真好比三国时周瑜为赤壁破曹缺东风的境遇一样。周瑜最终是找到了诸葛亮，我今天找你们两位也是来‘借东风’的。”

刘亚楼的话重若千钧，使两人感到了这个任务的分量。陈龙经一番思索后说：“我们手中掌握了一部叫‘二五七组’的逆用电台，目前已经晋升为敌‘国防部二厅长春站’的独立台。它的情报，敌人一直深信不疑。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做文章。”

刘亚楼点了点头：“你们多想想法子，好好研究一下，明早提出方案，需要什么配合，野司会全力提供。”

第二天早上，汪金祥、陈龙来到了东总那座欧式小楼，向刘亚楼汇报了方案：让被我掌握的逆用电台发报向敌‘长春站’请示，为详尽了解共军的军事秘密，是否从野战军司令部拉出一个作战处的参谋，随时提供军事方面的情报。

“你们这个戏唱的可不小啊！”刘亚楼眼睛一亮，大声说，“如果这份电文能蒙骗敌人，那我们就可以牵着他们的鼻子，一步步走向灭顶的深渊。”

如此这般后，很快就接到“长春站”的回电，一通褒奖和赞许后，要求尽快把东总参谋的姓名、年龄和军阶上报，以便加官进爵。

陈龙看到译出的电文，舒了口气，立即组织人员拟电作答，说这位根本不存在的作战参谋叫王展玉，并说这位参谋最近就有一重要军事情报准备报告，作为他参加组织的弃暗投明的晋见礼。敌人回电，加封王展玉为少校，并表示只要情报作用重大，随时都可晋升。

刘亚楼笑着说：“看来敌人已经深信有一个在我军总部核心的作战参谋为其提供军事情报了。很好！这场情报战已经成功地拉开了序幕，压轴的重头戏很快就要来了！下面，我野战部队就可以向辽西一带调动了！”接着一挥手臂，朗声道，“我向长春附近的佯动也应立即开始，这几个师的具体行军路线、宿营地点，就要由你们来指挥，出卖给敌人了。”

汪金祥、陈龙会心地一笑：“对，通过‘二五七组’随时向敌人贩卖。”

8月29日，林、罗、谭发出《辽沈战役行动前政治动员指示》，提出了“解放全东北”的口号。

9月8日黄昏，四平车站及其以东四梅铁路线上，静悄悄地陆续开出一列列火车。除了北线的一些部队和机关、弹药物资由铁路输送外，南线先期出动南下的几个纵队，都是徒步行军分路开进的，均采取昼伏夜行，并以无线电佯动相配合，步兵、炮兵、骑兵、坦克兵，一支支大军像奔腾的急流，

在金秋的夜色中涌动。月轮在云层中时隐时现，一条条看不见的长龙在黑土地上悄然而迅疾地舞动。

南下大军达到了高度的机密，而向长春附近佯动的那几个师，却是大张旗鼓，气势非凡，电台电波飞传，电话电报不断，每到一地便与当地群众联欢。

长春的守敌犹如惊弓之鸟，沈阳之敌也是如临大敌，深怕共军一举攻城。卫立煌、郑洞国、周福成一天几次向有关部门催问，要求马上弄清共军大规模调动的目的和意图。军统局、中统局的情报首脑，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四平的情报组织，先后都被粉碎了，现在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向上级复命！此时只有国防部二厅的“长春站”还可以吹牛，他们不仅在共军大规模调动前就获得了准确的情报，而且由于拉了一个“弃暗投明”的共军总部参谋，情报还在源源不断地通过电波传递过来。

卫立煌对“长春站”提供的“共军围困长春、准备攻打沈阳”的行动意图并未完全相信，他决定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以核实情报的准确度。

又是几次电报来回，陈龙根据野司送来的情报，又和助手们拟了一份电文，将向长春、沈阳方向前进的解放军部队的出发时间、行军路线及宿营地点及时报告了“长春站”。卫立煌将收到的电文与空中侦察的情况一对照，发现完全一致，由此得出结论：“二五七组”发来的情报确实是出自共军内部接触上层机密的人士之手，真实可信。依此判断，卫立煌抓紧布置长春、沈阳的防备。

大军南下辽西。国民党也不是没有察觉。飞机侦察和各地情报部门，都向“剿总”报告了共军动向。“长春站”回答时以“二五七组”的情报相告：这支部队运动意向已经探明，系奉调入关，准备协同华北共军进攻赤峰和承德。

大难临头了，可不管是沈阳“剿总”还是锦州指挥所，都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麻木和昏乱之中。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不知大战行将爆发，还把夫人接来锦州欢聚。当他发现了苗头，并向卫立煌告急时，辽沈战役的态势基本形成了。我几支主力部队均按时逼近锦州。

就在这节骨眼儿，林彪又有了顾虑。林彪早就顾虑攻打锦州时有被沈阳、葫芦岛之敌两面夹击的危险，10月2日在率指挥机关南下途中，得知敌人又向葫芦岛增加了4个精锐师，决心更是发生了动摇。他在没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擅自以“林罗刘”名义向军委发出4个“A”字的特急电报，改变攻锦方案。

作为参谋长，刘亚楼对司令员林彪的工作，一向是支持的。但这次打锦州，是牵动全局的重大战役行动，作战计划也已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尽管林彪顾虑这顾虑那，也总算同意了。如今大军早已出动，兵临锦州城下，林彪却抛开南下作战决定，又要回过头去打长春，刘亚楼当然是不同意的。而且，对这样一个事关战略决策的大问题，林彪不经商量，就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电报，也有违组织原则。在他和罗荣桓的批评和力劝下，林彪更正了回师打长春的错误想法，以“林罗刘”名义重新拟电向中央表示攻锦决心。毛泽东收到这份电报后，当即回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如果说，锦州之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性初战，那么辽西围歼战就是辽沈战役的最后决战。

锦州拿下后，东野大军在“林罗刘”指挥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辽西战场开进，与号称东北蒋军实力最强、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展开了大会战。

当一场决战刚刚打响就已稳操胜券时，刘亚楼显得那么激动而痛快。在作战室里他查对着电报，指示几个参谋人员在地图上拨掉或插上红旗、蓝旗。喜怒形于色的刘亚楼此时的心灵沉浸在

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之中，因为他和林、罗首长把握了一个最好的战讯，选择了一个最佳的战场，投入了最合迫的精兵，表演了一出将令历史击节的拿手好戏。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技巧，在战场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对部队特点了如指掌的刘亚楼，使用起部队来也驾轻就熟。他协助林彪指挥十纵拦住敌先头，六纵截断敌后尾，东返主力向敌中间一冲，廖耀湘兵团乱套了！真是种绝妙打法。

在作战室，刘亚楼指示各部队：“廖耀湘搞的是立体滚筒式撤退，我们也来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围堵，都滚到一块去，不要怕乱，大胆渗透、穿插，以乱对乱，‘乱而取之’！”

林彪将指挥权适时下放到各纵和独立师：“哪里有枪声就哪里打，哪里枪声密集就哪里冲。我不管什么纵队找不到师，师找不到团，找得到廖耀湘就行！”

一时间，辽四平原尤其是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枪炮声分不出个点，天地间的一切都被各种爆炸、火光、烟尘充塞了，这是一场空前规模的鏖战，双方都倾其全力，百万多人纠缠扭打在一起，枪管赤热，刺刀滴血，战线纵横交叉，犬牙交错。同一条路，不知有多少支部队的多少只脚飞速踏过；同一条河，千万条腿涉流而过；同一座桥，千万个车轮隆隆驰过；急促奔跑着的腿脚，溅起积雪，荡起尘土。那起伏不平的大地上，看不到尽头的钢盔忽而消失在地平线下，忽而冒出地平线，构成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神奇效果。

东野“旋风纵队”——韩先楚的三纵在六纵和十纵配合下，第一棒就打碎了廖兵团的“脑袋”——兵团指挥部。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二大主力——新一军、新六军，和新三军3个军的首脑机关几乎同时被铲除。敌四十九军、七十一军亦失去联系。

没了“脑袋”、群龙无首的廖兵团，阵脚彻底地乱了。

26日下午，廖耀湘窜逃到他发家的老本新二十二师师部，见战场指挥全部中断，无法与各军、师联络，在紧迫时刻，他以仅有的一线希望，拿起无线报话机，半明半暗地呼叫所属部队，妄图恢复指挥。

刘亚楼在前指无线电信号中多次听到廖耀湘反复呼叫“二道岗子”，认定这是个十分有价值的情报。

这个“二道岗子”肯定是个地名，可在哪里呢？刘亚楼和指挥所几个参谋人员，在上千平方公里的战场范围内依次查找。终于找到了3个“二道岗子”，哪个才是敌人企图恢复指挥之地呢？

“肯定是新民西南靠北宁线的那个！”刘亚楼根据战场形势分析，作出了准确的判断。随即命令就近部队向这个“二道岗子”进击。敌人大部集结还没有来得及恢复指挥，就又再次被我打乱，溃不成军。

廖耀湘虽然已经“不惜一切代价”了，但突围还是无望。看到包围圈越来越小，廖耀湘丧魂落魄地张着充满浑浊泪水的迷惘的双眼，向着被硝烟遮掩的夕阳仰天长叹：“十万精兵啊，老天！”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协同华北野战军发起平津战役，刘亚楼任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

12月7日，“林罗刘”一道乘汽车来到河北省蓟县孟家楼村。因为此地距北平、天津、唐山各约180公里，平津前线司令部便驻扎在这里。从这天起，刘亚楼就组织指挥着东北大军的行军、接敌、展开、战斗等各项任务的完成，中央军委的部署及林、罗首长的决心，也都通过他去付诸实施。在他身上，再次明显地表明了参谋长繁重的工作：大到兵团、纵队行动方案，作战部署的拟定，战斗总结，请示报告的起草与定稿，小到属下请示的批阅答复，以及吃喝拉睡，包罗万象。

11月9日，毛泽东给“林罗刘”发去了一份长长的“详告”，详细地对平津战役的重心和兵力部署及歼敌先后顺序作了明确的指示。23时，毛泽东又给华北局聂荣臻、薄一波等人及“林罗刘谭”电告：“这是一个巨大的战役，不但两区解放军应归林罗刘谭统一指挥，冀中七纵及地方兵团，亦应统一指挥。望华北军区即令七纵及冀中军区与林罗刘谭接通电台联系，向林罗刘谭报告情况，接受任务。”

“林罗刘谭”对部队作了军事部署，命令各部队向预定目标急进。刘亚楼还接见了傅作义的代表，北平第一次和谈正式开始。不久，华北野战军领导人聂荣臻奉军委命赶到蓟县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工作，和林彪罗荣桓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

整个平津战役中，刘亚楼虽然紧张繁忙，内心却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欢快和愉悦。不仅因为他见到了华北野战军领导人聂荣臻等许多阔别多年的老战友，还在于战役的步伐迈得很快很顺，总部每天都能接到来自前方大快人心的战报，这使得严峻却也活泼的他不时笑口常开。

北平第一次和谈由于傅作义缺乏诚意，被迫中止。翌日，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开始了战役的第二阶段——即各个歼敌阶段。22日，被捧得神乎其神的傅作义王牌军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灭了，素有“骁将”之誉的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24日发起的张家口战役，除敌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化装成伙夫带几个随从逃窜外，近7万余敌全部被歼。

当刘亚楼和总部首长收到中央的“祝捷电”，把满盈盈的胜利美酒举到唇边时，他们也十分清醒地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平绥前线的胜利，使北平之敌西逃的希望变成了泡影，但却增大了敌人从海上南逃的可能性。

按照中央军委12月11日的战略部署，东面先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西面拿下新保安，是关系全局的两着棋，“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现在新保安攻克了，塘沽这个“最重要”之点，却连如何打法的方案还没有，真叫人着急呐！

平津前指授命邓华指挥七纵、八纵、十二纵夺取塘沽、大沽、切断敌人东逃之路，可他们却认为攻击塘沽于我军不利，建议缓打。中央军委接到报告后，于12月26日电示林彪、刘亚楼：“攻击塘沽似以推迟至下月上旬为宜。”

平津前线总部，那张几乎占去了整面墙的地图上，两只鲜红的箭头拖着扇形的尾巴戳向塘沽、天津。刘亚楼内心包容着岩浆一般炽热的火，仔细看

着地图琢磨，眼光在天津、塘沽之间缓缓移动。他读出了地图以外的战事：塘沽以东、以北地形开阔，盐田连绵，冬季不结冰，河流纵横，不能构筑工事，不便大部队运动与接敌，更不能对敌形成四面包围；并且，蒋军兵舰摆在海上，守敌 5 个师随时准备登舰；敌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司令部及防守司令部统统设在军舰上；真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一条很滑很滑的泥鳅，搞不好，没让你近前，它就溜进大海了。

“不，这个仗不能打。”刘亚楼下决心似地握紧拳头，但随后又收住了，“不对，这是军委的部署。既然军委把它列为关系全局的‘最重要’之点，必有其伟大战略意义。”

他觉得军委的部署是有道理的，军委大局在胸，通观全盘，洞悉形势，他作为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参谋长，站在一个方面军位置上的执行者，只能熟悉一个方面的情况，对全国这个大局至多是了解个大概，而且有许多重要的情况不能及时知道。

在否定与肯定之中，刘亚楼细细琢磨着，他决心亲自前往塘沽实地勘察，听取部队的意见。

12 月 28 日，刘亚楼乘坐军用吉普，冒着凛冽的北风来到攻塘部队指挥部，召集会议听取各纵司令员对塘沽敌情、地形和打塘得失利弊的分析。通过实地审议，刘亚楼认为塘沽不是缓打的问题，而是不能打，他坚定了“不打塘沽转而夺取天津”的决心。

在战斗就要打响的时候，却要求改变作战计划，的确不是一件寻常的事。首先，这种建议很可能招来“不好打而不打”、“不执行命令”之嫌。但刘亚楼以对党对人民对上级高度负责的精神，回到司令部向林、聂首长（此时罗荣桓在西柏坡开会）作了报告。

“塘沽、天津两地之敌，军委都要求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歼灭，这是含糊不得，也是不允许含糊的，但是第一枪打向哪里，军委的电令是‘先打塘沽，后取天津’，军委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任何商量的余地。”聂荣臻说。

“塘沽是敌人南逃的唯一道路，我们必与性命同等视之。问题是，先打塘沽确实难以行通，困难很多，打起来不但守敌死守，平、津之敌也可能增援以至倾巢突围，那时将是一场恶战。退一步讲，敌人不死守，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塘沽守敌连司令部都搬到了舰上，能老老实实在呆着挨打而不迅速逃去吗？他们就像一群落在树上的飞鸟，即使你是神枪手，也不可能将其全歼。你的枪一响，顶多打死它三两只，其余的必然全部惊飞。不能全歼，却要我们付出偌大代价，打它又有多少用？”刘亚楼说话时仿佛有一股气，但不知是冲着谁，“把塘沽解放，控制海口，这固然起到堵死北平之敌退路的作用，但如果转而拿下天津，不是同样能封锁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吗？要把傅作义打痛，伤其元气，必须攻打平、津两处。北平是文化古都，打不得，因此天津最合适。”刘亚楼如竹筒倒豆般一口气说出了他的想法，作为参谋长，他也许比别人更明白突破口选在哪里的的重要性。

“那你说打天津较之打塘沽有哪些益处呢？”聂荣臻是刘亚楼的老上级，对刘亚楼的性格、才智和指挥能力，了如指掌，因此很乐于听这位高参的意见。

“我从中央要我们抑留华北之敌的指示精神考虑，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由傅作义的心腹陈长捷防守。我们拿下天津，就打到傅作义的痛处了：第一，他从海上逃走就几乎不可能了；第二，他在北平的 20 多万人，

不接受我和谈条件，就只有被围困而死，这就叫逼和。”刘亚楼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声音明快宏亮。

林彪静坐在桌前的藤椅上，他看了看刘亚楼，一阵沉默后，终于说话了：“打塘沽还是打天津，这个先后顺序不弄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大战。”

“我离开‘前指’到西面指挥平张线作战的几天来，也曾反复琢磨过解放平、津、塘从哪下手的问题，觉得打塘沽的时机需要斟酌。只是因为平张线战斗太紧张，来不及细想，没有形成腹案，现在听参谋长提起，甚觉有理。”聂荣臻说，“我看可以把想法提出来，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军委。”

刘亚楼见林、聂首长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忙高兴地说：“形成决议的东西也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有改变它的充分理由。”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共产党人是讲实事求是的，‘君命’与实际不符，将则可以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拿出自己的主见和办法。”聂荣臻说。

刘亚楼连夜起草了一份紧急电报，发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建议“我军拟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

电报发出后，刘亚楼的心一直悬着，他毕竟是这一建议的主要发起人。

29日23时，也就是电报发出12小时后，毛泽东和军委致电林彪、刘亚楼：“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刘亚楼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与此同时，他的心被一个强烈的欲望燃烧着，驱使他一大早便敲开了林彪的房门。

“林总，我有个请示。”

林彪狐疑地“哦”了一声，目光停在刘亚楼的脸上仔细打量着，他发现刘亚楼的眼睛里闪出激动的光辉。

刘亚楼神色庄重，一本正经他说：“军委已经同意打天津了，我请示党把攻打天津的组织和指挥任务交给我。”

“难怪你这么积极嚷着要打天津，原来是有‘野心’的呀。”林彪笑道。

“淮海战役胜利指日可待，平津战役一结束，蒋介石的主力就算完了。很难找到大一点的仗打啦，我想借此机会锻炼锻炼。”刘亚楼压抑着内心的激动，恳切请求。

“我知道，你的心早就痒了，早就想单独指挥战斗了。你的想法不坏嘛，你来东北时，我就说过，会给你单独作战的机会的。只要聂司令员同意，我这边没问题。”林彪点点头。

刘亚楼高兴地转身，迈开大步，走出门去。

聂荣臻听完刘亚楼的“恳求”后，笑吟吟地说：“看你说的，林总都同意了，我还阻挠？现在的关键就是看你的作战计划啦。”

“我一定会尽快弄出一个最佳的攻城方案的。”

“对，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要注意突出一个‘快’字。打天津，就要让它起到解决华北战场的关键作用。傅作义与我谈判为什么多次不着边际，没有诚意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自己以为有守城经验。”

刘亚楼轻松他说：“傅作义对他的守城实力存有幻想，我会让他领教我军攻城的厉害的！”

刘亚楼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担任了解放军天津前线司令员后，一方面很兴奋，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万一久攻不克，伤亡很大，或在攻城之时，蒋军空降增援，或派出海军运兵到塘沽，袭击后背，那将如何处置呢？

刘亚楼是个绝对闲不住的人。打天津的准备工作，他想到了方方面面，比如对据守在外国人房子里的敌人，是否一律进攻的问题，他就提了3条意见，请示中央军委。

毛泽东接报后立即电复：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

前线总部成立后，第一位光临的纵队领导是李大佑。他说：“司令员，我恳求把打天津的攻坚任务交给我。”

“哦，要走后门？”刘亚楼笑着说。

“我们一纵在辽沈战役中，老是被当作预备队，最后只‘预备’上了一个尾巴，一点也没劲儿地跑去沈阳放了几枪，部队官兵有怨言呐，再不为民请命，我这司令怕是要被大伙撵下来了。”

“没有这么严重嘛，谁不知道你们一纵是小老虎，你李天佑是平型关战斗主攻团团长。”

“四平攻坚失败后，我们一纵就再没捞上个像样的仗打，太叫人眼馋心痒了。当然，怪我这当头的，四平攻坚战，我有点求战心切，在林总面前极力请战，信誓旦旦地保证打下四平，可只用鲜血交了学费呀！”李天佑说完，叹了一口气，随后又坚定地看着刘亚楼，“司令员，如果把天津攻坚任务交给我，我敢立军令状！”

“我相信你！”作为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对各纵、各师领导的带兵方法和指挥艺术，可谓了如指掌。

1月4日，刘亚楼召开攻津部队高级将领会议，东野6个步兵纵队及特种兵纵队的司令、政委，都出席了会议。会上确定的作战方针：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刘亚楼讲解说：“天津市南北长、东西窄，守敌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间皆平常，根据这一特点，我们的部署是：东西两面是主攻，西面是重点，南面助攻，北面佯攻。为什么要先南后北先消灭南半城敌人？因为南面敌人距塘沽近，我们怕他跑掉，向北跑我们不怕。突破之后，大胆分割穿插，把敌人主要据点包围起来。因为毛主席指示，要少打坏一些建筑物，而敌人是利用坚固的建筑物防守的，所以我们先把它包围起来，再慢慢消灭它，力争劝其投降，这就叫‘先吃肉后啃骨头’。”

刘亚楼讲话很少用稿子，边讲边想，往往一开口就能把周围的人吸引注。

这次作战，我军参战的炮兵和坦克，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多，工兵则是首次参加攻坚作战。各兵种的协同作战，是我军攻坚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由于很多部队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刘亚楼亲手写成了《关于天津攻坚战的协同计划》，下发给连以上指挥员，对步兵与炮兵、步兵与坦克兵，以及步兵、炮兵、坦克兵之间如何协同作战做了详细的说明。

总攻发起前，刘亚楼带了赵长青等几个警卫员到准备作突破口的复兴门外观察地形。当他们深入到真空地带，站在一个坟包上观察时，敌人一个搜索队突然在暗夜里出现。搜索队用手电筒四处盲目地扫射着，余光突然接触到刘亚楼一行人的身上。因为距离较远，模模糊糊看不清，敌人便边拉枪栓边大声吆喝：“什么人？”

万分危急中，刘亚楼以“恼怒”的口气骂道：“混蛋，大声嚷什么，要让共军听见啊！”就在对方被骂得晕头转向之际，刘亚楼一行迅速给了他们一阵猛烈射击，随即趁夜幕掩护溜之大吉。

刘亚楼身先士卒，亲临最前沿阵地，对部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纵

队级指挥员到连排长，都深入下去，了解敌情，察看地形，群策群力。

为了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1月8、9两日，刘亚楼命令攻城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攻击，全部扫清天津外围之敌，使近万名敌人做了陈长捷的牺牲品。

自担任天津前线司令员那天起，刘亚楼就一直苦思冥想攻城方案。他想如果能将敌军主力调到城北，造成中心地带兵力空虚，然后从东西方向攻打城中心，把天津拦腰斩断，就将容易得多。可是，怎样才能将敌军主力调往城北呢？陈长捷也不是等闲之辈，会听从我军的调遣吗？

109

刘亚楼思来想去，先设一计，令部队将大口径火炮、坦克和装甲车全部调到了北边，做出一个将从城北强攻的姿态，然后故意将这个“情报”走漏给天津守军。

陈长捷生性多疑，不肯轻易上当，便命令自己的手下，穿上长袍、戴上大礼帽，举着白旗，组成一个“工商联合代表团”，以谈判为名前往天津西边的杨柳青，刺探解放军的攻城准备和主攻方向。刘亚楼正担心陈长捷不会上当，听说他派人来了，拍案叫好，来了个将计就计。

设在杨柳青的“前指”到谈判地点大南河只需30分钟。刘亚楼让联络参谋通知对方说：刘司令正在路上，大约要25分钟才能赶到。事实上刘亚楼是过了30分钟，才穿好大衣出发的。他让司机开车绕天津发电厂转悠了一圈，然后“风尘仆仆”赶到大南河，只见吉普车车轮沾满了泥浆，刘亚楼的大衣也落了一层土。

刘亚楼连声向敌方代表石作韶等4人道歉：“对不起，让诸位久等了！我紧赶慢赶，经过宜兴埠，一个上千户人家的大村子，陈长捷的部队一把火烧得光光的，老百姓拦路告状，耽搁我好一阵子。车到杨柳青，又耽搁了好久，杨柳青有名无实，街道坑坑洼洼，又那么窄，我的汽车差点出不来。”

敌方代表一计算：刘亚楼走了近一个小时，证明是从北面杨村来的。

谈判中，敌代表团拖延搪塞，刘亚楼早已洞悉其奸，指出了天津守敌投降的四个条件后，说：“陈长捷应当识大体，北平已经在和我们进行和谈，天津何妨先走一步。我们可以宽限陈长捷于13日午时前放下武器，如果陈长捷毫无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诚意，决心与人民、与解放军为敌，那我不得不对天津施以武力攻击。”

12日是天津代表再次出城“谈判”的日子。为了进一步“引君入瓮”，刘亚楼决定临时安排一次炮兵试射，以便更加坚定陈长捷“共军主力在城北，北城是攻击重点”的判断。

一切都布置妥当，刘亚楼才和敌方代表见面。敌方首席代表吞吞吐吐他说：“陈长官说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贵军的条件是不是……有些……苛刻。”

对敌人的这一套伎俩刘亚楼早有预料，他义正辞严他说：“无条件放下武器，这不是苛刻，乃是和谈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武器对军人来讲是第二生命，但对于刽子手和反动军队来说，却是肆虐人民的工具，为所欲为的本钱。陈长捷不放下武器，算什么‘和谈’，诚意又在哪里？这不仅人民解放军不会答应，天津200多万人民也决不会答应！”

这位首席代表又说：“本来陈长官也是考虑放下武器的，但六十二军和八十六军拒不同意……”

刘亚楼冷笑一声：“如果这两个军不愿放下武器，陈长捷可以把他的阵地让给我们，我们直接让这两个军缴械。”

一代表又探询似地问，“能否请刘将军宽限时日，让陈长官等再加考虑，安排下一步谈判？”

“没有再考虑的余地，请你们转告陈长捷，24小时内没有答复，我们便开始攻城！”言罢刘亚楼站起来有些不耐烦他说，“恕不奉陪，我还要组织炮兵试射，请诸位好自为之。”

十分钟后，数百门大炮开始轰鸣，天津北城顷刻陷入一片烟尘之中。敌方代表们条件反射似地站立起来，相互之间倏然交换了一下眼色，惊恐地透过玻璃窗张望着炮声响起的地方，连说：“太可怕了，告辞告辞……”

到13日，天津方面再没派代表出来。天津之战势在必行

陈长捷借谈判拖延时间和侦探我军的企图不仅未能得逞，反而中了刘亚楼的计。事前，虽然敌方已通过侦察，怀疑我指挥部在杨柳青，我军主攻方向在西南面，杨柳青也曾多次遭敌机轰炸，遭敌炮火扰乱；但“蒋干盗书”后，陈长捷赶忙调整守城部署，将其主力一五一师从市中心调到城北防御，金汤桥核心地区就此空

虚了。

这样也就有了他被俘前的跌足长叹：“我上了刘亚楼的圈套，上了刘亚楼的圈套！”

天津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考虑用3天时间结束战斗。当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在谈判桌上得知后，略带嘲讽地对聂荣臻说：“恕我直言，莫说是3天，30天也未必！天津嘛，你们最好不要打。”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命令3天内攻下天津，平津战役总前委书记林彪只限定48小时，而刘亚楼表态时却气吞山河：“辽沈战役打锦州，我们只用了31个小时。现在我有1300多门大炮和坦克装甲部队，再加上34万钢铁战士，30个小时内保证把陈长捷吹嘘的‘天津大碉堡化’打个稀巴烂！”

总攻时间定在1月14日。根据十几天来摸索到的气象规律，弥漫在天津上空的浓雾总是在上午9点多才能消散，所以，刘亚楼定于10时发起攻击。这天拂晓前，各纵司令员、各师师长，以刘亚楼的表为准，自上而下对表以利于协同作战。时间，平津战场的时间，全中国的时间，此时仿佛都挽在刘亚楼的手腕上。

10时整，雾气散尽，密密麻麻的炮队从伪装的绿荫中徐徐地昂起头，一根在冰冻的大地上滚动的电线把解放军在天津城四周10个攻城地段连在一起，同时给指挥员们送来了刘亚楼的铿锵有力的声音：“开始进攻！”

随着3颗绿色信号弹的腾空，按纵深梯次4层布在天津外围的1300多门火炮怒吼着，从各个方向对预定目标轰击。东北野战军在这儿又一次显示了神威。

就在炮火“破坏射击”、“压制射击”、“克服护城河”、“向纵深发展”等4个步骤的“四重奏”中，胜利的消息不断传到前线指挥部。

是晚10时，西面部队已打到金汤桥，和东面部队会师后，猛烈穿插分割，席卷全城。15日拂晓，解放军攻占了敌最强军事要点海光寺，接着打掉了天津警备司令部，经过激烈的拼杀，从院内打到里屋，冲进了地下室，把乌黑冰冷的枪口顶住十几个军官，其中一位是正用无线电同傅作义通话、请求“傅

座”救援的陈长捷。

天津城北的敌主力一五一师，在东野开始总攻后，觉察北面并不是主攻方向，但因受北面东野助攻部队积极箝制，陈长捷无法调动他们。该师在那里坚守十几个小时后，发现自己已陷入被歼的绝境，只好放下武器投降。

随着一五一师缴械，15日15时，天津战役结束了。刘亚楼看着手表，计算一下时间，脸上露出了欣喜的微笑，指示：向军委和总部发报，我以29小时攻克天津。

随后，刘亚楼即令十二纵迅速逼近塘沽，翌日下午发起攻击，突破后即向纵深发展，攻至新港，侯镜如慑于被歼，率主力5万人登船南逃（至福建后率部起义），其后尾3000人被全歼。17日，塘沽遂告解放。

毛泽东接到攻克天津的电报后，高兴地说：“华北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半。”他叫刘亚楼把陈长捷用汽车送到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傅作义代表邓宝珊见面。陈对他的上级邓宝珊说：“快回北平告诉傅司令，天津的滋味不好受哇，不要守了！”

当东野总攻天津时，傅作义和陈长捷的通话就没有中断过。傅作义这么关注天津，有两层用意：一是看天津部队能不能突围出动；二是看天津到底能支撑多久，好在和谈中与中共谈价码。天津被攻克，给傅作义以致命一击，迫使他丢掉幻想，交出了军队。后来他绥远的部队也起义了。

天津战役，歼敌13万人，生俘将级军官28人，校级军官44人，此役是我军建军以来最著名的、最漂亮的、最快速的一次攻坚战。

天津战役，是平津战役致胜的关键一仗，也是刘亚楼亲自导演的一场震惊世界、功垂青史战争活剧。

（钟兆云）

虎跃鲸驰鹰翔，直捣一江山岛

作战会上，他拿出了反常规的战役方案

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作战会议在宁波召开，中心议题是如何解放大陈列岛。

大陈列岛位于浙江海门东南，距陆地7海里，含上、下大陈及南、北一江山岛。是国民党军在浙江沿海诸岛的指挥中心与防御核心，又是敌海军“大陈战区特遣队”的前进基地，兵力一万余众。

在华东大陆及舟山群岛相继解放后，蒋介石在美军支持下，还占据在金門、马祖和上下大陈等一系列浙、闽沿海岛屿，并建了个“大陈防卫区”。企图以此作为反攻大陆的滩头阵地，狂妄叫嚣“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还搞什么“克难英雄运动”，以及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盟军一起收复大陆”等舆论宣传，同时不断派飞机、军舰对我穿山半岛、台州、温州等地进行袭扰，破坏我渔业生产及海上交通，严重危及我沿海军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常常为此深感不安：全国大陆以及部分沿海岛屿已经解放，唯独我华东军区驻地浙江、福建的部分岛屿仍为敌人盘踞，并不断对我沿海居民进行骚扰。华东军区就解放沿海岛屿问题两次报告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于1954年8月27日批准同意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直接归军委指挥，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委，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和参谋长马冠三、浙江省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为副司令员，军区副参谋长王德为参谋长，同时组织空军“前指”、海军“前指”、登陆“前指”、后勤“联指”，组成指挥中枢，统一组织、指挥解放浙江沿海岛屿。

195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了总参谋长及副总参谋长的任命通知，张爱萍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他接到命令后，没有到职，仍然兼任浙东“前指”司令员兼政委，继续组织指挥大陈列岛战役。

张爱萍时年44岁。他15岁投身革命，20岁任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长征中任团政委，长征胜利后出任中央骑兵团第一任政委兼代团长；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主席亲自授命他组织沪杭宁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周恩来副主席派他为代表，赴徐州向李宗仁建议在台儿庄一带堵截、重创南下日军（即台儿庄大战）；建国前夕，毛泽东主席又授权他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出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一任司令员兼政委。身经百战，文武兼备，在战场上以组织精细、指挥靠前著称。也许正因为这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推荐、毛泽东主席批准委任他为此役之总指挥。

张爱萍清楚：擒贼先擒王，断其四肢，不如挖其心脏。敌占浙东沿海岛屿的心脏是大陈列岛。而攻克大陈列岛，谈何容易？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诞生以来第一次三军协同渡海登陆作战。动用陆、海、空诸多种，要协调统一、步调一致，任何一处的疏忽和懈怠，都将导致整个战役的失利。

为确有把握，他们来了个“牛刀小试”，先搞了点实战试验，即动用部分空军歼击机、海军护卫军舰，配合陆军分队攻占仅有少数匪特的头门山、田吞和蒋儿岙三岛。这是一次三军联合作战的尝试。小试成功。控制了这三

个小岛，拔除了敌人的前哨耳目，同时也取得了些经验。但也引起了国民党军的极大不安，接连4天连续实施海空联合反击，图谋报复。而今，要实施解放大陈列岛了，先从哪里开刀呢？张爱萍召集他的几位副手、浙东前线指挥部副司令员及参谋长王德等一起商量如何打好这一战役。

大家发言是热烈的，而且摆出了各自方案利弊的依据。多数主张直攻大陈列岛，依据是打蛇打头，攻击了大陈，其他岛屿守敌不战自溃。有的主张先攻披山岛，理由是此岛守敌力量较薄弱，容易取得首战的成功。

“我主张先打一江山岛。”张爱萍的主张令人大感意外。而他却成竹在胸，以平静的语气道出了他的依据：一江山岛处于我前进基地至大陈岛的中间，为我前进的必经之路。若绕过一江山迂回至大陈登陆，必定增加航程，很可能遭到敌海、空军的袭击，容易导致失利；其二，一江山岛距我仅5海里，其守敌1000余人，便于在短时间突袭成功；其三，一江山岛是大陈的门户，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称：一江不保，大陈难守；大陈不保，台湾垂危。我们破门而入，必然收到击敌要害、撼敌全局之效，造成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巨大震动，给美、蒋协防阴谋以沉重打击。大陈列岛可能慑于我军威势，不战自弃，从而一举解放浙江沿海岛屿。

一番分析，入情入理，与会人员无不称赞是最佳方案。但是有的同志也不无担心地提出：“正因为一江山是大陈的门户，所以敌人的防备才特别坚固。我们又是第一次打渡海登陆战，没有特殊的办法是不行的。”

特殊的办法在哪？

在群众当中，在具有实践经验的将士之中。

张爱萍经过多方面的调查了解，感到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犹如风雨天打着伞走路，往往遮住了雨就抗不了风，而抗住了风雨又很难走路。因此，他们确定了一个基本方案：首先夺取制空、制海权，然后进行三军协同作战演练，第三阶段是登陆作战。即在我陆军部队进行登陆训练的同时，我海、空军积极寻找战机，打击、削弱敌人的海、空力量，逐步夺取浙江战区的制海、制空权，并进行直接配合陆军登陆作战的准备。同时决定：在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中，海军航空兵归空军指挥，共同执行护航、支援登陆作战的任务；登陆作战由经过登陆作战训练的陆军部队担任；登陆点选在一江山岛西北角的突出部——黄岩礁和海门礁；登陆时间定在白天……

后两个决定如石投水，在不少人心中顿时溅起惊异、不解的浪花：按教科书和惯例，登陆点选在船易于靠岸、人易于冲锋的地段，而黄岩礁和海门礁都是峭壁悬崖，船往哪里靠？人往哪里行？世界军事史记载的所有登陆战都是夜间航渡、拂晓登陆或黄昏起渡、夜间登陆，大白天渡海不把自己完全暴露出来了吗？

这些反映似乎已在张爱萍意料之中。他不动声色地走到地图前，指着地图说：“一江山岛几个岙部小滩头，均在南北一江山的连接部（凹部），都很狭小，部队难以展开，而且容易遭敌三面火力的封锁和杀伤。现在选择的登陆点固然条件很差，怪石嶙峋，又有岩头浪，多漩涡，不易靠岸，不易攀登。但是，正因为这样，也恰恰是敌人忽视的地方，敌火力配备较弱，而这里离190高地最近，只要我们利用满潮时节，不用涉水，就能直接而迅速地登上岛岸，割裂敌防御体系，各个歼敌，并可迅速接近和夺取190制高点。”他略顿了顿又提高了声音，“为什么选在白天登陆呢？主要考虑我登陆船只性能各异，白天行动利于渡海编队及准时到岸，只有准确掌握登陆点，才能

减少因登陆地段狭窄而造成混乱，更有利于发挥三军协同作战的最大效能。至于暴露目标的问题，只要我们夺取了制空、制海权，这就不是什么问题了。按照这里的潮汐推算，午后 12 时 30 分起航，15 时即可到达，正是满潮时刻，海水便可以把舰艇抬高至礁顶，登陆部队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登陆，抢占有利地形实施突击，这不是得以充分利用的大好时机吗？”

哦，原来如此！总指挥已经对地形、地势、天候、潮汐等方面作了周到细致的勘察、考查了呀！大家在恍然大悟的同时又平添了深深的敬意！

通过，通过！作战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这一战斗方案，同时上报军委。

北京，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大笔一挥：同意！并于 1954 年 12 月 21 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复电给张爱萍、王德：“关于发起攻占一江山岛的时间问题，应抓紧准备，只要准备好了，确有把握时就发起攻击。”

“用兵之法，教诫为先。”海、陆、空隐蔽大练兵

“古兵书云：‘士不先教，不可用也’，‘用兵之法，教诫为先’，方案即定，下边重要的问题就是围绕着方案的实施进行练兵了。‘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法，习艺为先，艺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我们要从思想到战术、从单一动作到协调统一，都要苦练精练，从难从严，以练兵的千斛汗水，浇出一江山战斗的胜利之花！……”

前指司令员张爱萍的层层动员，掀起了浙东沿海陆、海、空三军练兵大潮。

战前训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各军兵种分练，着眼于提高分队的登陆作战的技术与战术，以及本兵种内部的协同动作；第二阶段为各军兵种合练，主要解决诸军（兵）种整体的协同动作问题。

练兵伊始，不，严格他讲，自战役决心下定，张爱萍就注重了“隐蔽”二字，即隐蔽战役意图，蒙住敌人耳目，至时一阵闪电雷霆急风暴雨，致敌晕头转向不辨东西南北中于死地。

隐蔽指挥。经几番勘察，决定把前线指挥部设在宁波天主教堂里。为高度集中、隐蔽，把海军、空军、后勤三个指挥部全集中于此。

隐蔽训练。由于战前准备时间较长，采取分头准备、分散进行的办法。为避开一江山和大陈本岛，参战的陆军部队移到北边柴桥地区进行训练，把南边的披山作为假定目标进行佯攻，以转移敌注意力，造成其判断上的错误。登陆部队远在乐清礁半岛的芦苇丛中隐蔽进行约 3 个月的训练；三军实兵演习则选在穿山港，外边看不见、听不到，敌空中侦察不到。演习一结束，各部队立即分散。

隐蔽舰船。在征用地方船只时，只是说部队需要，不言其他；送交造船厂改装、修理，加装战防炮和火箭炮时，也只让其主要负责人知道改装任务，并指派专门技术人员进行工作。

隐蔽雷达。昼伏夜出，白天把天线放下，夜间竖起。

隐蔽主攻目标。对除指挥机关外的部队指战员和应征上船的技术工人、渔民民兵，只动员解放沿海岛屿，不讲具体哪个岛。

隐蔽，隐蔽！直隐蔽到炮弹落到敌人的头上、炸毁敌人的巢穴，解放我神圣疆土时，才向世界公开。

嗟呼！“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

远而示之近。”困敌于十里雾中，焉有不克之理！

所有参战部队开练后，“前指”司令员张爱萍就分别同他的几位副司令深入各训练场地，以准确掌握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浙东的冬季，海上风浪很大，常有雨雪，时有冰冻，气温常在零下七、八度，为海上训练造成了很大困难。

战士们根据战场上需要，负重几十斤进行摸爬滚打，上船、航行、涉水、登陆、冲击，每一步都要反复演练。练兵乘坐的是机帆船，颠簸大、离岸远，战士们每每练习登陆时，都要跳下齐腰深的水中冲击上岸。常常处于汗水、雨水、海水、冰水的浸泡之中。而我们的战士大都是“旱鸭子”，晕船厉害，呕吐不止，有的连胆汁都吐了出来，脸色苍白，身冒虚汗，归来后又茶饭难咽。

张爱萍看在眼里，疼在心中，但为了战斗的胜利，绝对不能放松训练。他对登陆指挥所司令员黄朝天说：“你们要买点水果，想办法让同志们吃下饭，注意劳逸结合，一定不要把战士们的身体搞垮了！”

他听到有的战士反映负荷太重，不适宜训练，便把战士的全部负重披挂在自己的身上，同战士们一起演练渡海登陆的全过程，而且一丝不苟，步步到位。汗水浸透了他的军装及军帽。演练结束，他跳几跳体会一下身上的负重，觉得还是可行的，便当场向战士们讲明登陆战要求速战速决，而海上补给困难，必须分带弹药的道理。指战员心悦诚服，一致表示：负重不变，继续练习。

然而，该变的，张爱萍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改变。

在滩头阵地，他发现战士登滩后，鞋子里很快就灌满了泥沙，行动十分不便。就当场同指战员研究出把布袜子缝在鞋帮上的办法，命名为“涉水鞋”，并立即命令后勤部赶制，每人一双下发部

队。

在登陆地段，他发现木制登陆船靠岸有撞岩的危险，战士下船时船有向后退的问题。他就同水手们一起研究，反复演练，终于想出了办法：用汽车轮胎挂在船外以防撞岩；登陆船抵岸时，水手持桨自上而后向前支撑，即固定了船位。

在航空兵侦察分队，他发现空中侦察拍摄回来的照片中间一段模糊不清，分析认为这是绕过目标所致。为什么绕过目标呢？可能下边就是敌高炮阵地，飞行员产生了恐惧心理？遂带着空军参谋袁中仁亲自同飞行员交谈。果然如此。于是他让袁中仁向他们分析了敌情、我情，并阐述了战斗机空中侦察照相被击中的可能性很小的道理。他进一步说道，事先对敌高炮阵地已经进行了火力压制，加之飞机飞得很快，不会有什么危险。鼓励飞行员克服畏惧心理，大胆飞行，勇敢实践。同时表明首次失利，可以理解。从而消除了飞行员的顾虑，再一次拍回来的照片，就格外清晰了。

在整个备战演练阶段，张爱萍的身影出现在陆、海、空及联合后勤部的各个训练场上，无论朔风凛冽的海滩，还是风浪摇曳的舰船，无论铺满泥泞的战壕，还是马达轰鸣的机场，都有他坚实的步履、响亮的声音、熟悉而又诱人的笑语。昨天（1954年8月30日），还在杭州笕桥机场召开空军分队长和机长以上干部座谈会，今日（8月31日）下午，就到了宁波召集海军分队长和舰（艇）长以上干部座谈……

一个个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对我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不少人心中都有种浓浓的神秘感和深深的忧惧感：陆军担心空军炸弹会炸到自己的部队，还担心海军登陆艇能否准确快速地把登陆部队送上登陆点；海军担心空军能否控制海区制空权，对自己会不会造成误伤；空军则顾虑我陆军的火箭炮误伤自己的强击机，等等。

一个个方案浮现在他的脑际，凝铸成为：

一、广泛开展思想教育，为协同作战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张爱萍明确提出“以陆军（登陆部队）的需要为需要，以陆军的胜利为胜利”的口号，指示部队广泛深入地进行协同作战的思想教育，同时公布了一个崭新的战术思想：“强击机与地面部队的协同，不要受作战方案的限制，而以自己机动协同为主，积极掩护步兵前进；而步兵则要充分利用空军的轰炸扫射效果实施冲击，强击机俯冲一次，步兵就冲击前进一次，使飞机起到随伴火炮的作用。”

二、组织参战部队互访互学、互相熟悉兵种知识以及兵器的性能、特点，增长现代化作战知识，以消除顾虑，摆准位置，各尽其能，协同作战。

三、继续认真组织临战训练，熟练掌握作战中的协同动作。

在具体实施上述三项措施的基础上，张爱萍又安排“前指”参谋长、他的老搭档王德组织陆军参谋方宗岳、空军参谋袁中仁、海军参谋郑武以及“海指”作战处长王英杰，“空指”作战处长曾幼成等，对每个协同动作的步骤、时间作精确计算反复演练，制订出切实可行的《作战协同计划表》。陆、海、空三军及所有参战部队照此表行事，将组合成一架精密而科学运行的机器，其力移山填海，其势震天撼地。

1954年12月13日，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合练。首先进行了一次严格依照作战方案，以一江山岛守敌之防御配系为战斗目标的三军联合演习。

战鹰翱翔，舰船破浪，火炮怒吼。连续进行了三次连、营的登船、航渡、登陆突破与纵深战斗的训练，并组织了火炮、舰船、轰炸机三者之间的协同动作，解决了各军兵种之间的相互识别和通讯联络等问题，登陆突击阶段的指挥协同和战术动作得到了很好的检验。

通过演习，进一步修订和充实了作战方案，使之更加符合实际，在战术和技术上均得到了明显提高，增进了了解，解除了顾虑，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张爱萍在625指挥艇会议室接见主攻团副团长毛张苗和海军3大队领导等同志时说：今天看了你们的联合演习，很高兴，也很感谢你们！如果下一次的登陆实战，能如今天一样，我们的指挥部门认真、仔细地组织，各级干部都适时指挥，我看一定能够成功！

在三军演练同时，我军成功地进行了夺取制空、制海权的斗争。在我轰炸机、强击机以及海军炮火的轰击下，敌人的舰艇“永春”号、“洞庭”号、“中权”号、“太和”号，还有其主要军舰“太平”号护卫驱逐舰先后葬于海底。

围歼“太平”号，张爱萍亲临前沿指挥。

1954年11月11日，张爱萍接到报告：据雷达侦察，连日来蒋帮海军主要战舰“太平”号护卫驱逐舰每天18时至19时，都从大陈岛出发，经一江山岛外海转向头门山岛，再右绕驶向渔山列岛，巡逻至拂晓前返回大陈岛。

13日晚，张爱萍带领海军参谋郑武潜伏在头门山岛观察。海风呼啸，海

天一色。他们就在夜海的喧嚣中搜寻“太平”号的踪影。果然，“太平”号沿袭往常的时间、路线倘祥了一遭。张爱萍当即决定：命令我4艘鱼雷快艇于14日夜埋伏在头门山岛海域，张网以待。可是，这天“太平”号一反常规，23时许尚未露面，直到零时才出来，并径直驶向渔山列岛。不少同志深感失望。张爱萍告诫大家：静心等待，提高警惕，以抓战机。接近拂晓，“太平”号方自渔山列岛驶出，乖乖地进入了埋伏区。张爱萍命令4艘快艇一齐行动，成半圆形包围圈，同时发射鱼雷。“轰隆隆”一阵巨响，“太平号”呜呼哀哉。

自此，敌舰再也不敢在我海战区露面了，至于空中飞贼，仅自1954年11月1日至登陆作战发起之日，我空军先后对大陈、一江山轰炸7次，投弹1600枚，炸毁炸伤舰5艘；我歼击机出动279架次，击伤、击落敌机多架，炸毁一江山敌高炮阵地，牢牢地筑起了空中长城。

“长城”坚固程度，其重要因素之一是后勤保障。作为战役总指挥的张爱萍是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深刻含意的。经过多次研究试验，他决定成立三军联合后方勤务部（简称联勤），由浙江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任司令员，海军、空军、陆军登陆部队的后勤部长任副司令员，并从各后勤部门抽调一批干部组成联勤指挥机构；师级单位设立登陆后勤处，团、营、连也都组成相应的战勤组，形成有力的联勤保障体系。在任务分工上，除专用物资和技术保障由各军兵种负责外，通过物资供应、卫勤保障、伤员的抢救与后送、俘虏管理、交通运输指挥、渡口码头的管理以及后方警戒等统由联勤指挥部组织指挥，各方面通力协作。

在所需物资特别是舰、船不足的情况下，张爱萍亲赴上海市委、浙江省委等地方领导机构，请求支援。浙江省委和上海市委帮助征集船只、动员船工参战，并且组织了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审时度势，“军队的基础在士兵”

天有不测风云。战场千变万化。

1954年底，正当战役准备就绪时，几个重要情况出现在张爱萍面前。

其一，12月2日，美蒋正式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规定，当蒋帮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军应立即“采取行动”，予以支持。与此同时，美国舰队出没台湾海峡，耀武扬威，一副挑战的样子。

其二，12月26日，我国国务院通过了新的兵役法和我军第一个军官服役条例。其中规定，战士将要由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服役满3年的战士除留下少数骨干外，要在旧历年前退伍。

在三军登陆部队中，绝大部分战士都符合退伍的规定。

其三，经各方气象专家会诊及到群众中走访，一、二月间大陈地区大都是风雨天气，适宜合成军队渡海作战的天气几乎没有。

怎么办？这场战役是打还是不打？是按计划近期打还是推迟打？

张爱萍顾虑的不是美蒋的“共同防御条约”。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已使他看清了美帝国主义的嘴脸，不外是纸老虎一个，是撑不住正义的铁拳的。此次美蒋签约，不过是同病相怜的垂死挣扎，同恶相济的狐假虎威，妄图侥幸阻挡、破坏我解放全中国的既定方针。事实上在此之前的11月份，美

舰借口“台风”已撤离了大陈岛。这不是很好的说明吗？

张爱萍担心的（或者说关心的）是战士们的情绪。如果照新的兵役制执行，这里绝大部分的战士可以也应该解甲归田，享受和平生活。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补充进来的新兵当然比不上这些不少从朝鲜战场上归来又经过较长时间训练的老兵。留下他们打完这一仗再走，无疑就留给了他们危险，留给了他们铁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况且，全军都在实行新的兵役规定，他们能够安心吗？经过反复考虑，他断然肯定：能！还是应该相信我们的战士，他们会以国家的利益为重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干部能不能向战士讲清道理，能不能让我们的战士信服。

他带着这一新情况新思考又一次来到了登陆部队的一个连队，同战士们促膝谈心。他介绍了新的兵役制规定，也谈到了这次战斗的重要，还讲到了留下来的危险……他与之最早谈心的三个老战士其态度居然是出奇的一致和坚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翻身解放的家，为了解放沿海岛屿许多没有翻身仍受苦难的家庭，我们坚决留队打好仗，不彻底解放沿海岛屿不回家！

哦，多好的战士多好的同志呀！张爱萍由衷地称赞。在1955年1月2日于宁波召开的三军干部和战士骨干思想动员大会上。他把这三位战士请上了主席台，请他们讲了自己的认识和决心。接着，他作了战斗动员；接着，在部队普遍展开了忆苦思甜教育、一江山战斗重要性教育、战士肩头责任教育；接着，决心书，请战书，雪片般飞到各级领导手中……

至于不佳的气象状况，对张爱萍来说也还是充满信心的：预测和惯例说适合渡海作战的天气几乎没有，“几乎没有”总不是“完全没有”，不是完全没有，就要千方百计地抓住，他号召气象人员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继续发扬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准确、精确地掌握适宜我渡海作战的天气。

战前的等待是焦急的。

“一切准备好，只等‘东风息’”的等待就更令人焦灼。

张爱萍又一次来到了空军气象站，倾听他们分析介绍近期的气象情况。气象科长徐杰回报了预测的近期气象情况后，说：“1月17、18、19日，3天为好天气时段！”

张爱萍喜不自胜：“真的？！”徐杰回答：“是真的”然后又作了有根有据的分析。张爱萍由衷称好，似自语地说，“一天就够了。只要准确无误，半天足矣！”

于是，1月12日召开“前指”党委扩大会，张爱萍建议：根据中央军委去年12月21日关于“只要准备好了，确有把握时就发起攻击”的指示，拟定于1月18日正式发起对一江山岛的进攻，上午8时航空兵出击，9时炮火准备，12时登陆舰艇起航，下午2时39分登陆作战。会议一致通过。

但是，时至1月15日，连续几个月的大风，依然在刮，整个天空灰蒙蒙的。而今万事俱备，只“怪”东风了。18日，18日能有一个好的天气吗？

以不变应万变，精诚所至，天眼为开

1月16日上午，张爱萍同王德听取了“前指”司令部关于敌情、气象情况的汇报后，当即决定：登陆部队于16日黄昏由穿山半岛向石浦开进，18日前到达头门山、高岛进攻出发地。

同日中午，张爱萍、王德以“前指”司令员和参谋长的名义向总参谋部及华东军区作了如下报告：

依据我们作战准备，可于17日完成。今天气象测量：17、18、19等日的云量、风浪、潮汐等天候适宜海、空作战（18日最好，19日后可能开始变坏），故我们对一江山的登陆作战，内定于18日实施；登陆部队于17日拂晓前进到石浦待机，18日拂晓前到达头门山、高岛进攻出发地；我们于17日晨自现地出发，当日晚间到达头门山“前指”……

17日6时，晨光初露，张爱萍、王德带领陆、海、空三军三个作战参谋乘车由宁波登程，经奉化、临海、海门，向头门山前线指挥所进发。

风依然在刮，天空阴沉沉的。

坐在司机右侧的张爱萍，把手自车窗伸出，时而仰掌向上，时而侧掌向前，他在测试风力，心里沉甸甸的：明天风能停吗？

车抵临海县灵江渡口，风势明显减弱。蓦地，一个军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报告司令员，临海军分区参谋科科长吴钊向您报告……”

张爱萍问道：“什么事情？”

吴钊说：“军区石一宸处长来电话说有急事向您报告。请你到军分区接电话。”

原来在他们走后不久，军区专作战处长石一宸接到了总参谋部的复电：

1月16日电悉。我们认为1月18日攻击一江山为时过早，必须继续充分准备，在气象良好情况下，确有把握时实施。过急发起进攻受挫后将会造成不良影响，于我不利。总之，应以准备充分、气象良好为好，攻击时间可自由选择，甚至推2、3月亦可。望照此执行。

犹如晴空霹雳，石一宸瞬间出了一头冷汗：部队已经到位，“前指”司令员率“前指”人员在奔赴前线指挥所的行进途中。他清楚他的顶头上司张爱萍的作战特点，调兵遣将也争分夺秒，不尽快把总参的指示报告他，说不定他又在作什么新的部署了呢？急中生智，遂告临海军分区，让其派专人到灵江渡口堵住“前指”首长，以便报告，同时请张爱萍尽快给总参陈赓副总长回电话。

张爱萍听完报告后，不禁自语道：真是莫名其妙！

他和王德简单地交换了一下看法，一致意见：战斗决心不变！

他打电话找到了副总参谋长陈赓。尚未开口，陈赓便笑了起来：“哈哈，不赞成我们那个意见是吧？”

向来说话不拐弯的张爱萍对老相识陈赓更是一针见血：是不能接受。遂陈述了他的意见，目前部队的各项作战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而且都已进至待机地域，18日气象预报良好，又无美机、美舰的干扰，是进攻的大好时机。如果改变作战计划，延期进行，除我军的作战意图暴露外，大批老兵退伍，部队还要从头训练，其损失和影响不可估计……

“哎呀，有这么严重吗？”陈赓还想说服张爱萍，均为张爱萍一一“驳回”。陈赓问：“你有绝对把握吗？”

张爱萍反问：“‘绝对’二字怎么讲？！”

陈赓说：“那好吧，待我向粟裕总长报告了再给你答复。”

张爱萍又追加一句：“要知道我明天就要开始行动了！”

“我一定尽快告诉你。”

在张爱萍等待总参回话的时候，参谋方宗岳又接到华东军区首长要求执

行总参电报指示的命令：“把部队撤回，停止攻击一江山的作战计划……”

张爱萍接过这张抄件，浏览了一眼，便甩到了桌子上，右手一挥：“出发！”

一个参谋怯生生地问：“到哪里去？”

“头门山，前沿指挥所！”

陈赓把张爱萍坚决维护作战计划的意见向粟裕作了报告，粟裕同意张爱萍的意见，并让陈赓向国防部长彭德怀报告。彭德怀正在中南海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顺便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当即征询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意见后，便告诉彭德怀：授权给你来下这个决心吧！

彭德怀本来就同意这一计划，他当即批示：同意爱萍同志意见，战斗照原计划进行！

张爱萍在去头门山的途中，不时用手掌或军帽在车窗外试风。风，依然在刮，并且逐渐加大；浓重的黑云似压在了他的心头。如果军委批准了我的计划，明天气象仍然不好，又该如何是好呢？

到达海门“联勤司令部”，风又大了起来。

恰在此时，接到了军委同意照原计划实施战斗方案的电话。

张爱萍坚信近半年的精心准备及饱溶三军将士智慧与汗水的战斗方案，是能够经得住惊涛险浪及铁与火之考验的。唯一担心的是天气，万一因气象的原因不能按时打响登陆战，推迟一天，就多一分暴露我战役意图的危险。

张爱萍听完林维先关于后勤保障工作已准备完毕的情况报告后，便乘坐520炮艇，在风浪中摇摇晃晃地赶至头门山前沿指挥所。风势丝毫未减，浪涛拍岸，发出震耳的轰鸣。

张爱萍心想：俗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倒是“不欠东风只怨东风”了；脑际不禁浮出唐人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的诗句，心中自语：难道东风不与张某便吗？

他不由得又要通了宁波空军“前指”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空军指挥部聂凤智司令员。

“这里的风还没有停！”张爱萍开门见山。

聂凤智回答：“这是阵风，晚上会转小的。”

“那就好！”稍顿又说，“你让徐杰讲话。”他还要亲自听到气象专家的判断。

徐杰报告说：“这是大风的尾风，明晨一定能够停息。”

“真的？能这么神吗？”

“司令员，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我可以立军令状！”

张爱萍从他干脆果断的口气里，似看到他在“啪啪”地拍胸脯，顿时也轻松了许多：“只要能停就好了。要立军令状也不用你来立，应由我向军委立。”

之后，便同王德等人爬到了头门山顶，好像他要在这里等着苍天，似乎在以一颗虔诚之心感化风停。可是，一直等到零时，狂呼乱叫的风浪依然十分猖狂，他便同王德商定作两手准备。回到指挥所，王德对部队进行部署，他又要通了聂凤智的电话，告诉他这里的风仍然未见减弱，要做两手准备：风停，则照原计划行动；风不停，则调动空军力量，严密封锁海疆及其上空，以隐蔽我登陆部队。

似刚踏进梦乡，又像正在梦境中徜徉，突然耳边有人喊道：“司令员，

风停了！”张爱萍一跃而起，见袁仲仁站在身旁并重复了刚才的报告。他一句话也没说，急步走出指挥所，哦！风果然停了！天空上缀着几颗黎明前的星星，面前是一望无垠的平静海面。喜悦的浪潮顿时涌遍全身：“一切照原计划进行！”

声东击西，塞敌耳目，倾万钧雷霆，胜似西湖竞渡

旭日东升，晴空万里，海湾里数不清的登陆艇和各种舰船在严阵以待；舰上的指战员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头门山山坡上竖起了巨幅标语牌：“同志们，为祖国立功的时候到了！”

在明丽的阳光中，张爱萍向“登指”司令员黄朝天和率领第一梯队登陆的指挥员等再一次明确任务和登陆地段。全体登陆将士无不信心百倍。万事俱备之后，他才进入前线指挥所，看了看手表，等待着时针指向“8”字……

空中响起飞机的轰鸣声。数十架由强击机和轰炸机组成的品字形机群，箭一般地向上下大陈岛及南北一江山岛飞去。

顷刻之间，大陈列岛和一江山岛相继陷入火的海洋。而首当其冲的是敌指挥所和雷达站。当127吨炸弹投掷完毕时，上下大陈岛与一江山岛的通讯联络全部中断，指挥系统陷于瘫痪状态。8时15分，我机群退出战斗返航，9时21分全部安全着陆。

坐镇宁波“前指”的副司令员聂凤智向张爱萍报告：据侦听，在我军对大陈本岛和一江山岛轰炸后，台湾国民党军仍未发现我战役意图，仍以为我军可能在披山岛登陆。

9时整，“登指”司令员黄朝天命令炮群实施炮火准备。万炮齐鸣，震天动地，1000发炮弹分7次全部送上一江山岛。

12时15分，黄朝天又一次命令：登陆部队启航！100多艘不同类型的舰船组成的登陆舰队，桅杆上挂着五星红旗，在M—13火箭炮群、海军舰炮及战斗机群的掩护下，犹如万箭齐发，井然有序，浩浩荡荡，驶向一江山岛。构成了一幅空中银燕翱翔，中间群弹飞驰，海面舰群犁浪的立体画面。张爱萍看在眼里，悦在心中，像是自语又像对身边的王德说：“看，这哪里像海上进军，简直是西湖竞渡，多么壮观呀！”

张爱萍在望远镜中发现掩护舰队的火箭炮群所发射的炮弹大多落入了水中，当即通过报话员命令炮群靠近发射。船载火箭炮迅速抵近敌岛界1500米处，实施齐射。敌190、203高地瞬间一片火海。

张爱萍的剪式望远镜犹如扫描器在海面上仔细地搜寻，突然发现，登陆输送舰队周围掀起数支水柱，他当即判断：这是大陈岛敌炮兵苏醒后进行拦阻射击所致，遂果断命令：“轰炸机大队立即摧毁大陈敌炮阵地！”

随着命令的到达，轰炸机群第二次起飞，成吨的炸弹再次倾泻向大陈岛。大陈岛的敌炮阵地顿时变成了哑巴。

14时10分，我第一梯队营登陆输送队，在离一江山岛2500米左右处，分三路展开战斗队形，以快速多箭头、多波次地向各登陆地段冲进。一江山岛越来越近。我各种火炮、炮艇大队上的火器，再度进行火力急袭，护送步兵登陆。

据王德回忆：“从战役发起到此时，我参战部队无一损失，按预定计划实施航渡和对敌进行火力准备。敌之火力为我压制，转入地下；敌之指挥通

信联络被破坏；各预定登陆地段敌前沿突出部之工事，大部被摧毁。蒋海、空军未敢出援反击，一江山之敌未敢以任何火力实施拦阻。”

在我登陆输送船队离岸 300 米左右时，敌前沿未被摧毁的各种火器突然爆发，向我舰船猛烈射击。

舰船在弹雨中疾进！

战士在弹雨中还击！

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升起，登陆部队终于冲上登陆点。主攻团五连于 14 时 29 分按预定时间提前一分钟在乐清礁登陆；六连标错了登陆点，在受挫的情况下也于 14 时 31 分在北山湾登陆；某部一营两队于 14 时 33 分、34 分分别在黄岩礁、山嘴林登陆；某部二营于 14 时 37 分在预定地点登陆。各登陆部队纷纷向“前指”报告：“占领滩头阵地！”率领第一梯队登陆的前指登陆指挥所参谋长王坤在报告中首先说道：“我建议为气象员立一等功！”

张爱萍接到报告喜不自禁，迅即从报话员手中接过话筒，祝贺他们的登陆成功，并要求他们再接再厉，英勇战斗，减少牺牲，尽早把红旗插上一江山岛的主峰。

登陆部队犹如越野战车又挂上一档，加大油门，如猛虎添翼，更加奋力忘我地冲击。而隐藏在地堡里的敌人也疯狂地向我登陆部队还击。

张爱萍从望远镜中看到岛上敌暗堡火力阻碍了我登陆部队的顺利前进，遂对空军参谋袁仲仁说：“命令强击机继续对敌人进行冲击。只要油料够，即使没有炸弹也能从精神上震慑敌人，鼓舞我登陆将士！”

强击机群按计划已经完成了三次低空攻击，准备返航，接到命令后，又对一江山敌阵地进行了俯冲。是的，他们的炸弹打完了，就用机枪射击。他们领会司令员的意图，飞机的呼啸声也是巨大的战斗力！强击机俯冲一次，登陆部队就前进一阵儿；强击机再俯冲，登陆部队再冲击。很快占领了敌第一道战壕。

掩护登陆部队的护卫艇水兵，发现向 203 高地冲击前进的一面红旗突然停了下来，这表明步兵前进受挫。于是，四艘护卫艇立即抵近岛岸，向敌火力点猛烈射击，迅速而准确地摧毁了敌火力点。

此情此景，张爱萍尽收望远镜中。他不胜欣喜，由衷称赞我陆海空三军将士主动配合、密切协作的精神。

15 时许，张爱萍对王德说：“你在这里指挥，我去一江山岛。”

王德不禁愕然。此时岛上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有的地方在白刃格斗，怎么能让主帅前往呢？忙对张爱萍说：“要去我们去，您现在不能去！”

“为什么？”

“现在去太危险了！”

“你们去就不危险了？最大的危险已经被我们的登陆部队承担了。走！”说话间，跨出了指挥所，跃上了炮艇。

海风裹着浓烈的火药味扑面而来。岛上硝烟尚浓，并不时传来阵阵枪声。张爱萍带着参谋袁仲仁从乐清礁攀岩上岛。

在一斜坡上方，他发现一战士平卧在血泊中。两只手抱着喷火器直指前方，前方的地堡呈现出被烈焰焚烧的痕迹。显然，这是我们的战士在发射喷火器的刹那间中了敌弹。张爱萍心里一阵痛楚，蹲在战士的身边把他扬起的军帽向下拉了拉，又擦了擦他脸上的尘土，调来副担架将他抬下阵地。

一江山的工事非同一般，其坚固、隐蔽、密集，这是在其他战场上未曾

见到的，难怪美军顾问炫耀它是美国造的“钢铁堡垒”。

枪声不时从各个方向传来。张爱萍若无其事地巡视部队，他要求部队尽快肃清残敌，迅速转入防御，以防敌人反扑。

在高炮部队，他发现指战员正十分吃力地把三七高射炮往山上拉，忙跑步过去靠上炮身推了起来，直至推到山上。

在 203 高地，他看望了首先登上一江山岛的主攻团指战员，代表总部和军区向他们祝贺胜利，并要求他们既要抓紧做好战后工作，加强防御，同时也要注意让战士休息好；尽快把伤员送后方医院治疗。干部战士无不感动。据当时任主攻团副团长、自朝鲜战场归来的战斗英雄毛张苗回忆：“首长亲自登上残敌尚未肃清、零星战斗仍在继续的海岛战场，给全团指战员带来了巨大的鼓舞。那时，部队中快板诗很流行，战士一边挖工事，一边编顺口溜。我记得有首战士诗是这样的：将军来岛上，/战士真欢畅。/三军插翅飞，/一江春潮涨。//将军来岛上，/美蒋着了慌。/且慢‘赔老本’，/先还家乡账。

“蒋介石的老家在浙江省奉化县。敌人逃离大陆，一直窃据我浙江沿海岛屿，抢劫来往商船，残杀渔民，血债累累，所以战士要他‘先还家乡账’。”

在巡视途中，张爱萍看望正在后运的伤员，仔细询问伤情，称赞他们打得很好，为人民立了功！安慰他们安心养伤。特别叮嘱干部要处理好烈士的后事……

夕阳西下，绚丽的晚霞为一江山岛、为浩瀚的大海镀上了一层紫金，银色的战鹰在蓝天巡逻，几支长长的俘虏队伍在我战士的押解下，走向岸边停泊的舰船……

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全歼敌守备司令以下 1086 人，其中击毙 519 人，生擒了国民党军驻一江山岛最高长官、第四突击队队长王辅粥。号称大陈列岛“铁门”的一江山岛被彻底打开了。

渔山列岛及披山岛之敌迅即撤进大陈本岛。

首战奏凯震八荒

在国内，捷报飞处，一片欢腾。

1 月 19 日，宁波、杭州等地隆重集会，庆祝胜利。杭州市中、小学校的学生，采集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树种，送到部队，希望撒到一江山岛上。

1 月 20 日，解放军总部致电浙东前线指战员，热烈祝贺并慰问。

1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欢呼人民解放军在浙东沿海取得的胜利。

1 月 23 日，海门港一万多人，手持鲜花、彩旗，夹道欢迎凯旋归来的指战员。

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一江山岛战斗对我军陆海空军联合登陆作战取得了初步的经验。为了有助于今后作战，我们必须重视这一经验……”

12 月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浦江时，在“港申”号轮船上，对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说：“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打得很好！我军首次联合作战是成功的。”

在海外也引起前所未有的震动：

路透社香港 18 日电：“香港观察家们认为，如果大陈群岛失守，对蒋介石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打击。”

合众社台北 19 日电：“共产党中国进攻大陈使用的兵力，使这里大为震

惊。这里军事当局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中国的第一次陆、海、空联合作战是经过周密策划而且执行得很好。”

战后的第三天，美第七舰队数十艘作战舰只（含两艘航空母舰），就开到浙江东海域，企图对我进行武力威胁，并掩护大陈本岛。

对此，张爱萍当然不能坐视，当即同聂凤智商定：除原布置沿海岸高射火炮外，又布置空军严守我领海线的大陆上空，敌机胆敢来犯，坚决叫它有来无回。

不久，还真有一架敌机飞入我领海线乐清礁上空，刚刚露面，就被我地面高射火炮一举击落。张爱萍遂动员部队做好反击其报复的充分准备。但是，美军一直没有行动，连点儿舆论上的反映都没有，似乎被打下来的不是美国飞机。后来，新华社一记者见到了张爱萍，告诉他说：香港报纸报导了美机被击落的消息。记者拿着报纸问美第七舰队司令：“你们的一架飞机被中共军队打下来了，你们是怎么办的？”这个司令回答：“那是我们的一架侦察机迷航了。”“王顾左右而言他”。

可见，还是毛泽东主席说得好：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然而，对与美军进行过多年较量的张爱萍来说，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要把纸老虎当成真老虎打。他精兵再练，箭搭弦上，正准备实施对大陈本岛的登陆作战时，突然接到彭德怀的电话：暂停对大陈本岛的进攻。

原来，美国务卿杜勒斯到莫斯科向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摸底：“美军将协助大陈本岛国民党军队撤退，中共军队会不会予以阻挠呢？”莫洛托夫回答：“这是中国政府的事情，你该去问周恩来总理，他会给你明确答复的。”交谈中，杜勒斯表露出请他向中国总理求情的要求。莫洛托夫默许了。中国政府考虑到国际关系及以防战争扩大，也默许了。

大陈本岛及南鹿山之敌，很快就撤逃了。浙东我军遂不战而占领了大陈本岛。

至此，浙东沿海敌占岛屿全告解放。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更善之善的是，”一位研究一江山岛登陆战的将军撰文说，“此战打碎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跳板，粉碎了其当时穷极恶光复大陆的美梦，使中国人民避免了一场战争的灾难……”

张爱萍当时没有考虑这么多，对诸多评论，他常常是微微一笑，却照例填了首《沁园春》词：

一江山渡海登陆即景

东海风江，寥廓蓝天，滔滔碧浪。看骑鲸蹈海，风驰虎跃，雄鹰猎猎，雷击龙翔。三军易统，戎机难觅，陆海空直蹈金汤，锐难当。望大陈列岛，火海汪洋。料得帅骇军慌，凭一赁空文岂能防。忆昔诺曼底，西西里岛，冲绳大战，何须鼓簧。“固若磐石”，陡崖峭壁，首战奏凯震八荒。英雄赞，似西湖竞渡，初试锋芒。

（东方鹤）

精确预测成妙算，小参谋受统帅激赏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一开始打得非常顺利，6月28日便解放了汉城。受美国扶植的南朝鲜李承晚政权眼看摇摇欲坠。美国人坐不住了，他们唯恐南朝鲜一旦垮台，会在整个亚洲引起连锁反应。

6月27日，美国出动海、空军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又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我军解放台湾。三天以后，美国又派陆军第8集团军直接参加朝鲜地面作战，随后美国操纵联合国，要挟英、法、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出兵，组成“联合国军”，另加李承晚的军队，由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任总司令。这时候，由于朝鲜人民军的英勇作战，到1950年8月初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迫使美军和李承晚军退守洛东江以东的大丘、釜山一隅。人们都处于高度的兴奋之中，等待着朝鲜实现统一的那一天到来。

一位苏联军事代表眉飞色舞地在北京对周恩来总理说：“人民军稳操胜券，要不了几天，李承晚伪军便土崩瓦解，朝鲜全境统一指日可待。”周恩来对这位苏联人的话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只说了一句“那好”。

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并不像苏联人那样乐观，显得冷静而镇定。他曾这样说过：现在朝鲜人民军应该做短暂休整，调整军队部署，然后再接再厉，最后一鼓作气，解放整个朝鲜。越是在这时候，越是要预防不测。

对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毛泽东给予了足够的注意。

就在毛泽东的目光紧盯着风云变幻的朝鲜半岛的时候，雷英夫作为周总理的军事秘书、总参作战室的主任，和作战室的参谋们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常常彻夜不眠关注着朝鲜战事的发展。总参作战室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一排平房内，平时戒备极严，人们戏称是“白虎节堂”。此时正是酷暑八月，参谋们冒着酷热翻阅资料，研究军事形势，气氛显得肃穆紧张。

各种各样的情报资料已经证实：朝鲜人民军已经打到了洛东江，釜山似乎指日可下。金日成的文告宣布：1950年的8月将是朝鲜人民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月份。或许出于军人的习性，在这一派大好形势下，雷英夫却生出莫名的疑虑和担忧来。

“主力全调到釜山三角洲，后方不全空了吗？”不知是谁半带惊讶地冒出了一句。随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

“美国驻日本的两个师显然是作为预备队部署的，可这两个师至今未动啊！”

“朝鲜的地形很像是一个长长的冬瓜，这地形可潜伏着危险啊！”说话人拦腰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地图上切了一下，那意思很明确，敌人会不会抄人民军的后路。

这一句话一下子提醒了雷英夫，情报部门提供的资料已完全证实，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及军事助手弗农·沃尔特斯已到达东京，这预示着美军将会有较大的行动。他立即提议，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并分两组对抗作业，然后将大家的意见加以归纳整理，提供中央首长决策参考。

讨论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多钟，意见共归纳出六条，但集中到一点：美军很可能要在仁川登陆，将朝鲜半岛拦腰截断，处于南部的朝鲜人民

军将有被包围的危险。对美军可能登陆的时间，他们也作了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选择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极大。当然，这些意见绝非主观臆测，而是在对大量资料和客观事实作周密研究后得出的。

以后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麦克阿瑟后来的回忆录证实，就在他们预测美军动向的同一天，麦克阿瑟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以骄矜自信的口气对总统顾问哈里曼说：“请马上告诉总统，如果他能满足我的要求，批准我实施9月15日涨潮时在仁川登陆的计划，我将用在南面的第8集团军为铁锤，用在北面登陆的第10军团为砧，把北朝鲜的军队砸个粉碎。”后来，杜鲁门果然批准了他的这个登陆计划，在选择登陆地点时，麦克阿瑟也曾考虑过元山、群山和仁川等地，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仁川，尽管仁川存在着登陆作战最忌讳的诸多不利条件。仁川港是朝鲜西海岸汉城西南30多公里处的一个重要港口。西海岸平均水深39.3米，比水深3699米的东海岸相差100倍。但西海岸的潮差特别大，涨潮时高差达11.2米，落潮后海面至港口可出现24公里的淤泥滩，在这里实施登陆作战，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这就使登陆时间的选择受到极大限制，带有很大的冒险性。而美军专家为麦克阿瑟提供的九月、十月、十一月的三个登陆时间，以9月15日为最佳。麦克阿瑟不顾军方首脑们的反对，决定冒险在仁川登陆。在东京论证作战方案时他曾说：“你们关于在仁川登陆的各种不利条件，恰恰正是本人确信此役必成之所在。”

麦克阿瑟的这种分析判断和最终决策，早在雷英夫等这些年轻参谋的预测之中。但预测毕竟是预测，他们的分析不过是依据一般的情报材料和作战规律得出的结论，对麦克阿瑟的计划他们不可能有所知晓。要不要将整理出来的六条意见报告中央军委决策人，雷英夫不禁产生了几分犹豫。

当然，这种犹豫更多的是由于对所提意见将会产生的直接后果的担心。这不是一般的日常工作事务，它可能直接影响最高领导人的决策。

雷英夫知道，我军从红军时期开始，虽然军事民主早已成为光荣传统，但决定战略战术的最终是统帅人物。作为参谋人员可以为决策提供情况和意见，做一些具体工作，直接参与大政方针决策的事，可以说是极少的。现在这些意见显然超出了情况资料的范围。一旦提出，就意味着直接参与决策指挥。

但是。他也想到另外一种情况：眼下新中国已经建立，统帅已经不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军事和作战了，更多的则是考虑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全面建设，作为首脑机关的工作人员，有责任为中央领导的正确决策当好参谋。何况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指示大家，要注意朝鲜情况的变化。

经过再三考虑，雷英夫决定把六条意见首先报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于是，当天晚上十点左右他回到西华厅对周总理说：“总理，我们作战室的同志对朝鲜战争作了研究，认为眼下潜伏着很大危险。”

总理放下手中的文件，以略带惊疑的目光看着他：“怎么，有什么重要发现吗？”

雷英夫说：“美军很可能要在朝鲜半岛实行登陆作战，登陆地点最大可能是在仁川。具体我们研究了六条理由。”

周恩来以审慎的目光看着他：“详细说说看。”

雷英夫指着墙上的巨幅地图，非常认真地汇报说：“麦克阿瑟眼下把美伪主力十几个师都摆在了釜山三角洲的滩头阵地上，我们计算了一下，平均

每 8 平方公里摆一个师，他的一个师差不多两万人。现在李承晚伪军龟缩在洛东江以东地区，釜山解放指日可待。可美伪的这二十几万部队既不撤退，也不住一线增援，固守这一片滩头，到底要干什么？从战略上看，我们认为这是为了把朝鲜人民军的全部主力吸引到南线来。如果这种判断成立的话，其中便隐藏着极为险恶的战略意图。”

周恩来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第二，美国驻日本的两个师，是作为预备队部署的，战斗力很强。眼下南朝鲜部队处在险境，可据情报证实，这两个师却没有任何去南朝鲜增援的迹象，而这两个师中，一个师就是海军陆战队。”

周恩来站起来，走到地图前，他的目光瞄向仁川当面的那片海域。不论从美伪军的兵力部署，还是从朝鲜整个地理地形看，仁川都将是敌人登陆地点的最佳选择。这里东西海岸的距离很小，一旦登陆完成，便很容易将南北朝鲜拦腰切断，而处于南部一线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将完全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周恩来的眉毛拧紧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麦克阿瑟这个冒险将军看来确实要在朝鲜再显身手了。”

雷英夫继续汇报：“再说麦克阿瑟和他的第 8 集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善于登陆作战而著称的，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曾吃了他不少苦头。就麦克阿瑟本人来讲，素来是敢冒险的，为此他与总统杜鲁门曾多次有过口角。比如，过去他搞登陆作战，攻占尼多罗岛、吕宋岛以及其它岛屿时，五角大楼都说风险太大，但他每次都力陈己见，最终都实现了计划，完成了登陆。”

周恩来双臂抱在胸前，微微点着头说：“现在麦克阿瑟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位高权重，按照他的禀性，要冒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风险，恐怕更有可能了。”

雷英夫说：“第四条便是我们对朝鲜地形的分析。朝鲜半岛南北长约 1000 公里，而东西最窄处仅有 200 公里。最有利于分割。而且可供登陆的地点很多，比如元山、镇南浦、仁川、群山。”他略作沉思，对登陆地点的回答显得异常慎重：“现在朝鲜人民军主力已经全部投入到釜山一带，后方很空虚，我们分析：西海岸的仁川是美军的最佳登陆地点。”

“为什么？”周恩来问。

“因为这里人民军部队少；这里既是汉城的外港，又是战略要地；这里的潮水落差大，地势险峻而且复杂，很可能因这样一个原因而被朝鲜人民军所忽略。而麦克阿瑟恰恰又是一个善于冒险且善搞出人意料的惊人之举的人物，那么选择仁川便完全符合麦克阿瑟的个性。”

周恩来点头示意他说完。

“这第六条也同样是很重要的因素。眼下无论是朝鲜还是苏联，似乎都沉浸在一片迎接胜利的气氛中，好像明天早上朝鲜就会统一了。报纸发社论，金日成发文告，表面看形势一派大好，其实在这大好形势之下，潜藏着极大的危险。一旦人民军被切断退路，就可能陷入绝境。对苏联和朝鲜目前的心态，美国人是清楚的。美英最近在地中海和太平洋基地抽调海空军封朝鲜海峡来，又是登陆作战的一个明显征候。所以，我们认为，美军极有可能正在筹划更大的阴谋……”

雷英夫话未说完，见周恩来大步走向电话机。恰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我是周恩来。啊，主席。”周恩来手握听筒，看了他一眼说：“刚才雷英

夫同志到我这儿来，讲了他们总参作战室对朝鲜战争的一些预测和判断，他们认为美军很有可能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是的，我认为很有道理。好，我马上带他去见你。”

“英夫同志，你跟我马上去见毛主席。”周恩来放下听筒，马上带雷英夫朝屋外走去。

事后雷英夫才知道，美军的这步险棋已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了。当朝鲜人民军打到洛东江的时候，他没有被当时的胜利所陶醉，而是提出朝鲜人民军应该休整，对战局作个客观准确的估计。当金日成的文告及朝鲜报纸的社论大张旗鼓地宣传胜利即将到来时，他却说，现在根本不是谈胜利的时候，朝鲜领导人及人民军应立即冷静下来。当美伪军队陈兵釜山一线，引而不发，杜鲁门又亲派顾问到了东京的时候，他预测战争很可能会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未雨绸缪，早在半个多月前，就对今日的朝鲜战局有所估计。因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不好轻易下结论，但有些工作毛泽东已经在做了。1950年8月5日，他命令东北边防军务必在8月份完成战争准备，以防不测。8月18日，他再次要求：“务于9月3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

此时已是8月23日。毛泽东正在菊香书屋仔细研究关于美军最新动态的一大摞电报。他打电话给周恩来，本想交换一下关于朝鲜战局的意见，没想到周恩来几句关于作战室见解的话，正是他数日来在反复琢磨思考的问题。

在菊香书屋，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听雷英夫汇报关于朝鲜战局的六条意见，他还不时用铅笔在面前的稿笺上写上几笔。

雷英夫一口气汇报完毕，毛泽东只是不住点头，没有插话，两眼一直在看着他，未了郑重地讲了六个字：“有道理，很重要。”

周恩来表示了自己相同的看法后，毛泽东起身在屋内踱步。他一边抽烟一边说：“据报告，美、英舰队正在向朝鲜海峡调动，飞机也在调动，看来美军如有大的行动，很可能就是最近。”说完，毛泽东把征询的目光投向雷英夫。

雷英夫鼓足勇气谈了自己的意见：“主席，对美军的登陆时间我们也作了预测。9月15日是大潮日，美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一天实施仁川登陆。”

“啊，如此精确。能不能谈得更具体点？”毛泽东对这个登陆时间似乎很有兴趣。

雷英夫说：“我们对9月至11月的朝鲜西海岸海潮作了研究，发现有3个最佳日期可供选择：9月15日、10月11日和11月3日。在这3个最佳日期内，各有2至3天的好时机。仁川海岸可供靠岸利用的时间，每12小时内只有3小时，如果以9月15日为登陆日，那天的涨潮最高时间共两次，一次是上午6时59分，另一次是下午日没35分钟后的19时19分。9月15日比另外两次时间相对更好。所以，我们认为美军极有可能把登陆的时间选定在9月15日。”说完，雷英夫顿时觉得有点忐忑不安。在最高统帅即将实施重大决策的时候，自己用如此精确的时间判断为统帅部提供参考意见，一旦有误，他知道这将负有多么重大的责任。

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当他缓缓吐出憋在胸中的烟团时，紧接着便发出一道在心中酝酿已久的命令：“立即通知情报部门严密注视朝鲜和美、英、日。立即把我们的看法向斯大林和金日成通报，提供他们参考，希望人民军有后撤和在仁川防守的准备。立即通知东北的十三兵团要

加紧准备，8、9两个月一旦有事，能立即行动。”

三道命令，由周恩来亲自布置实施。

不知为什么，自从离开了菊香书屋，雷英夫总感到肩上如千钧重担压着。或许在他去菊香书屋以前，毛泽东那些意见已成竹在胸；或许他的那些意见，恰恰促使了毛泽东最后决心的形成。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是在听了他们的六条意见之后发出命令的。这不能不给他造成极大的不安。

从8月23日开始，雷英夫常常彻夜难眠，几乎把全部的注意力关注到了朝鲜战场上。他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他认为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希望它成为事实。因为作为普通参谋，能为统帅提供事关全局的正确意见，内心将是一种极大的快慰，自己没有失职。何况这是普通工作人员直接参与的重大决策呢？但是，从内心讲，他又不愿看到这一判断成为事实。因为如果真是那样，将意味着朝鲜统一化为泡影，更大规模的朝鲜战争将会爆发，朝鲜人民将会陷入更深的战争灾难之中，而中国人民也必将同时受到战争的威胁。所以，他宁可承担一个失职的罪名，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判断成为事实。

然而，不管雷英夫的内心怎样矛盾，朝鲜战争却以它的固有规律发展变化着。

正当雷英夫为在菊香书屋给毛主席的汇报而时时担忧的时候，就在他们预料的那一天，即1950年9月15日晨5时，对朝鲜人民军最为不利的美军仁川登陆开始实施了。美军以其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为前锋，在仁川首先占领了面积0.6平方公里、位于仁川港当面的月尾岛（它被看作是仁川的屏障）；接着在当天下午涨潮时，美军登岛部队搭梯子爬上3米多高的防波堤，从仁川南部高地登陆；尔后，主力部队突破人民军防线，扩大了登陆场；至9月16日下午，控制了整个仁川。

70岁的司令官、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站在麦金莱峰号旗舰上指挥了这场作战。

美军占领仁川后，遂向汉城发起攻击，并以一部兵力南下水原，策应其正面战线上的部队实施反攻。驻汉城的朝鲜人民军在众寡悬殊情况下与美军血战半个月后撤离，为洛东江地域的主力大撤退赢得了时间。美军打到三八线时，美国政府为稳住中国，曾传话给我国领导人说只打到三八线。侵占北朝鲜的行动开始前后又传话给中国说，将在距鸭绿江40公里处停止前进。

毛泽东从来没有相信过美国人的谎言。

当苏联人垂头丧气地对我国领导人说：“看来金日成只有在中国的东北组织流亡政府了。”周恩来说：“我们的毛主席从战略上考虑这个问题，朝鲜就在我们身边，美国人占了朝鲜，我们将永无宁日。看着美国人灭亡朝鲜，见死不救，这说不过去嘛！”

据说，这句话传到斯大林那里，他感动得流了泪。

美军仁川登陆之后，毛泽东在周恩来面前表扬了总参作战室的参谋们，说：“不要什么都认为美国如何如何，我们的小参谋能预测出麦克阿瑟的登陆时间和地点，而且是那样精确，这可以说在军事历史上都是不多的。美国人没啥了不起，我们的小参谋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还说：“我们的小参谋懂政治，懂战略，不怕死不要钱，不怕苦不怕累，尽打胜仗。通过这件事，对少数犯‘恐美病’的人，是个最有力的教育。”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特别指出让雷英夫以更多的精力投入作战指挥工作。有什么重要情况和意见，可以随时向总理和他报告，不要有什么顾虑。毛泽东还提出，军队搞正

规化、现代化建设，参谋们可以负起职责，参与出谋划策，不要有自卑感。

作为统帅部的参谋，毛泽东的夸奖和鼓励使作战室的参谋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同时也感到庸头的责任更重了。

（陈先义）

“青山大学”出奇兵，“徐老虎”本名徐海东

1933年7月。

大别山区笼罩在层层灰云中，天阴沉沉的，整个大地闷热得像个蒸笼。徐海东和疲惫饥饿的战士们，拖着沉重的步子，风餐露宿，辗转在光裕山、杨真山、紫云山、鹅公山一带。这些天，干部、战士的脸也像天空一样阴沉，队伍里没有欢声笑语，更没有歌声。围攻七里坪之前那种高昂的士气、饱满的情绪，几乎都消失殆尽。有人叹气，有人埋怨，有人指天骂地：

“这鬼天气，要把人闷死了！”

“总是走，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

许多人脚板溃烂，走路一扭一扭，没有生病，也都瘦成皮包骨头了。副军长徐海东身体也很虚弱。他带着一条因伤致残的腿，和战士们一样，每天艰难地步行着。指挥员的马匹，现在全都让给了重病号和重伤员。在那围攻七里坪的四十三天里，全军伤亡、逃跑、饿死加上肃反扩大化被关押、枪毙的，损失了将近一半人。如今剩下的人当中，又有一半得了疾病。每个连队大部分人都在抬担架，照顾伤病员。错误的军事行动和肃反扩大化，不仅损伤了红二十五军的元气，而且挫伤了广大指战员的心。

徐海东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正想着如何休整一下，敌人向鄂豫皖苏区的第五次围攻又步步逼近了。

蒋介石这次亲临武汉，委任刘镇华为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调动的总兵力是14个师加4个独立旅，共82个团，约10万人。刘镇华的总指挥部设在河南潢川城。他亲自指挥三十二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三十师、五十四师、七十五师、十三师、三十一师，以潢川至麻城的公路为界，划为东西两区，对红二十五军实施“尾追”、“清剿”、“堵截”。

红军为避开敌人，不停地走动。一路上，他们食无粮，住无房，又遇上连阴雨。好不容易，找到一些麦豆之类的粮食。也没工夫把它磨碎，只好煮一下，匀给每个人一点嚼着充饥。这样对对付付过了十几天，徐海东魁梧的身躯实在支持不住了。他发起高烧来。可眼下谁也不能停，还得往前走啊！马夫要他骑马，他摇摇晃晃连马背上上不去。几个人费力地把他托上马，可他呢，连坐也坐不稳。他到了这个地步，也就只好躺在担架上，由同志们抬着往前走。

他作为一个副军长，既不能指挥队伍，又不能为军长分挑担子，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如今又躺上担架，让疲惫不堪的战士抬着风里来，雨里去，更是感到痛苦和不安。烦恼、病痛、饥饿和潮湿，使他的病情一天天加重。路上，抬担架的人走得稍快一点，担架稍一颠簸，他就咯血。

徐海东躺在担架上，心里惦念着军长、政委的健康和这支队伍的前途。他不时地向参谋、警卫人员打听部队的情况，他们都说：“没什么，队伍正朝着皖西走呢。”他渐渐地觉察到，这是一种出自好心的瞒骗。他听了这些不咸不淡的话，总是发火、骂人、骂自己。同志们都了解他那个火爆脾气，也毫不在乎。

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南移东转，终于在9月初到达皖西南溪一带，与郭述申率领的红八十二师会合了。这时，皖西只剩下一小片根据地，方圆大约也只有二百多里地。可当地的党政群组织都还在，除了红八十二师外，还有一、二、三路游击师都在坚持斗争。红二十五军来到这块小小的根据地，总

算是找到了“家”，有了一个落脚之地。群众拥军，党政机关欢迎，大家可以吃上顿饱饭了。

伤病员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徐海东被抬进了葛藤山边的一个小医院。说是医院，其实既缺医，又缺药。十多名医生、护士要治疗、照顾几百名伤病员。徐海东是个一刻都不肯安静的人。他日夜思虑着一个问题：敌人在鄂东没有抓住我们，决不会罢休，队伍要作好应付突变的准备。他让医生赶紧给他退烧。他还每天派人到军部去打听情况，带回的多是些安定人心的话。

9月10日，敌人七个师的兵力，从四面合围上来。红军天天和敌人激战。军长吴焕先知道徐海东发着高烧又咯血，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天刚晴了几天，突然又下起滂沱大雨。平时在行军、作战中，徐海东最讨厌雨天。眼下，他却对这雨天感兴趣了，他想：这大雨若是下个不停，就可能迟滞敌人的行动，我们也就趁这工夫多休整几天。

傍晚，徐海东静心听着雨打树叶的声响，迷迷糊糊正欲入睡。忽然，两名骑兵通信员顶风冒雨跑进屋来，大声地说：

“报告副军长，军长请你赶快回去！”

徐海东翻身坐起，看着两名浑身淋得湿透的通信员，知道下这样大的雨，要他赶快回去，一定是敌情严重了。他随口问道：“是不是情况不好？”

通信员回答道：“军长没有说，只是说清你快回去。”

徐海东赶紧边穿衣服，边向身边的警卫员说：“快去告诉医生，说我要马上出院。”

医生、护士一个个都围了上来，拦着他不让走。这个说：“你还发着烧呢！”那个说：“外面正下着雨，你若再淋着了，病会加重的。”

徐海东风趣地笑道：“淋淋雨，烧就退了！”说着披上雨衣，走出病房，爬上通信员牵来的马，冒雨朝军部奔驰而去。

一路上，大雨哗哗地下着，马蹄不停地敲打着地面，把那一汪汪积水溅得老高。徐海东似乎忘记了自己还在发烧，心里想的是如果真是敌人转向皖西来了，下一步怎样行动才好呢？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重兵在鄂东地区扑空之后，刘镇华忽令四十五师、七十五师、五十四师、六十四师、四十七师和七师、十二师，以南溪为目标，冒雨围了过来。

军部正准备转移，军长吴焕先一见徐海东回来，顾不及问他的病情，忙说：“海东，现在情况吃紧，敌人已逼近了。我们打了几仗，都没有打好，再不走，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省委已经作出决定，要我们立即转回鄂东。”

军长讲完行动的路线和当面的敌情之后，这才问徐海东：“你身体怎么样了？要不，还是睡担架。”

徐海东说：“我可以骑马。”

从医院随同回来的警卫员在旁边说：“不行，不行，副军长现在还发着烧呢！”

“啊，还发烽？”吴焕先向参谋人员以命令的口吻说道，“快去准备担架！”

“不要，不要！”徐海东抢着说。从鄂东转移过来，是让战士抬着来的，现在要转回去，还叫战士抬着，那像什么话。

吴焕先知道徐海东是个要强的人。他平时行军很少骑马，即使病了也满不在乎。现在他说要骑马走，估计病得不轻。军长沉思了一下，便向徐海东

说：“这样吧，我带七十五师先头走。你睡担架随大队。特务连跟着你。”

军长现在已经作出了安排，徐海东也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只好服从了。

9月27日夜晩，整个军从大埠口地区出发，钻过敌人一道封锁线，冒着雨，向鄂东转移。

走了五个黑夜，在10月2日的黎明，部队来到了黄土岗附近。这时，敌三十一师九十三旅已经堵在演麻公路上。随着一阵激烈的枪声，炮弹雨点般地飞来，把行进中的部队打乱了。

徐海东躺在担架上，听到这猛烈的枪炮声，急忙跃起身来。不一会儿，侦察员跑来报告说：队伍已被打散，先头部队已经越过公路，我们和军部失掉了联系。东方泛出鱼肚白。徐海东站在高处一望，明白过来，此地是黄土岗一带，前方不远处，就是演川到麻城的大公路。头天队伍出发前得到情报，敌三十一师九十一旅就驻在这一线，想不到我们的队伍趁夜色行军，还是中了敌人的埋伏。借着曙光，徐海东看清了附近有一座山，便立即命令身后的特务连马上抢占山头。特务连应声出动，迅速登上了山。这山不算高，山坡上有个“齐天大圣庙”，当地老百姓叫它猴子山，地图上却找不到它的名字。徐海东由两个人架着，一步一喘来到庙前。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拿望远镜四下看了看，又听了听枪声。显然，军长带着大部队已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大概已远去十几里了。他和特务连以及一些后勤人员，被切断在公路这一边。他看到许多挑行李的勤务人员和一些战士，正在山下一片野地里东奔西跑。敌人的枪炮漫无目标地射击着，看来敌人也弄不清楚红军行动的情况。

天大亮之后，部队仍处于混乱状态。有的人往山上跑，有的人在野地里转，只有特务连还完整无缺，守卫在徐海东的身边。特务连连长这时心里有些着急，向徐海东说：“副军长，我们怎么办？”

徐海东嘴上重复着连长的问话，发现有个号兵站在不远的地方，便向特务连连长说：“快，叫号官吹集合号！”从当团长、师长的时候，这个吹号的小朱就跟在身边当号兵，快三年了，小朱升任当了号长。不再叫“司号员”，大家尊称他“号官”。朱号官携带的这把黄灿灿的小军号，嘀嘀嗒嗒，能吹奏出好些语意：“紧急集合”、“防炮”、“防空”、“冲锋”、“开饭”、“休息”、还能指名道姓，传令哪级指挥员。徐海东自己就记着许多号谱，一般的号声，他不用号官翻译，自己能听懂是什么意思。

小号官接到连长的命令，也不问集合谁，就嘀嘀哒哒地吹了起来。号音刚落，山下野地里、山坡下就冒出几支小队伍，向着吹号的地方跑来。

徐海东看到这情景，心中一喜，又命令号兵：“再吹号！”

军号响，就是命令。徐海东所在的红军，没有电话机，更没有收发电报的机器，远路传信靠马跑，近处传令，使用军号。

小号兵这才领会了副军长的用意，登上一块大石头，鼓着劲又吹起了集合号。

随着嘀嘀哒哒的号音，又有不少人跑来了。

“再吹，不停地吹！”徐海东又对号官说。

号声又在山谷中震响，火红的太阳从地平线升了起来……

大概有一个小时了，集合号一共召集来六个建制连队和二百多名零散人员。呆在公路上的敌人只听到那号音响个不停，却搞不清这猴子山附近到底有多少红军，自然不敢贸然行动，只是盲目地朝着山上打枪、放炮。

徐海东命令通信员，通知连以上干部集合。

不一会儿，十几个连级干部来到了徐海东坐的小庙前。这时，山于部队突然被敌人打乱了，干部们心神不定。可是一看到涂副军长那么沉着，大家的心情又都平静下来了。因为谁都知道，跟着徐海东打仗是不会吃亏的。不过，大家见徐海东如今病得站都站不起来，又都忧心忡忡。

“嗬嗬，我们还有这么多人呀！”徐海东笑着，瞅了瞅每一个干部。他这一说，一笑，眼那么一扫，干部们也都精神抖擞起来

“都坐下来，”徐海东说，“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破敌人切断在公路这边了。向前走，那是往老虎嘴里送。要摆脱敌人，我看只有向后转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队伍太乱，没法指挥。”有人提醒说。

“眼下，要保住人和枪，把挑的担子统统扔掉！”有人紧急提议。

“对，人不能少一个，枪不能丢一支。”徐海东果断他说，“把所有零散人员编一个连，挑夫编一个连，把挑着的枪扛到肩上。这样，我们就会有九个连！”他伸出三个手指头，接着说，“可编三个营哩。我们有这么多人，也算是一支大队伍嘛！”

同志们听了副军长的这一番讲话，都抖起精神来了。于是各负其责就地整编了队伍，混乱现象霎时也一扫而光。

白天，新编成的队伍扼守山头，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太阳刚一落山，徐海东就下达出发的命令，八百名战士便悄悄下了猴子山，向东折回。

徐海东拄着棍子步行一阵，腿渐渐迈不开步了，便又被扶上了担架。他仰望着星空，听着战士们沉重的脚步声，心中不禁犯起难来：部队本来就丧失了战斗力，如今全军分成两半，今后可怎么办呢？……

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剿共”总指挥刘镇华，梦想三个月之内消灭红二十五军。可有一天，他突然接到情报，说皖西出现了一个红二十八军，军长是徐海东，政委是郭述申……不由得大吃一惊。这红二十八军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徐海东率领那部分人，在皖西南溪以北吕家大院找到了党组织——皖西道委。经皖西道委讨论决定，将游击在皖西的八十二师与徐海东带来的人员合并，组建成一个军。这就是红二十八军。

这时，皖西的形势十分严重。因为遭到敌人反复“清剿”之后，可以活动的地盘，只剩下了一条狭长地带。红二十八军留在这里不仅缺吃少穿，而且随时都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

11月11日皖西道委召开了一次会议，针对眼下的形势和徐海东的提议，确定了一条方针，不硬拼，不打消耗仗，积极向外游击，夺取敌人的物资、弹药，武装自己，让红军战士吃饱穿好。会上还决定：红军暂分两路。八十四师一路，由军长徐海东率领，北上熊家河一带，在外线打游击；八十二师一路，由皖西道委书记兼军政委郭述申率领，在原地坚持斗争。于是，这个新组成的红二十八军，又分头打游击去了。

冬季即将来临，部队吃饭、穿衣也都成了十分严重的问题。战士、干部一个个衣着褴褛，有的几乎不能遮体。白天，他们隐蔽在深山里，割草搭棚，煮点野草充饥；夜晚下山打游击。随着时间的推移，病倒的人，越来越多。

12月初，他们在商城石门打了一仗，缴获了一批棉衣。一部分换了装，大部分人仍是日间一身单，夜间盖茅草。就现在这样子，部队怎能过冬？供给处长急得睡不着觉。一天，他怀着焦虑的心情，向徐海东报告说：“全部

家当，只有 13 块大洋了。怎么办？”

徐海东也在为同志们们的生活问题操心，听了之后，还没有想出办法。突然，侦察员跑来报告说，驻段集的敌人刚刚运到了一大批布匹。徐海东一听，笑逐颜开，亲自带领一个团，长途奔袭吴桥和段集去了。紧接着，他又根据赤城县委送来的情报，攻下了叶家集。三战皆胜，歼灭民团共 500 多人，缴获棉布 600 多匹，还有棉花 1000 多斤……

供给处长看着这些布匹和棉花，乐得合不拢嘴，可舒心了。但他静下心来一算计，眉头又拧起了疙瘩。这时徐海东来到他身边，见面就问：

“几时能把棉衣做起来？”

“军长啊，要是能再打一仗，多摘点棉花来就好了。”供给处长说，“现在平均每一套军装只能絮一斤棉花，这衣怎么做呀！”

“看菜吃饭嘛，怎么不能做呢？”徐海东说。

“军长，指挥打仗我不行。”供给处长说，“做衣服，我有数。一斤棉花是絮不了一身棉衣的，最少也得两斤！”

“一斤，只有一斤。你得赶紧把棉衣给我缝出来。”徐海东说着，就蹲在地上，让供给处长把处里的同志都叫来，一起商量这一斤棉花怎样来絮成棉衣。

同志们来了之后，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可欢了。有的说：“絮上薄薄一层棉花就暖和了！俗话说，一层棉抵十层单嘛！”有的说：“干脆，只絮棉袄，不絮裤子。每人再发三条单裤就可以了。”……

供给处长磕着烟袋锅，一边琢磨大家的意见，一边说：“我看，裤子还是絮点棉花好，膝盖这一段絮上薄薄的一层，膝盖以下不絮棉花。另外，每人再发一副绑腿。这样，我们每个人穿上薄棉夹裤，再扎上绑腿，那不就暖和，又精神、整齐么？”

“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军长徐海东赞不绝口他说，随后又指着供给处长的鼻子：“鬼东西，人就是要受逼才行呢！你看，这一逼，不是把你逼聪明了么？”

“可是，”供给处长磕着烟袋，心事重重地望着军长，“缝衣服也是个问题呀！我们只有三十几个女同志，有的人还不会针线活。”

“人手太少吗？”徐海东站起来笑着说：“你啊，真是一会儿聪明，一会儿糊涂。哪个女人生下来就会缝衣服？你把布分下去嘛，大家都动手。我就不信，男人到老不会做针线活。可以通知下去，各班挑几个手巧的战士来参加缝纫训练班。”

第二天，徐海东和郭述申专门召开了一个干部会，动员大家做冬装。开始，有些干部思想不通，怕浪费了棉花和布还穿不上冬衣，有的人说：“好不容易搞的布，做瞎了太可惜！”

徐海东说：“不行，还是分下去做。我就不信，他娘的，男人只会穿衣，不会做衣。我看，男子汉除了不能生娃娃，什么事情都会做！那城里的好裁缝是男人，饭馆的好厨子也是男人。你们听着，明天就办训练班，选些心灵手巧的战士来，干部也要参加，谁要做不成棉衣棉裤，叫他娘的光屁股！”

会场上一片笑声，大家纷纷说：

“行啊！啥事都是人干的，边学边干吧！”

“哪个当兵的不会缝几针！”

徐海东说：“光缝几针不行，做就要做得好看，穿上整齐像个兵样，要

不把布缝缝披到身上，和尚袍似的，那算个啥东西！”他又对供给处长说：“你得动动脑筋，把布染好搭配好，灰布发给一个团，蓝布发给一个团，那样做出的衣服穿起来才会整齐一致呢！”

一声令下，从师长、团长、政委到每一个战士，都拿起了针和线。女同志，不管手艺高低，几乎都成了师傅。村子里的乡亲们——不论是老奶奶、大嫂子，还是姑娘、丫头也都组织起来，夜以继日地帮子弟兵做棉衣。

几天工夫，整个部队就全都穿上新军装了。“人要衣，马要鞍”，此话不无道理。指战员们新装一穿，绑腿一扎，一个个也就更显得精神焕发了。徐海东看着这空前整齐的队伍，咧嘴一笑，脸上的那个酒窝也显得更深了。通过这次换装，他更加深信：困难难不住真正的革命军人；革命军人在部队这个大学校里，一切都能学会。

冬衣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能不能再打个胜仗呢？新的欲望，在军长心里萌动着。徐海东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深深懂得：要带出一支好部队，最好的办法是领着他们打几个胜仗，尤其是打上个歼灭战。因为打了胜仗，部队的伤亡即使很大，情绪也是高的；要是打了败仗，就是伤亡不大，部队情绪也会低落。他便按照皖西道委会议决定的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拼，从分散游击中，寻求歼灭敌人的战机。他率领着部队，在敌人大包围中跳出跳进，时而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时而伏击敌人的小分队。仗越打越漂亮，越打越大。

1934年1月10日中午，在苏仙石、皂靴河之间的公路上，截获了敌四十五师一个运粮队。下午，敌人一个团攻上来。徐海东指挥红军又在高家贩、铁灰冲附近打了一个伏击，俘敌旅参谋长以下官兵160多人。第二天敌人大部队袭来，徐海东率领红军又跳入固始县境，接着奔袭樟柏岭、王家岭、顺河店、陈集、黎家集，先后歼灭民团3个中队，把敌四十五师的后方折腾得一塌糊涂。待敌四十五师打过来时，他又率领红军突然跳出，南下六安，在大小马店，一举消灭敌保安旅4个连，俘敌300多，缴获大米百余石。

3月10日，敌独立第五旅和一个民团尾追到金寨东南的古碑冲时，徐海东看准战机，指挥红军指战员给了敌人狠狠一击，将敌人全部打垮；敌旅长郑延珍负伤后掉头就逃，那个带路的县长想溜，却被当场击毙。剩下的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机枪、迫击炮、步枪丢得到处都是，归拢来足有100多件。

红军战士们以深山为家，每个人除了找一支枪，挎一个粮袋，腰里还插着一把镰刀。徐海东说：“这叫肩膀上扛粮袋，屁股后挂镰刀。”部队行过军，打完仗，就在山中住下。大家挥动镰刀，割草、砍树条，搭起挡风遮雨的小草房。粮袋空了，战士们提着镰刀，满山里跑，挖野菜，采山果。大伙都把镰刀看作枪一样重要。有人还为它编了一首歌：

“镰刀好似一支枪，帮我未果又盖房；
山沟野黍是我家，野菜山果是我粮。”

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成了徐海东得心应手的战术。哪里好打，他就率领红军往哪里打；哪里好走，他就率领红军往哪里走，弄得敌人无可奈何，十分狼狈，惊叫道：“徐海东是一条抓不住的游龙！”

3月，春暖皖西，山绿花红。徐海东和郭述申为迎接新的斗争，便率领

部队从外线又跳回皖西的中心区——葛藤山一带，决定进行休整。

这一天，部队刚刚停下，敌五十四师一个旅、七十五师一个旅，从南溪、汤家汇分头合击过来。

徐海东向政委郭述申说：“看来不打下个大胜仗，我们的屁股坐不住呀！”

郭述申说：“是这样哩！眼前敌人两个旅，我们要是吃掉它一个，剩下的敌人就会老实了。”

他们分析了两路敌情之后，定下决心：这一次把嘴张大一点，吃掉南路五十四师那个旅！

3月3日夜，五十四师上来了。徐海东命令一个营阻击北路敌人，其他部队集中在南路。第二天天刚亮，眼看敌人就要发动进攻，徐海东又命令两个营跑步向葛藤山西南的小石家沟前进，迂回敌人后侧。这两个营沿着一个突出的山梁，一直跑到山顶后，留下一个排固守，挖工事，其余的又顺着荫蔽的山沟，悄悄地向敌人摸去。

战场，是军事指挥员勇气和智慧的比赛场。徐海东常说：“要指挥好自己的部队，必须同时调动敌人。”他那两个营沿着山梁一跑，一下子就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小石家沟的山头上去了。

敌五十四师代理师长刘树春，是国民党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当过13年的团长和4年的旅长。他妄想和徐海东决一死战，捞上个彩头，好把那“代理”两个字去掉，他哪里想到，徐海东已给他摆下了迷魂阵，刘树春正指挥全旅的主力，扑向小石家沟山头，徐海东率领的红军主力却突然出现在他的背后两翼，这真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红军那激烈的枪炮声，使刘树春一下子乱了阵脚。

山梁上，声响嘈杂，有枪炮声，还有吼杀声。敌人的“围剿”常常扑空，今日里看到红军出现在山头，便拼命爬山追打。这时，埋伏在山下的红军和从山上转回来的红军两个营，分别从左右两侧夹击敌人，机枪手榴弹一齐对准山头。得意忘形的刘树春，这才发现已陷入三面挨攻的境地，想要调整兵力，已来不及了。

红军战士如出山的猛虎，冲入敌群。山坡上的敌人，成了热锅里的蚂蚁，东奔西跑，你推我操，乱作一团。徐海东提着马鞭，带领装备着驳壳枪的交通队参加冲击。

战斗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红军便活捉了刘树春，还俘了他的1000多官兵。敌人死伤不计其数，剩下的也都逃命去了，两个多团就这样彻底完蛋了。这是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反“围剿”作战中的一次大胜利！

战斗结束后，刘树春被押送到徐海东面前。这个“保定”出来的正牌军官，垂着头，不再趾高气扬了。一开始，他不吭声，过了片刻，忽然恍然大悟似地问道：“徐军长，您是黄埔第几期的？”

徐海东摇摇头。

“那您是‘保定’的？”刘树春不知趣地还问。

徐海东这才明白了，这个家伙满脑袋装的“黄埔”、“保定”。在他看来，不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就不会带兵；不是保定军校出来的，就不能指挥打胜仗了。

刘树春见徐海东不说话，认定他就是“保定”的同学，便又问道：“军长，您是‘保定’第几期的？”

徐海东火了，眼睛一瞪，说：“我既没有听过‘保定’的课，也没入过

‘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生！”

刘树春低下头，想了一会儿，又说：“敝人学识浅薄，不知青山大学在何处？”

“喏，就在这里！”徐海东手指着门外的远山近岭说。

最后，刘树春又怯生生他说：“敝人有个问题，百思不解，不知当问不当问？”

徐海东说：“可以问。你说吧！”

“你们苏区的红军，房无一间，粮无一颗，你们到底是怎么……”

“你倒好意思说出口！”徐海东突然站起身，气愤地打断他的话，“房无一间，那是你们烧的；粮无一颗，那是你们抢的！你们还骂我们是匪，你们才是真正的匪！你们以为这样就能灭掉红军，对吗？告诉你，这是永远也办不到的！”

刘树春早已闻得“徐老虎”的大名。今日里擒虎不得反入瓮，只得收敛起嚣张气焰。他想象中神出鬼没的徐海东，应该是个粗鲁的草莽英雄。他偷眼看望：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布军装，腰扎武装带，个子不高，却是一派将军风度。他顿了一会儿，再偷眼看望徐海东方圆型的脸盘，只见嘴角还挂着一丝笑意。刘树春有点发抖，连连说：“请原谅，请原谅，这些都不能归罪于我。我是个军人，军人只懂得服从命令……”

敌方听说五十四师一个旅被歼，刘树春被俘，又吃惊又害怕，立即集中四十七师全部和五十四师、五十五师各一个旅，共 10 多个团的兵力再一次围攻过来。徐海东指挥红二十八军，与敌人先头部队激战了一天。夜晚，部队转移后，进入了深山。于是，这支红军队伍里的每一个指战员继续在“青山大学”深造着……

（张麟）

有声的战斗和无声的战斗

在梁山下的一次成功伏击

1939年8月1日，在梁山南麓的一片松柏林里，战士们已经搭起了主席台。台上高悬着“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横幅，台子两边是醒目的对联：

想当年水泊梁山农民聚义震撼封建王朝
看今朝敌后山川八路健儿痛杀侵华强盗

指战员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有的打着竹板练习数来宝，有的敲着铜片学说山东快书，还有的在京胡伴奏下唱着京剧。到处是一派节日气氛。今天是建军节，前几天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带了两个连从微山湖回来同罗荣桓政委会合，大伙儿都准备好热闹热闹。

可是，这戏台却是白搭了。因为就在部队陆续进入会场时，驻在梁山前集的陈光、罗荣桓接到地方情报站派人骑自行车送来的情报：有一股日军已从汶上出动，带了四门大炮，有西渡运河向梁山开来的模样。陈光、罗荣桓一面命令继续侦察，一面通知部队，庆祝大会暂停，做好战斗准备。

这股鬼子有一个大队，300多人，属于侵华日军第三十一师团。大队长叫长田敏江。此人官儿虽然不大，据说同天皇沾点儿亲，来中国之前，还受过天皇召见，因此颇为骄横。他接受了一个任务，要把炮兵野尻小队连同两门新近从意大利运来的大炮护送到另一支部队去。这两门大炮再加上两辆拉弹药的炮车，煞是威风，因此被八路军的侦察员误认为是四门。

长田敏江领着队伍，拉着大炮，由汶上县警备队的伪军50多人开路，浩浩荡荡，直奔梁山而来。他认为这一带并没有八路军的主力，即使有个把“小小的游击队”，一见皇军来到，便会望风而逃。因此，也没有派出掩护和策应的部队。他准备到梁山耀武扬威一番后，再把野尻小队护送到目的地。

陈光是随朱德参加湘南暴动的农民出身的骁将。红军时期在九次战斗中负了十次伤。在进行平型关战斗时，他任三四三旅旅长，是前线指挥员。他酷爱战斗，一听说要打仗劲头就来了。得知这股敌人要送上门来，他兴奋地对罗荣桓说：“吃掉它，不能让它跑掉！”

性格沉稳的罗荣桓没有马上表态。他在一所农家小院内摇着蒲扇，来回踱步。高高的杨树上，知了不停地聒噪，他似乎充耳不闻。他在根据敌情、我情进行周密的思考。据侦察，汶上这股敌人是孤立的，没有后续部队，也没有其他股敌人的策应。梁山周围没有敌人的据点，稍远一点的东平、济宁、郸城、阳谷，敌人都没有增兵，也没有出动。我方兵力虽然只有一个营，但青纱帐已起，便于隐蔽活动。杨勇的独立旅就在梁山南面，远不过三十里，随时可以调来增援。而敌人并不知道我们的虚实，我们的攻击可以做到出其不意。罗荣桓判断，这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战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只要动作迅猛果敢，消灭这股敌人是完全可能的。于是，他朝陈光晃动晃动右拳说：“行！”

随后，他和陈光一道来到孟林勘察地形。孟林就是刚才准备召开“八一”庆祝大会的地方，现在戏台已经拆掉了。他们登到半山腰，朝东南望，只见茫茫一片高粱和玉米地，像是波浪起伏的绿色大海，一直伸展到天边。近处

可以看到从汶上过来的大路，稍远一点，路就消失在高粱、玉米丛中。敌人过来时，路两旁的青纱帐是打伏击的好地方。他们把目光再转向西南，只见一里开外的原野上耸立着一个孤零零的小山包，像一头卧地的黄牛。这座山叫独山，山周围有些民房，叫独山庄。在独山脚下有几座石灰窑，南面紧靠大路有车马店。这一带很可能就是战场。

罗荣桓和陈光商量好后，陈光开始调兵遣将，发电报给独立旅，让他们派人来接受任务；命令疏散前集和独山庄一带的群众，准备好战场；对几个连进行动员……独立旅的政治部主任欧阳文接到电报，赶到已转移到后集的师部。师部设在一座小庙里。供桌上摊开一张地图，还放了几本《水浒传》。陈光向欧阳文交待了任务，让他们负责战场勤务，并把驻在蔡林、拳铺的第一团调过来放在独山庄西南面，准备参战。在陈光向欧阳文交待任务时，罗荣桓摇着大蒲扇，在一旁悠然地踱着步。陈光布置完任务，欧阳文问罗荣桓还有什么指示。罗荣桓说：“让你们负责战场勤务，是因为你们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长，情况熟悉一些。”他又问欧阳文，有什么困难没有。欧阳文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在接受任务时，欧阳文不时瞥一眼供桌上的那几本《水浒传》。罗荣桓指指这些书，问欧阳文：“你看过这部小说吗？”欧阳文点点头，但并不明白罗政委问话的意思。罗荣桓又接着说：“在梁山脚下看《水浒》，打鬼子，蛮有意思呐。”欧阳文一听，也感到真是巧合。不过，在赵宋年间，梁山的英雄好汉抗击的是官军，而八路军今天要消灭的是穷凶极恶的日寇。

看到罗荣桓在战前是如此从容不迫，欧阳文突然想起苏东坡歌颂三国时期英雄人物周瑜的诗句：“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此刻罗荣桓手持的虽然不过是一把大蒲扇，穿的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灰军装和白布衬衣，戴的眼镜还缺了一条腿，弄一根线吊着，但他沉着、镇定的气度却给欧阳文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第二天中午，敌人过来了。汶上县警备队的伪军打头，接着是日寇，有骑兵、步兵、炮兵，队列整齐，神气十足。本来，陈光命令二连埋伏在大路两旁的高粱地里，准备打一个伏击。但是，敌人走了大路北面的另一条路，在这条路上却没有设伏，于是，敌人就一直闯到前集。好在前集庄里庄外还埋伏着四连和十连。他们见敌人进了庄，突然开火。埋伏在大路上的二连听到枪声，知道敌人已到前集，立刻赶来从敌人屁股后面开枪。前后这么一夹攻，敌人晕头转向了。打头的伪军首先被冲散，日军的骑兵、炮兵、步兵乱成一团，40余人被击毙击伤。

骑在马上长田敏江勒住惊马，挥舞着指挥刀，下令整理好队伍，然后让炮兵朝梁山方向开炮。轰了半个多小时，八路军一枪未还。长田敏江以为是碰到了游击队，又继续搜索前进，到了梁山西南面的马振扬村，奉命埋伏在那里的独立旅一团三营又给以一阵冲杀。其时天色已晚，长田敏江命令退守独山庄，准备第二天再行动。

在下午的战斗过程中，陈光、罗荣桓始终站在后集的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当他们看到敌人已经宿营，有些鬼子正在井台上打水洗澡时，才放下望远镜。他们又核实了从各方面搜集来的情报，当最后证实敌人只有这孤零零的一坨时，便下决心当夜予以消灭。入夜，三颗白色信号弹冉冉升起。师部的三个连和独立旅一团三营从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发起攻击。战斗进行到深夜，日军节节败退到大路旁的车马店内，在院墙上挖了许多枪眼，用

密集火力顽抗。这时，天快亮了。但这个车马店仍然没有攻下。有的干部担心天亮之后，敌人援军赶到，我军会吃亏。

在这关键时刻，罗荣桓命令一团火速派一个负责干部到师部指挥所来。一团政委戴润生赶到。罗荣桓听完他的汇报后说：“敌人是孤军深入。现在企图固守待援。但是，郟城、汶上敌人兵力空虚。如果临时从别处抽调，最早要明天中午才能到达。现在六八六团就在南面，已派部队向坟上方向警戒。你们放心打，要集中力量，一鼓作气，争取明天上午十点以前全歼残敌。”戴润生告退时，罗荣桓又握着他的手说：“兵书上说过，两强相遇勇者胜。一定要把敌人消灭掉！”戴润生精神为之一振，立即返回部队，向前沿阵地的指战员们传达了罗政委的指示。然后同周海滨团长一道调整部署，向敌人发起总攻。

罗荣桓又打电话给指挥师部几个连队作战的参谋来光祖，询问战斗情况。当参谋汇报到进攻车马店难免损坏民房时，罗荣桓立即说：“房子打坏了，战后再赔偿。现在要不顾一切消灭敌人。”于是，来光祖将部队组成人力组、作业组、爆破组。在火力组掩护下，作业组、爆破组登上房顶，作业组刨洞，爆破组往洞里集束手榴弹。与此同时，三营的指战员也逐个扫清石灰窑中的残敌，向车马店猛攻。日军支持不住了，开开南门向一片豆子地里乱跑。骑兵连及时赶到，战士们挥动着闪闪发光的大刀片，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向抱头鼠窜的鬼子砍去。独山庄的老百姓原来都撤出去了。此刻见八路军打了胜仗，也纷纷赶来，漫山遍野地捉鬼子。

3日上午9时，战斗结束。除少数敌人逃回汶上外，绝大部分被歼。打扫战场时，在一个洼地里发现了长田敏江的尸体。

梁山战斗的捷报，迅速传遍鲁西。梁山周围的老百姓敲锣打鼓，用车拉着西瓜、猪肉，慰问八路军。人们赶集一样纷纷前来参观那两门大炮。不仅老百姓，而且八路军的许多老兵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家伙。原来拉炮的马死的死，跑的跑。战士们临时找来一些牛套上。但怎么赶，那炮口低垂，车轮就是不动。一位侦察员说：“我看鬼子拉炮时，炮口是朝后的。”套炮的战士们恍然大悟，又把牛套到大炮的后面，这才把炮拉走。

罗荣桓的眼镜缺一条腿，作战参谋来光祖早就注意到了。打扫战场时，他看到一副眼镜，便装进了荷包。打扫完战场，他一到指挥所就嚷着要酒精。罗荣桓关切地问他哪里受了伤，他摇摇头说：“不是，我有用。”酒精拿来后，来光祖立刻把眼镜擦拭干净，然后送到罗荣桓面前说：“我拣了一副眼镜，你戴了试试。”罗荣桓戴上后向周围看看，又看看桌上的地图，高兴他说：“好，就像是专门给我配的一样。”罗荣桓在战争年代常为眼镜坏了而苦恼，如今意外地得到这副眼镜，真可以说是如获至宝。

梁山战斗是一次在平原地区进行的、以日军为作战对象的成功的伏击战。在双方兵力相当、日军火力处于很大优势的情况下，八路军取得歼灭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果。战后，八路军士气大振，加强了指战员们坚持平原游击战的信心。

梁山战斗的胜利也大大鼓舞了鲁西群众的抗日热情。战后仅仅半个月，在梁山和东平湖之间，就有3000名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

在诸葛亮故乡的一次巧妙突围

在山东省沂南县境内，沂河和东汶河汇合的地方，有一个村庄叫东西黄疃。这里在东汉时期属于琅琊郡，是足智多谋的诸葛亮的故乡。不过，诸葛亮童年时代就离开故里，随他的叔叔去了河南南阳。他的那些传奇故事，比如舌战群儒、六出祁山，前者发生于长江中游，后者则以秦岭南北为演出舞台，同他的故乡相去都非常遥远。

但是，在诸葛亮逝世一千七百余年以后的1941年11月，就在东西黄疃北面二十余里的留田村，却发生了一个充满中国人的智慧的故事，进行了一场奇妙的无声的战斗。

11月初，驻山东的侵华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上桥一次中将纠集了3个师团、4个旅团的日军主力，再加上伪军，共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这时，在沂蒙山区有两支八路军部队，一支是山东纵队一部，当时正在沂蒙山北部反击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的进攻。还有一支就是由罗荣桓和陈光率领的第一一五师师部机关以及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机关，共约两千余人，掩护这些机关的部队只有师部特务营和分局特务连。

过去日军“扫荡”，搞的是什么“分进合击”、“拉网”。这一次又换了新花样，叫“铁壁合围”。从这几个名词可以看出，日军的“扫荡”是一次比一次严密了。分进合击，缝隙很大。拉网，还有网眼。铁壁合围，那就如铁桶一般，该是插翅难飞了。

日伪军这一次确实是来者不善。11月4日，他们从沂蒙山以西的蒙阴县城出发，偷袭山东纵队机关驻地马牧池。山纵机关经过激战，袭围向东转移到南墙峪。不料又遭到从位于沂蒙山东部的沂水县出动的日伪军的合围。经过一天苦战，山纵机关才分散突围，随后向泰山区转移。由于情况紧急，山纵政委黎玉是翻墙头出村的。为了防止落入日军之手，山纵机关的电台砸了，密码也烧了，因而同友邻部队已经失去了联系。

陈光、罗荣桓在得知山纵在南墙峪遭日伪军合围后用电台呼叫，得不到回音，又派出许多侦察员，也没有查明他们转移到什么地方。与此同时，日伪军正逐步向留田逼近的情报却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这时，一一五师师部、山东分局和山东战工会机关就住在留田一带。

5日拂晓，临沂、费县、平邑、蒙阴、沂水、莒县的日伪军，兵分十一路，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从四面八方方向留田合围。到下午，日伪军最近的离留田只有七八里，远的也不过十几里。特务营已经在留田周围的山头、隘口，构筑工事，实施警戒。

如何应付如此严重的局势？下午三点多钟，在留田东南面一个叫牛家沟的小村子里，罗荣桓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在一座草房的东屋进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陈光、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肖华和一一五师司令部、政治部各部门的负责人，还有特务营的营长、教导员和副营长。他们有的坐在炕沿，有的散坐在炕下几张条凳上，有的干脆站着。由于人多，屋里坐不下，有几个干部坐在门口。

会场以炕为中心，炕桌已经拿掉，炕上铺着大比例尺的军用地图。几位主要领导干部都坐在炕边。讨论的问题很集中，即如何突出重围。由于事关重大，一开始与会者都没有发言。都在考虑。此刻，罗荣桓对如何突围，心

里已经有了个谱，但他在做出重大决策前，为了减少偏差和疏漏，已经习惯于认真倾听大家的意见，用大家的想法来补充和修正自己原来的设想。

半晌，朱瑞首先发言。朱瑞长方脸，个子很高，同罗荣桓一样，也戴了一副眼镜。他在苏联学过炮兵。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后，由于红军炮很少，他的业务长期用不上，一直在做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此刻，他看着地图，边考虑边说：

“从这里突围，当然是往东到滨海根据地最方便。过了沂河、沭河就到家了。现在河水很浅。过河不成问题。但是，我们这么想，敌人肯定也会这么想。他们很可能在路上布置一个口袋，等我们去钻。”

“奇怪，敌人用这么大的兵力包围我们，现在北面、南面、西面敌人都闹得很凶，为什么东面动静不大呢？”陈士榘插话。

“是不是敌人故意给我们网开一面，引诱我们上钩呢？”朱瑞接着陈士榘的话，补充了一句。罗荣桓听后点了点头。

“还有一个方向是往北，”朱瑞接着说，“昨天山纵刚刚在那里遭到敌人袭击。我们如果北上，会不会重蹈覆辙？即使我们能跳出去，北面是国民党军的防地，他们最近刚刚同山纵搞摩擦。我们转移过去如果遭受他们和敌人的夹击怎么办？我看，唯一的方向是向西，设法跳到鲁南或是天宝山区去。”

“朱瑞同志的分析很有道理。”肖华接着说，“但是，假如敌人在西面也设了埋伏呢？在费县、平邑的敌人都出动了。他们在那一带设伏不是没有可能的。我认为在弄清敌情之前，往那里跳也有点冒险。”

朱瑞听了很有见地的补充，连连点头，又陷入沉思。

讨论已有一个多小时了，需要赶快决定。因为敌人正在逼近，天黑之后无论如何必须突围。但是又不能匆忙决定。万一钻到敌人的口袋里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将意味着山东党政军首脑机关被搞掉，后果将不堪设想。沉默，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默。会场上只听得窗台上那个大闹钟的秒针在滴答滴答地往前走。它似乎也在催促人们早一点作出正确的决定。

罗荣桓看一看双手缩在袖筒内、蜷着双腿倚坐在炕头的陈光，问道：“老陈，你看呢？”

陈光最近身体不大好，离开工作休养了一段时间，前几天刚刚回来。他还没有完全进入情况，于是便说：“我再考虑考虑。”

又讨论了一会儿，大家提的方案归纳起来无非是四个：一是向东，二是向北，三是向西，四是从上述三个方向分散突围。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主张向南的，因为南面是临沂，是敌人的大本营。当时传说，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佃俊六就在临沂。因此，人们在考虑突围方向时，自然而然地把南面排除掉了。

然而，罗荣桓的主张却正是：向南！

为什么要向临沂方向突围呢？罗荣桓分析了敌情，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东面，沂河、沭河已被敌人严密封锁，日军在沂、沭河之间集结了重兵，设下了埋伏。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北面的沂蒙山区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他们在皖南事变后，同八路军关系恶化，最近刚刚同山纵交了火。如果我们北上，很可能遭到日、伪的两面进攻。西面，临沂通蒙阴的公路已经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即使我们能够通过这道封锁线进入蒙山，那里也是敌人合击的目标。南面呢，正因为是敌人的大本营，敌人就不会料到我们会向它

的大本营前进，向南走，可以出其不意。既然日军把兵力都集中到了沂蒙山区，其后方必定空虚，那里倒可能要安全一些。至于分散突围，那只是应急措施。现在形势虽然紧张，但还没有到必须分散突围的程度。罗荣桓主张，先向南突围，跳出包围圈，然后向西，进入蒙山南部。

罗荣桓的意见，乍一听，出人意料之外，仔细琢磨，又非常合情合理。与会者都是久经沙场磨练的战将。他们一点就通，一致赞成罗荣桓的意见。

方案定下后，罗荣桓便让作战科去通知集合队伍，又把特务营营长陈士法等人叫到地图跟前。他在地图上用蓝笔头画了三道横线，又用红笔头画了一条穿过这三道蓝线、由北而南再转向西的红线，然后指着那三道蓝线说：“这是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又指指那条红线说：“这是我们的行军路线，由留田经张庄、高里，转向西南，越过（临）沂蒙（阴）公路，直插诸城以南，在这里宿营。”他的手指指向汪沟。那里离临沂不超过五十里路。

罗荣桓等大家把路线记清以后，又详细交代了经过每个地方的注意事项。他对沂蒙山的地形要比他故乡衡山洙水还要熟悉，连哪里有一个隘口，哪里可以通炮车，都烂熟于心，了如指掌，好像在他脑子里有一个大沙盘。在日伪军“扫荡”之前，他曾派出参谋人员仔细勘察了沂蒙山区的山峰、河流、道路、隘口，他亲自召集大家对着地图汇报。有一些重要的地方，他亲自去察看。

罗荣桓交代了任务后，又给营里的干部做了具体分工，宣布了行军纪律：在跳出包围圈之前，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任何声响。太阳落山，河滩里飘荡着雾霭，夜幕悄悄垂下。守卫在留田周围山头上的战士们，可以看到日伪军点起的一堆堆篝火。人喊马嘶，此伏彼起。间或还能听到日伪军士兵在不成腔调地哼着小曲。看来他们颇为得意。他们以为“铁壁合围”已经大功告成，只待天明发起总攻了。

这一天是阴历十七，有月亮。人们都担心月光会暴露目标。然而可喜的是有雾，月光透过浓雾朦朦胧胧，好像是为八路军施放的烟幕。

两三千机关人员都在留田东面的河滩上集合完毕，静悄悄地，等待着出发。

前卫一连要出发了。罗荣桓在侦察科长周云等陪同下走了过来，问道：“你们连哪个班担任尖兵班？”

“还是一班。”宋连长和王指导员回答。

“哪一位是班长？”罗荣桓走到一班跟前。

“报告首长，我是一班长回景和。”一班长出列报告。“你们班担任尖兵任务多，有经验。”

战士们听到政委表扬，心里都美滋滋的。

“不过，今晚的任务特别艰巨。这么多机关干部能不能安全跳出包围圈，就要看你们了。”

罗荣桓的话音一落，宋连长便立即回答：“一连坚决完成任务。”

接着，罗荣桓又检查准备情况。当他知道战士小贾正在发烧时，便让警卫员小郭把他的日本制造的军用水壶取来递给回班长说：

“你们班里有病号，把它灌上水，路上好用。”

当时，部队都未装备水壶。罗荣桓这把水壶是从战场缴获的日军军用品。以后，回景和在战争年代经历过多次轻装，可这把水壶一直保存着，视若拱璧，伴随着他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罗荣桓带着作战科和侦察科的几位干部，随前卫连先头出发了。他没有骑马，很安详地走着，不时用手势同队伍中的同志打着招呼。他不像是带着几千人去突围，倒像是去散步。指战员们看到他那从容不迫的神态，紧张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

侦察科副科长周云带了几名侦察员走在最前面。他不时派人回来向罗荣桓报告前面的敌情。走到政治部驻地张庄，守候在路边的政治部的队伍也参加进来。日伪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到了。两股敌人之间的距离不足三华里。罗荣桓吩咐往后面传令：成三路纵队快速前进。队伍很快冲过了敌人的两道封锁线。途中，几次听到敌军的车马喧阗，都悄悄避开了。

到高里附近，向前看去，大小山头上火堆连着火堆。火堆旁，日军巡逻兵的身影隐约可见。每隔十分钟，许多绿色信号弹便腾空而起。这里就是日军的第三道封锁线。队伍在此地停留了片刻。不一会，前面的侦察员回来报告：“敌人的巡逻兵已经解决，可以向前走了。”罗荣桓下令跑步前进。当队伍经过两个火堆之间时，八路军的三个侦察兵已经穿上了日军的军大衣，正代替已经上了西天的日本巡逻兵施放信号弹，向日军指挥官报告平安呢。过了高里，已是敌人后方，果然守备空虚。部队折而向西，在埠山庄休息。此地紧靠临（沂）蒙（阴）公路，离临沂城只有五十华里。这时，天已大亮了。在村边不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日军的后续部队和辎重部队正源源北上。就在敌人鼻子底下，罗荣桓命令派出警戒，就地宿营。当大家和衣躺在草铺上时，远方传来隆隆炮声。敌人对留田的总攻开始了。对于劳累了一夜的指战员来说，这炮声无疑是最好的催眠曲。

这次突围，八路军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便安全跳出日伪军五万大军的包围。

在突围的行列中，有一个外国人，名叫希伯，是德国的进步记者。他到过陕北、皖南和苏北，访问过毛泽东、朱德、叶挺、陈毅。1941年9月，由苏北过陇海路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留田突围前，罗荣桓打算把他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希伯谢绝了。他激动他说，“我要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要用第一手材料向全世界报导山东战场的情况。”度过留田突围惊险的一夜后，他兴奋地对接待他的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我一定要把罗荣桓将军的这段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他写的文章翻译出来后就登在一一五师油印的《战士报》上，题目叫《无声的战斗》。

（黄瑶）

严惩侵略者，三战三胜汾离路

1938年9月，侵入我国华北的日本侵略军向山西增兵1万余人，并且兵分两路，南路侵永济、风陵渡，觊觎西安，从侧翼配合其正面战场作战；西路则犯离石、柳林，企图威胁陕甘宁，蹂躏吕梁山抗日根据地。日军来势汹汹，妄想一举消灭华北地区的抵抗力量，解除其后顾之忧。

西路日军的先头部队动作较快，不久便侵占了军渡——碛口一线，指挥这次行动的是日军一八旅团长山口少将。他亲率指挥机关进驻离石县，并在汾阳城内集中了大批弹药、粮秣、渡河器材等物资；随时准备起运，支援侵入离石县的日军。

活跃在吕梁山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抗日健儿，怎能允许日军的罪恶计划得逞？他们根据八路军总部“坚决拖住敌人，保卫延安，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的指示，行动起来，纷纷向日军出击。

罗荣桓、陈光命令杨勇率六八六团迅速进至汾（阳）离（石）公路东段，伺机打击西犯日军。

连日来，隆隆的炮声不断，军渡、碛口的日军正与坚守黄河防线的部队隔河炮战；汾阳至离石的公路上，整日烟尘滚滚，日军的运输车辆嘟嘟地嚎叫着，来往不断。六八六团的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把“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不许鬼子渡黄河，”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一些基层干部也急切地要求快下手。吃过八路军游击战不少苦头的日军，这次表现得特别小心，他们在公路两侧构筑了大量的据点和碉堡。每次运输时，前有尖兵开道，后有部队掩护，使抗日军队难有可乘之隙。

一天，杨勇带着各营的干部出去观察地形。天刚麻麻亮，一行人便登上了西公岭，隐蔽在半人高的蒿草丛中向公路上望。只见西公岭四周峰峦重叠，沟壑鳞比，汾离公路顺着山势，由东蜿蜒而来。公路在西公岭下爬过一段陡坡之后，便进入凹地。凹地一带并排平列着四条山沟，每条沟里都长满了齐腰深的茅草和杂乱的灌木。杨勇正看得出神，一个跑得气喘吁吁的侦察员送来师部的一份紧急命令：敌人20辆满载弹药和渡河器材的汽车，将从汾阳起运，请相机截击。大家知道了这个情况，指着那段凹地异口同声他说：“团长，这儿就是个好战场，就在这儿干吧！”

干部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唯有侦察队长刘善福坐在一旁没有吭声。他在一个星期前就来过西公岭，情况数他最熟，可他为什么偏偏不说话呢？作战中一向注意倾听部属意见的杨勇，头脑里不禁打了一个问号。

“刘善福，你的看法怎么样？”杨勇点将了。

“这里的地势好是好，就是那个碉堡讨厌！”刘善福指着对面山包上的一个碉堡说。

原来日军对这段凹地也是十分警惕，他们在对面的制高点上专门修了一座高大的碉堡。每当运输车队到来时，总是先派巡逻队搜索一下山沟，然后控制碉堡，掩护汽车通过。如此看来，这座碉堡对攻击部队来说，倒真是一个十分讨厌的障碍！

怎么办？有人提议干脆提前拔掉碉堡，但很快就被大家否定了，因为那样会“打草惊蛇”。又有人提议，在沟里埋伏部队的同时，也在碉堡后边的山凹里埋伏一个排，打碉堡和打汽车一齐开始，让敌人两头招架，不能相互支援。在一般的情况下，这样做是有把握取胜的，可现在地形不好，这样攻

击，伤亡一定不会少。尤其讨厌的是，碉堡背后的山凹不大，一个排隐蔽在那里很容易暴露。讨论来讨论去仍没个结果。这时，一直低着头在一块石头上画来画去的迫击炮连连长吴嘉德蛮有把握地对杨勇说：“这个任务交给我吧！保证三炮消灭碉堡。”原来他刚才在那里计算炮兵射击诸元。看着吴连长的神态，杨勇放心地点了点头。

问题解决了，大家都很高兴。

9月14日清晨，浓雾渐渐散去，金黄色的朝霞映照着苍翠的群峰，吕梁山脉显得分外雄伟。杨勇和团政治处主任曾思玉站在西公岭南山上的一棵高大的核桃树下，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周围的情况。只见山下的公路静静地躺在那里，公路两旁，漫山遍野的蒿草，随着晨风在微微地摆动，山谷里的早晨宁静极了。杨勇深深地吸了一口满带着晨露的新鲜空气，感到无比的清爽、新鲜、惬意，兴奋的心情驱走了连夜行军给他带来的疲劳。曾思玉打破沉寂，笑着说：“战士们隐蔽得很好，小鬼子这才叫磨道里的驴——没跑！”

7点多钟，活动在汾阳城附近的侦察员通过各村情报站送来了报告：日军的汽车已经出城了。

两个小时之后，汽车到达了西公岭前十多公里的王家池，在那里加了水，添了油，半小时后又上路。据守在王家池据点里的日军，先派出了一队巡逻兵出来开道，以掩护其车队安全通过西公岭。汽车队行至东山脚下时又停了下来，巡逻队上前搜索。隐蔽在南山顶上的杨勇仔细地观察着日军在西公岭东山顶上露出的黝黑的钢盔和闪着白光的刺刀。只见十多个鬼子持枪猫腰，成战斗队形沿公路缓缓前进，不时还煞有介事地放上几枪。这帮敌人走走、停停，停停、打打，慢慢地来到西公岭。他们一面虚张声势地咋呼着，一面用机枪、步枪四处盲目射击。也许因为他们近日来一直未在此地发现过什么情况的缘故吧，他们空忙活了一阵后，就稀稀拉拉地走进碉堡去了，一边走还一边“哇哩哇啦”地扯着嗓门唱日本歌。“叭！叭！”两发信号弹升上天空，负责搜索的日本兵好像是在用信号向隔山而望的汽车队宣布：“前面的道路没有问题，可以‘安全’通行。”可他们哪里会想到，杨勇也就是在这时向作战参谋说：“立即通知各营，准备出击！”

轰轰隆隆的马达声由远而近。转眼间满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的20多辆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开了过来，毫无戒备地开进了六八六团的伏击圈，当第一辆车快行到山拗时，时机成熟了。

杨勇毫不迟疑地向炮兵连连长吴嘉德发出了开炮的命令，只听“轰”的一声，第一发炮弹不偏不斜恰好落在那个碉堡跟前。曾思玉禁不住说：“好！打得好！”紧接着又是两炮，也都打中目标，碉堡里的敌人差不多全都报销了。

埋伏在北侧山坡上的连队迅速冲了出来，占领了碉堡前的阵地，一面截住了汽车西行的去路，一面向离石方向警戒。隐蔽在南侧山坡的指战员们则向行驶在公路上的车队扔出了一排排手榴弹。

狭窄的路面上，着了火的汽车“呜……呜……”地挣扎着，相互挤撞着。

车上的日本兵，有的跳下车来搏斗，有的趴在车厢里胡乱射击，企图顽抗。又是一阵轻重火力猛烈地压了下去，直打得日本士兵抬不起头来，一个劲地“哇啦，哇啦”乱叫。

嘹亮的冲锋号音震撼了山谷。六八六团的指战员们端起明晃晃的刺刀，个个像出山的猛虎，冲上了公路，与残余的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不到一个

小时，战斗就结束了，200多个日本官兵除3名投降外，全部就歼。

兴高采烈的六八六团的指战员们，挑选了两辆还能发动的汽车，满载着胜利品，开到了驻守在公路南侧山后的团后勤部门，并把其余开不动的汽车就地烧毁。

王家池据点里的日军虽然离西公岭近在咫尺，但对那里的情况糊里糊涂，搞不清楚。他们想打电话向汾阳报告，电话线早已被截断，接不通；他们想出兵增援，又不明情况，深怕自身难保。只好架起钢炮向西公岭的群山盲目轰击，一直打到半夜。

第二天，驻汾阳的日军才出动一个联队，外加几千伪军赶来，可他们又能看到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西公岭拉走五车他们同伙的尸体。

汾离公路上，一连几天不见日军的汽车。这下可苦了在黄河边上的鬼子兵。因为他们得不到后方的支援，粮秣和弹药就发生短缺。出来抢粮，又经常遭到游击队的袭击，粮食抢不到反而闹个损兵折将、丢盔卸甲。后来，日军一八旅团长山口少将出于无奈，只得让部下杀马充饥，固守待援。

“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日军，为了挽救其在黄河边上的部队，又开始了运输。不过，这回也学乖了，他们先派一个中队分乘几辆汽车，押送一车粮食试探前运。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杨勇决定先给敌人一个甜头，把这一车粮食送了“人情”。

第二天，日军的“胆子”果然大了起来，香月军团司令部无线电队一、五分队的20辆汽车，满载着通信、渡河器材和粮食从汾阳出来。当天下着瓢泼大雨，200多押车的鬼子，个个浇得像落汤鸡。汽车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整整颠簸了一天，好不容易通过王家池，爬过西公岭，眼看走过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不料却在油房坪一带较平坦的地方遭到了三四三旅补充团的伏击，补充团在彭雄团长的指挥下，冒着滂沱大雨，把敌人车队挡在公路的拐弯处，经过激烈的战斗，除先头的11辆汽车逃窜外，后面的9辆全被击毁，车上的100多鬼子又作了“泉台客”。此外，还缴获了许多通信器材。

日军在汾离公路上连续被歼400余名，一八旅团原有的50辆运输车也被搞掉了近五分之三。在这不断的打击下，鬼子损失惨重，坐卧不安，特别是后方补给线被切断，更使侵占离石的一八旅团心惊胆战，动摇了西渡黄河的决心，出于无奈，山口旅团长只得带着他的部队顺着公路向汾阳撤退。就在这时，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通知杨勇：“西犯之敌正在撤退，要不怕牺牲，不顾疲劳，迅速准备再战。”

为了狠狠地教训日军，陈光还把六八五团二营和师部特务连临时配属给杨勇，一起迎敌。六八六团的同志们高兴他说：“这下我们的力量就更强了，胜利也就更有把握了。”

屡遭打击的山口已成惊弓之鸟，他们估计在撤退中也可能遭到袭击，因而特别小心。

杨勇考虑到时时都在戒备中的日军，一定不易伏击。只有在日军感到最安全的地方出击，才能作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杨勇决定先钻到王家池据点附近，然后再寻机打击敌人。

王家池一带山大路窄。因为敌人在那儿吃过亏，特意安了一个据点。

9月20日拂晓前，六八六团及配属部队分头悄悄地摸到了王家池附近，迅速进入指定位置，隐蔽起来。二营及兄弟部队埋伏在公路北侧的薛科里一带，一、三营埋伏在公路南侧的铁剪沟附近。

薛科里、铁剪沟，山峦重叠，茂林密布，杂草丛生。

凌晨，日军垂头丧气地由离石县出发向汾阳撤退，沿途虽然不断地受到游击队的袭扰，但山口少将严令部属“不得恋战，快速前进”，因此，一八旅团只顾招架，并不还手，一路仓皇败退下来。

埋伏在王家池周围的六八六团的战士们强忍着饥饿、风吹和日晒，在“恭候”着山口的到来。太阳当头的时候，敌人的骑兵出现在公路上。紧接着，辎重、炮兵、步兵，前拥后挤、吵吵嚷嚷地来到了王家池山谷。杨勇命令二营首先发起攻击。紧接着其他各营也冲了出来。霎时，冲锋号声、呐喊声震荡山谷。

伏击部队一下子把日军切成了几段，并拦腰抓住了山口的指挥机关死死不放。头尾两段日军拼命反扑，想给他的指挥机关解围，双方胶着，厮杀激烈。在这紧要关头，杨勇把六八五团二营撒了出去。这支生力军一投入战斗，很快帮助各营把敌人一段一段地吃掉了。

这第三次大捷歼灭日军近千人，不久前还在叫嚣要一举渡过黄河的山口少将也作了战死鬼。

胜利轰动了整个吕梁山区，大大激励了吕梁儿女们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也打击了日寇企图一举消灭一切抗日力量的狂妄嚣张的气焰，粉碎了他们西进的企图。

侵华日军前线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力恼怒，破口责骂山口旅团无用。

汾阳城烟雾弥漫，臭气冲天，接连几天日军都在焚烧战死鬼的尸体，最后还开了个“慰悼”大会。那些“武士道”们免死狐悲地在灵前痛哭流涕。

差不多在日军开“慰悼”会的同时，吕梁山区也召开了一个盛大的祝捷大会。就在开会那天，杨勇收到了鬼子驻汾阳联队司令官写来的一份挑战书。“挑战书”是汾阳日军在“慰悼”会上由全体与会军官通过的。鬼子把送信人全家扣押起来，作为人质，逼他必须把“挑战书”送到杨勇手里。“挑战书”的大意是：前与贵军交战，遗憾万千……惟敝军不愿山地作战，愿约贵军到兑九峪平原一带决一雌雄……

杨勇看完“挑战书”，微微一笑，对周围的同志们说：“打仗嘛，就是要‘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这真是一封愚蠢的‘挑战书’。”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没过几天，鬼子当真调集许多人马进驻了兑九峪，等着与杨勇“决一雌雄”，还用大炮冲着吕梁山区轰了两天两夜。但日寇哪里会知道，等着他们的不是什么兑九峪的决战，而是在整个吕梁山区更为广泛炽烈的游击战争！

（姜锋）

七战七捷，粟裕打出八面威风

黑云压城，山雨欲来。内战全面爆发的阴影笼罩着华夏大地。

华中解放区是我解放区东南前哨，与国民党心脏宁沪地区隔江对峙，是蒋介石欲优先解决的“心腹大患”。作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的粟裕，对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伎俩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针对部队由于种种原因所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和平麻痹思想，粟裕反复对指战员讲，和不得成，是中央的事，我们作为军人，应该立足于打，不但要打，而且要准备长期打。华中地处要冲，势必为敌进攻主要方向，因而更应早做准备。

1946年5月5日，华中军区向中央建议：为确保沿江财源区域，并扩大政治影响，震撼京沪，华中军区已集中六、七、八纵队于苏中地区，并拟于五师战斗大爆发时，不待苏中顽军之动作，而先行发动攻势。次日中央复电：如果国方进攻五师，全国内战再爆发，你们先下手的计划是可行的。但必须得到中央的命令之后才能行动。当时，华中分局正在淮安讨论贯彻五四土改指示，粟裕在苏中前线作战前准备，人们称之为“蒋不攻李（先念），粟不攻蒋；蒋若攻李，粟必攻蒋。”

大战一触即发。针对敌强我弱的实际，我军在战争初期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呢？

长期独挡一面的作战生涯使粟裕深深懂得：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

那么，内战一旦全面爆发，战争初期又有哪些规律和特点呢？这个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萦绕在粟裕心间。

粟裕认为，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和我们都有了重要变化，我们必须着眼于战争的新的特点及其发展。蒋介石接收了日军的武器、装备和仓库物资，美国又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批飞机、大炮、坦克和各种武器交给了他，他的兵力发展到了他统治中国时期的最高峰——430万人。同时，蒋介石掌握着全国性政权，中国的地方派系中，再没有人敢于动用武力来打蒋介石了。因此，蒋介石必用全力来进攻我们。但与此同时，我方的情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停战协定生效时，解放区城市已有506个，超过过去中央苏区的24倍（中央苏区曾有过21个县城），解放区人口达13000万，超过过去中央苏区人口52倍（中央苏区最多时有人口

250万）。并且建立了东北和热河、察哈尔根据地，从此打破了敌人对我根据地长期四面包围的态势。除新四军第五师地区外，各解放区已联成一片。我们在战争的初期，就有一个历史上空前广阔的内线作战战场。我军已发展到127万人，其中野战军、地方军各半。尽管仍然是敌强我弱，但是，敌我力量的重大变化，已使国内战争的主要形式——“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永远结束了，产生着新的规律。在内线同敌人作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这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要充分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以运动战为主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敌我力量对比起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后，转入战略进攻。

但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6月22日设想的南线战略方针是打到外线去，实行外线出击的方针。6月24日，中央军委决定扩大南线作战计划的规模。由太行、山东两区主力外线出击，扩大为华中野战军参加的三军主力外

线出击。6月26日又电告华中分局：“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粟、谭（震林）率主力（不少于15个团）位于三分区（淮南津浦路东）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津浦路西地区），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

粟裕是于27日在苏中前线接到中央要华中主力西出淮南津浦线的命令的。他的内线歼敌的想法显然与中央外线出击的计划不一致。当时，毛泽东采取外线出击的方针，各有关战区领导都是拥护的。粟裕接电后郑重思考，认为如果把自己上述在内线歼敌的设想提出来，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他自己的设想并未经过实践的检验。为此他建议先在内线打一仗再打到外线去，用实践验证在内线作战与立即打到外线去的利弊。于是，粟裕在当天即向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华中军区建议：华中主力仍留苏中作战，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理由是：在淮南津浦线地区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如集中兵力过多，则所需粮、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另外，目前华中主力都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

粟裕发出此电后，立即赶回淮安，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一起商量，他们赞同粟裕的建议，于是，以邓子恢为书记的华中分局四位常委于6月29日联名向军委、陈毅建议：华中主力第一、六师仍留在苏中作战。

陈毅在接到粟裕27日电和邓、张、粟、谭29日电后复电指出，华中主力留苏中打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故应立即西开，执行外线出击的方针。

华中分局在接到陈毅电报仅几个钟头后，又接到毛泽东为中央军委写的复电：“部队暂缓调动”。于是，华中主力立即停止西开淮南。同时，陈毅也收到军委表示华中29日电“此意见似有理由”的电报。7月4日军委发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电报一到华中，粟裕在苏中前线立即照办。

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这是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对原定战略计划的一次重要调整，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此时，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国民党军12万云集苏中，狂言“三个星期消灭苏北共军”。

首战必胜，粟裕决心选择苏中解放区的前部地区作为初战的作战地域，尽管这不符合我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通常实行的诱敌深入的传统战法。但粟裕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诱敌深入并不是目的，也不是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唯一打法，而是歼灭敌人的一种手段。传统战法的运用，须在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从当面的实际情况出发，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在苏中解放区前部打，最主要的一是可收到“强敌而未展开，虽强犹弱”的效果，并迫使蒋军提早实行战略展开，从而便于我进行战略侦察；二是前部地区战场条件良好，该地区的广大群众经过长期战争环境的锻炼，具有顽强战斗的传统和丰富的作战经验；三是华中主力部队第一、六师在这一带作战时间较长，对民情风俗、地形道路十分熟悉，在长期坚持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军政、军民关系。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均对我有利，先在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打几个胜仗，是必要的，也是具备了条件的。

但是，敌为 12 万，我军仅 3 万余人，敌我兵力对比悬殊，且我军装备远逊于敌，再加上这是自卫反击第一仗，是内线歼敌的第一仗，是对付美械装备不可一世的蒋军的第一仗，这些赋予了该仗所具有的特殊战略意义。7 月 10 日，粟裕在得悉敌军将在三四天内分四路向如皋、海安大举进攻时，决定打四路之敌中的宣泰一路。该路是四路当中的中间一路，打掉这一纽带，西路泰州之敌和东路南通之敌的间隔就扩大了，我军可以转用兵力，连续作战，打开局面。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是粟裕用兵最为看重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突然性往往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选择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作为初战地域，这本身就是一个奇招的话，那么，打到进攻出发地域去，将尚未展开且孤立突出的美械装备之强敌整编第八十三师的两个团作为首歼对象则是奇中见奇了。敌人跟我军作战多年，熟悉我们的传统战法，在判断情况时有他们的思维定势。因此，从其绥区指挥官到八十三师师长，都没有想到我军会敢于主动向他们攻击，并且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军不等八十三师出动，而敢于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找上门去打他。

粟裕的奇招收到了奇效。7 月 13 日，粟裕率华野主力先机制敌，以 6 倍兵力攻打宣家堡、泰兴守敌各一个团。敌人事先毫无所知，战斗打响后，宣泰之敌慌乱失措，乱成一团。敌指挥部也莫测我军虚实，急令东路准备由南通北犯的第四十九师主力于 14 日回缩，以保南通。至 15 日，敌指挥部才判明我军主力确在宣、泰，又急令第四十九师再次北进。这一缩一伸，白送给我军两天时间。而 15 日晨，我第一师经一夜激战，已全歼宣家堡之敌一个团及山炮营，第六师也已基本上歼灭了泰兴之敌，敌人只剩下一个营部率少量残部负隅顽抗。鉴于我军已获得转移兵力的主动权，宣泰战斗遂告结束。我只留下少数地方武装继续围攻泰兴城内残敌，给敌人以为我军主力仍在泰兴的假象，作为钓饵，以引诱东路南通之敌北上。

宣泰之战，我军仅用一天多的时间歼敌整编第八十三师第十九旅的两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第六十三旅一个营，共 3000 余人。实践证明，整编的美械化蒋军是完全可以战而胜之、攻而歼之的。初战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我军战胜美械化蒋军的勇气和信心。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此也极为关切，战斗结束后，毛泽东便亲拟电文询问：打的是否即整编第八十三师？该师被消灭了多少？粟裕对此一一作了汇报。

然而，骄狂自恃的敌人竟估计我军经宣泰一仗伤亡必大，因此急调江南的整编第六十五师火速北渡长江，会同第九十九旅增援泰兴，并进犯黄桥，以拖住我军的主力；同时又令东路第四十九师星夜疾进，企图乘虚夺我如皋城；然后，第四十九师从如皋，第六十五师从黄桥，第八十三师从泰州，三面夹击我军。

针对敌人的部署，有两个作战方案要粟裕尽快做出抉择：一是就近打前来增援宣泰敌军；二是转移兵力，主力作远距离机动，直插进犯如皋的第四十九师侧后攻击之。粟裕认为：打援敌虽可就近转用兵力，部队不会疲劳，时间也较充裕，但援敌有备而来，警觉性必高，很可能一打就退，不易合围；或者打得相持不下，第四十九师得以乘机攻占如皋，使我军的侧后和后方受到很大的威胁。相比之下，打进犯如皋之四十九师虽需强行军一百几十华里，且两夜激战之后继以疾走，将减弱战斗力，但它的优点又是非常明显的，主要是敌人以为我主力在西边，第四十九师将放心大胆地向我如皋挺进，我军

来一个长途奔袭，必然大出敌人的意料，将陷敌于被动混乱的境地。

舍近就远，声西击东，弃援敌于不顾，远距离奔袭进犯如皋的第四十九师。粟裕果断下达了进军如南，歼敌于运动中的命令。

7月15日晚，粟裕令第一师全部和第六师大部转兵东进；并用汽艇急运第七纵队一个团先期赶回如皋，协同军分区部队扼守该城。同时设置疑兵，继续围歼泰兴城内残敌，给敌人以我主力还在西边的错觉，引诱如东之敌放胆向如皋进犯。

部队向东疾进。两昼夜的激战后，马不停蹄，又急行军一百几十里，也只有人民的军队才能有这样的打得、饿得、跑得的英雄气概。夜过黄桥，群众以烧饼和西瓜争相慰劳。这使粟裕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当年黄桥决战时群众支前拥军的场面，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那首激动人心的黄桥烧饼歌：

黄桥烧饼黄又黄暖，黄黄烧饼慰劳忙暖。

烧饼要用热火烤暖，军队要靠老百姓帮。

……

粟裕嘴角泛出一丝微笑，满怀深情地想：有了这样的军队，有了这样的人民，我们能不打胜仗吗？正义之师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7月18日晚，如南战斗发起。敌人还在做着兵不血刃、乘虚而入如皋的美梦，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百几十里之外的我军突然神兵天降，故而仓皇失措，部队大乱。

粟裕的奇招又奏效了！

如南一战我共歼灭敌整编第四十九师一个半旅，连同在阻击中消灭的敌人。共歼敌一万余人，达到了预期歼敌的目的。此时我军已连续行军作战10天，相当疲劳，加之敌援军趁机向我如皋和海安进攻，如继续与当面之敌纠缠，对我不利。为保持主动，粟裕决定我军23日主动撤离如皋城，准备再战。7月21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电贺华中野战军：“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

经过宣泰、如南两仗，敌人被我歼灭了两个半旅。但他还有第二梯队，立即又集中六个旅的兵力，分路合击我苏中重镇海安。

海安是苏中的战略要点和交通枢纽。敌人判断，海安是我军势在必争之地，企图依仗其优势兵力，在海安寻我决战，一举消灭我主力。

敌人的诡计岂能在粟裕面前得逞？粟裕考虑：中央要求我们不轻易放弃要地，但中央更要求我们保存有生力量，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在我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我固守海安，与敌人决战，势将付出很大代价，战胜了，敌人仍可继续调集兵力，保持其进攻的态势；战斗如不顺利，势必仍要撤出来，那就被动了。如我先以小部队实施运动防御，然后撤出海安，给予敌人以我军被迫放弃战略要地的错觉，使敌人重新骄傲起来，就将造成有利于我歼敌的战机。

然而，对于放弃海安这样的战略要地，粟裕也不敢单独做出决定。更何况当时中央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方针，还没有为大多数干部所理解和掌握。放弃海安确需慎之又慎。为此，粟裕日夜兼程从海安赶赴华中军区所在地——淮安。途中150余公里的路程，须经水网地区，粟裕开始骑摩托车，以后乘了一段黄包车（人力车），接着又骑自行车，乘船，当时能够搞到的交通工具全部用上了，一

天一夜赶到淮安。华中分局召开了常委会，经郑重讨论后，决定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尔后主动撤离，创造新的战机。最后以华中分局名义上报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并得到了同意。

粟裕对海安运动防御战采取的部署是：第七纵队在海安外围打运动防御战；第一师、第六师集中在海安东北地区休整补充，待机歼敌。

海安运动防御战从7月30日打到8月3日。第七纵队作风顽强，指挥灵活，奋战4天多，伤亡仅200余人，杀伤敌军3000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15比1的新纪录。8月3日，海安运动防御战胜利完成任务，第七纵队主动撤出海安。

实施运动防御，再主动撤离海安，实在是粟裕的一着妙棋，尤其是在我连打两个胜仗之后，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果断放弃海安。在敌优我劣的形势下，这样做不仅保存了自己，打击了敌人，为主力部队休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且放下了坚守海安这个包袱并将之甩给敌人，并造成敌人以为我不堪一击的错觉，为我以后歼敌创造了条件，埋下了伏笔。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局的发展，苏中地区已由粟裕初始建议的“打一仗再走”发展为三次作战，旦三战三捷，给敌以沉重的打击。三战的胜利初步证明了粟裕内线歼敌的正确性，并使他认为，内线作战还大有文章可作，他对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实行内线歼敌的方针比外线出击更符合战争发展规律的战略思想也由此得以升华。为此，在如南战斗结束不久，粟裕便于7月25日向中央、陈毅、华中军区建议：“当面尚有顽10师（旅）之众，而我们仅能集中35000人（官兵在内）之野战军于一个突击方向，于短期内恐难使战局打开更大局面。目前我淮南部队很难保住天长与盱眙，果如此，则淮南仅以少数坚持即可，故建议淮北战役尚未大打时，仍将五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有效。”

粟裕的这个提议，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一个旅的调动问题。可是，从实质上看，是华中野战军作战的主要方向是在苏中还是在淮南的问题，涉及华中野战军是仍在苏中内线歼敌还是立即西出淮南津浦线进行外线出击的方针问题。

此时，陈毅已率山东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线到达淮北。在接到粟裕25日要求五旅东调的电报后，陈毅决定遵循中央三路大军外线出击的计划不变。

粟裕从他对解放战争初期作战特殊规律的探索考虑，于8月1日向中央、陈毅及华中军区直陈己见：“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而在单独作战中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否则会影响到另一个战略区之机动。依目前华中兵力，实无法组成两个野战军。现天长、盱眙既失，五旅等部留淮南已无大作用，因此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苏中参战。”很显然，粟裕提出的各战略区“单独作战，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之敌”，与中央提出的集中三个战略区主力外线出击的计划是不同的。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华中野战军的作战方向和兵力使用问题采取了非常冷静的做法，继在7月4日做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的指示后，又于7月13日，即宣泰战斗发起的那一天，指出：“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

然后我鲁南（注：指陈毅部）、豫北（注：指刘邓部）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可以看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已暂时推迟了三支野战军同时实行外线出击的方针，而采取刘邓、陈毅两军暂时不动，由华中野战军先在内线打，查明敌人弱点以后，再一起动作，这实际上赋予了华中野战军以战略侦察任务。在接到陈毅 14 日“应即按原定南进计划（按：指三路大军外线出击计划）行动”电报后，毛泽东依然坚持让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作战的实践中先摸清敌人的底细，于 15 日复电陈毅：“最近几天，可看一看泰兴战斗结果如何？”8 月 2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给粟裕并告张鼎丞、邓子恢，陈毅，宋时轮的电报中也并未正面回答五旅是否东调问题，而是询问粟裕“一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们能在八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将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当接到粟裕 8 月 5 日“在五旅增到苏中条件下，于八月内再歼敌人两个旅是有把握”的电报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 8 月 6 日指出“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西调为有利”。此时，自我主动撤出海安，采取隐真示假手段后，果然如粟裕所料，造成敌人产生错觉，得出我伤亡数字竟达“二三万人”，因而宣告“苏北共军大势已去”。敌人自以为他们的第一步作战目标已经达到，因而调整部署，把原来驻在如皋城的陆空联络组撤回常州。

粟裕估计敌人必将分兵东进，占领李堡、角斜，完成其东西封锁线，然后守备部队准备分散“清剿”后方。骄兵轻进，必然会暴露出许多弱点，使我有隙可乘。8 月 6 日，敌果然由海安东进。粟裕遂于 8 月 7 日报告中央：“歼敌良机已至”，“如以五旅加入苏中作战，则苏中战局很可能最近有新的开展。”毛泽东 8 日为军委拟电复示：“望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显然，毛泽东所指的主要方向是苏中，而不是淮南。

敌人果然进一步暴露了“骄兵”的弱点，7 日占李堡，8 日占角斜。在得悉敌指挥部决定调整编第六十五师于 9 日经海安去泰州、黄桥接替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十九旅的防务，10 日又令新七旅从海安东开接替第一五旅在李堡一线的防务后，粟裕认为：敌军频繁调动，给了我军以趁其运动或立足未稳加以歼灭的大好时机。于是，粟裕当机立断，决心集中兵力，首先寻歼李堡之敌于运动中。

李堡之战于 8 月 10 日 20 时发起。我军挟三战胜利之威，士气高昂。我第一师乘敌人混乱之际，猛扑李堡，奋勇攻击。此时的李堡，正有敌人的两个旅部各率一个团在交接防务，兵力虽多，但队伍混杂，工事也未筑好，我军一击，建制大乱。至 11 日晨，我军完全攻占李堡。由于我掌握战机得当，攻势突然迅猛，敌人正在交接的两支部队都很混乱，交防之敌的电台、电话刚才拆除，接防之敌的电台、电话尚未架好，双方都无法向海安告急。11 日晨，敌新七旅旅长仍按原计划带领一个团由海安东行，我军部署在海安以东打援的第六师与第七纵队，立即利用高粱、玉米地作好伏击部署，在运动中将该敌全部歼灭，其中一个营缴械投降。

李堡之战，干净利落，前后 20 个小时，歼敌一个半旅共 9000 余人，赢得了苏中战役的第四个胜仗。

毛泽东是最注重实践的。而粟裕也是最善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也即打胜仗来解决意见争端的。当毛泽东得知李堡又获全胜后，12 日再给陈毅的电报中指出：“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二个胜仗（指李堡战斗——作者）不但使苏

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五军无法北调。”“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13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欣然电示粟裕、谭震林（华中野战军政委，李堡战斗进行中来到苏中前线）：望苏中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

四战四捷的实践也使粟裕更加坚定了在内线歼敌的思想，进一步证明了在战争初期实行内线歼敌方针的正确性。8月14日，粟裕、谭震林上报中央：认为再在苏中作战为有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此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完全赞同粟裕的意见，指出：“所见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陈毅也于13日、15日迭发两电指出：“宜就地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

作战实践终于统一了不同认识。

内线歼敌思想得以更加贯彻深入。

李堡之战意义重大。它打破了敌人迅速解决苏中问题的美梦，是苏中战役承上启下的关键一仗，更为主要的是以该战为转折点，在解放战争初期作战方针问题上从中央到战区指挥员之间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同时，也标志着粟裕初始委婉建议的“打一仗再走”在演变为四战四捷后，依然没有划上休止符，这篇光辉的乐章还要在苏中这块大地上继续高奏下去。

国民党军经过我连续4次打击，已被歼灭3万余人，在苏中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除非从别的战区抽调部队来增援，再难向我全面进攻。而我军经过连续作战，抓紧休整和补充解放战士（即俘虏），加上连打胜仗的鼓舞，士气高昂，越战越强。华中军区增调来的生力军第五旅和军区特务团也已于李堡战斗时到达，我军兵力增强。

两相对比，此起彼伏，敌我态势已出现了有利于我的明显变化。

粟裕那深邃的眼光又凝眸在地图前，运筹下一个作战方案了。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在苏中“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的指示精神，结合苏中当面实际情况，粟裕设想了一个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严重威胁敌人的后方基地，打乱敌人的部署，造成歼敌之良机的方案。

不过，敌人的这个“肚子”，东西百余里，南北仅数十里，东面是海安经如皋至南通公路沿线之敌；西面是泰州至靖江公路沿线之敌；南为长江；北为泰州至海安公路沿线之敌。在敌人肚子里面还有一条如皋至黄桥的公路，这条公路上的敌人是我们歼击的目标。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敢于钻到这样的肚子里去打，非有过人的胆识和气魄不可，也曾对作战计划进行缜密部署，不能差之毫厘，对战局的可能发展的估计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否则，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西游记》当中曾有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索取宝扇的故事。但那是神话。

而粟裕在解放战争初期苏中这块土地上创造的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的奇迹却是实实在在的事。

8月20日，驻扬州的敌整编第二十五师拟进攻我运河线上的邵伯镇，得手后将向高邮、宝应进攻，威胁我两淮。邵伯地区仅有我第十纵队和二分区

两个团守卫。于是，粟裕、谭震林决定采取“攻黄（如黄路）救邵（伯）”的方针，当晚，率华中主力第一师、第六师、第五旅、特务团共三万余人向南开进，目的是攻占如皋城以南的丁堰、林梓两镇，切断如皋至南通的公路，在敌人肚皮上切开一个口子，以便主力钻进敌人的肚子里去。

21日夜11时，丁堰、林梓战斗打响。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我军会来个釜底抽薪，到他的肚子里去打。

又是一次出敌不意的攻击。

战斗进展甚快。22日上午，丁堰敌交警第十一总队被我第一师围歼大部。我第六师围攻林梓，全歼守敌。东陈之敌在我第五旅围攻下，大部逃入如皋，东陈被我攻占。

丁、林战斗歼敌交通警察5个大队及第二十六旅一个营，共3000余人，缴获甚多，打开了西进的门户。

此时，淮北方向由宿县东进的敌人正准备向我淮阴进犯。扬州之敌第二十五师为了配合这一行动，于8月23日全部开始沿运河北上攻我江都县的邵伯镇。

粟裕决定按原定“攻黄救邵”计划，用攻其必救的办法来调动敌人，寻歼敌人于运动中，并解邵伯之围。

粟裕的部署是：以刚从地方武装升级组成的第十纵队（三个团）及第二军分区两个团在邵伯防御；第七纵队在姜堰、海安之间发动箝制性进攻，拖住敌人；第一师、第六师、第五旅、特务团继续大踏步机动作战，于8月23日夜间向敌人的“肚子”中心部位黄桥挺进，以寻机歼敌。

由于在我内线作战，加之我老区组织严密，敌人得不到情报，故反应迟钝多误。我军由丁堰、林梓西进，敌指挥部并未意识到我军将挺进黄桥，却根据我丁、林战斗的态势判断我将攻击如皋，急令黄桥守敌第九十九旅沿如黄公路增援如皋。8月24日，我军截获敌人这一行动的情报，粟裕即令部队在行进中严密注意敌情，准备在如黄路与敌第九十九旅打一场预期遭遇战。25日，敌第九十九旅进至黄桥东北之分界，与我第六师遭遇，当即被第六师包围，展开激战。

至此时敌人才发觉我主力已西进，乃令已南下到如皋的第一八七旅，加上第七十九旅一个团和第九十九旅的一个营，急向西南增援第九十九旅，该敌又被我第一师在分界、如皋之间的加力、谢家甸截住，将其包围。

25日夜，分界、加力两地之敌均集团固定，因为敌人实有的兵力远比我原先侦察的要多，经一夜激战，都未能解决战斗。

战局骤紧。西面运河线上邵伯、乔墅一线战斗十分激烈。我主力若在如黄路拖延时日，邵伯一旦失守，战局将起剧变，不利于我军。

“功亏一篑，这种教训不乏其例”，粟裕想，“就整个苏中战场来说，敌我兵力对比是三点五比一，由于我们灵活用兵，在第一、二、四、五各次战斗中，我们都集中了三倍以上的兵力对付待歼之敌。但是我们手头兵力不多，更没有预备队，只能从战场上及时转用兵力，靠灵活用兵来弥补兵力的不足。”想到此，粟裕果断调整部署，采取断敌后路、隔断敌人东西两部联系的办法，使之无法靠拢和脱逃，然后选取较弱的第九十九旅两个团先行歼灭。8月26日，粟裕令第一师的第一旅由加力方向西调，转用于分界，配合第六师等部以10个团的兵力，以五比一的绝对优势，迅速围歼了第九十九旅的两个团。随即又将第六师全部和第一旅东调，会同第三旅、第五旅以15

个团的兵力围歼加力、谢家甸之敌 3 个团。26 日晚，东调各部迅速开进。

此时，邵伯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从 8 月 23 日起，敌军在炮艇、飞机配合下向我邵伯、乔墅一线阵地猛攻。我第十纵队和第二军分区的部队根据水网湖泊地区正面狭窄的特点，采取轮番守备的战法，以连续的反冲击和白刃格斗消灭敌人。敌二十五师猛攻了 4 天，我军工事大部坍毁，许多部队的指战员坚持在齐腰的积水中作战，时常送不上饭，但战斗意志始终压倒敌人。这时，第九十九旅已在如黄路上被歼，第一八七旅等部也将不保。消息传来，敌全线震惊，深受威胁，且伤亡已达 2000 多人，再打下去，凶多吉少，终于在 26 日黄昏时候狼狈撤回扬州。

进行了四昼夜的邵伯战斗即苏中第六次作战又以我获捷而告终。

“救邵（伯）”目标已达到，剩下的仅是“攻黄”这一块了。27 日上午，我围攻加力。谢家甸之敌的 15 个团全部到达了预定位置并投入了战斗。敌人又从如皋拼凑了一个多团的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西出接应。加力、谢家甸之敌以营为单位分路突围。粟裕指挥各部全线出击，将突围之敌一一歼灭，仅数百人逃回如皋。如皋出援的一个多团，也被我歼灭一半。第五旅及时插到如皋西南，正好截断敌人逃路，俘获甚多。因我第五旅衣服为黄色，和苏中部队的灰蓝色不同，而与当时国民党军的黄绿色近似。该旅向敌迅猛出击时，敌军误以为援兵赶到，欢呼跳跃，随即成了俘虏。继而第五旅乘胜利余威于 31 日攻克黄桥，黄桥守敌第一六旅 5 个连缴械投降。

如黄路之战，我军共歼敌两个半旅，17000 余人。在解放战争初期对付美械装备之敌人，如此战绩，真可谓是大获全胜了。

至此，苏中战役历时一个半月，我军以 3 万余人迎战蒋军 12 万人，七战七捷，歼敌 53000 余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又一个奇迹。同时，该战役还证明了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从而为我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对此，毛泽东亲自为军委起草电文向各战略区介绍了苏中作战经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八月二十六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八月二十七日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精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杜魁元）

不拘陈规用兵，聂凤智迭克强敌

有险才有奇

这是一场春天里极其罕见的暴雨，已经下了一夜又大半天了，现在仍然像用瓢子往外泼，用筛子往下筛一样大一阵子小一阵子地不停下着，敲打着茅屋顶，像对屋里的人们发出什么警告似的。

和屋外的暴风雨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茅屋里的人们寂静无声，看着雨水从屋檐、墙头和树上跌落下来，院子里像水烧开了似的冒着泡儿。人人都在一支接一支地猛抽烟卷，专等着纵队主将——聂凤智司令员下决心。

1948年3月初，聂凤智第九纵队遵照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的部署，投入胶济铁路西段作战，首仗夺取周村。

周村，有“天下第一村”的美称，名为村，实是城镇，以盛产丝绸著名。它位于胶济铁路济南、潍坊之间的中心点上，是胶济铁路西段作战的战役核心所在。当时由蒋军整编第三十二师师部驻防，设有高大围墙、外壕、铁丝网等障碍物，工事坚固。敌整三十二师，下辖一四一旅、新三十六旅、交警一总队、淄博警备旅等，总兵力4万多人，布防在张店、博山、明水、齐东地域内。山东兵团在部署胶济铁路西段战役时，曾召开作战会议，提出过两个方案：一是九纵先打长山，七纵打张店。然后视情况发展，再取周村；二是九纵先打张店、后打长山，七纵打淄博。在扫清外围之敌的基础上，两个纵队夹攻周村。

对这两个方案，聂凤智持有保留态度。他提出了第三个方案：采用“挖心战术”，钻到敌人肚子里打。七纵打张店，九纵打周村，砸烂他们的指挥部，然后迅猛扩大战果。

聂凤智说：“兵团提出的两个方案，自有道理。照那样去打，我们背靠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层层剥皮，逐次攻击，是稳中取胜的办法。但是，这两个方案都是先从敌人外围打起，一层一层往里‘啃’，可能会拖延战役时间，付出相应的代价。”

聂凤智点燃一支香烟，使劲地吸了一口，接着说：“胶济路西段战役是中央军委和华野解放全山东作战部署的第一个战役，打好这一仗，对于争取时机，鼓舞士气，激励群众，震慑敌人，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一定要打得快，打得狠，干净利落，首战大捷。”

讨论中有的同志说：“按照老聂这个方案，如果打得顺手，是可以争取时机，缩短战役时间。只是长途奔袭，钻到敌人里头去打，四面受敌，太冒险了！”

为了说服大家，消除顾虑，聂凤智将几天前对周村地区所有敌军的建制、番号、兵力部署、通信联络、工事构筑以及部队士气等情况向与会人员作了介绍。他说：“周村守敌整编三十二师，半年前被我刘、邓大军在巨野聚歼，后以其残部为骨干，扩充成一四一旅，战斗力并不强。今年2月间刚从兖州调来周村，人地生疏，守备区内部指挥关系一时难以协调。整个守备区布防约百余里方圆，兵力分散，各点守敌之间空隙大，驻防周村的实际兵力只有5个营3000人左右。论城防工事，周村较长山简陋，缺少纵深配备。由于地处守备区腹心，周村守敌也有所懈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以主力一部直接楔入周村，打它个措手不及，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战果。至于险与不

险，不能说死。我们学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要讲一点军事辩证法。看问题要看它的实质。从表面看起来，四面受敌，的确很危险，历来是兵家大忌。但是，如果攻击的时机选择得当，攻击的对象选择准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取胜的把握性反而更大。这就是‘有险才有奇’的道理。”

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说：“军事斗争，一点风险也没有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消灭敌人，敌人要消灭我们，这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风险！”

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也果断他说：“好！就按老聂的办法打，远道奔袭，直取周村，来它个‘中心突破，四面开花’！”

经过缜密分析敌情，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兵团首长决定七纵打张店，九纵打周村，十三纵、渤纵、鲁纵阻击邹平、淄川、胶县、青岛援敌，于3月11日发起全线攻击。

3月工日，聂凤智率九纵从掖县出发，向周村开进。9日，到达广饶一带驻扎。这里离周村只20多公里，为了打好这一仗，聂凤智于9日夜，亲自率领担任突击任务的师、团、营、连指挥员，化装抵近周村周围察看地形。经过仔细观察比较，主突方向选在周村东门。周村东门外居民点建筑物距城门最近，便于突击队接近，有利于我炮兵抵近射击，发挥火力，掩护步兵突击。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10日黄昏，九纵正向周村穿插途中，天忽然黑了下來，一阵雷声滚过，雨就倾盆似的倒了下來。几分钟，天地已分不开，空中的水往下落，地上的水横流，成了一个灰暗黄昏，到处坑满沟溢，道路淹没。初春下这样大的雨，实在太少见了。

入夜，雨下得更凶了，四周漆黑，道路不辨，对面不见人影。矫健严整的进军队伍，全陷在泥泞之中，指战员们个个浑身滚满泥浆，弹药被装也全部浸湿。人，迈不开步；马，拉不动辎重；重炮轱辘，更难转动。部队前进十分艰难，一夜仅走几华里，未能按时赶到作战地域。

11日拂晓，七纵一举攻占张店，俘敌4000多名。张店在周村东面20公里。张店一打，周村守敌32师师长周庆祥猛然警醒。他一面急电济南王耀武处求援，一面命令驻守长山、桓台、邹平、齐东之敌，火速向周村靠拢，以求固守。一日之内，周村敌人总兵力已由原来3000人，突增到1.5万人。

当前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给九纵出了难题：打，还是不打？！

滂沱大雨，仍在哗哗地下着，部队继续在泥泞中跋涉。纵队指挥所，不得不在途中暂时停下来，寻一处路旁的小村庄，开会研究纵队下一步行动。

有的指挥员说：这场大雨下坏了。周村之敌察知了我军意图，我纵已失去战役突然性。

有的说：敌人兵力陡增四五倍，在兵力对比上，我纵谈不上占多少优势。

炮兵指挥员说：一部分大炮受雨所阻掉了队，弹药器材受潮，火力的发挥可能受到影响。

基层指挥员反映：部队连夜冒雨行军，困顿疲劳，后勤粮秣未跟上。

多数指挥员认为：现在周村之敌兵力急剧增加，如果贸然攻击，有诸多不利。兵团和纵队党委战前都作过明确决定：如敌情变化大，暂不攻击，可相机行事。

面对空中落下的万千条雨丝，听着大家不无道理的主张，聂凤智的脑海里反复权衡着打与不打的利弊：“不打，当然是安全的，而且有着十分充分的理由，也顺应了多数同志此时的心理状态。打，就有失败的可能，就意味着要承担招致失败的全部责任。然而，胶济路西段作战，周村是关键。打迟

了，拖延了，就会使周村之敌赢得调整部署、加固工事的时间，加之济南、潍县之敌下决心来援，就要造成全局被动。”

聂凤智又想到毛主席的军事辩证法，对出现的新问题进行分析：这场大暴雨，虽然阻碍了我军达到作战地域的时间，但也给我们帮了忙，敌人是不会想到我们在夜雨中攻击，我们更容易出奇制胜。周村守敌兵力增加，当然对我们不利。但攻击周村的有利因素也随之增加：敌人匆忙收缩，交接不清，部署混乱，我恰好乘乱攻击，打它个立足未稳；敌人集中，我正好多歼，比起一个一个去打四周城镇，战果更大；张店之敌被歼，我纵无旁顾之忧，敌人则受到震慑，坚守决心更加动摇……这样一分析，聂凤智认识到，九纵战役突然性只是部分失去，并未尽失；连夜突然发起攻击，仍操主动。为此，他提出：周村还是要打，而且要连夜打，并陈述了自己思考良久的理由。

然而，主张暂时不打的同志没有被说服，两种意见终难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建议：请示一下兵团首长，然后再定。

可是，由于电台淋雨受潮，无法沟通与兵团的联络。路途遥远，雨夜茫茫，派通信兵去联系也不可能。聂凤智看着摇曳不定的烛光，听着口袋里嘀嗒作响的怀表声，心焦难耐，打破茅屋里的沉寂说：

“战机难求，稍纵即逝。我作为军事指挥员，在作战方面有机断专行的决定权。今天由我下决心，错了我负责。我可以立‘军令状’！”

打，就这样敲定了。

聂凤智亲临前线指挥，12日拂晓，九纵向周村发起猛烈攻击。攻城各部打得十分顺手。全纵共选10个攻击点，短时间内，先后成功地突破7个。蒋军三十二师师长周庆祥，怎么也没有想到“共军”这么快就打到他的头上。九纵发起攻击时，他正在忙于召开紧急作战会议，研究固守计划，重新部署防务，安排交接，并严督各部抢修加固工事。会未开完，城外枪炮声四起。所谓“固守计划”也即刻化为泡影。敌人惊恐万状，乱成一团，稀里糊涂地做了我军的俘虏。

九纵各部在纵深战斗中，像一把把锋利的尖刀，迅猛穿插，把敌人分割成6大块，逐一聚歼。经过10个小时的战斗，周村守敌1.5万人被歼。仅周庆祥带几名亲信，化妆后从城墙下钻水洞逃走。战后，兵团许世发司令员对九纵给予很高评价：“周村一仗，使战役全局都活起来了。”

摧其坚以解其体

“开始先打东城就好了！”

“是呀，纵队决定先打西城，本身就是冒险的行动！”

“避强击弱，符合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聂司令为什么要先啃硬骨头？”

“个人逞能，头脑发热呗！听说兵团制订的作战计划，是先拿守备弱的东城开刀；聂司令不同意，坚持以硬对硬，先打西城。”

4月23日，担任主攻潍县“双城”的九纵，在彻夜攻城没有成功的情况下，指战员们产生了焦躁情绪，牢骚怪话多起来了。

听了这些议论，聂凤智没有上火，他理解指战员们的心情。同时，他也在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冒险、逞能，决定错了？

周村战役胜利结束之后，九纵休整 20 来天，于 4 月初奉兵团首长命令，回师东进，攻打潍县城。

潍县城由东城和西城组成，是远近闻名的“双城”。位于胶济铁路中段，系联胶东、渤海、鲁南三大区的重要枢纽，有“鲁中堡垒”之称，人口 10 余万。驻有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五师 4 个团及 6 个保安团，加上土杂武装和“还乡团”，总计 4.7 万余人，统归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四十五师师长陈金城指挥。潍县城防工事坚固。西城城高 10 余米，东城城高 7—8 米，城墙上下均构筑密集的火力发射阵地。城外设置掩体、土城寨、护城河、布雷区、子母堡群、鹿砦、拒马、铁丝网等，呈幅射状，延伸至 4—5 公里以外，构成大纵深的半永久性防御体系。据当地老乡说：潍县“双城”历史上从来未被攻克过。当时，陈金城曾吹嘘潍县城“固若金汤，坚不可摧”。他的幕僚跟着吹他：“陈金城守双城，万无一失。”

按兵团下达的任务，九纵和十三纵一部负责主攻，七纵和十三纵大部担任钳制和打援任务。在主攻方向上，两座城相比较，东城城墙低，守备力量弱一些，兵团决定先拿东城开刀。

九纵接受任务后，聂凤智率领师团长们利用民房作掩护，抵近潍县城观察。发现东、西两城相挨很近，最远超不过一二百米；一条白浪河穿流而过，河上有 5 座大桥沟通。从表象来看，东城低于西城 5 米，敌指挥机关也不在东城，东城应比西城容易攻破。但聂凤智从潍县特定条件下考虑，“双城”之间孰强孰弱，先攻哪一城有利，并不那么简单。先攻东城，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西城凶猛火力的钳制。即使拿下东城，仍要冒着西城居高临下的炮火，再攻击一次西城。相反以硬对硬，先打西城，敲打敌人的首脑机关。再依托西城，直取东城，能稳操胜券。也就是兵书上说的：“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

聂凤智把先打西城的设想，向兵团首长作了汇报。兵团首长经过认真研究，采纳了聂凤智的方案。许世友司令员高兴地对聂凤智说：“我们大别山有个规矩，你还记得吗？叫‘好菜请上客’。今天我们就先攻西城，先吃这盘‘好菜’，打掉陈金城的指挥机关，然后以西城高大城墙为依托，居高临下，东城一举可得。”为了吃掉这盘“好菜”，聂凤智针对潍县之敌防御纵深大，工事体系复杂这个特点，确定了九纵作战的三项原则：一是先扫清外围和城关，再组织攻城；二是“任务专一”，扫关的部队专司扫关，攻城的部队专司攻城，轮流使用两个不同的建制部队，保持雄厚的突击力量；三是“人马均活动于地下”，在外围开展土工作业，大量挖战壕和掩体，隐蔽接敌，楔入纵深。

4 月 23 日 17 时发起对西城总攻。九纵首先集中炮火轰击西城北埠。一声令下，众炮齐鸣，潍县城上下烟雾腾腾。260 余门大小炮，轰击近两个小时，将确定的目标全部摧毁，北门大阁转眼之间被轰垮。与此同时，几千斤炸药在敌人围城土堤、壕沟下的坑道内爆炸，将壕堤炸平 8 处，为突击队分头突过壕沟，对敌城下矮墙、地堡群实施爆破突击，创造了条件。

攻城各部在密集火力掩护下，连续爆破、架梯、登城。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在团长彭辉、政委陶庸指挥下，率先打破两处突破口，4 个连队先后登上城头，和一个团的敌人展开血战，争夺突破口。

这时，九纵指挥所已经前移到城北二三里处，挖了几个简易掩体。时近夜半，敌人乱炮打过来，把作战室震塌。电话机、水壶、地图等尽埋在土里。

聂凤智钻出掩体，浑身上下摸个遍，没见有什么伤。于是，让参谋们扒出电话机、地图，就在毫无遮拦的野地里指挥。

虽然是仲春，夜里寒气仍然袭人。聂凤智却一点也不觉得冷。由于登城连队与后续部队断了联系，只听得城头上枪炮声急如暴风骤雨，到底打得如何，聂凤智得不到报告。

直到天将拂晓，聂凤智才听到二十七师报告：一处突破口被敌人重新夺去，另一处仍在激战之中。

聂凤智又查问二十五师突击情况，报告说：“一夜攻击失利，受阻于城下。”

情况紧急！如果城头突破口丢光，不仅登城连队要被敌人打掉，而且兵临城下的后续部队，将全部暴露于敌人人力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沉不住气，产生了埋怨情绪。

聂凤智经过慎重的反省，认为“在这种时候，对一名军事指挥员，是真正的考验，打‘顺风仗’，人人会打；打‘逆风仗’，就不容易挺住。在战场上，与敌人斗志斗勇，既要慎重，又要大胆。慎重不是右倾，不是军事保守主义；大胆不是冒险，不是军事盲动主义。先打西城，决不是个人一时逞能，更不是头脑发热的冲动，而是在慎重分析敌情、我情基础上，作出的大胆决定。既然决心是正确的，无论听到多少闲言碎语，都要沉得住气，决不能轻易动摇。”聂凤智思考到这里，为了求得胜利，他又下了一个大胆的决心——白天强攻登城。

白天打一般的攻坚战，九纵打过不少好仗。而攻打潍县这样高大城垣、又受到敌人强大炮火压制和飞机轰炸，风险不小。但是，仗打到这份上，不攻不行，后撤更不行。白天攻城，是唯一的求胜之计。他向兵团首长报告说：“现在敌人团团被围，已成惊弓之鸟，在城头上的疯狂反扑，不过是强弩之末。这时候，不是我们的部队能不能打，而是指挥员敢不敢下决心打。我完全相信自己的部队，相信他们的勇猛精神和攻坚能力。”

天明以前，兵团批准了九纵白天攻城，同时命令城南渤纵、鲁纵加强攻势，积极配合九纵进攻。

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七十五团，不负重望，互相配合，并肩突击，从北门城垛附近一举突破，在紧要关头有力支援二十七师七十九团登城作战。午后不久，各部连续发起突击，攻城战斗出现了新的转机。十几个昼夜没有得到好好休息的聂凤智，困乏极了。警卫人员知道他的习惯，仗一打顺，他就要洗澡消除疲劳。因此，通信员为他烧了大半缸水。聂凤智全身浸在热腾腾的水里，听着愈来愈远的枪炮声，似睡非睡，晕晕乎乎，到通信员进来添加热水，他才发现，天已经快黑了。

当晚8时，九纵各攻城部队打开8个突破口，潮水似的涌入西城，和敌人逐街逐巷展开激战。陈金城乘乱跳上吉普车，匆忙逃往东城。

西城被克，东城之敌即处于我瞰制之下。26日黄昏进攻东城的战斗发起后，势如破竹，仅20分钟，二十七师八十团就突进城内。各部队勇猛穿插，守敌丢盔弃甲，从四面八方涌向东门，夺门逃窜。二十五师会同西海、鲁中部队，设伏在东门外专候，一声令下，收网兜鱼，几乎无一漏网。土匪头子张天佑被击毙，陈金城束手就擒。

攻取如此坚固设防的潍县“双城”，直接用于攻城作战的时间，不到40小时，共歼敌4.6万余人，消除了我军在山东的心腹大患。九纵二十七师七

十九团，荣获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授予的“潍县团”荣誉称号。

改“助攻”为“主攻”

“当唧唧……”

“当唧唧……”

九纵攻打济南的作战命令一发下去，各师纷纷给作战科打电话，问“命令”是不是搞错了。兵团下的命令九纵是“助攻”，纵队下的命令怎么变成“主攻”了？

“助攻”和“主攻”，虽是一字之差，意义可是大不一样的。在攻击行动中，根据自己的攻击目标：一座城市、一个阵地或一道防线，选好主攻方向，把自己最主要的力量用到主攻方向上，有主有次，有虚有实，突破一点，乘势展开，这是古今中外打仗决胜的要诀。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济南战役，华野共动用了14万兵力。这14万“攻城兵团”又分成西线集团和东线集团。西线便于突破，也便于切断济南守敌与外部的联系——控制西郊机场，而且对争取济南西区守敌总指挥官吴化文起义的工作也基本就绪。因此，许、谭选西线为主攻，配备三纵、十纵、鲁纵和两广纵队等9万人马，由十纵司令员宋时轮指挥；东线为助攻，配备九纵、渤纵和渤海军区部队，共5万人马，由九纵司令员聂凤智指挥。相对地说，担任“助攻”任务的部队要“轻松”一点，不那么“责任重大”。可是，聂凤智不想要“轻松”，却愿意承担“责任”。他在纵队给各师重新下达命令中，把“助攻”改成了“主攻”，把攻打济南最苦最难的活儿揽到自己的头上。

在我军战史上，争当“主攻”屡见不鲜，但临阵“擅改”上级命令，却极为少见。九纵的三位师长非常着急！他们了解聂凤智的长处，自然也熟悉他的弱点或缺点——拿“第一”的“好胜心”太强。以当时东线集团的兵力和济南城防工事情况看，九纵要想充当“主攻”英雄，那是不自量力的。为此，他们不怕挨批，要和纵队主将争一争。

九纵作战科长刘岩，见3个师长都打电话来问，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弄不好可能要影响战斗行动，有必要向司令员报告一声，“解释”一下——做做“思想工作”。

聂凤智听了刘岩的报告，悄然一笑。他手下的3名师长，都是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战将，学历比他都高得多，怎么今天对他改“助攻”为“主攻”也不理解了？于是，他抓起电话，给他们阐释自己的想法。

聂凤智的理由，无疑是雄辩的，有说服力的。他告诉他们，济南守城总指挥王耀武，不是一般的角色。他是国民党军队中有胆有识、谋略过人的将军。他不但经营济南多年，防务体系严密坚固。而且，和我军多次交过手，对我军的战略战术了如指掌。如果我们不在胆识上压倒他，谋略上超过他，依然墨守陈规地一边主攻、强攻，一边助攻、佯攻等等，既在他的意料之中，他也就有可能应付自如。要知道，我军攻城兵团14万人，王耀武手下却有11万完全称得上是精兵强将的防守力量。我们所以改“助攻”为“主攻”，就是要让大家放开手脚打，硬攻，狼攻，强攻，造成真正东西夹击的有力态势，争取一开始就把王耀武的阵脚打乱，使他判断失据，既难集中兵力，又难调整部署，先在精神上把他搅乱、动摇乃至摧毁。“助攻”改“主攻”，实质上是为了更好的“助攻”；我们既不增兵，也不添枪，改的只是大家的

精神状态。只要我们都按“主攻”的要求打，那么，王耀武再有胆有识，再冷静沉着，再神机妙算，也肯定不可能有章有法地同我军抗衡。心先乱，城必破！

聂凤智还告诉3位师长：改动命令的事，他已向兵团许、谭首长作了汇报。许司令员说：“就这样打！西面一把刀子，东面一把刀子，两把刀子朝里戳，戳烂它的五脏六腑！”

聂凤智改“助攻”为“主攻”，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把王耀武的指挥方寸给搅乱了。9月16日夜，攻城战役正式发起。西线集团部队多路飞插，赖以与外面保持往来的敌西郊机场受到威胁。王耀武判断“共军”主攻方向在西边。他早有这个准备，因而并不惊慌，马上把作为预备队的两个主力旅调往西线。可是，两个主力旅还没“到位”，东线又已告急：“茂岭山和砚池山一夜尽失。王耀武一听，顿时惊得一身冷汗。这两座山，是济南东郊的主要屏障，他耗用大量钢筋水泥，环绕山顶主碉堡构成夹壁墙工事；还曾特地组织炮兵在山下试射，夹壁墙工事安然无恙。敌整编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锋（济南东区总指挥）得意地说，“我从来没有作过这样坚固的工事。不怕共军来，就怕共军不敢来！”这样筑有“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的两座山，怎么一夜之间就丢光了呢？王耀武在电话里连问三次，确信果真如此之后，他唯一的解释是：自己判断失误；惯于“反常”用兵、“出奇制胜”的“共军”，这一回的主攻方向是选在东边。于是，他又马上把预备队调往东边。可依然没有“到位”，西线又频频告急：机场失守，济南与外界仅存的一条空中通道被切断了。“共军”来势凶猛，已乘势向商埠进攻。这样一来，王耀武又以为自己判断失误，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是好

战后，聂凤智见到一位被俘的蒋军高级将领。这位将领问聂凤智：“敢冒昧问聂将军一个问题吗？”

聂凤智十分干脆地回答：“可以。”

“仗，我们打败了。但有一个问题至今没有想明白。贵军攻城的主力，究竟是置于哪一边？”

聂凤智笑道：“为什么要置于哪一边？我们两边都是主力。”

“噢……”高级将领脸上浮现恍然大悟的神情，不无遗憾他说：“你们西边打得凶，我们将预备队往西边调；你们东边打得凶，我们又将预备队往东边调……机动兵力无固定阵地，无喘息之机，左防右堵，疲于奔命。一晃二晃之间，你们就打到济南内城了。”

改“助攻”为“主攻”，不仅迷惑了敌人，更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指战员们都雄心勃勃地真的要九纵唱“主角”了。他们不仅一夜之间就打开济南的东大门茂岭和砚池两山，而且是第一个攻破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内城，“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济南内城宽大坚固。城墙高12米，厚10至12米。像外城一样，城头、城角都修建有暗堡等隐蔽的火力点。城墙上筑有分层火力工事、交织成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城外，还有一道宽20至30米，水深2至5米的护城河。这条护城河，不但渡涉困难，还在多层多角度的火力严密控制之下。9月23日黄昏，攻城兵团向内城发起战斗，成百上千发炮弹在城垣上下开花，惊天动地，烈焰腾腾。九纵各部突击分队跃过护城河，迅猛插向城根。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一部在东门偏南方向率先登城。敌人迅速调动两侧火力封锁住突破

口，并凭借优势兵力，接连不断实施集团冲锋。我攻城指战员顽强拼杀，在弹药耗尽的情况下，与敌人展开血刃格斗。终因后援断绝，寡不敌众，大部壮烈牺牲。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也三次攻击，三次失利，被堵在护城河外。其余各部多次组织突击，均未成功。战至深夜，敌人死伤众多，我攻城兵团各部主要突击分队伤亡也不小，有的主攻连队只剩下一二十人。

在攻城受挫的严峻现实面前，九纵广大指战员攻城决心不动摇。他们队进攻茂岭山开始到打到内城根下，7天7夜，九纵伤亡多达7000余人，比其他纵队都多。但他们深知，冲杀在前，把最艰苦最危险的任务揽过来，比兄弟纵队多牺牲一些，这是正常的。自己多牺牲，兄弟纵队就可能减少牺牲。因此，九纵从司令员到战士，不同意撤攻。他们说：敌人四道防线尽失，被我们团团围在内城，慌乱不堪，困兽犹斗。我们的困难大，敌人的困难比我们更大！现在就看谁的决心硬过谁，我们要跟敌人比毅力、比顽强、比后劲！胜利往往就是在最后5分钟取得。他们要求再攻一次。

聂凤智核计了一下，全纵还有比较完整的5个团，再攻一次没问题。凌晨1时30分，最后一次攻击开始了。所有的轻重火器又都像发了疯似地吼叫起来。七十三团严密封锁住城墙上、中、下三层火力发射点，三营七连越过护城河，贴紧城墙，把几百斤重的云梯高高竖起。英雄战士们在敌人火力下，不怕伤亡，前仆后继，顺云梯攀援而上，跃登城头，勇猛地堵住首批扑过来的敌人。2时25分，相继突上去两个排。把山东人民赠送的“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红旗插上了高高的城头气象台。

时隔不久，七十三团有两个营（实际兵力两个连）攻入城内。拂晓前，十三纵一九团在西南角也突破内城。王耀武再没有戏唱了。他顾不得“城存予存，城亡予亡”之类的说道，悄悄地化装潜逃。不过他没有跑掉，被“活捉”了。

八天八夜攻克济南，比原来预计的时间大大提前了，出乎蒋介石、美国甚至毛泽东的意料之外。毛泽东亲笔改定的新华社“社论”中欣喜地称：“这个伟大的胜利来得意外的迅速”，“甚至全国的人民也因为它的意外的迅速而惊异”。

攻下济南，许世友尤为高兴——这是毛泽东亲自交给他的任务。他抓起电话直接要聂凤智。

“聂凤智吗？”

“是我。”

“嗯，这次打济南，你们打得不错！”

聂凤智还以为有什么指示，还等着，只听得“咔嚓”一声，电话挂上了。

亲自打电话表扬自己的下属，在许世友是绝无仅有的。就聂凤智本人来说，跟许世友打过多少次好仗，胜仗，可这样的表扬，18年来还是第一次。

（胡居成）

勇夺襄阳，王近山部俘康泽

刘邓大军从大别山出来后，与南下的陈赓兵团会合，集中在豫西休整，准备打大仗。

1948年5月，党中央为适应全国形势发展，调整区划，成立了中原局。邓小平任书记，陈毅任第二书记；同时成立中原军区，并将晋冀鲁豫野战军改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并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委。

刘陈邓肩负重担，共同经略中原。

6月5日，刘邓召开了纵队司令员会议，为了巩固豫西根据地，发布了打老（河口）襄（阳）战役命令。

但情况突变，粟裕率华野一、四、六纵队于5月31日过黄河后，原定打邱清泉的五军，因敌队形密集难以分割，而华野的三、八纵队离开封仅一天路程，粟裕遂改变计划报军委及刘陈邓，决心先打开封。经军委批准后，豫东战役打响。为了保证豫东作战，刘陈邓组织5个纵队，南下阻击张轸指挥的胡璉、吴绍周两兵团，老襄战役暂停进行。

这时，中野主力仅留王近山的六纵在唐河休整。

兄弟部队打得热火朝天，而一向担任主攻任务的六纵，却被“撂”在一边休息。王近山等六纵指战员个个磨拳擦掌，请求参战！

一天，刘伯承和陈毅去四纵开会回来，同乘一辆吉普车。天气十分炎热，陈毅叫司机老常开快车。疾风扑面，夹着阵阵庄稼的清香，顿感凉爽多了。战局骤变，大军云集，刘陈心境都不平静。他们谈到开封将是我军在中原打下的第一个省会，许多政策问题待解决，党中央指示：打下开封，除“省主席”刘茂恩以外。其余一律不抓。这一精神干部们一定想不通。

陈毅讲到，在中央时毛主席曾问他：“你陈毅打下了南京，如果胡适没有跑怎么办？司徒雷登没有跑怎么办？”

刘伯承哈哈大笑：“毛主席的想象力真丰富！你怎么回答呢？”

陈毅说：“我的回答是都不抓。毛主席说：‘对头。蒋介石儿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打败了，这几个人留下还能翻天！’”

谈笑间，又说开封一打响，蒋介石觉都睡不着。国民党那些河南籍的“立委”、“监委”，会对他哭爹叫娘的！

刘伯承又笑了起来，说道：“这两天还有一个人睡不着觉。”

“谁？”

“王近山。”

陈毅也笑了：“对，对，这个光想打仗的‘王疯子’，这次让你给憋得够受了！”

刘伯承说：“前天不是他又发来请战电报了嘛。我和小平商量好了的，在后方养伤一年多的王近山，就像刚出山的老虎；六纵每次都是啃骨头，打硬仗，看着兄弟部队打仗急得火烧火燎。这次偏把他们撂在一边去养精蓄锐，等战机一到，王近山一出动，襄阳指日可待！”

原来刘邓对中原这盘棋，早就全局在胸，王近山率领的六纵，是到关键时刻才奇出的“边车”。何时出“车”，只等战机的到来。

所以当王近山找到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联名发来再次请战打襄阳的电报时，刘陈邓只是回电说：“北线已攻占开封，正部署下一战役。你们应

大部监视敌主力，好好休息，并加强对老襄的侦察。”

打下开封后的一个早晨，刘陈邓和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后，在树林里锻炼身体。

陈毅和列伯承各打了一趟拳以后，谈起王近山又来请战的事。

刘伯承将左拳头往前一伸，说：“我们的策略就像《打渔杀家》里肖恩的拳法。这一拳打过去，别人一挡——这就好比我们几个纵队一出击，扭住了张轸，胡璉、吴绍周。”说着又伸出右拳说：“这第二拳就是打襄樊的。敌人要推挡，就得预先把张轸兵团拉到平汉路西。但现在豫东吃紧，蒋介石不敢这样调动，他要不挡呢，我就乘势一拳捅到他的胸部，拿下襄樊！”

陈毅连声称赞：“好拳法！好拳法！”

邓小平也走过来参加谈话，说：“襄樊这一仗非打不可，就是要选准时机。拿下襄樊，还要活捉蒋介石的大特务头子康泽，才算全胜。捉住康泽的政治影响，不下于军事胜利。”

打襄樊的时机终于到来。刘陈邓选择了豫东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刻——7月2日，下达了作战命令。这一天，正是华野歼灭了区寿年兵团，猛攻黄百韬兵团的日子。几天来，蒋介石在中原地区南北两线的7个兵团，全部陷于激战之中，欲拔不能。乘此良机，我军一举攻占老河口，揭开西面襄樊战役的序幕。

襄（阳）樊（城）隔江而望，自古为战略要地。地理位置处于汉水中游湖北西部，为豫陕川鄂四省结合部；从军事上讲又是蒋介石的顾祝同、白崇禧、张治中三大军事集团联合防线中最大的薄弱环节——汉水区，襄樊正居此区中心。如拿下襄樊，不但斩断了敌人几个军事集团的联系，而且可直接威胁武汉，进而南渡长江，西入四川。蒋介石有鉴于此，才在襄阳设立了统辖三个专区，十几个县的第十五绥靖区，并任命其心腹干将康泽为中将司令官。康泽是黄埔3期毕业生，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专事反共。蒋介石曾在黄埔系中搞了个核心组织“复兴社”，自任社长，其中干将有被称为“十三太保”、“四大金刚”者，康泽都有份。三青团成立时，蒋介石是团长，康泽是组织处长。到1946年三青团并入国民党，蒋经国取代了组织处长位置，康泽才被送到美国考察，回国后，蒋介石亲自召见，命其到襄阳上任。康泽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常委，足见其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康泽有一大弱点，就是光搞特务，从未带兵上过战场打仗，所以又调了个川军中老牌将领郭勋祺当他的中将副司令官。他们率兵两万余人，驻守于襄樊地区。

刘陈邓在中原的策略，把蒋介石和“华中剿总”司令官白崇禧搞得晕头转向。他们从各方面得来的情报都说，刘伯承所有主力部队都已东赴豫东战场，西面的老河口、襄樊一带平安无事。康泽见东面战场打得热闹，自己防区风平浪静，乐得逍遥。7月1日是他的生日，于是其属下便为他摆宴席，唱堂会，大搞祝寿活动。

正当这些国民党的官员们酒酣耳热之际，情报处长董益三忽接报告：老河口附近发现共军！康泽大为吃惊，急令：“查实！”调查的结果是，老河口一带不但有共军，而且还像是共军的主力部队。

7月2日，粟裕所部在中野部队的协力配合下，歼灭了区寿年兵团，俘虏兵团司令区寿年等人。豫东战役胜利结束。刘陈邓电令王宏坤、王近山率六纵、陕南十二旅、桐柏三分区等部，发动襄樊战役。

当晚，六纵自唐河地区出发，一昼夜急行军150华里，迅速隐蔽接近敌

人，突然发起进攻，于夜里 12 时，解放了老河口。守敌仓惶逃往谷城。陕南十二旅于 3 日晚歼灭该敌一六三旅，俘旅长以下 1800 余人。桐柏三分区歼敌一六三旅辎重营。

7 月 4 日，桐柏军区二十八旅包围了樊城。其余各部，沿汉水南岸抵达襄阳城郊。襄樊战役第二阶段开始。

刘陈邓命令：六纵司令员王近山统一指挥各部队，夺取襄阳城。

王近山接受任务后，十分高兴，在后方养伤一年多，终于有仗打了，而且还是个不小的仗。但攻襄阳，可是一块很硬很硬的骨头！不是讲几句空话，表表决心，或者猛冲猛打就能拿下来的。这时的王近山，已不是当红军师长时还带头冲锋的“王疯子”了。经过毛泽东、刘陈邓的教导，延安的学习，他身边经常带着刘伯承翻译的苏军合同战术、集团军指挥等理论书籍在读；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开始后不少战役、战斗的经验教训他也已熟记在心。而且对精彩描写古代军事家们进行政治、军事斗争的杰出作品《三国演义》很感兴趣，他最佩服诸葛亮，运筹帷幄，善于以智慧战胜敌人。王近山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能将书本知识，运用到实战中去，襄樊之役似乎对他是一场考试，考得如何，就得看战果来打分了。

到达襄阳的当天，王近山就带着各旅干部和主力团的主官，到离襄阳城西四公里处的小山头——万山去看地形。望远镜里，城内外的地形、地物都看得一清二楚。

襄阳城池坚固，城墙全用坚牢的大砖和石条砌成，墙高三丈余，顶宽丈余。城门用铁皮封包，紧紧关闭，还堆有沙包和铁丝网阻拦。除汉水围绕城北外，城东南西三面均有几十米宽的护城河，水深不可涉。城楼上筑有碉堡，工事。右边，襄阳城西南面，是延绵大山，山上构筑了许多地堡、工事，交通壕纵横。左边，是汉水。只有大山与汉水之间，有一条宽约二公里的狭长走廊，直通西门城关，再经过一座石桥，就到了西门。

大家边看边议论，襄阳确实难攻。东、北面为汉水包围；南面大山工事密布，俯制城廓；唯一能进城的西面通道又为西南面大山上下火力严密封锁。到底从何着手攻城？真是一个难题。

王近山看得很仔细，足足看了两小时后，叫大家回去考虑，明天召开旅以上干部会，研究攻城方案。

就在这天，攻击大山的部队传来消息。敌人山上工事坚固，火力很强；还施放毒气，使我军一个营失去战斗力。部队有伤亡，攻击无进展。

王近山最初的作战计划是一鼓作气攻下南山，再从南门破城歼敌。这样可以清除敌城屏障，放手打城，依据地形，自古以来，兵家都是如此打襄阳的。现在看来，这一计划是否可行？值得研究。

在六纵指挥所里，王近山坐在一张桌旁，俯身凝视地图，一言不发。他时而用手指在地图上移动，时而用粗大的红蓝铅笔轻敲宽大的额头，上午在万山看地形的情景浮现在脑子里……他在思考一个关键的问题：康泽守襄阳，靠的是什么？是兵力？是武器？是河？是山？……要说兵力，目前康泽在襄阳的正规军加地方团队，不超过三个旅，和我们相差无几；武器嘛，除能发射黄磷弹的重迫击炮外，似乎还没有什么重武器，自然，轻重机枪，小型火炮，在有坚固防御工事作依托的条件下，也是不可轻视的；靠水吗？一条汉水，环绕城东、城北，可以阻挡我军进攻，但在别的方面，对我军构不成威胁；那应靠山！对了！！城西南的大山，有坚固的工事，很强的火力，

居高临下，俯瞰襄阳及城西、南几十里，山上的敌人虽然不到两个团兵力，但却可以卡住成千上万人马，大山一日攻不下来，就休想接近城关。康泽来襄阳半年多，兴师动众，强迫群众修筑这座大山上的工事，就是想依靠它守住襄阳！

王近山觉得似乎已抓住主要矛盾了，他继续想，如果攻山，我得用多少兵力？敌人山上火力点密布，还有地雷，攻山时扫除鹿砦、铁丝网还得耗损人员，这个代价太大，绝不能这么干！再说时间也非常宝贵，东面战事已基本结束，如果敌人西调援兵赶来，战役将会出现什么局面？！……敌人的优势是大山，为什么不能选择别的方式攻城，而去适应敌人所长，让自己蒙受损失呢！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思考，王近山终于把当前的问题分析透彻，他如释重担，站起来，大声说：“再攻山，就中敌人的计了！”

真是一语道破实质，康泽的如意算盘正是利用大山拖住我军，等待援兵到来。而白崇禧也是电令他“坚强守备待援”。并告康泽，“已派七师、九师主力分道兼程来援”。

王近山决定另辟蹊径夺取襄阳。

他问参谋处长贺光华：“敌人有些什么远射程炮和重炮？”

贺光华回答：“除八二炮外，威力最大的就是8门一七口径的重迫击炮，大家叫它化学炮。”

王近山又问：“敌人大山上的火力，能不能封锁住我们通往西关的道路？”

贺光华走到地图旁，指着位置对王近山说：“几个主阵地上的火力，都被下面小山挡住，对我威胁最大的是下面的真武山、琵琶山。”

王近山想了想，决断他说：“看来这两座小山是非攻不可的了！”他见贺光华有些疑惑，才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说：“历史上打襄阳，都是先夺山，后攻城，这是自然环境所决定，当然有一定道理。现在蒋介石、白崇禧、康泽也都是按这样的思路设防的。”

王近山有些激动地继续说：“这都是些老章法！陈旧！保守！我非要破一破，不搞老一套！”说着，他用左手手指从地图上的大山一划，直到襄阳西门，又用右手把南面高地一隔，说：“我们要采取刘司令员‘猛虎掏心’的战法，撇开西南大山，通过山下走廊，直捣西门攻城！”

贺光华对改变原作战计划很感意外，有点犹豫他说：“那样打法，是不是有点冒险？会不会遭到城内外敌人夹攻！”

王近山笑了笑说：“冒险！干别人没干过的事，往往被看成冒险，实际并非如此，关键在于把问题分析透彻。”

于是，他从各方面向贺光华讲述了改变计划的理由，贺光华越听越有兴趣，最终表示，完全赞同。

王近山指着地图，又进一步详谈道：“琵琶山、真武山，和西关外的铁佛寺，是我们进攻西门的三道‘关’，首先要劈开这三关。这个任务交给十七旅。”看来王近山已考虑得相当成熟，连斩“关”部队都确定了。“劈开三关后，就不顾一切，分兵两路，从东、西门直扑襄阳，迫敌放弃大山。现在，陕南十二旅和桐柏独立团，仍继续进攻凤凰山、文壁峰，造成我继续夺取南山的假象，牵制迷惑敌人，配合十七旅在西边的行动。以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

王近山将此方案电报刘陈邓，首长们很高兴，特别是刘伯承，他最提倡指挥员动脑子，用智慧战胜敌人，他称赞道：“王近山养伤一年，好了身体，长了智慧，今非昔比了！”

刘陈邓很快来了回电：“完全同意作战方案。睢杞已告大捷，白崇禧主力被钳制在周家口一线；对南阳王凌云，已派二纵前往监视和阻击。十天内敌援兵保证到不了襄阳，后顾之忧可完全解除，望按计划加紧攻击。”

王近山看了电报，十分兴奋，首长们考虑得真周到，不但支持他的作战方案，还在全局上作了安排、部署，保证他们攻城作战。

他以十七旅一部攻占琵琶山、真武山，集中主力于西门实施主要突破；以十八旅待命插入东关，钳制敌人，分散其注意；以十六旅为预备队；以陕南十二旅和桐柏三分区部队继续佯攻南面大山，迷惑和牵制敌人。

部署就绪后，各部立即开始行动。

王近山把最艰巨的“劈三关”任务交给了十七旅。旅长李德生接受任务后，带着几个团长，白天黑夜到前沿看地形，观察敌情，又命令各团组织排以上干部及班长、老战士，轮流进行敌前抵近观察，然后开展军事民主，想出各种办法对付敌人。

琵琶山从西南高地伸下来，盘踞在西关走廊的最前面。仰望上去，大大小小的碉堡错落林立，组成了交叉火网，还有铁丝网、鹿砦挡路。

9日黄昏，十七旅四十九团开始进攻琵琶山。纵队调来四门山炮，摧毁了敌人的碉堡，开辟了进攻道路。为了不误伤跟进部队，战士们想出土办法，每人背上捆一支手电筒，山上一片点点亮光。王近山在望远镜里看着亮光前移，知道战士们攻占了山头，十分高兴地给李德生打电话，要他及时表扬进攻部队。

不幸的是，率领突击营攻山的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上山时误踩地雷殉职。在危急时刻，他还关心战士，叫警卫员：“快走开！我踩着地雷了！”警卫员刚一离去他就光荣牺牲了。王近山闻讯后非常痛心，气愤他说：“一定要攻下襄阳，活捉康泽，为苟团长报仇！”战后，他拍了一张苟在合遗体的照片，珍藏了几十年，纪念战友。

攻下琵琶山后，扫除了进攻西门的第一个“拦路虎”。康泽甚为惊慌，调集兵力三面攻琵琶山，与我军激战终日而未得逞。

十七旅攻下琵琶山后，陕南十二旅及桐柏三分区部队，按照王近山的指示，采取夜摸手段，先后控制了南高地主阵地一部，迷惑牵制了敌人，保障了山下攻击部队侧翼未受敌人太大威胁，巩固了阵地。

康泽看到我军队西面和南山节节进逼襄阳，感到形势严重，再次向蒋介石、白崇禧告急。白回电称：“当即放弃樊城，秘密集中，全力固守襄阳待援。”并告慰康泽：“已令七师等部取道来援。”因调兵需时间，要康泽“务须固守到22日”。

康泽接电后，即令樊城守敌一六四旅，全部渡过汉水，跑回襄阳，随即将襄阳四门紧闭，严禁出入，固守待援。

王近山见敌人进入襄阳，即令桐柏军区二十八旅解放了樊城，并架设浮桥，渡过汉水，绕到襄阳东南角，开辟了攻城基地，造成数面攻城，迷惑敌人的态势。

我军攻下琵琶山后，十七旅四十团继续攻真武。真武山在琵琶山以东，离襄阳更近，虽然只有二百多米高，但地形突出，在城西南角，扼控着南门

和西面走廊，敌人称之为“襄阳一把锁”。它是控制城关的最后一个高地，此山一得，我军就可直攻西关了。因此连远在汉口的白崇禧都非常重视，甚至电告康泽：樊城可以放弃，真武山千万不能丢！8日那天，康泽告急时，白崇禧派飞机来襄阳视察战况，见真武山上仍有国民党军队铺设的对空联络布板，连称“甚慰！”康泽在狭小的真武山上派了一个团长，在真武庙内设立指挥所亲自掌握部队作战。以一个加强连配以机枪排，在不到三百平方米的山头上，分布在三十多个永久、半永久工事里防守。可谓防守坚强了。

苟在合牺牲后，由四十九团副团长王西军指挥部队作战，他担任过六纵作战科长，用兵非常讲究战术。从琵琶山俘虏口中，他了解到真武山敌人布防详情，就让干部们把敌人的地堡、工事、铁丝网位置——画下来，让突击营的各班组，直到每个战士都知道，并对班、排进攻路线，具体打法都交给战士们进行讨论，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大家想出许多办法。对攻下山头充满信心。

9日黄昏，天还未黑，部队对真武山发起攻击。廉泽急了，命令重迫击炮向我军发射黄磷弹。这种炮弹打到哪燃到哪，十分厉害。我军干部战士不顾生命危险，在炮火掩护下，奋勇冲上山头。由于战前准备充分，敌情研究透彻，上山道路选择得好，部队又是小兵群跃进，大大避免了敌火和地雷杀伤。突击排分别行动，各自为战，二十多分钟，就连续爆破了敌人18个地堡。仅半个多小时，全部占领了真武山。

第二天，敌人在飞机配合下，向真武山发起猛烈反扑。激战一天，我军打退了进攻的敌人，坚守住了阵地。现在只剩下攻城最后一道障碍——铁佛寺了。该寺离西关仅50米，和敌人西门城楼成犄角之势，紧紧控制着入城的唯一通道。敌人用一个营防守，在高高的院墙上密密麻麻设置了各种口径的枪炮射孔。外层有铁丝网，并埋下了各式各样的地雷，防范十分严密。李德生与副旅长宗凤洲、参谋长宗书阁及团干部仔细观察敌情后，决定以三天时间挖交通壕接敌，并采取措施于白天观察好土迹，晚上扫除地雷。

王近山听取了李德生的报告后，同意十七旅这种稳扎稳打，细致作业，不急躁冒进，避免无谓伤亡的做法。作为全局在胸的指挥员，王近山更有着谋略上的考虑，而且是十分高明的一着棋。

正当十七旅悄悄进行土工作业，西门方向显得异常平静的时候，王近山却命令肖永银带领十八旅，在桐柏三分区部队掩护下，隐蔽绕过文壁峰，沿汉水河套北进，突然袭占了东关护城堤，建立了东关攻城基地，这样一来，城西、城东、城东南都出现了我军，城北面是滔滔汉水，仅城南留有一条通往南面大山的通道。康泽慌了，他摸不清我军将从何处攻城。赶紧将解放军围城情况急电报告白崇禧。

王近山“声东击西”之计果然成功地迷惑了敌人。白崇禧汇集了各方面情报后，于7月12日致电康泽称：“空军侦察报告，共军已架和正在架的浮桥有三座之多。”又见我西面、南面无动静，于是得出结论：“根据……等情判断，共匪向我西南攻击困难，损失重大，将转用部队向我东南攻击。除伤空军轰炸浮桥外，希注意加强东南面之工事及守备。”

白崇禧的这份电报，引起康泽一伙的混乱。南门，外壕浅，工事差，又有两个团在大山上，我如攻南门，切断了与南山相连的唯一通道，山上敌人连水都喝不上，将立即陷入绝境。要是南山一丢，失去屏障，襄阳就完了！白崇禧的电报，正好解除康泽这一忧虑，认定共军不会进攻防守严密的西门

了。于是他一面再向蒋介石告急，希望催促援兵快来，一面将城内总预备队六千多人，全部调往南门增强防御，敌人这一部署调整，更有利于我突破西门的战斗。

正当敌人忙乱调整布防时，王近山又命令十八旅将东关阵地移交给桐柏军区二十八旅，悄然从原路返回南山西侧，作为纵队攻城总预备队，使自己手中掌握了强大的重点攻击实力。

7月13日，十七旅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一举攻占了铁佛寺。同时还占领了近处的同济医院等地，全部控制了西关。

康泽见我军已占了东、西城关，白崇禧的援兵迟迟不来，对战局失去信心。蒋介石看出他的心境，于7月13日给康泽发来一份长电鼓气，其中云：“……南北两方援军最迟必于20日前赶到襄阳，中正负责督促，勿念……照屡次战役之经验，匪部弹药绝不能持续三至五日时间……故此次如我决心退守城内，集中全力防御匪部来攻之办法，则必能击退匪部，确保安全……何况我有空军昼夜前来助战，非匪之所能也。惟此全视主将之智勇决心而定……独赖指挥若定……吾弟经过此番风浪，渡过此一难关，以后不惟胆识可以因之大为长进，而且立名成业亦起于此也……弟以为如何？中正手启13日。”

蒋介石这封推心置腹、鼓励有加、关怀备至的电报，使康泽在绝望之中复苏了一线希望，又因为有了“全力防御”的“尚方宝剑”，于是在7月14日下令：南山部队全部撤入城内，固守待援。并发电向蒋介石表示：“誓不成功便成仁之决心，期达固守待援之使命。”

王近山真是善于运用谋略的良将，蒋介石、白崇禧、康泽等人全让他牵着鼻子走。敌人进城后，我军不战而得南山，为我襄樊之役“务获全胜”创造了条件。

十七旅攻占铁佛寺、同济医院时，残敌仓惶逃入城内，连进西门的唯一通道——大石桥都未及破坏。李德生立即命令部队架起两挺重机枪，紧紧封锁大石桥，并随时准备炮火支援，日夜监视，防止敌人破坏。控制了大石桥这条保存完好的冲锋道路，使敌人的护城河失去了作用，为攻城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几天来，李德生在铁佛寺围墙边的一个指挥所里，和宗凤洲组织营团干部仔细观察了城墙上的各种火力点，并要参谋绘制出详图。他还特地从各部队抽调了50名特等机枪射手，让他们分工负责封锁这些火力点。纵队将纵直和各旅的火炮都调集给十七旅使用。当宗凤洲提出炮弹少，向纵队要求增加时，王近山说：“还有92发战防炮弹，全给你们吧！”六纵打襄阳真是不借“倾家荡产”，和敌人拼到底了！

王近山将战况上报野司，并提出主攻西门的方案。刘陈邓同意了这一方案，并命令各参战部队：“不许顾虑伤亡，不准讲价钱。于7月15日20时30分对襄阳发起总攻！破城歼敌，一定要获全胜！”

王近山按此命令，部署如下：六纵，于西门实施主要突破。陕南十二旅和桐柏军区二十八旅，分别从东北角和西南角攻城。各部会合地点为杨家祠堂康泽司令部。

王近山的部署，充分体现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原则。六纵3个旅，全部集中在西门外纵深线上，以一个营作突击队，一个营担任辅攻，而以16个营的兵力，为梯次纵深之强大后梯队，待突击营打开缺口后，即迅速投入，连续跟进，使敌人无还手余地，无喘息机会。这种部署，这种战法，这种勇、

猛、狠，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是典型的刘邓部队的战斗作风！也是王近山指挥特色与风格的体现。在火力组织上，集中了当时全纵仅有的3门山炮、两门战防炮、17门迫击炮、27挺重机枪，编成四个火力队，均使用于西门一个方面。这样强大的兵力、火力集中于一点，真可做到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是任何敌人也阻挡不住的！

王近山对李德生交代攻城任务时说：“康泽是个反共几十年的特务头子，蒋介石的亲信，目前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定会狗急跳墙，死命挣扎，我们不把他打瘫在地他是不会叫饶的。必须抢在敌人援兵到来之前攻下襄阳，这是关键性的硬仗，你要精心组织指挥打好！”

李德生经过周密、细致的组织，终于一切准备就绪，他就在城门对面200米远的河堤边一个工事里指挥攻城。

7月15日晚上8时30分，王近山发出总攻襄阳的命令。

我军严密的火力，摧毁了敌人大部火力点，当残存的火力复活时，我机枪又予以压制，有效掩护了突击营冲过大石桥。四十九团一营教导员谭笑林，带着突击部队冲到了城下，工兵3次爆破都未炸开城门，幸而城门南边墙上有一豁口，为我炮火轰得更大了，部队就从这里搭梯子登城。城上敌人死命封锁豁口，并不断往那里扔手榴弹，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争夺战。梯子一次次被打断。三排长李发科见此情况，就站在被打断的梯子上，叫同志们踩着他的肩头登城。一颗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英勇牺牲在城墙下。这时，七八架梯子同时竖起来，靠上城墙，部队纷纷登城。很快，我军攻上去了两个连队，谭笑林也登上了突破口，组织部队打退了敌人3次猛烈反扑。

敌人一阵又一阵蜂拥上来，双方展了激烈的肉搏！

正在危急时刻，擅长攻坚的四十六、五十团的后续部队，多路登上城墙。顿时，喊杀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震天动地，我军像猛虎扑羊般向敌人压过去。敌人吓得失魂落魄，纷纷掉头逃命。

追击部队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大批敌人缴枪投降。

部队刚一站住脚，李德生就带着几个参谋上了城，在距城楼百余米处，设立了指挥所。为了让更多部队尽快顺利进城，他迅速派了一支部队下到城门外，搬开障碍物，打开了西门，十六、十八旅各团，也纷纷拥入城内。

各部队进城后，按事先分工的路线、区域，向纵深穿插、分割，歼灭敌人。

六纵突破西门时，陕南十二旅也从东北角成功登城。桐柏军区突击队140多名勇士，涉水强渡150米宽的积水地带，也出敌不意地从东南角攻占了城头。

经过彻夜激战，至天明时，城内守敌大部被歼。

钟鼓楼敌人一个团顽抗到上午10点，仍拒不投降。王近山火了，命令：“用迫击炮轰！”敌人看见我军搬运炮弹，吓得赶紧打出白旗投降了。

全城只剩下杨家祠堂康泽司令部还未解决。这是一座四进深建筑，围有高墙。院内四角各筑有十分坚固的两层碉堡。司令部中心筑有一座更为坚固的三层主碉楼。从司令官、副司令官的住室到中心碉堡有地道相通，敌人仗恃这些坚固的防御设施，妄图顽抗到底，等待蒋介石援兵到来。

王近山召集几位旅长研究后，决定将捣毁康泽司令部的任务交五十四团执行。

团参谋长沈伯英，找来炮连副连长康清林，命令他带连里的迫击炮、火

箭筒和工兵，去炸毁康泽司令部的工事，为步兵打开冲锋道路。康清林经过侦察，最后选定了一家茶馆，钻过墙去，摸到了康泽司令部墙边，用火箭筒摧毁了敌人机枪工事，又从正面以迫击炮平射，吸引了敌人火力，在连续爆炸声中，步兵冒着硝烟冲进了康泽的司令部。

很快，康泽司令部被我全部占领，襄阳解放了！

当突破襄阳的消息汇报到野司后，刘陈邓首长传来指示：“康泽只能捉来，不能抬来，要活的！”

王近山命令各部：“一定要抓到康泽！”

但是，部队在杨家祠堂内，一遍又一遍，翻腾了半天，就是看不到康泽的踪影。从各方面提供的情况证实，就在几个小时前，还有人亲眼见到康泽，难道他飞了不成？细心的五十四团教导员要秉仁，把被俘的康泽卫士傅起戎找来，叫他带路，钻进坑道底层，将敌人的死尸一个个翻开查看，终于在死人底下抓出了活康

泽。

7月23日，中共中央给中原局、中原军区、刘陈邓等首长和全军区指战员发来贺电称：

“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阳、樊城、老河口等七座城市，并活捉蒋介石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紧接着开封、睢杞两大胜利之后，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尚望继续努力，为彻底解放中原而战。”

党中央的贺电，极大地鼓舞了王近山和广大指战员的斗争意志。各部队纷纷举行庆功会，表彰奖励有功单位和战斗英雄、模范，而王近山却把目光投向新的战场了。

（甘耀稷）

抢占黄草岭，首战断敌魂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内战。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解放了包括汉城在内的大片国土。同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美国将全力干预朝鲜战争，并纠集英、法、意、荷等16个国家出兵，组成所谓“联合国军”，任命美国驻远东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对朝鲜实行赤裸裸的武装干涉。同时，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立即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并击退对台湾的任何进攻”。朝鲜半岛战火熊熊，亚洲上空战云密布。

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严正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将既不受美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将军正在黑龙江畔、大小兴安岭南麓的北大荒原上，率领全军指战员，执行党中央、毛主席赋予的屯田垦荒任务。他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局的发展，并等待着上级的命令。

一天中午，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派秘书给吴瑞林送来一封亲笔信，并派专列接他赴沈阳面谈。吴瑞林赶到军区司令部，高岗司令员和贺晋年副司令兼参谋长已在等候。高岗向吴瑞林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根据当前形势，中央命令你军于7至10天内南下，集结于通化、梅河口一线整装待命。高岗笑着对他说：“老吴，你要当先行官了。”贺晋年拿出已经做好的军运计划，作了具体部署。当晚，吴瑞林乘原专列返回齐齐哈尔军部。

7月中旬，吴瑞林率领全军集结于吉林通化地区，部队迅速掀起了一个战前大练兵、准备出国作战的热潮。

八月里骄阳似火。美国侵朝军队的飞机连续侵入我国东北领空，轰炸扫射，造成严重伤亡。在鸭绿江畔待命的广大指战员，面对美国空中强盗侵我领空，杀我同胞的血腥罪行，怒火中烧，强烈要求出兵打击美国侵略者。

10月8日，毛泽东终于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彭德怀在任职命令下达的当天，就乘飞机赶到沈阳会见第一批入朝的4个军的军政一把手。他们是：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四十军军长温玉成、政委袁升平和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以及炮兵纵队的领导人。

彭德怀同大家一一握手。当吴瑞林肢着脚走上前向他敬礼、握手时，他关切地问：“你的脚有残疾？”吴瑞林答道：“是在山东打日本鬼子时负伤留下的，不碍事。”

彭德怀看着吴瑞林那被北大荒风吹日晒显得有些苍老的脸又问：“你今年多大了？”

“35岁。”

“还很年轻嘛。”

彭德怀在他们下榻的东北军区高干招待所召开了见面后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杜平和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周桓等人。

高岗说：“在北京中央政治局开了会，彭德怀同志和我都参加了。毛主席

席下了决心，中央决定出兵参战，由彭德怀同志挂帅出征。现在请彭总作指示吧。”

将军们热烈鼓掌欢迎。吴瑞林是第一次同彭总见面，但他久闻彭总大名，十分敬佩这位毛主席写诗称赞的“彭大将军。”现在能在他的指挥下出国作战，更增添了信心，十分高兴。

彭德怀说：“我长期在西北工作，不了解你们的情况，没有发言权，还是先听你们讲。”

高岗说：“也好。就按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军以及炮纵的次序讲吧。”

吴瑞林在汇报时，首先介绍了部队的组建情况和战斗历程。接着，汇报了部队来到通化地区集结后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情况，最后说：“部队求战情绪很高，出国准备就绪，只是还有个别问题未得到解决。”

“什么问题？”彭总问道。

“战士的背包带还未落实。”

彭德怀认为此事重要，没有背包带，就会影响每个战士的行动，也就要影响整个部队的行动。他问：“你计算过吗，需要多少布匹？”

“每人一条背包带，全军需要 50 匹至 60 匹布。”吴瑞林说。

彭总问：“东北军区库存有多少？”

贺晋年回答，“库存有 100 多匹。”

彭总说：“4 个军和炮纵都要发背包带，还差 200 多匹布。”他立即往北京打电话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和总后勤部，调拨了布匹用火车专送各军驻地。

吴瑞林提出解决战士的背包带这件看来似乎很小但却关系部队行动的大事，给彭德怀留下了最初的良好印象。听完备军和炮纵汇报之后，彭德怀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入朝作战初期的作战方针：“积极防御，稳定战局。要在朝鲜第一个蜂腰部，元山、安州一线，把战局稳定下来，不让敌人过清川江。”彭德怀强调指出：“毛主席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敌人进攻速度很快，我们必须和敌人抢时间，绝对保守出兵秘密，出奇制胜。”

根据毛主席 10 月 9 日电令，彭德怀作了布置要求，4 个军和 3 个炮兵师，最迟不超过 10 月中旬跨过鸭绿江。四十军从安东渡江，向球场、德川、宁远地区开进；三十九军从安东、长甸河口渡江，向龟城、泰川地区开进；四十二军从辑安渡江，向社仓里、五老里地区开进；三十八军尾随四十二军渡江，向江界地区开进。

于是，各军军长、政委马不停蹄，火速返回各部，积极准备渡江入朝作战。这时吴瑞林向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提出：“朝鲜北部，我在解放战争时曾去过，但那时没有从作战的角度考虑问题。我想带司令部的作战、侦察人员化装到北朝鲜勘察地形，好做到心中有数。”高岗同意了他的意见，指示“既要熟悉情况，又不能暴露身份”。

吴瑞林安排好部队的工作后，带领作战处长侯显堂、侦察处长孙照普和几个参谋，打扮成铁路工作人员从安东出发，经新义州到平壤，换车经熙川到江界，再向北行，又从原路回到平壤，换车再经熙川到满浦镇，回到我国辑安，在朝鲜北部来回走了几遍。他们共用了 5 天 5 夜，对朝鲜北部地形、地物的情况做到了心中有数。回到国内以后，他们把所勘察的情况整理出来，再参照人民军提供的材料和地图，把作战可以利用的要点统一标在地图上。

然后他到沈阳向军区首长作了汇报。

在鸭绿江边，吴瑞林一行着重调查研究了部队如何渡江的问题。他们看到鸭绿江有段江面上，有行人涉水过江。吴瑞林立即决定亲自涉水勘察。十月的鸭绿江水已是冰凉刺骨，侯显堂和孙照普劝阻说：“军长，你的腿不好，我们下水就行了。”吴瑞林毫不犹豫地挽起裤腿下到江中走了一个来回。他发现水浅的地方，水在膝盖以下，只是在江中心，水深在膝盖以上。到了秋末冬初，估水季节，江水还会更浅。随后他们又用胶轮大车作了试验，结果载重大车也可以过去。他们又来到临江渡口，查明这里的江水比辑安还浅，江面也比较窄，一旦江桥被炸或被封锁，部队从此涉水过江是可能的。吴瑞林想，如果把河床修得更平整、更坚实一些，就是一座水下桥梁。吴瑞林曾在通化的大理寺，发现伪满时期为修建皇宫准备了很多花岗岩石条，他想，用这些石条铺在江底，江底平整坚实，车辆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吴瑞林回到通化军部，立即派作战处长侯显堂、侦察处长孙照普带工兵营长白韬研究执行修桥任务。他估计石条与木材不够，便亲自去找通化地委书记兼专员张雪轩，请求帮助，张雪轩当即表示：“用木材要多少供给多少，石条不够，我可以发动工人采打。”在一周之内，动员了五六百个石匠采打石条，顺利地解决了修桥用料问题，立刻运往辑安渡口抢修水下桥。桥筑成后，吴瑞林又乘载重的中型吉普车通过桥面。吴瑞林站在渡口，只见碧绿的江水哗哗流过，375米长的石桥，隐没在碧波之中，敌机从空中侦察很难发现。

为了准确掌握部队过江时间，吴瑞林又组织了一个步兵团，先行通过鸭绿江。他站在渡口，看着手表，全团人马仅用39分钟就通过了，行动慢一点，43分钟也通过完毕。按此计算，全军9个步兵团全部通过要用6个小时。

为使部队迅速过江，吴瑞林还仔细勘察了鸭绿江上的铁桥。桥上铁道的结构是枕木相间，碎石铺地，因而桥面凹凸不平，是人马行军的障碍，影响行军速度。他命令工兵在铁轨两侧和轨道中间都铺上木板，用抓钉固定，只将铁轨露出，这样，既不影响火车通过，铁桥桥面平坦，为部队迅速通过创造了条件。

朝鲜战局越来越恶化。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及李承晚军的总兵力已达42万人，拥有飞机1100架，各种军舰300多艘。他们越过“三八线”后，趁朝鲜人民军后方兵力空虚，长驱直入。在东路，李承晚军的首都师和第三师于10月17日占领咸兴，中路李承晚军的第二军于10月19日占领阳德、成川，西路美第一军3个师亦于19日占领平壤。美第十军陆战一师、步兵第三师及第七师一部分由仁川、釜山船运至元山港准备登陆。美空降第一八七团，在麦克阿瑟乘专机临空监督下，于肃川、顺川地区空降，企图切断自平壤北撤的朝鲜人民军的退路。

此时，麦克阿瑟得意忘形，口出狂言：“北韩共军有组织的抵抗似已不复存在”。他不相信刚刚成立一年的新中国敢于出兵参战，宣布要在基督教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结束战争。为了速战速决，他们采取以李承晚军打头阵，美英军殿后，以车载步兵为前驱的行动样式，分兵冒进。西线，由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指挥的美第一军和李承晚第二军，共6个师1个旅（英国第二十七旅）和1个空降团，分成两股，一股由平壤、沙里院沿铁路向新义州、朔州、碧潼方向进犯；一股由成川、阳德地区向楚山、江界方向进犯。东线，由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指挥美军陆战一师

和美七师，由咸兴、利原地区向长津、江界及惠山镇方向进犯；李承晚军首都师、第三师沿海岸铁路向图们江边境进犯。他们进攻的重点是黄草岭，矛头直指平壤失守后朝鲜中央政府所在地江界。

黄草岭，敌人称为“德洞关”，是长白山脉南麓、朝鲜东北部的军事要冲，敌人向西北迂回江界的必经之路。黄草岭、赴战岭同为狼林山脉的主峰，海拔在 1000 至 2000 米之间，大小山峰，纵横绵亘，形成东海岸南北走向的天然屏障，到处是悬崖峭壁，丛林密布、山峦交错。从咸兴到黄草岭一段有南北长约 40 公里的峡谷。咸兴公路由峡谷入口的五老里，经上下通里、馆坪、真兴里、三巨里、堡后庄到黄草岭。公路蜿蜒，上面是壁立千仞，下面是万丈深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地。山的北侧地势平缓。黄草岭以北，是长津湖南岸的一片丘陵中的小盆地，再西去 20 公里到柳潭里，有不高的山岭。故黄草岭是敌我东线必争之地。我军如先敌占领黄草岭，就可形成利我守，不利敌攻之势，对于掩护西线我志愿军主力歼敌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为此，吴瑞林受命率部奔袭 400 公里，要赶在敌人前头，抢占黄草岭。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并指示，大部队出动之前，由一名有经验的指挥员组织一支先遣支队，先过江入朝，到各指定的战场第一线，对敌情、友情、兵要地理进行深入侦察，收集第一手情报，从实际出发制定可行作战方案，供指挥员参考。吴瑞林决定，先遣队由一二四师副师长肖剑飞和军司令部侦察处长孙照普率领，一二四师和一二六师的一些各团营副职指挥员、参谋、两个师的侦察连，带电台一部乘汽车先入朝赴黄草岭，执行战役先遣任务，和朝鲜人民军联络，同军师主力保持联系。

四十二军党委在辑安召开了过江入朝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吴瑞林在会上说：“原来毛主席确定我军的任务，只用一个师阻击东线敌人即够，主力与三十八军协同打击西线平壤经孟山、宁远北进之敌，现在敌情变化，美军由咸兴—宁远—定州蜂腰部建立攻击终点线的企图，改为经咸兴攻占黄草岭，沿咸兴—江界西进迂回朝鲜北部后方，消灭朝鲜人民军的计划。根据敌变我变的方针，决定调整部署，以一二五师归三十八军指挥打击北进之敌，军主力一二四师、一二六师及炮八师、军炮团、直属队开赴黄草岭，支援朝鲜人民军，以主要力量遏制迂回朝鲜后方的敌人。”

吴瑞林强调说：“敌人异常疯狂，正大胆分兵冒进，发展迅速。我军到东线比西线各军多一倍的路程，渡江后要采取夜行昼宿的办法，以防敌机发现，对我空袭。我们要准备艰苦的快速行军，保持绝对秘密。动作突然。”他作了一个有力的手势，提高声音说：“黄草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敌我力争之地，我军的作战方针就是抢占黄草岭，坚决顶住西进敌人。”

在大部队未出动之前，吴瑞林反复考虑，作为东线前卫师的一二四师，按每夜行进 60 公里的速度，需要至少 6 至 7 天才能走完 400 公里，光凭战士两条腿，很难在摩托化敌人到达之前赶到黄草岭。为了和敌人抢时间，迟滞敌人的行动，吴瑞林大胆果断地命令 300 余人的骑兵大队先于大部队入朝，快马加鞭，直扑从咸兴到黄草岭的峡谷处的五老里。正巧遭遇到敌军的先头部队乘着汽车，在公路上开进。300 铁骑如神兵天降，冲入敌车队，用机枪、冲锋枪和手榴弹，一阵飓风般横扫过去，把敌人打得车翻人亡，晕头转向。敌人还未缓过神来，300 铁骑又一阵风般地神速撤退，消失得无影无踪。敌人不知这神兵从何而来，一时手足无措，不敢贸然前进，延缓了开进的速度。

深秋的鸭绿江上，夜幕降临得很早。刚过下午 5 点钟，江面就黑乎乎的

了。

1950年10月16日夜晚，吴瑞林军长和周彪政委迎着瑟瑟的秋风秋雨，站在辑安通向朝鲜满浦镇的铁桥北头，全神注视着全副武装的队伍，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一个师，由北向南跑步通过铁桥。车马辎重和炮兵部队则由“水下桥”通过。

没有军乐伴奏，没有响亮的进军号，没有人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那时这支军歌还未诞生，其它歌子也不准唱，也不许大声说中国话，更没有人民群众热烈欢送的场面……

这就是当年入朝作战的第一支部队过江时的真实情景。

按预定的方案，仅用了7个小时，整个部队顺利、迅速、安全地跨过了鸭绿江。各部队都在拂晓前做饭，重新伪装、隐蔽。一天之内，虽有美军飞机多次临空侦察，却未能发现我军。

一夜急行军，吴瑞林军的前卫师——一二四师，在苏克之师长率领下，前进120华里。到达江界时，这个朝鲜的临时首都已被美军飞机轰炸得大火熊熊，一片瓦砾。天亮了，部队立即隐蔽在公路两侧的山林里，天一麻黑，部队又急速前进。

吴瑞林率军指挥所紧跟前卫师后。途中，接到先遣队一二四师副师氏肖剑飞和军侦察处长孙照普来电报告：已与朝鲜人民军取得联系，会见了崔庸健副总司令；敌首都师已到咸兴，李承晚军三师也在向咸兴开进，美陆战一师开始在元山登陆，敌机正对黄草岭、长津湖以西地区侦察，估计“敌人有抢占黄草岭之势”。接着又来电：“敌军有向赴战岭方向移动，迂回黄草岭的可能。”

吴瑞林立即用电话通知前卫师师长苏克之：“用一日90公里的强行军速度，继续前进！”从17日夜起，前卫师已前进了180公里，19日越过别里河一线还须再走220公里才能赶到黄草岭。敌人也在向黄草岭运动，距离只有120公里，他们乘汽车三、四个小时就可到达，而我军这220公里，要靠两条腿走哇！吴瑞林焦急万分。

10月22日肖剑飞来电报告：朝鲜人民军派出卡车18辆连同我先遣队2辆车组成快速车队后返，接运先头团三七团二营抢占黄草岭前沿阵地；并与人民军守备部队沟通了联络，由先遣队及人民军坚守前沿松茸洞、水洞、烟台峰几个重要阵地，迟滞敌人行动；车运部队务于24日夜，先敌占领黄草岭最前沿阵地，死守待援。并派前哨部队深入最前沿监视敌人动向。积极佯动迷惑敌人。

得此消息，吴瑞林和苏克之既高兴又紧张，立即电报志愿军总部。

10月23、24日两天，由三七团苑世仁副团长指挥车运队，高速行驶，往返两次，中途接运三七团二营和一二六师三七六

团一营分头占领了黄草岭、赴战岭。这是狂妄叫嚣“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麦克阿瑟和美军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作梦也没有料到的。

10月25日凌晨2时许，率大军急赴黄草岭战区的吴瑞林收到先遣营已登上了黄草岭、赴战岭的电报后，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他让参谋打开地图，借着月光，用手电筒照着查看黄草岭、赴战岭的前沿，边看边下令说：“命令先遣营立即抢占黄草岭，赴战岭的前沿阵地，占据有利地形，抢修工事，坚决扼守，奄护军主力开进！”

深秋的夜晚，稀疏的星辰闪着寒光，东北风阵阵吹来，山林里枯黄的树

叶不停地飞舞，气温已降到零度以下。刚刚踏上了黄草岭前沿烟台峰、草芳岭、龙水洞、水洞、松茸洞几个咽喉阵地的战士们，没有喘一口气，便开始构筑野战工事，做伪装，刺刀出鞘，子弹上膛，战士们一个个匍伏在阵地上，瞪大眼睛，警惕地观察着黑乎乎的山谷。

守卫黄草岭发电所后山——796.5 高地的是三七 团二营四连。一个姓朱名丕克的机枪手蹲在机枪掩体里，把他心爱的加拿大式轻机枪擦拭得明光锃亮。5 天 5 夜的急行军，又挖了大半夜的工事，他实在太劳累、太困乏了，禁不住合上眼皮，刚打了一个盹儿，就赶紧睁开眼睛。这时，一抹金色的晨曦已涂在黄草岭的顶峰上了。

山谷里静悄悄，晨雾渐渐散去。

朱丕克举目向山坡下望去，发现有十来个李承晚军倒背着枪，大摇大摆地正向山顶上爬来。看样子像是敌人的前哨，他们没有发现四连已占据了山顶。朱丕克双眼死死地盯住敌人，右手食指轻叩在机枪扳机上，枪口瞄准向上爬的敌人，缓缓地移动着。

全连的战士都紧握钢枪，瞄准了敌人。

连长盖成友手握驳壳枪，低声提醒大家：“沉住气，放近了再打。”

当敌人爬到距离四连阵地只有三十来米的地方，盖成友一声令下：“打！”

朱丕克的机枪首先开火。一梭子弹就撂倒 5 个敌人，其余的扭头就跑，连滚带爬，逃下山去。

朱丕克的机枪打响黄草岭阻击战的第一枪。这天是公元 1950 年 10 月 25 日。从此，中国人民把这一天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从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7 日的 13 个血与火的日日夜夜里，吴瑞林指挥志愿军四万多个勇士，与约两千人的朝鲜人民军一个守备旅相配合，面对美军陆战一师、美三师、李承晚军首都师、第三师共八万余人，掌握着制空权，有大量坦克、大炮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为争夺东线屏障黄草岭，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特别是那号称美军王牌部队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史密斯少将指挥下有两万之众，装备精良，有战斗飞机 50 多架，坦克约 150 辆，装甲汽车 30 多辆，各种大小口径火炮 400 多门，轻重机枪 1000 多挺。它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地面部队的主力，麦克阿瑟的掌上明珠。

苏克之指挥的前卫师共一万四千多人，仅有马拉山炮 12 门，加上迫击炮、六 0 炮和配属的炮团总共不过 80 门炮，坦克一辆没有，飞机更不要提，轻重机枪只有 150 挺，战士们手中武器大部分是三八大盖步枪，加上手榴弹、爆破筒，冲锋枪、卡宾枪甚少。

面对强敌，广大指战员毫不畏惧。从上到下的口号是：“坚决打好出国的第一仗！”“首战必胜！”他们异口同声，“黄草岭背后就是祖国，坚决挡住侵略者，决不后退半步！”

在喋血鏖战的 13 个日日夜夜里，我军扼守阵地，与敌人拼杀，对每个山头和高地反复争夺，一个山头上午丢了，下午夺回来，一个阵地白天丢了，晚上重新占领。勇士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

笔者当时在军指挥所，是跟随在军政治部主任丁国任将军左右的政工人员，曾阅读、记录、油印过许多战报和宣传英雄事迹的材料，略述一二例可见一斑。

据守 796.5 高地的三七 团四连，血战 3 天 3 夜，打垮敌人 20 多次进攻，消灭敌人 260 多名，胜利完成任务，被授予“黄草岭英雄连”。该连九班副

班长、共产党员胡忠方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中，以身体保护轻机枪，英勇牺牲，副射手接过烈士的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打响第一枪的机枪手朱丕克，子弹打光了，跃出战壕，抡起机关枪，一口气砸死 10 个敌人。通信员、共产党员刘凤林，被一群美国鬼子围住，他打死了几个敌人，子弹光了，敌人扑上来企图活捉他，他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据守烟台峰的三七一团四连，遭到美海军陆战一师整团兵力的进攻，连长刘君阵亡，全连只剩下 19 个人。平时腼腆得像个大姑娘似的小司号员张群生，挺身而出高喊：“我代理连长，大家跟我来，人在阵地在！”19 位勇士，把所有的弹药查点一下，平均分配，每人只有五六发子弹和一两颗手榴弹。张群生对大家说：“子弹不够，就用刺刀捅，甩石头砸，也要守住阵地！”他们同敌人血战，从日出打到日落，让美军陆战一师在烟台峰上丢下 200 多具尸体，四连 19 勇士也只剩下了 8 人。张群生取下挎着的小铜号，面对西沉的夕阳，用嘹亮的号音向营指挥所报告：“天黑了，我们还坚守在烟台峰上！”战后，军里授予三七一团四连“烟台峰英雄连”的光荣称号。张群生荣记一等功。

吴瑞林将军把他的指挥所设在黄草岭山脚下一个铁路隧道里，距苏克之师指挥所不过千米。他把自己在川陕苏区、长征路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积累的丰富作战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黄草岭阻击战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美军利用机械化优势采取集团坦克群从公路上向我军扼守的阵地冲击，每组有五六十辆坦克，来势汹汹，火力猛烈，我军的步兵轻武器把它奈何不得。吴瑞林将军即令工兵在敌坦克必经公路的山坡上连夜劈挖石洞装上烈性炸药，当敌坦克群进入我埋设的爆炸地区时，一声令下，连锁起爆，石块如冰雹般铺天盖地砸落下来。第一次炸起山石数万吨，炸毁、炸伤敌坦克十多辆。第二次又炸起几万吨山石，炸毁炸伤敌坦克十多辆而且堵塞了公路，使敌坦克前进后退不得，并砸死砸伤敌人不计其数。美军搞不清中国军队使用的是什么新式武器，从此不敢在公路上用坦克向我进攻了。

吴瑞林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充分发扬我军善于近战、夜战、奇袭的战术，狠狠打击美国王牌军。

黄草岭阻击战打响不几天，朝鲜东北部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冰天雪地，使敌我双方攻守都增大了困难。

11 月 2 日清晨，从元山登陆赶来的美海军陆战一师，在师长史密斯指挥下，出动飞机 400 多架次，以 40 余辆坦克、装甲车为前导，在百余门大炮掩护下，用一个多团的兵力向我发起进攻。我因阵地工事被毁，人员伤亡过大，不得不放弃第一线阵地，黄草岭主阵地被敌人撕开一个口子，必须立即打击突入之敌，堵死缺口。苏克之师长向吴瑞林军长报告：“这情况于我不利，拟利用我军夜战之长，敌机、炮火不能大量活动之短，组织一次大的反击。”吴瑞林当即同意说：“反击事不宜迟，要做到稳、猛、狠。”一二四师在苏克之师长指挥下，组织 4 个营在夜晚进行反击。

天一黑，我军集中百余门大口径火炮猛轰烟台峰、松茸洞、水洞立足未稳之敌。部队按指定路线攻击前进。三七一团一营攻至龙水洞以北，歼敌一个加强排，击毁敌火炮 10 余门，敌人组织火力反扑，我被数倍之敌所阻，激战一夜，拂晓撤回固守。三七团三营，由团参谋长、解放战争中的战斗英雄邢嘉盛与营长马振国、教导员董永兴率领，趁着大雪弥漫，全营人员反穿

棉衣，人与雪浑然一体，神不知鬼不觉地插入烟台烽东侧水洞西山，全歼敌一个加强排，打开敌纵深突破口。午夜，全营千余人直下龙水洞以南敌后400.1高地，敌人还未发觉。三营立即将南北往返公路切断；奇袭一个炮兵营指挥所，击毁敌汽车10余辆、榴弹炮3门，歼灭车上之敌，直接威胁咸兴、五老里敌侧后安全。但三营反击过远，1000多人孤军深入，对敌人虽是极大威胁，对我也有相当大的危险。邢嘉盛判断明日必将有一场恶战。他果断地决定：趁天未明，敌未清醒过来之际，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里的战术，开展掏心战，他们深挖工事，做好激战准备，固守400.1高地及以东阵地。

美第十军头目阿尔蒙德对我三营深入其纵深后部，如芒在背，大为惊恐。他急令陆战一师暂缓正面进攻，以一部人马回头配合预备队美三师一个团夹击，企图消灭三营，以解后顾之忧。敌人出动60架飞机、10多辆坦克，向三营猛攻4个多小时。三营指战员沉着应战，待敌接近，各种火器齐放，粉碎敌人多次进攻，歼敌350余人，击毁汽车、坦克40余辆，毁敌炮10余门。敌虽遭我沉重打击，但到傍晚又调集大量兵力将三营包围，形势十分严峻。邢嘉盛深知孤军作战，久拖不利，决定坚持到午夜突围。

两夜一天过去了，苏克之师长对三营反击过远，失去联络，情况不明，十分焦急。他派三七一团一营和三七二团“蟠龙山英雄连”打过去接应三营。

正在师指挥所的吴瑞林军长更是惦念三营指战员。这是他在山东和辽宁带出来的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有着他十分相熟的战友。他相信他们能够突围归来，但耳听着远处激烈的枪炮声，眼望远处战场上一片通红的火光，他还是放不下心来。吴瑞林要求师里派一位领导干部亲自率一支精悍小部队，沿黄草岭与赴战岭的结合部森林小道，隐蔽行进，务必找到三营，将其接回。结果，三营在接应下，突围成功，绕道东海岸胜利归来。不仅把烈士掩埋好了，伤员抬了回来，抓到的美军俘虏和在美军中帮凶的两名日本兵也押了回来，还扛回来不少战利品。战斗英雄邢嘉盛见到日夜思念的首长吴瑞林和苏克之，激动得热泪盈眶，双手捧着缴获的两架美式高倍望远镜，分送给两位首长。

此时，在军指挥所养伤的朝鲜人民军副司令官崔庸健乘车赶来，和邢嘉盛等人紧紧拥抱，流下了眼泪。他看到无畏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能胜利归来，相信被隔断在南朝鲜的人民军健儿也一定能胜利归来。

后来，根据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吴瑞林将军曾派出一支有两个营的精悍部队深入敌后，去联络被敌人隔断的朝鲜人民军，找到了他们，有两批人民军部队十多万人胜利北归。这支部队在敌后同人民军一道开展游击战，扰乱了敌人，直接配合我军正面作战，解放了平壤。更有意思的是，40多年前，美国新闻媒介公布其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向三八线以南撤退中翻车身亡，而实际上是朝鲜人民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将其炸得车毁人亡的。

邢嘉盛、马振国、董永兴等率三营孤军奋战，胜利归来，该营荣立集体一等功，主要指挥员各立一等功。其他人员也受到不同的奖励。

事后，彭德怀曾指示吴瑞林，要注意培养、提拔邢嘉盛、董永光这样年轻的、有勇有谋的指挥员。42军抗美援朝归国后，他们被送入南京军事学院深造。后来，邢嘉盛担任42军副军长、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要职。

在吴瑞林统率的部队中，许多人都把他看成是苏联内战时期红军中的传奇英雄夏伯阳一样的人物。在朝鲜战场上，军内流传着不少关于吴瑞林将军

的传奇故事。

11月初，抗美援朝第一战役发展到空前激烈的阶段。西线志愿军主力5个军经10天激战，在运动中将美第八集团军7个师，李承晚军3个师击溃，使其停止了向中朝边境的进犯。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向麦克阿瑟发出急电称：“进抵清川江以北的第八集团军所有部队，全面遭到指挥高超、训练有素、众多的中共正规军的强大进攻”，在电报中历数所被歼的部队和武器装备遭受的损失后惊呼，“如无新的增援，第八集团军有被歼灭的危险！”他请求：“将部队撤到清川江以南固守。”

在东线，麦克阿瑟命令阿尔蒙德以陆战一师为主攻部队，集中美三师、李承晚第三师发动一次次拼命而徒劳的突击，妄图挽救危局。

11月4日上午8时，敌机如蝗虫般从南向北铺天盖地飞来，全天约500多架次，对我所有阵地进行地毯式轰炸、投掷大量凝固汽油弹，到处是一片火海。随后敌人从几个方向集中炮火向黄草岭、真兴里、三巨里我二线阵地轰击。炸得岩石崩塌，大树折断，土地像被犁过一遍。陆战一师以40余辆坦克在前，掩护200多辆装甲车组成的纵队，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扑来，实行突击。

严阵以待的我一二四师副师长肖剑飞指挥的百余门大炮，各团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火箭炮一齐开火，迎头痛击，顷刻间，敌坦克、装甲车，有的停止不动，有的起火燃烧，有的掉头逃跑，翻入深谷，我军战士乘势猛烈反击，敌步兵惊恐溃退，在黄草岭上弃尸遍野。

陆战一师第一轮突击被打退，又紧接着开始比第一次更凶猛的突击。

敌我双方突击与反突击，不断升级，整日激战，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4日清晨，吴瑞林把他的指挥位置推前到真兴里师指挥所，了解作战情况，加强师的指挥。他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对敌人可能利用长津湖南岸小盆地空降十分警惕。在对军纵深部署作了检查后，打电话询问师后梯队指挥员：“师直属队还有多少人可参战打空降？”对方回答：“有警卫营，工兵营、教导队共有3000多人，对敌空降，均能作战。司、政、后机关人员都有武器，也可参战。”并立即按吴军长的意图作好打空降的准备。

吴瑞林问苏克之师长：“你们师能否再守下去？能守多久？”

苏克之说：“至少能守一个星期没有问题。”并讲了能坚守的根据和条件。

吴瑞林鼓励大家说：“军现将三七八团调过来，做你们的预备队。你们一定要克服困难，准备苦战、恶战，不断改进作战艺术，坚决顶住敌人的突击。”

军政委周彪还指示，将彭者总签署表扬一二四师的嘉奖令，立即传达到每个指战员，大力加强战场宣传鼓动工作，号召党员、干部在关键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从11月4日至7日，敌我双方激战达到高潮。敌人突击打进来，我军反击插过去，敌我阵地交织，参差不齐，处于胶着状态，险象不断发生。

有一次，敌陆战一师的几辆主战坦克，一边施放烟幕，一边高速突进到距一二四师指挥所不到千米之处，情况十分危急。

苏克之师长挎上冲锋枪，手榴弹，让指挥所全体人员各持武器，准备战斗。

敌坦克一边发炮，一边冲来。苏克之疾令警卫班护卫吴瑞林，高叫：“军

长，你快走！”

吴瑞林的警卫员和作战参谋王玉振、江泉上前架起军长要走。

“闪开！”吴瑞林像一头雄狮怒吼一声，说道：“几只乌龟壳子，有啥子了不起，不要慌。”

炮弹不断飞来，在指挥所前后左右不远的地方爆炸，掀起阵阵硝烟。

大家拼命地把吴军长往掩蔽部的工事里拽。

吴瑞林却铁塔般屹立在掩蔽部门前，镇定自若地指挥着：“警卫班不要护我，从左侧迂回敌坦克，参谋人员从右边迂回过去，冲上去！用爆破筒炸掉龟儿子。”

当敌坦克冲到距师指挥所不远一条小河的桥头时，预先埋在桥下的炸药起爆，把为头一辆坦克炸翻到河沟里了。这时，赶来保卫指挥机关的战斗部队把敌坦克和后面乘装甲车跟上来陆战一师突击队团团围住，机枪、冲锋枪、六0炮、手榴弹，一齐开火，将敌人统统消灭。

为了打破僵持局面，严惩美海军陆战一师，吴瑞林军长果断地抓住敌人连日激战，疲惫不堪，传来西线美第八集团军正在向清川以南溃逃，陆战一师的士气不振的有利时机，命令苏克之、肖剑飞用两个步兵团，全部炮兵和朝鲜人民军坦克联队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击。

11月5日，夜幕降临，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吴瑞林一声令下，一组红色信号弹冲破雪幕，划破夜空，成百上千发炮弹呼啸着飞向敌阵，坦克隆隆开道，数支铁流从山上滚滚而下，向规定的目标猛突，打得敌人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各部队一气打回到数日前被敌军占领的阵地。

黄草岭阻击战13昼夜，使美国王牌军陆战一师不得越雷池一步。敌军共伤亡2000余人，被俘300多人，损失坦克、装甲车、汽车百余辆，各种大炮80多门，敌人赖以逞强的飞机也被击落2架，击伤多架，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仍然只能在黄草岭下望山兴叹。

16年后，侵朝美军第二任司令李奇微在回忆录中心有余悸地哀叹说：“这支中国精锐（指四十二军）……他们不知何时到达，在（朝鲜）东部高原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中埋伏下来，使联合国军在十分艰难中作战，遭到了损失。”

1950年11月6日傍晚，吴瑞林接到志愿军总部电令：“西线歼敌1.5万余人，胜利地结束了第一战役，四十二军撤出黄草岭，

另有新任务，黄草岭阵地由九兵团接防。”并嘉奖四十二军坚守黄草岭有功部队。嘉奖令的大意是：美军发动最后消灭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并直逼我国边境的冒险进攻，经我志愿军迎头痛击已遭挫败。此次战役，东线四十二军在炮八师和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已很好地完成战役牵制任务，尤其一二四师以少胜多，打得英勇顽强，连续激战13昼夜，毙伤大量敌人，守住了黄草岭，有力地保证了西线主力胜利歼敌，十分可贵，特通令嘉奖。现第一战役已经结束，望你们妥善组织，撤出黄草岭，建立新阵地，准备再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麦克阿瑟不甘心于失败，又发起了所谓“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企图将中国人民志愿军赶回鸭绿江以北，以实现霸占全朝鲜的野心。吴瑞林将军率部撤出黄草岭之后，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彭德怀指挥下，冒着隆冬严寒，乘胜前进，连续参加了第二、三、四次战役，连战连捷，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把美国侵略军赶回到三八线以南，稳定了朝鲜的战局。

(武际良)

有胆有识，郑维山拍案战金城

彭德怀点将

1952年夏天，以美国军队为首的“联合国军”北进失败，“绞杀战”、“细菌战”又先后破产，被迫转入阵地防御。战争成相持状态。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尽快结束战争”，侵朝美军调整部署，走马换将，原总司令李奇微被召回国，换上马克·克拉克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克拉克新官上任，雄心勃勃，但第一把火从哪里烧起呢？成了敌我双方、甚至全世界关注的问题。

当时在朝鲜战争态势图上，有一条横贯朝鲜半岛的停战线，即“三八线”；西起三八线以南板门店，东至三八线以北，成西南东北走向，中间部分在金城向北拐了个急弯，突入我方10余公里，且山高势陡，直逼我方阵地。克拉克的第一把火就打算从这里烧起。他企图凭借这突出部险要地形为依托，采取东西海岸侧后登陆作战，中间正面纵深空降配合的战术，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因此，他一面命令加强该地区的阵地工事建设，调整部署，储备弹药，一面加强东西海岸登陆演习。美航空母舰“秦师号”、“独角号”、“西西里号”分别开往东西海面。美空降一八七团由世济岛前调。纵深敌运输繁忙，汽车前送弹药日往返量多达800辆次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敌军利用中东部有利地形要大做文章。正在这时，担任金城正面防御的我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患病回国疗养。

此时此刻，谁来担当二十兵团司令员，成了志愿军最高统帅部急需解决的问题。大家明白，要粉碎敌东西海岸登陆进攻计划，除两侧作充分准备外，关键是看能否遏止中间突出部之敌的北犯攻击，这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想起了十九兵团副司令员郑维山，让他去代理二十兵团司令员，接替杨成武指挥。这个决定很快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批准。

7月19日，郑维山接到命令后，当日黄昏就驱车前往东线，到达二十兵团指挥部驻地台日里。

经前去接他的参谋指点，郑维山直接闯入兵团作战指挥部会议室掩蔽部。

这里正在开会。郑维山径直走进去，坐在那个空着的司令员位子上。兵团参谋长肖文玖惊愕他说：“你还是这个脾气呀！连个招呼也不打。”然后，站起来向兵团政委张南生作了介绍，并带头鼓掌欢迎。然而台下并没有积极响应，人们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干瘦干瘦”的新司令员，稀稀拉拉地拍着巴掌，似乎在问，你能指挥了这几个军吗？

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个代司令员有过人之处。白天，他几乎是天不亮就起床，每天追着敌人下班的夜航机赶往前沿。黄昏，他迎着已扔完炸弹去交班的敌机往回返，待敌夜航机升空时，他已返回“安全”地带。而比他早或晚的、动作慢的都会挨打挨炸。到达前沿勘察地形，他几乎每次都走在前面。他身轻体健，爬山走路“行如风”。那些参谋人员，反倒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就这样，郑维山用了整整半个多月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兵团的所有山头、坑道，检查了部队的阵地构成，兵力部署和生活设施，以及前后道路等，对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

第二十兵团是1951年夏入朝的，所属十二、六十七、六十八3个军，分

两个梯次部署在三八线东线西端，金城以北地区担任防御。金城以南，从山所里至金城川与北汉江汇合处，是敌战线的突出部，其弧形正面约 25 公里，突出部内多为山地，且山势陡峭，易守难攻。守敌为南朝鲜精锐部队第二军团，该敌依据有利地形，已构筑了大量工事，形成了以轿岩山、949.2、883.7、十字架山等为主要支撑点的坚固阵地。阵地内，坑道堑壕纵横交错，山山相连；山头间，明暗地堡火力点遥相呼应，交织成密集火网；阵地前，地雷铁丝网，层层叠障。特别是其阵地前沿，地形低洼，有数百米开阔地相隔，我军不易接近。

的确，这块向北突入的山地，对我方威胁太大了。敌居高临下，晴天可俯视兵团纵深 20 余公里。经常对我实施火力封锁和兵力袭扰。尽管先前部队曾进行了长期艰苦、卓有成效的努力，使我防御阵地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仍未摆脱被动不利的态势。

如何彻底改变这一不利局面？小打小闹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把金城这一突出部山地夺回来，将战线拉直，才是最佳方案。但是，郑维山清楚，就二十兵团兵力、火力和当前形势，立即采取行动攻取是不现实的。但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必须胸怀全局，立足现在，着眼未来。

郑维山再一次深入第一线，有针对性进行考察，与主要师团领导和部分基层干部、战士交谈，分析情况，研究打法，修订作战方案，最后与兵团其他首长和机关人员一起研究，制定了一套积极防御作战方案。然后，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

会上，郑维山首先分析了当前敌我态势，明确了兵团总的作战指导思想：“积极防御，全面准备，创造条件，适时反击，争取主动，夺取胜利。”眼前出发点是：一切工作应立足于准备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保证不出问题；在敌人发动大举进攻之前，应积极打击敌人，锻炼部队，积累经验，作打大仗、持久战的全面准备。在作战的范围规模上，郑司令员要求先从敌人的班排阵地打起，逐步提高，向敌连营团阵地发展过渡。在分析当前战场可能出现的情况时，郑维山明确三种情况下三种不同处置办法：一、在敌大举进攻情况下，一线团队坚守，在纵深炮火支援下，依托要点杀伤、消耗敌人，为二线梯队反击创造条件。经反复争夺，挫败敌人进攻。二、在敌以小股袭扰情况下，一线部队依托阵地，适时坚决反击，力求将其全歼。三、在敌固守不出，消极防御的情况下，兵团一线部队要积极组织战术反击，力争在攻势行动中大量歼敌，改善防御态势。战术反击作战的基本要求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得不偿失之仗，不打急躁莽撞之仗。要求每仗都周密组织，充分准备，做到不反则已，反必胜，围必歼，攻必克，守必固。”

郑维山讲话，声音洪亮，语言简练，有理有据，深入浅出，好懂易记，令到会人员口服心服。

这次作战会议之后，层层进行传达动员，使兵团 10 万之众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和战法。从 8 月上旬起，各部按照兵团的统一部署和要求，迅速掀起备战高潮。

正在这时，志司下达了新的作战命令。

原来，由于我军的积极备战，使敌人翼侧登陆进攻的可能性减少，但敌军从正面发动局部进攻的可能性却增大了。为先发制人，粉碎敌人的局部进攻企图，志司命令一线部队实施战术反击。命令规定，反击时间为 9 月 20

日至10月20日之间，对每一目标的攻击时间由各部队自行决定。

这一命令对于早已做好战斗准备的二十兵团的第一线部队来说如同“东风”。郑维山乘机立即指挥第十二、第六十八军，向早已选定的北汉江东西两岸守敌13个阵地展开反击，一举成功，

又夺占全部计划目标。得手后，组织纵深炮兵集中射击，打敌反扑，支援反击部队依托阵地与敌反复争夺。10天内击退敌230多次反扑，歼敌6200余人。首战告捷，坚定了信心，取得了经验。根据经验，郑维山组织一线参战部队稍作调整准备，于10月23日，再次发起攻击，连克敌阵地18个，打退敌199次反扑，给敌以重创。这次作战，占领了敌前沿阵地四个战术要点，向敌挤阵地2平方公里，特别是占了敌重要战术要点1089.6高地北山，和883.7东山腿阵地，并在这两处挖了坑道和屯兵洞，如同在敌人腿上安了颗定时炸弹。敌人非常不自在，拼命抢夺，在我纵深炮火轰击下，损兵折将，空劳往返。

反击战斗一结束，郑维山即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对战术反击中攻击目标和突破口的选择，攻击时机的把握，兵力兵器的使用，战斗指挥和通信联络，以及巩固阵地、打敌反扑、步炮协同、防空防炮等课题，进行认真的探讨，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反击战斗的胜利，更加坚定了郑维山对自己提出的作战方法的信心。一个更大的反击作战方案，渐渐在他胸中酝酿形成，夺回金城突出部地区，将停战线修正拉直的设想开始有一个轮廓。然而，郑维山清楚，要使自己的设想成为现实，眼前明显的问题是兵力不足，必须提前解决这个问题，使部队早进入情况，早做好准备。

郑维山想起了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他俩是一起离开十九兵团的。记得两人分手前，杨得志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向杨得志提出过，让他多打几个大胜仗的要求。杨得志曾答应过他：除了一线作战部队外，其余二线部队和刚出国的几个军，你都可以考虑。哪知郑维山不开口便罢，一开口却让杨得志吃了一惊。郑维山点名要的却是正在后方休整补充、调养元气的六十军。

原来六十军是1951年3月出国的，入朝仅两个月，即参加第五次战役。战役第一阶段，该军在三兵团编成内，由中部实施重点突破，攻击勇猛，发展迅速，直插敌人纵深。但由于我军无制空权，后方补给困难，敌抓住我“7天给养礼拜攻势”的规律，在我正准备结束战役时，实施两翼迂回，大规模快速反击。六十军为掩护兵团主力部队展开，组织纵深防御，全军指战员特别是一八师顽强拼杀，付出了血的代价，大伤了元气。战后，调到后方整顿调养。军委原准备将该军一八师调回国到北大荒农场搞生产。郑维山认为，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军队历来有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困难失败是人的最好的教科书，没有经过困难和挫折的人不算是真正的人，没有经过挫折失败摔打的部队，不一定是过硬的部队。六十军是朝鲜战场上支经过血与火洗礼的部队，是战争烈火中锤炼出来的一块金子，是金子只有放在烈火中才能显其本色。所以他点名要六十军来二十兵团作战。

就这样，1952年11月，六十军奉命来到二十兵团。一到前线，郑维山就让他们上了第一线防御阵地，接替了六十八军的全部防务。兵团领导的信任和重用，给了该军很大的鼓舞。广大指战员纷纷表示，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战斗任务，打好翻身仗。部队顺利地完成了交接，很快全面进入了情况。与此同时，六十七军也接替十二军的防务。兵团一线部队换成已养精蓄

锐多时的新力量。

至此，郑维山的金城反击作战计划逐步形成，作战部队已陆续部署到位。六十军军长张祖谅机智多谋，虚心好学，对郑维山很尊重。郑维山每到六十军视察，他都抓住机会与其一起探讨反击作战问题，对郑维山的指示认真领会接受，两人谈话十分投机。此后，郑维山又有针对性提出反击作战的课题，让张祖谅去思考，让六十军去摸索，去完成。张祖谅和六十军指战员毫不含糊，认真执行兵团首长的指示，坚决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在加强防御的同时，主动出击，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从1952年11月接防到第二年4月，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对敌连以下目标反击26次，其中有25次达到全歼守敌的目的。

一次，郑维山去六十军视察，发现他们不定时地向敌阵地前沿打炮。开始，他以为是冷枪冷炮活动。后来得知，他们正按兵团的部署，以炮火掩护挖敌人的阵脚，作大反击的准备。

原来，在六十军正面，是敌883.7和949.2高地，山高坡陡。而我方一侧则是一些低矮平坦的山头，无险可守。为利于长期坚守和反击攻取敌这两个要点，他们在本阵地内修了大量坑道外（六十军阵地共有坑道1310条，计33.797公里），还将坑道修到了883.7和949.2高地向北延伸的山腿上。由于距敌人太近，放炮炸石怕被敌人察觉，就以地面炮兵射击作掩护。郑维山肯定了他们这一做法，并在全兵团一线部队中推广，号召学习六十军，将坑道挖到敌人床铺下面去。

在此期间，郑维山指挥一线部队，进行有针对性的反击作战。这种战斗主要是有计划，有目标，以练兵为目的，主要是研究摸索如何解决步炮协同，潜伏和冲击动作等战术问题。仅敌前白天潜伏就搞了十几次，从班排到连，从数百米到敌前几十米，反复演练。同时，对敌我阵地之间的灌木丛，有意识地进行保护，有时被敌打着了火，我则在炮火还击中以散弹将火击灭。

积极备战，为收复金城地区创造条件

转眼到了1953年夏天。敌人经过一段时间谈判后，又弹起“让飞机大炮说话”、争取“军事上胜利”的烂调，天空飞机频频出动，两翼海面军舰增多，李承晚也坚决反对停战，叫嚷“必要时单独干”。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洞察一切，早已识破敌人企图从谈判桌外捞便宜的阴谋。指示军队“只管打，不管谈（判），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志愿军首长于4月20日下达作战预令，决心发动以打击西线美军为主的夏季反击作战。

这一决定在郑维山意料之中，又出乎他的意料。在意料之中的是，这个仗早晚要打，如果就此停战，将军事分界线确定下来，双方都后撤2公里，南朝鲜军队将退出现占领的对我威胁极大的几个要点。对此，它绝不会甘心。而我方后撤2公里，就到平坦地带，根本无法防守。因此，双方都不愿就此停战。他没有料到的是，主攻方向不在二十兵团的正面。这样本兵团兵力火力就得不到相应加强。靠现有实力要拿下计划中所有目标，会很吃力，甚至有些冒险。

郑维山是一位敢于冒险，善于险中取胜的将军。他有一句名言已载入《兵家名言词典》：“作战总有几分冒险，百分之百有把握的仗是很少有的。”

因此，尽管得不到加强，他仍不愿意放弃自己早已准备好的作战计划，并决心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实现。

在志司的作战会议上，尽管郑维山以充分的论据和理由说明攻取金城突出部地区将战线拉直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但仍没有得到志司的认可，也没有争取到火力兵力的加强。志司强调：“要稳扎稳打，每个军一次攻击目标不超过一个营，最好每次歼敌一至两个排到一至两个连。”战役的目的，主要是消灭敌人，锻炼部队，以配合板门店谈判，配合政治斗争。

会后，志司副司令员杨得志又将郑维山留下，再次强调，打是为了配合谈（判），打不好会影响谈（判），会造成政治上、国际上的影响。杨得志如此关照郑维山，是有原因的。中央军委为了让更多的干部在朝鲜战场上得到锻炼，制定了一个轮换作战的计划，决定让国内一些未出国作过战的高级将领到朝鲜学习，体验现代化条件下的战争，让先期入朝的一批高级指挥员回国。郑维山已列入回国人员之列，原在国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的杨勇，将赴朝接替二十兵团的指挥，各自的命令已下达。只是中央军委后来考虑到二十兵团正面战场的特殊情况，又下达补充通知：要郑维山待夏季反击作战结束后，再离开二十兵团。新入朝的指挥员先以观察员的身份观战。杨勇与郑维山的交接延至7月11日。郑维山虽然得知这一消息，但根本没把它当回事，一切如常，决心反击当面之敌。因此，杨得志不得不提醒他，这次作战，口不要张得太大，纵深不能进得太远。要稳扎稳打，要慎重。

郑维山虽然在志司没有争取到主攻方向。但他仍不愿放弃将战线拉直的作战计划。他决心将整个计划分三步去实现：第一步，夺占比较小而又重要的战术目标，以锻炼部队，取得经验；第二步，夺取敌883.7、949.2、十字架山（座首洞南山）、1089.2高地为主的敌金城第一防御地带内的重要阵地，得手后，依托阵地工事与敌反复争夺，借此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第三步，向敌纵深发展，攻占金城突出部，把兵团防御前沿阵地推至敌人现在的第二防御地带内的赤根山、黑云吐岭、白岩山一线，将停战线修正拉直。

郑维山的作战计划能不能实现？二十兵团怎样从次要方向，打成主攻主要方向呢？

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以下简称《战史》）作了如下记载：“按照志司原定计划，整个夏季反击作战于5月30日前完成准备，6月1日发起进攻。但是，由于有些部队已完成进攻准备。为了紧密配合谈判，掩护我军战役企图，志司于5月11日决定：凡对连以下目标的进攻准备已经完成的，即可开始作战。”

“根据这一决定，第二十兵团所属第六十、第六十七军，于5月13日晚，分别对南朝鲜军科湖里（金城东南）南山，直木洞（金城西南）东南横线、883.7高地西北无名高地等为重点的（9个）连以下目标发起进攻。至15日我军共进行了13次战术反击作战，攻歼了9个连排支撑点的敌人，并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共毙伤俘敌1500余人。六十七军二一师在科湖里战斗中，攻歼敌一个加强连，并打退敌一个排至两个营兵力持续一周时间的反扑，毙伤俘敌1300余人。受到志愿军总部的通报表扬。”

这次反击作战，二十兵团准备充分，首先打响，且进展顺利，引起了志愿军总部首长的重视。据《战史》记载：“志愿军首长于5月16日决定，‘战役不采取统一时间开始’，已经开始的第二十兵团对准备好的各点仍继续进

行攻击。 25 日后再将作战重点转移向西。”

志愿军首长在东线二十兵团发展顺利的情况下，暂停执行以西线为重点的攻击计划，是非常果断和明智的，它对于后来的战局发展，能够及时地将攻击重心东移，适时向二十兵团转移兵力，将夏季反击作战推向收复金城地区，将战线拉直的金城战役起到了重要作用。

5 月 16 日，“根据志愿军首长指示精神，第二十兵团继续对连以下目标实施反击，至 5 月 25 日，又进行了 16 次战术反击作战，攻歼了 11 个点的敌人阵地，毙伤俘敌 3530 人。”与此同时，中部第九兵团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军也对预定敌连以下目标进行攻击，歼敌近千人。我迅猛的攻势，军事上沉重的打击，迫敌在政治上。不得不作出让步。“5 月 25 日，美方基本上同意了我方 5 月 7 日提出的有关战俘安排的方案，谈判不日将达成协议。”

美军政治上的让步，使郑维山预感到了反击作战重心很可能向东线伪军转移。郑维山似乎看到实现收复突出部，将战线拉直的可能。

因此，第一阶段战斗结束后，郑维山即与六十军军长张祖谅和六十七军军长邱蔚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决心加快第二阶段作战计划的进程，以适应形势发展。立即进行战斗侦察性质的补充作战。破坏敌营团主阵地前沿工事、障碍，进一步探清敌纵深阵地构成，兵力部署、道路交通、联络等情况，弥补第一阶段作战的不足，为第二阶段向纵深发展，夺取敌突出部内重要战术要点创造条件。

郑维山这一决策及二十兵团以后的 5.27（5 月 27 日）行动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和行动。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在军事与政治交织的斗争中，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不仅要有军事上的胆魄，而且要有政治上的敏感。郑维山在第一阶段反击作战结束，全线战斗停止，部队急待休整的情况下，得知西线美军已作出了让步的消息后，立即作出反应，及时地定下决心，采取行动，进行 5.27 补充反击作战。实践证明，这一行动对以后局势的发展变化，为第一阶段反击作战向第二阶段过渡，为战役的次要方向向主要方向的转变，为志愿军总部以打西线美军为主到打击东线伪军为主的战役重心的变换，为以后把金城地区的反击作战推向高潮，以至打成抗美援朝战争最后的决战，架设了桥梁，铺设了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郑维山这一决策，二十兵团部队在第一阶段进攻结束后，休整了一天，27 日凌晨又发起猛攻，一举攻占敌数个战术要点的重要部位。《战史》作了这样的记载：“第六十七军攻占了粟洞南山及相毗邻的 690.1（金城东南）高地东北、西北两山腿（攻克后主动放弃）。歼敌 1 个连另 6 个排，并击退敌一个排至 5 个连 41 次反扑，共毙伤俘敌 1750 余名。第六十军攻占了 949.2 北无名高地和 949.2 高地西北、833.7 西北两山腿，歼敌 1 个连、9 个排、4 个班，另 1 个连部、1 个观察所和 1 个排大部，并击退敌 1 个排至 2 个营的反扑 38 次，共毙伤俘敌 1640 余名。”此时，西线反击作战亦于 28 日开始，但由于美军在谈判桌上答应我方的方案，所以西线攻击规模缩小，仅以四十六军攻歼了土耳其旅 1 个连另 2 个排和英军的 1 个连的阵地。对美军阵地暂未作攻击。后土耳其、英军也作了让步。

根据这种形势，志愿军首长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于 6 月 1 日决定，将原定的以打击美军为重点的计划改以打击伪军为主。将主要攻击方向和任务，交给郑维山的二十兵团。并将新入朝的第五十四、第二十一军调归二十兵团指挥，同时又从第九兵团方向抽调炮兵第七师第二十团、总炮兵预备队

第二师第二十九团加强到二十兵团作战，交给郑维山指挥。

战机的出现是偶然的，但又是战斗发展之必然。

郑维山与他领导的二十兵团从战场的次要方向成为主要方向，从助攻转换为主攻，主要是他们战前准备充分，战斗打响后，行动迅速，发展顺利的结果。

“打！错了我负责！”郑维山拍案定下夺城计

1953年6月4日，这是极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

二十兵团指挥部所在地——台日里，突然戒备森严。山上，防空火器进入一等战斗状态。山下，过往车辆行人严密控制。山沟拐弯处，二十兵团作战室大掩蔽部里，灯火通明。这里在召开一个重要会议，郑维山作关于金城反击战第二、第三阶段的作战方案的报告。

会上，郑维山总结报告了第一阶段反击作战的情况及当前敌我态势，对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作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那就是以两个军（二十一、五十四）作两翼保障，两个军（六十、六十七）正面突击，一个军（六十八）作总预备队，攻取敌当面两个团的阵地，即883.7、949.2高地和十字架山（座首洞南山）。这三点分别位于金城以东、东南，是敌稳固金城地区防御的三个强点（另一点为轿岩）。打下这三点，等于砍掉敌三条牛腿，使敌金城地区防御失去平衡，有利于我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为第三阶段收复金城地区作准备。谈到攻占上述目标的有利条件，郑维山说：“除了我军已作了长期充分的准备外，主要有四：一、上述诸点是敌之强点、要点，我之弱点，敌不会料到我对它下手，进攻可以出敌不意。二、883.7高地陡坡下有一开阔地，在敌人看来，似乎是我不可逾越的天然障碍。但该地树丛茂密，地表植被保存完好，我可将部队提前潜伏在这里，战斗打响后，直接发起冲击，减少伤亡，节省体力，在进攻接敌冲击的距离和时间上出其不意。三、六十军已有两条坑道挖在949.2、883.7高地的山腿上，可屯积弹药和二梯队。四、883.7高地与949.2高地与我阵地前沿之间有一片杂木林，可将炮兵临时发射阵地隐蔽于此。这不仅可增加我炮火射程和准确性，而且由于该区距敌前沿近，不易受到敌纵深炮火的压制，利于发挥我火力。

郑维山的作战方案有理有据，一气呵成，无瑕可击。

但是，当他发言完毕，征求大家意见时，近50多人的大掩蔽部里，却鸦雀无声，出现长时间的冷场。

领导和同志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其一，此战要同时攻取敌两个团的阵地，这是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近两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大超出了志愿军总部规定的“攻击目标不超过一个营为原则，最好每个军一次攻歼一至两个排到一至两个连”的范围。其二，在无制空权，技术装备较差的情况下，大白天，三千人大潜伏，现代条件下的战争也无先例。其三，朝鲜战场是当时全世界都瞩目的战场，万一打不好，不仅是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会影响国家和军队的形象，影响停战谈判的进程。

六十军军长张祖谅第一个发言，打破了沉寂。他表示支持兵团的作战方案，坚决执行命令，完成兵团交给的攻占883.7、949.2高地，歼敌一个团的任务。他就进攻的方法，使用的兵力、火器，成功的有利条件、不利条件作了客观分析论证，对战斗打响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及解决的办法，应变措施一

一作了说明。他接着说：“此次作战，主要是出奇制胜，其主要手段是大潜伏。对于这一问题，自从六十军接防以来，我们根据郑司令员的指示，进行了探索演练。先后组织对敌连以下目标反击26次，25次反击达到全歼守敌的目的，其中有21次都采取了大小不同的潜伏手段，从班排到连营都搞过。时间从几个小时到2昼夜都演习过，全部取得成功，使用兵力敌我对比基本是1:1到1:3。也就是说，此次反击，攻歼敌一个团的目标，我用3500人的兵力，潜伏成功，就够了。”张祖谅坚定他说：“3000多人在敌人手榴弹能砸到的地方潜伏一天一夜，是敌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我们敢想，而且能做到。我们可以在攻击的前一天夜里潜伏到敌人阵地前沿，第二天入夜发起攻击。攻占敌阵地后，还有4—6个小时的夜间时间，我们可以利用夜幕作掩护，调整部署，补充弹药，加修工事，计划火力与协同动作。在天亮之前，完全可以做好打敌反扑的准备。”

张祖谅的话刚落音，六十七军军长邱蔚站起来发言。他同意、支持兵团的作战方案，坚决要求攻打“十字架山”（座首洞南山），保证完成歼敌一个团的任务。并就具体作战的方法、措施作了简要说明。

张祖谅、邱蔚两位是一线主攻部队指挥员，他俩一前一后表了态，郑维山决心更加坚定。

他“叭”的一声，拍案而起，坚决他说：“打！错了我负责！杀头杀我的！”

张祖谅接着说：“我和你共同负责！”

郑维山毫不犹豫他说：“不要你负责，你只管打你的，错了有我一个脑袋顶着就够了！”

正在这时，志愿军政委、代司令员邓华已得知消息，把电话直接打到二十兵团作战室，他对郑维山说：“我们考虑了你们的作战计划，我们认为打883.7，949.2高地的条件不成熟。我们的意见是不要打，请你们考虑。”郑维山回答：“我决心已定，错了我负责！”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瞒天过海，金城战场创奇迹

为了保证战斗胜利，会议结束后，郑维山首先到了六十军，与军领导一起组织战前准备。他要求部队把一切问题解决在进入潜伏区和战斗打响之前，要确保3000人潜伏的成功。他说：“只要战斗打响时，这3000多人能站起来冲锋，或者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能参加战斗，仗就好打了，胜利就有八九分了。”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几千人潜伏在敌人鼻子底下，不出一点纰漏，不被敌人察觉，谈何容易啊？

一是几千人埋伏到敌阵地前沿一天一夜，部队吃饭怎么办？咳嗽怎么办？睡觉打呼啥怎么办？大小便怎么办？蚊叮、虫咬怎么办？……哪一点想不到，哪一个问题不解决，都可能引出大乱子。

二是炮兵的潜伏。由于敌我阵地之间隔个大川，如果炮兵在我阵地后侧射击，距离远，难以有效地支援步兵向敌纵深行动，也容易受到敌纵深炮火的压制。郑维山作出个大胆的决定，即把炮兵群由阵地后提到阵地前，放在敌阵地前沿883.7和949.2高地之前的一片杂木林里。这里距敌人近，易暴露，相当危险。

三是如何控制敌人，不让其靠近潜伏区，而又不使敌察觉我有意在控制

他，等等。

对此，都作了多手全面的准备。同时，各级也都做好了由奇袭转强攻的准备。

6月9日，郑维山来到兵团在龙门山坑道里开设的前进指挥所。这里与六十军指挥所相距不到百米，与敌前沿阵地直线距离2000米左右，潜伏区、敌前沿阵地均在眼界内。

晚7时，各突击部队开始行动，很快，报告接踵而来：

——六十军五三五团前进指挥所和二、三营第一梯队6个步兵连、2个机炮连1537人在902.8高地前沿潜伏完毕，侦察分队封锁了敌人出入道路。

——五四二团5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1000余人，进入973高地前沿，潜伏完毕。

——五四三团4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1000余人在883.7高地前沿潜伏完毕。

——五四团2连在949.2高地西北侧潜伏完毕。

——一八师侦察连到达指定位置潜伏完毕。

次日凌晨4时，六十军突击部队共两个团部的前进指挥所，4个营部，15个半步兵连、4个机炮连，约3500余人，全部安全进入潜伏区。

朝鲜半岛的夏天，天亮的特别早，时针刚过5点，天已大亮了。随着太阳的升起，人们的心被揪了起来，担心、焦虑，一齐袭上心头。二十兵团指挥部里，格外寂静，静得似乎能听到怀表的嘀嗒声。郑维山将军端坐在那里，面沉似水，格外镇静。他知道，前面各级指挥了望孔上，有无数支潜望镜在搜索着敌方前沿每一个阵地，捕捉着一切可疑的目标和迹象。炮兵前方和侧方观察所，在通过多种角度观察情况。炮兵有目的无目标地打着冷炮，进行扰乱射击，并按计划和规定的信号，每隔一段时间连打几炮，掩护战士们翻个身。

他知道，那些宣过誓的突击队员，在潜伏区内能坚持和克服随之而来的闷热、虫咬、口渴、大小便等困难。

他还知道，前线指挥员也一定能恰到好处地处理好各种情况。对此，他从不怀疑他们。但是，责任，义务，几千人的安危，身后祖国几亿人民的希望，都压在他的肩头。

正午。太阳像钉在空中一样一动不动，火辣辣的，像是有意和郑维山开玩笑，有意多看几眼趴在树丛中的几千名志愿军将士。好不容易熬到下午两点，一个突然的情况发生了。“前方观察所报告，有5个敌兵向潜伏区走来”。郑维山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但很快又坐下了。他知道，这些事情不用他来过问，张祖谅会按预设的办法处理好的。很快，炮兵发言了，几发炮弹在敌兵附近爆炸，敌人连滚带爬窜了回去。

此事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郑维山长出了一口气。看来三个月前他下达的一道命令，对于控制敌人来说起了作用。

原来，早在春天，郑维山来到六十军阵地视察时，看到这片开阔地茂密的树丛，想起一个成语“草木皆兵”，突发奇想，作了两条规定，第一，保护好这一带植被。第二，不允许敌人下山接近这一地带，发现就打。六十军以开展冷枪冷炮、狙击手活动，组织特等射手，以精确度很高的步枪，专打敌人的零星人员。打的敌人白天不敢出工事，更不敢轻易下山，有时出来巡逻也是应付一下就回去。所以6月9日夜，我军3500人潜伏在敌人阵地前沿，

他们竟毫无察觉。直到10日19时，敌二十七团二连的潜伏哨才发现前沿“有大部共军部队活动”，等报告到团部时已经20时了，我炮兵部队已开始去掉伪装，装上炮弹，抬起炮口，瞄准了目标。

这时，郑维山抬起手腕，通报自己手表的时间：“8点13分20秒”。

8时15分，所有电话、电台、步话机开通。

8点20分，近300门火炮齐鸣，金城地区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正式开始。霎时间，上万发炮弹倾泻在敌前沿阵地上。8分钟后，我炮火向纵深转移，诱敌人钻出掩蔽部，占领阵地表面野战工事。数分钟后，我炮火又打了回来。炮火中，敌肢体横飞。

几天来，一直为郑司令员担忧，老拉着脸的第三兵团司令许世友，自太阳下山，他的脸就露出了笑容。此时，见郑维山指挥若定，战斗进行得如此顺利，特别是见郑维山如此善用炮火，在一旁打趣他说：“看！郑司令员给咱上回锅肉了！”

郑维山笑着说：“和尚大哥！等着吧，今天还有红烧洋鬼子呢！”

话刚落音，炮兵第三次急袭开始，刚出现在朝鲜战场的苏制“喀秋沙”火箭营，突然加入战斗，一个集火齐射，成千上万条火龙飞向敌人阵地，把天空都映红了。敌人阵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

当年参加潜伏的同志，至今回忆起来仍激动不已，说：“当时，不知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大炮，身后炮声隆隆，头顶上弹风飕飕，脚下地在颤抖，真令人兴奋呀！”

此时，郑维山端坐在作战地图前，看着作战处长王树良将一支支红色的箭头和小旗向上画。其实，他不看也知道，第三次炮火延伸后，973、902.8高地前潜伏的部队应首先攻击，待将敌注意力吸引过来后，主攻883.7的突击队将突然插上敌阵，打敌个中心开花，然后配合正面攻击部队倒打949.2高地。按他的计算，8点50发起攻击，一个半小时，将夺取敌前沿阵地。但两个小时过去了，883.7、902.2、973高地上手榴弹爆炸声已响成一片，而且响声渐渐的向山背面滚去，说明步兵已占领阵地，正在驱赶敌人或打敌团营第二梯队反扑，但是，为何没有报告呢？

郑维山抓起电话问六十军。

“张祖谅吗？怎么搞的？仗才开始就放羊啦！”此时，由于电台联系不上，情况没有全部报上来，派出搜集情况的参谋还没有消息，军长张祖谅更着急。但见郑司令员问，仍平稳沉静地报告说：“我们正在搜集情况，综合后立即上报。”

情况很快报上来了。战况终于明白了。潜伏突击队共用了70分钟就攻占了预定目标902.8、973、883.7高地，歼敌二十七团第一、第二、第三营和师部搜索连。战斗发展如此顺利，令所有的人，包括志愿军总部首长也感到兴奋。

当郑维山接到报告，得知部队已按计划攻占所有目标，立即提醒六十军军长：“你对面是敌一个军团4个师，还有美一个空军联队，天亮敌一定要反扑，告诉部队要做好与敌长时间拼杀的准备。你要顶不住，早告诉我，兵团二梯队第二三师和六十三师就在你后面。”这最后一句，郑司令员本意，是想告诉张军长，有强大的预备队在后边，让他放心地打；当然也有激将的意思。而张祖谅避开本意，将计就计，立即告诉各师团：“要是不行，预备队随时可接替我们。”这不仅坚定了一线作战部队必胜信心，同时，激起指

战员的更大斗志。其实，拿下上述阵地，基本用的是潜伏部队。军的预备队，各师预备队，尚未用上呢，岂能让兵团二梯队上来呢！

天亮后，敌果然来势凶猛，飞机、炮火铺天盖地压过来，掩护步兵反扑。我军依托既得阵地顽强抗击敌人，连续打退了敌十几次冲锋。

战到中午，883.7高地“弹药告急”。张祖谅急向兵团求援。郑维山知道，张祖谅是从来不叫苦不讲价钱的人，此时，一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但目前，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靠人挑肩扛，杯水车薪，难以救急。他急中生智，命令将弹药在坑道里装上10辆卡车。他亲自指挥，乘敌这一批飞机拉起转弯之时，10辆卡车一起冲出坑道，飞奔上前线。又是一个出其不意。当敌人明白过来时，10辆满载弹药的汽车，已有9辆到达安全地带隐蔽起来，只有一辆被炸。在一旁观战的同志见了，连连称奇。

6月12日凌晨，当敌集中力量向六十军反扑之时，郑维山命令西侧的六十七军，突然发起攻击。一举攻歼敌第八师第二十一团大部阵地，夺取占领了金城东南座首洞南山（十字架山）。

右翼我六十七军突然迅猛的攻势，令美军司令官泰勒十分吃惊，他深怕我军由西向东卷击，急忙机动兵力，以阻止六十七军的发展。

此时，郑维山抓住敌军调动，指挥稍乱之机，命令兵团二梯队二、三师和六十三师从东西两翼同时加入战斗。向以949.2高地为核心的敌第五师阵地和敌第二十师六十二团1089.6阵地发起攻击。至此，敌哪里还能招架得住，且战且退。我军乘势攻占上述阵地。

正在向西翼机动兵力的敌司令官泰勒得知第二十兵团二梯队一举攻克位于东侧的1089.6高地，如梦方醒，知中了共军声东击西之计。但为时已晚了。

南朝鲜军第二军团敌中将长官丁一权感到防线已不可守，遂令第五师撤出战斗，占领第二防御地带的748高地、后洞、北汉江西462等几个矮小的山头上，阻我向纵深发展。于是，第五师师长于15日零时下达命令，全师撤退。实际上，不下达这个命令，他的部队已全部脱离向南逃了。而且在混乱中互相践踏，炸毁了北汉江上的六座桥和渡河器材及江东的重型火炮和装备，不少士兵掉入江中被激流冲走。

郑维山指挥二十兵团迅猛的攻势，连续5昼夜不给敌以招架还手之机，东西配合，步炮协同，在10余公里的丁面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使敌顾此失彼，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直至彻底败退。

6月15日晚，郑维山司令员正指挥兵团第二梯队向前推进，准备向战役第三阶段过渡，实施全部收复金城，将停战线拉直的计划之时，19时，接到志愿军总部和朝鲜人民军联合签发的命令，称：“敌方已答应我方提出的全部条件，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停战线将按照双方现已占领的实际控制线重新划定。签署停战协议在即。”同时，志司指示郑维山，立即派人将我部现已占领的阵地前沿坐标图送往板门店，以便验证界定军事分界线。命令还规定：“从6月16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攻击，但对敌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

至此，我金城反击作战第二阶段遂告结束。此阶段作战，历时5天6夜，二十兵团所属部队攻占金城以东及东南地区949.2、973、902.8、883.7、1089.6、870、760、938和座首洞南山等9个要点，攻歼敌两个团的阵地，共毙伤俘敌28382人，收复土地54平方公里，给了南朝鲜军第五师、第八师以歼灭性打击。在金城以东地区北汉江两侧占领了敌三个团正面12公里、纵

深3至6公里的防御阵地，并为以后夺取金城的作战及长期坚守防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尽管郑维山将军没有直接攻占金城，但后来人们仍然将他的名字与金城联系在一起，与3000人瞒天过海大潜伏的奇迹联系在一起。但是人们不会想到，在当时定下如此作战决心，指挥这次作战，要冒多么大的危险啊！

当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有人发现，患有严重失眠症的郑维山司令员，竟趴在他拍案下决心的那个桌子上睡着了，他太累了。

在他的面前，放着两份志愿军总部来的电报，一个是通报表扬六十军的，一份是通报表扬六十七军的。电报是邓华、杨得志、洪学智联名签发的，签发时间分别是6月12日、6月13日。所以，没有提到后来夺取949.2高地，又歼一个团大部的战果，也不会提到六十军座首洞南山歼敌一个团以后的战斗，更不会提到兵团代理司令郑维山。甚至在后来出版的一些抗美援朝的史书中，也有的将代理司令员一年的郑维山的名字遗忘了。

但是，朝鲜金城地区群众没有忘，朝鲜人民没有忘，朝鲜领袖金日成没有忘。30年后，1982年，当郑维山经过“文革”磨难复出以后，他们特邀他去朝鲜访问，以隆重的欢迎仪式，感谢这个当年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为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收复56平方公里土地，将金城停战分界线拉直，彻底改善了金城地区不利态势的英雄——“正直”将军。

（刘俊桐）

无私无畏，陶勇勇冠三军

安徽省霍邱县的叶集，是大别山下的一个热闹的小镇。1913年腊月十五日，一个老实本分的张姓庄稼人家诞生一子，请来私塾先生为其取名：张道庸。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他参加新四军。有一次陈毅和粟裕派张道庸到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为了迷惑敌人，陈毅建议他改名，说：“把姓去掉，剩下两个字，取音韵相近的两个字——陶勇，乐陶陶的陶，勇敢的勇。”在一旁的粟裕也连连称好。

从此以后，陶勇的名字像一把利剑，直刺敌人的心脏，令日伪闻风丧胆。就连国民党编著的名人辞典里，也有一条专门介绍陶勇的条目，把他称为一名勇将。

陶勇之勇，勇在无畏

陶勇是陈毅、粟裕喜爱的一名战将。他们之所以喜爱他，是因为他无私无畏，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刀吓不了他，国民党悬赏几百万大洋买他的头也动摇不了他。

故事之一：掩护李先念突围。1936年深秋，陶勇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他带领本团指战员在西征路上精疲力竭，仍顽强战斗。一天，陶勇接到九军军长的命令：由他带领九军余部插到敌人主力后面，牵制敌人，掩护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主力红军向新疆方向突围。陶勇无所畏惧，斩钉截铁地回答：“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完成任务！”他抱着九死一生的信念，带着部队左冲右突，转战在祁连山区。他们把追赶的敌军兵力引向自己，这里扔几个手榴弹，那里放几枪，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中转来转去，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一个个战士倒下了，幸存的十几个人也疲惫至极。然而，却换来了主力红军得到喘息的机会，在李先念的带领下迅速脱离险境，向新疆方向挺进。

故事之二：郭村保卫战。1940年初，陶勇接到挺进纵队叶飞发来的一个急电，八个字赫然在目：“郭村告急，挺进待援。”陶勇心急如焚：郭村是挺进纵队的驻地，也是新四军的一个重要基地。可是，自己离郭村整整一百公里远，还要通过日伪的几十道封锁，只要一处受阻，就难以到达郭村。解救兄弟部队于危难之中，义不容辞！立刻出发，火速驰援！陶勇当即下令。

夜深人静，身着便装的陶勇率侦察分队飞速前进。他们钻树林，跨沟坎，躲过敌人的探照的，摸黑直闯天扬公路，来到邵伯湖前。湖上浩淼迷蒙，日军巡逻艇不断往来，控制湖面。埋伏在岸边的陶勇，观察日军舰艇的活动规律，很快想出对策。他命令侦察员去找渔民想办法，趁白天打渔时偷出船隐蔽起来，晚上再乘船躲过巡逻的汽艇渡过湖去。

过了湖就是从仙女庙到高邮的公路。此时，天已破晓，敌人的巡逻队穿梭往来，真是插上翅膀也难飞过去。怎么办？队伍里议论纷纷，有的建议晚上再走，安全些；有的认为等待容易出事。陶勇冥思苦想。走，有危险；停，也有危险。然而，时间就是战士的生命，就是胜利的保证。他决定走。陶勇暗忖：日军以为我军多在夜间伏击、偷袭，何不趁他白天麻痹大意、不加防备之机，出其不意，在大白天闯过去！于是，一场十分罕见的“虎口夺路”，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了。陶勇率领着苏皖支队，以锐不可挡之势，跃上公路。

他们子弹上膛，脚步如飞，在日军封锁的公路上奔进。突然，前面出现了一队大摇大摆的日军巡逻队，清一色的三八大盖，在晨光中闪耀着可怖的寒光。发生了什么事？新四军怎么这时出现在公路上？还没等日军醒过神来，陶勇已下令三营长带一个排纠缠住敌人，掩护大部队迅速通过公路。

到了郭村，陶勇没有来得及歇一口气就领受了守卫郭村北面一线的任务。这一带是韩德勤手下张星炳的保三旅进攻地域。陶勇来到阵前，静观眼前战场，只见远处顽军阵地上，几个敌军官偷偷摸摸地东张西望。陶勇轻蔑地一笑，告诉部下：“注意前面的庄稼地，等张星炳这小子靠近了再打！”

果然不出所料，张星炳利用庄稼地作掩护，沿着田埂、小路由北向南地进攻了。

陶勇说：“看我面前这片开阔地，来多少敌人也不够喂机枪的。放心，敌人来了，我摔跤也把他摔出去。”

陶勇异常沉着，放敌人离阵地很近时，才大吼一声：“打！”

战士们将成串的手榴弹扔了出去，轻重火器一起开火。顽军抛下一片尸体，连滚带爬往回窜。

“出击！”陶勇趁对方乱了阵脚果敢下令。官兵们跃出工事，杀声震天。追杀一阵，俘获不少敌人。

从拂晓打到深夜，陶勇指挥部队，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自己阵地稳如磐石，屹立不动。整整两天两夜，陶勇没有眯过一下眼，饭菜无味。这一仗，至少歼敌三个团的兵力。

故事之三：扼守黄桥。奠定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黄桥决战开始了。陈毅对粟裕说：“守备黄桥是个苦差使，吃炮弹挨打不说，伤亡多缴获少，要十分过硬的部队才能担当坚守的重任。这个任务交给谁呢？”

“陶勇。”几乎是不加思索，粟裕脱口而出。

陈毅郑重地点点头，说：“陶勇的部队勇猛顽强，机动灵活，不怕牺牲。有他守卫黄桥，我放心。”

陶勇领受任务后表示：“人在黄桥在，决不让顽军过黄桥！”

两架顽军的飞机掠过黄桥上空。地面上，韩德勤李守维的前锋部队气势汹汹、黑压压地从东北方向扑向黄桥。

晨风阵阵吹来，陶勇和官兵们精神抖擞，严阵以待。

李守维在两架双翼飞机的助威下，直扑我阵地，妄图一鼓作气冲进黄桥。

陶勇全身心投入这场坚守战中。顽军打上来，他下令还击回去；再打上来，再还击回去！

战斗持续了一上午。主攻正面阵地的顽军抛下一片尸体。陶勇亲自给率领八团抗敌的张震东打去了电话：“老张，你那里怎么样？能顶住吗？”

“没问题。”张震东手揩汗水回答：“我正在考虑能不能主动出击一下？”

“行。”

张震东笑了。他见敌人又一次败退下去，大喝一声：“出击！”部队喊着杀声，跃出工事冲去，顽军原以为我军只有招架之势，没有还手之力，一时慌了手脚，一下子被我活捉了五十多人，缴了几十条枪。

韩德勤气坏了，他对李守维咆哮道：“小小黄桥是铜墙铁壁？攻不下黄桥提头见我！”

顽军换了花样，展开人海战术，从宽大的正面压将过来。密集的火力压得八团抬不起头来。陶勇接到一个个告急电话：

七团阵地弹片横飞，难以坚守了……

八团的一个营失利……

陶勇见此情景，心焦如焚。突然，他眼睛一瞪，随即脱去外衣，挥着战刀，大喝一声：“二营，跟我来！”冲向了敌阵。纵队政委见此，激动不已，高叫：“看，陶司令杀出去了！我们要顶住啊！”

战士们士气大振，狠狠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不一会，黄桥东门也告急，陶勇又拎起战刀率领三团，像旋风般杀去，仅二十分钟，就大获全胜，活捉了敌营、连长以下几百俘虏。后面的敌人一见此景，吓得倒退数里。

粟裕亲眼目睹这场血与火的交拼，对陈毅说：“他真是一个拼命三郎啊！”

陶勇之勇，勇在胆略

作为一个指挥员，不仅要无所畏惧，更要有在任何艰难困苦和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处理问题的胆略。

故事之一：单骑赴险地。1940年12月，国民党江苏省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奉韩德勤密令，背信弃义，倾巢围攻掘港。保安一旅詹长佑部也陈兵于掘港以北环镇地区，与徐承德部对我形成前后夹攻之势，形势十分危急。这时，担任三纵队司令员的陶勇，正率领主力三团在三百华里外的海安待命。闻讯后，他一面命令三团星夜驰援，自己则带了几个警卫员，不顾危险，登上汽艇顺流直下，通过敌情复杂的地区，接着又单枪匹马驾着摩托车直赴詹长佑的旅部驻地马塘。车进马塘时，哨兵问：

“谁？哪一部分的？”

“我是陶勇！”

陶勇双眉一挑，大喝一声，加大油门，笛也不鸣就冲进了镇里。

陶勇单骑闯入詹长佑的住所，给詹长佑一个下马威：

“詹旅长，我来了。”

“啊，陶司令？”詹长佑慌了手脚，连连让座。陶勇向詹长佑晓以大义，示以利害，詹长佑被陶勇的胆略所慑服，不得不放弃攻击我军的图谋。我军得以集中兵力，将徐顽第六纵队击溃，并乘胜追击，将其全部歼灭于启东县汇龙镇。

故事之二：“有我在，谁敢往回跑？”鲁南战役打响了。陶勇奉命率部对付敌快速纵队坦克营。陶勇迅速将部队布置开，将坦克营紧紧包围在陈家桥、贾头一带狭小地区内，展开了剥乌龟壳的战斗。

初次与敌坦克作战的指战员们，紧张兴奋地盯住眼前的一个个庞然大物，手里握住各种反坦克武器。

“沉住气，靠近些再打！”陶勇在靠近前沿的阵地上，一边观察敌坦克，一边直沉着指挥。敌坦克越来越近了，三百米、二百米，一百米，当坦克行进到距阵地只有几十米时，陶勇大声喝令：“打！”霎那间，一旅迎头一阵猛烈的攻击，三旅从侧翼扑向敌坦克后面的步兵，切断了敌步兵与坦克的联系。

“不要怕，跟我冲！”陶勇一声命令，部队杀声一片冲了上去。突然，在一条路口，几辆气势汹汹的坦克压过来，冲在前面的战士措手不及，掉头往回跑。这时，陶勇，往路边的一个大石墩上一坐，大吼一声：“有我在，

谁敢往后跑！”

战士们被陶勇的气势所感染了，返身冲向敌坦克，与敌人展开了搏斗。这时，司令部的参谋和警卫人员见坦克射击密集，便围住陶勇，保护他的安全。

“闪开！”陶勇推开人墙，怒吼道：“你们挡住了我的视线，叫我怎么指挥战斗？”

火光映红了陶勇的双眼。“用火烧！”陶勇下令。在阵地前燃起一道道火的屏障，阻挡坦克前进。敌坦克慌了，左冲右突，到处是火的海洋。一些坦克被逼到沼泽地，陷入泥泞之中，只听发动机响，不见坦克动。战士们纷纷冲上去，用火把，用集束手榴弹往坦克里塞，一辆辆坦克从塔顶上举出白旗投降。

故事之三：炮击英舰“紫石英号”。渡江战役即将开始，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黑天鹅”号突然向我阵地开炮，炸死、炸伤我官兵四十多人。

二十三军军长陶勇怒火满腔，当机立断：“听我的命令，坚决还击！”

“军长，恐怕不行！”一位干部急忙上前阻拦，说：“这样打，会不会引起国际纠纷？”

“怎么不行？”陶勇剑眉一挑，措辞严厉：“他们这是侵略！必须坚决还击！出了问题，我来负责！”众人肃然起敬。

“目标，英帝国主义军舰——开炮！”

顷刻间，两艘英舰陷入了人民解放军强大的炮击火网之中。“紫石英号”被我击伤，不得不停泊在江面，为我军俘获（后又偷偷地逃走）。

4月23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严厉谴责了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肯定了二十三军的正义行动。这也是对陶勇维护祖国尊严的英雄胆略的最好表彰。

陶勇之勇，勇在智谋

陶勇不仅无私无畏有胆略，而且足智多谋，他既善打硬仗，又善打巧仗。

故事之一：活捉杜聿明。在解放战争中，陶勇率部出击鲁南，决战淮海，渡长江，攻南京，战上海，他转战南北，屡立奇功，在诸多传奇故事中，淮海战场上活捉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是其中之一。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杜聿明二十多万军队陷入弹尽粮绝之境。华野部署八个纵队严密包围杜聿明集团，以七个纵队在夏邑、永城等地进行战备体整，随时准备歼灭可能突围之敌。陶勇和政委郭化若商量，利用休整时间，开展劝降运动，多抓俘虏。部队奉陶勇命令，将大批传单撒向敌阵。每天晚上，前沿阵地上就转播起毛泽东亲自为中野、华野部队写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组织喊话。

1949年1月6日，陶勇奉命结束休整，准备向拒降的杜聿明发起总攻。杜聿明部队兵败如山倒。陶勇趁敌溃乱之际，指挥部队向敌心脏猛插，迅速攻克罗庄、李庄，俘敌3000多人。

杜聿明、邱清泉逃到陈庄五军军部。陶勇又率部迅速攻占陈庄。杜聿明等落荒而逃。四纵一下子缴获汽车数百辆，火炮、坦克一部，俘敌万余人。

杜聿明化装成士兵，狼狈逃窜，正好窜到陶勇的司令部附近，一下子被陶勇的部下逮住了。在检查的时候，陶勇发觉他的士兵服里面穿了一件茄克衫，所有的口袋里装满了美国香烟。陶勇心想：“普通士兵决不会有那么多的美国烟！”便亲自审问。经过一番攻心战，陶勇终于弄清了这个“士兵”

的真实身分，将杜聿明这个国民党将军捉拿归案。

故事之二：智降海匪孙二虎。从长江口到连云港一带海面，过去是海匪窝。海匪有船，有武器。他们不仅能下海，还能在颠簸的海上准确射击。他们常常登陆抢劫，为非作歹，当地渔民称其为“海巴子”。这些海巴子自清朝以来就没有被人征服过。海巴子中势力最强的要数环港的孙二虎了。孙二虎出生于一个贫苦渔家。他8岁就跟父亲出海打渔。练就了一身航船的好本领。17岁当上了船老大，把黄海上的港港湾湾、明沙暗礁摸了个透熟。后来又拉队伍标旗立杆，划水为王。

海防团成立后，陶勇对当地渔民反映比较大的海巴子作了一些调查，了解到这些海巴子虽然为匪，但大多出于生活所逼，对他们不能用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而应以智慧和他们斗智斗勇，将他们感化过来，以扩大海上抗日阵营。1942年春的一天，陶勇听渔会会长报告，孙二虎带领几个海巴子上岸了，向渔会要粮食，已被他们稳住在龙王庙里。陶勇立即派人包围了龙王庙，经过一番拼杀，将孙二虎等六个海匪全部俘获。

“快把孙二虎单独带来见我。”陶勇兴奋地命令道，“我要亲自做他的工作。”

孙二虎被五花大绑地带进了司令部，一进门，他就圆瞪双眼，大声叫嚷：“要杀就杀，无需多言。”

“好一条江湖上的硬汉！”陶勇迎上前，亲自为孙二虎松绑。并像拉家常地问道：“听说你是船老大出身，从小也是打渔的，是吗？”

孙二虎点了点头。陶勇见有了反应，语调激昂起来，“可你——想过没有？当今中国，国难当头，内外战乱，民不聊生；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去打日本、打顽军，却在海上欺负老百姓，你，良心何在？”

孙二虎面红耳赤，低下头去。

“你也是个苦出身。”陶勇语重心长道：“该是悬崖勒马，改邪归正的时候了！只有投奔新四军一同走抗日的道路，才是你唯一光明的前途。”

一番话，触动了孙二虎的心。他见陶勇如此豪爽、诚挚，目光中的敌意消失了，心上沉重的冰块融化了。他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迟疑地张口问：“你，不杀我？”

“哈哈！”陶勇爽朗大笑：“不杀，我还要放你回去！”孙二虎目不转睛地看着陶勇，猛然双膝跪地：“谢谢司令不杀之恩，今后一定报效！”陶勇扶起孙二虎说：“请你回去考虑一下，设法说服部下弃暗投明。”

孙二虎毫不迟疑，满口答应：“陶司令，只要你放我回去，我一定说服同伙吴道生一同参加新四军。明天午后，请陶司令亲赴我驻地环港谈判，共商收编大事。”

陶勇随即叫人把驳壳枪退还孙二虎，见他枪里没有子弹，又把两匣子黄澄澄的子弹放进他的口袋。孙二虎连连称谢而去。

听说陶勇要下海谈判，地委领导都极不放心，认为这比当初骑摩托车闯马塘更担风险，但见陶勇决心已定，就提出派一个连护送。

陶勇认为斗争功夫还在舌头上，力量在于党的政策，去一个连保护不解决问题，他毅然决定“单刀赴会”。

环港海边，桅杆林立。十多条大小船静候在海边，一百多名海匪手持大刀，杀气腾腾地站在各个船甲板上。陶勇在朱坚和石林的陪同下，威风凛凛地走去。

“啊！陶司令，来啦！”从指挥船迎下海匪头目孙二虎。他一身青衣裤，腰缠红腰带，一左一右别着两把盒子枪，赶上前来打招呼。众海匪见陶勇果真来赴约，不免有点震惊。

陶勇落落大方，坐在孙二虎特意备下的海味宴席前，对着面前一大搪瓷碗烧酒，微微一笑道：“怎么，今番你们是要把我灌醉了？”

“听说陶司令海量。”孙二虎忙不迭回答，“你喝下这杯酒，说明是看得起我们，众兄弟也心甘情愿地跟司令走。”

“好吧！”陶勇不慌不忙端起酒碗，咕嘟嘟一口气灌进肚里。喝罢，他将碗一放，对众海匪道：“我这次是来和你们谈判，共商收编大事。想必诸位都看到，日寇入侵，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妄图消灭我中国，毁我河山。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岂能袖手旁观，等闲视之！”陶勇顿了一顿，犀利的目光环视着几个海匪头目，直言相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你们徒有堂堂七尺之躯，枉为江海绿林好汉，不仅毫不顾及民族利益，反而横行霸道，危及百姓，你们的路是不是走错了？”

海匪们张口结舌，面面相觑。陶勇有意放开嗓门继续宣讲抗日政策：“为匪作盗是可耻的。当今抗日烽火燃遍各地，你们只有掉转枪口对准日伪汉奸，才会无愧于后代子孙。”

“我，我是真心诚意参加新四军的。”孙二虎连忙表态。后来，孙二虎先后被任命为新四军海防团独立营营长、团长，成为新四军里的一名干将。

（崔向华、陈大鹏）

一天行军二百四，杨成武飞兵夺泸定

1935年5月28日，一个阴沉沉的黎明。红四团在野竹林稍事宿营休息后，正准备继续向泸定桥前进，红一军团的骑兵通信员记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交给团政治委员杨成武。他刚打开电报，两道浓眉就锁到一起：因敌情紧迫，军委命令红四团提前一天完成强行320里夺取泸定桥的任务。他什么话没说，急忙把电报递给团长黄开湘。

黄开湘迅速看完电报，马上打开地图，计算宿营地和泸定桥的距离。

“从地图上标的里程看，我们昨天走了80里，到泸定桥还有240里！”杨成武说。

“今天是28日，明天就是29日，必须赶到泸定桥！”黄开湘收拾起地图。

“两天的路程要一天走完，也许还要打几场恶仗。”

“一天要走240里，真是个大难题啊！”

是啊，原定三天时间，已经十分困难了，谁也没有料到，任务突然变得如此急迫。

几天前，刘伯承、聂荣臻率中央先遣队抵达大渡河畔的安顺场，红一团的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占领渡口，但是只找到三条小船。

毛泽东到达安顺场后算了一笔帐，三条小船每次只渡几十人，一天只能渡千余人，要把红军渡过去，最少也需要二十天。而蒋介石正急令十几万大军向安顺场疾进，最近的杨森、刘文辉部只有四五天的行程，薛岳、周浑元、吴奇伟部也不过六七天的行程。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来到营盘山下，这是当年石达开的太平军最后覆灭的地方。

毛泽东从衣兜里掏出两张蒋介石派飞机投下的传单，上面印着特号黑字：

大渡河是共军的覆灭之地！

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

毛泽东迈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地踱了一圈又一圈：“我们必须分兵渡河！不分兵，无法减轻安顺场的压力，无法摆脱失败。刘伯承、聂荣臻率一师、军委干部团从安顺场渡河，沿河东岸北上；杨成武率四团沿河西岸北进，夺取泸定桥。中央纵队和一、三、五、九军团全部从泸定桥过大渡河，以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

片刻沉默之后，朱德说：“这是一着险棋，如果夺桥失利，我们仅剩的两万多红军，以后很难再聚到一起，有被分而歼之的危险。”

“据情报反映，蒋介石在泸定已有准备，而且我们没有确切的消息，证明那座桥还在不在。”周恩来说。

少顷，毛泽东略带诙谐他说：“看来我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了，希望他把我们当成石达开，是石头——没有头脑，死抓住安顺场不放，忽略泸定桥；蒋介石自己呢，是石脚——拖着一双走不快的腿，怎么会在我们之前到达泸定桥呢？”

深夜，杨成武接到一份军委急电，命令他立即赶到毛泽东处接受任务。他扬鞭策马飞奔二三十里，满头大汗赶到毛泽东住处，一边敬礼一边急切他说：“主席，有什么任务，你下命令吧！”

毛泽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成武啊，你赶得很快嘛！噢，先别急，肚子饿了吧，咱们边吃边谈。”他坐下来，拿起一个煮土豆，就着炸辣椒吃起来。

杨成武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肚子咕咕地叫起来，笑了笑，也拿起土豆……

警卫员看到毛泽东终于吃饭了，高兴地走过来说：“杨政委，你要早来就好了，从昨天到现在，主席一口饭没有吃……”

杨成武放下手中的土豆，霍地站起来，重复了他刚进门时说的那句话。

“你先看看电报。”毛泽东把电文递给杨成武。点燃一支香烟。

“主席，这么说，我们很难在敌人包围之前渡过大渡河……”杨成武愣住了。

“这就是我找你来的目的。军委已经决定，兵分两路，北上夺取泸定桥，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四团，陈士榘的教导营，一军团炮兵营、通信营配属你们行动。”

毛泽东掏出怀表看了看：“现在是27日晨4时，两小时后你们出发，全程320里，沿岸刘文辉还布防着两个团，限你团三天，也就是30日晨6时赶到，下午6时前，夺取泸定桥，做好迎接主力过桥的准备。”

“主席，”杨成武信心十足他说，“我代表红四团向军委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现在情况又有了变化，三天任务要两天完成，一天一夜要赶240里，这是一个多大的难题啊！

杨成武收起电报，对黄开湘说：“时间紧迫，只有先出发，召开‘飞行动员会’了。”

“命令全团跑步前进！各营营长、教导员随指挥所前进，准备召开紧急会议。”黄开湘坚决、果断他说。

28日6时，红四团从野竹林出发了。

这不是普通的240里路。这里的路，有的是绝壁上凿出的栈道，有的是难以攀登的石梯，有的是蜿蜒缠绕、忽起忽伏的峡谷小径，有的一边是峭壁陡崖，一边是恶浪翻滚的河谷。这里的山，山下绿意融融，山腰以上却堆满银光耀眼的积雪，寒气逼人。这里的河，汹涌澎湃，像一条条白练，盘桓在数十丈深的峡谷，闪着寒光，翻着白浪，喷着迷雾，令人心惊目眩！

崎岖的山路上，红军在飞速前进。

政治处主任罗华生带着宣传队，站在高坡上，他们有的喊口号，有的说快板，战士们也跟着喊起来：

“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光荣任务！”

“飞奔240里，夺取泸定桥！”

为了快速前进，红四团边行军，边举行“飞行集会”。一簇簇、一群群的战士，由干部、共产党员召集在一起，只用几分钟的时间，明确任务的紧迫性及困难，研究完成任务的措施，相互鼓励，开展竞赛。

8时许，队伍来到猛虎岗南麓。这是一座上下三四十里的高山，右傍大渡河，左倚更高的山峰，山腰以上白雪皑皑，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越山而过，山顶的隘口驻有敌军一个营。

此时，浓雾弥漫，四野茫茫一片，几步之外什么也看不清楚。侦察小组跑回来报告说，山上的敌人还在睡大觉。

“好，悄悄摸上去，打它一个猝不及防！”杨成武说。

“对！王友才，你带三连摸上去，给敌人来个突然袭击！打响后，全团冲锋前进！”黄开湘立即下令。

三连的战士们低姿缓慢地前进着，浓雾渐渐地遮住了他们的身影。

全团战士卧伏在山坡上，默默地等待着。杨成武和黄开湘瞪大两眼，死死地盯住前方。

“轰隆！”期待的声音终于响了，接着手榴弹的爆炸声连成一

早已站成一排的司号员立即吹响冲锋号。红军战士呼喊声，排山倒海般向前涌去，像洪水翻滚，像暴雨席卷，像猛虎过岗……一营冲上山顶，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接着，二营、三营、教导营都冲上山，声势更加浩大。敌人溃退了。红四团勇猛地冲过隘口，向山下追击前进。

战士们一口气追到另一座大山脚下。山边有一个村庄，叫摩西面。村子里驻着敌人一个团部和一个营。山上敌人的溃逃，红军追击的气势，使村子里的敌人成了惊弓之鸟，也昏头昏脑地跟着逃跑。先锋连三连在王友才带领下，一直追到村北，被迫在一条数十米宽的无名河边停下来。

敌人逃跑时，炸毁了河上的木桥，桥板也被河水冲走，只有几根桥桩还立在那里。

王友才立即组成几个小组，有的摸水情，有的寻找新的渡河地点，有的找村民借木料、门板，准备架桥。

10多分钟后，杨成武随先头营来到河边，听了王友才的汇报，果断决定，立即架桥。

在无名河上的架桥作业开始了。河面虽不很宽，水却很深，流速又急，稍不留意，人和木料就有被冲走的危险，作业十分困难。

“政委，我有个主意。多下来些人，三人一组，一人架桥，两人保护，这样动作又快，又安全。”王友才说。

“太好了！”杨成武向一营的战士们喊：“水性好的都下来，两个人保护一个人架桥，防止被激流冲走，加快架桥速度！”

一声令下，一百多名战士纷纷跳入水中，向三连的指战员游去。

“轰隆，轰隆！”几发迫击炮弹在水中爆炸，掀起十几丈高的水柱。

“同志们！”杨成武抹了一把满脸的水珠，喊：“莫怕敌人打炮，我们一定要把桥架通！”

15时许，临时木桥架通了。红四团的部队也陆续到齐。跨过无名河，战士们继续前进。

铅灰色的天空翻滚着乌云，阴冷刺骨的山风吹着被雪水浸湿的军衣，似乎比冬季的严寒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战士们只能靠跑步散发的热量来驱除逼人的寒气。

杨成武忍着伤痛，带领着先头营前进，头脑里不停地盘算着两个数字：时间与里程。已经过去10个小时了，只前进了80多里，照这种速度，怎么能按时赶到泸定桥？他催促部队加快前进速度。

战士们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在大渡河畔一个只有一二十户的小村边，渐渐放慢了脚步。

杨成武打开地图，查看了一下，说：“从这里到泸定桥有110里，时间只剩下不到11个小时了。”

“而且都是夜路啦！”黄开湘说。

天色渐渐黑下来，山路也更加崎岖不平。忽然，远处投来闪电的蓝光，

只有在这瞬间，才能稍稍分辨出道路。战士们艰难地行进着，有的摔倒了，有的跌滚到坡下。马队远远地落在后边，有的牲口无论驭手怎么用力拉，使劲推，都不肯向前挪动脚步，有的索性卧倒在路上，拽也拽不起来。

这样下去怎么能按时赶到泸定桥呢？指挥员们都在发愁。在微弱的手电筒亮光下，杨成武发出宏亮有力的声音：“同志们，军委把我们红四团看作是一只虎，一只猛虎，才把这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的，我们不能辜负毛主席和军委的期望。”

杨成武再一次用军委急电的内容激励大家，他几乎一字不差地背出电报的原文：“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胜利！”

“同志们，越是最艰苦的时候，越要发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要发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精神……要让每一个战士知道，我们的行动关系着红军和国民党军斗争的胜负，关系着两万多红军的命运！也许我们每向前迈进一步，或早到一分钟，就意味着有几个、几十个战友获得生存的机会！就多一分战胜敌人的希望！”

讲着讲着，杨成武的声音更加激动：“告诉战士们，不能忘记太平军用鲜血写下的历史，我们不能失败，我们一定要争取胜利！”

指挥员们离开那微弱的手电筒光亮，回到各连的战士们中间。很快，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战士们有的喊鼓动口号，有的帮助别人扛枪，有的拉着后面战友的手，有的肩扛、手推着马匹前进……前进的速度又加快了。

“火，火把！”突然有人惊叫起来。

大家的目光同时移向对岸，果然是红彤彤的火把，一支、两支、三支……越来越多，好像是从山谷里走出来的。顷刻之间，连绵不断的火把形成一条长长的火龙，蜿蜒在沟谷、高坡、山梁，缓缓地向前移动。

“准是增援泸定桥的敌人！”黄开湘说。

“太好了！”杨成武兴奋他说：“我们也点起火把，可以加快前进的速度！”

“敌人会发现我们的！”黄开湘有些犹豫。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装作敌人嘛！”杨成武说。

于是，红四团用银元买下附近一个村庄的全部竹篱笆，缠上烂棉花、破布条，浸上大麻油、煤油，点燃了。群山峻岭之中，又有一条火龙在奔腾。几分钟后，对岸传来清晰的军号声。

司号长报告说：“敌人向我们发问了。”

杨成武问俘虏来的号兵，“吹的什么号？”

俘虏来的号兵说：“问啥子部队？”

“吹号回答你们54团的番号。”杨成武命令道。

号声响了。对岸的敌人相信了。两支敌对的部队都点着火把隔河并行，去抢夺同一座桥，眼下却相安无事。走着走着，大渡河越来越窄，两条火龙靠得越来越近，有时可以听见对岸的说话“啥子任务啊？”四川籍的敌人问。

俘虏来的号兵也用四川腔回答：“增援泸定桥。”“问他们啥子任务。”杨成武说。

俘虏号兵问了。

对岸回答：“一个球样哟！”

两岸静了下来，两条火龙在游动。大约并行了30里路，对岸的火把慢慢地聚集在一起，变得稀少了。

“吹号问他们在干什么？”杨成武对俘虏来的号兵说。几分钟后，对岸响起了号声。俘虏号兵说：“他们宿营了。”“看来，敌人熬不住喽！”黄开湘说。

杨成武借着火把的光亮看了看怀表，大声说：“同志们，敌人宿营了，我们加把劲，赶在敌人到达之前，夺下泸定桥！”“跑步前进！”黄开湘大手一挥。

火把在跳跃，火龙在奔腾。

突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暴风雨袭来了。对于赶路的红军战士，暴风雨似乎比一场战斗更讨厌，更可恶。山路变得更滑，更难走，有的火把被雨水浇灭，什么也看不清了。将近两天两夜，战士们只睡了两三个小时，都十分困乏。有的边走边打盹；有的站着就睡着了；有的摔倒了，爬起来接着睡；有的跌倒在路上也没有醒，绊倒后面的战士……有两个炊事员连人带锅挑子一起滚到坡下，怎么也上不来，他们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长廖大珠只好解下绑腿，叫他们系在身上，几个战士用力把他们拉上来。

杨成武一跛一拐地走到这里，见到这情景，心想，何不把绑腿利用起来？便对廖大珠说：“让大家把绑腿接起来，拉着绑腿走。”

廖大珠拍了一下脑袋：“快，解绑腿，系起来。”

战士们拉着绑腿，东倒西歪、一脚深一脚浅地前进着。绑腿标定了行走的路线和方向，就是闭着眼睛，也离不了大谱，掉进大渡河的危险小多了，只是前进的速度越来越慢。

慢下来的还不仅仅是脚步，战士们头脑的运转似乎也迟缓了，思维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好像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字：走！

杨成武边走边靠近黄开湘，扯了扯他的衣袖，低声说：“照这样的速度，恐怕到时赶不到！”

“我估计，每小时只有七八里路。”黄开湘压低嗓音说：“部队30多个小时没吃饭，再走，恐怕顶不住啦。已经昏倒好几个了。”

“可是，这雨里怎么做饭呢？再说也没有时间呀！”杨成武为难他说。

“6点以前，怕是赶不到了。”

杨成武摸了摸米袋子，说：“我看不如每人吃几把生米、生面，喝点雨水。一定要告诉大家，6点以前赶到泸定桥，这是命令！”

于是，杨成武站到路边，解开米袋子，倒出一把米来，喊道：“同志们，为了补充体力，我命令大家每人吃几把生米、生面。同志们，吃呀，就这样吃！”说着，他一仰脖子，把手里的米倒进嘴里，大口地咀嚼着，还不时仰起头，张开嘴接着雨水。

“吃呀，就这样吃！”杨成武一边喊，一边不停地示范。战士们也边走边解开米袋子，倒出白米、玉米面、青稞粉，一把一把地填在嘴里，狠命地咀嚼着，不时地仰起头，喝几口雨水。

“嘿，还真管用，真的不饿啦！”有的战士说。

“这脚底下，也觉得有劲多了！”

29日凌晨4时，已经走了210里。还有30里，时间只剩2个小时了。

杨成武看看怀表，凑近黄开湘说：“速度是快了，恐怕时间还是不够。”命令下达了，部队彻底轻装，随身只携带武器、弹药、电台等通信器材，其余的被装、粮食、工具、炊具等一律扔掉。他们扔掉了所能扔掉的一切！

战士们在飞奔，红四团在前进！是信念鼓舞着他们飞奔，是意志驱使着他们前进！

黎明前的黑暗，是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刻。然而，战士们似乎已经不需要借助光亮照路，不需要看着道路前进。没有人再打吨，没有人再跌倒，没有人再需要帮助，甚至没有人再说一句话……无论他们是什么队形、什么姿势、什么表情……他们都在飞奔，都在前进！

不知道什么时候，火把不见了，大雨停止了，东方的远山上升起了桔红色的彩霞。

尖刀班的战士跑回来报告：“绕过山脚，就是泸定桥！”

“泸定桥还在吗？”杨成武急切地问。

“在，还在！”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做好战斗准备。”

“咱们是不是趁热打铁，先把桥西的敌人端掉？”黄开湘征求杨成武的意见。

“好，先摸掉哨兵，隐蔽进村，分片包围，各个歼灭！”杨成武转向二营长曾庆林说：“你们营负责解决桥西的敌人，要快！”

泸定桥啊，泸定桥，到底是怎样的一座桥啊！

十三根光溜溜的粗大铁链构成一座微呈弧形的桥，高悬于峡谷之中，下面就是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桥的每根铁链长八十余丈，九根作为桥面，宽八尺，四根作为护栏。据当地群众说，桥面上原来铺有木板，已被守桥的敌人连夜拆掉了，全部堆放在东桥头。

铁索桥的两端筑有桥楼。隔河瞭望，东桥楼上，敌人用沙袋垒起一座坚固的桥头堡，黑洞洞的射孔里露出了枪口。桥楼后面紧连着依山而建的泸定城。敌人沿城墙筑有几座碉堡，密布的射孔可以形成多层次的交叉火力，以封锁住桥头、桥面和对岸。

看来，这将是一场十分艰难、激烈的战斗！

桥西的敌人在睡梦中被全歼。但桥东的敌人依仗天堑仍十分骄狂，不时地向西岸放冷枪、冷炮。有时还能隐约地听到他们狂妄的叫喊声：

“你们飞过来吧！”

“有种的过来呀！”

战士们听到敌人的挑衅，把牙咬得格格响，纷纷写请战书和血书，掀起“争当突击手，飞夺泸定桥”的请战热潮。

全团连以上干部大会决定：由二连挑选 22 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夺桥突击队”，廖大珠任队长，刘金山任指导员；由三连组成“铺桥突击队”，王友才任队长，由曾庆林统一指挥全团百余挺轻重机枪，掩护夺桥和铺桥行动；由赵章成率炮兵营，消灭敌人炮兵阵地和主要火力点；由陈士桀率教导营阻击打箭泸、康定方向的援敌。下午 4 时发起总攻。

西桥楼后面，二连、三连整齐地列队两旁。二十二名勇士，每人肩上斜挂一支驳壳枪，背上插着一把大片刀，刀把上垂着长长的红绸子，手里提着一支冲锋枪，腰间缠满了子弹和手榴弹，精神抖擞地肃立在那里。

“请廖大珠、刘金山接旗！”杨成武宣布。

两个人跑上前去，接过一面鲜红的旗帜。杨成武说：“你们肩负着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交给红四团的重任，祝你们成功！”

廖大珠表示：“我们决不辜负团首长和全团指战员的期望，坚决夺下泸定桥！”

突击队员们严阵以待，机枪射手们静称地伏在阵地上；四门迫击炮架在桥头，炮口直指对岸；20多名司号员站立在桥楼旁，号把上的红绸子迎风飘摆；指挥员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怀表。4时整。“开始！”黄开湘下达了夺桥战斗的命令。

顿时，军号声、机枪射击声响成一片，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对岸的桥头堡和碉堡上，“噗噗”地冒出烟雾，千余名战士同时高喊：“杀——！杀——！”

廖大珠的眼睛里射出异样的光，他回过头用低沉而有力声音喊道：“上！”

二十二名勇士像离弦的箭飞向铁索桥，攀爬在铁链上前进。在突击队队旗引导下，刀把上的红绸子像一簇簇火焰；对岸射来的子弹，呼啸着从勇士们身边飞过，打在铁索链上，发出声响溅出火花；勇士们的冲锋枪不停地扫射着，子弹飞向敌阵。

杨成武、黄开湘神色紧张地观察着突击队员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的每一个细小动作，都牵动着两位指挥员的心。

一个突击队员的身体突然向下一沉，杨成武倒吸了一口凉气，不由自主地喊：“坚持住，坚持住！”

话音未落，这个突击队员的身体已离开了铁索，掉下了河谷。

突然，爬在最前头的一名突击队员胸部中弹，趴在铁索链上不动了。少顷，他用尽全身的气力，继续向前缓缓地移动……在他侧后的刘金山喊着：“坚持住，坚持住！”

然而，他的伤势过重，没有能够冲过去，又掉下了桥……黄开湘、杨成武不停地下达着命令：

“赵章成，把左侧的重机枪碉堡掀掉！”

“一机连集中火力封锁桥头堡！”突击队员们冲在前面，负责铺桥的战士们扛起木板、门扇，冲上铁索桥，铺设桥板。他们的行动，很快引起敌人的注意，子弹呼啸着向他们飞来。战士们不顾一切，一批又一批冲上铁索桥，铺设桥板，桥面不断地向前延伸着。

“火，敌人放火了！”有人惊叫。

只见东桥头堆放的桥板被敌人浇上煤油点燃，烧起熊熊烈火。顿时，火光冲天，使东桥头升起一道烈火的屏障，封住了突击队员们前进的通道。

杨成武急了，翻身跃出指挥所，冲到桥头，高声喊：“同志们，莫怕火，冲过去就是胜利！冲呀，冲呀！”

廖大珠第一个冲进火海，紧接着，一个又一个队员冲出火海。除了从铁索上掉下去的四名突击队员，其余十八名都登上东桥头。敌人惊呆了，掉头逃窜。勇士们追杀过去，冲向了泸定城。

当桔红色的夕阳照耀着大渡河峡谷时，铁索上已经铺满桥板。一队队红军战士举着红旗，快速冲过泸定桥，冲进泸定城。

30日凌晨，一弯残月镶嵌在湛蓝的天空，杨成武和黄开湘在桥头迎来了刘伯承、聂荣臻。站在泸定桥上，刘伯承感慨万千：“泸定桥，泸定桥，我

们为你化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终于胜利了。”

“是啊，我们胜利了！”聂荣臻也十分激动。

“应该在这里竖一块碑，记下我们战士的不朽功勋！”刘伯承又说。

6月1日，他们又在泸定桥头迎来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

“主席，总司令，周副主席，请过桥吧！”刘伯承说。

大家一起走上泸定桥，站在桥中央，毛泽东说：“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人，是工农红军，不是石达开，不是太平军！”

说着又缓缓地脱下军帽，朱德、周恩来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脱下军帽，朝着大渡河水奔腾而去的方向，为在夺桥战斗中牺牲的烈士致哀。

6月2日，在泸定桥头，军委召开庆功大会，为红四团颁发了写有“奖给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的绵旗，还给二十二勇士以及杨成武、黄开湘等发了奖，奖品有写着“中革军委奖”的列宁服、钢笔、日记本、搪瓷碗、筷子。杨成武称之为“最高的奖赏”，并把那套列宁服保存至今。

（张子申）

打通抗日路线，红军渡河东征

毛主席数语释重负

一九三五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同年十二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东征。

次年二月十五日，贺晋年率八十一师向黄河边进发，到达清涧县袁家沟。

部队刚安顿好，毛主席便派人来，让师领导到他那里去一下。除师长贺晋年外，同行的还有政委张明先、参谋长李寿轩、政治部主任李宗贵和特派员覃应机。

袁家沟位于清涧县城东五十公里处，坐落在两山之间的峡谷深沟里。毛主席是二月初带一部电台和少量警卫人员离开延安到这个小山村的。这里离黄河很近，仅有十五公里。

警卫人员把贺晋年一行引到毛主席住的地方，这是一孔砖砌的窑洞。推门进去，只见炕上摆的、墙上挂的全是军用地图。炕上一张破旧的小桌上，除了一些书籍、文件外，有一支毛笔，一个墨盒。毛主席的铺盖是两床薄薄的被子，非常简单。

毛主席身披一件蓝布棉大衣在炕上蹲着，正俯身研究地图。听见有人进门，他抬起头，微笑着说：啊！你们来啦，坐下来谈。他边说边下了炕，光着脚踩在一双旧棉鞋上。

大家落座后，毛主席点燃一支纸烟，深深吸了一口，便问道：哪一位是贺师长啊？

第一次和毛主席面对面地直接谈话，贺晋年不免有些紧张，听到毛主席发问，他慌忙站起来答道：报告主席，我就是。

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似乎他已经猜出了贺晋年的身份，之所以要问，只不过是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判断力罢了。他轻轻摆了摆手，示意贺晋年坐下，又操着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缓缓而言：我晓得你这个人，在瓦窑堡还见到你写的好几封信呢！怎么，不想在军队里搞了是不是？

贺晋年没有想到，毛主席一下便提到了写信的事。那还是中央到陕北后不久，贺晋年听说十五军团要将他从八十一师师长的位置上调到七十五师任副师长，大为不解。认为自己一没有犯错误，二没有打败仗，为何降职使用？当时贺晋年年轻气盛，又加上错误路线搞“肃反”，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弄得人人自危，他心情不舒畅，便给陕甘晋省委写了几封信，反映了自己的想法，并负气要求离开军队，到地方去工作。这些信怎么毛主席也看了呢？后来才知道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把信送到毛主席那里的。

贺晋年一时语塞，刚想解释一下。毛主席却话锋一转说：今天不谈这个事了。东征你还是要去，在八十一师当你的师长，由总部直接指挥。

接着，毛主席讲起了东征。他告诉几位师领导，东征是为把全国抗日推向高潮。同时可以壮大红军力量筹粮筹款，扩大革命根据地。毛主席讲话深入浅出，风趣生动，几个人都听得入了迷。毛主席还详细地询问了八十一师的情况，并谈了一些勉励的话。

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贺晋年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刚才听警卫人员说，这些日子毛主席很忙，批阅文电、召集会议、起草命令，还找每个师的主要

领导一一谈话，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彻夜不眠。大战在即，有这么大的大事需要谋划，而他却把自己的这几封信挂在心上。毛主席亲自做思想工作，短短几句话释去了贺晋年心头的重负，使这个当年不满二十六岁的红军师长受到莫大的教育和鼓舞。

强渡黄河向敌纵深进攻

在渡河前的短暂时间里，部队一直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贺晋年带领团营的主要负责同志到黄河边进行了实地勘察，还看了几个渡口。黄河上游一般的渡口均属乱石河，或宽或狭，河岸曲折，岸陡流急，滚滚的河水夹杂着大量的泥沙奔腾而下，有一股不可阻挡的气势。对岸乱石丛中，阎军构筑的碉堡暗堡隐约可见。各地堡间又以交通壕相连接。敌人还将河边山崖地坝削成陡壁，关闭了渡口并把船只拉到东岸停泊。

当时由周恩来全面负责东渡黄河的后勤准备工作。阎红彦和毛泽民抓具体工作的落实。他们组织起水手工会，日夜赶造船只和羊皮筏子，建立兵站筹集各种物资。

渡黄河前，部队隐蔽集结在黄河西岸沟口附近。行动一律在夜晚进行，对大的居民点，一律绕道通过。所以，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调动，阎锡山竟一无所知，被我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部队二月二十日二十时开始渡河。毛主席决定，以聂荣臻同志的表为准。后来聂帅还风趣他说：想不到我的一只旧表竟成了东征的标准时间表了。

八十一师原定渡河点是老鸦关，后由于敌防御加强，奉毛主席指示，二四一团跟随总部在十五军团之后，从清涧河口强渡，贺晋年率师部及二四三团随一军团从绥德沟口强渡。

阎军虽然在黄河东岸险要处修筑了工事，并抽调了主力四个旅加一个团负责河防。但毕竟点多线长，挡不住红军排山倒海般的攻击，我军强渡成功。但我军也付出了代价，七十五师参谋长毕士悌在石楼贺家凹战斗中牺牲。

贺晋年踏上河东岸的土地时，天已经大亮了。总部的一位参谋引他来到河边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在一间普通的民房里，贺晋年见到了毛主席、彭德怀总司令等人。

彭总的脸上没有笑容，两眼布满了血丝，手指着地图简明扼要地向贺晋年交代了任务：沿突破口向两边撕开，肃清残敌，扩大战果，保障后继部队安全过河。

依着贺晋年的性子，他想带着部队向纵深发展。但在彭总面前，他不敢争辩。

贺晋年接受任务后，站在一处制高点上，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只见近处的几个碉堡已是一堆残砖乱石，几截梁木冒着黑烟，守敌的尸体横七竖八。远处的枪声仍很稠密。很明显，我军先头部队渡过黄河并向敌纵深发展。突破口两边的敌人调整部署，组织反击，妄图堵住口子，切断我军退路。

此种景象使贺晋年为彭总的决定所折服，他当机立断，命令二四一团向北，二四三团向南，全力卷击。全师指战员英勇战斗，一举扫平约四十公里敌碉堡群，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尔后迅速收拢部队，向石楼开进。

石楼守敌为温玉如旅四一三团（团长邢家骧），团部辖步兵一个营和机、炮各一排。见我军人多势众，敌军紧闭城门，不敢应战。我军亦不愿在此纠

缠，从石楼以北继续东进。

悲壮惨烈的兑九峪战斗

我东征大军突破敌黄河防线后，阎锡山这个山西土皇帝慌了手脚。尽管他不想让蒋介石染指山西，但此时却不得不向蒋告急求援。另外又慌忙调兵遣将，分别由中阳、汾阳、介休、隰县等地向我军发起反击。

三月初，我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继续东进至兑九峪一线。总部随十五军团到达了孝义城西南的大麦郊，越过了同蒲路。

为了扫除东进障碍，粉碎敌之阻拦和围攻，总部首长决定：以一部兵力在石楼、关上村牵制敌之第一、第四纵队，集中主力歼灭兑九峪地区敌之第二、第三纵队。令一军团由北向南攻击眼头村之敌，十五军团之七十五师、七十八师由南向北攻击仲家山之敌，八十一师由西向东攻击淋淋洼之敌。实际上是对兑九峪之敌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整个布阵犹如一个口袋，而八十一师恰恰在这个口袋底上，位置是相当重要的。

看过地形后，贺晋年二话没说。他不怕打硬仗，相反，他打仗专拣硬骨头啃。就在几个月前的劳山伏击战中，八十一师执行阻敌打援任务，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先后伤亡了七、八个营连干部，但贺晋年率领部队没有退缩，他不顾个人安危，爬到离敌人前沿阵地只有十几米的地方指挥战斗，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次东征前，上级又派来了李寿轩、张树才、谭冠三，方国安、罗元炘、林忠照等长征干部来充实师团领导力量。贺晋年对自己的部队充满信心。

三月十日清晨，战斗打响了。一开始就异常激烈，枪声、炮声响成一片。仗着山西有兵工厂，阎军对弹药是不吝惜的。特别是阎锡山为了山地作战专门制造的手雷，装药比一般手榴弹多，声音响，杀伤力强。随着爆炸声，大地在颤动，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气味。

兑九峪位于吕梁山南端，山高一千余公尺，遍山是深不见底的雨裂沟，地势险要，易守不易攻，这显然是一场恶战。

淋淋洼由两个制高点组成，成东西向一字排开。八十一师的分工是：二四一团打东面的山头，二四三团打西面的山头。贺晋年带师部随二四一团行动。

阎军士兵配有工兵锹或十字镐，修筑野战工事十分在行，善于打防御战斗。

阎军装备有山炮，阎锡山曾自诩其炮兵是国内无敌的。由于交战双方距离很近，山炮标尺均在千米以下，对我军的威胁很大。

我军装备较差，火力较弱，压制不住敌人的炮火。山上又是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树木遮掩，部队的行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造成伤亡比较大。

这样一直僵持到中午时分，贺晋年在师指挥所里，透过浓密的枪炮声，依稀听到阵阵嗡嗡声，他抬头一看，只见阎锡山的几架飞机也从太原飞来助战。

由于我军没有防空武器，很多战士也没有见过飞机，因此阎军的飞机放肆地轮番低空轰炸。五十磅一枚的炸弹不断落在我军的阵地上，给我军的进攻增添了新的困难。

望着不断增加的伤员，贺晋年的心里焦急万分，这是在和敌人拼消耗啊！突然，又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设在与兑九峪仅一沟之隔的郭家掌我总部指挥所被敌发现。阎军一部从二四三团左翼顺山沟向毛主席和彭总所在地进袭。

贺晋年在二四一团阵地上看到此种情景，急得眼睛都要冒出火来。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二四三团果断地撤下主力，向郭家掌机动，同时向偷袭之敌反击。双方激烈交战两小时，二四三团打退了偷袭之敌，将敌压回淋淋洼，并乘胜一举攻下了西山头。

战后，二四三团团团长李仲英告诉贺晋年，当时情况危急，容不得人多加考虑，他当机立断决定带部队增援总部。在总部附近，李仲英看到叶剑英参谋长已经带领总部警卫人员在山坡正面抗击敌人了。彭德怀对李仲英下了死命令：不管伤亡多大，一定要把敌人赶回去，确保总部的安全。在彭总和叶剑英参谋长的亲自指挥下，终于打退了敌人。战后二四三团受到了总部的通令嘉奖。

到了下午，仗越打越激烈，双方已成胶着状态。有几次敌人的通信员甚至把命令送到八十一师指挥所来。贺晋年判断，敌军的数目绝非是战前敌情通报所讲的四、五个团，而是大约有十几个团的样子。后来查明，阎锡山所派李生达纵队和王靖国师，由太原乘汽车前来增援，已经加入了战斗。

下午三时左右，总部通信员送来命令：敌援兵已经到达，敌我兵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令八十一师务必尽快夺下东山头，以掩护我军主力撤出战斗。

“死也要拿下东山头！”贺晋年将帽子摔在地上，恶狠狠地下命令。

贺晋年迅速调整了作战部署，将左右两路钳形攻势改为集中兵力攻击一点。

突击队长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二四一团副团长贺吉祥身上，这是贺晋年点的将。关键时刻，他相信自己的弟弟，也把这送死的差事交给了自己的弟弟。

贺吉祥那阵子正闹情绪，战前八十一师整编，营升格为团，他这个主力营长只当了个副团长，团长的位置让给了另一个同志。他心里明白，这是哥哥贺晋年定的。以往打仗，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往往落在贺吉祥身上，而提拔却没有份。“凭什么送死的事又落在我头上？”贺吉祥瞪大眼睛，和哥哥吵了起来。但吵归吵，命令总是要执行的，何况贺吉祥还是个一听枪响手就痒痒的人。

贺吉祥决心不辜负哥哥的信任，率领突击队舍生忘死，迎着枪林弹雨往上冲。贺晋年亲自指挥重机枪连（四挺重机枪）作掩护。

贺吉祥的脖子被子弹擦伤，淌着血，他不知疼痛，他顾不上包扎，冲在最前面。终于冲上了东山头，但立足未稳又被敌人强大的反冲锋打了下来。

紧接着二四一团又组织了一次强攻，还是没有成功。

第三支突击队很快组成了。由一连连长李发带领十二个战士参加，身背大刀，手握集束手榴弹，刚毅的目光透出必胜的信心。

贺晋年望着自己的最后一张王牌，默默地检查了每一个战士的行装，目光落在李发这个从大别山走出的二十三岁的小伙子脸上，一字一顿他说：拿不下东山头你不要回来！谁都知道师长这话的分量。

这次突破点选在敌侧后，全团火力一齐发射，喷出仇恨的子弹，勇士们义无反顾地向敌人的阵地冲去，子弹像雨点般地落在他们的脚下，打得泥土飞扬，打得石头冒火花。有人中弹、有人流血，但是没有人停止冲锋的脚步。

过了一会儿，山头上响起一阵手榴弹爆炸声。在望远镜中，透过硝烟，贺晋年隐约看到李发他们挥舞大刀，在与负隅顽抗的敌人拼杀。成功了，贺晋年急忙大吼一声，带领后续部队迅速冲了上去。

随后，八十一师牢牢守住了阵地，击退了敌杨效欧部一个团的多次反击。

入夜时分，总部要八十一师撤出战斗。指战员们含泪掩埋好烈士的遗体，撤出了这块浸透了鲜血的阵地，转至大麦郊南张村至池镇一带集结休整。

兑九峪战斗后，总部要从八十一师调一个警卫营。贺晋年毫不犹豫地把战斗力最强的二四一团一营调给总部，并派团长王思温和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高维嵩去加强这个营的领导，确保毛主席和总部机关的安全。

在晋西南行军作战

三月中旬，阎锡山四个纵队，以救援石楼为目的，重新发起反击。

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开始陆续进入山西，第二十五师主力已进入灵石，第一四一、一四二师正向介休、灵石间开进，第十三军正准备从风陵渡北上。

鉴于敌人集中兵力向石楼方向反击，减弱了太原和晋西南、晋西北的防守兵力，总部决定：

第一军团和红八十一师为右路军，继续南下，相机夺取赵城（洪洞）、临汾，并向曲沃、闻喜、运城前进；

第十五军团主力为左路军，乘虚北上。第一步相机占领文水，交城及其附近地区，威逼太原。第二步相机占领静乐、岚县、岢岚，创立晋西北游击根据地，打通同陕北神府根据地的联系；

原在石楼地区的红十五军团一个团零一个营及新成立的红三十军和山西游击队等为中路军，担负牵制敌人，继续包围石楼，控制黄河渡口，维持后方交通等任务。

按总部部署，八十一师随一军团南下。一军团派政治部宣传部长邓小平同志来八十一师指导工作。小平同志骑一匹大青骡子，他话语不多，经常下到基层检查工作，考虑问题周到、细致。参加师领导会议时，发言简明扼要，常常是一语中的。

三月十七日，红一军团和八十一师突破了敌汾河堡垒线，由霍县地区向南急进，迅速占领了霍县、赵城、临汾、襄陵（襄汾）、曲沃等地区。那一阶段部队很辛苦，常常是一天换一个地方。又要行军跑路，又要经常打仗，还有一些伤员随队行动，贺晋年师长再三嘱咐伤员一个也不能丢掉，他们是部队的骨干。他自己的黄骠马就常常用来驮伤员。

晋南是山西的好地方，土地肥沃，人烟稠密，物产富饶。八十一师沿途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筹措粮款，扩大红军，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和红色政权，壮大抗日力量。

在二十多天时间里，八十一师扩充红军 800 多人，组建两支地方游击队共 50 余人，筹集黄金 20 余两，银币 1 万余元，粮食 40 余万斤，并在晋南广大地区播下了抗日救国的火种。

赵城有个马牧村，村子很大，大约有几千村民，八十一师在

那里休整了一下部队。当地群众在阎锡山及封建宗族制度的统治下，思想闭塞，文化落后，对我党我军不够了解，见了我军指战

员常避而远之。师政治部经过调查，严厉制裁了欺压百姓的恶霸地主和高利贷者，将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群众，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不少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一下子就补充了200多名新兵。有些十五、六岁的娃娃也吵着要参加红军。有个叫王双科的小鬼，

个子很小，老跟在贺晋年后面，软磨硬缠，非要参军不可。贺晋年看到他的态度坚决，便把王双科和其他一些娃娃兵都安排在师政治部宣传队里。

正当我东征红军高举抗日救国义旗，在晋西、晋南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力量的时候，蒋介石，阎锡山又纠集重兵，向我

东征红军实施反扑。蒋介石本人还于四月九日再次飞抵太原，亲自部署进剿东征红军事宜。

红军在敌优势兵力压迫下，逐步由进攻转为防御，并开始做回师西渡的考虑。

血战大佛寺

四月中旬，八十一师直接归总部指挥。此时，各路敌军步步紧逼，妄图将东征红军消灭于黄河东岸。同时，蒋介石又命令陕、甘、宁各省国民党军队向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攻。为了避免与强

敌作战，保存抗日力量，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四月下旬，总部决定：回师河西。

四月二十六日，东征大军相继西移。为掩护主力安全西渡，活动于新绛、侯马一带的八十一师，奉命于二十七日拂晓进至稷山县，并迅速占领域北侧之冯市塬，阻击敌关麟征部对我之尾追。

贺晋年师长率二四一团占领大佛寺一线阵地，依据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做好阻击准备。大佛寺位于稷山县城以北三十余公里处，地形复杂，岭谷交错，为北犯之敌必经之处。

来敌是关麟征所辖二十五师，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关麟征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是蒋介石嫡系将领，行伍出身，打仗很猛，入晋后不可一世。

战斗打响后，敌人先用重炮轰击八十一师阵地，继而又组织了轮番冲锋。由于二四一团的一个主力营调给总部担负警卫任务，防守正面又宽，我方兵力明显不足，连一些勤杂人员都拿枪投入了战斗。

打阻击战对部队的消耗最大。八十一师仓促修筑的防御工事几次被敌炮火炸平，部队的伤亡也不小。特别是二四一团六连一排孤军坚守大佛寺主阵地，与数十倍于己之敌激战一日。除排长冯振海身负重伤外，其余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黄昏，大佛寺失守。贺晋年亲自带两个连的兵力向敌反击，力图夺回大佛寺阵地。无奈敌人兵力太多，又都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我几次反击均未成功。遂退至大佛寺北一村子里，又顽强阻击了一整夜。

经一天一夜激烈战斗，八十一师打退敌人十余次进攻，阵地前沿敌尸横陈。这时，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给贺晋年打来电话表扬他们拖住了敌人，给主力转移赢得了时间，要他们立即撤退。

贺晋年放下电话，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汗水，向阵地留下了最后一瞥，命令部队撤退。他用自己的黄膘马驮着腿负重伤的冯振海排长，留下一个连轻

装抗击敌之尾追，带领其余部队迅速摆脱敌人，进山回撤。

大佛寺战斗后，八十一师派出工作队，拿出全师的牲口，其中包括师首长的马匹，协助地方工作人员将筹集的粮食，物资运往河西根据地。贺晋年等师首长和普通战士一样，每人身背三十五天的口粮，以每天四十公里的行进速度，边打边撤，抗击着汤恩伯部三个师的追击，胜利地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任务。

五月三日，八十一师从延水关渡河，返回延川县段家河休整。

（程国庆）

高举抗日大旗，誓复失地逐强梁

受命指挥林南战役

李达是1937年11月随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进抵太行山区的。到了1943年8月，他已在太行山战斗、生活了近6年。作为一二九师参谋长，作为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助手，太行山区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无不了然于胸，甚至连哪里有一眼水井，哪里有一条地图上未标出的小路，他也能随口道出。

近几个月来，李达一直关注着太南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动向。太南，指太行山以南的晋南、豫北地区，驻有国民党的第二十四集团军。1943年5月以前，第二十四集团军虽与八路军有些磨擦，总还是在抗日。可是到了5月以后，情况发生了突变。

日军大本营鉴于太平洋战争吃紧，决定从中国华北战场抽调3个师团，南下太平洋战场作战。抽调之前，为确保占领区的“治安”，日军出动1万余人，对太行山区的中国军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毁灭性扫荡”。国民党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很快就被日军击溃，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以及新五军军长孙殿英、新五军师长刘月亭等，均在战败后向日军屈膝投降。日军毫不延迟地将这些投降的部队改编成伪军，给了他们一个“和平剿共军第二十四集团军”的番号，下辖暂编第五、第六、第七军，以及太行保安队等部。

庞炳勋、孙殿英刚刚将溃散的部队集中起来，便开始配合日军向太行山区的八路军进攻。7月，伪暂五军军长刘月亭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率本部及伪暂六军、暂七军共2万余人，在日军第三十五师团3个步兵大队的支援下，侵占了我太行根据地的林县城及周围地区，使太行军区面临的局势一下子变得严峻了。

7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发来命令，要求太行军区在冀南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发起林南战役，坚决反击庞、孙所部伪军的进攻，保卫和扩大根据地。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商议后，决定责成李达指挥这次战役。刘师长和邓政委对李达说：还是那句话，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一个也按不死。用兵一定要有重点，重点就是伪军。要以优势兵力，首先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林县城及周围据点的伪军主力。至于日军，以少量兵力进行牵制，切断他们与伪军的联系就可以了。如果战役进展顺利，再乘势扩大战果，相机拔除日军据点。

李达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和刘邓首长的指示，精心制定了《林南战役纲要》，向刘邓首长汇报后，又进行了补充，很快得到批准。

李达将部队划分成东集团和西集团。东集团由一团、十团、十三团、三十四团、七七一团、警备二团组成，徐深吉、皮定均、高扬为指挥，任务是向林县城北的姚村、城东的横水、城东南的东姚进攻；西集团由二团、三团、二十团、三十二团、七六九团组成，以黄新友和何柱成为指挥，任务是向林县城和城西南的合涧镇、原康等地进攻。李达还部署一二九师师部特务营和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部队组成汤安支队，由李景良，李少清指挥，在水冶、观台一线设置防线，阻击安阳可能出援的日伪军；以抗大第六分校师生组成武工队，在东姚、临淇、原康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袭扰敌人。

8月18日零点30分，林南战役打响了。李达率指挥部随西集团行动。

打响第一枪的是西集团的七六九团。据守林县城西郊的伪军作梦也没有想到八路军会在半夜三更的时候突然进攻，被打得手忙脚乱，怎么也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七六九团的进展很顺利。打到西坛和西家庄时，一个伪军团长带领 300 多名伪军顽抗，被七六九团包围。七六九团一营向伪军喊话，命令他们放下武器反正。伪军团长派人出来，要求八路军去一位干部谈判。一营长李德生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只身前往伪军团部，向伪军团长解释了八路军的政策。伪军团长原本还有顾虑，听说面前的李德生就是八路军的营长，十分感动，终于下决心率部投诚。

西集团其他部队的攻势也很凌厉，三团和二十团拂晓前已从南面、东面、西面攻进林县城。三十二团拔掉了伪军在北郊的据点，与据守林县城北关的敌人展开激战，争夺北门。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告急，使伪暂编二十四集团军前敌指挥部弄不清八路军的主攻方向，只好派部队四出反扑，结果因力量分散，均被八路军击退。日军在头道营和城南关驻有二三 联队所属的伊藤大队，被七六九团 1 个营和二十团 1 个连分隔开。伊藤大队数度出击，都在伤亡多人后被迫退回，再不敢贸然冲出据点去援助伪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伪军一股一股地被歼。

东集团采取的战法是：打破常规，不与敌人的前哨据点纠缠，只以小部队监视这些前哨据点，而以主力出其不意地插入敌人纵深，从东面和西面同时进击林县城东北，包围了伪军的南北陵阳、蒋里、东西夏城等据点。这一大胆的行动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伪暂五军第四师、独立旅等部陷入一片混乱。

8 月 18 日中午，西集团部队已将敌人压缩至伪暂编二十四集团军前敌指挥部。李达要求尽快打下这个首脑机关，使敌人失去指挥。伪暂五军军长、“前敌总指挥”刘月亭督率伪军凭借核心阵地顽抗，被我军击伤，他不敢再打下去，丢下部队化装潜逃。他一跑，敌人军心更乱，我二十团四连勇猛地打进了敌人的指挥部。四班长赵德忠踢开敌指挥部的大门，一口气扔进去好几枚手榴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他立即率全班冲了进去，没被炸死的伪军官都当了俘虏。

失去统一指挥的伪军彻底崩溃了。到 8 月 18 日下午，林县城内的伪军已全部就歼，只剩头道营和南关据点的日军还未消灭。李达决定先打头道营的日军。考虑到日军火力猛，我军装备差，为减少伤亡，李达叮嘱指挥员入夜再发起进攻。

8 月 19 日零点，西集团的二十团，在七六九团 1 个营、三十二团 3 个连的配合下，向头道营日军据点发起了进攻。日军火力点喷出道道火舌，使进攻部队受阻。战前准备的爆破组出动了。他们利用夜暗和日军的射击死角，以熟练的动作将炸药包运送到日军的火力点前，将日军的火力点一一炸飞。日军支撑不住了，拆开一段围墙逃往城南关据点，我西集团部队随即将其再次围困。

8 月 19 日全天，日军出动飞机助战，李达指挥东、西集团部队冒着轰炸与敌人激战。东集团部队攻克了南北陵阳、曲山、姚村等据点，将伪暂五军第四师师部及第十团、伪暂五军独立旅全歼。西集团部队在继续围困城南关日军的同时，攻克了马圈、西坛等伪军据点。

战至此时，林县城及其周围地区除城南关日军据点外，已基本上被太行军区部队控制。指挥部里，有人建议一股作气将城南关的日军据点打下来。

李达没有马上做出决断，而是冒着敌人时断时续的射击，亲往城南关阵地，仔细察看了日军据点的虚实。李达认为：这里的地形易守难攻，工事掩体坚固，加之日军兵力有1个大队，火力很强。而我军攻坚手段差，火力不足，硬攻难以奏效，只会徒增伤亡。李达指挥作战，深受刘伯承影响，刘伯承历来不主张死打硬拼，讲求的是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有把握取胜才打，没把握打胜就撤，重新在其他方向捕捉战机，绝不做“亏本生意”。李达思索了一阵，决定不攻城南关。

回到指挥部，李达面对地图审时度势，定下了下一步的作战决心。他命令东、西集团同时南下，乘胜扩大战果。

8月20日，各部队浩浩荡荡南下。庞、孙伪军兵败如山倒，非逃即降。仅两三天时间，东集团部队就攻占了东姚集、李家厂，横扫鹤壁集、西鹿楼以西地区，前锋已进至汤阴。西集团部队兵出临淇，收复了合涧、原康，攻克了西平罗和南平罗。

8月24日，日军在庞、孙伪军的一再哀求下，分两路出动了。安阳的1000多名日军西进，辉县的400多名日军北进，企图以钳形攻势挽回败局。

李达命七六九团沿途阻击，迟滞了日军的行进速度。两天后，两股日军才得以会合，他们没有钳击到我军，于是改变北攻合涧的计划，突然西进，向连家坡扑来。

李达率指挥部正驻扎在连家坡一带的小庄。日军突然改变攻击方向，给指挥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当时，李达手头只有一个不满员的警卫连，处境十分危险。

李达临危不惧，他命令警卫连进入村外的正面阵地阻击敌人，又令情报科长梁军带领机关全体人员向村后的山沟里转移，他自己仍留在村中指挥。危急时刻，东集团三十四团的两个连队恰好路过小庄，李达命令他们留下来，立即抢占庄后的两个山头制高点，以火力压制进攻的日军。

不一会，警卫连寡不敌众，从村外退了回来。尾追的日军发现了李达的临时指挥所，密集的子弹雨点般发射过来。李达为了争取时间掩护机关撤退，指挥警卫连顽强抗击敌人，三十四团的两个连也向敌人开了火。日军的气焰不那么嚣张了。

突然，敌人侧后枪声和喊杀声大作，原来是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部队和七六九团一部，听到指挥部方向响起密集的枪声，主动赶来增援了。嘹亮的冲锋号响过以后，战士们端着刺刀，勇猛地向日军扑去。

第五军分区司令员皮定均跑步来见李达，看到李达和指挥部机关安然无恙，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从硝烟中走出来的李达面不改色，他看见皮定均手中的望远镜被打碎了一个镜片，关切地询问了部队的伤亡情况。这时，七六九团的一位营长也赶到了，李达当场决定：七六九团与正向坡底村疾进的二团合兵追击日军。

见八路军紧迫不舍，日军更加慌乱，天黑以后也不敢宿营，连夜渡淇河向林县撤退。恰巧这时秋雨连绵，山洪暴发，渡河的日军被洪水吞没了100多人。七六九团和二团原想继续追击，因渡河实在困难而停了下来。历时9天的林南战役就此结束。

林南战役共攻克据点80余处，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20门、轻机枪83挺、步枪3118支，还击落日军飞机1架。另外，此役收复了林（县）南、辉（县）北数千平方公里的国土，解放人口40万，使

太行根据地的面积恢复到 35008 平方公里，处于东可切断平汉路、南可控制黄河渡口的有利态势。我军付出的代价是伤亡 790 人，三团团长周凯东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局部反攻捷报频传

1944 年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开始从所辖的 11 个师团、7 个独立混成旅团、1 个骑兵旅团中，陆续抽调部队支援太平洋战场和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几个月时间调走了 9 个师团，留下来的部队多是担任守备的新编步兵旅团，战斗力明显减弱。太行军区周围的日军主力师团也大部调走，新编成的步兵旅团兵力不够，只好将许多重要据点交给伪军守备。

已被正式任命为太行军区司令员的李达认为：日伪军的部署变更，形成了一个可资利用的空隙。他与太行军区的几位领导同志——政委李雪峰、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镇、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研究后，制定了一个局部反攻的作战指导思想。即：1. 继续夺取与逼退某些距敌占区较远、兵力薄弱的日伪军据点；2. 向东发展，尽可能多地俘虏伪军缴获其装备，扩充我军，扩大解放区。

春节刚过，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部队即向蟠（龙）武（乡）线的日伪军出击，经突然袭击，于 2 月 28 日攻下了已被我军围困 8 个月的蟠龙镇。李达命令第三军分区部队不要停顿，要立即在第二军分区部队配合下向榆（社）武（乡）线进击。榆社城的日伪军在两个军分区部队的夹击下，抵挡不住弃城而逃，途中被我军歼灭一部。我军于 3 月 29 日收复榆社城。第二军分区部队并一度袭入太谷城。

2 月下旬，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部队在新近武装起来的游击队配合下，加强了对驻守临淇据点日伪军的袭扰。日伪军补给困难，被迫于 3 月 1 日放弃临淇撤走。

4 月 1 日，太行军区第五、第七军分区部队 3 个团，在辉县民兵配合下，向盘踞林（县）水（冶）公路沿线的伪暂五军发动进攻。部队首先打击由林县城外出抢粮之敌，而后将林县城外围的据点一一拔除，并切断了林水公路。驻守林县城的伪第六方面军 3 个团待援不至，补给又断绝，只得于 4 月 14 日弃城东逃。两军分区部队歼灭伪军 900 余人，收复林县城。

5 月下旬，李达调集太行军区第四、第七、第八军分区部队围困陵川城，数千群众自动赶来助战。浩大的声势使陵川城内的日伪军胆战心惊，不断呼救。5 月 29 日，平城日军松山小队和小山小队、伪剿共第二师 1 个团沿公路来陵川解围，遭我打援部队在郎持岗、杨砦地区伏击，被全歼。李达嘱咐参战部队不要急于攻取陵川城，要继续在打援上作文章，尤其不能放过敌人运送补给的部队。参战部队依计而行，连续截获敌人的粮弹物资，毙伤许多护送补给的日伪军士兵。

就在太行军区部队的局部反攻捷报频传的时候，传来了国民党军队在豫中会战中溃败的消息。4 月中旬，日军为了破坏盟军在中国建立的空军基地，并打通一条从朝鲜釜山经中国平汉、粤汉、湘桂铁路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调集 4 个步兵师团、1 个战车师团、2 个独立混成旅团和 1 个骑兵旅团共五六万人，开始实施“1 号作战”计划。日军主力渡过黄河后，攻占郑州、新郑、密县、许昌、登封、漯河；另一路日军攻陷浉池、灵宝、陕县、

洛阳。国民党军 40 多个师有的屡战屡败，有的望风溃逃，使日军如入无兵之境，大片国土和人民沦于敌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雇了只小毛驴逃走；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化装成伙夫逃出河南……

李达根据每日的战况估算了一下，国民党军队竟然在 37 天时间里丢失了 38 座县城！这使他心中十分愤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节节胜利，唯独在中国，国民党军队却丧师失地、溃不成军，真是中国军人的奇耻大辱！

这时，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邓小平政委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要求太行军区和太岳军区迅速向河南发展，以一部兵力开辟豫西地区。

李达等太行军区领导人迅速抽调两个团，组织了豫西抗日独立支队（第一支队），由皮定均和徐子荣分任司令员、政委。李达考虑得很细致，为减少部队开辟新区的困难，同时尽量减轻豫西人民的负担，他决定把军区历年积蓄的银元拿出一部分，给独立支队带去做经费。这支 1000 多人的部队于 9 月初从林县出发，9 月下旬击退伪军河防部队渡过黄河，接着击破日伪军的围攻，进入嵩山、箕山地区，在国民党军队丢弃的国土上建立了偃师、巩县、伊川、登封、荥阳、密县、洛阳等十余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打开了豫西的局面。

日军击败国民党军队、打通平汉铁路南段以后，马上调回部分兵力“扫荡”晋冀鲁豫各抗日根据地。李达认为：日军集中兵力“扫荡”我根据地，其后方据点和交通线反显空虚，愈发暴露出捉襟见肘时的弱点，我军正可采取刘伯承师长惯用的战法——敌进我进，突入敌之纵深。

李达随即指挥太行军区部队向敌占城镇和交通线推进。在日军刚刚打通的平汉铁路上，太行军区部队趁虚袭击了石家庄、内丘和邢台车站；在正太铁路上，袭击了寿阳西南的马首、上湖车站，获鹿以西的微水车站，还袭入了和顺城。

各军分区部队也同时行动，颇有斩获。第一军分区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向临（城）内（丘）段敌军设置的封锁线出击，拔除日伪军据点 14 个；第二、第三军分区部队围困辽县（今左权），攻克七里店等据点；第四、第七、第八军分区部队继续围困陵川，不断打击增援陵川的日伪军；第六军分区部队攻克敌人号称“最坚固”的功德旺据点；第七军分区主力攻克薄壁镇等据点，开辟了新（乡）辉（县）地区。

1944 年全年，李达指挥下的太行军区部队共作战 4048 次，攻克、逼退日伪军据点和碉堡 364 个，解放国土 4748 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570000 人，毙伤日军 2440 名，毙伤伪军 7339 名，俘虏日军 16 名，俘虏伪军 3346 名，另有日军 4 人、伪军 402 人投诚或反正。我军的伤亡为 3061 人。

1945 年 1 月，为开辟道（口镇）清（化镇）路以南地区，加强太行军区与豫西新区的联系，李达指挥太行军区第七、第八军分区部队以及平原党校警卫团，共 4 个团另 3 个独立营，在豫北发动了道清战役。

道清战役第一阶段，由地方武装和民兵袭扰日伪军控制的城镇据点及交通线。第七、第八军分区部队于 1 月 21 日夜间突然从修武以北的九里山地区南下，越过道清铁路，远程奔袭小东镇和宁郭镇，歼灭守敌攻克了两镇。接着，又攻下平汉路以西武阁寨、程风、徐营镇、中和镇等日伪军据点 16 处。日军第一一七师团三九大队 800 余人分 3 路出动，企图合击我军。李达根据“重点主义”的用兵原则，集中 3 个团在樊庄设伏，以绝对优势兵力打三

路日军中兵力最薄弱的一路——三九 大队大队长有角光率领的 1 个中队。结果战斗速战速决，1 个中队的日军被全歼，仅有角光只身一人侥幸逃脱。另两路日军闻有角光大队长失利，均无心再战，灰溜溜地撤回焦作。

战役第二阶段，参战部队主力事先全部后撤到根据地纵深辉县以北的南平罗地区，此举果然迷惑了道清路以北的日伪军，以为我军已无力再战。见敌军已松懈下来，李达决心扫除道清路以北的日伪军据点。他仍然根据“重点主义”的用兵原则，增调第三军分区部队七六九团参战。2月20日战斗打响，3个团进攻庞炳勋所部伪独立十四旅旅部五里源，2个团进攻五里源外围据点陆村。陆村和马坊、焦庄等据点先后被攻克，五里源之敌也在我军数次猛攻之下动摇，放弃据点开东门逃跑。可惜我负责堵截的部队疏忽大意，敌守军大部逃脱。“乱弹琴！”李达严肃地批评了该部队指挥员。他平素从不对下属发火，“乱弹琴”三个字，就是他最严厉的责备了。他并要求各部队都吸取教训。随后，李达命令各团抓住敌人军心动摇的机会，迅速东进辉县地区扩大战果。各团立即行动，势如破竹地攻克了赵固、峪河、百泉等据点，摧毁敌碉堡 59 座。3月6日，部队一度攻入辉县城南关和西关，李达见守敌兵力尚强，城防工事坚固，加之新乡日军已出动增援，不宜恋战，遂命令部队撤出辉县城。

战役第三阶段，依然是在敌人预料不到的时间、地点发起的。敌人判断我军下一步会进击东北方向的辉县、获嘉、修武，所以手忙脚乱地收缩兵力，加强上述三城的防务。李达发现敌人调整部署以后，北起新乡、西至郑州、东至开封这个三角地带空虚了起来，便决心兵出东南方向的原武、阳武（今原阳）地区作战。3月22日夜，第七军分区主力在武工队配合下越过平汉路，突然袭击原武外围的王村、盐店、葛庄等据点。日伪守军以为原武距驻有重兵的新乡、开封、郑州都不远，八路军无论如何不可能打到这里来，因此疏于防范、毫无作战准备，我军将原武外围据点一一顺利攻克。据守原武城郊的日伪军闻讯，惊慌失措地逃入城内，使原武城完全失去拱卫。我军两度乘隙袭入城内，歼敌一部后撤出，更加剧了日伪军特别是伪军的恐慌，伪保安大队 300 余人在军官带领下反正。我军越过老黄河，兵锋已逼近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城郊。敌伪的河南省当局感受到严重威胁，一度下令关闭开封城门，以防八路军突袭。在第七军分区部队横扫原武、阳武地区的同时，第八军分区部队南渡沁河，西进温县、孟县地区，也打得敌人摸不着头脑，部队一度攻入温县城，造成很大震动。

4月1日，道清战役结束。我军共歼灭日伪军 2500 余人，解放国土 2000 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75 万；还建立了 4 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打通了太行根据地与新开辟的豫西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道清战役是一次成功的运动战战役。战役结束后 10 天，1945 年 4 月 11 日，中央军委在致新四军、八路军南下支队和东江纵队领导人的一份电报中，肯定了这次战役的经验。中央军委的电报指出：确实弄清敌情，实行“重点主义”的兵力部署，采取不规律的闪击行动，并加强伪军工作和开展地方工作等，是战役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安阳战役战绩辉煌

1945 年 5 月 8 日，德国军队向盟军投降。当初挑起战争、荼毒世界的三

个法西斯轴心国，只剩下日本还在垂死挣扎。

八路军总部于5月29日发出指示，要求华北八路军各部队对敌展开更积极的攻势。

李达坚决贯彻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在指挥太行军区部队收复了日伪军占领的陵川、辽县、晋城、和顺4座县城后，与太行军区的几位领导同志一起，研究了夏季攻势作战计划。

6月11日，邓小平政委要去延安出席党的七届一中全会。正在筹备安阳战役的李达赶来给邓政委送行。他向邓政委详细汇报了安阳战役的战前准备情况。邓政委说：要通过这一仗提高部队打运动战和攻坚战的水平。多年来，我们打惯了游击战，可是要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光打游击战不行，还必须会打正规战。无论是太行军区还是太岳、冀南、冀鲁豫军区，都要搞好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兵力的正规战过渡。思索片刻，邓政委又说：“日本鬼子的日子不长了，我们的眼光还要再看远一点。”

6月29日，安阳战役打响了，李达和李雪峰率军区战斗司令部去了前线。

几年来，日伪军一直在安阳以西地区修筑据点和碉堡，构成了一条针对太行军区的封锁线。这条封锁线阻碍着我山区和平原之间的联系，阻碍着我军的行动和发展，早已是太行军民切齿痛恨的眼中钉、肉中刺。

这次安阳战役，将要彻底摧毁这条封锁线。战役的作战对象，是驻扎在平汉铁路两侧的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一部、铁杆汉奸李英的伪剿共第一路军2个旅、孙殿英的伪第六方面军暂九师等，共7000余人。

李达将打击的重点放在死心塌地的汉奸李英头上。李英是号称“东方佛朗哥”的伪皇协军第一军军长李福和的侄子，他自恃有日本鬼子撑腰，处处与八路军和抗日群众作对，还经常口出狂言。自太行军区部队开展反攻后，李英的部下们惶惶不可终日，李英给他们打气说：“八路军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打据点，是‘行不行，两点钟’，你们只要能挺过两个钟头，他们就没咒念了。”

这话后来传到了李达耳中，他向军用地图上的安阳一带猛砸一拳说：“对这样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不狠狠惩罚怎么行？！”

李达集中了太行军区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八5个军分区共9个团的兵力，另外还调集了林县、安阳、安汤、林北、磁武、涉县6个县的6900名民兵和25000名自卫队员。参战部队分成3个支队，第一支队由一团、四十三团、二团和3个县独立营组成，黄新友、张廷发、高扬任指挥；第二支队由三十二团、三十四团、义勇军第五团和2个县独立营组成，韦杰、陶鲁笱、马忠全任指挥；第三支队由七六九团、十四团和八路军总部警卫团组成，鲁瑞林、王一伦任指挥。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担任主攻，第三支队为预备队。

三支队中的七六九团，是太行军区最老的部队，历次战役战斗都承担最艰难、最重要的任务，可此次战役却被安排担任预备队，有些同志想不通，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李达抓住这个思想苗头，对三支队指挥员鲁瑞林说：“求战心切，想打头阵，本来是一种积极的思想情绪，但因为当了预备队就松劲，这就不好了。其实，让你们作预备队，是把你们当一个拳头来使。如果没有预备队，把两个拳头一齐打出去，遇到意想不到的敌情怎么办？你们要把这些道理给干部战士讲清楚，不是不让你们上，是要到关键的时候再把你们甩出去。要告诉大家特别是七六九团，准备好打硬仗、打恶仗。要把泄了的气再鼓起来，鼓得足足的！”鲁瑞林按照李达的指示精神，再次对第

三支队进行了动员。

在向各支队负责人布置任务时，李达强调了这次战役与过去战役的不同之处：这次战役主要是打运动战和攻坚战，而以游击战为辅。要有意识地锻炼部队的攻坚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全面反攻作准备，为大部队联合作战积累经验。为打好这一仗，李达花费了几个晚上的时间，结合1945年上半年对敌攻势作战的经验教训，撰写了《关于进攻作战的一些问题》，指出部队现存的5个带有共性的薄弱环节，以及5条改进的措施。这篇文章作为给参战部队的指示下发后，在安阳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战前的准备工作相当充分，李达要求营以上指挥员和突击队的连排干部，都要到准备攻打的敌军据点前观察敌情，做到胸中有数。他自己也带领3个支队的指挥员到距离敌人只有500多米的阵地前沿，观察地形和敌军的布防情况。所有参战部队都按要求进行了10天的攻坚和村落战斗训练，各团还针对本部队的任务，进行了夜间袭击、野战动作、土工作业等演习。3个支队都不间断地派出侦察人员，到据点和敌占区侦察，随时掌握敌情的变化。

为分散敌人注意力，使其摸不清我军的主攻方向，李达商请冀鲁豫军区协同作战。冀鲁豫军区部队应约于6月30日至7月3日在平汉路东侧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势，以6个团和5支游击队插入安阳与成安之间的日伪军纵深，攻克据点20多个，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使安阳敌军从北面受到严重威胁。

另外，李达还命令未参加此次战役的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和第二军分区，以其主力在元氏、获鹿、赞皇地区先期发动攻势；第六军分区在武安、沙河方向破击平汉路。第一、第二军分区部队攻克仙翁寨、南佐、同冶镇等10多处据点，袭入赞皇城，歼日伪军500余人；第六军分区部队攻克石门、中关等据点，炸翻敌人火车一列。这一系列行动果然把日伪军搅得晕头转向，战役发起前，一直没有察觉我军即将在安阳一带发起较大战役的意图。战役已进行了一两天，仍未判明我军的主攻方向究竟在哪里。

6月29日凌晨2时，安阳战役第一阶段的战幕拉开。一支队率先行动，他们在夜暗中强行军30公里，以突然勇猛的动作向驻守曲沟集的伪剿共第一路军第三旅旅部发动袭击。

这是李达采取的“掏心战术”，一交手就先打敌人的指挥中枢，而暂时置敌人的战斗部队于不顾。

由于是在夜间，天又下着雨，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八路军会在这样的時候突然进攻，顿时陷入全面混乱中。经5个小时战斗，伪第三旅旅部被攻占，伪旅长杜有帧被俘。打掉了旅部，伪军部队群龙无首、失去统一指挥，伪第三旅所属第六团也很快被歼灭。

二支队攻打驻水冶镇的伪第二旅旅部，战斗于30日1时40分打响。水冶镇据点堡墙高大。部队连续两次架3丈多长的云梯都告失败。但战士们毫不气馁，改用连续爆破结合冲击的战法，终于第三次架起云梯，登上堡墙打进了据点。伪军旅部被解决后，只剩下一个日军碉堡还在顽抗，碉堡里驻有日军一个“指导班”。跟随二支队作战的日本解放同盟盟员野村匍匐凑到碉堡近前，喊话劝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但碉堡里的日军十分顽固，不但不听，还向野村打冷枪。晚9点，我军工兵在迫击炮掩护下，用炸药包将碉堡炸掉，“指导班”的日军全被炸得粉身碎骨。

这时，李达接到报告：安阳城内的日军已经出援，正向曲沟集运动。他马上命令预备队第三支队担负打援任务。第三支队于凌晨3时半到达距安阳

10 公里的北曲沟设伏。

1 个半小时后，果然等到了敌人。驻安阳的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第七十四大队大队长大泽，率领日军士官训练队 100 多人、伪军 60 多人出动，他们带着 1 门山炮、1 挺九二式重机枪，分乘 6 辆汽车前来增援驻曲沟集的伪第三旅。我第三支队候个正着，立即将大泽部队的退路截断。上午 10 点第三支队发起攻击，大泽部队被压缩到北流寺村中。

大泽是一名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率部从安阳出发前，曾对伪军头目李英说：“你看好门，我去击溃八路军！”陷入重围后，骄横的大泽率日伪军连续反扑 5 次，企图突围，都被三支队击退。

李达从设在北曲沟的战斗司令部里给第三支队打来电话，询问了战斗进展后说：士官训练队成员是日军中的骨干，装备好、战斗力强，但现在他们的兵力处于绝对劣势，又没有坚固工事可依托，正是加以歼灭的好机会，把这股敌人打掉，会在日伪军中引起强烈震动，一定要全歼！

下午，三支队打进北流寺村中，战士们与敌人逐屋争夺，一登上屋顶，就把成筐的手榴弹运上去，一枚接一枚地投向顽抗的日军。经几个小时激战，100 多名日军官兵除 5 名被生俘、5 名自杀外，都被击毙。不可一世的大泽大队长也丧了命。

大泽部队带有一部电台，在覆灭之前，他们曾一再向安阳呼救，安阳日军果然又出动 100 多人赶来援救大泽。已攻克曲沟集腾出手来的一支队承担了截击安阳第二股援军的任务。一支队在王家邵村截住了这股援军，毙伤 30 人，击毁汽车 2 辆。其余敌人见势不妙，掉转车头仓惶逃回安阳。

7 月 1 日，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按照李达的部署，第一支队向南夺取北当山、九龙山、东善应等伪军据点，第二支队向北进攻石官，东鲁仙等据点，第三支队向众乐、李家岗等据点进攻。经过两昼夜激战，3 个支队将安阳城以西、观台镇以南、鹤壁集以北地区内的日伪军据点尽数拔除。

第二阶段作战的对象主要是伪军，各部队都加强了政治攻势，效果很明显。据守东善应和石官的伪军，在我军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势下，集体缴械投降。二支队攻打东鲁仙时，伪第二旅四团的 1 个营部和两个连仗着日本军事工程师设计的坚固碉堡和 3 层工事顽抗，已投降的伪第二旅四团团团长及大崐和部分伪军家属去喊话劝降，他们也不理睬。这时，我军用迫击炮连续平射，准确地命中了目标，这才震慑了伪军营长，派出副官来“谈判”。经团长蒋克诚讲清我军政策并限定 15 分钟之内必须答复，据守东鲁仙的伪军终于走出碉堡缴械投降。

在第二阶段作战中，美军驻太行军区观察组应我军要求，呼叫了西安机场的美军轰炸机前来助战。7 月 2 日，两架美军轰炸机从西安机场起飞，飞临安阳城上空投弹轰炸了日伪军。这次轰炸的规模虽不大，却使日伪军大为震惊，因为多少年来都是日军飞机对抗日军民狂轰滥炸，想不到如今八路军竟也有了空中支援。美国空军配合八路军作战，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一次。追溯起来，这是和太行军区与美军观察组建立的良好关系分不开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开始利用设在中国的军用机场轰炸日军目标。一些美军轰炸机被日军击伤或击毁，跳伞的飞行人员被太行军区陆续搭救了数十名。后来，美国方面提出：为了营救飞行员和观测气象，希望在八路军控制的太行山根据地设立观察组。经中共中央同意后，美军观察组于 1944 年底来到太行军区。这时候，太行山区虽已度过了灾荒，但还没有完全恢复

元气，物质上仍有许多困难。尽管如此，李达等太行军区首长还是决定：在生活上尽量照顾美军观察组，想方设法给他们提供一些肉、奶、蛋。有一次，美军观察组的一位军官前来拜访李达，正巧赶上李达吃饭，美国军官看到李达司令员吃的是粗粮，菜中根本没有肉，非常惊讶。回到观察组一说，全体成员都很感动，他们从此开始帮助八路军做一些事。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共产党、八路军的高级干部从延安来前方，或是从前方回延安，可以搭乘美军的便机了。安阳战役中美军飞机轰炸日伪军为八路军助战，也是美军驻太行军区观察组促成的。

第三阶段作战于7月4日开始。部队虽有些疲劳，但士气高昂。第一支队向南扩展战果，挺进至汤阴县境内。支队主力7月5日强攻鹤壁集，全歼伪第六方面军暂九师第二十六团。又乘胜攻下曹家、鹤塔等据点。第一支队一部奉命东进，在3天时间里攻下了赖家河、黑塔、北唐仲、时丰、大湖、鹿楼集等伪军据点，平均每天拿下两三个据点，付出的伤亡代价却很微小。这是因为该部注重军事进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争取了伪军2个连反正。第一支队的胜利进军，开辟了平汉路以西的一大片平原地区。

观（台）丰（乐）铁路一直被日军用来运输六河沟煤矿生产的煤，对日军来说经济价值不小。李达命令第二、第三支队加紧破毁观丰铁路。在近万名民兵、自卫队配合下，第二、第三支队将铁轨拆走，枕木烧掉，连路基也刨平，把观丰铁路变成了一条支离破碎的死蛇。李达来到破路现场，鼓励战士、民兵、自卫队员尽量多拆铁轨，因为这些铁轨运回太行山以后，可以做为制造武器和农具的原料。

观丰铁路沿线的西保障、东保障、王安等伪军据点，被第二、第三支队悉数拔除，驻防伪军或被歼灭，或逃往观台、丰乐。据守丰乐车站的日伪军出动600多人援救铁路沿线伪军，但刚到丰乐以西的张显屯就遭到三支队阻击，赶紧又缩了回去。

观丰铁路被彻底破坏后，李达和李雪峰于7月7日命令各支队停止作战行动。7月9日，安阳战役结束。李达原先预计整个战役需要17—20天时间，结果只用了10天。

安阳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共毙、伤、俘日伪军3300余人。其中包括：大泽大队长等100多名日军官兵，俘虏或迫使投诚、反正的日伪军2500余人。李英的伪军部队被歼灭三分之二，伪军将级军官3名、校级军官22名、尉级军官169名被俘或反正。另外，还击溃伪军900余人，攻克据点30余处，收复国土15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5万。

安阳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的广大军民。人民群众敲锣打鼓为部队庆功，不少村镇的父老乡亲还送来猪肉、羊肉、烧酒、纸烟慰问部队。边区政府决定：参加安阳战役的部队一律免除3个月的粮食生产任务，每个指战员奖给10斤粮食。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了不起的奖励措施了。

《新华日报》（太行版）的记者采访了李达，请他谈了安阳战役的经过和战果。李达在谈话中指出：“这次战役中，我军士气旺盛，动作神勇，组织非常周密，在精神上、物质上完全压倒了敌人。我军的攻坚精神和作战的持续性，使敌伪大为震惊……我军从游击战、麻雀战进入进攻的野战范围，获得了许多新的作战经验。”

太行军区部队经过8天休整，于7月18日召开了隆重的祝捷大会。李达、李雪峰、戎伍胜、袁子钦等同志检阅了精神抖擞、士气高涨的部队。李达没

有陶醉在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他在大会上讲话说：安阳战役，这只是大战前的演习，新的更大更艰巨的战斗正等待着我们。

（王晓建）

转战东北，韩先楚夺关斩将

挺进东北

日军投降后，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大队长韩先楚，受命率一大队干部及部分干部家属进入东北，被任命为辽东军区第四纵队副司令员。

1946年5月，第四纵队一部在沙岭子围攻战中失利。韩先楚虽然到任不久，却十分重视这个突如其来的“下马威”，经过深入调查，立即组织部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向广大干部讲清目前“敌强我弱”的形势，要求部队克服和平麻痹思想，树立长期作战、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要练好兵，提高战斗力，抓住战机，争取多打胜仗。在保卫本溪作战中，他亲率四纵第十师阻击敌人。当部队进至奉旗堡附近时，与国民党第十四师遭遇，他果断地指挥部队先敌发起勇猛冲击，将敌击溃，并在乘胜追击中，毙伤敌师长龙天武以下1300多人，俘敌600余人，创造了东北民主联军1个师击溃国民党军1个师的先例。这一仗的胜利，不仅解了韩先楚的心头之恨，亦极大地鼓舞了东北我军的士气。

这时，国民党趁我进入东北的部队还不多，武器装备差，物资供应困难，即命令东北之主力部队，不遗余力集中向民主联军据守的北满地区发起进攻，直接威胁民主联军后方的安全。继占领本溪之后，国民党军接着又向四平、长春进攻。鉴于此，中央军委即电示：南满要派部队在中长路南段，选择要点，狠狠打击敌人，把敌人拖回去，配合北满作战。

韩先楚看了电文后，略加思索，便主动请缨，亲自指挥四纵两个师和辽南地方武装，发起鞍（山）海（城）战役。首先从驻防鞍山的国民党军第一八四师开刀，歼灭该师一个团；尔后迅速移兵海城，经过激战，夺取了城外所有据点，并攻入东门。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利用一八四师是滇系部队，经常受到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歧视的矛盾，派人打入一八四师，直接做师长潘朔端的工作，成功地促成了潘朔端率师部和1个团起义，通电全国，开了东北瓦解敌军的先河，鼓舞了全国人民反内战的斗争，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在半年内消灭民主联军，占领整个东北的美梦。

但是，从1946年10月19日起，盘踞在东北的国民党军为实现其“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最后占领全东北”的阴谋，集中8个师约10万兵，分路向南满地区发动全面进攻。

这时，民主联军在南满的部队，只有三纵和四纵及两个独立师，总共4万多人，无论兵力还是装备，都与国民党军相差甚远。南满保卫战一开始，辽东军区首长便以三纵为主，准备在新宾地区，歼敌一九五师一部，并令四纵韩先楚率十师等4个步兵团，及纵队炮兵团配合3纵作战。

接到命令后，韩先楚即率部马不停蹄地赶到永陵街地区，刚与敌接上火，战斗尚未全面展开，突然又接到三纵首长电示，立即撤出战斗。

“这打的啥仗，刚进入阵地，又叫撤出。”韩先楚莫名其妙，下令部队撤出战斗之后，自己跳上吉普车，直奔军区。一走进作战指挥部，他便大声嚷嚷：“这打的什么仗，刚同敌人接上火，就不让打了，这是怎么回事？”

一看见韩先楚风风火火地闯进了指挥部，军区司令员肖华便耐心他说：“有的同志认为打赢这一仗，条件不具备，把握不大，因此信心不足，暂不同意打。这次，你们是配合，不要急，仗是有的打。”肖华边说边拿出四纵

胡奇才司令员连发来的3份电报，“你看看电报就明白了。其次，你得马上归建，立即把部队带回去，尽快开到宽甸以西新开岭地区待命。”

韩先楚接过电报，认真地看了起来。

原来，四纵代司令员胡奇才集中5个团的兵力，一口吃掉了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留守马赛集的两个营，俘敌300多人。这下敌师长李正谊慌了，立即命令他的主力往回返，企图救他的两个营。但李正谊怎么没想到，他的长驱直入正中诱敌深入之计，等他进了新开岭地区一个狭长的山谷，即被胡奇才给堵住了两头，进退两难。于是，胡奇才连连发电，请求军区首长准歼敌二十五师于狭长山谷，并建议韩先楚副司令员速率主力第十师归建参战。

韩先楚看完电报，很有点不好意思。但只要有更大的仗打，他的情绪又马上恢复。立刻笑着对肖华说：“好！就应该集中兵力，抓住战机，打几个歼灭战，才能打掉敌人的威风，阻止住敌人的进攻！”

肖华见韩先楚怨气、火气已消，便说，“你们太辛苦了，顶风冒雨赶去，仗没有打上，现在又要赶回去。”

“辛苦一点，倒不怕，就怕没得仗打，部队情绪受影响。”韩先楚最关心的是部队能否有仗打。

“不错，你尽快带部队赶回去，争取打他个歼灭战！要是去晚了，捞不到仗打，可就设法向部队交代了。”

“我得立即回去，还得抓紧时间给部队动员，一些准备工作也要做。”韩先楚很快上了吉普车。

一返回十师，立即开了个短会，向大家讲清敌情和纵队意图，要求部队克服困难，按时出发，昼夜兼程，赶往新开岭参战。

等一切工作安排妥当后，他便带上几位作战参谋，坐上吉普车，先去纵队接受任务，以便部队一赶到，就能立即投入战斗。

歼敌“千里驹”

韩先楚赶到纵队后，首先碰到原任纵队参谋长、现任十一师师长蔡正国，便急忙向他了解情况。

蔡正国情绪不怎么好，但见来者是韩先楚，便摊开作战地图，边指划边说：“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凭借武器装备好，目空一切，从沈阳出发，沿沈安公路挺进，攻占马赛集后，只留下两个营驻守，没想到被我们一口给吃掉了。这下他们不干了。谁都知道，他们是蒋介石的“千里驹”。其师长李正谊立即率部返回追我们，我师则以1个营的兵力诱其深入，他们以为我们是游击队，紧追不舍，妄图一口也把我军吃掉。现在他们已被我诱入新开岭地区，卡在那里了。”

韩先楚盯着地图，用红色标出的新开岭在宽甸以西大约35公里处，四面环山，地势险峻。看着看着，他的心里就开始琢磨了。北面的老爷岭，是最高屏障；东面瑗阳边的东山，可以控制公路东头的出口；南面黄家堡子边的南山，可以控制黄家堡子一带；西面有潘家堡子高地，可以封锁公路西头的出口。其间只有一条公路从新开岭穿过。真是天赐良机，敌二十五师这匹骄横不可一世的“千里驹”，此刻就被围困在黄家堡子一带。这还有什么说的？韩先楚一下来了情绪，忙向蔡正国说：“依我看，老爷岭军事价值最大，控制了它，就可以控制东北、正北、西北3个方向。”接着他又问：“老爷岭

现在由谁控制着？”

“我师警卫营等在坚守。”蔡正国答。

“这就好，这个战机抓得太好了。敌人孤军深入，就是插上翅膀，也是难逃，我们一定把它干掉！”韩先楚十分兴奋，语气坚定。

“干掉个鬼呀！刚刚接到纵队指挥部电话，要我们准备撤出战斗。”

“要撤出战斗，为什么？”韩先楚感到意外，“这么好的战机，怎么可以放弃呢？纵队指挥部在哪里？快点带我去！”蔡正国派人护送韩先楚到纵队指挥部。

翻身下马，韩先楚见到胡奇才，第一句话就说：“这么好的战机，听说你准备放弃？”

“哦！这么快就来了，情况也都知道了？”胡奇才见韩先楚赶来了，惊奇中带有喜悦的神色。

“我一赶到这里，就有同志向我反映了情况。你电报催我回来，不就为了消灭二十五师吗？我日夜兼程往回赶，可好，刚赶到，你的决心又要变，不打了，这怎么向下面交代？”韩先楚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

“十二师已向敌侧后运动，还没有到达预定位置，无法通知。”胡奇才十分理解韩先楚的心情，但却有点为难。

“怎么还没有通知十二师？搞不好，他们要吃亏的！”韩先楚更加心急了。

胡奇才的眉头皱了起来：“不光是十二师，十师也没有回来，我们担心主力不在，兵力不集中，这仗不好打……”

韩先楚说：“十师今天肯定会赶回来！这我有把握。”接着，又十分诚恳他说，“这次战机，你抓得很好，老胡。我们不能轻易放弃。我的意见是打，坚决把二十五师干掉！”

“二十五师是国民党军主力师之一，干掉它，不是那么容易啊！”

胡奇才不是没有道理，起码不能轻敌啊！这个二十五师，全部美式装备，是国民党军中数一数二的精锐师，战斗力较强，关麟征和杜聿明就是靠它发家的。抗战时，曾远征印度，在打通中缅公路通道时也打出了名。敢于执行危险任务，又善于迂回包围，素有“能征善战千里驹”之称。而其师长李正谊，是黄埔四期毕业生，是关麟征、杜聿明的同乡，深受关、杜的宠爱与信任，因而轻世做物，倚势凌人。对待这种部队，对待这种人，不能不多考虑一些，多准备几手。

韩先楚据理力争，胡奇才步步为营，两人开诚布公，言来语去，也不知彭嘉庆政委什么时候来了。他听了一阵，知道两人有些不同的看法，便插话说：“老韩，你刚回来，也许不甚了解，原来下决心时，这一路敌人只是二十五师师部带两个团，它的另一个团给他们军作预备队，随军部行动。现在这个团已归建了。这样，二十五师就是3个完整的团，有9000多人，而我们，算上第十师，也不足两万人，仅两倍于敌，装备又远不如敌人，想吃掉它，恐怕不容易。是根据这一变化，我们才准备改变决心的。”

韩先楚说：“我也认为应该集中4倍、5倍于敌的兵力，有把握地打。但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如果等有了4倍、5倍于敌人的条件，那么在南满我们就没有仗可打了，因为我们只有两个纵队，而敌人有好几个师，而且还会增加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吗？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一点都没错，但也得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处理。这次，敌人是3个团，

我们有 8 个团，另加 1 个炮兵团，已两倍于敌了。何况敌人孤军深入，已经钻进了我们的口袋了，这对我们十分有利。再说，他路敌人又不能及时赶来支援。敌人骄狂，轻视我军。我兵力集中，士气高昂，又占地理优势这些条件，足可以吃掉这股敌人……”

韩先楚这么一说，胡、彭两人都陷入了沉思，最后 3 人共同下了决心：打！

决心下定后，胡奇才立即给蔡正国打电话，撤销原准备撤出战斗的通知，要求部队抓紧时间，做好战前准备，等十师赶到，即向敌人发起进攻。

这时，李正谊，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包围，只感到弹、粮不够，山区道路窄又不好走，运动困难，弄不好部队就会断炊饿肚子。他在作战室踱了几步后，便叫副官发报给坐镇沈阳的杜聿明，要求他空投弹药、给养。

杜幸明却是非常精明，收到李正谊的电报后，立即在作战地图上细看起来，当他标出二十五师所处地理位置后，便惊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李正谊啊李正谊，你怎么钻进这么一条山沟里？这不是找死吗？他立即给李正谊发电，要他占领有利地形，固守待援。接着，杜聿明又一封接一封地发电给北路的一九五师，进路的二师、西路的二十二师，命令他们火速向宽甸以西的新开岭开进，救援二十五师脱离险境。

但李正谊仍刚愎自用，妄自尊大，竟给杜聿明回电，拒绝援兵。他在电文中断然说：“只要弹粮，不要援兵！”

十师经过 17 个小时连续强行军，于 10 月 31 日拂晓才到达新开岭柏林川、高丽墓子地区，韩先楚立即赶到部队了解行军情况，向他们交代新的任务。

十师归建后，纵队即决定 11 月 1 日上午 10 时发起攻击，但

由于李正谊觉察被围，再加上杜幸明的再三命令，终于上午 8 时抢占了公路南面的一座高地。而十师的行动亦受到抢占老爷岭的守敌阻击，难以前进。

十师和十一师，经过一天激战，不但进展不理想，且人员伤亡过多，战斗暂时受挫。

除此之外，令人焦虑不安的是，敌人的各路援军正渐渐逼近，从 3 个方面来援救李正谊。

韩先楚坐不住了。他首先到了二十八团，找到团长胡润生、政委张继镛和参谋长李书轩，和他们一起研究战斗情况。二十八团是攻打老爷岭的主力部队，由于老爷岭是一座易守难攻阵地，坡高，路滑，工事坚固，敌人火力强，强攻伤亡太大，而且难以成功。鉴于此，韩先楚提出从正面佯攻，两翼迂回的攻击办法，正要亲自带人去侦察进攻路线，忽然接到通知，要他速回纵队参加党委扩大会。韩先楚稍作交代，立马赶回纵队。

在会上，胡奇才详细地介绍了敌情，特别是敌援军的推进情况。显然，情况是十分的严峻。一位参谋送来一封拾到的杜聿明给李正谊的信。信是从飞机上投下来的，内容是要李正谊坚守到 11 月 2 日下午，待各路援军赶到之时，聚歼共军主力于新开岭地区。

胡奇才看了信后，当即指出：“目前情况十分严峻，如果不尽快消灭二十五师，我们就有可能被敌人包围，遭到内外夹攻而陷入被动局面。”他要大家认真考虑，这仗是打下去，还是早一点撤出？是打是撤，都要快作决定，争取时间。

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时间一分一秒都十分重要，韩先楚便首先谈起自己的意见：“从目前情况看，我们是伤亡大一些，但敌人的伤亡要比我们更大。敌人孤军深入，已进入我们的口袋，被我们四面包围，粮、弹靠空投，但大部分都投到我们阵地上。敌援军虽离我们近了，但要赶到这里，还要十几个小时。国民党军向来相互观望，指挥难以统一，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我想，只要我们能将二十五师干掉，他们就立刻会缩回去。如果我们不打，撤走，麻烦事会更多，不但前功尽弃，而且也摆脱不了目前的困境。我们一撤，二十五师会立刻硬起来，会与赶来增援的部队一起追我们。到了那时，我们会由主动变成被动，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眼下逼得我们只有一条路，这就是下决心打。只有消灭了二十五师，一切主动权都会落到我们手里。”

韩先楚发言之后，党委成员们便纷纷表示赞同他的意见。彭嘉庆政委说：“我们是有困难，但要看到敌人比我们更困难。”胡奇才司令员说：“咬紧牙打，我同意，但对敌各路援军的情况不能不考虑，我的意见，打到明天中午12时，如果还打不下来，就撤！”

会议最后决定，先集中兵力攻打老爷岭，把纵队预备队三十团也拉上去，集中一切炮火配合步兵从侧后两翼攻击。

为了争分夺秒地赶时间，韩先楚连夜赶到炮兵团，正好有40辆马车拉着炮弹赶到了。韩先楚非常高兴他说：“太好了，全部拉到老爷岭下。”接着，他又对几位团领导下达了具体作战指示：“纵队炮团、军区炮兵一团，一律向前移至距敌阵地500米至1000米处，要直接瞄准射击。拂晓前做好一切准备。”

一切准备工作，在夜色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着。攻击时间快到了，韩先楚立即回到了前线指挥所，用电话向胡奇才报告：“胡司令员，炮火已全部准备好了，就等你的命令！”

天亮时，按时胡奇才的命令，三十团开始向敌侧后两翼运动。二十八团集合起所有能拿枪的机关干部、炊事员、勤杂人员、编成1个突击队，团长胡润生任队长，政委张继璜任指导员，担任冲锋突击队。

韩先楚接到总攻开始命令后，即向各炮阵地发出了炮击命令。顿时，万炮齐鸣，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敌阵地一片火海。二十八团突击队，在炮火掩护下，迅速向敌阵地发起冲锋。

韩先楚举起望远镜，看到冲上老爷岭的战士，高兴地喊了起来：“好啊！冲上去了，快，炮兵赶快轰击敌人第2梯队！”

随着韩先楚的一声命令，几百发炮弹像长了眼似的，顷刻间在敌第二梯队两个营的人群中爆炸、开花，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死尸遍地。

攻下老爷岭，全体指战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顿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力量，更加勇猛地向各阵地发起了攻击，所向披靡，势不可当！

李正谊等二十五师指挥官妄图竭力反击，可是他们已回天乏术了。敌全线溃逃，纷纷向黄家堡子逃去。

韩先楚看到敌人不约而同地向黄家堡子逃，高兴他说：“敌人统统往黄家堡子跑好！”

当他看到敌人越来越集中，便命令炮兵向黄家堡子猛烈轰击，炸得汽车、装甲车、辎重车统统起了火。顿时，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紧接着，他又发出了向敌人冲击、开展抓俘虏竞赛的命令。

直到11月2日，四纵将士猛冲猛打，连续歼灭国民党军号称“千里驹”

的精锐部队第二十五师 8900 余人，俘少将师长李正谊、少将副师长段培德、少将团长李公言与赵振戈等大批官兵，缴获其全部武器装备，开创了东北民主联军在一次战斗中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先例，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通令嘉奖！

坚持南满

新开岭战斗结束后，胡奇才司令员因病休养，韩先楚和政治委员彭嘉庆率领纵队北上。

由于新开岭战役，辽宁军区部队的活动区域随即暴露，国民党军接连攻占了安东、庄河、桓仁、新宾等城镇，南满地区大部被国民党军占领，他们分兵把守各水陆要道、各铁路、公路关口。四纵从新开岭撤出，敌人就前堵后追，部队再次处于危急时刻。

自从 10 月 19 日国民党军恢复在东北大举进攻后，四纵各部队就一直处于奔波之中，特别是奔赴新开岭苦战数日，指战员非常疲劳，眼下又要在敌人追击下长途转移，处境非常艰难，而且，部队中除了 1000 多名伤病员外，还有大批俘虏。

韩先楚率领大部队，迎着凛冽的寒风，从敌人的缝隙中钻进钻出，终于把全纵队带到了通化以东的铁厂、六道江一带，与三纵队胜利会合。

不久，国民党军又抢占了通化、辑安等重要城镇，进一步向长白山压缩。此时，南满根据地只剩下临江、长白、蒙江（靖字）、抚松等 4 县和两条大沟，局势非常严峻。加上土匪、特务、伪警察、地主武装到处活动，不少干部被杀害，一些地方武装哗变，使部队处境更加困难。在气温零下摄氏 40 多度的严寒下，不少官兵没有棉衣、棉帽、手套等御寒用品，生活非常困难。由于老百姓家中住不下，许多部队经常露宿在冰天雪地中。在困难重重的处境下，不少人产生了消极思想，对南满的前途和命运议论纷纷，突出的问题是向何处去？革命的道路怎么走？怎样才能走出困境？等等。

韩先楚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急如焚、不无忧虑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不怕困难，就怕思想不统一，信念不坚定。大家思想统一了，什么困难都可以战胜。胜利的道路，是靠不怕困难的人走出来的。”

这时，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为了加强和统一南满的领导，坚持对敌斗争，决定将辽东军区和辽宁军区合并，组成南满军区，由原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陈云担任南满分区书记兼南满军区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肖劲光兼任南满军区司令员，肖华任副司令员。

韩先楚欣闻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突然接到电报，要纵队领导和 3 个师的师长、政委于 12 月 11 日赶到七道江参加重要军事会议。

会上，肖劲光详细地分析了敌我形势，提出了军事行动方针，他说：“我们要以军事反‘清剿’为主，以有力的游击兵团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清剿’，恢复广大乡村政权，迟滞与打击敌人的新进攻。主力集中适当位置，准备于敌进攻时，消灭其一部，配合游击战争。”

肖劲光对具体作战又提出了意见，他说：“从目前来看，南满的危急时刻已经到来，而且可能发展。但，这绝不能改变我们坚持南满的决心。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要有长期打算的思想，在任何情况下，应坚持南满……”

肖劲光报告后，与会者的热烈争论中，立刻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韩先

楚、莫文骅、唐凯、刘西元等人同意肖劲光报告的意见，要坚持南满斗争，但坚持这种意见的是少数人。另一种意见是多数，提出转移到北满。

韩先楚就南满与北满，南满与整个东北的唇齿相依的关系，以及坚持南满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作了发言。没想到他的发言却遭到了主张放弃南满、撤往北满的多数人反对。

一时，与会者各执己见。当韩先楚听到有人称赞“留得青山在”说得好时，他坐不住了，当场反驳说：“好个鬼，既然等将来打回来，不如现在就不走，只有我们坚持在南满，才能把敌人拖住，也只有拖住了敌人，北满才能保住。”

肖劲光感到坚持南满，事关全局，但这一战略意图还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具体作战方案更无法进行研究。他想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说服大家，统一思想。然而，敌人的进攻迫在眉睫，时不我待，必须从速决定。

韩先楚因形势紧张，想赶回部队，因为部队许多事在等着他。但他又想现在意见不统一，方向不明确，回到部队也不知如何行动；再说南满不能放弃，如果放弃南满将后果不堪设想，他要留下来，为坚持南满再作努力。他找到了肖劲光，说：“肖司令员，我还想参加半天会，行吗？”

“为什么？你不是发过言了吗？”肖劲光有些不解。

“我想再陈述一下保住南满的重要性。”

肖劲光看着他，点点头：“南满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和陈云同志来南满，就是为了和大家共同商量坚持南满的，想不到支持我意见的只有你们几位，多数人却主张放弃南满……”沉默了一会儿，肖劲光试探着对韩先楚说：“先楚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拿出一个纵队插入敌后，用游击战术拖住敌人，配合正面部队保卫临江，坚持在南满斗争，你看行吗？”“我也有这个想法。”韩先楚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看派哪个纵队去好？”

“我们四纵！”

“你们刚赶回来，部队太疲劳了，还没有来得及休息，许多事也没有来得及处理……”

“为了大局，你下命令吧！保证完成任务！”韩先楚语言简明，态度坚决。

肖劲光拍了拍韩先楚的肩，说：“大家的思想工作，我已请陈云同志来做。你和彭嘉庆政委先做好准备，说不定真要你们带领部队插入敌后，在敌人心里搅它个人仰马翻。”

13日晚，陈云冒着大雪连夜赶到七道江。由于战事紧张，韩先楚于12日晚上就回部队部署作战，没有参加后面的会议，也没有直接听到陈云的讲话。14日深夜，当彭嘉庆回到纵队后，他急忙问：“会议最后是怎么决定的？”

他没有等彭嘉庆回答，就通知刘澜波（安东省委书记兼四纵政治委员）、欧阳文（四纵副政委）立即来开会。

人到齐后，彭嘉庆介绍情况说：“陈云同志亲自参加了最后的会议，说得大家口服心服，最后他拍了板，三极定音了。”“什么‘三槌定音’？”

“陈云同志的意见，南满部队不走，要坚持南满，一个人也不能走，都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扛起红旗，摇旗呐喊！这是陈云同志的第一槌定音！”

“好！这一槌定得好！”韩先楚发自内心的高兴。“第二槌和第三槌是一块敲的，就是决定1个纵队插入敌后，到敌后大闹天宫，配合正面部队保

卫临江，达到坚持南满斗争的目的。”

“派哪个纵队去定了没有？”韩先楚着急地问。

大家越急，彭嘉庆反而不急，说：“肖司令员问大家，谁能打出去，要自报奋勇。我看到一时没有人吭声，就说我们四纵刚打完新开岭，就急忙赶到这里，伤员还没有处理完，新兵也尚未补充，大批俘虏也没有来得及消化，部队冬装还未解决……”

“噫！你提这些东西干什么？”韩先楚说。

彭嘉庆笑着说：“你听我把话说完。我虽然摆了许多困难，我的意思是自己把这些上级本来就知道的困难先说出来，请领导和大家不要担心我们的困难。所以，我坚决表示，我们虽然有上述一点困难，为了照顾大局，只要需要，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我们要求打出去！陈云同志听了我的表态后，马上表示说：‘好！就由你们打出去，纵队全都打出去。你们需要什么，首先保证你们的需要！’”

彭嘉庆说完，看到韩先楚等3人脸露悦色，自己也很高兴。会议结束后，彭嘉庆、韩先楚和两位副政委，又着手研究纵队3个师插入敌后的行动路线、作战方针，一直研究到天亮才确定下来。

捷报频传

韩先楚率四纵全部人马，于12月16日，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踏着没膝深的大雪，越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出敌不意地向敌后挺进，在安奉线的两侧，纵横驰骋，声东击西。转战月余，连克敌据点44处，歼敌3000余人，直逼沈阳、本溪、抚顺等城镇，搞得敌人晕头转向，只得将新二十二师和九十一师等部队回调。这样，四纵就有力地配合三纵在正面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一次对临江的进攻。

之后，四纵又奉命调回正面战场，同三纵一起粉碎了国民党第二、第三次进攻，大量地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这时，国民党军又加紧实施其“先南后北”的计划，除原有兵力外，又调集新二十二师和二七师的1个旅，新编一八四师，以及十四师、二师各一部，还从热河调来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中的1个团，共计6万余人，于1947年3月19日，分3路向临江发起第四次进攻，来势凶猛。

敌人进攻速度很快，当敌进至湾口镇、柳河地区时，有的人认为各路敌军靠得很近，来势汹汹，我军兵力不占优势，难以分割歼敌，主张暂时不打，部队避敌保存实力，待机再战。韩先楚一直在前线，了解敌情，他认为敌八十九师及五十四师的一六二团新来南满，情况不熟，却骄傲冒进，抓住他们这一弱点，集中自己的3个主力师攻敌，另用1个师阻援，是有把握消灭该敌的，因此，他力主打八十九师。

军区很快批准了韩先楚的意见，并指定他统一指挥三纵和四纵的第十师作战。

韩先楚接受任务后，立即部署兵力，以1个师阻敌援兵，以1个师从正面与敌接触，以诱敌深入至三源浦以西红石镇地区，进入预设战场，以求消灭敌人。

4月3日向敌人发起进攻，韩先楚命令八师从正面出击，七师和十师从敌人的南北两侧，进行迂回包围，勇猛攻击，切断敌退路，并迅速夺占兰山、

大花钟等制高点。经过 10 小时激战，全歼国民党第八十九师及五十四师的一六二团，俘敌副师长张效堂、秦世杰以下 8200 余人。

这次胜利，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临江的进攻，扭转了南满战局，为坚持南满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形势越来越对我有利，东北野战军转入了战略进攻。为大量消灭敌人，连续发动了夏、秋、冬季攻势作战。

1947 年夏季攻势中，韩先楚统一指挥三纵和四纵第十师，首先向国民党军防御较弱的沈吉线中段发起攻击，以三纵一部攻歼山城镇驻敌，并以主力打援。

国民党王牌新六军第二十二师急忙出援。

韩先楚动员部队时，提出：“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 6 军”的战斗口号，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战斗情绪。韩先楚将敌诱至南山城子村一带，突然发起猛攻，歼敌 1500 余人，缴获全部敌人的重装备，这一次，打垮敌人最精锐的六十团，首次给该军以沉重打击，使新六军畏我如虎，尽量避免与我作战。紧接着，韩先楚指挥第十师在三纵的配合下，向国民党战略要点、交通枢纽梅河口守敌新组建的一八四师发起猛攻。敌人凭借坚固工事，拼死固守。韩先楚指挥部队进行反复猛攻，激战 4 昼夜，歼敌 7100 余人，敌师长陈国文被俘。

夏季攻势作战时，韩先楚出任三纵司令员。秋季攻势作战中，韩先楚率纵队主力，以长途奔袭手段，隐蔽地包围敌一一六师师部。敌人惊慌失措。在混战中，摧毁了敌师部，消灭了师部直属部队，俘敌师长刘润川、副师长张绍贤。敌军失掉指挥，其余各团均很快被歼。此役毙伤俘敌 8100 余人，消灭了敌一一六师。

1947 年底，东北野战军开始冬季攻势，主力挺进至沈阳西北寻机歼敌。

国民党东北军政长官陈诚，觉察东野动向后十分紧张，为了确保沈阳的安全，他赶紧拼凑了 15 个师的兵力，分路气势汹汹地向东北野战军扑来。

韩先楚发现进攻的敌人中，新五军前进的位置较突出，便率三纵从敌后插入，首先切断了新五军的退路，配合兄弟部队围歼新五军。

新五军被歼后，在国民党军内部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南京东北籍军政大员及知名人士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法办陈诚以谢罪。逼得蒋无奈，只好撤了陈诚的职务，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

在辽沈战役中，韩先楚指挥三纵首先攻克义县，打响了战役的第一炮，而后率部进至锦州城北，担任了主攻重任。

守锦州的第六兵团是由范汉杰指挥的，约 10 万人，已在锦州经营 3 年之久，构筑了大量的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妄图依靠坚固工事固守待援。

在三纵进攻的正面有两个制高点，一是配水池，构有坚固工事，敌人自吹为“第二个凡尔登”，“固若金汤”；第二个是大疙瘩，这一东一西，构成北城的两扇铁大门，居高临下，控制着通往城内的公路。这两个制高点，是攻取锦州的必由之路，却又是易守难攻的屏障，还影响炮兵对城内的射线。

韩先楚深入到火线，命令要攻取这两个制高点，扫清外围障碍，为攻城战斗创造条件。

10 月 2 日，二十团的一营和二十四团的三营分别向配水池和大疙瘩发起进攻，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敌我双方伤亡大，但战斗成胶着状态。

韩先楚一直等待战斗进展消息，但是每了解一次，都使他着急。他一边

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边紧张思考如何解决战斗受阻。夜幕刚降临，韩先楚就带领参谋人员奔向二十团指挥所。

“首长，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团长吃惊地问。

“我怎么就不能来这里？”韩先楚反问。

“这儿太危险了，敌人不断向这里打炮！”团长担心他说。

“大家都不怕，我怕什么！”韩先楚关心地问，“伤亡大吗？”

“敌人的工事太坚固，火力又猛，我们还没有完成任务。”团长把进攻受阻的情况作了汇报。

“我看，用火炮、山炮抵近射击，才能解决问题。”韩先楚观察后说。

“这地形，山炮运不上去呀！”

“我看可以把炮拆开，挖条地道运上去！”

战斗的关键时刻，指挥员一个正确的指点，就能引导部队取得战斗的胜利。

工兵连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交通壕挖到距敌阵地 100 米处。

用炮直接射击，炮声一响，就把敌人暗堡盖炸开了。

“同志们，冲啊！”全营战士一起冲锋，把敌人鼓吹为“第二个凡尔登”的配水池攻克了。

为了靠前指挥，韩先楚立即将指挥所转移到距敌城防阵地不到 1 公里的配水池。在这里对敌情观察一目了然。他从侧面观察到大疙瘩后面有敌人一条交通壕，敌人不断通过那里运送伤员和物资。他立即派一个连队从侧后插过去，切断了大疙瘩与后方的联系。很快攻下了大疙瘩，扫清了外围障碍。

14 日，开始总攻。十九团和二十三团的突击部队，冒着敌人的火力网，仅用十多分钟就越过了 300 多米的开阔地，将红旗插上了城头。

这时，国民党军暂编二十二师依托伪省署大楼顽抗，三纵后续部队受阻，战斗难以进展。

韩先楚观察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七师、八师主力以及九师、十七师由突破口东侧突入。他自己率指挥所进入城内，指挥纵深战斗。

部队经过逐点攻击，先后攻占了敌铁路管理局、车站、交通学校等据点，摧毁敌第六兵团指挥部和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机关。范汉杰化装逃遁。

战至 15 日战斗结束。三纵和兄弟部队攻克了锦州，歼敌 10 万余人。

攻克锦州后，蒋介石仍不死心，立即又纠集 10 万余人，组成西线兵团，由中将廖耀湘指挥，妄图与锦西残敌夹击东野部队；同时，还企图夺取黑山、大虎山一线阵地，指示其主力，必要时撤向营口，尔后由海上逃走。

韩先楚率三纵同兄弟部队于 20 日开始围歼敌西线兵团。

根据战场局势，韩先楚要求各级指挥员靠前指挥，以乱对乱。哪里有敌人就冲向哪里，大胆前进，要不失时机地消灭敌人。并指挥三纵先后攻占了罗家屯、张家窝棚、郑家窝棚，歼敌 1000 余人。

当东野发起全线攻击后，敌人已无法组织有力的战斗，我军只遇到一些小股部队抵抗。东野部队在黑山以东、大虎山东北、绕阳河以西的 12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开了抓俘虏竞赛。炊事员用炊具、担架员用扁担都可以抓到俘虏。

廖耀湘不想死在战场，也不想当俘虏，他化装逃跑，没想到还是被三纵后勤人员抓获。

廖耀湘被带到韩司令员处。他以恐惧的心态不敢正视韩先楚：“韩将军，

三纵就是你指挥的那个‘旋风部队’？”

“什么‘旋风部队’，我们是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旋风部队’是你们瞎嚷嚷出来的。”

“韩将军，我很敬佩阁下的指挥才能，也佩服三纵的战斗作风！我曾多次告诫我的部队，要防备你们的‘旋风部队’，没想到还是……”

截止 1948 年 11 月 2 日，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部队包括新一军、新六军两个王牌部队在内的 5 个军 12 个师，被东北野战军歼灭。随后，韩先楚出往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第 40 军军长南下作战。

（何念选）

喋血塔山，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1948年9月12日，我东北野战军向北宁线守敌发起了攻击，辽沈战役开始。

准备了一桌饭，却来了两桌客人

10月2日。公务车厢里。林彪凝视着窗外，身体随着列车震动的节奏微微摇晃着。

一阵敲门声响过，刘亚楼拉开了车门。林彪依旧一动未动，不经意地问：“什么事？”

“葫芦岛敌人又增兵了，有华北剿总的新五军、独立九十五师，还有烟台的三十九军两个师。”刘亚楼的声调显得高而急。

林彪霍地站起身来，眼睛立刻盯在了地图上。突然，他转过身，大声说：“我估计，不！我可以肯定，蒋介石到了沈阳！”

攻打锦州，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全国的敌我形势，特别是东北战场的敌我态势，对下一步任务作了详尽的分析之后决定的。

锦州是北宁线的咽喉，它好像是一根扁担挑着两头，一头挑着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另一头挑着华北的国民党军队。攻下它，犹如割断了敌人的大动脉，把东北和关内的蒋军分割开来，关上了东北的大门，切断长、沈之敌的南逃退路，形成“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的态势。这关系到能否全歼国民党在东北的50万军队，并直接影响到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

蒋介石看出了我攻打锦州这步棋的厉害。此次，他亲赴沈阳、北平调兵遣将，部署作战。

林彪判断葫芦岛之敌将大举援锦，造成与沈阳守敌夹击我军之势。他打锦州的决心动摇了，甚至未与政委罗荣桓商量，便以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名义向军委发了电报，拟回头打长春。

林彪的这一想法自有他的道理。与共产党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蒋介石此时像是预感到了什么，急命范汉杰固守锦州，同时从东、西两线调兵遣将，企图解救锦州之危：一面调集沈阳地区的11个师另3个骑兵旅组成援救锦州的“西进兵团”，着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先向彰武、新立屯进击，截断我军后方补给线，尔后经阜新趋义县与我军决战；一面调集华北5个师，烟台两个师海运葫芦岛，连同锦西、葫芦岛地区原有的4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着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北上增援锦州，与“西进兵团”会合，夹击东北野战军，扭转战局。

而此时，我军已摆开了作战阵容，驻守锦州以南的兵力不多。锦西、葫芦岛距锦州不超过50公里，其前沿阵地距锦州只有15公里，且无险可守。以一个纵队阻挡敌人强大的“东进兵团”，谁也没有这个把握。而蒋军的这个重兵集团如能突破塔山防线，就可迅速投入锦州作战，势必对我军造成重大威胁。

林彪惊愕地发现，我们准备了一桌饭，却来了两桌客人！“西进兵团”远在沈阳，有我第五、六、十等三个纵队牵制，林彪并不担忧。但他对近在咫尺的“东进兵团”这一桌新到的“客人”颇为担心，担心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抗住这强大的援敌。因此，他急电中央军委，想回头打长春。

林电发出后，东野首长进行了慎重研究，未等军委复电，便于次日9时再电军委，表示了“仍攻锦州”的决心，并迅速调整部署，增强南线阻援兵力：以第二兵团指挥第四、十一纵队和两个独立师，进至援敌必经的塔山、红螺山一线，阻止援敌北进，以保证攻锦作战的顺利进行。

10月6日，蒋介石又偕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以及国防部要员亲临葫芦岛督战，并命海、空军配合“东进兵团”作战。

情况更加错综复杂了。

10月11日，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把东野作战处长苏静找来，开门见山他说：

“苏静同志，派你去四纵，那里将有一场恶战。四纵、十一纵和两个独立师的任务就是把敌人隔在塔山以南，以便保证我们能够顺利攻下锦州，你给吴克华和莫文骅说清楚，四纵的任务可能更艰巨。你的任务是给他们当参谋，出主意，协助他们指挥部队坚决死守塔山。要不伯牺牲，不惜代价，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一定要顶住敌人，顶住了就是胜利。”

同一天，四纵接到东野首长电令，为切实加强一线指挥，命纵队副司令员胡奇才到塔山前沿协助十二师指挥作战，并责其每日向东野司令部发4次电报，报告敌情、我情、人员伤亡和弹药消耗情况。

必须死打硬拼，死守不退

蒋介石深知，他的“东进兵团”能否解救锦州之围，关键在于能否迅速攻下塔山，因为它是“东进兵团”援锦的必经要隘。为此，他乘坐“重庆号”巡洋舰来到连山湾，坐镇督战，并亲自给“东进兵团”的团以上军官训话，“这一次战斗胜败，关系到整个东北的存亡和几十万国军的生命。我们要有杀身成仁的气魄！”

塔山既无塔也无山，这一带是退海小丘陵，“山”是只有海拔59米的一个小土包，无险可守。难怪国民党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騫当着蒋介石的面夸下海口：“拿不下塔山，不劳总统制裁，我自会羞愧而死。”

蒋介石听后，点了点头，又指示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把‘24生’舰炮弹全打出去，把塔山给我轰平，轰平！”

10月4日，东野四纵接受了在塔山地区阻击敌人的任务，于10月8日占领塔山一线阵地。东野指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敌于塔山以南，争取7天时间，掩护主力夺取锦州，全歼守敌。东野电令指出：“我军绝对不能采取运动防御方法……必须死打硬拼，死守不退，抵抗敌之飞机大炮和步兵的猛烈冲击，利用工事沉着地准确地大量杀伤敌人。”

纵队党委认真研究了上级命令和纵队作战计划。吴克华司令员、莫文骅政委强调：“坚决执行命令，哪怕牺牲1万人，也要守住塔山。”在新式整军教育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战前动员，广大指战员下定了誓死守住塔山的决心。

四纵在东起打鱼山岛、西至白台山与十一纵的搭界处长约8000—9000米的地段上，为所属各师、团分配了防御任务。

入夜，胡奇才久久不能入睡，白天所见，像过电影一样在他的眼前闪现。主要阻击阵地到底应放在哪儿？吃紧的地方兵力配备够不够？工事构筑如何？噢，他的头又开始疼了，那是1933年在红四方面军的一次突围中，头部

中弹留下的后遗症。恶战在即，哪怕是睡上一分钟也好啊，可就是睡不着。每想到前沿阵地没有察看清楚，他便深感不安。

天刚蒙蒙亮，胡奇才便偕参谋长李福泽再次进入前沿阵地。尽管这里已在敌人炮火的射程之内，但他们还是过细地察看了有关情况。

经实地察看，他们感到，此次阻击任务比预想的要艰巨得多。除敌军在数量上、装备上占有强大优势外，地形与阵地条件也是

难守易攻，对我相当不利：敌我相距不到 500 米，中间只隔一条水不没膝的小河。而敌人占据了几处高地，我军处于低矮开阔的丘陵地带，敌在上，我在下，阵地高差 20 米。敌阵地早已设防，由交通壕与碉堡联结成完整的防御体系，进可攻退可守；我军昨日刚进占塔山一线，工事还没有修好，而且阵地纵深很浅，没有回旋余地。一旦战斗打响，当面敌人 3 个军 8 个师压过来，我阻击部队将要承受极大的压力，战斗会十分惨烈。

十二师师长江樊元、政委潘寿才正巧也来到了这里。

他们认真地研究了主要阻击阵地的选定和兵力配置等问题。胡奇才认为，是重点守小山包，还是重点守村子，直接关系到这一仗能否打赢。凭多年的作战经验，胡奇才提出：“应把守村作为重点，同时守好小山包。”侧过身，他手指塔山阵地，分析着这里的军事地形：“小山包位于公路的一侧，阻敌作用受到限制；塔山堡这个村正在公路线上，而且在小山包前面，首当其冲。”停了停，他继续说，“而且，铁路桥头堡和白台山 7 号阵地又可作为塔山堡的左右手进行侧应，这样就有了机动余地。如果不把守村作为重点，村子被敌人占去，再增加一倍的伤亡也不容易夺回。敌人如果绕过山头，就会沿公路直奔锦州，到那时，我们守塔山还有什么用？塔山堡就像整个防御阵地的门闩，失守，大门就会被打开。”

按理说，塔山堡地势低洼，不如土包好守，可是村前有条 20 米宽的饮马河，这倒成了阻挡敌人前进的天然障碍。而村中的房屋和树木也能作为工事的依托，并可进行巷战。村前土质松软，在这里挖工事好挖些，可以节省时间。

一阵沉默之后，胡奇才又斩钉截铁地补充道：“这个村子只放一个连不行，兵力要增加两倍。还要加固工事。”

“再有，我们要遵照东野总部首长的指示，用最强的连、营、团坚守阵地。一成不变地在我阵地死守不行，要进行反冲击。反冲击远了也不行，不反击，敌人会把工事筑到我工事的门口，一下就可以冲到我阵地上来；冲击远了又回不来，有被敌人吃掉和失去阵地的危险。”

胡奇才的分析颇有道理，大家权衡利弊，达到共识，采纳了胡奇才的意见，并报二兵团司令程子华和四纵领导。十二师师首长当即命令三十四团一营的另外两个连火速进到塔山堡村。

10 月 10 日拂晓，敌人向塔山及附近阵地发起了试探性进攻。

塔山前沿阵地，炮弹雨点般落下来，硝烟遮蔽了黎明时的天空。

一个声音嘶哑而惊恐的战士突然喊：“敌人上来了！”抱着枪、倚战壕休息的战士听到这一喊声，条件反射般的立刻趴在战壕沿上，进入临战状态。

只见粗大的水泥桥墩对面，小河对岸的敌人正向这里扑来，黑压压的一片。

伴着弹雨，海滩上的国民党兵缓慢地爬行着。十几艘登陆舰艇逼近了海滩。蒋军的登陆部队及冲锋部队利用我军立足未稳和海潮退落的时机，很快

占领了塔山东侧的打鱼山岛。

此时，一夜未合眼的胡奇才正在九股屯纵队指挥所里，耳畔忽然传来激烈的枪炮声，他一惊，立刻赶到莫文骅政委处打听情况。莫政委正在打电话，焦的地向十师询问情况。可事情来得大突然，十师一时也说不清。

不对！哪有无缘无故打炮的？胡奇才脑子里原本绷得很紧的弦现在绷得更紧了。他二话没说，大步流星地走出指挥所，跳上汽车，风驰电掣地赶到了十师师部所在地王善屯。

走进作战室，胡奇才一眼便看到师参谋长张捷勋正擎着一支蜡烛，紧张地查看着墙上的地图。显然，他们还没搞准这是怎么回事。胡奇才焦急地来回踱着步，感到身上的血脉在喷张。与其在这里等消息，不如自己出去搞个明白，胡奇才又急匆匆地赶到 33 高地的十师观察所，方得知打鱼山岛被蒋军攻占了。

打鱼山岛的失守，给我塔山地区左侧防线造成威胁，东野首长立刻打来电话询问情况。进攻锦州的兄弟部队也打来了电话。他们意识到了打鱼山岛失守的严重性。

必须立即把打鱼山岛夺回来！

下午 5 时，亲到十师指挥所的胡奇才手举望远镜，目不转睛地盯着二十九团一营夺回了打鱼山岛，并将敌人一部歼灭。望远镜里，显现了四散溃逃的国民党兵退入了正在涨潮的海水中，并立刻被海水吞没。胡奇才慢慢地放下望远镜，紧绷的面部线条松弛了下来。回过身，他看了看指挥所里的其他人员，轻轻地松了口气。

10 月 11 日，东野首长发来电令，点名要胡奇才到塔山前线协助十二师指挥作战。

天空已被硝烟染成了灰褐色，远近都是凄厉的枪炮声。胡奇才匆匆地往前走着，身旁跟着参谋侯文珍。大地震颤着，四周散溢着火药味和土地、房屋及树木燃着后的焦糊味。

进入十二师的交通壕，一颗炮弹在不远处落了下来，两个人不禁下意识地低了低头，弯了弯腰。胡奇才抬起头，脱下帽子，抖抖上面沾的灰土，又顺手拍了拍衣服。他的眉头一皱：交通壕大浅了，要坚持几天打硬仗，这怎么行呢？必须派工兵连构筑师指挥所、炮兵指挥所和掩蔽部。

进了指挥所，胡奇才发现十二师团以上干部都在这里。大家看到胡奇才进来，便纷纷立正。胡奇才用带满血丝的眼睛扫了一眼在场人员，发现他们的军装已被硝烟熏得脏而皱巴，有的人脸上还有一条条的黑道，大睁着的眼睛炯炯有神，可也掩饰不住一丝倦容。此时，他们已接到东野首长的电令，便集合在战壕里等候开会。

来不及问候，来不及寒暄，胡奇才首先传达了东野首长的指示和纵队党委的决心与作战方案。他与江师长、潘政委研究起了

分工和纵队直属炮兵团的指挥与步炮协同等问题。为了充分发挥炮兵作用，他们让师团山饱和迫击炮靠近前沿，选择隐蔽阵地，直打进攻之敌；把纵队炮兵配置在师指挥所附近，由 7 门射程万米以上的 90 野炮专打敌人炮兵。要求炮兵对敌炮测好距离，事先编好射击诸元，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步兵提出要求，随时可轰击敌人，重点打击敌军的第二梯队。

布置停当，胡奇才立即带上参谋到塔山堡一营阵地。

一营的战士正在对筑成的工事做最后修理。连日来苦战，已把这些战士

弄得疲惫不堪，甚至一张张年轻的脸上也没有了朝气。有的战士挖着挖着工事，便一头栽到了地上，呼呼大睡起来；有的战士嚼着嚼着饭，嘴里竟发出了鼾声。

胡奇才跳上一个由三层树、四层草包垒起来的工事，站在顶端跳了几下，感到脚下很有弹性，便问：“这能行吗？”身边的两位参谋沉默地摇了摇头。胡奇才跳下工事，大声命令：“给我用60炮炸！”

“轰”的一声，工事被炸塌了。

营长闻声跑了过来。看到眼前的一切，站在那里傻了眼。

胡奇才指着狼藉一片的工事，问周围的人：“你们的工事，连小小的60炮都经不住，能顶住敌人的飞机大炮吗？”他大声说，“我们这次打的是阵地战，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较量，抗击的是几倍于我们的敌人。敌人多如蚂蚁，他们来时，我们连个窝都没有，难道想让敌人把我们吃了？”

胡奇才站在高处，抓住时机，给在场的几十名指战员作起了动员，申明了此次阻击任务的重要性：“为了减少伤亡，顶住敌人，必须抓紧在战斗打响前把工事修好。敌人轰炸时，我们可以藏到工事里；敌人冲上来时，我们可以迅速钻出来迎敌。如果工事修不好，牺牲就要大，就不能在塔山阻挡敌人7到10天。那样，你们的东北家乡就解放不了！”

这些指战员都经历过惨烈的战斗，有实战经验。从疲惫不堪的指战员的眼神中，胡奇才明显感到了他们迫切需要休息的心态。甚至有的人对他的讲话表现出了无可奈何。可管不了那许多了，胡奇才依然口气强硬他说：“哪怕不睡觉，不吃饭，也得把工事给我修出来！”

从塔山透迤向北，直达海边连绵几十里的地带，数不清的解放军战士和当地群众正挖战壕，修筑防御工事。宣传队的队员打着快板为人们鼓劲。人们的吆喝声与零落的枪炮声混杂在了一起。许多群众打着赤膊，背着沉重的石磨、枕木、钢轨走上阵地，再把这些东西覆没在掩体上。

师指挥所。胡奇才与十二师领导研究决定，抢在敌人进攻之前，把主要炮兵阵地前移到塔山堡西北高地。布置各级掌握足够的预备队，以抗击敌人的持续进攻。胡奇才告诫各级指挥员，这次作战主要靠坚守，坚守要与反冲击结合起来。要善于依托工事，以火力杀伤敌人，不要轻易离开工事。反击时，不可久离和远离工事。

传来修筑工事的人们的吆喝声，胡奇才轻轻地地点了点头。

塔山阵地上，硝烟弥漫，热浪翻涌

头一天的试探性进攻受挫了。这一天上午，敌人调整了部署，以4个师的兵力，采用中央突破、两翼策应的战法，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向我核心阵地塔山堡发起猛攻。敌人以密集猛烈的炮火，从我前沿轰到纵深，又从纵深排击到前沿，对塔山堡进行毁灭性轰击。塔山阵地上，硝烟弥漫，热浪翻涌。

炮火准备后，敌步兵向塔山堡发起了多次进攻。在我三十四团一营阵地前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敌大兵压境，一营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敌人终在我巧妙设置的炮火的有力杀伤及一营指战员的英勇抗击下被击退了。

敌人不甘心，又集中数十门野炮、榴炮与两艘军舰的大炮，并以5架飞

机轮番投掷重型炸弹，集中轰击了半个小时，约有 2000 多发炮弹、炸弹落在 一营阵地上。敌人企图先用炮火予以摧毁，再以部队实施突击。

我一营阵地前沿工事大部被毁，人员伤亡很大。炮火还未停稳，敌人趁机又发起了集团冲锋，迅速靠近了我前沿阵地。我一营一连死守不退，顽强抗击，还是被敌人抢占了塔山堡村边的 3 处民房。

师指挥所。负责全面指挥的胡奇才与江师长、潘政委密切关注着阵地前沿的战势。当听到塔山堡边的 3 处民房被敌抢占时，三人的脸上都现出凝重的表情，立即派出第二梯队前去增援。

正在东西小山头观察前沿战斗的我一营副营长鲍仁川，知道一连吃紧，躲过了敌人的人力封锁，插进村内，迅速组织一连尚在人员，和赶到的第二梯队与敌人搏斗，杀伤大部敌人，俘敌 20 余名，恢复了原有阵地。胡奇才知道阵地又被我一连夺了口来，轻轻地松了口气。

敌人的第二次冲击被击退，又迅速组织第三次冲击，战斗进行得更加惨烈。师警卫营投入战斗，协同一营再次击退敌人。其他几个阵地也成功地阻击了敌人。

敌又以 4 个师同时向我铁路桥头堡、塔山堡、7 号阵地及杨家洼子 4 处阵地发起总攻击。我军先以猛烈的炮火进行回击，尔后发起反冲击。敌人没有料到，受到猛烈炮火轰击的塔山守军居然还有能力进行阵地前的反冲击，立时乱了阵脚，不一会儿，便不得不全线后退。

敌人刚退下去，我军又调整了部署，紧缩阵地，补充人员。纵队决定，将铁路以东阵地交由十师固守，十二师的阵地紧缩为塔山堡及白台山 6、7 号阵地，纵队和师团机关还抽调出一批勤杂人员，充实到一线连队之中。

这一天，毙伤敌人 1300 多名，我军伤亡 500 多人。

枪炮声渐渐稀落下来。胡奇才等人走出师指挥所。眼前，我军阵地惨不忍睹：工事大部分遭受了程度不同的破坏，受轻伤的战士依在战壕里，艰难地包扎着伤口。救护人员往来奔跑着。很多重伤员因来不及抢救，便默默地离开了人世。大地被鲜血染成了一片片的红色，硝烟未散尽的战场上，尸横遍野，一片狼藉。

战斗并未结束，明日将要面临更激烈的对抗。望着伤亡的战士，胡奇才心情异常沉重。为了减少下一次战斗的伤亡，他指示各团抓紧修复和加固工事。

阵地上，在修复工事的官兵队伍里，不时夹杂着当地老百姓跑动的身影。不远处传来了吵嚷声。胡奇才走了过去。

几个战士正与几个当地老百姓指手划脚他说着什么，越说嗓门越大。

“老乡，这里大危险了，敌人随时可能攻过来。你们还是快离开这里吧。”一位战士恳求他说。

“那可不行。你看你们累成啥样了？有的战士连吃饭的劲都没有了。你们是在为我们拼命啊。我们不会打仗，给你们出出力总行吧？”一位老乡说着，抄起身边的铁锹，扭头就往修筑工事的人群里走。

有一个老乡被劝急了，放下手中扛着的门板，大声嚷道：“国民党抓我去修工事，我是趁着天黑跑回来的。在这里挖了 5 天战壕，一点不累，因为我愿意。你们不要管我们了。”说着，扛起门板走了。

胡奇才听了，心中涌过一股暖流。多好的老百姓啊！为了支援解放军守好塔山阵地，2000 多当地老百姓参加了支前工作，为我军挖战壕 8000 多延

长米。有的人把门板和盖房用的木材全拿出来了，甚至连炕沿木和寿材也用在了阵地上。假如没有他们，我们能打赢这场仗吗？胡奇才又来到刚刚修完工事的指战员身边。战士太累了，见到首长到来，纷纷起立，有的竟累得腿脚不听使唤，一下子没站起来。胡奇才连忙用手按住了他们。一回头，他发现热气腾腾的饭菜就摆放在那里，老炊事员一边盛着饭菜一边说：“今天咱们吃猪肉炖粉条。闻闻，多香啊。”盛完一份，便递给战士一份，可战士对这颇能引起食欲的饭菜也缺少了兴趣。他们太困了，有的抱着碗便睡着了。

看到自己的战士疲惫成这样，任何一个带兵人也会心如刀绞般疼的。

晚上，纵队和各师政治部主任带领机关干部和宣传队进行了火线慰问。在评功、查功、记功的基础上，召开了战评庆功会，宣扬英雄事迹，给立功单位和指战员颁发嘉奖令，授予奖旗、奖章。各连队健全党组织，吸收经过战斗考验的积极分子火线入党。

向东野首长报告，塔山依然在我们手里

10月12日，敌人用了约两个军的兵力，向塔山堡、铁路桥头堡及白台山7号阵地发起了疯狂进攻。我前沿阵地失而复得，给进攻之敌大量杀伤。黄昏前，我各团经过反击，将敌人推出阵地1000米以外。

敌人调兵遣将，我军也在紧张地加紧部署。为了做到“知己知彼”，纵队又做出决定，出去捉“舌头”、割电线，扰乱敌人。

夜幕垂下来，各部队组织的小部队纷纷深入敌营。三十四团侦察排七班的5个人，居然活捉了敌二十一师六十三团的一个副团长和一个卫兵。

这位国民党军副团长供称：侯镜如向攻击塔山的国民党部队发布了10条命令。并决定，今后，蒋军利用其所处位置地势高的优势，使用瞰制火力掩护部队前进。明天，国民党军将要采取“波浪式”战法，海、空军全力出击，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亲临指挥海空军参战，配合号称“赵子龙师”的蒋九十五师攻打塔山。

胡奇才得知了敌俘虏的口供，知道明天面临战势的严重性，他立刻与十二师领导研究了如何粉碎敌人“波浪式”冲击的作战方案；要求各团、营、连抓紧修复和加固工事，抓紧休息；重申了保持预备队的指示，以便各级保有足够的后续力量。

第二天，当硝烟还未散尽的天边刚刚露出晨光时，敌人的数十门重炮和军舰、飞机又叫嚣了起来，顿时，塔山大火燃烧起来；小河的水柱被高高掀起，又缓缓落下。敌机由远而近飞来，密集的重磅炸弹狂啸着纷纷落下，土砾飞溅，大地震颤。敌炮弹落在我军前沿阵地的工地上，覆盖物立刻腾空而起。几十分钟内倾泻了几千发炮弹，土炸松了好几尺，地表工事大部被摧毁。强烈的气浪，冲得战壕中的我军官兵喘不过气来。

在炮火的掩护下，敌独立九十五师、八师、一五一师、一五七师分路向我塔山阵地猛攻，两翼突破，夹击塔山。

敌独立九十五师3个团、八师二十二团，在空军掩护下，在海军大炮和数十门重炮配合下，沿铁路向我铁路桥头堡阵地发起了整营的集团冲击。

这次，敌人组织了“敢死队”、“军官团”，轮番向我8公里宽的阵地猛攻。敌军官一手拿“金圆券”，一手拿枪督进。远远望去，黑压压的敌人气势汹汹，一波一波地向我阵地涌来。一波被打下去，第二波又跟上来。战

斗处于白热化状态。这一次，敌人的来势更加凶猛了。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去死，要么发财。

敌人攻到近前，我军指战员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直杀得敌人尸横遍野，退出阵地。我军的一个加强排，守着6个碉堡和500米的战壕，战得只剩下了7个人，却抗住了敌人的8次集团冲锋。7号阵地守备的三十六团五连，战到最后只剩下了一个人……

当胡奇才得知前沿战士浴血苦战，伤亡惨重时，紧咬牙关，撑在桌子上的手不知什么时候握成了拳头。

我三十六团适时反击了，可一时撤不出来。胡奇才通过望远镜看到这一情况，立刻调三十一团协助三十六团反击。由于杀敌心切，三十一团一下冲到敌群里与敌扭成一团，硬是分解不开了。如果时间拖久了，敌人后续部队上来，于我不利，胡奇才很是焦急。他立刻命令炮兵团团长王一平：“用90野炮，向敌人后续部队，给我轰！”

王团长为难他说：“恐怕不行。只有几发炮弹了。”

“就是剩下一发，也要给我打！不把敌人打散，三十一团就报销了！”

王团长二话不说，转身去下命令。几炮打出，正中敌群，敌人乱作一团，三十一团反击部队迅速撤了回来。

胡奇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东野指挥所里，通信参谋不断地呼叫：“塔山——塔山！”听着密集的枪炮声，林彪焦急地来回踱着步。塔山来电，报告了塔山我守军抗击着强大敌人的进攻，伤亡惨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彼此不安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塔山防线一旦崩溃，敌“东进兵团”便会长趋直入，兵临锦州城下，到那时，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在考虑是否把总预备队拉上去。林彪沉思半晌，开口道：“总预备队先不动。告诉塔山，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塔山！”

这一天的战斗，是塔山守备队开战以来最惨烈的。敌人丢在我阵地前沿的尸体，有些地方竟探成了尸墙。尸墙上插着我军官兵写的标语牌：“你为什么这样来送死”、“你的妻子在怀念你”……敌人又攻上来，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些尸体。由于风吹日晒，战场的温度也随着战事的升温而升高了，尸体散发出浓烈的臭味，熏得战士恶心呕吐，鼻眼肿胀起来。

统计完战场的伤亡数字，报告给胡奇才：毙伤敌1200多名，我伤亡1000多名，几乎是一对一。我军付出代价之大，令胡奇才等人的心抽紧了。

胡奇才回过回头来，大声命令：“向东野首长报告，塔山依然在我们手里！”

蒋介石大骂：你不是黄埔生，是蝗虫，是蝗虫！

10月14日清晨，东北野战军几百门大炮齐向锦州开火，发出地动山摇的巨响。立时，深秋时节的东北大地上覆盖了一层灼热的气浪。大团大团的尘土腾空而起，不一会几，便把炮群遮笼起来。

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守敌发起了总攻。

11时，敌人再次向塔山阵地前沿发起猛攻。而我军指战员士气越来越高，看着敌人在阵地前狼狈逃窜，真是心花怒放。我军又以师预备队同三十六团预备队实施有力的反冲击。这一天，毙伤俘敌1200多名，我伤亡700多名。

正与十二师指挥员一起指挥作战的胡奇才对远近的枪炮声已充耳不闻

了，他太熟悉这种声音了，以致这声音稍有间歇，他便会立刻感到不适应。夜以继日地作战，他的眼里布满了血丝，可脸上的阴云消失了，头疼病也不治而愈。几天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我们的阻击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报告，东总首长来电。”

胡奇才转过身，接过参谋递来的电文，读着读着，他脸上焕发出了光彩。

胡、江、潘并十二师指战员：

你师在友军配合下，5天来英勇作战，顽强抗击，打退了九十五师、八师、一九八师、一九七师、一五一师、暂六十师，在海空掩护下之连续猛烈进攻，大量杀伤了敌人，并全部歼灭了打鱼山岛之敌，保障了我攻锦部队充分准备，因而取得了对锦州的顺利突破。你们这种英勇顽强的防御战，是模范的，值得赞扬的，盼你们继续努力，顽强阻击敌人，保证锦州战役的全部胜利，为下一次战役造成有利条件。

林彪 罗荣桓 刘亚楼 谭政

1948年10月14日

胡奇才看完嘉勉电，马上传给了身边的人，大声说：“快，把这消息立刻告诉阵地上的官兵。”

远处炮声隆隆，攻打锦州正在吃紧关头，胡奇才兴奋不已。这炮声，预示着我军攻锦的胜利，预示着东北全境的解放，预示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将要提早到来！

10月15日，我攻锦部队即将取得全胜之时，锦西、葫芦岛的敌人还想作最后一拼，集中了5个师的所有兵力，想以偷袭手段，并肩夺路北进，驰援锦州。

凌晨两点，敌暂六十二师、八师、一五一师不经炮火准备，便以集团冲击突然向我塔山阵地猛攻。我守备部队与敌展开了激战，经顽强抵抗和有效反击，将敌击退。

连日里，塔山堡阵地我守备三十四团作战频繁，战斗间隙还要抢修工事，极度疲劳，以致敌独立九十五师于夜间接近我前沿阵地，摸进了第一道战壕。当敌人向第二道战壕爬进时，被我一连警戒哨兵和两个送饭的炊事员发现。他们一面和敌人扭打厮杀，一面大声高喊。一连战士一阵猛打，将摸进来的敌人全部消灭。

偷袭不成，敌人又兵分三路，发起集团冲击。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我军大量杀伤敌人。

敌九十五师的两个连被我压缩在饮马河高坎下的开阔地里，进退不得，经我军阵前喊话，124名敌军放下武器，跑过来投降。

在这天晚上，我军取得攻锦胜利之后，我军集中兵力围歼敌廖耀湘兵团，四纵和十一纵继续在塔山地区阻击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保障主力的作战安全。但该敌已毫无锐气，又眼看廖耀湘兵团被歼，虽然蒋介石要求部下继续攻打塔山，可将不用命，未敢北援，反而于我解放沈阳后，逐渐停止进攻，经海上撤向了关内。

16日下午，蒋介石从沈阳坐专机飞到了葫芦岛。此时的他还不知道锦州已被攻克。到了五十四军军部，罗奇向蒋介石报告攻击塔山受挫的经过。蒋介石越听越有气，指着阙汉骞大骂：“你不是黄埔生，是蝗虫，是蝗虫！”要阙汉骞对失败这件事负责，还要枪毙他。蒋军众战将看到蒋介石发这么大

的火，吓得面如土色，一动不敢动地僵直在那里。

枪炮声稀落下来。敌人已无心恋战。胡奇才放下了手中已握得发热的望远镜。

连续6天6夜的激战，共毙伤俘敌6100多名，我伤亡3000多人。

塔山阻击战为攻锦主力夺得了时间，对攻占锦州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毛泽东得知辽沈战役进行的经过后，高兴地说：“你们四纵队在那里仗打得很好，没有让国民党增援锦州的军队迈进一步，急得蒋介石亲自坐飞机到葫芦岛督战指挥，为他调去的十多万军队鼓劲打气，一定让他们增援到锦州，结果却让你们四纵队打败了。锦西的阻击战是解放全东北很关键的一仗。”

（刘燕红）

保卫延安“蘑菇”战术奏奇效

1947年春，蒋介石调其精锐胡宗南集团25万兵力，矛头直指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妄图摧毁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消灭陕甘宁边区部队，迫使我军东渡黄河。

为了迎战敌军进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先调贺龙指挥的晋绥军区廖汉生、张宗逊所在的第一纵队（简称先为张廖纵队、后为贺（炳炎）廖纵队），担任保卫延安的神圣任务。后来，陆续调来晋绥军区的第二、第三纵队，在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指挥下，用当初仅有2万余兵力同10倍于我的敌军转战陕北，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廖汉生所在的一纵，在党中央撤出延安后的“三战三捷”中，打得敌军损兵折将，直到沙家店大捷中粉碎敌军的重点进攻。接着，他们又以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在著名的宜川瓦子街战役中歼灭敌军精锐刘勘部，从而名震陕甘宁，威震大西北。

飞师陕北，保卫延安

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原任江汉军区政委的廖汉生将军从南方重返晋绥后，在我军开始大反攻中，曾任晋绥的晋北野战军副政委。

1946年11月中旬，大同战役撤围后，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晋北野战兵团，将晋绥军区部队统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时，廖汉生改任第一纵队政委，和司令员张宗逊共同领导这支由358旅和独一旅改编而成的老部队。

第一纵队刚编定，由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调集10个旅和1个装甲团的兵力，企图偷袭延安，消灭中共中央的首脑机关，而我陕甘宁边区当时只有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共两旅兵力，势单力薄，难以抗衡，因此，中央军委决定，急调晋绥军区第一纵队飞师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

军令如山。11月16日，晋绥军区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廖汉生和张宗逊当即兼程西进临县，迅速补给弹药，积极准备渡黄河。当天，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从兴县赶到临县三交镇为部队送行。他动员部队说：蒋介石到处进攻解放区，这一回更狠毒，想打我们的脑袋、进攻延安，要摧毁我们的党中央。同志们现在就要过黄河去，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当警卫员，一定要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

第一纵队的前身，是贺龙在湘鄂西创建的红二军团。抗战中改编为358旅，部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多次袭击延安，358旅曾于1941年和1943年两次西渡黄河，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由贺老总带领这支部队从延安重返晋绥，参加抗日大反攻。今天，这支部队再次奉命西渡黄河，贺龙特意为部队送行，使部队感到责任重大，无尚光荣！

11月17日，在边区人民的热烈欢送下，廖汉生和张宗逊扬鞭跃马，率领一纵经吴堡、绥德一线，由延川向延安进军。沿途迎面看到从延安撤出的后方机关，其中一队便是坐在骡马驮子筐内延安保育院的娃娃们。面对这些情景，廖汉生感到形势紧张，任务繁重。

第一纵队在延安以东拐峁驻营时，适逢朱德总司令60大寿。廖汉生带领所部几位战斗英雄，带着镶嵌“寿”字大旗，赶往杨家岭中央礼堂，代表一纵全体指战员为朱总司令祝寿。12月7日，与张宗逊率部在延安机场，参加

名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动员大会，实为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接见张廖纵队全体指战员。

这次一纵进入延安，为时刚刚一周，很快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不仅使老战士感到无上光荣，尤其使不少投诚起义参加我军的新战士感到格外荣幸。他们对比说，在国军当兵多年，很少见到军长以上的长官；参加八路军不到半年，就能够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真是作梦都没想到啊！

会后，廖汉生所部集中在七里铺一线整训待命。这时，由于黄河以东的晋绥第二纵队发动吕梁战役，给予阎锡山和胡宗南集团一定打击，迫使胡宗南调兵回撤，推迟了进攻延安的计划。张廖纵队抓住空隙时间，原地练兵待命。

1947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将晋绥军区一纵与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和教导旅合编为陕甘宁野战军。由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廖汉生任副政委，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担任保卫延安的重任。

这时，胡宗南的西路军先以8旅兵力进犯关中地区，接着又调5旅兵力进犯陇东分区的庆阳、合水，企图吸引我军西调，尔后采用钳形攻势，向我延安发起进攻。据此，中央军委决定，以廖汉生的一纵为主力，加上新编第四旅等部，集中优势兵力，打击胡宗南由陇东来犯之敌，另以教导旅和警备团等部担任东起临镇、西到廊县的防御，保障延安的外围安全。

3月3日，据侦察报告：敌第四十八旅南撤到西华池和板桥一带，我军以两团兵力在板桥和赤城警戒。当晚，廖汉生指挥三五八旅和新四旅向西华池敌军发起突然袭击，很快占领敌军阵地，击毙敌第四十八旅旅长何奇以下1500余人。是役，本可全歼敌军，由于侦察不够周密，加上新编部队相互协调不够，战斗打成僵持局面，我军撤出战斗。

第二天，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凭借临时抢修的工事同我军对抗。虽然我军再次发起攻击，但未能奏效。

撤出战斗后，全军先在富县开会总结经验教训，接着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在枣园中央礼堂召开陕甘宁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鉴于新编部队相互协调不好，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军番号，恢复原有番号，廖汉生和张宗逊为第一纵队政委和司令员。

3月11日，胡宗南出动50架次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两人，率领15个旅的兵力从洛川、宜川两路北上，扬言“三日内占领延安”！

这时候，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以惊人的气魄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但毛主席等领导人仍留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并且直接指挥陕甘宁部队。当时，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以东的我军，机动防御，节节抗敌，尔后，我军主力主动撤出延安，使敌军认为我军不堪一击，从而诱敌深入，紧紧拖住胡宗南集团的尾巴，寻机有效歼灭敌人。

在强敌压境的险恶形势下，由于指挥陕北部队的贺龙司令员远在河东处理晋绥问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主动请缨，是否由他来指挥陕北的两万部队同十倍于我的敌军作战？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意他的请求，决定所有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和地方武装，统统由彭德怀指挥。

据此，3月16日中央军委下达了保卫延安的命令，成立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从此，保卫延安进入高潮。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廖汉生所在的“张廖纵队”包括三五八旅和独一

旅，以及警备第七团在内，担任保卫延安的右翼，在道佐铺、甘泉、大小劳山、青北沟、小神庙地区组织防御，坚决抗击敌军进犯延安。另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王震所部，迅速西渡黄河来陕甘宁参战，与教导旅等部担任左翼，在庙尔梁、程子沟、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

张廖纵队从3月15日进入甘泉南北两线，多次击溃从咸阳、榆林公路来犯之敌，敌军每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每天只能行军几里路，从而使敌人“三天占领延安”的狂言破产。

18日下午，中央军委传来急令：毛主席要廖汉生和张宗逊赶回延安王家坪接受新任务。

廖、张二人快马加鞭，黄昏时刻赶到王家坪总部时，彭老总和习仲勋站在门口等候，他们说：毛主席在他们极力劝说下刚刚撤走了。彭老总说：党中央、毛主席和延安群众已经安全撤离，野战部队也将转移到延安东北隐蔽待机。你们一纵的任务是，今晚连夜撤进延安，明天上午放弃延安，然后向西北方向转移，把敌人引到安塞以北。

根据彭老总的指示，廖汉生立即命令一纵各部停止攻击，当晚进驻延安。

晚上，一纵各部相继进入延安，纵队司令部设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所住的地方。这一夜里，几乎从纵队指挥员到每个战士没有一人睡觉。尽管廖汉生反复做思想政治工作，说明放弃延安是个策略，但大家深深感到，我们为保卫延安而来，如今又放弃延安，心里很不好受。

第二天上午，廖汉生和张宗逊命令部队按照中央军委规定时间相继撤离延安。中午，董钊的先头部队侵占延安。

当时，延安虽是一座空城，但敌军大肆吹嘘所谓“重大胜利”，甚至狂妄叫嚣“中共已成流寇”、“共军不堪一击”等等。蒋介石在南京闻讯也手舞足蹈，除通电“嘉奖”外，并令胡宗南尽快“寻找共军主力决战”。

“蘑菇”战术，三战三捷

这次保卫延安作战，由于敌强我弱，敌我力量较为悬殊，因此，如何“与敌周旋”，然后“寻机击而歼之”，仍然是我军行之有效的战术。

“张廖纵队”撤出延安后，按照彭老总的部署，大摇大摆地向安塞方向行进，并且有意安排独一旅二团二营，在延安西北一线与敌保持接触，故意让敌军追赶，诱敌主力北进安塞。这时，刚从晋绥调来参战的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埋伏在公路以东，新四旅从青化砭向南，布成口袋阵。

果然，胡宗南中计，误认为我军主力布在安塞。于是，他除亲率前沿指挥所从洛川赶往延安督战外，并令第一军军长董钊率第一师和第九十师共5旅兵力，向安塞攻击前进，大有一举消灭我军之势。

3月24日拂晓，除了第二纵队和教导旅按部署进入伏击阵地外，廖汉生、张宗逊命令主力三五八旅进入伏击阵地，独一旅对延安和安塞之敌进入警戒。当时，我军在积雪未消、寒风刺骨的山中趴了一天，只见敌机高空侦察，但不见公路上敌军的影子。后来查明，敌军干粮不足，推迟行动一天，我军只好于黄昏回原集结地休息。

第二天拂晓，我军按原位置进入阵地。上午10时，敌整编三十一旅和另一个团全部进入青化砭伏击圈。突然间，我军军号嘹亮，伏兵四起，枪炮齐鸣，手榴弹和炮弹在敌群中开花。敌军本来负荷很重，连续行军疲劳不堪，

突然遭到伏击，顿时一片混乱，完全失去指挥。经过1小时又40分的激战，全歼敌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以下官兵2900余人，几乎无一漏网。是役，称“青化砭大捷”。我军撤出延安只有一个星期，青化砭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延安军民。

这次青化砭伏敌，由廖汉生所部的一纵三五八旅和二纵的三五九旅担任主攻，从东西两面夹击敌人，曾涌现出三五八旅八团四个连直取敌军指挥所，排长尹玉芳带领一个班生擒敌旅长李纪云的英雄集体。

胡宗南得知他的第三十一旅被歼，急令进入安塞的整编第一军5个旅调头向东，会同延安以东的整编第二十九军进犯延川、清涧、瓦窑堡，继续寻找我军主力。为了避免孤军被歼，敌军采用“方形战术”，几个旅同时并进，同行同宿，并且日走山梁，夜宿山头。

青化砭伏敌后，我军神速转至蟠龙西北地区待机，小部队仍然牵着敌军转动。敌军连连扑空，遂留第一三五旅守瓦窑堡，七十六师守延川，主力南撤。

廖汉生所部眼看敌二十九军后撤，4月6日有意截其尾部，使敌军背后受敌。

4月13日，西北野司命令廖汉生所部一纵在蟠龙西北一线阻击敌军9个旅的主力，由二纵所部伏击敌军从瓦窑堡增援的第一三五旅。

我军从敌军10个旅中歼其一旅，是“虎口拔牙”。能否阻击敌军9个旅成了关键。彭老总特意赶到一纵督战说，三五八旅对付敌一军5个旅，独一旅对付敌29军的4个旅，两路配合，让二纵吃掉敌一三五旅。

从13日到14日，廖汉生所部一纵，摆出一付决战的架势，把敌军9个旅的兵力吸引住，在几十公里的宽大正面展开阻击战，给敌军一定杀伤后又主动后撤，选择有利山头对峙，限制敌军行军一天不超过5公里。

14日这一天，敌一三五旅果然南下策应，在羊马河被我预伏的二纵所部教导旅和新四旅全部消灭。是役，歼敌一三五旅4700余人，活捉敌代旅长麦宗禹和两个团长。这是保卫延安的二战二捷。

羊马河大捷后，廖汉生所部迅速甩开敌军主力，神出鬼没地隐没在群山之中。这时，由于敌军接连受挫，胡宗南命令两军主力向东合围。廖汉生灵机一动，命令所部选择敌军一部拦截，在杀伤敌军2000余人后，主动撤走，空出大道，让敌军原路退回蟠龙。

蟠龙是延安东北的一个重镇。胡宗南在这里设有临时后勤基地。我军如能打下蟠龙，将造成敌军缺衣少食的局面。

这时，侦察报告，敌军判断我军主力和中共首脑正东渡黄河。彭老总为给敌人造成我军正渡黄河的假象，命令二纵各旅抽调精悍部队，配合晋绥军区的第三纵队向绥德撤退，吸引胡宗南的两军主力9个半旅尾追，蟠龙只留下敌一六七旅部和四九九团及保安总队驻守。

调开了敌军主力，廖汉生所部一纵和二纵，从东西两面于5月3日向蟠龙守敌发起攻击。4日全歼敌精锐一六七旅旅部、四九九团及保安队等共6700余人。号称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旅长李昆岗被一纵三五八旅活捉。是役，缴枪千余支，缴获面粉12000袋，军装4万套，子弹百余万发，骡马千余匹，以及大批其它辎重，使我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得到了补充。

蟠龙守敌被歼，延安的守敌吓得丢魂落魄，胡宗南急令董钊、刘勘带其整编一军、整编二十九军回援。看到蟠龙一六七旅覆灭的惨象，胡宗南摸不

着头脑，只得瞪眼叹息。

从3月19日我军撤出延安，到5月4日攻克蟠龙，为时一个半月，以“张廖纵队”为主力的西北野战军，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总计歼敌14000余人，活捉敌军3个旅长，显示了毛主席“蘑菇”战术的神威，证明了彭老总机动灵活的正确指挥，也极大地振奋了边区的军民。

为了庆贺三战三捷的巨大胜利，5月14日下午，西北野司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安塞县真武洞隆重召开祝捷大会。到会的5万多军民聚集在流经真武洞的延河沙滩上，喜笑颜开地参观我军缴获的各种战利品，无不欢欣鼓舞。

当天，坚持在陕北指挥作战的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也专程从百里以外赶来祝贺，并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战斗！

内线反攻，再创辉煌

蟠龙战斗后，骄横一时的胡宗南集团已被我军“磨”得损兵折将，锐气大减。这时，青海、宁夏的马家军第八十一师和八十二师乘虚侵入我陇东的安定、定边和盐池地区。为此，西北野司于5月21日发起了陇东战役。

在这次战役中，廖汉生率领一纵所部，经过八、九天的艰苦行军，于5月30日向敌军的据点蒋台发动攻击，全歼敌第八十一师第一七八团，生擒敌团长，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接着，攻克环县，继续北上，于6月30日攻占定边、安边、盐池，收复了整个三边地区。

随着西北我军的节节胜利，西北战局发生了重大转折。当年7月，党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意见，西北野战军北上榆林，紧紧拖住胡宗南的尾巴不放。

这次北上榆林，由于原一纵张宗逊调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另调廖汉生的老战友贺炳炎担任一纵司令员，廖汉生除原职政委不变外，任纵队党委书记。

榆林，是国民党在晋陕绥边的反共堡垒，守敌是邓宝珊的第二十二军15000余人。西北我军3个纵队从8月6日开始围歼，廖汉生所部七一五团前锋部队曾攻开榆林西门。由于前后配合不好，加上蒋介石得知我军围困榆林后，急调胡宗南整编第三十六师以“快速兵团”增援榆林，我军果断撤出战斗，选择战机，歼击前来增援的三十六师。

战前，西北野司召开纵队和旅以上干部会时，毛主席和周恩来也赶来参加。廖汉生首先向毛主席敬礼，代表一纵指挥员向毛主席问好。毛主席满脸笑容，鼓励到会干部说：“一定要打过山坳！”

8月11日，敌军刘戡所部向葭县逼进，他的三十六师钟松所部更是头脑发烧，公然远离敌军主力，孤军向米脂县的沙家店冒进，并且拉成一字长蛇阵，毫无警惕。

这是一个极好的战机。8月18日，廖汉生同贺炳炎率部在高柏山、老虎圪结集时，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军克服一切困难，冒雨等待敌军的到来。

第二天上午，敌军三十六师的师部在1个旅的掩护下，首先进入沙家店以东。当晚向沙家店靠拢。

8月20日拂晓，我军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向敌三十六师师部和一六五旅发起攻击。战斗中，廖汉生接到彭老总的命令：“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

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开始……你们一定要继续发扬英勇无畏的精神，立即消灭三十六师、活捉敌师长钟松……”当时敌人有飞机助阵，但我一纵英勇的三五八旅仍将敌人的反扑压了下去，并乘胜占领均家沟高地。当天下午5时，敌军三十六师部及所属两旅全部被歼，除师长钟松和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乘乱逃跑外，毙伤俘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等共6000余人。

沙家店战役告捷，我军消灭了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的三十六师，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实现了毛主席“打过山坳”的愿望。为此，中共中央高度评价这一战役的影响，指出：“经此一段，局势即可改变，利于陈（赓）谢（富治）南进”。

8月23日，西北野司在东原村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从四十里外赶来祝贺：

“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好啊！”毛主席高兴地祝贺说。“毛主席指挥得好！”廖汉生又一次代表一纵指战员为毛主席立正敬礼。

当时，由于我军陈赓兵团南渡黄河，迫使胡宗南调其在陕北主力整编第一军和二十九军南下堵截，我西北野司各部受命在咸榆公路两侧猛烈追击敌人。从米脂到延川一线，我西北野司各部在关庄、岔口等地击溃敌军4个旅。接着，廖汉生和贺炳炎奉命率部参加延（川）清（涧）战役。

这次战役从10月6日开始，到7日攻克敌外围据点，清涧城内的敌人如同热锅蚂蚁，每天几个电报求援，哀叹：“再不救援，唯死与降耳”。10日下午，三五八旅七一四团终于在友军配合下炸开北门，进行巷战，到11日清晨，全歼守敌整编76师师部和第二十四旅两个团，俘敌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廖昂等4300余人。中央军委发出通报指出：“西北我军在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下，七个月内击破胡宗南数十个旅的攻势，使我军转入了反攻……”1948年3月，西北野司的决定，进行宜（川）瓦（子街）战役。这次战役，按照彭老总“围城打援”和“钓大鱼”的策略，终于钓来了胡宗南的精锐刘戡第二十九军。经过两天的决战，歼敌1个军部、2个师部、5个旅。敌军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戡在绝望中自毙，敌九十师师长严明被击毙，敌二十六师师长王应尊被俘。由于全军覆没，蒋介石闻讯发出哀电：“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哀情何以堪！”

战斗结束，西北野战军通电嘉奖廖汉生、贺炳炎和一纵队全体指战员。毛主席除签发党中央的贺电外，并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称赞：“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到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朱泽云）

冰天雪地大厮杀，悲壮惨烈长津湖

1950年岁末，继彭德怀率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宋时轮统兵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东北部地区，参加了志愿军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起的第二次战役。关于这场战役艰苦、残酷程度，第九兵团第二十军张翼翔军长深有感触地说：“这一仗的艰苦要超过长征的时候。”廖国政副军长表示赞同地说：“从这么多天的冻饿来说，长征没有过。”这是两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老军人的亲身感受。“联合国军”东线战场美第七师所属第五十七炮兵营指挥官卡罗·D·普顿斯中校说：“对这场战斗（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战斗），我感觉是如此强烈，因为我失去了所有的战友。我们伤亡惨重。我从没有见过像这样的战斗。我曾经在二战中，遇到过德军最后一次大反攻，但也不似长津湖之战这样激烈。那情景真是不堪回首。”在这里，志愿军第九兵团的将士与“联合国军”第十军长官与士兵们终于在战场之外达到了“共识”——这是他们一生中最为恶劣的经历，战斗是那样的惨烈、那样的悲壮。

宋时轮独战东线，毛泽东说：“我们不遥制。”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乘机对这个主权国家悍然发动侵略战争，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着刚建国不久的新中国的安全。美国纠集16个国家的军队，号称“联合国军”向朝鲜首府平壤发动进攻，战局在发生急剧变化。此时，宋时轮正率领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的部队进行水上练兵，准备执行解放台湾的任务。

10月，中央军委命令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统领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准备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增援已经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消息在兵团上下传开后，出国参战的一切准备工作立即由上至下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

根据军委指示，20日，宋时轮率领兵团部和所属三个军，进驻曲阜及其附近地区整训待机。由于朝鲜战局变化很快，志愿军虽已增至6个军、3个炮兵师，兵力仍显得不足。23日，军委电令宋时轮即刻到京领受任务。

形势发展之快超过了宋时轮所预料，对于敌我之间力量的对比，宋时轮并不十分清楚。他只了解自己兵团所属各部队的作战特点、人员、装备及思想动向，他对东线“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数量的了解只是个大概，心里还没底。但是，他对这场战役胜、负的战略价值则是十分清楚的。宋时轮正是怀着这种既忐忑又兴奋的心情来到了北京。

10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宋时轮。当宋时轮全面汇报了第九兵团的详细情况之后，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时轮同志，为何劳师远征把你的兵团调入朝鲜而不就近调动部队，这一点不用说你是清楚的。军委要用人所长，要用部队所长，解放战争中你兵团练就了一身的硬骨头，是善打阻击、勇战恶敌的部队之一，现在用你兵团目的就在于此。我们要争取战略主动，扭转战局。”宋时轮的两只耳朵竖起来仔细聆听，毛泽东继续说：“德怀同志率领先期入朝的部队，第一仗是在西边打的，东边42军也打了一下，没有硬碰。目前，麦克阿瑟误认为志愿军兵力不大，仍要大举进攻，我则放纵他，要诱敌深入。麦将军的胃口太大，西边打的不过瘾，东边调‘联合国

军’第十军从兴南方向分三路直接向北惠山、江界方向逼近，企图直插鸭绿江边。此举的战略企图十分明显，一旦成功，朝鲜面临亡国危险，志愿军将被‘联合国军’挤到半岛西部约1/10的狭小地域里，抗美援朝将面临前功尽弃的可能。”毛泽东有意在这里停顿了一下：“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志愿军腹背受敌，唯一的选择是由安东至集安段退回国内。这是麦克阿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对等方案，当时朝鲜人民军不是已经把韩国军队打到半岛东南方向1/10的狭小地域釜山了吗？就在即将把李承晚的军队赶下大海之时，美军仁川登陆，把半岛拦腰截断，人民军处境危难，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挽救了局面。现在可以这样说，李承晚依仗美国，金日成有中国在支援，谁是赢家还说不准。但是我们一定要争取主动，夺取战略上的胜利。长津湖地区位于西线我军侧后，要在这里划一条线，绝不能让‘联合国军’跨过这条线。你兵团的任务就是占领有利地区，割裂敌东西联系，以消灭美军两个团为主要目标，特别是以打陆战第一师为主。美国人是最怕死的，只要陆战一师顶不住，就可以化解矛盾，争得主动。战役要立足于你的兵团独立作战，不要寄希望于增援，德怀同志也没有兵力支援东线；战役部署和指挥由你全权承担，我们不遥制；战役目标是让敌人从何而来再从何而退，之后稳定战局，这是最理想的方案。”

当毛泽东向宋时轮交待入朝作战任务时，突出强调“战略”二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对宋时轮的提示，点将不如激将；二是重点强调东线战场作战的战略意义，非一般战役作战。宋时轮想，主席请放心，我绝不会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托和信任，我宋时轮就是豁出性命来也绝不会给中国人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丢脸。

三筹棉衣未果，宋时轮麾下十五万将士只有五万件大衣。兵马已动，粮草未行。宋兵团秘密集结，尚未交火，已创“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一声军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变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

宋时轮曾在雁北战斗过，对北方寒冷的冬季有过感受，因此，这次受命伊始，宋时轮首先考虑的就是部队御寒冬衣问题。

1950年9月5日，三野关于对第九兵团北调研究执行办法致电毛泽东、中央军委并华东局：装具补充我们当尽全力满足其需要。目前该兵团冬衣系按江南气候缝制，恐不耐寒，寒区气候我们亦无经验体会，不知如何缝制才合标准，可否请东北装备御寒衣被，棉鞋帽等。

10月初，兵团计划北运山东泰安，宋时轮即到山东省委、省府，请求帮助解决第九兵团赴寒区作战的服装。省委、省府应允尽全力帮助解决。但是，战场形势急剧变化，10月12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要求“宋部提前开东北。”

宋时轮率部开往东北之后，他立即赶赴沈阳会见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当面汇报了第九兵团尚未完成换装计划，绝大部分战士、干部还穿着很薄的棉衣、解放鞋，戴大盖帽，不适应朝鲜严寒条件下作战的情况，请求东北军区予以补充。

高岗对宋时轮的请求答复说，任务紧迫，时间仓促，全部补齐来不及。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为解决第九兵团防寒与作战急需，倾其仓库所有，支援5万件大衣。宋时轮作常感谢贺晋年，能应兵团1/3部队之急。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补给重于作战，这是用兵作战之法。而这一次却例外了。

时间不多了，宋时轮遂率部进入朝鲜。

11月9日，毛泽东给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和高岗的电报中再次指出：“请高、贺用一切可能方法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服（保障御寒）之供给。”对此，东北军区确实想尽了“一切可能方法”，由于“联合国军”空中战役开始，在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后勤保障异常困难。

华东、济南、东北三次解决寒衣的计划均未达到目的，朝鲜东北部地区为世界寒区之一，温差达20多度，第九兵团广大指战员入朝作战困难可想而知。

毛泽东电令，九兵团从11月1日开始，先开一个军，其余两个军接着出动，不要间断。到战区后，受志愿军总部指挥，以寻机各个歼灭韩国首都师、第三师、美军第七师及陆战第一师等4个师为目标。该敌时位于城津、咸兴、元山及以北一带地区，有分路向临江、辑安进攻企图。

宋时轮和陶勇副司令商量，认为入朝第一仗一定要打好。元山距临江和江界只有300—500公里，我兵团15万人，若按部就班地开进，10天也走不完。为了争取战机，他令第二十七军为先导，迅速开进，他亲率少量参谋人员先期出发，了解战况，研究部署。

当时，东线战场有美第十军和韩国一军团。11月初，美军由元山、利原登陆，分三路沿黄草岭、吉州向鸭绿江推进；韩国一军团越过“三八线”，继续北犯。“联合国军”在没有弄清中国出兵意图时，力图寻找相应对策。总司令麦克阿瑟认为，中国军队及大量军用物资从中国东北地区通过鸭绿江入朝，将造成“联合国军”迅速占领全朝鲜的困难。他要求美国空军轰炸中国东北地区军事基地和鸭绿江上所有桥梁，阻止中国人民志愿军继续入朝，以实现其两个星期内完成“最后攻势”，让美军官兵“回家过圣诞节”的企图。8日，美国空军开始发动为期两周的“空袭战役”，麦克阿瑟命令美国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以最大的力量”“摧毁在满洲边界上的朝鲜这一侧的全部国际桥梁”。“空袭战役”期间每天平均出动各种飞机达1000余架次，共投弹41127吨、发射火箭弹9585枚、炸毁汽车7361辆。

宋时轮根据军委和总部的指示及当前敌情，与陶勇反复研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隐蔽企图，出敌不意地发起攻击，给东线美军迎头一击。为此规定严格的保密和伪装措施。11月7日，宋时轮指挥第九兵团开始隐蔽入朝。第二十军由辑安跨过鸭绿江，经江界、云松洞等地区进到柳潭里以西及西北地区，17日完成集结任务；第二十七军自临江进至朝鲜，向长津地区前进，21日到达旧津里地区；兵团指挥部随第二十七军过江后立即向江界胜芳洞指挥位置前进；19日，第二十六军过江后于临江、中江镇地区集结，21日进至厚昌口地区，担任兵团预备队。至此，第九兵团第一、第二梯队共3个军12个师15万余人全部秘密完成战役集结行动。

11月24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视察西线第8集团军，向前线的指挥官和士兵灌输他速战速决的战略设想。他对美第二十四师师长约翰·丘奇少将说：“我已经向你们的小伙子们的妻子和母亲打了保票，小伙子们将在圣诞节回国。可别让我当骗子。赶到鸭绿江，我就放你们走。”尔后，麦克阿瑟乘飞机经鸭绿江口掉头向东，在空中他清楚地看到白雪皑皑的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都市、村庄、荒野历历在目，没有大部队运动和集结

的痕迹。他自豪地向随行人员宣布：“交通已完全彻底被摧毁，鸭绿江两岸并无中共大部队运动迹象。”他的心腹惠特尼接着说出所见所感：“极目所望是无穷无尽的穷乡僻壤，崇山峻岭，裂谷深峡。近乎于黑色的鸭绿江水被束缚在死一般沉寂的冰雪世界中。”

7日至21日，宋时轮率部隐蔽进入战役集结地域，完成部署之后，正在积极投入战前准备。东线，第九兵团发起攻击的前一天，即26日，“联合国军”第十军美陆战第一师师长奥利弗·史密斯少将乘直升机由兴南飞抵柳潭里，听取部属对当前情况的汇报，并勘察阵地。返回途中，他在飞机上面带微笑，洋洋自得，认为朝鲜战争胜券在握，回家过圣诞节是没有问题的。俯视下望，东线战场白雪覆盖着高山、沟壑一览无余，气温奇寒，小股侦察分队活动是不可避免的，大部队机动谈何容易，在他的视线里也没有发现志愿军部队运动和集结迹象。然而，就在这块地域里，实际上第九兵团十数万将士正屏息待机。

由于对第二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未能做出正确的判断，麦克阿瑟指示第十军在东西两线“联合国军”作战部队之间出现80英里宽的间隙进行封锁，以掩护第八集团军东翼侧安全。据此，阿尔蒙德少将命令：海军陆战第一师向长津湖西侧前进，切断联接满浦、江界、熙川中共军补给线，支援第八集团军进攻，并继续向满浦进攻；美陆军第七师主力向长津湖东侧攻击前进；美陆军第九师掩护军左翼和守备军后方地域，与西线第八集团军保持密切联系。西线25日总攻发起后，东线27日开始进攻，目标是鸭绿江。

第九兵团秘密集结的战役行动，对手丝毫没有发现，更坚定了“联合国军”的作战行动。这个事实在战后被西方一些史学家高度称赞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之一”。

鹿死谁手还说不定呢！

战斗进行10余个小时，宋时轮的主力师损失过半，宋时轮痛心疾首，恐无颜见陈毅。气温骤降，积雪过膝，宋时轮咬紧牙关，终创全歼美军建制团的新纪录

宋时轮根据东线战场敌我态势，决定抓住敌人兵力分散和尚未发现志愿军集结的有利战机打击敌人。全线原定25日发起反击，宋时轮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各部队仓促入朝，准备工作尚未就绪，过急的发起战役，如打成“夹生”，于全局不利，他向志愿军首长建议，九兵团推迟两天发起反击。彭总批准了这一建议。

27日黄昏，宋时轮命令第二十军、第二十七军向长津湖地区发起进攻。当晚，第二十七军由东北、东南、西、西南四个方向对柳潭里美陆战第一师第五、第七两个团完成包围，第二十军控制了死鹰岭，割裂了柳潭里与下碇隅里敌人的联系。28日拂晓，第二十七军完成了对新兴里地区美第七师的合围。至此，长津湖地区的柳潭里、下碇隅里、新兴里、社仓里被围之敌有美陆战第一师、美第七师、美第三师部队，共计5个团、1个坦克营、3个炮兵营，比预计敌人数量多一倍。且敌以坦克组成防护圈，在火力掩护下，夜间死守，白天依靠飞机、大炮掩护，用火力杀伤志愿军。彭德怀、毛泽东先后致电宋时轮，要求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法，先歼运动增援之敌，后歼被围之敌。宋时轮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决定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他迅即定

下决心，首先歼灭新兴里美第七师第三十一团和第三十二团第一营及师属炮兵第五十七营，对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采取钳制性攻击，对社仓里美三师暂取守势。作战部署调整后，他命令第二十七军第八十、第八十一两个师担任围歼新兴里地区敌人的主攻任务。第二十军第五十九师暂归第二十七军指挥，主要担负阻击美陆战第一师第五、第七两个团突围南逃的任务。

战斗打响，第二十七军的任务相当艰巨，一方面要合围柳潭里美陆战第一师主力。围而不打是不可能的，你不打它，它要突围打你，自然要有一场突围与反突围的殊死搏斗。二是围歼新兴里美七师第三十一团。毛泽东打仗的原则中有一条是“先弱后强”，陆战第一师是美军中的强中之强，第七师则弱，先打第七师之一部，能使部队练练手，熟悉一下美军作战特点，尔后再集中全力打强敌。

自27日夜24时发起攻击时至28日晨，长津湖东岸第二十七军第八十、第八十一师全力围歼新兴里之敌，毙、伤、俘敌400余，捣毁第三十一团指挥所和炮兵第五十七营指挥所。因侦察新兴里地区美军为1个营（实为一个加强团）的信息不准确，至使突入新兴里的第八十师遭到较大伤亡。美陆战第一师骄狂得很，扬言去为第三十一团解围，均被阻于被围地域未果。

战役初始一夜，担任主攻新兴里美七师第三十一团的第二十七军八十师减员1/3；担任包围陆战第一师并阻其突围、增援新兴里的第七十九师减员近1/2，其中冻伤占两个师全部减员数量的1/3。这里已无需要叙述战斗过程的激烈程度和美军火力的强大程度，数字已经足以说明了。这使得宋时轮大伤脑筋。主力部队的主力师仅10余小时损兵折将近半，有朝一日回国见到陈毅司令员如何向这位几十年的老领导交待？这个数字使宋时轮痛心疾首。

新兴里美七师第三十一团此时指挥4个营，并非该团固有建制。因为第三十一团有1个营部署在远离新兴里以东的元丰里，而第三十二团有1个营临时编组归第三十一团指挥，说它是1个完整的建制团是从营的建制单位而言，不缺一兵一卒。同时还有加强该师的炮兵第五十七营和1个坦克分队，故称第三十一团此时为加强团。坦克分队机动性能好，见其被围，在损失部分坦克之后先跑掉了。

一夜间，新兴里地区之敌在第八十师连续猛烈的打击下，防守地域越来越小，部队残缺不全，企图固守待援。

28日，被围之敌在大量飞机、火炮和坦克的密切配合下，向第九兵团反扑，妄图夺回已经失守的部分阵地。第二十七军、第二十军各师在寒冷、饥饿、疲劳和低劣装备的极端不利条件下，坚守既得阵地，未让敌人前进一步。敌攻我攻，宋时轮依然坚定原部署，首歼美七师第三十一团。第八十师开始了第二次进攻新兴里的战斗。

内洞峙，位于新兴里以西不远，美7师部署的兵力是第三十二团1个整营，隶属第三十一团指挥，并配备炮兵、坦克各一部。该营在第八十师勇猛穿插、积极歼敌的打击下，至29日拂晓，营指挥所被摧毁，残部逃往新兴里。

激烈的战斗，使第八十师再度严重减员。29日晨，据不完全统计，全师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已达2/3。1万余人的师在不到两天时间损失6000多人。宋时轮得到这项报告的时候，震惊了。损失速度按这个指数上升，全兵团能支持多久？面对强敌还敢不敢打？能不能打？在严重的局面困扰面前，宋时轮想起毛泽东亲自交待的“战略”二字，不能退缩，退则全盘皆输，退则死！他指示参谋人员通知第八十师并告第二十七军，各团调整建制、调整战斗组

织继续作战，消灭当面之敌任务不变。作战刚刚开始，条件异常恶劣，荆棘丛生，大雪皑皑，十数万将士与险恶的大自然、与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装备的“联合国军”作殊死搏斗，死神从四面八方无时无刻都在仰出罪恶的黑手拉扯他们，部队随时都要从死神的手中争夺生命，每前进一步，都在用鲜血和肉体与死神作无情的抗争。

第二十七军打得太艰难了，不是官兵不努力，而是对当面之敌的确切数量未弄清楚。经两昼夜连续作战，从俘虏口中得知，新兴里之敌为美军1个加强团，共计4个营的兵力。柳潭里被围之敌为美陆战第一师第五团全部、第七团两个营和第十一炮兵团两个营。两处敌人的数量远远超出战前估计数量的3倍以上。宋时轮得到报告之后，再次定下决心，集中兵力，先打弱敌，首歼新兴里第三十一团，尔后转兵歼柳潭里美陆战第一师。遵照兵团首长的决心，29日，第二十七军调整部署，调整八十一师主力协同第八十师聚歼新兴里地区之敌，两个师组成联合指挥所部署新兴里战斗，第八十一师一部保障主攻部队左翼安全；第七十九师继续围困和积极牵制美陆战第一师于长津湖以西地区。

正当九兵团展开歼灭战的时候，一场严寒袭击东线战场，气温骤降，战场积雪过膝，对部队指挥、联络、作战行动造成极大困难，冻伤减员也大幅度增加。宋时轮要到新兴里亲自指挥，陶勇副司令员认为，司令员统筹全局，不能离开指挥位置，陶勇副司令员来到第一线。30日23时，第八十师、第八十一师主力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向新兴里之敌猛攻，长津湖东岸顿时被战火硝烟笼罩。奇迹即将出现。激战至12月1日凌晨，敌人被压缩至狭小地域，陶副司令员根据兵团首歼新兴里之敌的作战方案，指示第八十和第八十一两师：务求将敌全歼。战至11时许，敌伤亡惨重，待援无望，遂于13时在40余架飞机掩护下，以10余辆坦克为先导，沿公路向南突围，第八十、八十一两个师在敌机猛烈轰炸下迅速追击。敌人在南逃途中被歼过半，另一半大部企图乘汽车越过封冻的长津湖与湖西美陆战第一师会合，结果冰冻的湖面难以承受压力，全部塌落水中冻饿而死。小部残敌窜到后浦里、泗水里地区，被第八十一师阻击部队全歼。至此，“联合国军”美第七师第三十一团（加强团）全部被歼。

新兴里战斗结束了。志愿军第二十七军在宋时轮等兵团首长指挥下，创造了我军有史以来唯一一次消灭美军建制团的新纪录。

乾磁开位于长津湖地区中部，“联合国军”部署有美、英、土耳其和南朝鲜部队，有坦克、汽车百余辆。29日，敌人在飞机掩护下，企图向下碣隅里增援，被第九兵团第二十军阻击后包围，敌人在军事、政治攻势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投降。此次战斗俘敌240余名，缴获和击毁坦克、汽车78辆。

1950年12月2日零点，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及宋时轮等称：“庆祝我九兵团两次歼敌大胜利。”要求“九兵团除加紧歼灭被围之敌外，并应准备与必然增援之两个李承晚师和美三师一部作战。”宋时轮立即将电报转发各军，鼓舞士气，并令第二十军、第二十七军继续围歼柳潭里之敌，令二梯队第二十六军南下。

新兴里、乾磁开的敌人遭歼灭，使美军第十军阿尔蒙德少将受到沉重打击。加之西线战场“联合国军”已经开始全线溃退，敌人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已告破产。

宋时轮终于让美王牌陆战一师听到了自己同胞的劝降声，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宋时轮在包围、反包围中从容调兵

柳潭里是由5座孤立的高山环绕的宽阔山谷，小小的村庄坐落在这山谷的中央，其周围地势绵延曲折，村子只有几条狭窄的公路可以通往谷地之外。在这些孤立高山临近谷地的地方，耸立着有效地控制谷地的6个高地。“联合国军”第十军的美陆战第一师主力就是以柳潭里为前沿攻击阵地，企图直插江界。

10月26日，美陆战第一师在元山登陆之后，前进方向一直向北，向长津湖地区推进，期间没有遇到大规模的抵抗。11月初，美陆战第一师在水洞附近同担任阻击任务的志愿军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有过接触，战斗也很激烈。但是，第一二四师遵照“志司”命令示弱撤走，这更加滋长了美军的骄狂，正中彭德怀诱敌深入之计。15日，敌占领位于长津湖最南端的下碣隅里，南、北走向的公路从这里向北分出两条路，一路向长津湖东侧新兴里、新岱里、内洞峙地区；另一路向长津湖西侧死鹰岭、新兴里（长津湖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新兴里，东侧的新兴里为第三十一团被歼地区）、柳潭里；向南，直达兴南港口。24日，敌进占新兴里，25日，先头部队占领柳潭里。阿尔蒙德高兴地指示美陆战第一师：尽快“推进至满洲边界”。

当时，宋时轮判断美陆战第一师进入柳潭里之后，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西进，抄志愿军西线部队的后路，造成西线我军腹背受敌的态势；二是北进占领江界，扩大占领区域，尔后由北向南攻打志愿军西线部队，逼我退回鸭绿江。这个判断促使他确定的部署是：第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全部、第九十四师一部、临时配属该军的第五十九师对柳潭里、新兴里陆战第一师主力全面围歼；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六十、八十九师由上通里向北至下碣隅里一线自公路西侧向敌发动进攻，堵截陆战第一师的退路，达到全歼第五、七两个团的目的。第二十军作战地域里，高山林立，树木茂密，道路狭窄，村镇稀少，海拔达1500—2000米。

在柳潭里，美第七团以狭谷为中心设置环形防御阵地。在部队全部展开完毕开始进攻之时，遭到宋时轮第九兵团的打击。

美陆战第一师第五、七两个团拼命突围，第二十七军部队转攻为守反突围。28日，敌五次冲击1282高地，并使用空中和地面重炮对第二十七军进行轰炸，帮助敌突出重围。第七十九师伤亡较大，但敌企图未能得逞。1240高地曾一度失守，在反击中又将其夺回。敌机轮番轰炸，投掷大量燃烧弹，第七十九师防御阵地成为一片火海。军第二梯队第九十四师主力已经转向柳潭里方向，增强了防御作战力量，彭德清军长命令：“第七十九、九十四、五十九师通力合作聚歼被围之敌。”是日，该三个师已经“切断德洞通路至柳潭里的补给路。因此柳潭里完全被包围，处于孤立”。

战斗围绕着抢战要点，为下一步作战行动做准备而残酷地展开着。进攻1232高地和1240高地之敌合为一股，向1282高地猛攻，阵地上展开了原始的肉搏战。在敌飞机和炮火的狂轰滥炸之下，阵地上的岩石变成焦土，树木变成黑炭，而坚守1282、1240两高地的第二十七军部队曾几度将得而复失的阵地重新夺回。战斗仍在继续，史密斯师长命令第五、七两个团坚守柳潭里。

30日，一位美军俘虏在柳潭里陆战一师阵地前对他的同伴喊话：“你们被包围了，快投降吧！”美海军陆战第一师骄横一世，从没想到在异国作战

面临被中国军队招降纳叛，史密斯将军感到：这是有生以来的奇耻大辱。

围歼这支部队，非一般人所为。

在第二十军战斗打响3个小时后，各师全部完成预定任务。第五十八师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包围了下碣隅里之敌；第五十九师一部夺占了死鹰岭，割裂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的联系；第六十师进占富盛里，切断古土里之敌与下碣隅里的联系；第八十九师近迫社仓里。宋时轮对第二十军的使用和部署，其目的在于创造各个歼敌的有利态势，并没有想到敌在后来的溃逃中第二十军又起到了层层堵截的作用。此时的美陆战第一师被第二十七军和第二十军自柳潭里向南新兴里、死鹰岭、下碣隅里到古土里被截为5段，极有利宋时轮指挥部队一口口地吃掉。他有点操之过急，命令第二十军立即攻歼下碣隅里被围之敌。战至28日晨，第五十八师在歼敌300余人后发现，下碣隅里敌军不是1个营，而是3个陆战营、坦克营、炮兵营各一，共计5个营。30日，宋时轮电令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师：坚决攻歼下碣隅里之敌，并以第二十七军一部抢占长津桥配合作战。这着棋走对了，拿下该地区，柳潭里的美陆战第一师主力就会成为瓮中之鳖，向南没有任何退路。

在整体上双方都处在进攻的条件下，谁先胜一筹，谁将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第二十军各级指挥员都在作战第一线，大家明白：这个大写字母“Y”三岔交点的战略地位。第五十八师一七二团三连连长杨根思率第三排浴血奋战，弹药耗尽，阵地上只剩两名伤员，负重伤的杨根思临危不惧，与敌同归于尽，用鲜血和生命为第九兵团的勇士们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赞歌。

第九兵团柳潭里、下碣隅里战斗打得很顽强，也很艰苦。在这段时间的作战中，宋时轮实际投入兵力为两个军，同美陆战第一师、美第七师和美第三师一部在5个地区作战。本来，宋时轮的计划很好，在几处被围之敌中，先打美第七师第三十一团，尔后转兵歼柳潭里美陆战第一师。但战场形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已包围它，它必然要反包围来打你。所以，五个方向同时作战不足为怪。敌未能突出重围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第二十七军、第二十军部队想方设法聚歼被围的美陆战第一师也没有达到目的，且伤亡人数也很大。美军这支部队无愧于它的历史，是一支火力强大、机动能力快、始终保持“进攻”方向的部队，似乎灭不掉它。下一步怎么办？宋时轮计划调第二梯队第二十六军立即投入歼灭美陆战第一师的行列。

关于美陆战第一师的情况，新闻记者马加列德·希金斯小姐是这样记述的：“我在下碣隅里见到这些被打得焦头烂额的官兵时，曾想，他们究竟还有没有力量再经受最后一击而突围出去呢？官兵们的衣服破烂不堪，他们的脸也被刺骨的寒风吹肿，流着血，手套破了，线开了。帽子也没有了，有的耳朵被冻成紫色。还有的脚冻伤穿不上鞋子，光着脚走到医生的帐篷里……第五团团长默里中校，像落魄的亡灵一样，与指挥第五团成功地进行仁川登陆相比，完全判若两人了……”

手榴弹成为宋时轮兵团的重武器。第二梯队贻误战机，宋时轮一拳打裂桌子

长津湖美陆战第一师和美第七师处于严重危机之时，西线“联合国军”在受重创之后开始全线溃退，麦克阿瑟将军“圣诞节攻势”流产，东线“联

联合国军”第十军亦动摇。

30日，下碣隅里美陆战第一师指挥所，第十军少将司令官阿尔蒙德向陆一师少将师长史密斯和美七师少将师长巴尔传达总司令麦克阿瑟新的作战命令：长津湖附近所有部队撤往咸兴、兴南地域；要强调机动速度；对一切影响撤退的装备全部炸毁；补给食品与作战物资空军会给予支援。

据此，美陆战第一师少将史密斯师长的设想是第五、七两个团要在空中火力支援的条件下，突出重围，与下碣隅里第一团汇合，向古土里方向发展，最后撤到咸兴。该师后来的行动就是按这个方案实施的。但是，朝战中“联合国军”为什么要全线撤退？这一行动标志着什么样的结局？除麦克阿瑟总司令之外，阿尔蒙德少将、史密斯少将、巴尔少将无一知晓。而史密斯师长在一点上是庆幸的，即中国军队是一个很可怕的对头，他们勇敢、士气高昂、有很强的战斗力，从作战狠劲上看，他们完全没把陆战一师放在眼里。撤出战斗可以解陆战一师之危，免遭全军覆灭的下场，保持陆战一师的声望和荣誉。

“联合国军”的逃跑计划详尽周密。

火力，第九兵团部队是比不过美军的。就在围歼柳潭里之敌的过程中，各级指挥员都感到火力不足的压力，有的指挥官高喊：“重机枪！重机枪！为什么不使用重机枪加强火力？？重机枪手说：“水压重机枪在如此低温条件下全部冻坏，还不如一根烧火棍。”第二十军张翼翔军长后来回忆说：“当时战场形势对我很有利，可就是打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没有空中优势，运输条件差，重武器无法运送，重机枪又不能用了。火力不够是打不下来的直接原因，第二十军作战重武器就是手榴弹。”

对于武器装备在低温条件下性能失常，“联合国军”第十军也遇到了。轻机枪受冷时间长会不发火，所以每两小时必须发射一次；卡宾枪耐寒能力最差，使用前必须加温，否则不能立即射击；M1步枪耐寒力最强，但油多受冻凝固后也会失去效力，必须少涂油；重机枪以不冻液代替水，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大自然对洋人、国人均一视同仁。只是洋人在科学技术上优于国人一步，表现在战场上克服困难的方法上前者优于后者。

按照新命令，柳潭里美陆战第一师主力以强大的火炮轰击第二十军部队，陆战第五团喊出的口号是：“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在空中掩护和坦克引导之下，该敌倾其全力突围成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聚歼该敌，宋时轮深感遗憾，时间不等人，宋时轮随即改变部署，命令各军在运动中追歼、截歼逃敌。

彭德清军长遵照宋时轮的部署，命令第五十九师主力坚守死鹰岭，阻敌南逃和打击下碣隅里北援接应之敌；第七十九、九十四两师由柳潭里向死鹰岭协同第五十九师打阻击、打援敌。宋时轮命令第二十六军由长津湖东侧直插下碣隅里至真兴里一线，投入截、歼逃敌作战。

死鹰岭位于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是美陆战第一师南逃的必经之地。第五十九师主力与第八十一师密切协同，全力阻敌，激战三天，阵地几度易手又几度被夺回。但是，最终因为火力不足被敌夺路而逃。在美军头上经常有8至16架海军飞机和海军陆战队飞机实施掩护，特别是海军陆战队战斗机对地面部队给予有效的直接支援。与第一线地面部队同行的老练的飞行员，从地面上以无线电话准确地引导飞机飞向目标、进入角色，通知其发射时机

等。所以，对距美军非常近的中国军队也能进行航空火力攻击，有时对美军50米以内的地点也进行凝固汽油弹的攻击，海军陆战队的这种空地一体协同战术取得了良好的战果。

陆战第一师主力越过死鹰岭与下碣隅里之敌汇合，让宋时轮十分懊恼。他大声询问作战参谋：“第二梯队呢？第二梯队为什么不上？为什么？”参谋回答：“第二梯队还没有到位。”听到这里，宋时轮一拳打在用木板拼成的桌子上，木板断裂，地图、铅笔、茶杯散落一地。

经过一周作战，宋时轮发现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对公路的依赖性特别之大，尤其是沟壑纵横、桥梁居多的山区，阻敌前进的最好办法是破坏道路、炸毁桥梁，尔后寻机各个歼敌。张翼翔军长得到指令后马上指示六十师把下碣隅里至古土里乃至真兴里道路上的全部桥梁炸毁，封锁敌南逃之路，特别是下碣隅里向南到古土里之间的水门桥，实现宋司令员堵敌南逃、寻机全歼的作战意图。

宋时轮部署的这一行动，不能不说是给拥有1400辆汽车、坦克、火炮辎重的美陆战第一师出了一个必须立即解决的难题。

水门桥是通往咸兴的重要公路桥。它位于古土里以北6公里处，桥架设在峡谷的断崖上。4日，被第六十师炸毁。6日，美帕特里奇工兵中校在飞机上侦知，并估计架桥需要4套M2车辙桥，考虑到损失，计划空投8套，于次日完成任务。7日上午9时30分至12时，第5航空队出动C—119运输机8架，将8套钢制的车辙桥板和木制的车辙桥及组装用的部件，投向狭窄的古土里环型阵地。陆战第七团战斗群辎重队担任运输并作掩护，架桥作业任务由两个工兵排完成。是日夜，下碣隅里美海军陆战第一师第五、七团与古土里的该师第一团会合。惊人的综合能力，不仅宋时轮没有想到，兵团全体官兵都十分吃惊。因为这样的速度和技术对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来说在当时是不会想象得到的。

使宋时轮更为惊讶的是：在火力、通信和补给方面占优势的作战一师，对被以毁坏的车辆作为路障堵塞道路的地方，用推土机将其推走，打通了道路；对被毁坏的道路，使用机械化作业的工兵部队又重新修筑了迂回道路；对被毁坏的桥梁又高速重新修复。

宋时轮面前，是一个具有现代战争手段且十分顽强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随时调整决心，他最后选择的还是一个“打”。

美国陆战第一师的陆战队员们是这样形容中国军队的：“中国兵对我们的火力屏障般弹幕射击，好像不知道‘恐怖’，一直接近到手榴弹投掷的距离内。中国兵这样多，这样顽强地反复进攻的事从未见过。”

9日夜，美陆战第一师过桥的车辆和人员川流不息。对于这样走走退逃的部队，第九兵团为什么没有发起激烈的进攻呢？寒冷、疲劳与饥饿，使部队失去战斗力，冻伤使他们患了坏疽病。

水门桥南侧的堑壕内本有第二十军第六十师1个连队的埋伏，目的在于阻止美军架桥和担任阻击任务。可是，当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局面没有出现。为了整体、为了胜利，设伏部队只能匍匐在雪地上或堑壕内纹丝不动，严寒的冬季，在无遮无盖的野外阵地上，单薄的军装经过十余天的战斗尚能遮体，岂能御寒。大部官兵冻死，个别一息尚存者四肢已被冻麻木，不能活动。他们不是不想打敌、阻敌，也不是没有部署，是无情的暴风雪的袭击使他们不能。

烈火中的邱少云家喻户晓，雪地上的“邱少云”却鲜为人知，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雪地上的邱少云，1950年底，在宋时轮兵团里并不少见。

12月11日19时，宋时轮致电彭德怀并报军委的电报中讲到：第二十七军八十师二四二团第五连，除一名掉队者和一个通信员之外，全连设伏准备攻歼美七师第三十一团，待战斗打响后，该连无一人站起，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干部、战士成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细查尸体无任何伤痕与血迹。

没有留下姓名的雪地上的邱少云第九兵团还有很多……

12月8日，美海军在“麦肯雷山号”舰上举行作战会议，协同第十军向兴南撤退。隆隆的爆炸声震撼着咸兴、兴南，宋时轮指挥第九兵团就是在这样波状式弹幕攻击的条件下继续实施追歼逃敌的战斗。

为了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宋时轮令冻伤减员严重的第二十军就地肃清残敌，整顿补充，指挥第二十六、二十七两个军，克服地形与气候给作战带来的困难，不顾连日作战造成的疲劳，同人民军第三军团一道追歼敌人。17日占领咸兴，19日占领涟浦机场，给美陆战第一师残部又一次打击。24日收复兴南港和沿海各港口，东线美、李军全部被打退到“三八线”以南。

第二次战役东线长津湖地区进攻作战，宋时轮运筹帷幄，兵

团各军密切配合，给建军有百余年历史、自诩力“重装备典型”的美“王牌军”陆战第一师和第七师以歼灭性的打击，共歼1.39万余人。志愿军第二次战役的胜利，粉碎了美国侵略者所谓的“总攻势”作战，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战局，为以后更大的胜利奠定了新基础。

宋时轮向长津湖方向脱帽弯腰，深深鞠躬。清长之战被称为对鸦片战争的一个交待

12月17日，毛泽东主席对宋时轮兵团在第二次战役中的作

用，给予高度评价：“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四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同时，也指示部队：“为

了恢复元气，以利再战，提议该兵团在当前作战完全结束后整个开回东北，补充新兵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再开朝鲜作战。”

自然条件恶劣，战争环境残酷，使第9兵团指战员在经历28天战斗后身体极度疲劳。毛泽东主席提议，第9兵团撤回东北休整，以备再战。宋时轮报告了部队手足冻伤者多，不便长途行军

的情况后，建议就地休整。彭德怀报军委，毛泽东于12月21日致电彭德怀、高岗、宋时轮、陶勇：“十九日二十四时电悉。答复如下：（一）在你所述的情况之下，九兵团即在咸兴地区休整，只将重伤员运回东北，抽出干部回东北带训新兵，较为妥善……

（八）增加汽车，速运棉鞋、大衣、棉衣、被毯，极为必要，请高岗同志设法解决。”

1952年7月11日，中央军委调宋时轮回国担任军委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9月的一天，他面向长津湖方向，脱帽弯腰，深深鞠躬90度，哀悼牺牲的烈士；然后戴帽行了标准的军人举手礼，向长眠于异国他乡的战友告别、辞行。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二次战役的历史作用和意义，1992年《世界军

事》杂志刊载一位英籍华人的文章指出：“第二次战役即清（川江）、长（津湖）之战‘迫使敌军转入防御，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中国人自近代以来第一次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战胜一个西方列强（而且是最强国）的战争应该是抗美援朝战争。只是经过这场战争，中国人才真正在世界强国之林中站立起来了。清长之战是对一百年前鸦片战争的一个交待：是的，我们战败过，但是现在我们战胜了！因此，清长之战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永远引为自豪和加以纪念……建议：宣传清长之战的历史地位，每年12月24日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应当永远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特别是永远纪念这场战争的象征——清长之战。”

（穆俊杰）

粉碎“绞杀战”，建设钢铁运输线

彭老总“扣留”了他

1950年年底，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周纯全根据上级的安排，到朝鲜前线去慰问参战的志愿军。

一个多月前，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首批入朝参战的是中南军区第十三兵团的四个军。入朝后，已进行了两次战役，打得非常好，值得庆贺。解放战争期间，作为中南军区前身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长的周纯全对他们真是太熟悉了。

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指挥部设在一个矿洞里。当周纯全出现在他面前时，彭老总的眼睛突然一亮，脱口而出道：“噢，你不要走了，留下来参加抗美援朝，管管后勤！”

周纯全没一点思想准备：“这……”

“怎么，有啥想法？”

“好！等我回去交待完工作，马上就来！”周纯全很坚决地表示。

“不！”彭老总挥挥手，“你从现在开始上任，其他事你不要管了，由我向中央军委说。”

说到这里，彭老总一笑：“你不要感到我强迫了你！其实，我们都是被战争强迫的，我，还有洪学智副司令员都是这样！”

彭老总说的全是真话。

今年国庆节刚过，10月4日那天上午，作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正同几个领导同志研究开发大西北的规划，中央突然派飞机来西安，令他立即上飞机去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停留。结果彭老总连家也未回，洗漱用具也没带就上了飞机，到北京后，才知道中央决定派他参加抗美援朝，他二话没说就来了。

至于洪学智副司令员就更突然了。他本是十五兵团兼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8月上旬的一天，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派他到北京向军委请示十五兵团与广东军区合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结果中午火车刚到北京，他就被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从火车站“劫持”走了。面见林彪，指示是：“火车票已经弄到，吃过午饭马上就走！”同样是连一件换洗衣服也没带就到了东北。

这就是战争造成的特殊环境和特殊需要，这就是军人的作风。

周纯全被留下以后，彭老总立即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第二天就得到了军委的批准。彭老总告诉周纯全：“先抓工作，后下命令。”1951年2月，中央军委才正式下达了命令，任命周纯全为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前方指挥部指挥。原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任后勤部政委。

原来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一直没有成立后勤部，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一直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设在沈阳的东北军区后勤部离前线很远，派在前线抓具体工作的是由副部长张明远和副政委杜者蘅带领的一个十几个人组成的指挥所，加上几个后勤分部，力量太单薄，根本适应不了现代化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在当前志愿军后勤部尚未成立的情况下，调周纯全来抓这项工作，无疑是一个加强。

周纯全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之中。

1月5日，他与彭司令员和洪副司令员联名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改善志愿军后勤组织机构和改善部队供应的建议。

1月11日，周纯全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志愿军在作战中遇到的情况和后勤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

1月22日至30日，周纯全在沈阳参加了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会议由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主持，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李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吕正操等领导同志，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东北军区后勤部和志愿军各军后勤部及各后勤分部与东北人民政府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建设巩固的运输线，搞好前线的供应。会议认为：从朝鲜战争几个月的情况看，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大家围绕运输这个中心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领导都作了重要讲话；周纯全在会上作了发言，就如何加强组织领导和后勤力量，千方百计搞好后勤供应工作提出了建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肯定。

就这样，周纯全在被彭老总“扣留”以后，在还没有正式任命、没有正式职务的情况下，就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投入到了抗美援朝后勤保障这个中心工作之中。

关于“防空哨”的神话

防空哨，顾名思义，是监视飞机的岗哨。但一下用11个团、几万人设防空哨，这在战争史上恐怕是不多见的。

那时，我们没有制空权，而敌人则仗着他们的空中势力，一次出动几十架甚至上百架的飞机，对我后方交通线昼夜不停地进行狂轰滥炸，又是“梳篦扫射”，又是“饱和轰炸”，连一座小桥，一个人，一辆车甚至一缕炊烟都不放过，我们的铁路和公路桥梁经常处于炸了修——修了炸——炸了修的急剧变化之中；我们本来有限的汽车每天平均要损失30辆左右。4月8日这天，敌人的飞机轰炸我三登库区，一次就烧毁82节火车皮和物资，其中有粮食287万斤，豆油33万斤，单衣衬衣41万套，胶鞋19万双。此时，敌人把他1700架飞机的60—70%用来轰炸我后方运输线，并大量使用定时弹、照明弹、四爪钉、蝴蝶弹等，一般后方供应的物资，能有60%左右运到前线就不错了。

为了战胜敌机的轰炸，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周纯全动了很多脑子，他夜里亲自坐车上路实践。那时，为了防敌机轰炸，汽车部队已一律改为夜间行驶，但敌人的照明弹照得公路上如同白昼，车队仍经常遭到袭击。3月的一天，周纯全来到后勤一分部和三分部驻地检查工作，看到他们在运输线上专门设立有对空监视敌机的哨位，听到敌机声即鸣枪报警，汽车就闭灯行驶或就近隐蔽；敌机过后，哨兵发出解警信号，汽车继续开灯行驶。这种办法使司机有了“耳目”，解除了顾虑，运输效率显著提高，行车事故及车辆损失率也大为减少。

周纯全感到这个办法不错，于是很快加以总结，在其他单位进行了推广，使它很快遍及整个运输线。

防空哨每个哨位一般由3~5人组成，哨间距离在1.5~2公里之间，桥

梁、渡口及交通枢纽地段可适当加强。最多时仅由志愿军后勤负责的 2800 公里的运输线上就设置防空哨 1568 个，使用兵力达 11 个团。

为了使汽车听到报警或遇到轰炸时有地方可隐蔽，志愿军后勤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主要运输线路两侧，构筑了许多汽车掩体，最多时达到 8969 个。防空哨与掩体相结合，大大提高了汽车运输的安全系数。

防空哨在发展中，任务也渐渐得到了“扩充”，由开始时的专司对空监视敌机，发展成为既监视敌机，又打低飞之敌机及指挥交通、维修道路、救护车辆、清剿匪特和接待过往人员等多种勤务。

一次，防空哨的哨兵庞林，见敌人的飞机器张得不可一世，紧挨着山头飞行。他气得骂了一句：“他妈的，太欺负人了！”说着举起步枪，砰砰砰砰……四发子弹就打得敌机着了火，“轰隆”一声栽到地上爆炸了。

接着，汽车司机赵宝印也用步枪击落了一架敌机。

周纯全高兴地表彰了他们。他号召后勤分队普遍建立起对空射击小组，以步枪和轻机枪组成火力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打击低飞敌机的活动，有力地挫伤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他们再也不敢低飞滥炸了。

防空哨创造了神话，毛泽东主席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他 1953 年 9 月 12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抗美援朝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

毛主席的话，为抗美援朝的防空哨作了历史性的结论。

“周瞎子的队伍，过！”

周纯全在战争年代，右眼受伤失明，于是得了个绰号“周瞎子”。

他虽然身有残疾，但干起工作来却不要命。

第一届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以后，他将原来的军区后勤部前

方指挥所改为指挥部，并亲自担任指挥，还增设了许多必要的机构，人员由十几个增加到 80 多个，使后勤指挥能力和协调能力大为提高。

由于部队的作战地区已前进到三八线以南，补给线延长了十来倍，使本来就严重不足的后勤保障力量更加窘迫。增加后勤力量势在必行。周纯全在一个资料里曾看到：美国兵打仗，一个士兵要七个后勤人员保障；而我们刚好相反，一个后勤人员要保障七至十名战士。我们的人力本来不缺，为什么不能以充足的后勤力量来保障前线的需要呢！

在周纯全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由华东军区组成的后勤第六分部和由西北军区几个单位组成的后勤第七分部先后入朝，每个分部都带有 3 个大站。同时，给原来已在朝鲜的 5 个后勤分部各增加两个大站，使每个分部有了 5 个大站。运输力量也得到了成倍的增长，由 6 个大军区新组建的 6 个汽车团于 3 月底以前已全部入朝参战；由 6 个大军区新组建的 10 个人力运输团，每人携带一辆推拉两用小车，也入朝投入后勤运输；同时，辎重团也增加到 17 个，警卫勤务团增加到 8 个又 7 个营。

这些后勤力量入朝后，周纯全一个个与他们接头、交谈、交待任务，规定注意事项，经常忙得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

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道路抢修力量不可少。为此，从2月份开始，铁道兵第三师、第二师先后入朝，工兵的7个团也上阵参战，他们主要负责铁路桥梁和公路的抢修任务。指挥部还将东北人民政府支前的公路工程纵队改编为三个大队，分别配属给后勤第一、二、三分部，担负道路抢修等紧急任务。一般敌机炸坏的桥梁道路，都能在一两天内修复通车。

另外，为了适应战线南移、提高运输效率的需要，周纯全和有关同志研究确定，重点建起了东、中、西三条兵站运动线。东线由安东（今丹东）、长甸经安州、平壤、涟川到汉城，全长650多公里；中线由辑安（今集安）经熙川、顺川、三登、铁原至加平，全长800公里；西线由宁边经德阳、元山、平康到洪川，全长400多公里。

在建设运输线的同时，他们还在沿线接近前沿的地区开设了供应站，供应站一般距军后勤的距离为30—50公里，各军缺什么物资可随时到供应站领取或由分部组织下送。这样，既保证了志愿军后勤（战役后勤）与军后勤（战术后勤）的衔接，也较好地解决了运力不足的矛盾。

在那紧张繁忙的日日夜夜，周纯全尽管身体不好（血压有时高达200毫米汞柱），视力很差，却常常不分昼夜地奔忙在各条运输线上，指挥抢运各种物资，打通线路和重要关节。

一天晚上，周纯全为了检查运输线上的防空情况，亲自带着30多辆满载给养物资的车辆赶往前方。夜里11点，当车队来到山下一片开阔地时，遇上了20多架来轰炸的敌机，敌机的照明弹像天灯一样挂满了天空，照得大地一片皆白。30多辆汽车按防空哨的警报，纷纷闭灯隐蔽在路边的掩体内。但敌机仍把成吨的炸弹倾泻在公路和掩体周围，炸得烟尘滚滚，硝烟弥漫。周纯全冒着横飞的弹片，飞奔向旁边的高炮营阵地，命令营长：“开炮，狠狠地揍狗日的！”

咣！咣！咣！

炮弹呼啸着射向敌机群。

一些敌机拔高了，一些反而又扑向高炮阵地来投弹。

敌人的嚣张气焰激得周纯全愤怒异常，他恨恨地骂道：“狗日的，老鼠来舔猫屁股。给它点厉害的尝一尝！打头里的那两架！”

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两架敌机中弹，一架在附近坠毁起火，另一架拖着长长的尾巴，一抖一抖地向南逃去……

敌机飞走以后，周纯全回到公路边。他看到前边的关键路段被敌人的重磅炸弹炸出了一个深五六米、直径约七八米的大坑，汽车根本无法通过，旁边又无便道可绕，就急令通信员去附近一个山洞里找驻在那里的工兵连来抢修。通信员还没走，工兵连连长就带着全连同志扛着木料、工具匆匆赶来了——飞机的炸弹声便是他们战斗的讯号。

周纯全告诉工兵连长：“车上拉着前线部队急需的炒面，今晚不但要全部通过这里，而且赶天亮前还要走完80公里的路程。所以必须快抢快修。”

工兵连长看了看弹坑说：“靠搬石运土填平这个坑，天亮前也完不成。现在只能用原木在坑内架设便桥了！”

“架便桥要多长时间？”周纯全盯着问。

“起码得4个小时。”

“不行！”周纯全说，“4个小时后天就亮了，我们还怎么赶路？！”说完，他在坑边走了一个来回，忽然喊道：

“你过来看看：这个坑靠山的这边，还留有3尺路面，可通过一侧车轮；你们能否在坑内架起一座供汽车另一侧轮子通过的简易桥，这样既省工省时，又不耽误事情。”

工兵连长看后，高兴地说：“行，行！这样起码可以省出两个小时来！”

由于有周纯全带领汽车司机一起干，一个半小时后简易桥便修成了。

“周部长，让我第一个过吧！”汽车连连长向周纯全请求。

周纯全检查了一遍，认为没啥问题，便点头同意，并亲自站在前头指挥。汽车一只轮子压在弹坑边沿，一只轮子碾在单轨桥上，一米一米缓缓移动，一辆一辆接连通过……凌晨两点，在周纯全带领下，车队又向前奔去……

这一切，对周纯全来说已很平常了。但却被搭车的一位苏联防空兵的大队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对这位一只眼的中国军队的后勤指挥员大加赞赏，并向司机打听：他是谁？为什么只有一只眼？

“他是我们的后勤部长，眼睛受过伤，所以外号叫周瞎子……”司机是个老兵，话说得很实在。

“噢——周瞎子，周瞎子……”这个苏联军官是个搞后勤的，部队就在前面不远处驻扎。他牢牢记住了周瞎子的名字，回去后

向他的同伴们大大吹嘘了一顿。于是，周瞎子的拼搏精神不但在后勤战线叫响了，而且在友军中也有了极佳的名声。

有时后勤运输队为了安全，需要经过苏联防空兵的营地。哨兵阻拦时，司机们只要说声“我们是周瞎子的队伍”，哨兵就放行

了。有时司机索性连话都不用说，只冲着哨兵闭一下右眼，哨兵就会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噢，周瞎子的队伍，过！”

说完，还要挥挥手，敬个礼，表达一份尊敬之情。

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1951年5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加强志愿军后勤工作的决定》。《决定》命令：

着即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管理在朝鲜境内之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包括铁路、军事运输在内）。

凡过去配属志愿军后方勤务部之各部队（如工兵、炮兵、公安、通信、运输、铁道兵团各部队、工程部队等），其建制序列及党、政、军工作领导、指挥与供给关系等，今后统归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

中央军委任命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志愿军后勤司令员，周纯全为政治委员，张明远为副司令员，杜者蘅为副政治委员。

随后，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机关相继组建了后勤本部、政治部、卫生部、军械部、运输部、供给部和干部管理部，使后勤领导机关有了一套比较健全的组织、指挥和业务机构。

领导齐备，机构健全，周纯全对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充满了信心。

但是，一场更严峻的考验却又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1951年7月，美帝国主义乘朝鲜北方发生特大洪水之机，在对我发动夏秋季攻势的同时，对我后方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空中封锁战”

——“绞杀战”。

许多后勤人员不明白何为绞杀战，跑来问周纯全：“周政委，这‘绞杀战’是否像绞肉馅一样，要把我们绞碎？”

周纯全曾上过抗日军政大学，也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的校长，对战史懂一点，就笑了笑说：“你理解的意思倒不算错，但那只是敌人的妄想！‘绞杀战’，一词来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时盟国空军在意大利境内对以德军使用的铁路为主要攻击目标，发动空中袭击。他们称此为‘绞杀战’。现在美军感到他们对北朝鲜的空中封锁和交通线的轰炸，与当年的盟国空军相类似，所以也把他们的这次军事行动称之为‘绞杀战’。它要绞杀，我们就反它的绞杀！”

敌人的“绞杀战”开始了。他们在横贯朝鲜半岛的“蜂腰”部划定一个阻滞地带，一次出动数十架上百架飞机，对目标进行长时间的毁灭性的轰炸，叫嚣要阻断“所有的公路交通、铁路交通”，“摧毁各条线路上的每一辆车、每一座桥梁”。他们为了炸毁志愿军的楠亭里仓库，在13个小时内竟出动飞机28批、367架次，投掷各种炸弹2040枚。在价川、顺川和新安州的“三角地区”，不到70公里的铁路线上，敌人竟投下了3.8万枚炸弹，平均每两米就中弹一枚。

“绞杀战”开始之时，也正是洪水的高峰时期。这是几十年未遇的暴雨，导致山洪爆发，河水漫溢，洪峰最高处达10米以上，后勤物资主要集散地三登附近成了一片汪洋，仓库、医院、军营及高炮阵地皆被水淹。后方运输线路遭到严重破坏，205座公路桥梁和94座铁路桥梁被冲垮，路面被冲得七扭八裂，难以通行。

天灾加上人祸，给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造成极大的困难。

面对这严峻的局势，周纯全政委与洪学智司令员团结带领全体后勤指战员，与铁道兵部队，工程兵部队、高炮部队密切配合，在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采取抢运、抢修、防空三位一体的方针，展开了反“绞杀战”的战斗。

请看这么几个镜头：

——“倒三江”。西清川江、东大同江和东沸流江铁路大桥被毁后，由于敌机昼夜不停的轰炸，加上这些地方地势险要，一时难以修复，致使许多物资积压在江岸，无法满足前方的急需。

“铁路不通用人通，桥断路断运输不能断！”这是洪学智和周纯全向后勤人员发出的号召。他们决定采取人扛、马驮、汽车拉的办法，把积压在江边的物资倒运出去。一声令下，4个大站的几千名指战员和5个汽车团的1000多辆汽车集中到了“三江”边，他们日以继夜，一口气倒运走了西清川江桥头的600多个火车皮的物资，倒运走了东大同江边的1100多火车皮的物资；倒运走了东沸流江岸270多火车皮的物资。在繁忙的战斗中，周纯全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他一会儿扛炒面袋，一会儿扛子弹箱，肩磨破了，衣挂烂了，还要和小伙子们比着干。几次昏倒在现场，也不肯歇口气，直到完成任务。这便是抗美援朝战史上著名的“倒三江”。

——“顶牛过江”。本着先通后固、确保重点的原则，铁道兵部队先抢修了一部分简易铁路桥梁。这些桥梁不够坚固，承受能力也有限，上百吨的火车头再加上车厢重载，将使这些简易桥梁无法承受。可是没有火车头，车皮如何过桥呢？总不能既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吧？大家动脑筋，想办法，终于想出了一个“顶牛过江”的妙法：就是上百吨重的火车头不登桥，

而是从桥的一头把载物的车皮顶过桥去，再由等在桥那头的另一个火车头把车皮拉走。这样，一列列满载军用物资的火车，照样可以安全通过简易铁路桥，奔向前方。

——全军修路。“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这是朝鲜前线全军上下形成的共识。为了及时恢复被毁公路，保障前运物资、后送伤员的急需，洪学智和周纯全研究后，向志愿军首长提出了发动全军修公路的建议，得到了彭总和陈赓副司令员的赞同。彭总说：“这是战斗任务，所有部队都要集中力量搞，这有战略意义。”

9月中旬，志愿军抽出二线的11个军，再加上9个工兵团和3个工程大队，共数十万人，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抢修公路的热潮。周纯全派出有关业务干部分赴各地进行规划和指导，各单位采取分段包干和劳动竞赛的办法，使工程进度不断加快。只用了25天，就把被毁的道路全部修通了。而且还加宽了路基，新修了不少左右联结、前后贯通的迂回道路，加强了运输道路的网络化。这样就可以达到此断彼通、彼阻此畅，条条大路通前方。

——重点打击。为了保护重点地区的交通安全，根据志愿军后勤部和运输司令部的请求，志愿军首长将3个高炮师的大部调到交通枢纽“三角地区”进行对空防御，一个月内即击落敌机55架，击伤100余架，有力地打击了敌机的嚣张气焰，迫使其不得不逐渐放弃它的“绞杀”计划。

到1952年6月，敌人发动的为期一年的“绞杀战”被我志愿军彻底粉碎。美远东空军在对其“绞杀战”所作的最后分析报告中，不得不承认：“由于共军后勤系统的灵活性……绞杀作战未获成效。”美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惊叹：“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周纯全和大家一起创造了奇迹，也一起迎来了胜利的欢笑……

（窦孝鹏）

雏鹰展翅，王海长空歼顽敌

王海和他的战友们当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弱胜强，以劣胜优，威震长空，他们建立的赫赫战功，在世界空战史上独领风骚。仅英雄王海大队就击落击伤敌机 29 架，荣立集体一等功。其中王海自己击落击伤敌机 9 架（击落 4 架、击伤 5 架）。由于王海在空战中功勋卓著，1952 年 1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荣记特等功，同年 12 月 26 日记一等功，并授予“一级英雄”称号；1953 年 1 月 10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二级国旗勋章，同年 11 月 8 日再次授予他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及军功章。

英雄王海，你和你的战友们是怎样建功长空、威震世界的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叙述吧！

东望鸭绿江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爆发内战。美国纠集 16 个国家出兵，打着“联合国军”旗号，进行武装干涉，悍然越过“三八线”向中国边境逼近，并不断派飞机轰炸我东北边境城镇，把战火烧到了中国境内。同时，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阻止我军解放台湾。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进行抗美援朝作战。

为了加强我国东北地区的防空和准备组织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1950 年 10 月底，空军第 4 混成旅旅部和第 10 驱逐团由上海移防东北，改编为空军第 4 驱逐旅。11 月 16 日，奉军委空军命令，从空军第 3 旅调入第 7 驱逐团，并将旅改为师，成为空 4 师。那时我就在该师，但后来组建空 3 师时，又调我到 3 师 9 团当大队长。因此，空 4 师最先参加抗美援朝空中作战，我没赶上。1951 年 1 月 21 日参战的 4 师，由李汉击伤敌 F—84 飞机 1 架，首创战果。尔后，又取得了一系列空战胜利。

那些日子，我们每天都盼望着自己能赶去参战。但战争的进程又让人不知道能不能赶上这个趟。

1951 年 5 月 21 日，中朝人民军队并肩战斗，胜利结束了第 5 次战役，歼敌 8 万余人，把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赶到了“三八线”以南。

7 月 10 日，美国被迫坐到了谈判桌前。

但在战场上，狂妄的侵略者仍想从空中捞到他们在地面得不到的东西。

7 月 13 日，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微命令：“采取行动，以充分发挥空军战斗力的全部能力。”

8 月初，美空军制订了所谓“绞杀战”计划。决定以海军飞机、战略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破坏朝鲜北部的的主要交通干线。

这时，敌侵朝空军增加到了 19 个联队，14000 多架飞机。

当然，敌人在地面捞不到的东西，也决不允许它从空中捞到。志愿军空军因此开始了以师为单位的“轮番参战”，反敌空中封锁。

1951 年 7 月 9 日，我们大队同空 3 师的战友们一道，肩负着重任，进驻安东浪头机场进行实战锻炼。后因连日阴雨不能起飞，于 7 月 30 日转场到沈

阳。这次实战锻炼虽未战斗起飞，但却经受了转场的检验，为后来的参战作了一次实际准备。直到10月21

日，我们再次转场安东浪头，投入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去。

当时，我是空3师9团1大队大队长。

为了摸清航线和战区情况，在上级统一部署下，我们接连作了几次熟悉战区和航线的飞行。

前线，到处是硝烟弥漫、战火纷飞、断垣残壁、一片废墟。

战友们触景生情，极端愤慨，恨不得马上把美国强盗消灭干净，方解心头之恨。

我们志愿军空军和美帝国主义侵朝空军比起来，无论在兵力、装备，还是在技术上，都明显处于劣势。我们在喷气式飞机上的飞行时间平均只有24小时，仅仅掌握了中队和大队的编队技术，普遍没有飞过复杂气象，甚至连一次空靶也没打过。而美军的许多飞行员飞过上千小时，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不禁担心：我们上天后会不会打仗？能不能把敌机打下来？

“不会打就学呗！上级不是号召咱们边学边打、边打边建嘛！”有的战友说。

“原先咱们还不会拼刺刀哩！拼几次不是也会了吗！”我们这些飞行员，以前都是从陆军选调来的。许多同志在陆军打过硬仗，立过战功，经过生与死的考验，因此这样说。

“美国人是人，我们也是人，天空这么大，我就不信打不掉他那玩艺儿！”我是山东人，生于1926年1月19日，论农历是乙丑年己丑月，也可说是牛年牛月生，当时不满26岁，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所以，我在大队作战斗动员时，用浓重的胶东话给大家鼓劲。

“对！大队长讲得好。”有的人附和道：“两军交锋不怯战，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揍不下他们美国佬！”

11月的前线，冰天雪地，寒风凛冽。但大家伙儿的战斗热情却是火辣辣的，人人都有一股不信邪、不服输的劲头，我们憋足了劲儿，只等战斗机会一到，就上去同美国佬拼它一回！

长机的自责

升空作战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

当时美军的“绞杀战”计划正在实施之中，敌人几乎每天都出动大批飞机，对朝鲜北方的铁路、公路桥梁和运输车辆进行轰炸扫射。我们在初步熟悉航线、战区和作战方案之后，便在帮助我们的苏联空军部队掩护下升空作战。

起初，由于我们不会搜索目标，几次战斗起飞，都是乘兴而去，空手而归。在空中一听到敌情通报，精力就分配不过来。有的只顾看座舱内的仪表，忽略了向外搜索；有的心情急躁，东张西望；有的顾此失彼，只看一个方向。结果，几次战斗起飞不但没打上仗，连敌机的影子也没发现。

先敌发现，是战斗中致胜的重要因素。连靶子都找不着，打哪门子仗呢？大家伙儿都为这事着急，我身为大队长，心里也很窝火，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可光着急也没用，我让大家冷静下来，好好分析一下不能发现敌机的原因，想出一点解决的办法。大家把多次战斗起飞的情况都摆出来，逐次作

了分析，每个人都谈了自己的看法，一致认为，空中不能发现敌机的原因，主要是不得要领，注意力分配不当。当时，我们研究出了一个搜索发现敌机的要领，即在空中要十分沉着地按照地面指挥员指示的方向，由近及远、由远及近、由低及高，迅速而仔细地观察；在思想上，大家要互相信任，并严格按照自己的分工搜索自己的警戒区，不使可疑情况漏掉。为了提高目视搜索能力，我们还通过看飞鸟，看空中的飞机，锻炼自己的视力。经过一番锻炼，我们的空战本领渐渐有了提高。

我们经历的第一次战斗，是在 1951 年 11 月 8 日。

那天上午，师指挥所接上级通报：敌机一批，在清川江一带活动。

我们团奉命起飞，机群排着“品”字队形向南飞去。

当我带领本大队飞到清川江上空时，一簇簇黑点突然出现在右前方。

“发现敌机！发现敌机！”战友们不约而同地喊起来。

可是，就在我们准备迎上去攻击的一刹那间，狡猾的敌人先动手了。12 架 F—86 敌机猛然一个左转弯，绕到了我们机群尾后，咬住了我们，准备向我们射击。

在这紧急关头，飞在机群后尾的 8 号机马保堂眼疾手快，一扭机头便朝着敌机群猛冲过去。

敌人见势不妙，慌乱中迅即散开了。但是，敌人很快又忽啦一下子把马保堂包围起来。

马保堂浑身是胆，毫不畏惧，猛一拉操纵杆，来了个急跃升，把敌人甩在了下面。接着，他又一推机头冲下去攻击敌人。这一冲，使敌人乱了阵脚，见没便宜可占，便逃走了。

战斗就这样结束了，敌我双方均无伤亡。

然而，由于没有击落敌机，我们大队每个同志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大家谈论着失去战机的经过和教训，觉得战斗没打好，主要是失之于指挥，动作迟缓。

那天夜里，我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反复琢磨着白天战斗的情景，思索着战友们的谈话，最后悟出一条经验，空中指挥必须当机立断，攻击动作必须快、猛、狠。

第二天上午 9 时 44 分，在平壤以南发现敌 F—84 型飞机 8 架。我们于 9 时 51 分奉命起飞了 18 架飞机，由副团长林虎率领出击。

到达战区后，发现敌机群已经返航，但前方约 40 公里处还有 1 架飞机在活动。

为了抓住这一有利战机，经带队长机同意，我率领焦景文、周凤性、刘德林向敌机扑去。敌人发现后慌忙做了个 180 度转弯向南逃跑。

我们加大油门同敌机作空中赛跑，约追击了百余公里，至镇南浦上空时追上了敌机。

“这下看你往哪里逃！”我心里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赶紧瞄准敌机，不停地按动了炮弹发射按钮。随着一串串炮弹出膛，敌机在空中“扭起了秧歌”，但就是不往下掉。我又急忙按动炮钮，却不见炮弹出膛。糟糕，炮弹打光了！我一下子急了，立即退出攻击，喊道：“你们攻击！”

紧跟在我后面的焦景文、周凤性急冲了上去：“咚、咚、咚……”发出了一阵连珠炮。可是，炮弹打光了，敌机还是没有掉下去。

这时，轮到刘德林开炮了，他紧跟在敌机后面瞄准射击，一共打了 10

多炮，这架英制 FMK—8 型飞机终于冒烟起火，机毁人亡了！

我们大队首次击落敌机的消息轰动了整个机场，师、团首长和战友们都向我们表示祝贺。但是，我们没有被初战胜利所陶醉。这次战斗，虽然我们 4 人个个猛打猛冲，全部开了炮，而且人人都击中了敌机，取得了战果，可是值得吸取的教训也不少。特别是我作为带队长机，查找了自己的不足：一是见了敌机红了眼，距离 1700 米就开炮，结果把炮弹打光了，二是我作为大队长只喊了“你们攻击”四个字就完了，没有具体指挥，三是我与焦景文、周凤性 3 个人炮弹打光后，不应该各自返航，应该继续佯攻，互相掩护。

参加战斗讲评会的团首长鼓励我们说：“在我们团里，击落第一架敌机的是你们，这是你们的集体荣誉。不过，打仗只凭一股

勇劲还不够，还要讲技术、讲战术，勇敢加技术才能打胜仗。”

此后，大家钻研飞行技术和空战战术的劲头更大了。每次空战归来，常常顾不上休息就各自拿起小飞机模型，在机场上兜着

圈子表演空战经过，研究战术动作。同志们在一起坦诚相见，说

短论长，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做到打一仗，进一步。

机务人员也抱着同样的决心和愿望，在实战状态下钻研维护技术，保证飞机多出勤、出满勤。他们不顾天寒地冻，不分昼夜地在机场检查、维护飞机，并响亮地提出：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一定要做到“故障不过夜，故障不上天。”严于律己，严格要求，使我们的飞行技术和空战本领在战斗中提高很快，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空战的胜利。

“11.18”之战

从战争学习战争，使我逐步掌握了空战中的指挥主动权，大家密切配合，团结战斗，战绩非常明显。

1951 年 11 月 18 日，我们大队打了一个漂亮仗。

那天下午，美国侵朝空军的 184 架飞机活动于大同江及永柔地区上空，其中数批窜入安州、清川江一带轰炸扫射。由志愿军空军和友军空军共同编成的大机群奉命飞往战区截击敌机。

我们大队出动的 6 架飞机，由我领队向指定的战区飞去。当

飞到清川江上空时，我发现左前方低空有黑压压一大片敌机，后来知道实际是 60 多架 F—84 型战斗轰炸机，有的正向清川江桥投掷炸弹，腾起股股浓烟。

这时，敌机还没发现我机。

我立即发出口令：“跟我攻击！”

命令一出，6 架战鹰从 6000 米高度冲到 1500 米，对敌机群展开了攻击。

敌人遭到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十分惊慌，把炸弹胡乱投掉，急忙抢占位置，仓促应战。

敌人采用圆圈战术，互相掩护着与我机兜圈子，企图寻找机会，咬尾攻击。

开始，我机和敌机混在一起转了一阵圈，双方靠得很近，可就是抢占不上有利的攻击位置。我感到这样不行，因为敌机水平机动性能优于我机，而垂直机动的性能不如我机，我们应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于是，我马上喊道：“爬高占位！”

“ 哗—— ” 我们的 6 架飞机一昂机头，爬上高空，占据了有利位置。

紧接着，我们采取猛冲下来、猛拉上去、再猛冲下来的战法，如此反复数次，像“老鹰扑食”，又像虎入羊群、猫捣鼠阵似地一番猛冲，硬是把敌人摆开的“圆阵”捣乱了。

我赶紧抓住这有利时机，在 500 米左右的距离上瞄准敌机猛烈开炮，打得 2 架 F—84 飞机翻滚着栽了下去。

我的僚机飞行员焦景文也大显身手，在 600 米以内把 2 架 F—84 飞机打得火烟滚滚，坠落下去。

素有刺刀见红精神的飞行中队长孙生禄，逼近敌机至 300 米，一阵炮火把 1 架 F—84 飞机打得凌空开了花。

几分钟的战斗，接连击落敌机 5 架！

一阵猛攻，敌人被打懵了，一时摸不清我们究竟出动了多少架飞机，一个个惊慌万分，四下逃散。

我考虑到敌众我寡，不能恋战，否则，敌人如果察觉我们只有 6 架飞机，而且炮弹消耗得所剩不多了，回过头来包抄，我们就会吃亏。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口令：“集合返航！”

就这样，我们 6 架飞机无一伤亡，编着整齐的队形返回了基地。

当天，我们认真进行了讲评。大家认为，这一仗打得较有章法，发现敌机早，决心下得快，勇敢灵活，配合默契，靠得近，瞄得准，打得狠。这说明，我们经过几次锻炼确实有所进步。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不足，这就是保持双机编队作战还不够。我们下决心要在实践中学会编队作战，充分发挥集体的战斗威力。

领导对我们大队给予了表扬，并特意指出：“这一仗再没有把炮弹一下子都打光，要继续发扬！”这后惹得大家哑然失笑，不过心里都甜滋滋的。

长空战友情

在大规模的空战中，要战胜敌人，以小的代价夺取大的胜利，单凭个人的勇敢、技术还不行，更重要的是靠编队作战，靠密切协同，靠集体的力量。

随着整个战局的发展，美国侵朝空军的行动有增无减。我们大队由开始参加同几架、十几架敌机组成的“小机群”作战，逐步发展到参加与数十架、上百架敌机组成的“大机群”作战；由打性能一般的 F—80、F—84 型战斗轰炸机，逐步发展到打性能较好的 F—86 型战斗截击机。这就对我们的编队作战和协同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我们大队党支部明确提出了空战中要听从指挥，遵守纪律，统一行动，防止单机蛮干。同时，响亮地提出口号：“在空战中掩护和援助一个战友，比击落一架敌机还重要！”并规定，在评定战果时，处于僚机位置的飞行员，掩护长机击落击伤敌机者，也记其间接战果，并予奖励。

在实战中，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1951 年 12 月 15 日的战斗就是最好的例证。

这天上午 6 时 58 分，美军 F—84 型飞机 52 架，活动于平壤地区上空。

7 时 08 分，空联司指挥所令空 4 师 42 团起飞 18 架米格—15 飞机为攻击队，空 3 师 9 团起飞 20 架米格—15 飞机（其中 4 架发生故障返航，实际只有 16 架）为掩护队，出击活动于平壤地区的敌战斗轰炸机。我们大队出动 4

架飞机，在副团长林虎统一带领下迎敌。

当机群飞到清川江上空后，42团降低高度到4000米搜索前进，我们9团在7000米高度居高临下进行掩护。整个空中编队保持着严整的战斗队形，以大速度接敌，很快发现了敌机。

42团立刻冲上去攻击敌人，全团8人开炮，先后击落敌机2架。

我们密切地注视和警戒着战区的情况，准备随时冲向敌阵，支援战友。

突然，兄弟部队的1架单机被4架敌机包围了！我当即带领我们大队的4架战机向敌机扑了过去。

敌机见我们冲上来，连忙采取对策：一对双机继续跟踪我们那架单机，另一对双机拉起机头抢占高度，在后面掩护。

我们4架飞机缠住敌人不放，互相掩护，轮番攻击。

忽然，又从高空冲下来8架敌机，向我和2号机焦景文同时开了炮。

我一面和2号机焦景文一起攻击前面的敌机，为兄弟部队的战友解围，一面命令3号机马保堂和4号机刘德林截击后面的敌机。

2号机焦景文咬住敌机，按动炮钮，击落敌机一架。

这时，我一抬机头猛然看到焦景文的飞机已被敌机击中起火了，后面还有数架敌机扭住不放，疯狂攻击。于是，我一推机头猛冲过去，对准敌机狠狠开炮，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在我攻击前方的敌机时，后面的敌机又扑了上来，企图报复。3号机马保堂眼明手快，加大油门冲了上去，又打落其中1架敌机。可马保堂立即遭到6架敌机围攻，陷入了危险境地。见此情景，4号机刘德林闪电般冲上前去，勇敢地截住了6架敌机的去路，左冲右突，一鼓作气，击落敌机2架。经过激战，敌人被我们打退了。我们不仅完成了带领和掩护所参战兄弟部队作战的任务，而且创造了击落敌机5架、击伤1架的战果。

如果不是群威群胆，团结战斗，互相支援掩护，密切协同配合，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取得这样大的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们大队这种互相支援掩护、主动协同配合的战斗作风和精神，在后来的多次战斗中都得到了充分发扬。其中，1952年12月2日和3日的战斗中，飞行中队长孙生禄和僚机马连玉，还有我的僚机焦景文，在与数量处于显著优势的美空军F—86战斗截击机空战中，为了掩护机群作战，保护带队长机的安全，几次冲入敌阵勇敢拼搏，表现了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

12月2日下午，美空军战斗轰炸机一批在F—86战斗截击机掩护下，向铁山半岛和鸭绿江沿岸窜来。我奉命带队出击。

正当我带领机群向2架敌机攻击时，突然从右上方冲来4架F—86飞机，恶狠狠地向我和僚机焦景文扑来，眼看就到了开炮的距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孙生禄带领僚机马连玉插入敌阵，一举冲散了敌机，为我和僚机解脱了险境。

这时，另外4架敌机向他们猛扑下来。孙生禄在其飞机遭到攻击已经负伤的情况下，又掉转机头从正面向敌机撞去。

不料，僚机因转弯动作过猛，进入螺旋，自己又被3架敌机

417咬住。

孙生禄遇险不慌，沉着机智地转到敌机尾后，瞄准敌机接连开炮，击落敌F—86飞机2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然后，驾着负伤20多处的飞机返回

基地。

12月3日下午，我再次带队反击平壤方向之敌。在清川江南部上空与20余架敌机展开空战。我们扭住不放，从1.2万米的高空打到1500米，从清川江打到大同江，始终保持一域作战，互相掩护支援，共同创造了击落击伤敌F—86飞机6架的战果。

在激战中，我的僚机焦景文，飞机中弹24发，座舱盖被打破，仍然奋不顾身地掩护长机攻击敌人，最后在炮弹耗尽的情况下，才摆脱敌机，安全返航。

中队长孙生禄及其僚机马连玉，为保护带队长机和机群的安全，先后与8架敌机格斗。

孙生禄后遭敌机攻击，飞机中弹起火，他驾着熊熊燃烧的飞机冲向敌机群，壮烈牺牲。

他的僚机马连玉抱着为战友复仇的决心扑向敌机，猛烈开炮，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

这次惊心动魄的空战，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通天大道

自1951年10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在第一次参加抗美援朝实战锻炼的86天中，空3师共击落击伤美机64架，王海大队就击落击伤15架；在全师个人战绩突出的8人当中，该大队就占了3名：王海击落击伤敌机5架，焦景文击落击伤4架，刘德林击落3架，因此被同志们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1952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看到空3师86天作战的情况报告后，亲笔写下了“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的批语，中央军委发电嘉勉，并在赠送的巨幅奖旗上绣了“战绩大，打得好”6个金黄色的大字。

1952年5月1日至1953年1月26日，在空3师第2次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期间，王海和他的大队又打了不少的胜仗。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王海大队共计空战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飞行员人人都创造了战绩，立下了战功，架架飞机都涂上了红五星。其中，一级战斗英雄2人，即王海与孙生禄；二级战斗英雄1人，即焦景文。

然而，王海又是如何由一个普通的平民子弟飞上蓝天的呢？

公历1926年1月19日，王海出生在山东烟台。在他5岁上，全家迁到威海谋生。他在家兄弟中行五，上面还有一个姐姐。

他的父亲王兰芝，祖籍是山东平度，念私塾长大，写得一手好字，是一个穷秀才，也是个基督教徒。当年从老家平度逃荒出来，干写字匠的活儿，替人抄抄文书，每月挣两块大洋养家口。由于家境贫寒，王兰芝供不起王海上学，便自己教儿子认字，读《圣经》。但王海见其他孩子上学，便坚决要求进学堂，父亲只好将他送进德国人办的“海星学校”读书，后来转到“金线顶”中学就读。在威海，他呆了10多年。他家当时住在大海边，王海几乎每天都要下海游泳，正是大海炼就了他的许多美好品质，陶冶出不少高尚情操。因此，他在离开威海当兵时，特地为自己改名，意在记住大海，要有大海般宽广的胸怀和伟大志向。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次年，日军侵占威海。日本鬼子在威海烧、

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法西斯暴行，激起了王海极大愤慨，他毅然决定：辍学抗日！

1939年，年仅13岁的王海与4个同学离开学校，去寻找抗日队伍。但是他们找到的并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他们又失望地返回了学校。

1944年，王海在学校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许多抗日宣传活动。经过党组织的培养和考验，他于1945年正式入党。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王海在政治思想上不断成熟，革命意志非常坚定。一次，他接受党组织给的任务，去送一份重要的情报，不慎被日伪的3个便衣特务盯上了梢。他察觉后，便机智地躲避。敌特紧追不放，将他逼到了一处村落边上。

王海心想：“要落在他们手里，只有死路一条，决不能束手就擒，一定要跑掉。”于是，他便向前猛跑。

“啪！啪！啪！”特务开了三枪，王海就地一个打滚，翻身后又迅跑起来……

敌人没能捉住他。王海第一次尝到战胜死亡的快感：怕啥？狭路相逢勇者胜！

不久，党把王海送到沂蒙山东抗大分校学习，陈毅讲的政治、军事课，薛暮桥上的政治经济学，都给他留下了至今难忘的记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时，党中央派出一大批干部去东北，创立东北根据地，王海成了这批干部中的一员。王海当时是学生中的班长、党支部，他们几十名学员在王德方、胡娥亭的带领下，从胶东的龙口海岸坐船，（有动力的汽排子），几经辗转，经辽宁庄河，最后到达安东（今丹东）军区。领导给他们传达指示，讲了三个去向：第一，留地方参加党的工作；第二，到装甲部队；第三，参加建立东北航校的工作。王海没有多考虑，便决定去航校。就这样，他成了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校（习惯上称为东北老航校）的学员。

在老航校，王海被编入机械班，是一期机械班的40名学员之一。由于当时选入飞行员班的学员太少，所以，在他学完机械后，便和侯书军、邹炎、胡锦涛、刘发科、杨扶真等6名机械班学员被送到飞行学员速成班学习。

在航校学习阶段，困难是很多的。当时，世界各国训练飞行员的常规都是三个阶段——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后飞高级教练机或战斗机。但由于航校条件受限制，难以走常规的训练路子。初教机倒有几架，但都是木质的，在建校搬迁中折腾得变了形，没法飞。中教机一架也没有。现有的只是日本投降时留下的几架日本战斗机和一些破烂的99式高教机。怎么办？可不可以直飞高教机呢？这是个新问题，前人没遇到过，书本上找不到答案。一部分坚决反对，说航空史上没有，也违反科学。有的还讽刺说：“想一步登天，只怕飞得高，摔得重！”

在上级领导支持鼓励下，学员们坚决回答：“我们不怕打破常规训练，愿冒任何风险，上高级教练机学飞！”就这样，他们三步并成一步走，直接学飞99高级教练机、海牙菩萨战斗机。当他们驾着高教机飞上天空时，日本教官们惊讶他说：“一步登天，奇迹！今天我们才真正懂得了共产党能打胜仗的道理。”

“飞行训练中，当遇到飞机的发动机、仪表有什么问题时，我都是沉着对付，不惊慌，不失措。”王海回忆说，“一旦飞行中出现异常情况，我都

是把飞行的转速表、油压表等配合起来看，沉着冷静地采取处置对策。有时见飞机的某一仪表盘飞行中突然凸出来了，我就一手继续操纵飞机，一手安装仪表，排除故障。有时飞机平飞、倒转，进入螺旋后，我都能再改出继续飞。由于我训练成绩突出，在老航校改装喷气式战斗机时立了二等功。日本教官也常常在讲评时对我竖大拇指：“王桑（先生），你的大大的勇敢，将来大大的有出息。”而有的飞行学员，不擅于把故障联系起来思考和处理，一见异常情况就惊惶失措，以致发生了飞行事故。在初学飞行时的这种作风我一直坚持下来，后来在抗美援朝中，才比较沉着勇敢，敢打敢拼，能够胜利。”

“那时，我们凭着对毛主席，对共产党的无限敬仰，无限忠诚，不怕死，只想着早日学好本领，一有机会就为国家和人民出力。”王海充满深情他说，“由于心里想的就是飞行事业和本职工作，根本没心思计较什么条件和待遇。尽管在机场吃饭都是站着的，晚上睡觉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睡乌拉草，嘴角眼角都结冰，洗脸水都冻成冰疙瘩，但心里全装的是革命事业，盼望着一声令下，就为国争光。”

就这样，党为王海插上了钢铁翅膀。

就这样，王海赶上了抗美援朝的报国良机，终于成了空战英雄！

（王咸金）

将星初耀，人小志大举义旗

参加黄麻起义

这是中国大别山下一个普通的村庄。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对着一块黑色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汗珠子摔成八瓣渗进土地，在那里结晶抽芽，长出沉甸甸的稻穗和麦粒。他们双手捧着自已的劳动果实养育着自已和自已的子孙。他们尽管没有多少文化，但沿袭千年的纯朴民风 and 耕耘者勤劳善良的习性，他们崇尚圣贤，断断续续地知道一些历朝历代明君忠臣的故事。劳作之余，村口的大树下，常有银须飘飘的老者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诸葛亮七擒孟获、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

那位后来成为解放军一员猛将的人物就是在这里蹒跚学步的。他有一个不算富裕但却充满温暖的家庭。父亲秦辉显和伯父耕种十余亩田地，母亲周氏勤俭持家，纺线织布，饲养牲口，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都很早地懂得了日子的酸甜，能够主动帮助大人们干活。举家和睦，生活中没有大富大贵的征兆，倒也乐趣盎然。

八岁时，父母把他送进本村私塾读书，希望他能识几个字，念通官府的公告，知道捐税名目，算清收入支出，当一个明明白白的种田人。

然而好景不长。

从一九二五年开始，横祸接踵而至，一场不知名的瘟疫，相继夺走了母亲、父亲、伯父和哥哥的生命。家破人亡，半边天哗啦一下落下来，砸在他十一岁的肩膀上。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悲痛和恐怖铺天盖地而来，几乎让人窒息。姐姐出嫁后，他成了孤儿。偌大一个农舍里空落落的只剩下一个孩子。白天门上一把锁，下田干活。收工回来，自己做饭自己吃。田里的草薅了，院子里的草又长满了。晚上睡觉，老鼠也欺负他，谅他奈何它们不得，成群结队，大摇大摆，穿堂而过，要是来了兴致，吱吱吱杀声震天满屋子追着打架。

日子就这么辛酸而又坚定不移地向前走着。

每逢佳节，便是这个孩子最难捱的时光。

失去亲人的第一个八月十五那天下午，他早早地锁上门，独自一人坐在秦罗庄对面的山岗上。今天是团圆日，有爹有娘的孩子不会来找他玩。即使来了，他也快乐不起来，他们有温暖的家，有慈爱的父母，有香喷喷的月饼，可是他没有。同他们在一起，听他们的欢声笑语，他更觉得孤独。

由于家破人亡，这个十一岁的孩子，过早地体察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想当年，父母和伯父健在，家道殷实，自己一家在村中颇有威望，左邻右舍羡慕之也亲近之。如今只剩自己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家道一落千丈，三里开外能看见房顶上呼呼直冒的穷气，人们再也不愿意同这个穷孩子有更多的瓜葛了，生怕有朝一日他饿昏了冻病了会赖在自己家的门口……

那时候，他并不知道村里大人们的这些想法。他只是凭着一个孤儿悲凉而又敏感的心，本能地注意到人们异样的目光，对他不像过去那么亲热了。于是在那个八月十五的下午，他独自坐在对面的山上，从林缝里望着自己的村庄。村人哪知孤儿心，那秋收后的喜悦，那阖家团圆的欢乐景象，像竹签一样刺痛了他的双眼。

他仰起脸，把目光投向村后更远处的老君山、天台山，泪水顺着脸腮落

在脚下的草丛里，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爹爹呵娘呵，你们在哪里呢？你们知道不知道么娃心里好苦哇，你们快回来吧，搂着娃亲亲热热过个节吧，娃不眼红人家的月饼，也不馋人家的鱼肉，娃就想搂在爹娘的怀里当一个有爹有娘的娃……

他曾听老人说过，人死之后灵魂升天。望着遥远苍穹下渐渐变红变紫的山脊线，他看见那山脊在微微悸动，山坡上鲜花绽开，就在这花的海洋里，两个身影冉冉升起，向他款款飘来，飘近了，他才看见他们正是他的爹和娘，他欣喜若狂，顾不上擦去眼角的泪，一跃而起，向爹娘扑去——却没料到，扑了个空。

倏然惊醒，他怔怔地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哇地一下哭出了声。

那个晚上，他在山上一直坐到月挂中天。

人生的重大转折发生在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七年，外面的世界已是闹哄哄的了。

远在黄安千里之外的欧亚大陆上空，仍是战云密布。中国国内的农民运动也是风起云涌方兴未艾。早在这年一月初，武汉老百姓在刘少奇、李立山的领导下，举行三十万人的游行示威，愤怒抗议英国水兵枪杀罢工工人事件；一月八日，中国北伐军占领汉口；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被杀被捕……

远处的枪声没有传到黄安。倒是黄安、麻城等县有一些本地人，有穿长袍的，有戴眼镜的，频繁奔走于城乡之间，秘密串联百姓，给偏僻的山野带来新奇、神秘的色彩。

那是夏天的一个清晨，头夜里下了一场暴雨，露珠还在叶子上滚动。黄安北部山区的土质是红粘土，雨水一渗，又板实又平坦。伢子们清晨照例去放牛，牛儿还是那般摇头晃脑快活地鸣叫，草儿还是那般挂着雨露晶莹柔嫩，太阳也还是以往的那个太阳，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千真万确有一件东西像钻石一样嵌进了秦伢子那双机灵而又充满忧郁的眸子里。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发现——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如同米面馍馍一样大小形状，里面有弯弯曲曲的图案，印在地面上，纹络清晰异常。

众牛倌扑闪着大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印在地上的是何物。

秦伢子自然也不知道，他上前蹲在地上看，又站起来后退几步看，然后东瞅瞅西瞧瞧，冷不丁冒了一句：“莫不是鞋印？”

“对，是鞋印！”紧接着就有人响应。

“像鞋印。”又有人恍有所悟。

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最终统一了认识，印在地上的，就是一双鞋印。

是鞋印但又不是寻常的鞋印。这双鞋印，可以说是一种现代文明的象征。它不仅使这几个牛倌惊奇不已，而且对整个秦罗庄的传统文化都是一种冲击。它是从外面的世界来的，是从秦罗庄大山屏障之外的广阔大地里来的。一句话，这双鞋印是有来头的，它和本地人穿的布鞋印截然不同。

接着，一个牛倌又发现了一双。

还有一双。

再往后，就见多了。田埂上，草棵里，盐店河边的沙地上，到处都出现了这种鞋印。与这鞋印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贴在墙上的标语，无非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之类。

消息就像投进池塘的石子，很快便在山乡荡漾开来。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或经过世面的私塾先生便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又有共产党往南边去了。

证据便是那鞋印。

那样的鞋子是胶底鞋，也被外边的人们称作“马克思鞋”，作田人是不穿的，只有扛枪打仗的人才穿这种鞋。乡下人传得活灵活现，说穿“马克思鞋”的人都是共产党，他们走的是一条叫作“革命”的路，这种路走到头，就是共产主义的天堂。

这种传说，对于秦伢子是极具诱惑力的。

没有谁比这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更孤独的了。

没有谁比这个既无母爱又无父爱的孩子更渴望有一个家了。

没有谁比这个一无所有的孩子更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了。

对于穷人来说，打土豪、分田地，没有比这再好的事了。

举目四望，只三间老屋，家什物件纷纷卖入他人之手，锅碗瓢勺破破烂烂黑不溜秋，出门几步，良田厚地均划在他人名下，自己留下那几亩薄地一无水二无肥，只长草不长粮食。

天上的太阳很亮很扎眼，心却很灰很泄气。

左思右想，日不能静，夜不能眠，心里像有一种东西被灶火燃着了，越燃越旺，最后燃成一片势不可当的火焰。

他娘的，丢掉这堆破烂，离开这个穷家，穿“马克思鞋”，走革命路去。

于是就成天痴痴地想，骑在牛背上，遥望天边与大山的接连处，眼巴巴地盼着过来一支灰衣灰帽穿胶鞋的队伍。

有了明确的主张，日子就过得有条理了，心里也有了支撑，除了放牛做田，剩下的全部大事就是一个字：等。

已经是深秋了，山外刮进来季节的冷风，装满了他的那间稀里哗啦的破屋子。那屋子，连冷风都不愿意久留，刚刚进来，又从四壁透亮的缝里钻了出去。

可是，他没法出去。这儿好歹是个家。离开这里，他连破屋子也没有。

冷飕飕的。他在院子里堆了几尊树根，拎过一把斧子，把庞大的树根劈成一截截小块。冬天，下雪了，出不得门，窝在家里烤火，树根是最熬得起燃的。

然而毕竟年纪大小，斧子举得尽管很高，可落下去还是轻飘飘的，少年劈树根，就像蚂蚁啃骨头。

正在满头大汗地干，虚掩的院门被喘开了。本家的一名堂叔旋风般地跑进来，惊惊乍乍地喊：“还劈个么事，闹革命了，还不跟我打县城去！”

他半天没回过神来，直到看见门外又有一群人，手里拿着梭标、大刀之类的家伙，一边奔跑，一边咋唬，这才恍惚明白，这就是大鼓书里说的：要起事了，要翻天了，要换世道了。穷人造反打江山，水浒一百零八将，闯王李自成夺天下，天王洪秀全闹长毛……官逼民反，民不聊生，不得不反……霎时，从大鼓书里听的，从大戏里看的，听老辈人传的，那一串串轰轰烈烈的故事像盐一样注进了血管。多少个饥饿寒冷的夜里做过此类辉煌的梦呵。

这龟孙日子是活不下去了。这是他的脑子里闪过的第一层思想。

反了，我不反谁反？最该反的就是我！这是他的第二层思想。

“叔，我跟你去！”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重大的选择面前，在生死攸关未来莫测的严峻关头，这个十三岁的少年既不显得悲壮也没怎么激动。他

掂了掂手中的斧头，平静地问：“我就带上这家伙？”

堂叔一把夺下斧头，说：“你家伙管屁用，尺把长的柄，还没等你近身，人家早一刀砍过来了。给你这个。”

他伸手接住了，是一柄用麻绳染成红缨的梭标。

他扛着这根梭标，并趁堂叔不注意，还是把斧头揣进腰里，然后跟本村的乡亲们一道上路了。这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黄（安）麻（城）起义开始了。

对于起义，他是半明白，半懵懂。但有一个原则，村里的穷人参加而富人害怕，这就是他之所以毅然跟随起义队伍前进的基本前提。他读过年把私塾，脑子里多少有些文化知识。那时候，他不可能从理论上先弄明白起义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才决定是否参加。他衡量可行与不可行的唯一尺度，就是看哪些人乐意和哪些人不乐意。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尽管这是几年后才由毛泽东概括出来的行为准则，但是，在此之前，绝大多数革命分子正是以这个原则选择自己的道路的。

当天下午，起义的群众汇集在黄安北部重镇七里坪，在那里编队动员。然后于当晚子夜浩荡南下，直指县城。地上，万头攒动，梭标大刀寒光闪烁。中天之东，悬一轮皓月，冷静地注视着中原沃土大别山麓的这支热血沸腾群情激昂的农民队伍，注视着这群衣衫褴褛而又手舞足蹈的庄稼汉子。

他们要干什么？

打天下夺江山去也。

一路奔袭，到了打鼓岭，劳累加激动，他的小脸憋得通红。

伢子，怕吗？一位满脸络腮胡子、背扛大刀的乡亲跑前跑后，俨然是个组织者。路过他身边，大约是看他年龄大小，便停在脚步问他。

有什么怕的！他答，转动脑袋，看了一眼漫山遍野的队伍。

是啊，跟这么多人在一起，有什么可怕的。中国的农民运动提供了这样一条经验，人多不仅力量大，胆量也成倍地增加。

知道我们这是干什么吧？络腮胡子又问。

革命呗！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嗨？络腮胡子惊奇了。笑了笑又问：“革命是什么呀？”

这回轮到他语塞了，吭哧了半天，才反问：“你说革命是什么？”

络腮胡子想了想，说：“什么是革命呢？革命就是打地主老财，要他们的命，让老百姓都有饭吃。”

“就这些？”他问。

“约莫就这些。”络腮胡子不太肯定地回答。

他没说话，但他在心里并不认为就这么简单。革命这个词儿他听了好几回了，革命的理儿也有所耳闻。他琢磨，革命绝不仅仅是要地主老财的命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肚皮问题，革命可能还有比这更要紧的目的。

从七里坪到县城，弯弯曲曲五十多里。起义的队伍人山人海，刀枪林立，逢山过山，逢水过水，顶着皓月直达城北三里岗。天亮时分，总指挥潘汝忠和吴光浩指挥队伍由城北角攀梯而上，一举攻入城内，全歼县警备队，缴枪三十余支，活捉县知事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以及十几名土豪劣绅，收缴了一大批钱钞物资。

一直处于国民党严格控制下的黄安县，转眼之间赤帜飞扬。

在战斗中成长

一年一度的秋天，红红火火地走来了。他怀里揣着从乡苏维埃软缠硬磨得来的证明，离开了自己的故土。

在山根拐弯处，他转过身，最后望了一眼他的那几间破旧不堪的房子，心里突然涌上了一丝柔情。虽然那里面已经没有可以眷恋的人了，但是，他对爸爸、妈妈、伯伯、哥哥的全部记忆，童年的全部乐趣，都还盛在那几间房子里。这几间房子，仍然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拥有的东西。

还能回来吗？

不知道。

终于，回过身来再也看不见秦罗庄了，那大片大片绿色的树海和漫山飘荡的氤氲覆盖了他的留恋，他于是放开了脚步，先是大步流星，然后一路小跑，跑着跑着，就撒开脚丫子，就像是疯了。同村的几个小伙伴，你追我赶，你斗我闹，赶到红三十一师驻地，差不多都是汗流浹背了。

他被分配在三团机枪连当战士。

红军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耕田耙地之类的活计，它需要力气，但又不完全凭借力气，需要勇气，而有勇无谋也不行。它对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甚至是苛刻的。如果说，人是一种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高级动物的话，那么军人又是这种高级动物中更为特殊的动物，特殊之处就在于职业的性质要求他尽可能全面地具备所有动物的特性。一个优秀的士兵应该是这样的——具有老虎的勇猛，狐狸的狡猾，猴子的敏捷，犬的警觉，豺的凶残，而当需要溜之大吉逃之夭夭时，则又需要兔子的速度，优秀的军人尤其是处在野战状态中的优秀军人应该具备所有野生动物的长处。

早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其生存状态的确可以说是野生的。没有军饷，没有补给，没有营盘。所面临的，是夏暑冬寒的磨砺，是国民党军没完没了的围剿捕猎，是动荡不定的奔袭和跋涉，是一场又一场残酷的格斗和厮杀，是一次又一次从大刀和牙齿的砍杀撕咬中挣脱而生。

没有比中国红军的生存条件和野生动物更为相似了。于是乎，论勇猛，论坚强，论灵敏，论吃苦耐劳，论生存能力，论饿饭缺水……中国红军在古今中外的军队中，都当推首屈一指。

太阳已经偏西了，前肚皮已经贴在后脊梁骨了，汗珠子干在额头上，粘出了一脸脏乎乎的灰渍。

自然很苦。但是，眼睛必须瞪大，不得露出半点苦相。脚尖绷直，从脚而到小腿到大腿，绷成一条刚劲的直线，呈四十五度踢出去，悬在空中，上下不能颠簸，左右不能摇摆。固定成这样一个姿势，除了呼吸尚在允许范围，其它的运动，甚至包括腮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抽动都可能会招致一顿训斥，甚至更为严厉的惩罚。

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他感到贴在地面的那只脚，在喀喀嚓嚓地颤动，似乎有一缕热而且硬的气流穿过脚心，渗过脚踝，越过膝盖，一直注满了全身。连每一根毛发都被注满了钢的颜色，并拢的五指在膨胀中毕剥抽节。他咬紧了牙关，严格控制随时都可能喷涌而出的泪滴。尽管只有十

五六岁，但他从来没在公开场合哭过。在这长时间的凝固中，他感到他的全部记忆全部思维像稻穗一样束成一把，放在一个指定的位置，他的血液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按照教官的意志涌动。到了最后，他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了，他全部融进在训练场此起彼伏的心跳声中。

终于休息了。教官下了一声口令：“解散！”

他没有动。周围还有几个人没有动，没有今天我们往往见到的那样，一声“解散”之后，队伍会雀跃散去。

“解散！”教官重复大喝一声。

凝固的思维为之一振，他这才试着用脚趾抠了抠地，将并拢的五指试探着向外张弛，一点点，一步步，好了，通了，全身终于放松了，有了知觉，然后扑通一声，幸福地倒在地上。

第一次战斗，是跟国民党第二十军郭汝栋的部队交手。这回可是真刀实枪地干。地点在麻城县的城门岗。敌人是一个团，被红三十一师团团围住，但由于红军的武器差，未能全歼，只是杀伤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跑了。

他当时没有太多的想法，一个集中的问题是如何在这次战斗中搞到一枝枪。那时候没有发枪这一说，参加红军了，也不会马上就发枪，想要枪，就得自己去夺。他太渴望有一支步枪了，革命军人还成天扛着根梭标，脸上实在有些挂不住。要是打过两仗还扛着梭标，那就太惨了，不说你怕死，至少是笨蛋。

战斗一打响，他就顾不了那么多了，老战士趴在土堆上射击，他看得干着急。打了一阵，敌人退了，这回轮到他一显身手了，挺一根半丈梭标，一声大吼，张牙舞爪往前冲，如同饿虎下山。

果然，缴了一棵大枪。虽说只是个汉阳造的单套筒，比捷克式和大盖式差点，但终究比梭标强。对着太阳拉开枪栓看看，枪膛好好的，这兵也真熊，一枪没放就撒丫子了，枪膛里还亮铮铮的呢。嘿嘿，你不要，老子可不客气了。

一扬手，那支土里巴叽的梭标就抛出十丈开外。来一个优美的转身，漂亮的老套筒便洒脱地左肩右斜了。

这次战斗，他崭露头角，被提拔为副班长。

副班长是个多大的官呢？以后当了国防部长的将军开玩笑说：“可别小看了副班长，官不小呢，比三人战斗小组的组长大，比日本鬼子的伍长大，管好几个人呢。”

确实，他很珍惜这个职务，管理起来很大胆，硬是把副班长当出了八面威风。正是在副班长的位置上，他显示了组织能力，不久就被保送到随营学校去学习。

七个月后，当他从随营学校毕业时，他所在的三十一师已被整编为红一军第一师，他被分配在军部经理处监护连担任排长。没过几天，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又整编为红四军，部队来了个大调整，他又被调到军部手枪营二连当排长。

排长当了好几个月，他才发现一个问题。排里好几个战士都是共产党员了，而他这个排长居然还是“党外人士”。天哪，那时候的党员光荣得要死，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担任指挥员竟然不是党员，那工作怎么开展呀？有许多事，党员们悄悄商量，根本不通知他。

他感到很恼火，于是找营教导员，要求入党。

教导员的答复有两条：

第一，你是中农成份，中农要用更长的时间考验。

第二，你政治上还不成熟，好打不平，爱提不同意见，需要改。

对第一条，他毫无办法，中农成份不是他挣的，也不是他想改变就能够改变的。对第二条，他也是毫无办法。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从小到大都是一根肠子，直来直去，想改，但改不了。改了几天还会再犯，一犯就更厉害。

一九三一年，苏区大肃反。

肃反，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创造，也不是中华民族的发明创造。自从人类有了政治集团之后，清除队伍内部的异己分子，就一直是各政党或政治集团的经常性工作。然而，在现代历史上，把这项工作推向极致的当首推世界革命的老大哥苏联。不幸的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王明上台之后，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于不顾，对苏联完全是亦步亦趋，苏联的一切原则包括十分荒谬的理论，都被奉为中国革命的经典，其中也包括惨绝人寰的大肃反。

军长撤了，师长抓了，团长、政委抓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营连干部抓了，再往下，不偏不倚地该小排长们倒楣了。

还好，秦基伟没被杀头。运动由上而下，到了最底层，风势就弱了，再说，连小排长都杀了，还靠谁来打仗呀？同那些被杀掉被撤掉的人相比较，他确实要算是万幸了。

他被调整了工作，从一排长的位置上调成了二排长。

这只是个小小的变动，但这个变动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奥秘，也算是中国红军独有的特色之一种。如果按新的眼光看，从一排长到二排长，应该说属于正常的工作调整调动范畴，然而在六十年前的红军时代却不是这么简单。那时候的一排长人称“大排长”，作战时紧跟连长指导员，相当于副连长，而且是连长的当然代理人。

可是二排长就不同了，甚至可以说，二排长在连里的地位往往还不如三排长。红军连队，往往是这样，先锋是一排，后卫是三排，二排夹在中间，不说信不过，至少可以说，二排的力量相对弱些，使用起来也自然靠后一些。

为什么要“降职”呢？

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他也没有想到要去问个水落石出，同时也不敢，没杀你的头就是天大的运气，你还问什么，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不成？

但自己心里难免要犯嘀咕。我没犯错误呀？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都是没什么问题的。虽说性子直了点爱提个意见，可从来没出格呀，怎么稀里糊涂就给“涮”了呢？

后来听人传说，是被人“张冠李戴”了。因为他幼年时出过天花，脸上有几颗麻子，被大家喊作“麻子排长”。红军时代职务称呼比较随便，由于战斗中变化大，有的干部互相之间甚至只知绰号不知姓名。恰巧，本连三排长也是个“麻子排长”，曾经对肃反说了几句风凉话，可能是被连长和指导员（已先被抓走了）供了出去，于是保卫局就来找“麻子排长”的事。又因为三排长是雇农出身，比他的中农成份好，所以没怀疑三排长，稀里糊涂地把他给收拾了。好在他才是个排长，又沾了工农干部的光，脑袋才没有搬家。

张国焘有一个歪理：“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他有幸成了“党可原谅三分”的人，脑袋没掉，后退一步，当起了二排长。

现在，站在训练场上，面对一群或比他年长或比他年小的或者老兵或者新兵，秦排长双手卡腰昂首挺立着，流利而宏亮地教授步兵战术条例。

部队的成份实在太乱了。排里有些老兵，参加过几次战斗，似乎多了一些经验。但更多的人，昨天还是工人农民，今天就是红军了，连枪都不会放。

而他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他曾经在心里暗骂他最初的教官是“狗日的白匪”，但正是那个从白军里投诚过来的“狗日的白匪”以无情的严厉将他磨砺成材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次又一次从心里感激那个“狗日的白匪”。

况且，他还上过随营学校，单兵战术那一套受过相对正规的训练。进攻时利用地形地物比较灵活，懂得侧面接敌，善于运用匍匐和跃进相结合的冲击方法。

姿势好看与否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实用，减少伤亡可能性。

他先介绍自己参加了哪些战斗，遇到了那些艰险，克服了哪些困难，获取了哪些战果。然后扯开衣襟——

“同志们请看——”他喊了一声。

大家齐刷刷把目光投向排座赤裸的胸膛，不禁有些发懵，白白净净，搓衣板式的胸膛上任啥没有。有什么可看的？

他笑了。“我参加过那么多战斗，每次都往前面冲，遇到过那么多危险，枪林弹雨里一次次闯出来，汗毛都没掉一根，你们说为什么？”

老兵新兵面面相觑。为什么？走运呗，难道是神仙保佑不成？排长也别吹，你是碰巧了，要是枪子儿低点儿，不信你不挂彩。“告诉你们，我就是刀枪不入。刀枪不入的窍门只有一个，那就是训练，练出一身机动灵活的战术动作。”

老兵新兵恍然有悟：绕了一圈，原来是动员呵！有些老兵撇撇嘴，骂一声：毛头小伙子尽搞歪门邪道。心里却不得不服，这个伢子不赖，练起兵来有板有眼。

大家的认识提高了，他就自己做示范。

定好目标，首先在前方选好隐蔽物，计算好时间，然后开始冲击。什么时候跃进，什么时候匍匐，什么时候正面猛跑，什么时候侧身接敌……这一套做得从容利落，看得大家都很服气。

在早期的红军队伍里，能够这样有板有眼地练兵，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有理论讲解，有现身说法，有具体示范，有归纳总结，形象直观，生动通俗。

只是，这样的好苗子竟然被涮，心里实在有些窝火。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多雾的早晨。

太阳还没完全爬出云端，晨曦初露，南方的山岗上湿漉漉的，氤氲缭绕，宛如飘带。

连队统一操练之后，各排带开进行战术训练，此时东方已是霞飞云颤。他和他的二排沐着一身灿灿的金晖，开始了新的战术课目训练。

嗓门出奇的大。参加红军之前，在秦罗庄当小农民，跟着大人学唱山歌，一嗓子亮出去，这山响了那山回音。

训练中，隐约看见场地外有几个人向他们指指点点，因为隔得远，加上

雾大，没怎么看清，所以也没怎么介意，依然夹紧腓沟子使劲下口令，一动一动喊得山响。

第二天，却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那天也是训练，正在兴头上，来了两个人，都挎着驳壳枪，同连里干部连招呼也没打，径直走到场地中间，问：“谁是二排长？”

一看这阵势，他有些发虚：这两个人都不认识，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又都挎着盒子枪。

心里咯噔一紧：坏了，莫非是保卫局抓人来了？

当时肃反还没有结束，本连三排长刚被抓去。掰着指头算，再往下，除了自己，没谁可抓了。

怎么办？四处看了看，练兵场上喊声震天，各训各的，没谁注意这边。保卫局抓人是家常便饭，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被抓的走了，坐牢或者杀头去了。没被抓的照样训练。

跑，跑脱是有可能的，可往哪里跑呢？又凭什么要跑？老子参加红军就下了决心要革命到底，不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一股血气涌上来，他挺身而出，铿锵回答：

“我就是二排长。”

那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他以为是要下他的枪，但没有。来人中的一个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走，跟我们到军部走一趟。”

到了军部才知道，是军长徐向前召见。军长一口山西侬腔，开始听得不大明白，后来终于听明白了，军长是在和他拉家常，上问父母，下问土地，再问理想，又问决心。

家常聊完了，军长说：“行啦，你回去收拾一下，到手枪营二连当连长。”

他“啊”了一声，半天嘴巴没合拢。

直到徐向前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才回过神来。

哎呀，我的个天啦，紧张了老半天，原来是升官呀。心里直怨那两个挎盒手枪的同志，干吗不早说呢，吓得我差点跟你们动家伙。

不久就知道，“肃反”并非是党的本意，只不过是党一些人利用了，搞极端化，错杀了许多人。徐军长是个军人，他是坚决反对那种过激行为的，部队搞完了，他这个军长指挥谁去呀？

可是，在红军队伍里，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可以说法力无边。许多事情他这个军长是无能为力的，甚至连他的妻子程训宣都被当成反革命悄悄地杀掉了。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徐向前还是尽最大努力保护了一批干部，其中就包括秦基伟。

这以后，他就跟定了徐向前。

转战鄂豫皖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了第四方面军，秦基伟继续担任方面军总部手枪营二连连长。

十一月十日夜，也就是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第四天，黄安战役的枪声打响了。

那几天里，方面军总部气氛异常紧张，参谋人员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秦基伟作为负责首长安全的手枪连长，虽然与参与决策距离尚远，但他有幸目

睹了大战在即总部首长的风采，也亲身感受到了首脑机关的指挥作风。

他尤其喜欢注视那些长时间伏在地图上工作的人们，每当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便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和向往。那几天，除了吃饭和当面询问、布置任务以外，徐向前总指挥很少离开过地图，他趴在地图上，就像一个饥饿的人趴在又香又甜的白面馍上。那专注的神态和虔诚的表情，让十七岁的秦基伟领略到了一种崇高的神圣感。

十一月二十五日，方面军总指挥部前靠，进驻黄安城东南距城仅五公里的郭受九地区，加强了火线指挥。

秦基伟和他的连队“心里急得冒火，手里痒得出汗。”外面拼命地打，里面拼命地吵。吵什么？要打呗！手枪营是总部首长身边的部队，人员全是从部队里左挑右选的，小伙子一个个健壮膘悍，一长一短两支枪，加上后背的一把明晃晃的大刀，红穗子平时一飘一飘的，牛气得很，看得兄弟部队老大哥心里酸溜溜的，可如今外面打得叮叮咣当，自己这伙人却白白净净地守在总部，就像恋窝的鸡，这算什么事呵！

还真有说俏皮话的，十一师的部队换阵地，路过总部，就有人跟手枪营的同志哥说风凉话：“喂，仗都快打完了，你们啥时候露一手呵？别捂出了痂子！”

还有刻薄的，那就不是俏皮话了：“同志哥呀，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怎么样？你们不敢上，把大刀借给我们使使怎么样？你看咱这把，刃口都卷了。”

当真扔来一把卷了口的刀，看得手枪营的小伙子满脸愧色，气不得，恼不得，也骂不得。不管啥理由，人家从火线回来，人家从死人堆里闯出来，别说腌臢你几句，就是骂你几句你也得听着。

秦基伟却恼了，毕竟年轻气盛，一脚踹开营长的门：“这个岗老子不站了，老子的连队要打仗！”

营长正在补军装，瞟了他一眼，头也不抬他说：“好哇，你秦基伟英雄呵！把连队给我留下，你爱到哪里去到哪里去。”

他懵了，满脸狐疑地看看营长，营长仍然专心致志地补他的上装。娘哎，竟用麻线，针脚东扭西歪，难看极了。

“把枪也留下，打完这一仗，封你为秦大刀！”营长又说，依然没抬头。

一腔无名之火，被营长不紧不慢给灭了。留下连队，留下枪，他去干什么呢？真去耍大刀也未尝不可，可是，真能一走了之吗？徐总指挥的岗谁站？

发牢骚可以，动真的不行！这点组织纪律观念他还是有的。

露一手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全部肃清黄安城外围障碍之后，徐向前确定对黄安城围而不打，夹而不击。目的是吸引周围的国民党军前来增援。围城之意不在城，关键在于诱敌援兵，待援兵打得差不多了，再也不敢来了，这才集中兵力大手大脚地收拾城内守敌。

这一招果然奏效。黄安城内的国民党军多次寻机突围，自然都是徒劳，像是铁皮脑袋碰上一个橡皮口袋，虽然往外拱了一截，却空欢喜一场，最终又被坚决地弹了回去。城南国民党军第三十师也两次派出增援部队，均被红军之十一师打退。

十二月二十日拂晓，国民党军集结其三十师大部分和三十一师一部兵力，猛提一股虚劲，并组织“敢死队”向红军十一师三十一团的嶂山阵地进行夜袭。由于该团五连前卫排警戒时疏忽，嶂山阵地被突破。国民党军爬上嶂山顶峰，直逼红十一师指挥所。

天亮以后，国民党军又集中兵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拼命向红军阵地攻击。双方反复白刃格斗，阵地几经易手。战斗进行至下午三点多钟，增援的国民党军已进至离黄安城仅十余里的地方，逼近红军打援部队固守的最后一个山头。

情况是十分严峻的。红军十一师已经同敌人混战在一起，师长王树声把手直手枪队和通信队也组织起来，跟国民党军拼上了刺刀。

总部手枪营三百多个精神焕发的战士被召集在总部大院门前。

深秋下午的太阳像是戴上了一层透明的面纱，筛下来的光束温暖而又柔和，在这经过淡化处理的阳光里，山野的秋色也就有些朦胧了。

而地上却有三百多簇鲜红的火苗在微风中抖动。大刀柄上的红绸子，鲜艳醒目，迎风招展。

关键的时候到了，徐向前打出了最后的一张王牌：把手枪营拉出去。

一声令下，三百多条汉子如箭离弦，拥向十一师的格斗场。

岂是手枪营，连总指挥徐向前也操起了家伙上了阵地。

秦基伟亲眼看见了那一幕：在山头上，徐向前双手擎着望远镜了望。山腰上，国民党军撕开十一师的防线，一步一步地往上攻。秦基伟急忙率队扑向前去，冲到徐向前身边时，他差一点动了手，想把总指挥拽到山的反斜面，但他没敢。

徐向前这时候差不多成了最基层的指挥员，他观察了一会，把握火候一到，下了一道命令：“命令二十八团和手枪营冲锋！”

霎时，手枪营从正面，二十八团从右侧，十一师从左侧，像决了堤的洪流，一路杀声，滚滚而去。

以后将军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红军打仗，漫山遍野。”

的确是漫山遍野。军号声、冲杀声、枪声、炮声，汇成一支雄浑的交响曲，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别山麓，奏出了壮阔的旋律。

黄安战役胜利后，为了给予北路敌人以有力打击，夺取商城，把鄂豫边和皖西根据地连接起来，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商潢战役。商潢战役自一月十九日打响，红军集中四个师的兵力，对商城仍然采取围而不取的方针，诱敌援兵。另集中一部兵力，在商潢公路附近运动，寻机歼灭来援之敌。

敌果然被诱动。一月底，国民党军第二师、第十二师、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六师四个师共十七个团出动，沿商潢公路东进。

红四方面军主力连夜冒雪行军，集结于杜甫店地区，抢修工事，布好阵势，准备迎敌。红十二师担任正面突击任务，红十师、红十一师置于左侧，红七十三师置于右侧，担任两翼包抄任务。

手枪营经过黄安战役，略有伤亡，但建制完整。战后，兵员和武器都得到了很大补充。二连补充了十名新战士，清一色的黄安人，可谓清一色的子弟兵。在这件事情上，秦基伟表现出了年轻而成熟的思路。他把十名新战士

召集在一起，先是介绍了本连的战斗业绩，然后一本正经他说：“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我的指导员也是黄安人，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自从有了董必武，黄安人就走上了革命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英勇作战，打死了是黄安人的光荣。贪生怕死的，活着也是黄安人的败类。我们都是乡亲，我当这个连长，对你们只有一个照顾，战斗时给你们机会往前冲！”

一席话，说得新战士哑口无声。

秦基伟举目轮流扫了一遍，提高嗓门大喝一声：“听清楚没有？”

众人一个激凌，嗷地一声回答：“听清楚了！”

“如果有人嫌我不顾乡亲情面，怕在我手下吃亏，现在提出来，还来得及，我找营长帮你们调换连队。”

新战士们憋红了脸，无一人吭气。

“没有？那好，从今以后，我秦基伟往哪里冲，你们就给我往哪里冲。谁要是筛糠丢人，我丑话说在前面……”下面的话他没说完，只是用手使劲地拍了拍屁股后面挂着的驳壳枪。

大家全明白了。商潢战役在即，连长是怕咱们新兵给黄安丢脸呵！“连长你放心，黄安穷山穷水穷云彩，就是不穷志。你说往哪里打，咱就哪里打，打死你给家里捎个信，张三是往前倒下的。”

“对呵，连长你记住，哪怕收不全尸，你也得把咱的红军帽捎回去，革命成功了，家里也有个依靠。”

战士们很动情，说着说着就哭了。

秦基伟把脸板得风雨不透，可又觉得鼻沟子有些痒，伸手挠一挠，娘哎，净是水。这没出息的眼泪珠子，不知道啥时候就溜了出来，露了连长的气。

心里却暗自得意：好，这把火烧起来了，而且烧出了战斗力。

二月一日上午，战斗打响了。红军首先与敌军二师交火。敌二师装备精良，兵痞较多，战斗力很强，不断发起猛烈进攻，双方血战了数小时。

当天下午，红军第十一师、十二师从左侧迂回，抵刘寨包围了敌第二师和十二师的两个指挥部，并抢占了傅流店渡口，切断了右路敌人的后路，迫敌军心动摇，全线慌乱。红军正面和左翼部队乘势对敌发起猛攻。

敌军几万官兵眼见大势不妙，哗地一下全线溃退。

徐向前挥师前进，红军追兵急如潮涌。

手枪营也拔营起寨，簇拥着总部，一路喊声连天，追将过去。

正追击间，猛听得一声喊：“秦大刀，你给我站住！你往哪里冲，还要不要总部啦？”

秦基伟举目一看，是营长，气还没喘匀，就赶紧回答：“营长，我……没丢掉总部呵，我一直跟着……”

营长火了：“什么一直跟着，看看你们都打到什么位置了？”

秦基伟顿知理亏。天啦，只顾追击，确实把总部抛下了。正在解释，营长又是一声怒吼：“你的人怎么跑了几个？”

秦基伟吃了一惊：“不会吧，我的连队还能开小差！”

“不是开小差，是开大车，你给我看！”

顺营长手指的方向看去，秦基伟笑了，被他“整训”的那帮子黄安籍乡

亲，挥舞大刀，拼命地往前追，已经插进了三十三团的队伍。

尽管他为自己的部下兼乡亲的勇敢行为而暗暗高兴，但战斗结束后，他还是黑青着脸皮把他们训了一顿：“勇敢得讲究个章法，该拼的时候冒死地拼，不该拼的时候就给我稳住，一说追击，连总部都不要啦？都给我反省！”

从一九三一年十月以后至一九三二年上半年，红四方面军历经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连续奔波，劳累异常，亟待休整。而且，面临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即将拉开帷幕，红军理应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从容迫敌。

但张国焘不管这些，在他的心目中，国民党政权已经飘摇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江山易手天下姓共，而他张国焘也可以身居京都了。况且，还有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支持，更坚定了张国焘的决心。于是乎，麻城战役势在必行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攻下黄陂，打到武汉去！”

这一盲动的后果是严重的，从大的方面讲，它使红四方面军陷入麻城之战不得脱身，蒋介石得以乘机从容调兵遣将，从三面紧缩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包围圈，导致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最终失败，导致红军将士严重伤亡。

秦基伟第一次负伤流血，就是在这一次行动中。

这是一场近乎冷兵器时代的战斗。

敌人是一个团。不是正规的国民党军，然而却比正规的国民党军更要强悍、玩命。土匪、地痞、流氓、赌汉，就是这样一群渣滓占山为王，本来连国民党也要作对的，但蒋委员长对这些渣滓似乎有特殊的偏爱，一纸御文下来，即招安从军，泼皮无赖们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第三十二师的一个团，占据一个拔地而起的陡拔山，行帮凶职责。

对于陡拔山，当时当地人有两种解释，一是第一次大革命时，土豪劣绅被扫地出门，纠集上述泼皮无赖在此栖身，闲得无聊，开设赌局，引东西南北乡民来此酣赌。陡拔山，赌博山之谐音也。另一种解释是，这一带是陵中平原，阡陌纵横，水稻田一望无际，而平地突兀耸起一座山包，陡然拔起，故曰陡拔山。

陡拔山既不巍峨，也不雄伟，但在一九三二年的麻城战役中，它却成了横卧在红四方面军前进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首战陡拔山，是王树声的红十一师。四方面军并没有赋予这个任务，但王树声率十一师参加围攻麻城，路过此处，认为有必要把它打下来。但在实施过程中，又没把陡拔山放在眼里，认为不过一群地痞流氓、乌合之众而已，没有认真对待，只是派出一个团带有捎带性质地去打一打，没想到敌人的兵力比他预料的要多，而且工事诡奇，冲锋地段又多是水田，部队前进受到很大限制。这个团去打了一仗，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伤亡了一百多。

王树声气得暴跳如雷，小小土顽居然负隅顽抗，岂肯善罢甘休，呼呼又派出一个团，可是又没打下，伤亡更大。恰在此时，围攻麻城的部队陆续到位，徐向前电令王树声不得恋战，速率部队奔赴主战场，紧缩麻城包围圈。

参加围攻麻城的红军部队有四军的十师、十一师、十二师，可谓人多势众。麻城虽然陷入重围之中，但守城国民党军根据蒋介石的“拖”字方针，

凭借城坚壕深，固守不出，红军屡攻不克。于是留下黄安独立师继续监视麻城，主力向西南出击，占领仓子埠，进逼黄陂县城，武汉为之震动，国民党军急忙调兵遣将，企图在宋埠、歧亭、祁家湾之间地区阻止红军前进。

殊不知，这是徐向前的一计，待国民党军重新部署后，趁其立足未稳，徐向前、陈昌浩突然回马一枪，于七月二十六日在李家集、靠山店、甘棠铺一线，重创国民党军三十师两个旅，歼其一个团，其余溃退至宋埠、歧亭等据点。

此时，双方重兵都集中在麻城西北方向上，陡拔山的问题再次从次要位置上升到显赫地位。

这次是总指挥徐向前下的决心，仍由十一师主攻，少共国际团协助。十一师负责北、西、南三面，其中有一个西门，少共国际团负责打东门。连长上了，副连长跟上，然后是排长、班长，于是，在南方水田的万顷碧波中，展现了这样一幅画面：

——一座拔地而起的山包威风凛凛地立于水乡田园上，工事坚固，枪眼密布，穿着军装的士兵和袒胸露臂的亡命之徒混杂一起，乌黑的机关枪管吐出红色的弹雨，泻向山下。

——山下，最后的夕阳铺天盖地而来，沐浴着几十名少年红军，他们左蹦右跳轻如猿猴，捷如矫兔，红旗和刀柄上的红穗在前进中迎风招展，猎猎作响。一名红军倒下来，胭红的水田和西方的晚霞浑然一色。后继者跨越同伴的身体，捡起甩落水中的刀枪，又勇往直前。

寨子内的国民党军士兵由狂妄而惊奇，由惊奇而紧张，由紧张而恐慌。天啦，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呵，机关枪织成的火网没有挡住他们的步伐，他们的旗帜已经被打成碎条，褴褛的衣衫在衬着金色的残阳飘动，他们披头散发，他们浑身泥水，他们满脸血污，然而，他们扬着驳壳枪挥舞着大刀势不可挡地冲了上去。

为首的小个子是个指挥官也是个战斗者，他没有挥舞大刀，大刀倒插于背上，他率领的小分队在跨越了死亡地带之后，终于钻进了射击死角。他的驳壳枪清脆如炒爆豆，敢于挡路者在他凌厉而准确的射击中如同收割韭菜般地纷纷倒下，他破旧的军装上泥水和着血水。

人梯搭上后，他第一个上去了。当下面第三个人直起腰时，他从背后抽出了大刀，一道寒光闪过，豁口上守城的敌军不见了踪影，他于是攀着垛角，正欲翻身而入，却见一只乌黑的枪口瞄向

自己，他扬手一枪，击中那枪口的主人。不幸的是，两支枪几乎同时熄火，一棵寸把长的汉阳造子弹头击中在他的右胳膊上，全身顿时为之一颤，驳壳枪也飞出城下。

从豁口上滚下来之后，他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抡起大刀又往上窜，却冷不防被人从后面拦腰抱住了，并摔倒在地上，二话不说，扯出一条绷带，把他的胳膊捆了个结结实实。

他，就是连长秦基伟。

（楚春秋）

暴动小号手，战斗在故乡

张铨秀 1915 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北乡虹桥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这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家庭，父亲背井离乡在外打工，一去就是几年。铨秀从小就不得不拾柴捡粪，帮着母亲和大哥下地做农活养家糊口。

家乡紧挨着井冈山，毛委员、朱总司令领导的井冈山革命的烈火就在这里燃起。1927 年底，永新县的西乡、南乡即发起了农民暴动。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纷纷起来，拿起梭镖、大刀，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反动武装，建立起人民的苏维埃政权。而虹桥村所在的北乡，由于靠赣西反动派的堡垒吉安近一些，革命的烈火蔓延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 1928 年的秋天了。

这一年的秋天似乎来得迟一些，革命给虹桥这个贫穷的山村带来了生机。近一段时间，铨秀的大哥成秀显得特别忙，他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或是秘密集会，或是走家串户，正在组织虹桥村的农民暴动。

大哥是铨秀革命的启蒙人，他年长十岁，大革命时期即投身农民运动，1926 年曾任老居、左坊、虹桥等村农民协会的会长。他从小当“挑脚”，为地方豪绅长途往返担运货物，挣几个血汗钱养家。由于经常到莲花、萍乡等地，很早就接受了革命思想。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哥为躲避反动派的迫害，进了北乡的山区，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他根据党的指示潜回北乡，秘密组织虹桥、南田、下街、肖坊、陂头五个村的农民暴动。

一年以前大哥在家乡搞农运时，十来岁的铨秀实际上已经成了大哥的通信员。他年纪小，道路熟，背个粪筐什么的很容易地就躲过了反动派的盘查。这次大哥回来，需要铨秀做的事就更多了，走村串户、送通知传消息。起初，铨秀并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在做革命工作，他只是认定大哥是在为穷人做事情，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大哥让他做什么事都乐意去做，而且每次都能做得很好。

大哥组织的暴动队员，都是本地的农民，他们有的亲人被反动派杀害了，有的田地地主豪绅霸占了，总之都是些苦大仇深的穷人。暴动队没有枪，只有自己打造的大刀、梭镖作为武器。暴动前也没见他们出过操，处于地下活动状态。这一时期，大哥还在村里组织了儿童团，年长几岁的肖其瑞当了儿童团长，张铨秀成了儿童团的骨干。儿童团员在本村利用各种活动作掩护，暗中监视村里土豪劣绅甘新才等人的出入情况，并留意外地来的生人进村后的活动，成了暴动队的得力助手。

暴动前几天，儿童团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马口铁做的号角。一天早上，儿童团员们都聚集在甘家祠堂门口玩那只号。女孩子们只能老远地站在一旁看热闹，她们知道这事没有她们的份，况且她们也根本吹不动。张铨秀小时性格内向，寡言、憨厚，先是不动声色地在一旁观看。其他人都鼓足气，争先恐后地轮流吹了一遍，但没有一个能吹响。最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张铨秀的身上。这时，他仿佛觉得伙伴们对他抱有一种莫名的也是很热烈的期望。他没有说话，从容地接过伙伴递过来的号角，鼓足气用力一吹，竟然把号角吹响了。虽然他不懂号谱，吹不成调子来，但却能吹出长声和短声，这足以使儿童团员们兴奋一阵子了，纷纷提出建议，把这“宝贝”归他保管，并封他为儿童团的“号兵”。

其实，儿童团是不需要号兵的。对于这一点，铨秀自己心里也清楚，但

这并没有影响他练习吹号的劲头。一连几天，他都在“嘟嘟哒哒”地练着，而且还能根据自己编的号谱吹出几种花样来。一天夜里，大哥神秘地对他说：“你的号明天就能用得着了。”大哥让他第二天天一亮站在屋后的山坡上，连续不断地吹号，吹的声音要紧凑一些，使人听起来像村里发生了什么事似的。他知道大哥是在给他布置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几天辛勤的练习终于能一显身手了，他兴奋得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天不亮，大哥领着几个扎着腰带，身背大刀，威风凛凛的暴动队员去捉人。天刚亮，铨秀按大哥的布置爬到屋后山坡上吹响了号角。急促的号音划破了寂静山村的上空，把村庄从睡梦中唤醒。这时，村里的儿童团员也一会儿敲敲这家的门，一会儿又敲敲那家的门，吆喝着全村老小至甘家祠堂外面的坪子上集合。全村一下子就沸腾起来。

“嘟嘟哒哒”，张铨秀将自己编的号谱反复吹了几遍以后，也蹦蹦跳跳地下山赶到甘家祠堂。嗨！这时祠堂前已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大哥和堂叔张森隆他们捆绑了两个人站在祠堂外面的台子上。这是本村出了名的两个地痞恶棍，是土豪劣绅甘新才的狗腿子。他们依仗甘新才的势力，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乡亲们都十分憎恨他们，一见这两恶棍也有今天，都义愤填膺，一致要求暴动队打死他们。遗憾的是这次暴动未能抓到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甘新才。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还是他嗅出了什么味道，头天连夜躲到安福县的亲戚家去了。暴动队员扑了个空，只抓到这两个恶棍。

公审大会开始了，会上农民协会宣布了二人的罪状，然后大哥和堂叔张森隆分别代表暴动队和农协会做出决定，将这两个恶棍拉到甘姓牌坊外的草坪上处决。当天，全村农民在农协会主任张森隆率领下，分了甘新才家的浮财，大家都眉开眼笑十分开心。不几天，暴动队侦得甘新才的藏身之处，大哥带着几个暴动队员到安福把他抓回来，也开了个公审大会，在甘家牌坊前就地处决了。这样一来，大哥张成秀领导的虹桥农民暴动，算是取得了圆满成功。

自暴动的那天起，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儿童团的活动就频繁了。先是各自回家革自己家的命，把祖宗牌位砸了，然后吹号集合，把村后三个福主庙的关公菩萨给捣了，关公肚里的粮食掏出来煮吃掉，接着又到村东把甘姓的城隍庙和杂姓的城隍庙统统砸掉，泥塑的菩萨一个个都被打倒。扫除了本村的鬼神，儿童团员们决定远征，到附近的村子里去革命。大家扛着标枪和锤子，张铨秀在前边不时地吹着进军号，俨然像一支出征的队伍。沿途乡亲们也都投来异样的目光，并赞叹说：“世道真变了！”

儿童团在打倒神权，破除封建迷信方面充当了主力军，同时也成了暴动队打富济贫，消灭反动武装等行动的得力助手。张铨秀这时真正成了暴动队的号手，每次行动都少不了他了。

虹桥村南面三公里是左坊村。当时北乡分为十都，左坊是一都都公所在地，驻有国民党永新县靖卫团的一小股武装。一天，暴动队决定去攻打左坊的这股敌人，鸡叫三遍即整装出发，到了左坊天还不大亮。队伍将都公所四面包围，按事先计划，铨秀的号音一响即迅速冲进去消灭敌人，但却扑了个空。原来这里的靖卫团武装得知虹桥暴动队要对他们采取行动，头天天一黑就向安福方向逃跑了。

暴动队决定当天在左坊打土豪劣绅，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虹桥的儿童团员们也及时赶到左坊，铨秀吹起了号角，儿童团员和暴动队员一道挨

户叫门集合群众。左坊这天也和虹桥暴动那天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财主恶霸们的权势被摧毁了，祖辈受穷的泥腿子做了左坊村的主人。

打入左坊不久，暴动队又向东进军安福县的石桥。石桥距虹桥有二十来里地，暴动迟迟未发动起来，大哥他们计划去帮助石桥的穷人起来革命。参加这次行动的不仅有虹桥的暴动队、儿童团，也有左坊等邻近几个村的农友参加，浩浩荡荡地有好几百人。张铨秀和往常一样，走在队伍的前边，边走边吹起那支心爱的号角。响亮的号音为暴动队助了威，为这支打富济贫的农军壮了行。

经过约一个月的东征西讨，虹桥暴动队的历史任务完成了，暴动队员大部分参加了红军，也有的被派到其他地方去做农运工作。不久，大哥也调到中共永新县委去工作。只有儿童团员们还留在本地活动，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通风报信、传递消息。虹桥的东北面是安福县的金田，这里的农民运动没有搞起来，是国民党势力控制范围。所以虹桥东北面实际成了红白交界的地区。儿童团主要面向金田放哨，观察和掌握对面敌情。县、区、乡各级还组织儿童团送信，设递步哨，一村一站，一有情况飞速传递。张铨秀个子高、跑得快、又机灵，儿童团长经常让他单独往左坊、老居、石桥等地送信。为了把信安全送到，每次往南边山区送信时就带着砍刀、扁担绳索，扮成打柴的模样，如往西边去，则以拾粪为掩护。母亲对儿子的工作非常支持，但又很担心，生怕儿子出事情。每次儿子出发前都千叮咛万嘱咐，东西要放好，遇到“白狗子”要沉着应付，遇到坏人要勇敢巧妙地与他们周旋，切不可把东西落到坏人的手里。

由于张铨秀在儿童团表现突出，完成任务好，不久就由儿童团转入少先队，担任分队长同时兼任模范少先队的号兵。少先队是由16至23岁的青年组成的，它在共青团的领导下担任比儿童团更为艰巨和重要的任务。

1930年2至9月，赣西特委先后九次组织攻打吉安的战斗。张铨秀的少先分队参加了其中的二次，担任往前线送弹药物资和往后方运送伤员的任务。激烈的战斗中，人们经常看到一些少年活跃在红军的阵地上，他们把子弹、食品送到红军战士的手中，把伤员运到后方。那些日子里，张铨秀的双脚满是水泡，肩膀上勒出了一道道血印。战斗结束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湘赣苏区军民反“围剿”的日子里，少先队的任务也重了。站岗放哨、守卡，为参战部队抬担架支前。张铨秀还经常利用年龄作掩护，和伙伴们到敌占区侦察敌情，引导游击队深入敌人控制区，打击敌人的守望队、挨户团，捕杀豪绅地主和反动帮会的首领。形势缓和时，就到处收集破铜烂铁，送到县苏维埃的兵工厂制造枪炮弹药。有时，少先分队还要配合主力红军打仗呢！

1931年12月12日，驻安福金田敌人的一个营窜到左坊活动。刚取得吉安官田歼敌300余人胜利的红八军闻讯赶来围歼。张铨秀带着少先分队拿起梭镖、大刀，和红军、游击队一起行动，在桂林坊将敌包围全部消灭，击毙敌营长，缴获了很多的武器弹药。

在游击队里

虹桥一带是永新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地方。游击队队长马秋德是离虹桥不远的马连村人，很早就参加了红军。后来，党组织派他回到家乡组织游击队，

配合红军主力打击敌人。他们有时和红军主力协同作战，打击国民党正规军，有时去袭击反动派的地方武装，有时又按地方党组织的指示，去捕杀罪大恶极的豪绅恶霸。

张铨秀的少先队，经常和游击队接触，完成游击队交给的任务，有时甚至和游击队一道执行战斗任务，因此和马队长及游击队员们都很熟悉。他非常羡慕游击队的战斗生活，很早就想成为一名光荣的游击队员，和反动派刀对刀枪对枪地干，但马队长总嫌他年龄小。到了1933年3月，他的愿望总算实现了，他和本村的几名青年一起，被批准加入永新游击队，这时他才17岁。

到了游击队可艰苦多了，离开了家，每天行军打仗，东躲西藏，还要忍饥挨饿。刚参加游击队就碰上敌人对湘赣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各路敌军大举向湘赣苏区的中心永新县分进合击。红军主力这时却北上表水，去配合中央红军的作战。永新游击队、永新独立团和少先队等只好一齐上阵，分头抗击敌人侵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队和地方武装使用偷袭、袭扰等游击手段迟滞和消耗敌人，难以给敌人歼灭性的打击。4月中旬，敌人占领了永新城及周围一些地区。

敌人驻扎下来后，立即大肆搜捕“赤色分子”和抢夺粮饷。一天，驻金田敌人派出约一个班的兵力到附近的洋门村抢掠。游击队侦知这一情况，认为敌人兵力少，思想麻痹且地形有利，这是打击敌人的极好机会。便选择敌人返回时必经之路的山口打伏击，给敌人一点颜色看看。傍晚，抢掠了一天的敌人终于满载而归了，一个个敞胸露怀，倒背着大枪，有的甚至喝得东倒西歪，摇摇晃晃。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十分得意之时，却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游击队的罗网。马队长一声令下，游击队员立即开火，敌人死的死伤的伤的逃的逃。虽然是初次这么近地面对敌正规军，张铨秀却毫无惧色，他随着马队长的冲击口令跃出阵地，用大刀将一名逃跑的敌兵砍翻，缴获了敌兵的“汉阳造”。战斗仅用了十几分钟便告结束，等到附近大股敌人来增援，游击队已经带着战利品消失在山林之中了。这一仗下来，马秋德队长见张铨秀虽然参军才一个多月，年纪又小，但打仗勇敢，有一股不怕死的劲头，是块好材料，就提升他当了副班长。

这一年的6月，永新游击队与安福县的游击队合并，组成永安独立营。游击队升了格，张铨秀也由副班长升为该营第一连第一班的班长。独立营虽然不算主力红军，但也是正规的地方部队。这以后家是不能经常回了，活动的范围也扩大到永新、安福、峡江、吉安这一广大的地区。他留恋故乡，牵挂家中的母亲。而母亲呢，更思念这么小的年龄就在外东跑西颠的儿子。一次，母亲做了一碗儿子爱吃的红烧肉，带一壶自己做的永新老酒，翻山越岭，一个村一个村地打听，也不知走了多少路，辗转好几天才找到儿子的部队驻地。本想给铨秀改善一下伙食，增加点营养，但

由于天气热，时间长，红烧肉已发了霉，老酒也已经变味不能吃

大哥张成秀是铨秀革命的启蒙人和引路人，什么“农民革命”、“穷人翻身”这些词汇最早就是从大哥那里学来的。1933年，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时，大哥第二次遭到厄运，第一次受到打击是1929年底“立三”错误路线的时候。这两次，大哥均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职务和开除了党籍。但大哥并未因此而对党产生怀疑，对革命丧失信心，也未因此而消沉下去，仍然在家乡从事革命活动。不久，错误路线得到纠正，大哥恢复了党籍，

在永新县委任委员、常委兼财贸部长。1934年8月，湘赣主力红军转移，敌人占领了苏区，大力搜捕党组织成员，残害革命群众。永新县委、县苏维埃被敌围困于山区，1935年初被迫分散活动。大哥潜回家又重新以“挑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杀害。

1933年11月初，湘敌刘建绪部开始对湘赣苏区大举进攻，根据地军民自此揭开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序幕。反“围剿”斗争的第一阶段主要进行梅花山战斗。梅花山坐落于湖南茶陵与永新高溪地区交界处，是湖南通往江西的一条重要通道。湘敌刘建绪以第16师和第15师45旅担任主攻，企图占领梅花山，打开我根据地西大门，然后向根据地的中心永新推进。

主力红军都调出去阻击敌人了。为保障主力红军在梅花山取得胜利，永安独立营在永、安、峡、吉交界处，和这一地区的一些游击队一道，以积极的行动牵制住这一地区的敌军朱耀华第十八师，使其无暇西顾与湘敌刘建绪部取得联络，保证红军主力不致腹背受敌，能一心一意地对付进攻梅花山之敌。

永安独立营人少武器破，根本不能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规军硬碰硬地干，只能分散活动，利用群众的掩护和对本地区地形熟悉这一优势打麻雀战、打小规模偷袭战，趁敌人不备时打一下，打完就跑，决不能让敌人咬上。战士们管这种战法叫作跟敌人“捉迷藏”。这也是面对强敌唯一能采用的办法。

这一天，一连准备利用夜色掩护分别对几个村庄的驻敌进行一次袭扰。一排的目标是一个叫下义的村子。白天，排长派张铨秀带两名战士对这里的敌情进行了一番侦察，基本弄清了村里的敌情：该村驻有敌五十四团所属约一个连，在村西一个大户的院里集中住有一个排的兵力，其余敌人则分散住在村东的几户人家；村边路口和大院门口各设有一个步哨。由于较长时间没受到过红军的打击，这些敌人显得既骄横又麻痹。排里根据一班汇报的敌情，研究制定了战斗方案：把袭击的重点放在村西大院，一班对地形、敌情熟悉一些，主要完成袭击大院的任務；二班在村东牵制敌人，听到村西枪声即行射击，使村东敌人摸不清虚实不敢西顾；三班则占领有利地形，掩护一班的行动。排里一再强调，突出“袭扰”两个字，不计较歼敌多少，打一下就撤，自己不许有伤亡，否则视为失利。

深夜，张铨秀带领全班急促地前进在崎岖的山道上。初冬的寒风侵袭着身着单衣的战士，但他们谁都没有在意寒冷的天气，只想快一点见到攻击的目标。没有人说话，只有草鞋与路边茅草磨擦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夜幕对于习惯夜战的战士们来说不是障碍，而是很好的掩护，所以他们很快便接近了目标。为了快一些到达攻击位置，张铨秀带着战士们绕开了村口的岗哨，直接接近了大院。此时已是深夜2时许，门口的哨兵已有些睡意，夜幕和风吹树叶的声音掩护了一班的行动。两名负责解决敌哨兵的战士很快跃到院门口，敌哨兵还没作出反映即被解决了。全班立即扑向大院。这时，突然从院子的一角传来一声发问：“什么人？”不知是起来解手还是换哨敌兵的发问，使张铨秀原来想多消灭几个敌人的打算落了空。此时，双方显然谁也没有看清对方，敌兵的发问也只不过是情况有些疑惑。张铨秀正欲上前和敌兵答话，但班里一名战士可能对突来的情况感到紧张，立即向传来声音的方向开了一枪。这时大院里就炸营了，敌人有的咋呼“有情况”，有的叫喊“红军来了”。情况有变，张铨秀立即改变原定计划，命令全班战士将准备好的手

榴弹向院里扔了十几颗，敌人嚎叫和手榴弹爆炸的掩护下立即撤出了战斗。这时村东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由于天黑，敌人不知虚实，不敢贸然行事，只是在村边乱喊了一气，放了一阵枪，任凭一排战士从容地消失在夜色之中。这次战斗虽然战果不大，但已圆满完成了上级预定的战术任务。

五次反“围剿”的第二阶段的斗争是极其残酷的。红军主力先是护送湘赣省出席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去河东，后红十七师沿赣江北进，配合中央红军在河东的永丰地区作战，接着，红十七师又奉命北上破坏南污铁路威胁南昌，吸引赣东敌人北调，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这时，永安独立营肩负了更加艰巨的作战任务，在敌占区频频出击敌人，给敌人一个红十七师主力尚在湘赣苏区的错觉，以牵制敌人的兵力，不使其尾追我十七师。

这一段时间，敌人在湘赣苏区采取堡垒战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使湘赣苏区日益缩小。在这种形势下，永安独立营每个战士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在湘赣省委和永新、安福县委的领导下，与留在苏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和其他地方武装一起，经过艰苦斗争，保住了西起沙市、东到虹桥、老居的一小块较为完整的根据地，为红十七师以后回来留了落脚的地方。

参加主力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的第三阶段，永安独立营同其他地方武装配合红十八师作战，牵制敌人，迎接红十七师南下。3月22日，红十七师回到湘赣苏区与红十八师会师，接着进到永新县的黄岗、象形和花溪地区。这时，湘敌刘建绪趁红军极度疲劳且又严重减员之际，对红军发起进攻，企图以优势兵力消灭红十七师、红十八师。任弼时、肖克、王震等首长认真研究了敌情，决定在永新的沙市地区利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以伏击手段截击敌一部，杀杀敌人的威风。

永安独立营奉命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在禾水南岸占领阵地，阻止被伏击之敌南渡禾水突围。独立营沿禾水南岸布阵。禾水也叫永新河，北岸是一条绵延数里的大道。这大道就是红军为敌人准备的葬身之地。永新河静静地向东流淌着，河面不算宽但也不算窄。张铨秀的一班在这里占领营的前沿阵地，此时此刻他心中非常激动，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战斗，尽管是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他怕敌人不从这里突围，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打仗，他又怕敌人来得太多，独立营一口吃不下，让敌人从这里漏网，那在主力红军面前也太丢人了。

4月5日10时许，战斗打响了。听着对岸激烈的枪炮声和主力红军的喊杀声，张铨秀他们心里火烧火燎的，恨不能跨过河去立即投入战斗。约过了四十分钟，有了情况，河岸上露出了敌人顶着青天白日帽徽的脑袋，一个、二个、三个……小股敌人爬上了河岸，真的企图从此突围。张铨秀命令全班一齐开火。惊魂未定的敌人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嚎叫着滚下了河岸再也没有上来。这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战斗仅用两个小时时就全歼了湘敌第十五师第四十三旅，俘敌旅长侯鹏飞以下1000余人，毙敌600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永安独立营经受了锻炼，战后即加入主力红军第十七师四十九团，编为第三营，张铨秀也因作战表现出色被提升为第七连一排排长。

沙市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对于红军来说并没有根本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需要寻找战机，以运动战的方式不断打击向苏区进攻之敌。

4月中旬，红军得到情报，驻安福之敌陶广部一个旅准备推进至安福西捕木桥、田里一带筑碉。肖克、王震首长认为这是歼敌的好机会，决心集中红十七师、红十八师在楠木桥至田里之间长达5公里的峡谷消灭敌一部。

任务传达后，各级进行临战动员。张铨秀排长在全排开展表决心和杀敌竞赛活动。他向全排同志动员说：“这次战斗是我们参加主力红军以后的第一仗，一定不能辜负上级对我们的期望。我们都是湘赣苏区井冈山根据地的子弟，几乎每位同志的家里，都有国民党反动派欠下的血债。我们一定要用手中的枪杆子向反动派讨还血债。”全排杀敌报仇的情绪高涨，都决心多杀白匪多缴武器。

一排的伏击阵地在军团指挥所的左前方，这里是一道东西走向并与公路平行的高坎，坎与公路间是约50米宽的狭长稻田，有利于红军将沿公路开进之敌迅速拦腰截断。

湘敌六十二师一八六旅在旅长王育英指挥下，4月14日由安福出发，向红军顶设阵地开进。次日上午10时，一个团开抵田里，一个团则在土桥至楠木桥间开进。红军乘机向敌发起攻击。听到攻击信号，张铨秀率全排跃出工事冲下高坎，以迅猛的动作越过面前的水稻田，冲到公路上与敌厮杀。敌人遭到突然攻击，来不及展开队形，指挥也失灵了，一些就地作无力的抵抗，一些则向北面的树林里溃散。一排歼灭了公路上的敌人后即向树林里面之敌进攻，很快将其消灭。全排又向东参加围歼被红军兜住的敌人。这时敌人足有一个团的兵力被红军像赶鸭子似的赶到田里以北一片很开阔的稻田里，枪炮声、红军战士的喊杀声、白匪军的绝望的嚎叫声响成一片。激烈的战斗进行到下午4时，我军以歼敌一个团，击溃一个团，俘敌200余人的战果结束战斗。一排虽然是到主力红军后打的第一仗，表现却不一般。全排毙敌20名，缴到步枪十几支，还抓了好几名俘虏。

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五次反“围剿”进入了异常艰苦的阶段。敌人大兵压境实行白色恐怖，而这时党内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占主导地位，在红军中推行“单纯防御，短促突击”的作战方针，与敌人堡垒对堡垒地进行阵地战，拼消耗，结果使红军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打了田里战斗以后，湘赣主力红军投入到以阵地防御战来保卫苏区的最后一战中。在湘赣省委提出的“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下，在花溪、象形以北的九重门、公公山、天龙山地区和永新东部的石灰桥、金华山和东北部的松山、成功山一带广泛构筑工事，准备以阵地战抗击敌人大规模的进攻。5月下旬，敌人在永新、莲花间的碉堡封锁线已经基本完成，兵力也部署就绪以后，即准备向石灰桥地区侵犯。

红十七师、红十八师在石灰桥集结，以一部兵力占领金华山、荣子山一线阵地，以少数兵力控制仰山、月岭、虚皇山诸阵地，主力集中石灰桥，伺机出击。张铨秀所在的三营奉命防守金华山，而一排则在前沿阵地荣子山上坚守。6月3日，驻禾川城敌第十六师在东华岭之敌第六十二师一八六旅策应下，向金华山红军阵地进攻。上午8时开始，前沿阵地与敌人展开激战，敌人对荣子山的数次冲锋都被一排打退。但敌人依仗绝对优势的兵力且有备而来，进攻的势头有增无减，一次比一次疯狂。一排坚持了一个多小时以后，虽然守住了阵地并给敌人一定的杀伤，但排里伤亡也不小。鉴于这种情况，上级指示一排主动撤出阵地。敌人顺势占领了荣子山，气势汹汹地继续向三营的主阵地进攻。这时肖克师长率主力三个团杀出，向敌人侧后猛烈攻击。

防守金华山的红军部队也跃出阵地向敌人发起反冲击。天下起了滂沱大雨，红军战士冒雨与敌激战3小时，迫使敌人退守东华岭。此战毙伤敌官兵300余人，红军的伤亡也很大。

铨秀的母亲听说儿子的部队在金华山打了胜仗，便拖着不满十岁的小弟焕秀，跌跌撞撞跑了几十里地，赶到金华山看儿子。哪知道儿子的部队已经转移。第二天，娘儿俩又跑到成功山红军驻地，一打听这是红五十团阵地。五十团的战士一边修工事一边告诉老人，他儿子的部队在左坊附近布防。这时，母亲又跑了好几里地到左坊不远的背店村才见到儿子。

排里的同志听说排长的母亲来了，高兴得像是见到了自己的母亲，问长问短的，还不停地打听各人自己家中的情况。母亲则拿出特地带来的红烧肉、豆腐、还有酒招待同志们。那时候几乎天天打仗，生活很苦，酒、肉之类的东西是很难见到的。排里同志吃到了母亲、小弟带来的东西，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兴奋和激动。

这天，同村在五十团当通信员的曾旺昌同志因公来四十九团，也参加了聚会。不知怎的，他和同乡刘国华因开玩笑翻了脸，竟打了起来。这时张排长就不讲什么老乡情面了，先是严厉地制止了他们，然后又把他们叫到一边进行严肃的批评，使他俩认识到错误并做了检讨握手言和。这些，母亲都看在眼里，看到儿子在革命队伍里成长了进步了，脸上露出从心底里透露出来的微笑。

6月下旬的一天，团部为了掌握敌情，派张铨秀回虹桥，侦察虹桥以北一线的敌情。一大早，张铨秀即化装成做买卖的后生，到金田、洋门一带的村镇侦察。途中几次通过敌人哨卡，由于是本地人，对当地情况很熟悉，对敌人岗哨的盘查对答如流，没有露出半点破绽，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归队时他顺便回家看看母亲和兄弟。这次回家，是他离开苏区前的最后一次，而与大哥的分别，则成了永久的诀别。

回到部队，张铨秀将敌人步步为营，金用、洋门一线的确堡已构筑完毕，很快即可能向前推进的情况向团部作了汇报。果然，敌人6月30日即发起了攻势，7月1日松山战斗正式打响。

松山是红五十一团坚守的阵地，该团7月1日与敌激战一整天。2日，敌五十三师两个旅并力向红五十一团进攻。五十一团顽强抗击，守住了阵地，但伤亡很大。下午3时许，肖克师长命四十九团三营到松山接防，将五十一团的一个营换下来休整。三营奉命从官山坪待机出发，穿过凹地沿松山东侧隐蔽运动。到了东山头，营部把七连留在山脚下作为营的预备队机动使用，第八、第九连上山接防。

4点多钟，敌又开始向松山进攻，他们攻到山腰时被刚接防的八、九连打退。这时营命第七连出击，侧击退却之敌。第一排作为连里的尖刀排，沿东山头的山脚向敌人冲杀过去。山上的防守部队也纷纷跃出工事追杀逃敌。三营的部队冲进山下的松山村，同敌展开激烈的逐巷逐屋的争夺战。张铨秀首当其冲，率一排与敌格斗，攻至松山村祠堂，将敌约一个排的兵力消灭，然后和全营一道，把敌人逼到村东北的水稻田里。这时对面敌人的机枪阵地向三营反击部队猛烈地开火，掩护其溃败的同伙回撤。三营只得停止反击，撤至原防御阵地。

松山战斗打了三天，虽然由于红军的英勇奋战给了敌人重大杀伤，但红军伤亡也很大，尝到了执行单纯防御作战方针的苦果，部队越打越少，根据

地越打越小。肖克等首长认为这样的阵地消耗战我们打不起，下令部队撤出了战斗。

告别故乡

湘赣主力红军在金华山、松山前后浴血征战一个多月，由于军事上执行单纯防御作战方针，虽然给敌以重伤，但敌人的“围剿”未能彻底粉碎，不仅保卫苏区的目的未达，我军力量也逐渐削弱。肖克师长原计划还想打几仗扭转局势，开拓苏区。但敌强我弱，苏区范围极度缩小并被分割，物资缺乏，我军回旋艰难，只得放弃了这个难以实现的计划。

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湘赣省委和军区决定出兵井冈山，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然后以它为依托游击赣西南和湘南，再图恢复湘赣苏区。于晕派红四十九团先期向井冈山进军，打开那里的局面，其他部队暂留牛田地区休整。

7月10日左右，红四十九团向井冈山出发，沿途只碰到一些地方反动武装靖卫团的拦击，但井冈山却被敌人重兵占领了。红军在攻山时失利，只好退至牛田地区。

正在这时，中革军委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创建新的根据地，要求在8月中旬出发。但8月初得到情报，敌即将向红军发动全面进攻，企图首先消灭赣江以西的红军主力，摧毁湘赣苏区，然后再向东配合国民党军主力进攻中央红军。红六军团鉴于这一新的情况，报经中革军委批准，提前于8月上旬突围。

1934年8月7日，张铨秀告别故乡，离开了红军以鲜血建立起来的湘赣苏区，离开了曾为之战斗的深深眷恋的这片红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他的大哥和三个堂叔、三个堂兄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们中，有的牺牲在战场上，有的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还有的冤死在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解放后，人民政府都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

（学秀）

挺进冀南，陈再道声名大振

阵前受命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陈再道率部在山西娘子关、黄崖底等地连续取得伏击日军的胜利以后，从山西省榆次县的下黄彩出发，去辽县（今左权县）城西约5里的西河头村的一二九师接受新的任务。命令还未下达，但陈再道对新任务已略知一二，因为旅长陈赓曾给他吹过风：可能去组织新的部队，开辟新的地区。

陈再道到达师部后，刘伯承师长和张浩政委正在和一位身着军装、个头高的人在谈话，见陈再道来了，忙叫坐下，张政委指着那位同志说：“这是晋冀边区党委书记李菁玉同志，不认识吧？今后你们就要搭伙，在一起战斗了。”陈再道心里想，准是陈赓旅长给他说的那个任务了。刘伯承接着说：“是这样子，我们决定抽调五个连队组建一个东进纵队，由你担任司令员，菁玉同志当政委，去开辟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菁玉同志原是冀南党的领导人之一，熟悉那里的情况。”刘伯承把一幅军用地图在陈再道面前展开，并不时地指指点点。从地图上看，冀南的地理位置大体上是在平汉路以东，沧石路以南，津浦路以西的平原地区，刘伯承指着地图对陈再道说：“再道同志，你看清楚了没有？”“看清楚了，是一片大平原。”陈再道答道。刘伯承点点头，语重心长他说：“开辟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对我们来说是头一次，对我党我军来说也是个新问题。因为那里没有山地依托，是光着屁股洗澡，全部露在外头啊。”刘伯承的幽默语言使大家都笑了，接着，他又充满信心他说：“在平原创建根据地要比山里困难得多，我们大概计算了一下，敌人总兵力一半以上分布在整个华北，但这是不够的，是敌人致命的弱点。敌人不可能在几个地方同时集中兵力作战，这是我们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冀南有三四十个县，到处可以打游击，有很大的回旋余地，那里又有广大的抗日民众，特别是有地下党的工作基础。应该说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是完全存在的。当然，最重要的是政策对头、指挥适当，主观指导上不要出大纰漏。”陈再道一边听，一边从心里暗暗佩服刘伯承的雄才大略。最后，张浩政委说：“据我们了解，现在冀南的情况很复杂，社会秩序极混乱，处理问题一定要慎重。菁玉同志熟悉那里的情况，你们好好谈一谈。”陈再道怀着惜别的心情与两位领导告别，刘伯承紧紧握着他的手，亲切他说：“我们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有机会我也准备到冀南去看看。”

在回部队的崎岖小道上，陈再道感到肩头上好像挑了一副重担。他虽然做过军师的领导，指挥过不少的战斗，但承担独当一面的工作还是第一次，深感责任重大。

回到部队，陈再道把关于组建东进纵队的情况向陈赓旅长作了汇报，建议组建新部队主要由七六九团抽调，并提议从全旅抽调些骑兵，组成一个骑兵连，因为骑兵在平原可以充分显示威力。陈赓表示赞同。李聚奎立即打电话向师部作了报告，领导同意陈再道的意见。最后，抽调一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连，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总队，简称东纵。

东纵组建后，进行了十多天的动员教育，陈再道和李菁玉便率领大家下了太行山，开赴冀南。

冀南的局面极为混乱、复杂。敌人已于10月15日占领邢台，17日占领

邯郸，11月14日占领了德州。冀南腹地大部分县城，曾一度被日军占领，后因日军进攻武汉，大部南下，仅威县、平乡、临清、馆陶、大名等少数县留有日军守护，其余县城都组织了伪政权或维持会，驻有大量的伪军，有些地方的保安团也被编为伪军。在日军大举进犯时，国民党的专员、县长携带财物闻风而逃，以致整个冀南地区陷入混乱的状态。土匪、游杂武装、会道门打着“抗日”、“保家自卫”的旗号，乘机蜂拥而起，一时司令如毛、土匪满地。各种会道门如六离会、白极会、地坎会、大刀会、红枪会等处处设坛摆场，几乎遍及冀南各地。有的与日伪军勾结，有的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互相兼并。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闹得广大群众不得安宁，苦不堪言。

1938年1月15日，正值隆冬季节，北风刺骨，寒气逼人。遇到这样的天气加之兵荒马乱，老百姓大都呆在家里，闭门不出。隆平县（今尧县）的魏家庄这天却热闹异常，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热烈欢迎八路军。陈再道率东进纵队经过一天的行军到达这里。

部队住下后，陈再道到村外的高坡上，用望远镜眺望远方，只见漠漠原野，阡陌纵横，村镇棋布，连个土丘也难看到，真是望不到边的一马平川。陈再道立刻意识到：在平原上开展游击战争，地形条件真是个大问题。

第二天下午，东纵与先期到这里的挺进支队会合了。挺进支队是1937年11月初，从一二九师教导团调出300余人，由孙继先任司令员、胥光义任政委组成的，在这里做了不少工作。陈再道和李菁玉听了他们的汇报。翌日上午，侦察参谋领着一个衣衫褴褛、面带倦容、年约30岁的人来见，不等参谋介绍，这人紧紧握住了陈再道的手，眼里含着泪花，兴奋他说：“可找到你们了，可把你们盼来了！”说着急忙撕开衣襟，从里面取出一封信交给陈再道。李菁玉一眼认出了他，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来人名叫张子衡，是地方党派来的联络员，他告诉陈再道，以巨鹿县保安团为一方，土匪刘磨头、邱庆福等为另一方，正在火并，已经打了十几天了。刘磨头等是惯匪，盘踞在任县、隆平一带，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近来他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收容了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游勇，裹胁了一些群众，居然扩大到三四千人，是冀南土匪武装中最大的一股。巨鹿县保安团团长王文珍，警察局甄福喜，国民党政府秘书刘建三等，是巨鹿县封建势力的代表，1935年曾残酷地镇压农民运动，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和无辜群众；“七·七”事变后又秘密接受了日军的委任，筹建“维持会”，所属保安团近千人，人数虽然没有土匪多，但老兵多，装备好，是南宫一带保安团中战斗力较强的一支武装。据张子衡介绍，双方火并的主要原因是：巨鹿县保安团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曾应任县国民党政府的邀请，打过刘磨头。刘磨头现在人多势众，要报“一箭之仇”并乘机扩展地盘，壮大势力，扬言要“打进巨鹿县城过年”。

听了张子衡的汇报，陈再道和李菁玉等都认为：巨鹿县是我军进入冀南的一个门户。保安团和土匪火并如果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不仅会阻挡东进纵队的去路，影响预定计划的实现，而且还会给今后的工作造成困难。据了解，冀南各县的保安团，除了少数投敌外，大都原封未动，土匪问题更是严重，不下120余股，因此，解决好巨鹿火并的问题，对于争取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具有重大意义。从情况分析看，保安团既怕土匪打进巨鹿城，当然也怕共产党、八路军报复。只要说明东进纵队为了抗日，不念前仇，不计旧恶，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其顾虑是可以消除的；土匪刘

磨头等虽然人多势众，却是一群乌合之众，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倾轧，打进巨鹿城，消灭保安团并非易事，因此，说服他们停止进攻，也是有可能的。

根据上述分析，陈再道一面派人去刘磨头指挥部、巨鹿城保安团劝说他们停火；一面将部队移驻紧靠火井地区的任县邢家湾。

邢家湾是滏阳河畔的一个重镇。陈再道住紧靠河岸的一座房子里，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阵枪炮声。

果然不出陈再道所料，派到刘磨头那里的代表当天就回来了，经过劝说，刘磨头答应停火；巨鹿县王文珍第二天也复信欢迎东进纵队代表到巨鹿城进行商谈。张子衡熟悉巨鹿的情况，自告奋勇，经过两天的谈判，张子衡义正辞严地指出他们的行为是不顾民族大义、国家危亡的行径，王文珍才软下来，答应东进纵队升进巨鹿城。

1月25日，陈再道率部迎着朝霞由驻地出发，中午到达巨鹿城西关。城门口站着一堆人，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穿着西装革履，还有几个戎装整齐的军人，见陈再道下了马，都急忙过来，哈腰鞠躬，拱手作揖，连声说：“欢迎贵军！欢迎贵军！”东进纵队在巨鹿积极宣传抗日，发动群众，进行整编工作，鼓舞了人民的抗日热情。

进驻南宫，扩大武装

陈再道率东进纵队在巨鹿县住了几天，即向南宫县境内开进。部队在南宫城西村住了不久，于2月8日进驻南宫城。南宫，位于冀南地区的中心，是平（北平）大（名）公路上一个重要的县城，交通方便，街道整齐，店铺林立，商业发达，向有“小北平”之称。但是由于不久前10余股土匪围攻该城，多战事的影响，城里的商业已凋敝零落。东进纵队即驻在城内一家已经关闭的“华兴烟草公司”。

这时，日军正向南入侵，从华北抽调第十六师团及第十四、第一八师团各部参加南下作战，华北的兵力相对减少。陈再道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在南宫县及其附近的清河、冀县等地宣传我党的政策，建立抗日政府或“战委会”，改编地方部队，组织抗日自卫队、农民会、妇救会、青抗先、儿童团等抗日团体。同时，从纵队抽出一部分兵力，分赴平汉路东侧的隆平、尧山、任县一带，以及津浦路西侧的临清、夏津、高唐一带，积极打击敌人，摧毁敌伪武装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东进纵队以南宫为中心而迅速展开，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在伪军和土匪游杂武装中也引起很大的震动，甚至有人主动要求东纵予以改编。驻在冀县码头的金庆江原是个土匪头子，“七·七”事变后，招兵买马，队伍很快发展到三千余人，成立了“青年抗敌义勇军”，自封司令。金庆江想找八路军做靠山，派人到南宫找陈再道，陈再道表示欢迎，但金庆江非要朱总司令下委任状，正谈判时，东进纵队通过地下党得知金庆江改编没有诚意，于是将他扣押起来。陈再道赶到码头镇，受到了群众和爱国官兵的夹道欢迎。在地方党组织帮助下，陈再道将金庆江部改编为“东进纵队第二队”，同时还盘踞在丘县的土匪李景隆部3000余人改编为“八路军东进游击第一师”。占据威县的日伪军，是对冀南八路军的最大威胁，而要消灭敌人，拔掉这个据点，当时又难以做到，因此，加强对伪军的争取工作就成为东纵工作的侧重点。驻威县的伪军警备第一旅，是原威县城北的民团。“团总”高

士举，于日军攻占威县后，为保存实力，投降了日军，该旅下辖四个团和一个警备营，共 2000 余人。早在 1937 年 11 月间，冀南地方党曾派人去做高的工作，在东进纵队威震冀南、大力加紧争取工作的情况下，高士举愿意弃暗投明，参加抗日。四月初，该部改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以高士举之子高希伯为师长。

东进纵队的节节胜利，鼓舞了平原群众的抗日情绪，青壮年踊跃参军。纵队以两个老连为骨干成立了东进纵队第一团（团长程启光，政委桂承志），以另一个老连为基础扩大组成为津浦支队，骑兵连也扩大为骑兵大队。

冀南地区抗战大好形势的迅速发展，给东进纵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干部严重缺乏。各县纷纷来人要求东进纵队派出干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再道与李菁玉等研究，决定立即开办一个“抗日军政学校”，校长由陈再道兼任，具体工作由纵队司令部训练科长王蕴瑞负责，学员大都是由地方党介绍来的进步男女青年知识分子，也有少数共产党员，校址设在南宫县原国民党县政府内，学校设有专职教员，都由省委和纵队领导同志兼任，陈再道和李菁玉也多次去讲课，教学内容主要是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各项政策，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学习一些游击战术等军事知识。学员完全按军队组织编成，过军事生活。每期学习一个月，共办了两期，培训 600 多人。学员毕业后，在各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游击队，建立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在创建冀南根据地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晓以大义，折服赵、段

东进纵队以南宫为中心，东向津浦，西向平汉路的发展都比较顺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向北发展却遇到了困难。在武邑、衡水、枣强、景县、阜城、故城、武强等县，盘踞着赵云祥的“河北民军”和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团，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利用社会关系，收编了大量散兵游勇及一些县的保安团，各自发展到近四五千。赵云祥自恃实力雄厚，一心想吃掉了段海洲。

争取和团结他们共同抗日，或暂时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不仅关系到南宫等县的巩固，而且关系到整个冀南根据地的建设。东进纵队进驻南宫后，曾提议由三方派代表举行会议，商谈联合抗日的问题，但遭到赵云祥的拒绝而未能实现。当东进纵队在南宫、新河、冀县一带展开时，赵云祥为了与我军抗衡，迫不及待地想用武力收编段海洲，不时向段部进攻，并扣押了段海洲的参谋长朱家恺。段为了保存实力，想依靠东进纵队与赵云祥作对，特派其部下陈元龙到南宫同东进纵队联系，表示愿与东进纵队联合抗战。根据这一新的情况，陈再道和李菁玉等研究，要抓准有利时机争取赵、段两部，并以陈再道的名义邀请赵云祥、段海洲在南宫城举行三方会谈。段海洲立即表示同意，赵云祥虽然心里反对，但又惧怕东纵与段海洲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因而不得不表示愿意出席。

3 月初，会议在南宫城东进纵队驻地举行。

开会前一天，段海洲就来到，陈再道举行晚宴欢迎他，席间阐明了共产党的政策，并就联合抗日的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赵云祥来开会时带着一个骑兵连驻在城北一个村子里，第二天快开会时才进城，很显然对东进纵队存有戒心。

会议开始，陈再道首先说明三方如何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问题，并着重解释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陈再道的话音刚落，赵云祥就争先发言，说什么联合抗日他“赞成”，但是如何联合起来，还有待研究，接着他把段海洲恭维了一番，竭力解释过去与段海洲发生冲突如何不幸等，意在拉段海洲共同对付东进纵队，以取得领导地位。但是，他这一阴谋未能得逞。段海洲在会上历数赵云祥主动向他进攻、挑起冲突的事实，并请赵云祥答复，赵神色紧张，把挑起冲突的责任推给部下，说自己只是“管教不严”。陈再道怕他们吵起来，影响会议的进程，弄个不欢而散，便从中调解，要求双方协商解决。陈再道严肃地对赵云祥说：“希望赵先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不能对自己的人。”赵云祥自知理亏，便顺水推舟他说：“过去的事情咱们不提了，还是要研究今后如何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问题吧！”陈再道趁机提出由三方成立军政委员会，各部队由军政委员会统辖，不得扰乱地方，危害人民的意见，段海洲对此表示同意，并建议划分驻区，各部不得越界行动，并建议由陈再道任军政委员会主任、段海洲和赵云祥任副主任；但赵云祥则找了种种“理由”不同意成立军政委员会。段海洲再度陈述成立军政委员会的必要性，不同意赵的意见，并说：“如果赵先生不同意成立军政委员会，就由我和陈司令两方组成”。赵云祥见此情势，只好勉强表示同意，会议终于达到预定的目的。

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是冀南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的又一胜利。它加强了东进纵队在冀南各类武装中的领导作用，对进一步稳定冀南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加强冀南工作的领导，1938年3月19日，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派宋任穷同志率骑兵团来到冀南。他们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发展根据地的问题。这时邢台至临清公路上的一些县仍被日伪军盘踞着：武强、衡水、枣强、景县等地仍被赵云祥和段海洲的部队所控制。因此，向北向南发展均有困难，只有向东向西发展阻力较小。冀南西部与太行山相连，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必须以太行山为依托，同时也便于及时接受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的直接领导和指示；而太行山的巩固与发展也要靠冀南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因此，他们决定以东纵一团和骑兵团等部队迅速向西发展，从而扩大与太行山的联系。稍后，文令津浦支队向东发展，陈再道率东进纵队一团进到滏阳河南北地区，连克宁晋、赵县、藁城、巨鹿、新河等县；骑兵团连克广宗、平乡、南和、曲周等县城；津浦支队在孙继先司令员、王育民政委率领下进至高唐、夏津一带。

东纵每到一地，在地方党的协助下，解散伪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改编保安团，宣传和组织群众，冀南根据地的局面逐步打开了。

巧擒匪首，计捣匪巢

在冀南根据地迅速发展的时候，原来被东纵收编的一些土匪头子，如邱庆福、刘磨头等本性不改，不仅不执行东进纵队提出

的要求，而且暗中与日伪军勾结，继续危害人民，影响了社会安定和群众的抗日情绪。在群众的要求下，东纵决心以武力铲除之。

邱庆福，是原来盘踞在隆平一带的土匪头子，被东纵收编后，依仗其人多武器好，积极扩大地盘，竟带着部队到南宫县城附近烧、杀、抢、掠，群

众恨之入骨。陈再道多次令他返回原驻地，不得扰害百姓，他却置之不理。那时，在南宫只有东纵两个连，如不解决邱庆福，不仅引起群众的不满，而且还全严重威胁着东纵

司令部的安全。于是，陈再道召集东纵一团团长程光启及两个连的干部一同制定了一个比较巧妙的办法。

一天上午，陈再道以检阅部队为名，邱部在南宫城北樊家庄一个大场子里集合。这个场子旁边有条干壕沟，是个天然战壕，东纵的两个连站在壕沟的前边，邱庆福的部队在场子另一边，其身后也有一条壕沟，但有一人深，难以徒涉。樊家庄村北有一栋高房子，东纵在房子顶上隐蔽了几挺机枪，当程光启团长站在场子

中间一个方桌上给邱部讲话时，陈再道令邱庆福到司令部开会。司令部驻在一座三进的院子里。邱庆福带着十多个护兵一进司令部大门，陈再道事先布置的人员就告诉他，里面屋子小，不能来这么多人，留下他的几个护兵。他们进入第二道门时，又对护兵说，今天陈司令要同邱司令商谈军机要事，只请邱司令一人进去。邱庆福无可奈何，只得只身进后院，他迈步进来，埋伏的几名战士一跃而上，将其捆住。接着，陈再道让邱部中队长以上的人员前来司令部“开会”，缴了他们的枪。这时，邱部中的汉奸、特务和个别死硬分子，见状感到事情不妙，就高声喊“打”。东进纵队迅即退到后边的壕沟里，抢先射击，房上的机枪也同时开火。邱部后退无路，乱作一团，到处乱窜，有的跳进水里，有的被打死或打伤，有几个匪头跑到东纵司令部跟前；作了俘虏。邱庆福和他的部队就这样全部被解决了。

解决了邱庆福，南宫地区的群众欢欣鼓舞，杀猪宰羊，慰劳东纵。这时，宋任穷和陈再道决定4月初进剿刘磨头。

刘磨头率领的土匪盘踞在任县地区，县城东北10余里的环水岛，是刘磨头的老巢。该岛四周被水环绕，与滏阳河相连，东南北三面水深三尺，水面宽阔，不易徒涉，犹如一个小小的“梁山泊”，易守难攻，刘磨头在这里盘踞已有20多年，抗战前国民党二十九师派部围剿均被击退。要彻底消灭该匪，必须首先捣毁刘磨头的巢穴——环水岛。

陈再道决定由骑兵团、东纵一部和当地武装共同完成这一任务。当即召集参加作战的领导干部分析情况，研究作战方案，大家认为，最好智取，不要强攻。

参战部队到达隆平、任县地区后，地方党的同志一听说要打环水岛，端刘磨头的老窝，高兴极了。地方党的负责同志说，刘磨头手下的一个头头在这里，我们可以让他帮忙。这个头头名叫刘福子，东进纵队到达冀南后，他以探听虚实为由自环水岛出来，想与我地方党建立联系。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物。打算由他乘船带路，直捣环水岛，刘福子开始有些犹豫，怕我们消灭不了刘磨头，自己反而受害，后经说服才接受了这一任务。

4月4日拂晓，大雾弥漫，陈再道率东纵首先以骑兵大队一部用几挺机枪封锁了环水岛通滏阳河的水面，防止敌人乘船逃跑，同时以一个排为突击队，乘船在刘福子引导下向环水岛西岸疾进。突击队距岛100米时，岛上的哨兵高声问话，刘福子回答：“我是刘福子，外出回来了！”哨兵一听是刘福子的声音，再也没有吭气，东纵部队亦随即赶到，立即发起攻击，将土匪围在一个四合院内。经过激战和政治瓦解，土匪全部被歼，毙伤匪徒百余人，俘200多人。与此同时，东纵骑兵团亦将驻在永福庄、郑家庄一带的刘磨头

部消灭，歼匪 500 余人，缴获轻重机枪 8 挺，长短枪 400 余支。但是，在俘虏和击毙的匪徒中却未见刘磨头，经过多次搜查，仍未找到其踪迹。被审讯的匪徒有的说：“刘磨头在三天前，带着他的姘头不知到哪里去了。”有的说：“他向邢台跑了。”

在消灭邱庆福、刘磨头两股土匪部队的同时，陈再道对冀南其他地区一些坚决与我为敌的土匪、伪军也进行了打击。在威县南里村，消灭了赵山峰部；在曲周县消灭肖耀成部；在临清之唐园消灭了张义等部。还有不少小股土匪慑于东纵的强大威力，有的投降，有的消声匿迹。自此以后，社会秩序大为安定，群众的抗日热情更高了。

短短几个月里，东纵协助冀南党组织建立了 20 多个县的政权，纵队也由 500 多人发展到一万余人。由原来的 5 个连，逐步发展到 3 个团，东纵政治委员改由宋任穷担任，政治部主任是胥光义，参谋长是卜盛光。

为统一领导冀南各方面的工作，1938 年 4 月 15 日在南宮县召开了有各界代表和友军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冀南抗日军政委员会筹备会，巨鹿名绅乔铭阁被选为主任委员。军政委员会制定了敌后抗战的施政纲领，建立了县级政权以及游击队、自卫队的组织，冀南抗日军政委员会的成立，对于全面开展根据地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它标志着我党我军已经在冀南站稳了脚跟，冀南已形成了平原抗日根据地。

（方军）

沧海横流孟庆山平原显本色

红旗飘扬高阳城

孟庆山从河间、蠡县回来，侯玉田后脚跟着进了北冯村。一进院里，孟庆山就赶紧问：“找到东北军那个团了吗？”

“找到了，嘿！装备好，人员多，还有大炮哪……”侯玉田眉飞色舞他说。

“他们怎么说？愿意回来抗日吗？”

“愿意，他们也正在找党组织呢。进屋我给你细说吧。”

进了屋，他一五一十地介绍了寻找东北军六九一团的经过和吕正操现在的想法，直说到天黑下来，连油灯也忘了点。孟庆山听完很兴奋，又仔细问了问部队的装备、军事素质、群众纪律等情况。他长年在红军中做领导干部，能从这些细小的地方分析出一个正规团的战斗力。可惜，侯玉田没在正规部队呆过，对这些不甚懂，只得说：“到蠡县会合时就知道了。”

与吕正操部在蠡县汇合的日子快到了。这天清晨，孟庆山在南冯、张庄、孟仲峰村集合了近200人的武装队伍，就向蠡县出发。孟庆山骑马走在前面，越走，心里跳得越厉害。按行军路线，

正好从自己的家乡万安村通过。他想回去看看年迈的父母亲 and 几个弟弟，但又强迫自己打消了这个念头。队伍接近万安村，老远，孟庆山就看见那横亘在村边的长堤，他的心跳得更厉害了：8年前，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出外谋生，从此音讯全无，现在家人怎么样了？队伍渐渐进了村。街道两旁，都是本村看热闹的群众。妇女们兴奋地指点着这支穿灰军装的抗日队伍，孩子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孟庆山骑在马上，首先看到了十字街上的那棵老槐树，又看到了那座大石桥。他的心情十分激动。这时，在桥头的人群中，倏地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那高高的、微驼的身板，那嘴角上饱经风霜的皱纹……是爹！他差一点没喊出来，眼睛也有些湿润了。但他强压住心里的激动，策马徐徐走过石桥。

他爹孟宪耀在桥头扬了一下手里的烟袋，喊道：“老总，下来喝口水吧！”他做梦也想不到，这就是失去音讯多年的大儿子。

孟庆山猛地扭过头，用鞭子抽了马屁股一下，马加快了脚步。

大约中午时分，孟庆山带领队伍进了蠡县县城。进城没走几步，碰到了正在组织欢迎人群的路一、梁斌等人。他们打过招呼，立即投入了欢迎的准备工作。

这天清晨，吕正操率人民自卫军从博野县城开拔，日头一竿子高，吕正操率司令部和特种兵骑马坐车先行抵达蠡县。离城一里多地，就听到了欢迎的锣鼓声，眼见无数男女老幼打着红、绿旗子，舞着彩绸迎出城门，爆竹声响成一片。吕正操心里不禁一热，看来，孟军委已先来一步，做好欢迎人民自卫军的准备了。

孟庆山身穿灰军装，腰扎武装带，右肩左挎公文包站在人群前头，侯玉田和警卫员站在他的旁边，吕正操等人骑马由远而近，侯玉田小声介绍道：“前面那个骑白马的高个子就是吕司令。”

孟庆山点点头，笑了笑，大步迎上去。

吕正操老远下了马，将缰绳扔给警卫员，疾步而来，双手一抱，作了个

揖：“孟军委，可找到你们了！”

孟庆山也紧走两步迎上去，两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孟庆山握着他的手，说：“共产党保属省委欢迎你们北上呵！有了你们这支抗日队伍，冀中人民就有了主心骨。”

吕正操感叹道：“我们也在到处我党组织啊！”

孟庆山看着眼前开过的队伍，心里十分高兴。4匹马拉的炮车，一辆辆从他们面前过去了，群众的欢呼声、惊叹声不断：“……哟，这么大的炮！”“怕是能打几十里吧，那炮弹该有多大个，还不像个碌柱……”

吕正操、孟庆山在警卫人员的簇拥下，信步进入城里。在本地党员路一、刘希亭等人的带领下，按照已号好的房子住下，休息、开饭，饭后，群众送来了花生、红枣、猪、羊肉慰问。整个县城，沉浸在欢快的气氛中。

吕正操和孟庆山商定，人民自卫军开到党的基础较好的高阳一带，保属省委给人民自卫军补充一些兵员和给养，人民自卫军给河北游击军保属省委的队伍补充一些武器弹药。

高阳城被冀东保安队尹松山部占据，保属省委曾经派人去做工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可是他们执迷不悟，扰民严重，变成了土匪。

第二天下午，人民自卫军开到高阳城下，结果，尹松山命令保安队关闭了城门，人员都持枪上了城墙。下面的人喊话，他们不但不开城门，还向下开枪，打伤了一个副连长。孟庆山很生气，说：“尹松山铁了心要当土匪，围起城来消灭他。”不多时，吕正操带领司令部赶到了，两门大炮也运抵城下，孟庆山向吕正操介绍了情况，经商量，决定再向城里捎个信，让他们打开城门接受改编。如不服从，则攻城。

信捎去后，直到天黑也没回话。城门照样紧闭，城墙上仍有人守卫，随时准备射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卫军决心攻城。不长时间，云梯搬来了，炮兵打了两炮，守城的保安队从没打过仗，一看这阵势，一个个吓得抱头鼠窜，跑出工事，溜下城墙。趁此机会，战士们将云梯靠上城墙，占领城头，然后下去打开城门，部队像潮水一样涌入城里。孟庆山和吕正操也进了城。第二天，在西关学校操场上召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尹松山。高阳城头，飘起了红旗。

孟庆山和吕正操一同进高阳没几天，晋察冀军区就派共产党员孙志远从早平县风尘仆仆前来联系。原来，聂荣臻司令员听说有一支东北军的部队在冀中打起了抗日的旗号，经向搞过兵运的孙志远询问，估计可能是吕正操领导的六九一团，因此，就派人来了。

孙志远和两名随行人员带着密码，历尽千辛万苦，于10月下旬穿过日寇的封锁线——平汉线，进入冀中，首先到了定县。在那里见到了县委的同志。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孙志远等人来到高阳。他1933年在东北军做兵运工作时，认识吕正操，便径直找到了司令部，见到了吕正操，带来了聂荣臻司令员的口讯，欢迎他们就地坚持抗日。吕正操与他相逢十分高兴，向他介绍了部队的情况，接受了他带来的密码，命通讯主任架设电台和晋察冀军区沟通联系。

在谈话中，孙志远得知党中央通过另一个渠道派来了红军团长孟庆山，也在这里发展抗日武装，并以保属省委军委书记的身份支持人民自卫军的工作。他非常兴奋，吃完饭，没有休息就去商会大楼找孟庆山。两人见面，分外亲切，霎时间，因和北方局、中央联系困难的愁云一扫而光。长征时他在

红三军团工作，知道聂荣臻是红一军团政委，现在聂荣臻来晋察冀军区当司令员，还从山里派人来联系，显然中央加强了对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

两人都是常年在党内生活的同志，谈起来格外亲热。孟庆山离延安两个多月，和中央间断了联系，觉得闭塞的很，他迫不及待地问了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人的情况、国内的总形势、国际上的形势……孙志远把自己能说上来的，及在晋察冀党委听来的一些情况，一古脑儿讲给了他，直讲到半夜。通过谈话，孟庆山对孙志远有了一个较全面的看法：这个同志有文化、有能力，是一个难得的干部，后来，他以保属省委的名义向吕正操推荐，由他担任了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孙志远果然能力很强，他在改造人民自卫军的艰苦工作中，成绩显著。1938年4月成立冀中军区，他升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全盛发展的河北游击军

孟庆山与吕正操在高阳县会师后，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大力发展队伍。不久，吕正操带领人民自卫军3个团共2000多人进山整训，冀中暂时由孟庆山支撑局面。此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冀中，已形成杂色武装近百股，他们打着抗日旗号，招兵买马、扩大地盘，一些有钱的商人、绅士为保住自己的财产，积极活动建立维持会，购买枪支、组织武装。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孟庆山和保属省委研究认为，要坚决贯彻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力争团结他们，改造他们，不让他们投奔铁路沿线的日军成为汉奸，也不允许他们成为祸害群众的土匪。

为了保证地方党组织手里有武装，孟庆山将高阳和肃宁的一部分自卫团整编为游击军第一师，自己任游击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这个师虽然编制不满员，但党员成份很大。接着，他又将我党掌握并发展起来的蠡县人民自卫团编为第二师，安平县人民自卫团编为第三师。

促使孟庆山和保属省委加紧收编杂色武装、围剿土匪武装的直接原因，是省委委员肖第之死。

省委委员肖弟受省委指派来保属省委辖区了解情况，在河北游击军住了几天，听说安新一带杂色武装发展很快，便放弃了马上回石家庄的想法，准备去安新帮助河北游击军收编群众武装。孟庆山担心他说：“你找那些杂色武装可得小心点，他们这伙人大都是兵痞、土匪、二流子，别看他们打着游击队的旗号。”

肖弟笑笑：“没事，你去吧，回来后到肃宁找我。”

肖弟到了安新，见到我党领导的受挫的第一支队，让他们去肃宁找孟庆山，并告诉他们自己去邵庄子收编马有彬的队伍。随后，即乘冰床子上邵庄子村。

肖弟见了马有彬，讲完改编的道理后，就住在这个村子里。深夜，当肖弟在黑暗中被惊醒时两只胳膊已被绳子捆上。他毫不畏惧，破口大骂。匪徒们把他架到外面，塞进了白洋淀的冰窟窿。

过了几天，没听到肖弟的消息，孟庆山很着急，就派人去安新找寻。找了好几天，也没看到肖弟的人影，又派人到邵庄子等村查找，经当地渔民报讯，找到了肖弟的尸体。

孟庆山在河间听到肖弟牺牲的消息，心如刀绞，暴跳如雷地一拍桌子：“他娘的，抓住这帮龟孙子枪毙！”然后命令安新的八路军围剿马有彬。

两个多月后，河北游击军八路军在光淀张村将其包围，打死打伤一部分，将马有彬等4人活捉，押到河间审问后枪毙，为肖弟报了仇。

就在孟庆山寻找杀害肖弟的凶手时，又出了一件事。

这天上午，在安平县的第三师师长马佑民飞马来见，进屋，没顾得上擦汗，着急他说：“孟司令，俺们那边出事了……前一阵俺们三师成立后，都在乡下活动，县城里只剩下县游击队政治部主任段占熬等10几个人。昨天我县何经武、刘文宪等地主勾结蠡县地主武装袭击安平县城，杀害了段占熬、赵锡珍等3人，缴了其他人的枪……现在他们占据了县城，自立为王……”

孟庆山听到这里，脑袋“嗡”的一下，那几个都是很好的同志，是他和省委研究后派去的，现在杀害肖弟的凶手没抓到，又有几个同志被地主武装杀害了，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冷静了又想，如不坚决镇压地主土匪武装，很难稳定住局面。他告诉参谋长集合部队，去安平。

天黑时，部队抵达安平城下，只见城门紧闭，城墙上端着枪的人晃动。孟庆山几次令对方开城门，对方就是不开，但也不敢开枪。孟庆山看天色已晚，令部队将城围住，同时向城墙上喊话，命令他们赶快出城到指定地点集合，不然到明天就不客气了。占据安平县的100多人的地主武装，见孟庆山亲自带人来了，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半夜，想弃城逃路，被围城部队乱枪打回。早饭后，游击军已做好了攻城准备，20多挺轻重机枪分别对准了4个城门，云梯开始向城下运动。城里的地主武装一看要完蛋，赶忙打着白旗、开开城门到城外集合，游击军和县游击队员们上去缴了枪，痛打一顿。孟庆山赶到现场时，恰逢段占熬等同志的尸体抬出来，他走上前去看了看，只见死者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死者家属早已扑上去嚎陶大哭。马佑民咬牙切齿地叫道：“孟司令，这帮龟孙子怎么办？都毙了算了！”战士们也吼叫起来：“都崩了他们，这帮王八蛋不抗日，专杀老百姓和抗日人员……”

孟庆山向马佑民挥了挥手。

马佑民嘶哑着嗓子下了命令：“全部绑到城南苇坑边上去。”他的命令一下，战士们冲上去绑人，人群一阵骚乱。马佑民朝天开了两枪，镇住了慌乱的人群，很快将俘虏们捆起来，让他们排好队，向城南走去。

这时，孟庆山的头脑渐渐冷静下来，他想起了红军的俘虏政策，一扬鞭，骑马追上去，命令道：“把他们带回去，坏头目交县政府审判，其他人员释放回家。”

马佑民一愣，问道：“什么？释放回家？杀我们的人白杀了？”“执行命令！”孟庆山不容质疑地命令。

第二天，俘虏们大部分被释放，几个杀人的坏头目公判后枪毙。这件事对一些杂色武装产生了很大震慑作用。

解决了这股地主武装，孟庆山回到高阳，来访的社会名流、联庄会头头、旧军人络绎不绝。肃宁县的旧军人王贲拉起了一支队伍，几天前他来拜谒孟庆山，请求委任。孟庆山未答应，原因是对他的情况不太了解。今天，他又来谒见，孟庆山和其他委员商量过后，觉得没发现王贲有什么罪恶，给他加委对团结抗日有利，于是，任命他为游击军第二路军总指挥。王贲接过盖有孟庆山鲜红大印的委任状如获至宝，像得到尚方宝剑一样，小心翼翼揣入怀中，再三道谢后，带领随从疾速返回，招兵买马，扩大队伍。

下午，共产党员韩印堂带着安新同口人陈沐新来见孟庆山，韩印堂介绍，陈沐新和束鹿、晋县，深泽、安国一带的红枪会有密切联系，如果给他加委，

他能够把红枪会改造成抗日武装。陈沐新再三表示了自己的抗日决心，请求孟司令加委，孟庆山为联合抗日，当下委任他为游击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印堂为政治主任，让他们去冀中东部发展抗日武装。

近在咫尺的万安村里，孟庆山的老父亲孟宪耀听人们纷纷说，儿子孟庆山当了司令，驻在高阳，他有些半信半疑，可老伴总是淌着眼泪催他：“去看看吧，兴许是他回来了。”经再三催促，他和儿子孟庆三背着铺盖卷，徒步奔向高阳县城。

一进城里，果然气派和从前不一样。街上，到处是穿灰军装的人，两边贴了不少红红绿绿的标语。经过打听，知道司令部驻在高阳县商会大楼，他们就找到那里。门口，有站岗的，孟宪耀有些胆怯，犹豫了一下才上前问：“老总，孟庆山是在里面吗？”

哨兵打量着他，警惕地问道：“你找他干什么？”

“俺、俺是他爹，这是他二弟。”孟宪耀赶紧回答。

哨兵向里喊了一声：“传令兵，孟司令的爹来了！”一个传令兵跑来，把他们领了进去。

在一间大房子里，孟宪耀见到了当司令的儿子。孟庆山惊喜地迎过来，叫道：“爹，你们来了！”

孟宪耀望着儿子，眼泪“扑簌、扑簌”地滚下来，嘴唇颤抖着说：“山子，当初爹不该……”

孟庆山笑着，宽慰老人家：“爹，别哭了，也是当初穷得没法，要不是你赶我走，我怎么能参加红军，懂这么多事理……娘的身体好吧？”

“好、还好，就是常念叨你，你大弟庆龙已娶媳妇分家过，下面的庆中、庆杰也都长大了。”

孟庆山亲热地拍了拍庆三的肩膀，问：“二弟，你现在干什么呢？”

庆三回答：“我在村里开了个小药铺。”顿了一下，又说：“日本鬼子一来，日子也没法过了，大哥，我跟你当兵吧！”

孟庆山语重心长他说：“参加革命，这是好事，可是不要靠我，不要想从当司令的大哥这里沾什么光。”他看了看庆三有些失望的眼神，又补充道：“你参加咱们队伍也好，现在部队还缺卫生人员。这么着吧，你回去把你们的同行叫一些来，一起搞卫生部，另外，把你小药铺的药也都带到队伍上来吧。”庆三高兴地点头：“我能叫十几个先生（医生）来。”

孟庆山和保属省委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声势越来越大，不但影响着石德线以南的冀南，也影响着平汉线以西的冀西山区。孟阁臣原是国民党败军的连长，1937年10月带着10几个人溃退到易县塘湖一带的石板山落草为寇。后来，为了扩充势力，诱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参加他的队伍，打起了抗日旗号，并袭击过一次日军，队伍很快发展到200多人。他两次派侍使去见孟庆山，请求加委，第一次去时，孟庆山考虑易县离冀中较远，对情况不太了解，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第二次请求孟庆山加委时，孟庆山已听说了他们袭击日军的消息，就委任他为第七路军总指挥。

1937年12月中旬，河北游击军指挥部及一师3000多人，浩浩荡荡从高阳县南迁冀中腹地肃宁县。在那里，消灭了土匪徐二黑部。这时，有通讯员送来急件，打开一看，原来是肃宁东边旧武装高顺成部几百人从任邱、河间一带越过县境，抢劫老百姓的东西，奸淫妇女。群众纷纷要求我军保护。二团请示：打不打？

孟庆山和许佩肩、田同春及作战科的同志们一起商议，田同春介绍了详细情况：高顺成也是土匪出身，但此人有点正义感，过去为了贩盐，和盐商们拉起百余人武装，对抗官军。“七·七事变”后，打起抗日旗号，很快发展到四五千人，编成3个团，号称7000人。他本人对群众祸害不太大，他外甥高宁子是个流氓、恶棍，现在他手下任团长，经常带着几百人打家劫舍，群众对他恨之入骨。

孟庆山问：“我先后给高顺成去过两封信，怎么连信都没回？”

许佩肩说：“高顺成仗着自己有几千人，狂得很，谁都不放在眼里。前一阵我们一支队伍要从他们地盘过，提前打招呼，他们不让过，还限定我们只许往三十里铺以北发展。”

孟庆山想了想，命令道：“老许、老田，你们今天晚上就去二团，再从一团带一个营，瞄准机会打他们个伏击！”

两天过去了，东边一直没有动静。这天下午孟庆山参加完“游击剧社”的成立会，隐隐约约听到二团驻地方向有枪声，不大一会儿，通讯员骑马跑来。孟庆山估计是伏击高宁子的战斗已打响，果然在他预料之内，高宁子带200多人到太平庄抢劫，被许佩肩、田同春率部包围了。孟庆山立即命令派人支援，要他们力求全歼，多抓些俘虏。

战斗到半夜结束。除高宁子带少数人逃跑外，打死打伤一部分，俘虏100多人，还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孟庆山第二天清晨赶到太平庄。许佩肩问怎么处理？孟庆山吩咐：按红军的俘虏政策办。

高顺成当天晚上就知道了被伏击一事，气得他把高宁子狠狠骂了一顿：“你这个混蛋，告诉你不要招惹孟庆山，你非跑到人家地盘里去瞎糟，这下子咱们吃了亏，人家还得我咱们的事……”第二天，外面不少家属闹死闹活要人，吓得他不敢出门。下午，忽听有人传报：“孟庆山派人来了，有事求见！”高顺成十分疑惑，让赶快请进来。

来人是第一路军参谋长田同春，见到高顺成，作了个揖：“高司令，对不起了！昨晚有一支部队到我们驻地老百姓家里抢东西，被我们打了一下，抓了100多俘虏，孟司令亲自看过后，知道是你的部下，让我来赔礼，并让你们来人把他们领回去。”

高顺成听了又惊又喜，赶忙请田同春坐下，用茶，连连夸游击军是“仁义之师”。

傍晚，高顺成派人来领俘虏，并送了一些茶叶、白糖做礼物，孟庆山和蔼地接见他们，当场清点缴获的武器弹药，一一送还。接着又去交还俘虏。结果俘虏们嚷嚷起来：“我们不回去了，我们要参加游击军抗日！”、“我们不当土匪！”弄得接收的人十分尴尬。孟庆山大声说道：“高司令心里也愿意抗日，大家回去吧，咱们一块跟小日本干……”这样，给了来人一个台阶。通过做工作，俘虏们都被领了回去。不久，高顺成也接受了河北游击军的委任。

此时的冀中，河北游击军有3个师、12路军、3个直属团，号称10万之众，分布在3.6万平方公里的平原上，汇成了抗日的海洋。

此时，孟庆山听到，在回族村庄较集中的献县、定县具有两支回民武装队伍，积极进行抗日斗争，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领导献县回民义勇队的是东辛庄村马本斋，他上过两年私塾。13岁闯关东，在走投无路时参加了东北军，由于他身材魁梧，能吃苦，有文化，先当

班长、排长，又进讲武堂。“九一八”事变后升任东北军独立二十一师团长，驻守胶东一带。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马本斋看到东三省被日军占领，怒火中烧，屡屡向上峰请战，不但没批准，反遭训斥，他一气之下弃官回故乡。8月的一天，日寇的铁蹄踏到了马本斋的家乡。这天日寇在东辛庄烧杀抢掠，整整闹腾了大半天，下午外出回来的马本斋刚进村，就看到被日军杀死的乡亲、烧毁的房子，几天后，他在东辛庄清真寺里组织了有70名回族兄弟的回民义勇队。这支队伍，打了第一次伏击，取得了胜利。1938年初，马本斋率领这支队伍又进行了几次战斗，但由于人少力单遭受了损失，牺牲了几名队员。大家心情都很沉痛。在母亲的劝说下，他动了投奔共产党的念头。

2月，定县的抗日武装“回民队”负责人刘文正奉保属省委指示来东辛庄见到马本斋，并带来了河北游击军司令员孟庆山的亲笔信，马本斋像是在大海中航行的孤舟看见了灯塔，立即率部开赴河间县，正式参加了八路军，改称回民教导队，马本斋任队长。

两万大军围攻河间城

在孟庆山南北用兵，收编杂色武装时，驻高阳县的河北游击军参谋长阎九洋送来急信：保定的日军分两路向高阳、安新两县进攻，形势吃紧……保属省委和河北游击军领导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一部分人提出请孟庆山立即率部去抗击，他们认为高阳、安新两县是河北游击军的根据地，不能让日寇占领。孟庆山讲了自己的看法：高阳、安新两县城距保定仅十公里，日本鬼子是不会让我们长期占着的，现在最主要的是抓紧时间收编杂色武装，消灭土匪，不然等日寇一到，这些人当了汉奸就麻烦了。至于高阳、安新失守，以后我们腾出手来再往回夺。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拥护。于是，他继续率4个团收编联庄会，打击地主、土匪武装。到1938年2月稳定了冀中广大农村的局势，树立了共产党的权威，巩固了河北游击军的地位。

1938年4月，敌人为了打通平大公路，将冀中分割开来，纠集日伪军3000多人，从沧州向冀中腹地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孟庆山立即率游击军司令部和部分人员返回河间指挥反击。

到了河间城，留守人员赶紧向他介绍前线的情况。据今早从藏家桥一线退下来的部队讲，虽我3个团沿有利地形阻击，但鬼子、伪军气焰十分嚣张，只两天时间就从交河推过献县，由于游击军军事素质差、武器简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有些连、营已被打散……现在段士增正率余部在藏家桥苦战，以掩护河间城里的军民撤出去。

参谋长王松耆在桌上摊开地图，看了看说：“藏家桥离河间城约35里左右，公路还没来得及破坏，敌人如果突破藏家桥的阻击线，3个小时就能赶到这里。”

孟庆山说：“命令段士增，一定要坚持到明天早晨8点，争取一晚上时间。我们调集部队，在城南八里桥包围鬼子！”

傍晚，一个参谋急促报告：“司令！段师长他们败下来了……”

孟庆山没说什么，一边扎武装带，一边向前院走去。

段士增和几个部属在台阶下等孟庆山，都有些忐忑不安。边上的几匹战马，浑身冒着热气，嘴里溢着白沫，一看就知是经过剧烈奔跑而来的。

孟庆山看到他们，强压住火气，问道，“老段，怎么回事？”

“我去左翼了，鬼子的坦克往中间一突，有几个新兵往后跑，其他人沉不住气，也往后跑，防线就……”

“你是干什么吃的？你这个师长白吃干饭，你怎么没死在阵地上？”

“我……”

“别说啦，藏家桥一丢，八里桥的防线还没设好，鬼子一会儿就可能追进河间城……参谋主任，你马上带警卫营去八里桥，防备鬼子趁势进城。另外，还有哪个部队到了？一块调上去！”孟庆山向屋里喊道。

参谋主任从屋里跳出来：“是！”说完，带着几个人向外跑去。

段士增是最后撤出阵地的，临离开阵地前，还叫住几个慌乱的战士抬下去最后一个伤兵，鬼子的歪把子机枪把他的褂子穿了两个洞。经过孟庆山这顿训斥，他脸色通红，气的一跺脚，飞身翻上马，一扬鞭直奔院外，他的几个部属也照样跟了去。孟庆山想到段士增脾气暴躁，怕出意外，连忙喊道：“老段，干什么去？”

“和鬼子拼了……”

“站住！”孟庆山喝道。

段士增没理他，在“哒、哒”的急促马蹄声中，一溜烟远去

气得孟庆山吼道：“无组织无纪律，真他妈的该关禁闭……”然后派人去追段士增。这时屋里电话铃响了，他去接电话。电话是抗日政府的县长打来的，问是不是先组织城里的医院和政府人员撤出河间城，孟庆山告诉他，尽快把河间城里非军事人员全部撤走。

到夜里10点多，援兵源源赶到。凌晨1点钟，孟庆山已对6个团的团长和几个师长布置完任务。师、团长们按照命令去调动部队，他才松了一口气。

刚坐下喝了两口水，有人喊道：“段师长回来了！”接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进了院子，台阶下传来沙哑的喊声：“报告！”

孟庆山听出是段士增的声音，答道：“进来！”

段士增在几个人拥簇下进来了。只见他满脸是血，左胳膊用绷带挎在脖子上，驳壳枪无力地垂在腹前，气色非常难看。孟庆山问道：“怎么回事？”

“段师长带俺们在商家林村突击了一下……”跟在段士增后面的人小声回答。

“还有伤亡吗？”

“阵亡7人，伤了10几个……鬼子也伤亡10来个……”

孟庆山气得对段士增说：“你……”后面的话止住了，他看了看段士增蜡黄的脸：“先下去休息吧，你不服从命令的事下来再说。”

凌晨，孟庆山率司令部赶到距河间城8里的河边，安顿下临时指挥所，师、团长们听说他来了，纷纷跑来打听消息，他笑着挥挥手：“回去再修整一下工事，没事了抽袋烟歇会儿，攒足了劲儿天亮干吧！”

大家笑着回到自己的阵地，向指战员们渲染着孟司令的轻松情绪，于是，这些刚当兵的庄稼汉们也消除了高度紧张心理。

很明显，战斗将在黎明打响。孟庆山黎明前最后视察了战场，他看看黑黢黢的前面，命令：“弄几只小船划到这三座桥下，船上装好稻草、火药、煤油，万不得已就烧桥。”

随着雄鸡的叫声，河对面传来“砰、砰、砰”的枪声，紧接着又是日本歪把子机枪一串“嘎、嘎、嘎——咕、咕、咕——”的响声。

对面地里人影在晃动，敌人在指挥官的嚎叫声中，成战斗队形前进。

孟庆山带几个人来到了重机枪掩体边。重机枪射手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一边从准星里往前看，一边往手心上吐唾沫、搓手，来人了他都没发觉。能看到对面鬼子的黑影了，机枪手伸手去扣扳机……

孟庆山轻轻拍拍机枪手肩膀，小声地制止：“慢些，放近点打！”

机枪手扭头看了他一眼，不好意思地笑了。

“砰！”的一声，边上不知哪个战士沉不住气打了一枪，其他人以为是指挥员发出了射击命令，“砰、砰、叭、叭”开了枪，一时间枪声大作，敌人受到这突然打击，都纷纷趴在地上还击，由于距离较远，敌人几乎没有多少伤亡。

重机枪射手转头看了看，又“呸、呸”往手上吐了点唾沫，双手扶住重机枪扶手，孟庆山小声说：“等等……再等等……好，打！……”随着他的喝令，重机枪响了，“咚、咚、咚——咚、咚、咚——”声音既沉闷，又有节奏，像一个发了怒、强压火气的愤怒老人……

敌人被打倒几个，其余的敌人迅速趴下了。我军士气大振。战士们在战壕里大叫起来“打得好！打得好！”随着叫喊声，有几个胆大的战士跑向河边，甩出几颗手榴弹，尔后又跑回来。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敌人开始退却。

早上，战士们正在战壕里吃饭，听到空中传来“吱—吱—”的响声，不知谁喊了一声：“炮弹——”话音未落，附近就响起“轰隆——轰隆——”的强烈爆炸声。刹时间，阵地上浓烟四起，灰尘满天，鬼子开始用炮火急促轰击游击军阵地。

有些新兵惊慌了，蹲在战壕里一动不动，孟庆山知道炮击一停，敌人就会发起冲击，立即命令道：“师、团领导要战斗在第一线，指挥在第一线。”说完，带着警卫员和参谋大步走向阵地。

时间不长，敌人的冲锋又一次被打退。

中午刚过，敌人炮击比前几次都猛烈，随着炮火的稀疏，远处出现了几个黑黑的大家伙，后面，是穿黄呢子的日本兵和穿绿衣服的伪军。

孟庆山用望远镜仔细一看，发现黑黑的大家伙是坦克，他数了一下，一共7辆。这7辆坦克一字排开，一边开炮，一边引导步兵前进。他没有再犹豫，立即命令道：“参谋长，你马上跑步去，监督桥头部队立刻将桥烧掉。”

很快，三座桥下的小船上燃起熊熊大火、火借风势，窜起一丈多高，引着了木桥，烧得“吱、吱”直响。

游击军虽然猛烈射击，但敌军在坦克的引导下仍然冲了过来，到了河边。敌坦克冲到桥头，一看木桥已燃起大火，不敢过桥，怕掉进河里。敌步兵想从火中冲过来，被机枪打了回去。双方相距几十米，形势有些严重。

孟庆山跑出掩体，一边在阵地上鼓动着，一边不时用手枪向敌射击。在他的带动下，师、团领导及司令部一部分人员都到了最紧张最危险的地方向敌人射击。

鬼子也豁出了老本，一汽车、一汽车的援兵不断运来，这些人一跳下车，立刻成战斗队形散开，补入与我对峙的阵地里。

不多时，天空中传来“嗡嗡”的声音，4架标有红膏药的日本飞机逆着太阳光向游击军阵地扎来，到阵地上方俯冲时，距地面只有一房多高，“轰隆、轰隆”的马达声和空气的呼啸声震得人们耳朵几乎聋了，有几个战士顷刻之间倒在了血泊中。

孟庆山大喊着：“同志们不要惊慌，敌人飞机来了，趴下，千万不要乱

跑！”

敌机转了一圈，再次俯冲下来，一架飞机从孟庆山头顶飞过，低得很，几乎把他的帽子挂掉。他一伏身，敌机打下一串机关炮炮弹，子弹射入身后10几米的地里。

近5点钟，敌人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除了大炮和飞机轰炸，有两辆坦克竟冒着翻车的危险下了河。游击军战士们被敌火力压的抬不起来，唯一的重机枪也被打坏了，几个地方同时被敌军突破。

孟庆山眼睛红了，他“唻拉”一下撕下棉袄摔在地上，骂道：“他娘的，我不信一万多人挡不住三四千人，说着，从一个战士手里夺过一把带刺刀的步枪：“通知各部队，准备和鬼子拼刺刀，谁也不许后退一步！”

秘书王志到他面前小声地：“孟司令，你冷静点，咱们这是新建立的部队，可不是你原先的老红军，好多人枪上没有刺刀，还有的是打兔子的火枪。”

愣了片刻，孟庆山咬牙下了命令：“撤！”

日伪军伤亡300多人，占领了空空荡荡的河间县城。

但是，游击军各部队并没有按计划撤到既定地域。而是自行退到了河间城下，准备和敌人再干一场。此次阻击战使这些初上战场的庄稼汉们明白了：日本鬼子也不是三头六臂，子弹碰到身上照样躺下。特别是父老乡亲姐妹兄弟们的慰问，更使他们热血沸腾。

这些情况，是孟庆山率游击军司令部撤到鸽子洼村才知道的。

这是距河间城10余里的小村庄。孟庆山召集游击军师以上干部开了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汇报了所了解的情况，分析了形势。一致认为，敌人进城后未敢再出城求战，说明敌人士气受挫，正在休整。经过休整和补充后，会继续北犯，执行打通平大公路的计划。为彻底粉碎敌人的计划，必须乘敌立足未稳攻取县城，将敌逐出河间一带。但是，也有人提出，河间县城城墙坚固高大，我军只有一些轻重机枪、掷弹筒，用什么去攻城？

孟庆山狠狠一拍桌子，坚定他说：“一定要攻下河间城！”随即发出命令，调集游击军各路人马。

最先赶来的，是许佩肩、田同春的第一路军。部队还在后面几十里，两人已先骑马赶到鸽子洼，一见面，许佩肩止不住地埋怨：“孟司令，你让我们呆在滹沱河北岸防守、连个敌人影儿也没看见，可你们这边却打了好几天……把我急得，天天派侦察员到这边打听消息，也没个准信……”

“孟司令，没受伤吧，听说你带着人和鬼子拼上刺刀了？”田同春关心地问。

孟庆山笑了：“没有、没有，……看你们这个样子，我要真阵亡了怎么办？”

“你要真阵亡了，十万游击军还不散了伙！”田同春嘟哝着。

正说话，外面有人喊：“报告！”一位魁梧军人大步走进来，向孟庆山报告：“献县回民义勇队队长马本斋前来报到。”

孟庆山大步走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你们来得正是时候，欢迎回民弟兄来参战。”

马本斋也紧紧握住他的手：“孟司令，我们作战经验不足，你以后多支持……”

正说着，陆陆续续又有高士一的第五路军及第二路、第四路、第六路、第十二路一部、三支队、模范营前来报到。

深夜，孟庆山去城外视察各部队阵地，当走到回民支队的阵地时，看到他们的堑壕、掩体、隐蔽指挥所已挖好，部署得井井有序。孟庆山暗暗点头称赞。他弯腰钻进指挥所，见马本斋正弯腰在汽灯下标地图。马本斋见他来了，赶紧打招呼，孟庆山过去看地图，见地图标得相当准确、清楚，敌我态势、地形、地物也画得非常规范。这样的图，没有良好的军事素养是标不出来的。马本斋指指地图，遗憾他说：“这里敌人很薄弱，如果有平射炮，几炮就能打开缺口……”

孟庆山看了一会儿，突然说：“老马，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打完这一仗，你能不能来游击军司令部工作，我们这里非常需要一位懂军事的参谋长。”

马本斋沉思半晌，说：“我还是带回民义勇队吧，现在队伍刚拉起来，我要一走……”

孟庆山听完，想了想：“那也好，等队伍巩固了再说。”

3天时间，河北游击军共集结了两万余人。

后勤部搞了几车炸药，刚拉到，不知怎么使用，孟庆山突然想起幼年放起花能飞很高。对！麻瓣手榴弹是撞击引爆的，如果把起花做得很大，带上麻瓣手榴弹飞入城里，不也能炸敌人吗？

当地做鞭炮、做起花的师傅是很多的，下午，请来几个。先做了几个小碗粗细的起花，后面绑上三根两米多长的秫秸，然后再绑上个小砖头试验，只听“嗖——”的一声长啸，起花飞出去三四百米远，司令部的同志都“哄”地一声笑了：“行，能行，再加药还能飞得更远。”

实验成功了，游击军星夜派人到高阳，任邱、蠡县、安国等县去请花炮师傅。很快就找来了一二百人。孟庆山亲自召集他们布置任务。花炮师傅们忙碌起来了，他们连夜熬硝、碾木炭。后勤部从各地购买了大批麻杆和现成的火药，并派出部分战士给他们当下手。经过5个昼夜的忙碌，造出了几十大车。远远看去，像连绵的山岭。

日本鬼子和伪军被围在河间城里，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夜里看到北部常常有火焰飞上天，不知是怎么回事，纷纷胡乱猜测。1938年4月18日的夜晚，游击军各师、团进入阵地，除了担任外围警戒和准备打阻击的部队外，直接参加攻城的有15000多人。

时针指向深夜1点，孟庆山一挥手：“开炮！”他的命令一下，院里的花炮师傅点火，三声礼炮，传出好远，鲜红焰火，直上天空。进攻信号发出，河间城四周顷刻发出了阵阵长啸声，随即，成千上万个飞炮拖着火红的尾巴，带着麻瓣手榴弹飞向县城上空，又落下去，发出连绵不断的爆炸声，西城的木炮、大抬扛儿和所有的迫击炮也一齐开了火。整个天际都映红了。

城里的敌人被打的晕头转向，不知道我军用的什么新式武器，只是在火光中东跑西窜四处躲避，有的则以为是苏联运来了什么高级武器，吓得抱着头钻到碾子底下，一动也不敢动。炮火准备了15分钟。冲锋号响了，县城四周都是号声，也不知有多少号，有多少部队。各部队扛着云梯向城墙跑去，迎着城墙上日本鬼子仓皇射出的子弹，没有犹豫，没有怯懦，只有一个信念——攻入城里，赶走日本侵略者。

上百副云梯架上了城墙，在攻城中，会武术的小伙子们打了头阵。有人只拿一根长矛，冲上去与日寇肉搏，有的冒着危险将手榴弹绑在长杆头或刺刀头上，只要一上城墙，立刻将“嗤、嗤”冒烟的手榴弹向鬼子群捅去，攻不下城，毋宁死！

日军指挥官也急了，提着战刀在城墙上督战，遇到退却的，立刻嚎叫着上去一刀。日本下级士兵在长官的监督下拼命抵抗。我军有的云梯刚挨着城头，即被推翻过去。这时，城下传来海潮般的喊声：“拿下河间城，消灭鬼子兵，冲啊！”在振奋人心的喊声中，被推翻的梯子马上又竖起来，人们争先恐后地向上爬去。

鬼子的坦克使不上劲，步兵又顾此失彼，攻上城的游击军战士越来越多，到两点半，北城墙首先燃起一堆大火，这说明攻北城的游击第一师已得手。

与之不相上下的，是许佩肩、田同春领导的第一路军，他们进攻的西城墙也生了一堆大火。

游击军源源不断地从北门和西门进入城里，巷战开始了。城里的日伪军沿街抵抗到凌晨4点多钟，形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发展下去有被分割歼灭的危险性，日军指挥官看到大势已去，命令打开南门，在坦克的掩护下狼狈逃窜。

拂晓，孟庆山骑马踏着发热的子弹壳和血迹进入城里。战士们正在打扫战场。日伪军的一具具尸体被抬走，偶尔也有零星的枪声，那大概是战士们在搜索溃兵时发生的个别战斗。

打下河间城后，孟庆山在那里驻扎了几天，他经过反复思考，越发感觉到冀中一座座坚固的城他对我坚持平原游击战不利。因此，孟庆山向保属省委提出发动群众拆城的建议，省委委员们一致表示同意。在部队的配合下，首先发动群众拆了肃宁城。然后在冀中全面展开“拆城破路”运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拆除了24座城池，同时还开始了破路工作，把各种公路全破坏掉。在路边，挖宽3米、深2米的道沟，牛车、马车可以通行无阻，汽车过不去。隔几十米筑圆形土丘一个，围绕土丘筑成上下道，两辆车对行可以错开，也可以防止敌人顺道沟射击，便利了我军行军作战隐蔽。这种道沟在广大群众的参与下，挖了72000华里，改变了冀中的地形、地貌。

（李金明）

惊天地泣鬼神，杨靖宇将军的最后一战

在杨靖宇养伤期间，敌人反复进山“搜剿”，一路军在桦甸、濛江的密营相继被毁，几次战斗中缴获的粮食和冬装被烧。在这种情况下，杨靖宇和曹亚范必须首先弄到粮食和冬装，才能让部队安全过冬。

但濛、桦地区已经不是年初的形势了。这时已像整个南满一样，遍地都驻满了日伪军。杨靖宇和曹亚范在山林里转悠了半个月，还没有找到可以下手的地方。杨靖宇意识到如今濛、桦地区已成了日伪军“大讨伐”的重点地区，决定南下金川，寻找机会。10月末，他刚率警卫旅和一方面军越过辉发江，就被数路敌人发现，紧紧跟上来。11月初，杨靖宇进入金川，又与六百余名伪军遭遇。激战中杨靖宇手握双枪，带头冲锋，伪军死伤五十余名，我军伤亡十二人。大批敌人闻讯赶来，杨靖宇被迫调头向西，进入濛江。11月23日，他又在濛江小西头地区与千余名伪军遭遇，目标暴露，大批日伪军迅速跟来。杨靖宇不得不再次北上，进入濛江西北山区。12月9日，刚刚进入濛江大北山的杨靖宇又与日寇渡边“讨伐队”遭遇，虽成功地甩掉了对方，却再次暴露，在濛江无法活动，只能二次南下，进入金川。我军至此已十分被动，只能在敌人大军的夹缝里钻来钻去。24日，杨靖宇、曹亚范所部四百人在临江、金川交界的大板石沟岭与大批日伪军遭遇，激战中我军伤亡惨重，两支部队一起解决给养和冬装已不太可能，杨靖宇和曹亚范商议，决定分开活动。

杨靖宇生命的危机正是从这时开始的。与曹亚范分手后，他和一路军警卫旅在金川濛江、桦甸的冰天雪地的山林中进入了1940年。经过两个多月的南北转战，部队的给养和冬装仍没能解决，反而处处挨打，人无粮，马无草，伤员得不到救治，部队大量减员。1月初，这支还剩两百余人的队伍袭击濛江县敌重要据点龙泉镇，得到了一批给养，士气稍振。6日，这支部队在濛江西岗与日寇“小滨讨伐队”、“程斌挺进队”、“崔青峰挺进队”遭遇，敌众我寡，杨靖宇决定各部分散突围，警卫旅政委韩仁和率六十余人北上桦甸，佯装主力吸引敌人，杨靖宇率部分兵力就地隐蔽，待机与一路军军需处长全光会合。15日，警卫旅旅长方振声率一支小部队在桦甸筹集给养时，因汉奸告密被捕牺牲。21日，警卫旅一团参谋丁守龙在濛江马家子南方被汉奸申麟书带领的伪通化省警察大队捕获，叛变投敌，杨靖宇所在位置、兵力情况等全被敌人知悉。野副昌德闻报，立即调集大原、有马、小滨、有政四部日军，加上伪步兵三团，以及程斌、崔青峰等九支警察大队（即所谓“挺进队”），总兵力达四万余人，又派飞机数架，由伪通化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到濛江坐镇指挥，对杨靖宇隐蔽的濛江西部山区实施“铁壁合围”，专心一意捕杀杨靖宇。月末，杨靖宇率部在马屁股山与大股日军遭遇，激战中我军伤亡达七十余人。突围后杨靖宇与警卫旅和少年铁血队失掉联系，跟他在一起的只有特卫排六十余人。2月1日，特卫排长携带现金九千余元、手枪四支及机密文件投敌，队伍进一步失散。2日，杨靖宇身边只剩下二十余人。10日，在日伪军不停顿的追击下，杨靖宇身边只剩下十二名战士。15日，他身边只剩下七名战士，粮尽援绝，陷入重围。

2月15日早上，杨靖宇和最后七名战士潜藏在濛江县五斤顶子西北方一个山坳里，再次被汉奸崔志武带领的警察大队发现。崔志武急忙报告岸谷隆一郎，岸谷当即命令正在周围搜寻杨靖宇的“程斌挺进队”、“唐振东挺进

队”、“崔青峰挺进队”一起赶来，参与所谓“最后的围剿”。岸谷还怕地面跟踪难以奏效，专门调来飞机，从上往下“盯”住杨靖宇，杨靖宇到哪里，飞机便跟到哪里，一边给地面上的四支伪警察大队指示目标。这天，杨靖宇带七名战士边打边撤，却一直没能将敌飞机甩掉。下午三时，他们占领了一座小高地，阻击跟得最快的“崔青峰挺进队”和“程斌挺进队”。两队敌人加起来共有六百多名，杨靖宇身边只有七个人，敌人气焰十分嚣张。“崔青峰挺进队”的日本人队副伊藤用中国话向杨靖宇高喊：“快投降吧，你们跑不了啦！”杨靖宇回答：“你们不要打了，派一个人过来谈谈！”伊藤信以为真，喊：“很好，我马上去！”刚一起身，只听“啪、啪”两枪，伊藤应声而倒。崔青峰大怒，带起队伍就要朝前冲。杨靖宇举起手中的毛瑟一号手枪，“啪、啪”又是两枪，汉奸崔青峰的左腿骨被击断，倒在雪地上。两队伪军一时被震住，杨靖宇趁机率领最后几名战士突破了重围。当夜，他们找到一间架子房休息，敌人又顺着脚印追来。此时七名战士一名牺牲，四名负伤。为不使负伤者落入敌手，杨靖宇决定与伤员们分手，只带朱文范、聂东华两人离开，将敌人兵力引走。为抓住势单力孤的杨靖宇，“程斌挺进队”和“崔青峰挺进队”整整追了一夜。黑夜里敌人的飞机不再能派上用场。上述两支“挺进队”中的日寇和汉奸们就一根根地划着火柴，寻找杨靖宇的足迹。他们在雪地上发现了血迹，认定杨靖宇已经负伤，以为胜券在握，更加兴奋，继续向前追下去。但是16日清晨，他们还是在濛江大北山东方的公路上失掉了“目标”。这一天一夜间，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以惊人的毅力，将六百余人的伪警察队拖得精疲力竭，被打死、打伤和冻伤、疲惫掉队者竟有五百余人，最后只剩下五、六十人，坐在雪地上喘气。

岸谷隆一郎接到“杨靖宇消失”的报告，大为愤怒，在无线电中将程斌等人大骂一通，令其带队加紧寻找。再次派出飞机，漫山遍野地到杨靖宇可能藏身的地区广泛搜寻。中午，敌人在濛江大北山发现了六名抗联战士，以为他们就是杨靖宇的小队伍，急忙用无线电呼调来了一支日军，将其中一人打死，两人俘获。日本人以为被打死者就是杨靖宇，迫不及待发出了“捷报”。但不久“程斌挺进队”赶到，经辨认方知死者不是杨靖宇。岸谷隆一郎白欢喜一场，又羞又恼，决定重新撒开大网，搜寻杨靖宇。

2月17日夜，摆脱敌人追击的杨靖宇让朱文范、聂东华二人带上一些现金、三支手枪和自己的印章，离开潜伏地区，到山边的屯子里搞一点吃食。入冬以后，部队经常断粮，与警卫旅分手后，杨靖宇和他身边的战士更没有得到一粒粮食，每日只能用草根、树皮甚或衣袖上绽露的棉花充饥。显然，即使到了这种时刻，杨靖宇对于逃脱敌人的“追剿”也仍然没有失去信心。杨靖宇仍然是杨靖宇，只要有了粮食，他觉得他们仍有可能突破重围，找到警卫旅，重新投入战斗。18日晨，朱文范、聂东华在濛江大东沟附近试图靠近屯子，被敌人发现，当地伪警防队和特务搜查班一边向上司们报告，一边紧急出动，朱文范、聂东华边打边撤，终于在海龙河东沿被敌人打死。日寇在两位死者身上找到了现金和杨靖宇的印章，急忙报知岸谷隆一郎。岸谷从而断定杨靖宇就在附近，随即下令收缩包围圈，切断公路，封锁森林，派遣特务伪装成樵夫进山，寻找杨靖宇。但四天过后，敌人仍然一无所获。岸谷这时突然觉得，杨靖宇可能又一次逃脱了他们为他布下的“必死之阵”。这个日本人内心里已对杨靖宇形成了那么深的敬畏，他不敢相信自己这次真能捕获这位“中国战神”。

杨靖宇却在这时出现了。失去了朱文范、聂东华之后，杨靖宇现在成了孤身一人。他已在生命最后关头用毅力和强健的体魄一次再次地击败了敌人，但是他无法击败饥饿和寒冷。在躲避敌人追击的日日夜夜里，他肯定会对于一个多月的失败感到突兀。杨靖宇出山后从没有这样干净利索地失败过，失败的原因又那么单纯（只是为了得到冬装和粮食，就使自己 and 部队完全陷入了被动），使一向充满自信的他根本不能承认这是一次真正的失败。伟大的杨靖宇可能仅将这次失败看成一次意外的失利。一路军各部还在，总部独立旅还在，照他过去的经验看，只要有了粮食和一双新棉鞋（他脚上的棉鞋已经烂成一团，靠一根绳子捆着才没有“散架”。终日在冰天雪地里奔走，他的两只大脚已经冻伤），他仍然有把握穿越敌人的重围，找到自己的队伍，东山再起。但朱文范和聂东华的死却使他必须亲自去弄食品和衣物，这样做他便不得不暴露。一向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杨靖宇，就在这一刻显示出了生命的脆弱。

然而即使如此，杨靖宇大概仍认为自己能够得救，也应该得救。他不是活在自己的国土上吗？不是活在中国人之间吗？他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直至今今天被四万日伪军苦苦追杀，不是为了这块国土上的每一个中国人不再做亡国奴吗？这时的杨靖宇肯定知道自己面对着一种两难处境，他要为这个民族战斗下去，就要得到食物和棉鞋；而要得到食物和棉鞋，他就必须暴露。暴露的危险他是知道的，多日激战之后，他生命的力量即将耗尽，他可能再也不能像2月15日夜里甩掉“程斌挺进队”和“崔青峰挺进队”一样甩掉某一队敌人了。但不暴露也有危险，那样他就会在山林和雪原中冻饿而死。杨靖宇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为了得到食物和棉鞋，找到部队，重振抗日雄风，他必须暴露，但只能向中国人暴露，向他认为是老百姓的那些中国人暴露！

2月22日，杨靖宇出现于濛江县保安村以西五里的山里，保安村四个砍柴的村民看到了他。这四个人是：伪牌长赵廷喜、村民孙长春、辛顺礼、迟德顺。他们认为，杨靖宇是有意站在那里等他们的，他的第一个愿望是想用钱向这些砍柴人买饭吃。砍柴人一般要在山里过一天，身上总带有一顿干粮。但四个砍柴人身上却没有干粮。自从杨靖宇被围困在这片山区，屯里的伪警察所就开始严格盘查所有进山的砍柴人，不再准许他们带干粮进山。赵廷喜后来说，那个人听说他们身上没带干粮，有些失望，就请他们回到屯里帮自己买一点吃的和一双棉鞋，他还说自己可以多付给他们钱。为了使这四个中国人相信自己的话，他甚至还拿出身上带的九千元伪币对他们摇晃了一下。四个人答应了。此时他们已断定这人就是日本人出动数万大军要抓的杨靖宇，却没有想到加害于他。伪牌长赵廷喜还开口劝他：“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是不杀头的。”杨靖宇这时的反应是耐人寻味的，对方已经认出了他，他却没有否认，只是以一个中国人对另一些中国人的口吻平静他说：“我是中国人哪，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赵廷喜等人听了，不再言语，答应回屯里帮他弄点吃的和一双棉鞋，然后与杨靖宇分手。

赵廷喜等人走了。杨靖宇却遇上了一个难题：他是不是应该相信这些已经认出了他的中国人。从与他们的交谈中，他对他们特别是那个开口劝他投降的人是不放心的。但从另一面讲，他也不能认为他们都是汉奸。汉奸不是这样的人，出卖良心的汉奸他是一眼就能认出来的。杨靖宇面对着两种选择：留在此地等候他们设法从屯子里搞点食物出来，让他活下去，继续为中华民

族的解放而战；马上离开，让自己最终饿毙在山林之中。就上述两种选择而论，杨靖宇很自然地倾向于前者。杨靖宇不是一个渺小的中国人，他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像所有伟大的中国人一样，他也将另外的中国人看得比实际上伟大。他不能不认为他们和自己一样伟大，不然，他就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要为他们奋斗，不能解释他牺牲一切为之奋斗的理想又有什么意义！

杨靖宇留下来了。

现在杨靖宇把自己的生死寄托在几个他不能把握、却无法不信任的中国人身上了。只要他们愿意，杨靖宇就可能得救。或者他们什么也不做，杨靖宇虽然失望，但至少不会被敌人发现。他会饥肠辘辘地转到别处，再去寻找另外的中国人，那个或那些中国人也许就能帮助他度过难关，再造生命的辉煌。

需要赵廷喜们做的其实只是一件事：不做日本人的帮凶。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也许赵廷喜离开杨靖宇时并没想到要向日本人告密，也许他一点儿不想帮日本人杀这位穷途末路的抗日军人（他也是中国人，虽当了伪牌长，也未必不恨杀人如麻的日本鬼子）。但是赵廷喜害怕另外的事情；他怕他会因此事受到连累，怀疑和他一起进山的其他三个人先报告了他们和杨靖宇的会面，那时他就会因不向日伪当局报告而被冠以“通匪”的罪名，全家都可能被杀。

这种恐惧的想象是没有根据的，至少那种足以威胁他全家生命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想象本身却十分“合理”。

正是它改变了一切。

赵廷喜走回屯子的路上，越想越怕。回到屯子里，偏巧迎面遇上了日本特务李正新。后者可是个铁杆汉奸，只认钱不认人。一见到他，赵廷喜不知不觉就哆嗦起来。

“老赵，你怎么啦？”李正新看出了他脸色的不正常，立即警觉起来，问。

“山里头有一个人，他叫我们帮他买粮食和棉鞋……”一种突然的要将自己从危险中解脱出来的愿望，使赵廷喜冲口说出了刚才还不想说出的话。不仅说出了他们四人同杨靖宇见面的经过，还说出了杨靖宇现在的位置。

李正新的两只小眼睛立即变得贼亮。李正新是另一类中国人。在他的意识里，钱显然比世间的任何东西都更重要。他的思维很简单，如果抓住了一个叫杨靖宇的中国人能得到日本人的一万元赏金，这个杨靖宇就应当被抓到，而且应当由他参与抓到。他活了半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哪！

李正新一把抓住赵廷喜，带他去了屯里的伪警察所。这时赵廷喜就是不愿去，也逃不掉了，他已经成了李正新发财计划的关键人物。

伪警察所立即将“发现杨靖宇”的消息上报给了濛江县伪警察队本部。

赵廷喜和李正新，两个中国人，并非故意合谋，却已经做到了四万日伪军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以虚假的承诺（帮助买食物和棉鞋）将杨靖宇“定”在一个点上，然后报告给日本人，等候日本人去“剿灭”。

1940年2月23日下午三时，濛江县伪警察本部的日本警佐西谷接到报告，开初并不在意。近日来这类报告太多，他不相信这个来自保安村的报告就一定“可靠”。因此，西谷就没有再向岸谷隆一郎报告，便带着警察本部十九名日本警察、以及汉奸唐振东警察大队留在濛江县城的二十几名队员，乘车赶到保安村，要“看看究竟”。

赵廷喜又被李正新抓来了，被迫重新“报告”了一通经过。西谷这时有点信了，他让赵廷喜带路，去寻找上午见到的那个“杨靖宇”。赵廷喜连声答应。事情已越来越严重，他若是不能帮日本人抓住山里遇到的那个人，日本人很可能不会放过他。此时这个中国人，甚至比日本人还热切地希望杨靖宇被抓获，而不是为了得到赏钱。

西谷等人跟着赵廷喜出发了。这时濛县城里的岸谷隆一郎已经从别的渠道接到了这个报告。他比西谷“敏感”，立即派出了五批敌人，去保安村“围剿”杨靖宇。

下午四时，西谷带的队伍在保安村以西、濛江县三道崴子七三高地附近发现了杨靖宇。杨靖宇饥寒交迫，伤病缠身，面对着突然出现的敌人，心里想些什么，后人是不难想象的。

伟大的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生命最后时刻的表现是被他的敌人记录下来的。在日伪档案里，他仍然“表现得很沉着，”一边用两支手枪准确地向围上来的敌人射击，遏止敌人的攻势，一边向后方的四九高地退却。杨靖宇此时也许仍想逃走，西谷却已认定他就是杨靖宇，决定不遗余力，将其活捉，立一大功。他命令部下散开向杨靖宇迫近，“不要开枪”。西谷这个立大功的想法让日本人更多地付了生命代价。

现在杨靖宇已经退到七三高地与四九高地之间的河谷里，与敌人相距不足三十米。这时西谷停住了，他不能再让杨靖宇往后退，再往后杨靖宇就可能退出山谷。西谷向杨靖宇大喊：“杨，你的命要紧，抵抗没用了，快投降吧！”最后关头的杨靖宇哑然一笑，明白日本人不会再让他往后退了。实际上他也没有气力了。他甚至都没有气力回敬日本人几句话。他手中只有枪，能用它们回答日本人。西谷喊了两句，杨靖宇就“叭”、“叭”回敬了他两枪，击中了正向前靠近的两个日本警察。西谷这时才明白“劝降”没有用的，于是这个日本人决定：消灭杨靖宇！

最后的攻击开始了。西谷将日本警察和唐振东大队的伪警察分为两路，从左右两翼向杨靖宇包抄过去。杨靖宇已无退路，就地应战。随着一声声枪响，冲在前头的敌人一个个倒在地下。敌人不敢再向前靠、便卧倒在地，一起向他猛烈射击。一发子弹击中了杨靖宇的左腕，手枪被击落。他忍住巨痛，用右手里的一支枪向敌人射击。接着，又有两发子弹接连击中了他的胸膛。杨靖宇身体朝前一扑，倒下了，一代抗日英豪就此壮烈殉国！

笔者写到处，有一种感觉一直挥之不去，直到牺牲的一刻，杨靖宇也还可能不相信自己会死！无论是失败和牺牲，对他来说都是突然的，而且是难以理解的！

杨靖宇生前死后都是让日本人异常敬畏的人物。他牺牲后好久，西谷等人才敢向他靠近。这时敌人再次犹豫起来，不能相信死者真是大名鼎鼎的杨靖宇。但程斌带着他的“挺进队”来了。他向西谷等人确认，此人正是杨靖宇。据事后伪《协和》杂志记者报道，听说他们真地杀死了杨靖宇，西谷等人“一点也没有感到快乐，”反而“呜呜地哭起来。”随后，敌人从村子里弄来一辆大车，将杨靖宇遗体拉回濛江。岸谷隆一郎让程斌等人再次验证，确信是杨靖宇无疑，才令人将其遗首割掉，装入一只长宽各二十五公分、高三十五公分、前面装有玻璃的木匣内，紧急送往伪通化省警务厅，然后送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岸谷实在不懂杨靖宇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些日子来究竟靠什么活着。他怀着敬畏之心，让人解剖了杨靖宇的尸体。敌人在英雄的

胃里见到的只有草根和棉絮。有资料说，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听完报告，“默然无语，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

杨靖宇的遗首在伪满首都新京受到了另一番“礼遇”。关东军司令部、伪满军政部将这位“中国战神”的遗首放入防腐液，保管在伪满军政部内。迷信“武士道”的日本人以为他们杀害了杨靖宇并控制了他的头颅，就能控制乃至完全消灭东北抗日联军。敌人甚至还生出一种很天真的想法，只要将杨靖宇战死的消息广泛宣传，让所有抗联部队得知，联军就会自动瓦解。为此，关东军将装有杨靖宇头颅的木匣拍照，制成传单，印刷了二十万份，在南满、吉东、北满和其它有抗日军活动的地区到处张贴。日寇不便去的深山密林，就用飞机空投。

对于熟悉杨靖宇英名和事迹的东北人民和抗联部队来说，他的被害同样是不可信的。被敌人重兵分割的一路军部队的许多干部战士很久之后也不相信总司令牺牲的消息。至于吉东的二路军和北满的三路军，直到1940年末，仍坚信敌人空投的传单是“造谣”。此时，金日成带一路军余部退入了苏联，与退入苏境的二路军、三路军领导人相会，他们才相信杨靖宇真的牺牲了！伟大的民族英雄杨靖宇，从他牺牲的那天起，就进入了不朽！

（朱秀海）

创建兵工厂，血战黄崖洞

蟠龙卧虎之地

抗日战争初期，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敌后抗日根据地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武器弹药的供应严重不足。

根据党中央决定和八路军总部命令，1939年3月在榆社韩家庄成立总部修械所，同时接收了武乡地方的一个铁工厂，改为总部柳沟铁工厂。工人虽有近百名，“机器”却是几台旧钻，几把火锤，加上那又笨又粗的土老虎钳。修修损坏了的刺刀、马刀还可以，要想制造枪支弹药，谈何容易。警卫分队的战士们开玩笑说，我们兵工厂的家当，还没有王二麻子剪刀铺齐全。

当时，榆社韩家庄一带常遭日本鬼子的“扫荡”，敌人企图捣毁我军就地取材办起来的简陋军工。总部修械所的工人们老是背起工具箱跟着部队打游击。为了让修械所尽快定点安全生产，八路军总部决定找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建立一个兵工厂。左权亲自四出勘察，选择厂址。他爬山越岭，多方比较，终于看中了黄崖洞这块能打能藏、易守难攻、蟠龙卧虎的军事要地。

左权将勘察情况向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汇报后，引起了两位首长的极大兴趣。他们毅然决定，立即成立工事委员会，大搞大办一场。朱老总自告奋勇兼任工事委员会的主任，说这样便于和友军及各师部队交涉，积极添置工厂设备，决心把黄崖洞建设成为攻不垮、打不烂的铜墙铁壁。并指定左权兼任工事委员会副主任，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几天后，左权邀了几位老乡，和朱、彭首长一起到黄崖洞实地考察定点。当首长们见到群山环抱，悬崖峭立，绿树丛生之中，竟有仙境似的山洞时，不禁啧啧称奇。

朱老总看到这么好的地形，高兴地问道：“这个洞可藏多少人？”

“少说三个连。”左权答道。

“厂房建在哪里，有多少面积？”朱总司令又问。

“我与军工部刘鼎部长商量过，工厂打算造十二栋房子，总建筑面积约六千平方米。建筑材料就地取材，有的是石块，最大的钳工房一千平方米，两层结构，楼下生产，楼上住人。”左权胸有成竹地汇报说。

“好是好，只是要快，越快越好。根据我们的条件，你看需要多少时间？”彭副总司令插话问。

左权想了想，答：“力争半年完成。”

“半年时间完成？这么大工程，运输材料的通道怎么解决？今后生产武器弹药的运输问题，考虑了没有？”彭副总司令又问。

“这些都向老乡请教过了。这里与外界有两个通道，一条沿西北出左会山口，可抵根据地的腹地武乡；另外南边还有一条道出南口……”左权详细谈了自己和刘鼎部长的初步设想。

“好！我看就这个地方，可以定了！”彭总听后满意他说。

“对，兵工厂就选在黄崖洞。组织特务团尽快上马！”

朱总司令拍板定音了。

厂址选好之后，左权异常兴奋。他拉上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又上了黄烟山，再次勘察地形。上得主峰，真是视野大开：这里与八路军总部驻地后边的桐峪山遥遥相望，互为呼应；山下河谷盆地，可以一览无余。左权对

欧团长说，警卫部队在这个山下设防驻守，北可钳击武乡东下“扫荡”之敌，南可截击潞城、黎城来犯总部之寇，还可以顺着山势走向，构成环形工事，保卫兵工厂。欧致富打心眼里感到，左权参谋长看中这块龙蟠虎踞的地方，总部首长决定在这里创建兵工厂，眼力确实胜人一筹。

艰苦创业

建厂初期，朱老总指示说：“现在大敌当前，作战紧急，枪弹是我们的命根子。这唯一的大型兵工厂，可以说是我们八路军的掌上明珠。厂子建得越快，部队的战士越能早日得到杀敌武器。”党中央和毛主席也十分重视这个兵工厂的建设，千里迢迢，从延安转运来几台崭新的机器。各部队听说总部要扩建兵工厂，作战缴获中凡属“机”字号的，都千方百计运来献给了工厂。

左权率领干部、战士、工人、民工一齐上阵。他不仅指挥工程建设，而且和大家一起攀崖越岭，抬土扛石，和泥拌灰，砌石奠基，样样活儿都干。休息的时候，左权经常和工人们促膝谈心，耐心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他还给工人和战士们介绍一些苏联革命刚刚成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苏联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利用旧铁制造武器弹药，运送给前方的红军，打败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和进攻的事迹，鼓舞大家的斗志。

厂房建在水腰岭下的一块小平地上。安装机器的那几天，左权差不多每天都到工地上指导工作。他对工人们说：“这些机器是我们兵工厂的宝贝，是我们军火工人的命根子。别看这些机器又老又破，但都是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还有两台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派人从延安送来的。大家掂掂分量，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机器上的每一个零件。”

可是机器刚刚安装好，加固厂房顶棚、修筑防洪设施都还没有顾得上，狂风暴雨就来了。一天晚上，乌云集聚在水腰山峰，天空黑得像个锅底。随着一阵狂风，雷鸣电闪，瓢泼大雨铺天盖地地下了起来。当工人们赶到厂房工地时，洪水已经漫开，大伙儿呼喊着，紧张地拆卸机器，搬运材料。左权带着一批总部人员急速冒雨赶来。他一到工地，就把袖子一挽，裤腿一卷，淌进了没膝深的水里，和工人们一起抢运机器，嘴里还不住地高喊：“人在厂房在，不能叫机器受损失！”

风越刮越大，雨越下越急，水位越涨越高。房顶上泥皮随着雨水大块大块地往下脱落。工房随时有可能倒塌。

“危险啊！左参谋长，快出去吧！”大家的心像被揪着一样，有的工人焦急地喊了起来。

“不要紧，快干！”左权头也不抬，沉着地指挥大家抢救一台大锅炉。在左权参谋长的带动下，所有在场的人勇气倍增，搬的搬，抬的抬，终于把所有的机器和材料都抢搬出来，运到了一块高一点的平地上。

经过一夜的奋战，风停了，雨住了，山洪也渐渐地退了。水腰山顶上的乌云裂开了缝。露出了青天。工人们劝左权参谋长去休息一下，他只是微笑他说了一声“不必了”，就又和几个工人师傅拿起铁锤、铆钉，到机器旁“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开始了新的战斗的一天。

在左权参谋长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厂房基本建成、机器安装停当

后，工人们又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全力攻关，紧张地试制步枪、掷弹筒、子弹、地雷、手榴弹等各种武器弹药。到今年冬天，大都已试制成功，开始生产。

有一回，左权听部队反映，兵工厂生产的木柄手榴弹，从山上往下扔，没等落地在半空就爆炸，无法炸着敌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骑马来到兵工厂，找负责人石成玉等同志商量，要求把木柄手榴弹改进成麻尾弹。他还在地上比比画画一阵子，最后嘱咐：“你们要和工人多商量，再大的困难，只要依靠工人、发动群众，就能解决。”

左权走后，工厂马上发动工人设计、画图、试验，抓紧改制。在试制过程中，一个一个难点都被突破了，可就是有一道工序，白生铁套不住丝口，卡了壳。大家没日没夜，不知试验了多少回，钻一钻，不行；鏊一鏊，也不行。半个月过去了，任务还没有完成，大家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左权再次来到兵工厂，见了石成玉的面就问：“麻尾弹做成了没有？”“掏不动丝口，还没有完成任务。”石成玉如实汇报了情况。左权皱了皱眉头，说：“不完成不行，这样大的一个工厂，有这么多的工人同志，召开职工大会，动员大家想想办法，集思广益，一定要攻克难关。”

当天下午，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左权亲自做了进一步动员：“战士们反映，木柄手榴弹没有赶到敌人跟前就爆炸了。我们要改制成麻尾弹，它的优点一是投掷得远，二是什么时候着地什么时候开花。前方等着急用，我们一定要研究制出麻尾弹来。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大家动动脑筋，群策群力，我相信，工人们一定能战胜困难。”

会后，工人们奋战了七昼夜，用给白生铁里头灌上一层铜的办法，套住了丝口，终于突破了难关。麻尾弹试制成功的消息，报告给左参谋长后，他兴奋地说：“工人阶级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经过半年的艰苦创业，黄崖洞兵工厂已建设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规模最大的军火生产工厂。有工人700多名，月生产新式步枪400多支，掷弹筒200多个，还有其它步枪、刺刀、子弹、地雷等武器弹药。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首长视察

有一天，左权从兵工厂带回一支试制步枪的样品给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看看，鉴定一下。朱、彭首长接过自己工厂制造的步枪，时而摸摸拍拍，时而端枪瞄准，心里十分高兴。左权介绍说，这种枪工厂试打了几次，质量不次于汉阳造的。朱、彭表示，要到工厂去看看，鼓励鼓励。

很快，朱总司令来到黄崖洞兵工厂视察。他看到工人们生产的一支支新式步枪，笑嘻嘻地合不拢嘴。他兴致勃勃地给装枪的钳工工长韩忠武、机工长齐宣威亲笔写下了“生产英雄”的题词。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朱总司令祝贺工厂取得的成功，并给大家讲形势、鼓干劲，号召工人们加倍努力，多造枪弹，支援前线。会后，他又和工人们亲切交谈，一起在食堂就餐。离别时，朱老总还指示工厂领导要对“不习惯山区寒冷气候的新职工多加照顾”，“培养一个技术人才太不容易了，宁可舍掉一点物资材料，也要保证每个技术工人的安全”，“工人同志不能同前方战士比，应该设法给他们增加一套工作服”。

几天后，彭老总也来到了兵工厂。在视察生产步枪、掷弹筒的车间时，左权简略地介绍了情况。彭老总问：“朱老总交待了，明年（指1940年）的产品，要准备装备二十个团，咬咬牙能完成

不？”

左权是个什么事都很认真，决不夸口的人。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在心里盘算了一阵，才答道：“二十个团有困难，十五六个团是完全有把握的。主要是新工人多，技术力量少，硬赶的话，质量上就难以保证了。”

“行呀！要保证质量，每年平地腾起一两万只猛虎，也够鬼子受的了。”彭老总对这个数已经感到相当满意。他担心的倒是工厂的安全保障问题，又问：“敌人要是来个万把人‘扫荡’，能顶多久？机器来不来得及转移？守备部队还有没有力量反击？”

左权对此胸有成竹，对答如流。他说，工厂外围各个口，都构置了两层防线、三道雷区，我们不让一让路，敌人五天以内是攻不到厂区的。厂区内，挖有秘密坑道，实在吃紧的时候，机器可以撤进洞里，再从上边通道搬到山上分散掩藏。工厂区又可以变成大雷区，主峰下面部署了三层火力，可以控制整个厂区。

彭老总听了介绍，频频点头称赞。

视察了兵工厂以后，一行人沿着盘山小路出了黄崖洞，走上刚落得脚的新栈道，来到一面大断崖边。一条瀑布挂崖而下，把山口冲出了一条大断沟，不能过人。兵工厂建进黄崖洞后，在这条断沟上装了一座吊桥。平时放下吊桥，行人才能进入山口；战时，升起吊桥，千军难入。为了防御需要，沟底隆起的巨石已经被一一炸掉，修筑成一个个陷阱。断沟两壁又加工削成近九十度直口。这个口子，俗名叫瓮屹廊，军事上叫南口，不管从那个角度观察，这里都气势非凡。两边陡壁拔地而起，从涧地仰视，只见一线青天。南口左侧，经一条十米左右宽的高山山脊，可到达制高点桃花寨。“两边削壁入云端，仰头高望一线天”，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然险要隘口。左权向彭老总介绍说，这是黄崖洞东南面唯一的出口，赤峪村右边和总部兵工部驻地南北庄后面，山势笔陡，根本无法上人。

彭老总仔细观察了半天，看见口子上只挖有一点野战工事，心里不太满意，就冲着随行的欧致富团长说：“欧致富，你准备在这里怎么布兵？你就不怕敌人重兵从这里突破？”

欧团长明白彭老总指的是工事太简陋，便解释说，这里要等第二期工程才能搞。彭老总不容解释地说：“抽一个营来，赶快搞。山口两边要修上地堡，要立足于敌人马上来攻你，把这里造成他们的坟墓！”

根据彭老总的指示，左权参谋长立即下了决心，马上抽调特务团一营和总部炮兵团的三个连，加速构筑永久性工事。

苦心经营

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增援施工的部队还没有开进山，左权已经忙得连轴转了。他冒着严寒，顶着风雪，每天在黄崖洞、水腰山周围的山顶上爬起来，一个防区一个防区地勘察地形、配备火力、制图作业。一连几天，他把整个黄烟山，上上下下，沟沟岭岭，南北东西，又实地勘察了一遍。就连警卫员都埋怨说，参谋长一天只啃几个冻馒头，喝半壶冷开水，没吃过一顿

热饭，胃怎么受得了呢！

欧致富团长见左参谋长这么忙，实在过意不去，曾建议他，多带上几个参谋和警卫部队一起分片勘察，分片制图标图，然后再由他来综合。可左参谋长笑了笑说：“谁让我当参谋长了，当参谋长的对一个战区心中没有个立体总图，指挥作战起来要误事的呀！再说，我不先拿出个草图，下一步修改，你们怎么好提出意见来呢？”

果然，开了春，左权带上总部的参谋人员和特务团的军事干部、作战参谋及施工营营长，上黄烟山落实防区了。每到一处，他都展出亲自制作的示意图，逐处说明自己的设想，反复征求大家的意见。

两大山口的防御实施，在左权制作的图上，标得非常细致、具体：根据地形，哪里应构置暗堡，哪里是明堡、暗道、交通壕相结合，哪里能利用天然洞加以改造，哪里可以设投弹所，各点的火力如何配置，以形成交叉、直射、侧射、斜射、仰射、俯射等强大的火力网，并配以地雷组和地雷区。就连各个射击视线前有什么障碍物，图上也标得一清二楚。

对于左参谋长亲自勘察，亲自设计的整个防御工事体系和如此精细的制图，大家一时都提不出什么意见。左权便说：“大家回去再推敲推敲，就是施工中发现有不切合实际的地方，也可以随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他对欧致富团长说，根据防区的划分，预备队现在就可以拉出来演练，多拉几次没有坏处。工事修好了，全团再来个大演习，各级指挥员的位置，部队的支援路线、转移路线、防区范围都要记得清清楚楚，战士们对工事编号、战斗位置也要熟记。这样，不论什么时候打起来，都不会乱套。施工过程中，施工部队的衣、食、住成了大问题。在这里，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也包含着一些“地弊”。一是地脊，加上连年大旱、鬼子的“三光政策”，老百姓生活很苦，部队筹粮十分困难；二是地潮，山高场深，洞里窑里湿度很大，衣服易烂，人易得病。施工连队任务重、劳动强度大，能抽出去筹粮的人不多，“大肚汉”增加不少，不出几天就吃“过头粮”，有时断了炊。战士们喝野菜汤，怎么能顶得住，抬东西上山，腿肚子直打颤。开始，团营领导瞒着左参谋长，自己想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多派些人出去找粮食，发动执勤和机动连队支援，调剂和帮助筹粮等。

不几天，左权参谋长来到黄崖洞，和战士们一起干上一阵活，情况就完全了解了。他把欧致富团长找来，核对了一下情况，首先表扬了他们团领导解决施工连队口粮的办法。接着，以责备的口吻说：“不该这样对我封锁消息，战士们光着脚丫抬东西，吃着野菜埋头施工，谁见了不心痛！再怎么讲，现在总不像我们长征过草地的时候，那时谁倒下了扶也扶不起来。现在还是要做好保障工作，不能因为这点困难就让战士倒下。”

最后，商量了几条措施：夏粮下来后，自己种的一百多亩地的粮食、蔬菜，给施工部队多分一些；战士住地每孔窑洞里，烧一盘炭火，搁上几担石灰，驱驱湿气；跟后勤联系，多拨一点旧衣服，每人多发一双鞋子、一条毛巾给施工连队的战士。左权一再叮嘱欧团长，要尽快落实。

没过多久，欧致富来报告说，前两条措施已经落实，没有问题。只是第三条，和后勤供给部门去联系，碰了钉子。他们答复：一是“违章”；二是没有库存。作战部队更费衣服，人家都没叫唤。言下之意，施工部队不能特殊。

左权听后想了想，说：“好，第三条措施，我来想办法。”他并没有直

接给后勤供给部门下命令要这要那，而是很策略地打了一个迂回战。

这一天，左权参谋长邀请总部机关有关部门人员到黄崖洞参加劳动，熟悉防区，了解战备物资的供应和贮存情况。到了工地，左权没有指指点点，而是挽起袖子就干，扛石头、挑土灰、抬钢轨、凿崖石，什么重活都试巴试巴。他不时地对同去的机关人员说：“看看我们的施工战士，吃的啥，穿的啥，干的是什，应该满足他们最低的生活要求吧。”不用多说，干了一阵子，机关的同志和施工战士的衣服已经完全两样了：机关干部穿的虽然补丁不少，总算还耐得住磨蹭；可施工战士们干一阵子后，衣服就五花八门，掉了袖的，开了肩的，绽了膝的，撕了襟的，简直不能穿

休息时，左权参谋长抓着一营营长，问道：“魏传连，你这个营长不带个头，把自己的衣服补好一点，补牢一点！”魏营长拍着自己的开肩，说了实话：“参谋长，不瞒你说，这还是今天一早才补的。补的布片，比穿的衣服还霉，一蹭就破了！”

营长一说话，战士们话匣子也打开了。这个说他的袖子老当“逃兵”，那个说他的膝盖爱“喘气”，还有个淘气的战士，从脖子抹下毛巾，轻轻一拧，拧下了一角，大声吆喝起来：“大家看看，我这是变魔术，‘毛巾变面疙瘩’！”左权看了，也忍不住大笑起来。倒是后勤来的同志怎么也笑不出声。

左权参谋长趁机告诉大家说，后勤的同志也在这里，大家有什么特殊困难自己不好解决的，就说一说吧。

魏营长明白了左参谋长的意思，不能什么意见都提，只能抓住重点，讲一讲特殊困难。他说，肚子问题、居住条件的改善，我们自己正在解决。只是前一段没有注意洞里潮湿问题，衣服霉的太多，加上大强度劳动，特别费衣服、费鞋子，这些东西自己没法做，解决不了。

后勤的同志原以为施工部队的战士们会叫苦连天，一听就提了这么点要求，也很受感动。后勤部门的领导当场拍板决定：施工部队每人增发一套衣服、一双鞋子、一条毛巾。

欧致富团长一听，笑了。他对左权说：“还是参谋长有办法，难题这么容易就解决了。”

开饭的时候，各连都是清一色的半菜半粮。欧团长问魏营长：“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故意吃给首长们看的？”魏营长狡黠地笑着回答：“那敢呀！机关和兄弟营连也是勒紧裤带支援我们，战士们过意不去，都说净吃小米干饭对不起兄弟连队，要求细粮粗吃。左参谋长来吃过几餐，也说这样好吃，能节约粮食。”一个炊事员还悄悄地告诉欧团长：“左参谋长可爱吃山韭菜了，每次上山他拣回一把山韭菜，叫我们用大锅煮，不准多搁油。”欧团长抬头环视，发现左参谋长正混在战士中间，端着个搪瓷碗，边吃边和战士们交谈着。有的战士特意把山韭菜夹到他碗里，他也不拒绝，还连说：“好吃，确实好吃！”

施工部队的吃、穿、住问题基本解决后，大家劲头倍增，经常挑灯夜战。入夜，一条条火龙从山上一路摆到山下两里路外的河沟边；几百担水桶，在火龙下颤悠着、穿梭着；十几处的土炉上窜起了通红的火苗，战士们把刚从正太路、平汉路上扒来的铁轨，架在炉上烧红压弯，用来做工事顶盖的支架。

到1940年9月，黄崖洞兵工厂的建设完全走上了正轨，生产出来的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到各作战部队指战员手里。整个黄崖洞的设防工事建设

同时竣工，加修了三百多处石碉和战壕，构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守备部队也反复演练，严阵以待，单等鬼子来碰壁了。

初试锋芒

1940年10月，百团大战进入了反“扫荡”阶段，战事正酣。前一阶段破袭战全面展开，敌人尝到了八路军的厉害，也吃够了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的苦头。所以，敌人一下子出动了号称十万人的“扫荡”部队，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机关和黄崖洞兵工厂。

当时，总部特务团除了留一两个连队警卫总部外，其他连队都已跳到外线，配合一二九师主力和决死纵队聚歼各处孤立之敌。担任兵工厂的警卫部队不足一个排。从武乡据点出动的两千多敌人，探知我兵工厂守军不多，便气势汹汹地扑来，想直取兵工厂西北边的左会大山口。

左权参谋长得知敌人这一动向后，立即命令兵工厂马上转移、掩埋机器、工具和材料，大部分工人迅速撤到高山顶，留下工人自卫队突击班和警卫分队与敌人周旋，守住山口。他考虑到工人自卫队不善初战，还特地赶到厂区进行检查动员。他说：“黄崖洞的每块石头都是武器，崩下去半壁山峭，不砸扁敌人的脑袋才怪呢！还是彭老总的那句话：‘敌人不拿路条，休想进山来’！”他看到工人自卫队和警卫分队的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人人斗志昂扬，纷纷表示要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誓死保卫兵工厂，心里踏实多了。

接着，左参谋长又具体检查了战前准备：工人自卫队已在各处安好了“机关”，两边的山头上、崖顶上，架起了机枪；部队送来检修的迫击炮已经修好派上了用场；步枪手都试了靶，测好了距离。他指导地雷班的工人，沿山边埋了几组大拉雷，压上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头，敌人一触即发，来个“天女散花”。

欧致富团长担心工人自卫队吃不住敌人的“扫荡”，电话请示左参谋长，让特务团派部队支援黄崖洞。左权在电话里信心百倍地对他说：“让工人们练练胆，大山口没那么容易突破。再说，突破了也找不到东西，到时候你们再来关门打狗吧！”

一天下午，敌人终于逼近了大山口。工人自卫队的同志从干部到战士，都是第一次参加实战。队伍中，有胆大手痒的，有心虚怯战的，有要求出击的，也有主张打一下就转上山去的。大家众说纷坛，把原来统一的战斗信号给争乱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刚在山口露头，按原来预想的打法应该是先放过先头敌人，然后拦尾打腰，但拉雷小组的同志一见敌人来了，就急不可待，激动间拉响了一个雷。顿时，大小石头抛上天，又甩下崖，飞向敌人头顶。敌人的先头部队搞得晕头转向，嗷嗷大叫，抱头直往回跑。

地雷一响，满山都热闹起来。持枪的放枪，操炮的打炮，地雷“轰隆、轰隆”地开了花。机枪手也沉不住气了，一个劲地往敌群里扫射。就连已经撤到山顶上的工人们，也都“热烈配合”。漫山放起枪来。枪声四起，雷声大作，石块、子弹、碎土到处飞扬。这声势酷似山上伏有千军万马，不可匹敌。打出去的几发炮弹，正好落在敌人的人堆里爆炸；几挺机枪，也在有效射程里咬倒了一些敌人。于是，敌人指挥官以为这里有骁勇善战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守卫，不敢造次。他拿着指挥刀比划了半天，这股敌人便夹着尾巴调头逃跑了。

初战告捷，工人自卫队和警卫分队无一伤亡，工厂也没有损失。七百多工人，挡住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证明了经营一年多的工厂防御体系经得起战争考验。为此，总部军工部在报纸上，特地表彰了工人自卫队的战斗精神。

左权参谋长了解了整个战斗过程后，丝毫没有责备工人们初战的“失常”，却对工人自卫队大加赞扬地说：“试枪试炮试炸地雷，就吓退了鬼子几千兵，这是个不小的胜利！”

迎敌准备

1941年秋季，敌寇以重兵层层梯进，层层梳篦，欲置我军于死地。10月，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倾巢出动，加上第四、第六混成旅，纠集了一万多人，分兵数路，浩浩荡荡，企图一举合击总部领导机关，进而摧毁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彭老总和左参谋长判明敌人意图后，当即通报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瞄准弱点，待机破敌。他们还命令总部特务团派出大部兵力，出山迎敌。彭老总对欧致富团长交待任务时说，你们的任务就是不让敌人进攻势头的高峰推到总部和兵工厂的门口，是挫敌而不是歼敌，要留足后劲。左参谋长说得更明确，敌人的交通线常闹“肠梗阻”，我们就给它来个“翻肠洗肚”，迫敌不能完成战略包围，包围了也迫使它没有进攻的力量。

特务团主力立即出山迎敌，在温村凭借有利地形，一阵快打，消灭敌人先头部队一百多。兄弟部队第三八五旅从左翼拦腰打来，敌人被迫改道它窜。第三天特务团又配合兄弟部队在五十亩、源泉村一带的山口设伏歼敌，激战竟日，击毙敌大队长以下近百人。

11月7日深夜，敌情有了变化，退至黎城等地的日军五千余人，妄图奔袭黄崖洞、水腰山区，破坏我总部兵工厂。彭老总直接和欧团长要通了电话：“欧致富，你听着：特务团所有预备队立即撤进黄崖洞，黄崖洞的守备部队天亮前全部进入阵地。有困难也不许讨价还价！”这是几年来少有的事，说明情况异常严重。欧团长刚把命令传达布置下去，彭老总又亲自来了电话追问：“第一号命令下达完了吗？”欧团长回答后他才缓了口气说：“对手是坂垣师团的精锐旅，平型关吃了败仗后改头换面的。人家老想进黄崖洞拣点破烂，就让他进去看看。你说实话，能顶多少天吧？”

“首长让我们顶多久就能顶多久！”欧致富一时猜不透首长的意图，表决心似地回答说。

“你什么时候学会踢足球，把球踢回来了？”彭老总笑着说，“好吧，具体的听左参谋长部署！”

“五天怎么样？”左权接过彭老总的话筒，征求欧团长的意见。

“只要战局需要，十天半个月，一个月都能顶住！”

左参谋长说：“那倒不必了。兄弟部队也要摊点嘛，你们团就以五天为限。五天以后再另作部署。”接着，他解释了彭老总的意图：既然敌人老找黄崖洞的麻烦，外围部队准备干脆让一条路给敌人进来，然后在黄崖洞防区吃上一顿“老虎食”，把敌人精锐旅消灭其大部，从中提高部队防御作战能力，检验一下经营多年的防御工事工程设施。

左参谋长又指示了具体战法，说：这叫“咬牛筋”，即把敌人咬住拖住

以后，猛中求稳，不焦不躁，不惶不恐，不紧不慢，以守为攻，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时间上，在山口处顶住两天，刹刹敌人的势头；在二道防线再顶它两天，然后上高山，我增援部队赶到再来一个反包围。

整个黄崖洞保卫战，由彭德怀副司令员直接部署，左权参谋长具体实施指挥。左权参谋长此时心里是有底的：武器弹药，装备的和储备的就是打一两个月也足够；粮食、蔬菜、炒米、生面、熟饼，加上过去缴获舍不得吃的压缩饼干，还有干菜、腌菜、窖藏菜，也够吃上十天半个月；特务团老兵成份多，战斗经验丰富，经过几次实地演练，地形熟悉，出击撤退路线和打法，人人都能掌握。

第二天，下着小雪。侦察员报告，群众刚刚撤离不到两小时，敌人先头部队已经进占了南口外的上下赤峪村。不过敌人并没有猝然进攻，而是在赤峪一带紧张地部署兵力，桃花寨、南北庄、赵姑村方向的敌人也在频繁调动。

左权抄小路上山，来到特务团指挥所。欧致富团长汇报了部队临战前的各项准备情况和对当前敌情的分析，说：“敌人的主攻方向在南口，不在左会，这次敌人要‘驻剿’，而不是过去‘抓一把就走’的‘飞行扫荡’。这场战斗将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恶战！”

左参谋长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既然来敌是号称‘钢铁大队’的坂垣师团精锐部队，决不能掉以轻心。这一仗，敌众我寡，敌明我暗，必须以静制动，‘稳’字当先。”他又风趣地说：“欢迎敌人来碰碰这颗硬钉子，但也要警惕敌人声东击西，西口一营不要轻易使用。根据战略侦察，敌人配属有十一门重炮，又调来了几架飞机，要通知部队，避过敌人的炮火准备，暗火力点不要过早暴露。”

最后，左参谋长又特别叮嘱：再检查一遍，把工厂没有转移埋好的物资，没有转移撤退的人员，迅速转移到指定位置。一切布置妥当，左权才放心地返回总部指挥所。

欧致富团长立即把左参谋长的指示通报各营，并要求一线连队，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

首战告捷

11日拂晓，敌人炮击南口通路。重炮、山炮、迫击炮一齐开火，妄想用炮弹“扫雷”。设雷组的战士就与敌人炮弹“打游击”，全面炮击后，又突击埋雷，专等敌人步兵。敌人步兵发起攻击时，进攻队形前面，狡诈的日寇驱赶着一百多只羊，想赶羊“趟雷”开路。那知这一路埋的是大踏雷，人踏马踩才响，羊群蹄脚轻小，除偶尔的响个把拌雷外，雷区安然无事。

敌人似乎放了心。三百多名步兵紧跟着羊群后头，端着枪向

山垭拥来。步兵后边一百多名骑兵也挥刀翻身上马，准备一举突进垭口。到了口子前，敌人步兵马上一路变两路，两路变四路，企图分头夺取各个目标。

突然，成千上万个滚雷从天而降，我前沿各机枪阵地也猛烈开火。敌阵顿时乱成一片：躲过头顶滚雷，脚底又踩上踏雷，工兵要起地雷，垭口两侧地堡里机枪又扫过来，马惊着竖起腿，人懵得趴在地。敌人要攻无方向，要退又无路，只好窝着一堆挨打。敌指挥官慌忙下令撤退，骑兵下马赶马趟雷逃命，步兵则一步两挪，慢慢地爬出了雷区。

左权在指挥部里沉着地指挥战斗，时而在地图前沉思一阵，时而去向彭老总报告情况研究问题，时而给其他部队发电报，时而又给特务团打电话。当特务团报告，敌人第一次冲锋被打退，横七竖八地丢下了两百多具尸体，部队无一伤亡时，他连说：“打得好！打得漂亮！”随即赶去向彭老总报告了喜讯。

一小时后，敌人又开始炮击。他们吃了滚雷的苦头，这次炮击，便集中轰击我山口两边阵地，妄图削弱我“天女散花”的威力。有两门山炮，竟斗胆在离垭口两千多米处抵近射击。炮火未停，歪把子机枪就响起，压住我前沿阵地。步兵开始了第二次冲锋。

团长欧致富在观察所里见那两门山炮太欺负人，就通知炮兵排，准备干掉敌人那两门山炮。当时，全团只有两门炮、十二发炮弹，打一发都需经总部批准。欧团长打电话请示总部，没想到，左参谋长回答得非常干脆：“十二发都打完，三四发打敌炮阵地，其余的打敌人集团目标。”

命令刚下，两发炮弹像长了眼睛似地飞向敌人山炮阵地，一下子连人带炮给掀翻了。炮排战士瞄了好半天，这下才出了气，剩下的十发炮弹，也准确地落到敌群里，炸倒了好几十人。

阵地突出部陡崖上投弹所里的战士，往下猛砸手榴弹，高兴了还端起枪来打几个活靶。左翼山头上前沿阵地的七八个投弹手，拧开弹盖就照敌人头顶撒。号称大钢板的枪手，见有顺坡一溜爬上来的敌人，便一口气搂完一梭子四十八发子弹，串鱼般地一连穿过二十几个敌人的胸膛。经过指战员们英勇无比的一阵猛打，这边崖下的敌人便丧失了战斗力。

冲到断桥前的敌人，一见吊桥已撤，桥下是深沟，退不甘心，进也无路，想爬崖过沟，又无处下脚。愣过一阵，一部分敌人竟想贴着右边悬崖过去，另一部分人选个浅处跳到了沟底。守卫在断崖顶上和断桥头工事里的八连指战员，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等最后一个敌人下到沟底，连长一声喊“打”，整条沟就闹开了地震：铁蛋飞滚，炸声如雷，步枪、机枪、地雷、手榴弹，响成一团。成百的敌人，死的、活的、伤的全都“一锅煮”。被炸伤了敌指挥官，还想孤注一掷，强令没死的和轻伤的士兵，拖着尸体搭起“尸梯”。战士们干脆滚下几颗大地雷，报销了断桥下边的全部敌人。

至此，敌人的第二次攻击被彻底打垮了。

经过两次激烈反击，我前沿地上的火力点已基本暴露。敌人步兵进攻失利后改变了打法，利用后续部队拖上山来的大炮，进行强大的炮火报复。然而，由于左权参谋长组织构筑的黄崖洞防御工事，结构非常巧妙，平射炮不用说不好打，就是曲射炮对它也基本不起作用。虽然敌人连连炮击，我军阵地仍然岿然不动，稳如泰山。

指挥若定

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炮兵开始向我军阵地施放毒气弹。

欧团长和三营长钟玉山正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突然周围落下七八发炮弹，有一发掉在七八米远的地方。一团黄烟顺风卷来，一股怪味直呛鼻子。“毒气！”欧团长马上命令钟营长：“通知前沿各连队，立即戴上防毒面具，没有的用湿毛巾捂住鼻子……”话没说完，便一阵昏眩，不省人事了。

钟营长中毒较轻，他一直戴着防毒面具指挥反击敌人的冲锋。好在毒气

弹先打到这里，防毒措施通知得快，全团才十几个人中毒，不碍事。左权参谋长得知后，立即电话指示：“马上抢救中毒人员，坚守勿出，待机歼敌”；并命令团部组织一个连队，以侧击火力支援南口阵地。过了一阵，欧团长苏醒过来，左参谋长的电话又来询问：“欧致富同志，能坚持不能？”

“首长，没关系，能坚持！”

“要是实在不行……”

“根本没有实在不行的说法，”欧致富害怕被送到后方医院去，急忙争辩：“说实在，冲锋不行，指挥行。我只感觉腿有些发软。”

一句话把左权说笑了。他又安慰了几句，并提醒说：“天快黑了，敌人会报复一阵子，好掩护他们的殡仪队收尸。”

果然，左权参谋长判断非常准确。下午五时许，敌人又闹腾起来了：各种火炮、机枪一个劲地往前沿阵地打来，大群大群的敌人借着火力掩护，拼命地向南口山垭冲来。每人手上揣着几条套马绳，见着尸体就猛甩绳圈来钩，钩住腿拖腿，钩住头拖头，转身低头弯腰就往回跑。有没死的重伤兵，也被这样子拖走。

前沿陡崖阵地上的八路军指战员，看清了敌人的意图，干脆给它凑一份热闹，冒着敌人炮火的袭击，将滚雷、手榴弹都推下崖去，把前来拖尸的敌人又炸翻了几十个。剩下的敌人连头也不敢回，不管拖的是死是活，拽起绳子就拼命逃跑了。

自从战斗打响之后，彭老总和左权参谋长就牢牢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左参谋长昼夜守在指挥部里，根据各方面来的电报、电话，分析、研究，作出判断、下达指示。他通过电话，与黄崖洞特务团保持联系，从容地指挥战斗。早在组织构筑三百多个石碉工事时，左权就坚持亲自实地勘察，并逐个工事编了序号，这会儿都用上了。敌人到了几号工事前，那个地方来了多少敌人，他在指挥的地图上标好，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

深夜，左权参谋长给欧团长打电话，询问了战斗情况和部队的伤亡人数后，说：“前沿阵地的几个连队打得勇猛顽强，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要好好表扬他们。希望他们在战斗间隙不断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敌人一再遭到八路军沉重打击之后，不断改变战术，翻新花样，明的不行来暗的，正面攻不下改攻侧面，企图从赤峪东边的悬崖，选择最峻险的地方作突破口。当特务团向总部报告了这一情况后，左权参谋长指示：充分准备，待机行动，以变应变。

以变应变

敌人从最难最险的地方下手，主要是想“借路”，攻进水腰洞区。弄清敌人企图后，左参谋长马上同意了欧团长的建议，大胆地给敌人让出一条路，守备部队都撤到山上，在“一线天”沟底布雷，然后两边火力夹击，把敌人消灭在沟底。

我军的战术一改变，马上奏效。敌人打了整整一个上午，零零星星被消灭好几十，才推进二百多米。但是下到沟里的敌人很快又被打懵了。几百米长的沟，宽度仅有十来米，两边尽是五六 十米高的峭壁。左侧高地上的部队猛打迎头来的敌人，山口右侧崖上的战士专打敌人的屁股，两翼火力挨个点杀了敌人的名。整整一个下午，突进到沟下的两百多个敌人，憋在沟里抱头

鼠窜，还未接近我核心工事，就已悉数被歼了。

紧张的战斗进行到第五天，彭老总指示：敌人无非想“参观”一下兵工厂，机器撤完了，就让他们“爬”进去参观好了。左权参谋长在电话里问：“欧致富同志，五天时间已经到了，还能坚持吗？”

“能！参谋长，还能坚持五天！”

“我知道你这个欧致富，不但能守一个五天，两个五天，甚至三个五天。”左权高兴地说：“可是，现在不必了。我们的外援部队即将赶到，你们把敌人再拴它个三四天就足够了。你们一定要以静制动，晚上把所有部队撤到第二线。既要诱敌深入，又要顽强防守。”接着他又鼓励说：“你们打得很顽强！告诉指战员，要再接再厉，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扩大战果！”

天一黑，欧致富团长按照总部指示调整了部队的部署。让敌一步，战局更活了。清晨，几百名敌人急于占领工厂区，向山口纵深攻击前进。部队遵照总部掌握“稳”字的要求，战斗在有节奏地进行，紧一阵又松一阵，狠一阵又慢一阵。进了山口的敌人，受到几面火力的打击，防不胜防。前面的沟比南口的更窄，埋设的地雷，起不胜起。付出伤亡代价突进工厂区的小股敌人，更像是进了坟墓。这里，厂房拆了，机器搬了，就连边角料也全被掩埋了。随时随地都会遇到诡雷、拌雷、踏雷和钩紧了弹弦的“吊雷”，吓得敌人不敢恋战，更顾不上找机器了。

晚上，左权参谋长又打电话询问部队伤亡情况，得知伤亡总数不足二百人时，大加赞扬说：“好！你们已经打垮了敌人一个团，使其丧失了战斗力。前天开始，敌人又换了一个团进攻，再咬一咬‘牛筋’，这个团也会抽筋断骨了。”同时，他告诉欧团长：“敌人电台正在大吹大擂，说捣毁了我兵工厂，欧团被歼近千人。根据这个动向，敌人可能要挖几部机器作证据，也可能攻一下左会山口的阵地，以显示他们的‘胜利’。”最后左参谋长指示说：“兄弟部队已经进入埋伏区，你们要积极行动，进一步扩大战果。”

特务团根据总部的指示决定，坚守北山高地的二营，保持与敌接触，不骄不躁，不紧不慢地磨；守卫水腰洞区的三营，继续阻挠敌人搜找机器，零打碎敲敌人；一营是团的预备队，要留足力量准备反击。

这样一来，战场上虽然听不到激烈的枪炮声，但是歼敌的数字并不少。仅在工厂区周围磨蹭，就把陆续进来的二百多敌人磨得只剩下几十人。想从驴驮岩突进左会山口的敌人，也被三处高地的几个连队采用猎熊三角形的打法，打得团团转，攻不动，退不回。

只有桃花寨东侧阵地相继被敌侵占。面对敌之冲锋，四连一排排长赵政林等十二名勇士坚守桃花寨阵地，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危急情况下，仍以压倒一切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团结一致，不怕牺牲，奋勇杀敌，连续击退日寇多次冲锋。敌人伤亡较大，进退两难。勇士们在这个孤立点上，饿了啃雪团，渴了喝自己的小便，硬是战胜了恶劣环境，战胜了敌人，最后与反击部队胜利汇合，表现了八路军指战员临危不惧，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气概。

战果辉煌

11月18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部队赶到。左权参谋长打电话告诉：敌人已发现山外有重兵伏击，可能要逃，命令部队不断夜战，迅速收复阵地。总部特务团和兄弟部队紧密配合，给敌以重大杀伤，最后把

敌人撵出黄崖洞。至 19 日拂晓，特务团全部收复所有守备区。遵照总部命令，出山追击。可是追了十多里路，连个敌人的影子也不见，沿途转移的老乡们已纷纷下山回村。一位村干部主动找到欧致富团长，报喜说：不用追了，前面一二九师部队已干掉敌人五百多，我们正在组织拾战利品呢！黄崖洞保卫战，历经艰险，浴血奋战八昼夜，终于胜利结束。

在左权参谋长的组织指挥下，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以不及一千五百人的团队，抗击了五千多敌人的进攻，把近千名敌寇击毙在黄崖洞区。我军牺牲负伤共 166 人，敌我伤亡比例六比一，战绩辉煌，创造了抗战史上空前未有的记录。此役，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出色完成了掩护兵工厂安全转移的任务。

八路军总部通报表扬特务团打得英勇顽强，彭德怀副总司令代表总部亲自授予欧团“保卫水腰立战功”锦旗一面。总部授予特务团以“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光荣称号；八连连长彭致海等十二人被誉为“黄崖洞十二勇士”；守如泰山的四连一排、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李吕标、英雄司号员崔振芳、模范班长张进杰等多人受到总部的通令嘉奖。

战斗结束后，左权参谋长来到特务团驻地苏峪沟，热情祝贺和亲切慰问指战员们，并对这次黄崖洞保卫战作了总结。他高兴他说：这次黄崖洞保卫战打了八天八夜，仗打得很好，你们为人民立了大功。这次战斗的胜利，意义是多方面的：一、保住了兵工厂人员、机器，安全无损；二、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三、锻炼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四、振奋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志，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五、为我军依托阵地坚守防御、大量歼灭敌人，创造了范例，积累了阵地防御作战的经验。

（姚仁隽）

穿林海跨雪原，方强率部剿顽匪

奔赴合江

1945年秋天，陕北大地一片金黄，塞外的秋日稍有几许寒意。但是抗战胜利的喜讯，却在每一个战士的心中燃起了一团火。

革命圣地延安，每天都有一批批干部、战士，奔赴新的战斗岗位，去接受日伪军投降，开辟新的根据地。他们像一粒粒红色种子，撒向祖国大地，生根、开花。这时，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派方强到东北工作。

11月上旬，方强到达承德。在这里同先期到达的洛甫（张闻天）、高岗会面，然后一起乘火车到达沈阳。停留中，东北局书记彭真向他们详尽地介绍了当时东北的局势和任务，要求他们尽快赶到北满，开辟工作，建立根据地。

当方强同高岗、洛甫赶到哈尔滨时，中共中央的命令已经到达，高岗为北满军区司令员，洛甫为合江省委书记。北满分局任命方强为合江军区司令员。

合江省西临牡丹江，北靠松花江，东依乌苏里江，是东北的战略后方。当时，这里盘踞着四大土匪：

匪首谢文东，满族，正白旗。1887年出生于辽宁省宽甸县水甸镇碾子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此人五短身材，臃肿肥胖，性情粗野，胆大过人。青年时倒卖牲畜，从中渔利。民国十六年，鸭绿江水出槽，淹没了很多农田村庄，谢文东举家迁往依兰县东大荒土龙山，开荒致富，逐渐成为地主。“九·一八”事变后，他反抗日寇侵略，加入民族抗日自卫军，打过一些漂亮仗，他曾率领民众救国军同日寇平岗小野的千余人精锐部队交战，击毁日军汽车17辆，打死打伤日军100余人，后来加入了赵尚志的抗日联军，任第八军军长。抗联八军在勃利县境内遭到日军石川、和田部队的围剿，损失惨重，谢文东一家有8口亲人惨遭日军杀害，最后他却投降了日军。日本人以邀请的名义把谢文东弄到伪满州国首都新京（长春市）和日本国东京参观访问，受到日本国天皇裕仁的召见。谢文东感恩涕零，跪在“忠魂碑”前忏悔认罪，彻底投靠了日本人，参与了日军屠杀鸡西煤矿工人事件。日本投降后，他又拉起队伍，接受国民党的领导，被委任为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他有1000多人马，轻重机枪十几挺，盘踞在佳木斯与勃利之间的湖南营子、东驼腰子、石头河子一带。

匪首之二李华堂，河北冀东人，“九·一八”事变后曾一度抗日，任抗日联军第九军军长，后投降日寇。日本投降后，他纠集一伙土匪组织什么“忠义救国军”，后被国民党封为“东北挺进第一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他的人马、枪支与谢文东不差上下，活动在通河、方正以及依兰的土城子、刁翎一带。

匪首之三张雨新，国民党东北先遣军中将军副军长，有1000多人，野炮2门，轻机枪10余挺，经常流窜于勃利、刁翎一带为非作歹。

匪首之四孙荣久，此人是孙靖字的族叔，是个老惯匪，人称杀人魔王。他16岁落草为匪，狡猾凶狠，刁蛮残暴，曾效劳日寇残害抗日志士。日本投降后，被孙靖字的“三江人民自治军”收编，担任独立团长。他嫌官小，后又接受国民党收编，被委任“中将军长”。他有五六百人和一个骑兵队，盘

踞在勃利、林口两县地区。

这些土匪控制着合江 17 个县中 14 个县的城镇、农村和铁路、公路交通要道，挂起国民党党部和县政府的牌子，同国民党正面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遥相呼应，在解放区后方大肆破坏骚扰，袭击佳木斯、依兰、富锦等地，严重威胁着战略后方根据地的建设。

在北满分局的会议上，陈云本着“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的精神，告诫方强等与会同志：“东北斗争无非是三种前途：一是我们消灭国民党，二是我们被国民党消灭，三是又走抗联的老路，过江寻求苏联的庇护。我们要力争第一个前途，避免第二和第三个前途。”陈云要求北满全党干部“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实行大转变，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和在城市工作的思想，脱下皮鞋西装，换上农民服，深入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扩建武装部队，消灭土匪，建立根据地。”

北满分局会议之后，12 月 7 日，方强和洛甫带着一部分干部北上，从哈尔滨乘火车向目的地——佳木斯进发。

方强第一次领略东北的严冬，千里原野冰封雪盖，铁路两旁的丛林满树银花，人在车厢里，哈气成冰，手握车门扶手，松开时被沾掉一层皮。第二天，到达牡丹江，因铁路中断暂住数日，只好改乘大卡车继续北上。

当汽车驶近林口县城时，突然前方鸣枪示警，坐在驾驶室内的方强一眼就看出是从苏军岗哨打的枪。方强立即拔枪，警惕地注视着目标。

驾驶员说：“这是林口县城，里面有苏军驻防。”

“他们为什么向我们开枪？”方强问。

“要我们停车，进行检查。”

汽车停了下来。方强与洛甫商量，即派陈剑飞、彭敏两人前去联系，向苏军说明车上人员的身份和去向。

苏军的一名上尉军官告诉他们，前日勃利、林口发生了叛乱事件，为了保证安全，请方强一行前往苏军卫戍司令部暂住，视情再行前进。

原来，政治土匪张雨新对混入三江人民自治军的惯匪孙荣久、伪保长徐汉章等人，进行政治策反，并勾结匪首谢文东作外援，叛变革命，于 12 月 10 日攻打勃利、林口新成立的人民政权，林口县大队长被杀害，大队政委兼县长秦秀川只身到苏军司令部避难。叛军虽被苏军赶出林口县城，但郊区仍不安宁，勃利县城仍被土匪占领，难以通过。

从勃利撤来林口的王景坤、于化南等人，于 15 日早晨在林口旅店向洛甫、方强汇报了事变的经过，洛甫决定转向牡丹江到安宁县开展工作，再向合江地区发展。方强的意见要尽快到达佳木斯，早日展开剿匪和地方工作。两种意见两种做法。方强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时，正好有一列苏军货运列车在林口装卸完货物，前往佳木斯。方强即派人去协商，搭乘这列火车通过叛军占领区北上。在征得苏军和洛甫的同意后，12 月 18 日，方强率陈剑飞、郝力宁、谭荫傅、李万新、李万杰、翟颖、黎侠、顾烽等 10 多名干部，登上北上的列车。

火车喷着白烟，鸣着长笛驶向山谷，白茫茫的雪原一望无际。当火车穿过山涧徐徐开进勃利车站时，土匪已经封锁了车站内外。

苏联军官把方强等人移到车厢里面，用汽油桶挡着，然后他们站在车厢门口作掩护。火车未停稳，一群背枪的土匪吆喝着：“停车检查！停车检查！”

苏联翻译告诉土匪：“这是苏联红军的专用军列，你们无权检查！”

几个土匪窜到车门口，抓住把手强行登车，被苏联军官挡在车门外。土匪向车里东张西望，仍然无法上车。这时，一个土匪头目向苏联军官走过来，邀请苏联官兵到站房里休息用茶，企图趁机上车检查，也被苏军婉言谢绝。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纠缠，土匪无机可乘，又迫于苏军的威力，只好同意放行。火车一声长笛，把土匪抛在身后，驶向合江省省会——佳木斯。

清剿土匪

美丽的边城佳木斯以春天般的温情欢迎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干部的到来。方强与先期到达的李延禄、李范五等四批同志汇合一起，战友重逢，欣喜若狂，相互倾吐着沿途的感想，畅谈未来工作的设想。经过交谈，了解掌握了先到达的干部人数和开展工作的情况：

最先到达的是彭施鲁带领的 40 多名抗联干部。其中一部分同志，原先一直在东北境内担任敌后侦察任务；另一部分同志，是苏军进东北时，派入第一线部队担任翻译和向导工作的。日本投降后，他们成立若干个工作组，分别进驻沈阳、哈尔滨、佳木斯等重要城镇，重建人民武装力量、宣传发动群众，开辟新区工作。第二批到达的是孙靖宇率领的 800 名“三江人民自治军”和 30 余名干部。这支部队，原是山东军区滨海支队的一个整连和从胶东军分区抽调的一部分干部。他们到达沈阳后，扩大了两个新兵连，编为一个营。东北局指派孙靖宇、戴洪滨率领他们开进佳木斯，建立“三江人民自治军”和“三江专员公署”。10 月中旬，部队进驻哈尔滨后，又扩充了两个连。11 月 5 日，800 名装备整齐的部队开进佳木斯市。市卫戍副司令彭施鲁在车站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八路军来了！”而土匪、地主豪绅则纷纷议论：“这里到底是国民党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

第三批到达的是李延禄、李范五率领的 20 多名干部。他们在接受东北局交给的组建中共合江省工委和合江省政府的任务之后，于 11 月 17 日到达佳木斯。李范五任工委书记，李延禄任省主席。

第四批到达的是吕清、孙西林率领的 60 名干部，他们是从延安来的“东北工作团”的一部分同志。同时到达的还有王景坤率领的新四军抽调的一个营架子的 55 名干部。

以上同志到达合江之后，迅速开展工作，组建了中共合江省工委、省政府、建立了拥有 800 多人的“三江人民自治军”，还成立了“人民民主同盟”等一批群众组织。这些以 200 多名党政军干部为骨干的组织和武装力量，将开辟合江工作。

合江省，不少人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在伪满时，把这里划为三江省和东安省。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把这里划为合江省，全省人口约 200 万，是东北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后，合江曾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重要活动地区之一。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抗联坚持到 1942 年弹尽粮绝，不得不离开国土，渡过乌苏里江到彼岸苏联境内。抗日游击队在那里进行整训的同时，还经常派出小分队潜回敌后打击日寇。

日本侵略东北，国民党奉行不抵抗主义，命令东北军不战而退，大好河

中尽陷敌手。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秘密派出“宣抚委员”窜到合江地区，纠集地主、资本家和伪满官吏、警察、宪兵等一起，大肆活动，一夜之间，在佳木斯挂起了国民党党部的牌子。伪满一个高级文职官员张人天摇身一变，当上佳木斯国民党党部的书记长。曾当苏联俘虏的伪满少将旅长王嘉善经常出入佳木斯国民党党部的大门。他们组织“宣抚委员会”，收容日伪的军警宪兵和特务分子，收编土匪，开办“三民主义青年团”训练班，等等，在各县还设立了国民党党部和县政府。许多地主武装则采取两面投机的政策，他们在国民党军队还未进到合江时，就暂时依附共产党，表面上“服从”共产党领导，暗地里却在进行破坏活动，即所谓“明八路、暗中央”。

“三江人民自治军”到达合江后，宣布国民党的一切组织为非法，摘掉了国民党党部的牌子，处决了几个头目。国民党人员又转入地下活动，到土匪中去组织武装，招兵买马，扩充土匪势力，由小股逐渐集结为大股，由不出区县界的地主武装变为在整个合江地区活动的流寇。据了解，当时在合江境内有大大小小40多股土匪武装，加起来大约有2万余人。主要有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四大惯匪。

当时，匪患结合江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到处是断垣残壁，满目疮痍，市场萧条，通货膨胀，工厂矿山停工，人民生活没有保障。

方强等人一到佳木斯，立即召开省工委扩大会议，传达北满分局关于《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和陈云在哈尔滨党员干部会上的重要讲话，方强起草了《关于合江军区的战略与军事建军方针》的文件，由省工委讨论通过。

文件详尽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具体战略方针和政策：

合江，在北满及东北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合江党的总任务是创造以广大农村为基本阵地的根据地，逐渐与黑龙江、滨江、牡丹江各根据地连成一片，实现控制北满的战略目的。

合江当前的形势是：由于在南满的国民党军队向北进犯，加上我们在过去工作中的某些错误，人民基本武装力量发展不快，而土匪的武装却在不断扩大，已盘踞了勃利、林口、通河、方正、华捕、密山、平洋镇、鸡西、东安等14个县和依兰、汤原、富锦等4个县的广大乡村。土匪占有的县城多于我，控制的面积大于我，土匪的武装力量10倍于我。

方强提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消灭东北战略后方四大土匪。在战略部署上，要求今后6个月内，使我在战略形势上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以达到最后彻底肃清土匪的目的。为此，军事指导思想是，要坚决反对退却防御，立即组织力量反击，先把土匪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在战略行动上，部队立即出动进剿，先打对依兰威胁最大的松花江南岸的几股大土匪，消灭其主力。在战术上，坚决反对并立即纠正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的攻坚战、阵地战、消耗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采取奔袭、偷袭、夜袭、奇袭和伏击的游击运动战。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歼灭要害，在土匪溃散时，穷追猛打务求歼灭。

省工委会议一结束，方强即动身亲赴依兰剿匪前线。

在那里，方强首先对部队进行整编。为了便于作战，将大团编成小团，使部队更加机动灵活；精简机关，充实连队，组建成精干的指挥机关。接着，对部队进行短期的军事、政治训练。根据当时的形势，对政治工作提出的要求是：团结自己，宣传群众，瓦解敌人，发展同苏军的友好关系。为了加强

内部团结和提高战斗力，还着重进行了形势和任务教育，按照人民军队的宗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组织原则进行整训。

这时，土匪的活动更加猖獗。

12月中旬，匪首谢文东率领大部队浩浩荡荡开进勃利县城，已叛变投敌的孙荣久大造声势，隆重欢迎土匪进城。孙荣久推举谢文东作县长，谢文东执意不肯，他嘲弄地对孙荣久说：“你老兄真的小瞧了我，一个县长算什么？”这时的谢文东已被国民党授予十五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全部人马戴青天白日臂章。他主持组成李儒忱为县长的勃利伪县政府，强行发行流通券，筹集军款，搜集枪支弹药。

苏联红军于12月底再次进驻勃利，通令谢文东、孙荣久等匪军，限期撤出县城。谢文东不敢以卵击石，只好将匪队撤到小五站、七台河等地。

谢文东撤出勃利后，突然决定去鸡西接收，但遭到苏军的拒绝。匪徒们一气之下，在苏联红军司令部门外，砸了一辆苏军吉普车，抢了枪支和红军票。这下捅了“马蜂窝”，苏军追上去一阵痛打，谢文东狼狈逃回营地。

这时，方强部队已整装待发，他们首先印发大量的布告和传单，在城乡广为散发张贴，对土匪实行政策攻心，提出“投降不杀，缴枪留命，回家分地”的口号，并通过各种形式做土匪家属工作，实行宽严结合的政策，号召受骗者、协从者主动投案，带枪投诚。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面前，谢文东的鲍得水、秦秀权等人先后离开谢文东，匪部渐渐分崩离析。

1946年1月12日，方强率部在依兰县城召开剿匪动员大会，部队情绪高涨，群众欢呼雀跃。当日，部队出师东剿。

连续战斗

剿匪第一仗是团山子歼灭战。

1946年1月，正值隆冬季节，在我主力部队驻地——依兰地区周围，李华堂匪部时常出没，伺机骚扰。该匪纠集通河、方正、勃利、林口各股土匪，向依兰东面的广大村镇集结，蠢蠢欲动，妄想夺取依兰县城。

依兰是佳木斯的屏障，如果被土匪侵占，则直接威胁佳木斯的安全。因此，清除依兰周围的土匪，扩大根据地，保证铁路、公路的畅通，是打开合江地区剿匪局面的前提。

这次参加出师东剿的指战员大都是关内同志，对冰天雪地里行军不太适应，尤其是夜行军，弄不清脚下深浅，一个小时走不到10里路，战士们睫毛上都挂上了冰霜，刺骨的寒风钻进更生布做的棉衣，冻得他们直打哆嗦。

“叭！叭！”

一串枪声划破夜空，团山子方向打响了。我军雪夜进剿，土匪没有料到，因此，部队很快扫清了前哨之敌。接着，连续攻打道台桥和周围各村庄土匪据点，敌人来不及还击就当了俘虏。这一仗，歼灭了谢文东的孙景韬旅大部，缴获步枪200余支，轻机枪3挺，残匪败退西太平镇。

首战告捷，土匪的嚣张气焰受到打击，给部队以很大鼓舞。

第二仗打的是反击战。

那是1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我军驻在三道岗，当时，正待出击湖南营、双河镇等地，突然响起一阵枪声。

侦察员向方强报告；“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和孙荣久几股土匪联合起来，分三路向我三道岗营地发起进攻。”

方强同吕清、戴洪滨正在吃早饭，方强放下碗筷，淡淡一笑说：“这么早就送上门来了，通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正说着，一颗炮弹落到屋顶上，房顶被炸开了一个大洞，警卫员的胳膊被击伤，碎木尘土掉在饭桌上。吕清气愤他说：“真他妈的猖狂，竟然打到我们身边来了。”

方强看了一眼碗里落进的尘土，说：“敌人给我们加餐来了，我们也得给他点硬的尝尝。”说罢，方强立即跑到前沿阵地指挥。当时，我军有4门迫击炮、土匪已攻进200米以内，方强指挥着，发发炮弹在敌阵中开花。

敌人用猛烈的炮火轰击了一阵，又连续发起三次冲锋，都被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指战员击退。连长丁席昌带领战士猛打猛冲，与土匪展开肉搏战，杀得土匪魂飞魄散。方强趁机组织反击冲锋，土匪便败退而去。

三道岗反击战之后，方强率部一鼓作气收复了湖南营，该地土匪被歼灭一部、击溃一部。部队连续打胜仗，情绪高涨，又乘胜南下，夜袭张雨新总部所在地——双河镇。张雨新从梦中惊醒，来不及穿鞋，便赤脚逃命，在雪地里奔跑，逃往刁翎。这一仗，俘敌十五集团军参谋长舒大光等官兵500余人，缴获步枪300余支，山炮1门。残匪向刁翎一带逃窜。

2月1日，农历除夕，松花江两岸万家灯火，欢度新春佳节。但作恶多端的土匪没有消灭干净，干部战士们都无心过牛，纷纷要求再打几仗，用胜仗来个“聚餐”。方强决定改变作战方向，来一个声东击西，突然调转部队改东剿为西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下松花江北岸的青河镇、祥顺山、大罗勒密和方正县，全歼李华堂的高明山土匪600余名，缴获长短枪300余支，轻机枪5挺，重机枪2挺，军马30多匹，在通河与松江剿匪部队会师。

方强率部西进之后，土匪又趁机窜回依兰南面的一些村镇，杀害共产党地方工作人员，抢劫老百姓。2月7日，方强得知情报后，即率队从通河返依兰，追歼敌人。第二天，打下太平镇，收复三道岗、二道河子等地区，歼敌大部。余匪溃退到刁翎。

刁翎，是一个盆地，四周高山，地形险要既宜坚守，又便出击。伪满时，这里曾是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日本侵略者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一年之久，花了不小代价才攻进刁翎。“八·一五”后，一直被土匪霸占着，成了土匪的藏身洞，当土匪走头无路时，便逃进刁翎凭地势坚守。

合江军区的部队决定进剿刁翎。

2月23日，部队分路进到二道河子集结隐蔽，待命出击。从二道河子到刁翎有140华里，都是山路。25日黄昏，部队摸黑向刁翎进发。第二天拂晓，可以看见刁翎的轮廓了。

突然，前面传来密集的枪声，尖兵排与黑背一带的敌人打响了。方强立即命令一、五团和十九团、独立四团分两路跑步前进，迅速向黑背山岗迂回，包围敌人。

顿时，枪声四起，日式歪把机枪特别响，震耳欲聋。部队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乌合之众的匪徒哪里抵挡得住我四个团的进攻，不到一小时，便歼灭敌骑兵300余人，活捉团长2人。剩下残匪向三道沟、莲花泡一带深山逃窜。方强令独立四团留守刁翎，打扫战场，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政权，然后自己率领主力追击残匪。

二道沟、土头甸是土匪设防的两个据点。3月26日，军区主力包围这两个点，从拂晓激战到中午。方强从望远镜中发觉敌人已经动摇，便下令冲锋，亲率突击队冲下山去。土匪夺路而逃。主力团乘胜直追，连续收复勃利、林口、龙爪、宝林、桦林、与牡丹江的剿匪部队在柳树河子会师，重新打通了中断三个月之久的牡——佳铁路线，一批被阻滞在外地的干部，顺利来到合江。

经过几次作战，谢文东部损失惨重，已溃不成军。三月，他来到石头河子，把失散的队伍集中起来，在三道河子重新整编。国民党联络员杨义儒趁机窜到三道河子，代表早已不存在的国民党合江省政府、省党部，传达了东北剿共总司令委任谢文东为合江省保安军军长、杨义儒为保安军参谋长的命令。谢文东借此重新组建合江国民党保安军，下属两个支队，第一支队李凤金，第二支队穆青山，两个支队共六七百人。

新成立的保安军立即成了合江军区部队进剿的目标。老奸巨猾的谢文东深知石头河子不是久住之地，为了保存实力，等待国民党来接收，就把队伍分散隐蔽在山区地带。

谢文东攻占鸡西的贼心不死。他乘合江军区整编之机，纠集卢和、汪洋几方土匪制定了攻打平阳镇的计划，土匪七八百人，有几门大炮，驻守平阳镇的合江军区十四团一个连只有八九十人，他们得知土匪的进攻计划后，趁天黑主动撤出了平阳镇。

当夜，谢文东便发动攻城，一阵炮火之后，听不到镇内还击的枪声，谢文东派人进去了解情况，方知守军已经撤退。于是，谢的指挥所设在平阳镇维持会大院里，杨义儒把军需和维持会的人找来，要款、要粮、要物，胡子兵在大街上挨家挨户搜查，把群众的马匹、猪、鸡、鸭和衣服都抢走了，有的还公开奸淫妇女，引起群众极大愤恨。

谢文东轻松地拿下平阳镇，觉得自己还行，便准备攻打鸡西。鸡西东南是鸡冠山，它是鸡西的天然屏障。方强早在这里埋下伏

匪部攻占鸡冠山主峰，激战一天一夜，寸步难行。第二天中午他们派人叫群众给他们送午饭来，这时，发现我军主力部队正向他们包围，谢匪乱作一团，连忙逃窜，连阻击部队也留不下来。上匪一口气逃到哈达岗、大荒地两处，分散活动去了。

1946年4月初，苏军佳木斯卫戍司令告诉方强：苏军将于4月5日撤离佳木斯回国，要合江军区接管防务工作。经过几天的紧张筹备，合江军区于4月5日夜接管了苏军撤走后的佳木斯市内营区、机关、仓库和各县的防务。从此，合江省政府统一了自己的辖区。

4月中旬，方强等人在林口县举行酒会，欢送苏联红军回国。苏联红军在战斗中与合江军区部队结下的友谊，使方强久久难以忘怀。

智歼顽匪

国民党自1月10日停战协定签订后，不断进攻东北解放区，到3月22日，侵占了新民、辽阳、抚顺等地。由于兵力不足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国民党被迫于3月27日与中共签订了东北停战协议。然而，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军又从31日开始，向营口、鞍山、本溪、四平街等地发动了新的进攻，造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正当四平保卫战激烈进行之际，北满的土匪又加紧了对我后方的骚扰活动。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连续发出关于剿匪的指示，要求各部队迅速肃清各地的股匪和残匪。这时的合江军区经过整编后，下属四、五两个支队和特务团、炮兵团共六个团，由原来的 800 人发展到 4000 多人。

4 月 20 日，军区四支队在勃利东 40 里的青龙山，包围了孙荣久的骑兵 200 多人，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和供应，并接连送去三封敦促投降书，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军区部队发起冲锋，全歼匪部，孙荣久被活捉，但由于政治部看守不严又逃脱了。

一个多月后，部队抓住了孙荣久的一个传令兵叶某，他时常化装成猎户进出青龙山。经过审讯，得知孙荣久的 300 余人分成了七小股，孙匪与参谋长彭治斌二人离开巢穴窜到桦南县阎家区马家街猴石一带，潜伏在密林草丛中。

困兽犹斗。孙匪虽处日暮途穷之境，但不可轻敌。方强与桦南独立团的领导一起，拟定了捉拿孙荣久的方案。他们派桦南县大队骑兵连指导员赖庆同带领 16 名战士，装扮成打柴的分散进山。

赖庆同是一位有多年作战经验的老侦察员，他们押着带路的叶某，雪地行军百余里，分头赶到猴石山。当他们搜索到山腰旧炭窑旁的破木屋附近时，孙匪才察觉。赖庆同立即命令两名战士从山坡绕到房顶，用刺刀戳开房盖观察，受惊的孙匪急忙向外打了一排盒子枪，双方展开对射。

机智勇敢的赖庆同高喊道：“一排在左，二排在右，三排跟我来，冲！”并命令投出一排手榴弹，随着几声巨响，房墙被炸塌一角。

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孙匪难以抵抗，呼喊“投降”并从破木屋里扔出几支枪。随后，双眼暴凸、满腮胡子、一脸横肉、肥胖臃肿的孙荣久垂头丧气地举着双手走出来。

活捉了孙荣久，勃利县人民欢呼雀跃。匪部 200 多人带战马 85 匹，前来投降。民主联军乘胜追击，全歼了小五站、驼腰子、七台河、石头河子等地的顽匪。

正当合江军区西剿和南进之际，匪首谢文东率残部 300 余人又窜到东安之密山、东海一带；李华堂、张雨新收罗 160 多人又窜回刁翎、三道通一带活动。这时，奉命调来合江配合剿匪的三五九旅八团已进至勃利附近。军区决定，从 5 月上旬开始，集中优势兵力进剿三道通、大百顺沟、刁翎之土匪。

战斗部署是：由军区所属五支队担任主攻，三五九旅八团担任堵击，刚刚成立的东北航空学校出动飞机助威。新迁到勃利的东北航空学校，有几架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斗机，土匪不知道这一情况。方强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设下圈套。

5 月 5 日，航校派出一架伪装成国民党的飞机，在刁翎上空投下一封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嘉奖张雨新、李华堂作战有功的信，诈称 5 月 7 日上午熊式辉亲自飞临刁翎检阅部队并合影，指令务必在两日内于刁翎东门外平整简易飞机场，集合全军迎接熊主任检阅。

土匪拾到空投信后，根本没有想到合江人民自治军有飞机，认为确是国民党送来的信，一切照办。军区将预先印刷的大量宣传品（告土匪书、各种布告等）和一枚日本炸弹、两挺机关枪分别装上两架飞机。并作了两手准备：如土匪集合队伍迎接检阅，则饷以炸弹和机关枪；如土匪不集合部队，则只投放宣传品。地面部队只等飞机到达，就发动攻击。

5月6日晚上，部队运动到刁翎北部山林隐蔽。5月7日上午，飞机在勃利机场出现故障，一架起飞后不久就摔了下来。朝鲜籍驾驶员当场死亡，幸炸弹没有爆炸。另一架飞机成功地飞到刁翎，见到土匪部队果然在东门外空旷地上集合，于是便低空扫射一阵，投下红红绿绿的宣传品。土匪忽然惊觉，四处逃散。我地面部队猛烈冲击，毙匪30名，俘匪70名，缴获轻重武器多件，残匪800多人逃往牡丹江西岸的深山大森林中，零星散匪陆续回到刁翎向我投诚。

与此同时，围剿匪首谢文东的战斗在哈达岗、大荒地两处进行。合江军区派出十四、十五、十六三个团的主力部队进攻谢匪。谢文东的部队发现被包围时还在梦中，仓促突围，丢下八九十具尸体逃到黑台。这时，三五九旅八团的部队赶到黑台又将谢文东部包围。谢匪主将穆青山准备撤退，郭兴典则依仗自己炮多不撤，抓紧时间修筑炮阵地。

战斗一开始，三五九旅八团的机枪火力猛烈扫射，打得郭兴典的炮兵阵地尘土飞扬，人仰马翻。谢文东见势不妙，便拉着穆青山逃往东山，郭兴典的炮阵地迅即被八团接收。

在逃跑前，他们把拿不了的枪支弹药、衣物药品，还有两木箱匪军花名册，一箱用白绸制的空白委任状等，全部藏在一个山洞里。谢文东的侄儿谢生堂被俘后交待了藏东西的山洞，小五站地区中队去山洞将东西取出，拉回几十大车。

剿匪部队还采取了攻心政策。在谢文东即将走向灭亡时，合江省主席李延禄便派人给他捎去一封信，教育他说：“你回想一下，咱们过去共同抗日时，国民党不是说支持我们抗战吗？可是国民党到底给咱们一粒粮食没有？给咱们一文钱没有？给咱们一杆枪、一颗子弹没有？事实说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谢文东仍执迷不误，他对送信的人说：“你回去对李延禄说吧，我已经这样了，就跟国民党走了，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四平保卫战是解放战争前夕国共两军打得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我军在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之后，于5月18日撤出四平，向松花江北岸转移。5月30日，蒋军进到松花江南岸，此时，合江的残匪又嚣张起来，以配合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赵秉镛匪攻占同江得手，进而围攻富锦；郭兴典股匪700余人进犯东安；谢文东纠集当地土匪1500人围攻鸡西；王小丁股匪200人攻入牡丹江市区。

为了支援四平前线，合江军区于5月24日向所属部队发出作战命令：“务必在5月底到7月中旬完全彻底消灭合江境内土匪。”并派出四支队前往富锦解围。方强亲率五支队一部进剿东安之匪。

6月17日，三五九旅的主力部队经牡丹江来到鸡西、密山、东安等地区，协同牡丹江和合江军区的部队，分三路围剿谢文东之主力，此役共毙俘匪1000余人，缴各种炮19门，枪支700余，其残匪向宝清地区逃窜。三五九旅一部向东安以东地区进剿，地主武装纷纷瓦解，仅饶河一县就收枪5000余支。三五九旅另一部越过几百里无人烟的完达山区，与合江部队钳击宝清股匪，军区骑兵团冲进宝清县城，歼敌800人，1500人投降。三五九旅与合江部队会合后，又在富锦、桦川之间地区歼匪1400余人。郭兴典残部溃入荒无人烟的大草原，被我佳东支队尾追8天8夜，俘匪团长以下875人，毙伤百余人，缴获大量枪械。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另有800多散匪携械投

诚。在阴阳圪、九间房至大通沟追击中，俘匪五十二军军长孟尚武以下百余人。

至此，合江各地大股土匪已基本肃清。共歼灭土匪 7600 多人，收复 14 座县城，合江军区部队得到迅速发展，由原来的 800 人扩大到 9000 人，增长了 11 倍。

捷报频传

俗话说：“擒贼擒王”。抓不到匪首谢文东，张雨新、李华堂，就不能说取得了剿匪的全胜。

此时，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匪首谢文东仍在作垂死挣扎。他在牡丹江边找到李华堂，商议去刁翎会见张黑子（张雨新）。三大匪首在刁翎召开三方联席会议，决定军事上实行有分有合的方法对付共产党，以求保住各自的地盘和实力，等待国民党接收。

这时，贺晋年调来合江军区任司令员，方强改任政治委员。部队第三次进行整编，并确定第二阶段剿匪任务：重点放在山区，深入搜山，分进合击，穷追到底，并按防区分工堵击，不使其四窜，务于 12 月底前全部、干净、彻底消灭之。

1946 年 9 月，谢文东带 300 余人洗劫了牡丹江市郊八道沟一个小屯，后又来到海林县进行抢劫。

合江军区实行分片包干的办法，土匪在哪个地区出现，就将它在哪里消灭。他们发动群众，搞坚壁清野，断绝土匪粮食，逐渐把土匪追到深山老林之中。

10 月末，三五九旅八团和合江军区骑兵团把谢文东部压缩到牡丹江西岸、四道河子以北的一个狭长地带。谢文东的四儿子、警卫团长谢生荣带十多人骑马外出搜集粮食时，被我伏兵打下马来。谢文东得知后，找来心腹李凤金、穆青山，说：“小四子被八路军打落下马，看你们谁去把他抢回来。”

谁也不出一声，大势已去，大局已定，挣扎也是徒劳的。杨义儒劝说谢文东：“赶快转移吧，再晚就没命了。”

无可奈何的谢文东带着队伍绕道往西，遇到三五九旅八团的堵击；又折向东，同样受到合江军区骑兵团的堵击。走投无路又返回营地。这时，谢文东才发现杨义儒、汪洋、韩希精一伙人已无影无踪，离开他到长春投靠国民党中央军去了。

谢文东也想去投靠中央军，但为时已晚，他已在我军大部队的包围之中。

10 月 6 日，谢文东带几个随从窜到大夹皮沟，钻进了合江军区和三五九旅剿匪部队设下的天罗地网。方强指挥部队分成几小股深入到大夹皮沟、头道河子和五道河子之间的林海中，堵住了谢文东南逃和西窜的各个出入口，北面有依兰县独立团在黑瞎子沟堵截，东面有老爷岭挡住去路。这样，合江地区最大的匪首谢文东便成了瓮中之鳖。

11 月 11 日，他从五道河子上山来，原打算从五虎嘴子偷渡牡丹江，被打回了去，又北窜偷渡，仍被打回了去。方强派出两名猎户进山进行劝降。当即有他的两个营长站起来说：“我们不干了，下山去，只要能保住命就行。”气得谢文东抡着枪说：“别听共产党的假宣传，现在投降也是没命了。”

谢文东把两个老乡绑起来，正要杀害时，尾随而来的剿匪部队机枪响了。

谢文东闻风而逃，此时，只剩下六七个人了。

他们气喘吁吁跑到山坡上，实在走不动了，索性躺在雪地上。谢文东有气无力地对匪徒们说：“弟兄们，别泄气，胜败乃兵家常事。当年刘备同曹操打仗时，兵败小沛，只剩单骑，走投袁绍，后来还成鼎立之势呢。而我们还有几个人，等国军一到，何愁不成大事。”

谢文东的随从汤二虎把枪口对准谢文东说：“军长，我实在不行了，你投不投降，我要去投降了。”

谢文东看到汤二虎的架势，知道来硬的是不行了，便装出一副可怜相，说：“二虎有难处，我也有难处，你今天先去投降，能替我办个手续，明天拉个马来，再带几个饼子来接我。”

第二天，汤二虎带领剿匪小分队来抓谢文东时，谢早已逃之夭夭。三五九旅六团五连副连长李玉清带二排长刘淑颜和十几名战士，身穿便衣，化装成土匪，跟踪追击，来到山顶的一座庙宇前，看到有几个人，迅即包抄上去。

李玉清摸到庙后时，谢文东正跪在地上，喃喃地说：“神灵保佑，保佑我们父子性命平安，摆脱困境，将来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李玉清大喝一声：“谢文东，我们捉你来了，看你敢跑！”

失魂落魄的谢文东瘫软在地，连声说：“我是中央胡子谢文东。”

谢的大儿子谢生发和几个匪兵正要逃跑，被刘淑颜等人擒获，不由分说绑了起来。

当天晚上，谢文东被押到西三道通八团团部审讯，谢文东战战兢兢他说：“我能提一个要求吗？”

“可以。”看押人员说。

“我要拜见一下方强司令、贺司令、共产党厉害，我服输。”

方强听说后，冷冷地回答：“在法庭上见，审判他。”

11月21日，谢文东被押到依兰县游街示众，几天后，押送到勃利。

在剿匪反奸胜利大会上，谢文东被拉到碾子河西岸枪决，并在勃利、依兰、桦南、佳木斯等地悬头示众。

12月5日，在依兰附近的追剿中，擒获匪首张雨新。

12月12日，李华堂在刁翎落入法网。

到年底，合江境内的土匪全部被歼，匪首无一漏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来嘉奖电：“你们继肃清谢文东股匪之后，又生擒民族叛逆伪匪巨魁李华堂，将反动派在合江境内的内应力量彻底消灭。同时，也伸张了民族正气，保卫了人民的生命安全。捷报频传，特电嘉奖。”

（郭富文）

横扫千军，驰骋白山黑水

建设北满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加强东北地区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抽调主力部队进入东北，创建东北根据地。原准备派往山东开辟工作的李天佑、肖劲光等，在走到河南濮阳时，忽接中央：“万万火急”电报，令他们改赴东北从事开辟根据地的工作。

他们几经转折到了沈阳。彭真代表东北局，对先后到达的六七百名干部表示热烈欢迎。不久，李天佑以军事顾问身份，随吕正操等赴鞍山、营口等地勘察地形，视察部队，研究设防方案，准备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1946年1月，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建立了北满、南满、东满、西满4个军区。李天佑被任命为北满军区参谋长（司令员高岗、政委陈云）。该军区下辖扩编后的第七师、陕甘宁第三五九旅，以及合江、松江，北安、嫩江和牡丹江等5个军分区。军区机关设在黑龙江省通河县。

北满军区成立不久，苏军从东北各大城市撤走。国民党一时无力去接管。我党便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放开手脚夺取各大城市，壮大自己的力量。东北局决定派部队进占哈尔滨，作为北满根据地中心。任命李天佑为解放哈市总指挥，三五九旅旅长刘转连为副总指挥，共同负责制定解放该市的作战方案。

哈市位于黑龙江南部，是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铁路、航运和公路的交通枢纽，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早在苏军进驻时，我党即在这里建立了党政军领导机构，组织和武装群众，准备接管该市。但是，苏联政府拘于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协定”，要求我党我军领导机关撤出该市和不在苏军驻守地区同国民党军作战，还准备将该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

1945年12月，国民党“东北行营”在苏方同意下，派了关吉玉等接收大员及部分武装人员接收哈市政府及其所属机关。他们来后，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建立军警和特务组织，监视进步团体，制造谣言，进行暗杀、破坏等罪恶勾当。

针对上述情况，陈云在1946年3月曾就解放哈尔滨问题，对李天佑和刘转连作了重要指示：“苏军很快就要撤退了，蒋介石对东北的大城市都想占有。苏军撤退后，我们占领哈尔滨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是打后占领；二是小打或不打而占领。军队应该做打的准备，而且要做好打的充分准备，力争不打，但立足点放在打上。”陈云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他的指示精神，说：“必须从困难着想，要用宰牛的刀来杀鸡。”

李天佑等遵照指示精神，经过仔细研究，深入调查，制定了立足于打的具体作战方案，部署了兵力。令三五九旅向三棵树推进；哈南分区王奎先部在顾乡屯一带待命；调北安分区1个团占领江北要地；派人在市内南岗设立军事联络点，收集敌方情报，研究敌动向。

4月25日至27日，李天佑和刘转连对哈市周围进行了现场勘察，确定了进攻的主要方向在市区南面，那里地形较好，便于进攻和指挥。七一七团、炮兵营、骑兵大队等主要兵力放在市南的王岗、174高地、双榆树以北地段；七一九团部署在市东的王三屯和靠河寨之间，攻占道外；特务团放在市西南陈家岗、王岗车站附近，主要负责道里；七一八团在平房附近作预备队。松江部队和北安部队也按时进入指定地点。

与此同时，哈市各界名人和社会团体联名发出要国民党军队停止北上、请求我军进入哈市维持治安的通电。哈市国民党接收大员在我拒绝与其谈判保存国民党政权以后，于4月25日随苏军撤退至海参崴。

当时，国民党在哈市的所谓正规军、护路军、先遣军、忠义救国军、民众救国军、挺进军、光复军等约5000人，潜伏待变。

1946年4月28日拂晓5时，李天佑下令进攻哈市。各部队按预定部署，迅速占领了指定目标。在进军中，只在南岗和道外遇到小股敌人的抵抗和暗枪射击，但这些敌人很快被我歼灭。在市内地下党组织配合下，我军比较顺利地解放了哈市。

哈市解放不久，东北局决定撤销北满军区，成立松江军区，下设合江、松江、北安、嫩江、牡丹江和兴安6个军分区，共辖20个县，由李天佑任司令员兼哈尔滨市卫戍司令员。

此时，东北局势极为严峻。蒋军在美国支持下，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夺去了交通干线上的许多大城市。原来伪装接受收编的伪军和土匪，竟摇身一变成为“中央军”，发动暴乱，占领了松江军区的许多县城。他们与国民党军相呼应，妄图趁我立足未稳，攻占哈尔滨。

面对此形势，李天佑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工作方针。他首先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哈市社会秩序：从加强部队纪律着手，接着成立治安组织收缴社会上散存的枪支弹药，组织巡逻；向市区重要设施派驻部队；坚决取缔各种反动组织和镇压反革命。经过严厉整顿，工厂恢复生产，商店开门营业，学校照常上课，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秩序好转。与此同时，为了对付国民党的进攻，还采取了破坏铁路、公路、桥梁等一系列预防措施。

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扩大我武装力量，李天佑还以极大的精力抓剿匪工作。

1946年10月，蒋军全力进攻我南满地区，先后占领了通化、安东等重镇。同年底，又连续进犯我临江地区，企图将我军“消灭”在长白山下。针对敌“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企图，我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提出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方针。从1946年底到翌年4月，南满我军进行了4次保卫临江的战斗。

北满我军认真贯彻中央建军路线，经过半年休整、补充和训练，战斗力得到恢复和提高，从1947年1月至3月中旬，李天佑率领松江军区部队曾三下江南，策应和支援南满兄弟部队作战。他们同一、二、六纵队一起，趁着松花江千里冰封，冒着零下40度严寒，在辽阔的原野上进军，向松花江以南，长春、吉林以北的敌人，发起进攻。

经过3个多月作战，我军毙伤敌1.9万人，俘敌4.4万人，收复城市8座，极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动摇了敌人的士气，敌“南攻北守”战略被我彻底粉碎，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我南北满根据地得以连成一片，从而使东北局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巨大变化。

血战四平城

为继续歼灭敌人在东北地区的有生力量，进一步孤立长春、吉林守敌，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于1947年5月决定集中一纵、七纵和六纵的第十七师，

共7个师的兵力，加上5个炮兵营，组成四平攻城部队，由一纵司令员李天佑和政委万毅统一指挥，进行东北战场第一次大规模的攻坚战。另以4个纵队和1个独立师位于四平南、北地区，担任阻援、打援任务。

四平，是当时国民党辽北省政府所在地，是东北地区中部的重要交通枢纽，进入北满的门户，东北的重要战略基地。该市的东北部，山峦重叠，西南部河流纵横，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守敌为七十一军和十三军1个师，连同众多地方团队共约3.5万人，由陈明仁统一指挥守卫。他严令部队昼夜加修工事，做了坚守数月的准备。

6月8日，李天佑、万毅率领部队围攻四平。13日，乌云密布，大雨倾盆。就在这天下午8时，李天佑下达发起总攻命令。战斗异常激烈。我方在猛烈炮火掩护下，连续发动4次猛攻，前卫团一夜之间，打退了敌人15次反击，但敌阵地仍十分稳固。

14日，我各路部队在李天佑指挥下，再次发起猛攻，攻占了市区10公里以内所有村庄。为加强纵深战斗，李天佑一方面命令部队猛攻，一方面要求炮兵全力支援。战斗越打越激烈，李天佑不时地拿起电话筒，询问各路进攻部队进展情况，不断调整兵力部署。

意外的是，敌人似乎越打越多，原侦察：守敌1.5万至2万人，如今发现有3.4万人，几乎多出一倍。侦察上的失误，给进攻部队造成了极大的被动和困难：坚持打下去兵力不足，不打又觉着可惜。在进退两难时，李天佑一面向总部反映，一面命令部队咬紧牙关，狠劲地打。同时，果断命令预备队立即投入战斗。

预备队指战员接到命令后，犹如猛虎下山。无炮火支援，就采用连续爆破的新方法，炸塌了敌人一座座碉堡和一个个火力支撑点、掩蔽部，清除了敌人设置的一道道障碍，摧毁了铁路以西敌七十一军军部的核心工事，活捉了敌特务团团团长、陈明仁的胞弟陈明信。敌八十八师则溃不成军，陈明仁率领军部只好收缩到铁路以东地区负隅顽抗。敌辽北省主席刘翰东躲进铁路东面的尼姑庵内，化装准备逃跑。

在敌屡次反击失败采取守势后，我各路部队乘胜进攻，展开了逐屋逐巷争夺战，直逼敌军部。我七纵从西北方向也突破了敌人防线，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国民党省政府被攻下，铁路大楼、车站和敌弹药库、兵站等也被相继占领。但在我军进到铁路以东时，却遇到敌人拼命抵抗。我军则以顽强的攻势、密集的火力，顶住并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冲锋，而且很快攻占了四平市五分之三的地区。

面临灭顶之灾的陈明仁，接连向蒋介石发报，呼救求援。

经过浴血奋战，激烈争夺，敌人经营年余的现代化工事与密集的卫星地堡群基本被摧毁。敌七十一军军部及暂编三师全部、八十七师和五十四师大部被歼灭。毙敌军副参谋长以下官兵万余人，俘敌团氏以下官兵6000余人。

但残敌仍依托要点，拼命顽抗，固守待援。当其行将灭亡之际，蒋介石派来了新编第六军、第九十三军、第五十二军以及新从关内调来的第五十三军与长春之敌新编第一军，分南北两个方向向四平逼近。

鉴于敌情突变，李天佑奉命改变决心，除一部佯攻四平外，集中9个师迎击由沈阳北援之敌，但因敌过于密集，无隙可乘，在歼其1个团后，于6月29日，我参战部队全部撤出战斗。

1948年，经过休整扩编和发动秋冬季攻势后的东北民主联军，更加发展

壮大。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央军委批示，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而东北敌军，经我连续打击，损兵折将，丢城失地，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为切断沈阳与长春之敌的联系，我东北野战军在攻占法库、开原后，决心以主力北移，夺取重镇四平要点，并力争歼灭沈阳援敌一部，为最后夺取全东北创造条件。

此次攻打四平，仍由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和政委万毅负责统一指挥。

依据敌情、我情和指战员们的意见，以及上次打四平的教训，李天佑决定此次打四平，首先要肃清外围支撑点及敌防御主阵地前沿碉堡群，以顺利实施突破；多撕开几个突破口，从5个方向形成两面和对角的多路突击，使敌腹背受攻；部队突破后，要迅速穿插分割，以1个营打1条街。

3月11日凌晨，李天佑检查了主攻方向的突破口和冲击道路。这时，部队正在隐蔽地挖掘工事，进行近迫作业，构筑前进壕沟。是日黄昏，指战员们正加紧向前搬运弹药和攻坚器材。

3月12日黎明，我各路部队对四平发起总攻。顿时，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硝烟迷漫。仅7分钟，敌炮就被我猛烈炮火压了下去。敌前沿阵地的碉堡群大部被摧毁，突破口也被撕开。7时50分，李天佑命令发信号弹。各路部队像洪水一般，向四平涌去。一纵一师二团二连仅7分钟就越过铁路桥头堡垒，从四平北面突破进城。接着一团八连在铁路东面突入城内。独二师一个团则从西北角突入敌主阵地。然后三纵、七纵分别由正东和西南方向突入城内。14时，我南北两路大军在中山大街会师，并以一部兵力转向路东扩展战果。

我突入路东市区的一纵一师，采取大胆迂回战术，把敌防御体系打乱，并组织对敌核心工事进行连续猛烈冲击，直至将敌歼灭。接着，又转移兵力向南穿插。与此同时，三纵也向北压缩，形成对路东守敌的钳形夹击。经短暂激烈战斗，彻底地消灭了该敌。

战斗历时23小时，全歼守敌第七十一军七十八师和3个保安团、1个骑兵团，共计近2万人。

会战辽沈

1948年春我军解放四平后，东北国民党军48万余人，分别被包围在锦州、沈阳、长春三个孤立的地区，东北面临决战的形势。

李天佑奉命率领一纵队进驻梨树和九台地区整训，开展政治整军和军事大练兵活动，练射击、刺杀、投弹、登高等技术动作和夜行军、进行攻防战斗，为参加东北战场最后决战做准备。

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我军根据毛主席指示，将主力用于北宁线，决定先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点，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李天佑奉命率第一纵队进驻锦州和塔山之间的高桥，担负锦州攻坚和塔山阻援的总预备队。

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急令沈阳敌军组织廖耀湘西进兵团出辽西，令华北和山东敌军抽调7个师海运葫芦岛，会同锦西原有的4个师组织东进兵团北上，企图解锦州之围。

为了保证锦州攻坚的胜利，我塔山守备部队在敌机、军舰、大炮的轰击下，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6昼夜。10月15日，我军攻克锦州，歼敌

13万人。不久，长春和平解放。

敌军遭受致命打击后，10月18日，蒋介石第三次飞赴沈阳，部署“总退却”。他判断我攻锦部队伤亡大，需要1个多月休整才能再战，遂令廖耀湘部经黑山、大虎山向南，在锦西地区各部策应下，“光复锦州”，尔后掩护沈阳敌军经北宁路撤入关内；另派兵抢占营口，以便从海上撤退。

我东北野战军领导针对以上情况，向中央军委建议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地区消灭退却之敌。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我东北野战军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的战法，歼灭廖兵团。锦州地区的我第一纵队主力和兄弟部队，立即隐蔽地向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疾进，从两侧迂回包围敌人。一纵队三师和兄弟部队撤至黑山、大虎山地区，继续迟滞敌军前进。

10月21日，李天佑率领部队，不顾疲劳，火速向东疾进。23日，敌先头部队逼近我黑山阵地。敌人是精锐的美械兵团，扼守黑山阵地上的我十纵和一纵三师，要挡住敌人6个军。我军在敌机、大炮的猛烈轰击和轮番集团冲锋下，浴血奋战，激战5天，阻止了廖兵团前进。

26日，我东进主力到达。廖急令各军分别向沈阳方向撤退，但为时已晚。我各路纵队由西而东，由南而北，从四面八方将廖兵团团团围困在狭长约1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黑山阻击战的英雄们，跟塔山阻击战的英雄们一样，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史诗。李天佑时而命令三师全力投入战斗，时而命令一师从右切断敌人退路。当发现敌人妄图南逃时，又急令：“出击！堵截！绝不能让敌人逃跑！”指战员们一个个生龙活虎。他们发扬高度机动作战能力，不怕疲劳，不怕伤亡，大胆穿插于敌人中间，分割围歼，消灭敢于顽抗之敌。

截至10月28日止，仅在两天时间里，廖耀湘兵团10万人马就全军覆没，廖本人也当了俘虏。廖兵团被歼后，驻沈敌军妄图继续顽抗，或伺机从海上逃跑。为全歼该敌，中央军委于10月27日午夜，电示东北野战军：星夜兼程东进，阻截敌人逃路。李天佑率领一纵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不顾连续10天行军作战的疲劳，以每小时16.7里的速度向沈阳奔袭。

在东进途中，李天佑指挥一纵三师协同二纵攻下新民，并沿途追歼逃敌。这时，围困长春的我兄弟部队经600里强行军，已抵达沈阳近郊。消息传来，指战员们情绪更加振奋。31日下午4时，潮水般的队伍到达沈阳西郊，立即与兄弟部队一起，同敌展开激战。入夜，一纵三师进入敌主要防区铁西区，李天佑立即命令八、九团进入冲锋出发地，他们一个猛冲，连续攻下几个碉堡群，为后续部队进入市区打开了通路。

11月1日拂晓，一纵、二纵由西和西北，十二纵由南，各独立师由东和北，对沈阳发动总攻击，很快突破了敌第二道防线，进行巷战。在我军沉重打击下，敌人纷纷举起白旗投降。

2日，沈阳解放。东北的锦绣江山，从此完全回到了人民怀抱。

在这次战役中，李天佑指挥的一纵指战员，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行程2500里，毙伤和俘敌2.9万余人，缴获汽车400辆，战马3000多匹，为解放东北立下了赫赫战功。

（郝生章）

张国华奉命进藏，“佛光将军”誉满高原

世界屋脊上，居住着一个伟大而神秘的民族，有一位智勇双全的共产党的“入藏大臣”，在这里留下了一个个传奇故事。他就是被称为“佛光将军”的张国华。

邓小平：让“地主”去西藏吧

刘伯承：三十六岁属兔的，兔子灵活，特别是爬山

重庆曾家岩。

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毛泽东发自莫斯科的进军西藏的电报，来回传阅了两遍。刘伯承把手插在袖管里，邓小平则不停地抽烟。这两位二野的最高领导人，平时看起来好像把职务安反了。刘伯承比较“文”，休息时也是手不释卷，依在一块石头上能看上两小时。有人戏称他是“老妈妈”，当然是仅就外表而言，其“川军刘伯温”“独眼战神”之称早已闻名遐迩。邓小平则有一股英武之气，目光如电，对部下要求严厉。他和战士打牌、顶牛、掰腕子，刘伯承就拿本书往他旁边一站，眼睛全盯着书，好像要感受那股气氛。按现在的话讲他俩还真是“黄金搭档”。现在两人也有点犯难：派谁出兵西藏呢？

二野的部队的确不少：三个兵团，九个军。可目前已经占领西康省会雅安，不是二野的老部队，而是贺龙的六十二军。从地理位置和经济、时间上看，最合适的是这个军。但他俩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最艰苦的工作还是由自己的部队来执行妥当。他们又将自己的九个军一个个筛选，认为十军的战斗力最强，派他们去合适。遗憾的是军长杜义德身体近来很差，进藏困难。

“让‘地主’去吧！”邓小平烟抽得舌头发麻，忍着把烟头掐灭，挥赶着烟雾，说了一句“怪话”。

刘伯承被说糊涂了，忙问：“谁？”

“张国华。”

刘伯承欣喜地笑了：“我也正在打他的主意，好，就叫他去。”

刚满十五岁就参加红军，经过长征，曾与十倍于己的蒋介石部队周旋，战功赫赫，又有开辟新区丰富经验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怎么又成了“地主”了呢？

这要从十八军的干部队伍说起。这个军有相当数量的老红军和抗战勇士，有不少做过地方工作的干部，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南京解放后，需要一批干部去接管，但多数部队还在打仗，抽不出人。刘邓决定由各军随营学校来接管南京。在部署会上，当十八军随校政委林亮说到该校人员有四千五百多时，全场哗然。邓小平政委也怔住了：因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其他各军随校人数的总和。有人窃窃私语：“张军长如此富有，真是‘地主’！”遂决定接管南京的任务由十八军随校单独承担。虽然后来又有变化，随校编入五兵团去贵州征粮去了，但张国华“地主”的绰号却不胫而走，连邓小平说到干部问题时，也要开玩笑他说：“十八军的干部不必补充，张国华是‘地主’嘛！”

可这时的“地主”差不多已归了地方了。张国华正带领他的部队开辟川南新区，大批干部已被派往川南各地担任县市领导，政委谭冠三已喝过十八

军的送行酒，就要去任自贡市市委书记了，张国华也已就任了川南行署第一任主任。部队在进驻防地，1月8日，传来了刘邓首长的电令：十八军就地待命，张军长及各师主要领导干部速来重庆。

张国华一惊，立即意识到：任务有变！

他驱车火速赶往重庆。一路琢磨：是去哪里呢？云南？是四兵团的地盘：西康？十八兵团已经进驻；打台湾？有三野，看来十之八九，是要去西藏，因为只有那一片空地了……他的估计没有错。一到曾家岩，刘邓就把毛泽东要二野进军西藏的情况说给张国华听。在这期间，刘邓也觉得十军军长不要去西藏，而让十军部队受张国华领导去西藏，弯子不好转，已明智地作了决定：让张国华在二野所有部队中任意挑选三个主力师，组成三万人的一个军。

刘伯承见张国华不言语，问：“你的意见如何？”

张国华陷入深思。他很清楚，这样组成的军战斗力不成问题。可是进藏不只是打仗，更多的是政治斗争，这对一支不熟悉的新军来说是最让人担心的。可他自己的十八军思想弯子也不好转。本来要去贵州，刘邓考虑十八军过江以来跑路最多，吃苦最大，中途又让十八军改进天府之国的川南。官兵们对此尚未尽兴，又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风和日暖的天府之国到冰天雪地的神秘兮兮的西藏……他更相信这支归建二野以来一直跟随他的老部队。他下了决心，便仰起头，目光直视刘邓：“我还是想带十八军担负进藏任务。”

刘伯承以目光征询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转而问张国华：“你觉得有没有把握？”

“问题不大。”

邓小平看了一下刘伯承，刘伯承笑而不答。邓小平知道他也同意，指示张国华：“那就这样定了。我们马上报告中央。你还有什么困难吗？”

“现在还没有想到。”

刘伯承叮嘱他：“有困难要说话。全二野都会支援你们。”

张国华走后，刘邓马上给远方的毛泽东发电，毛泽东也立即复电：完全同意刘邓（1950年）1月7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1月15日，刘邓要接见十八军军师干部，四天前，刘伯承先期接见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副政委王其梅等军的领导。“小平同志有个重要会议，让我先问同志们好！”刘伯承操着一口四川话，依次握手。张国华第一个站在他的面前。刘伯承扶了扶眼镜：“你没得四十岁吧？”

张国华挺起的胸脯往回收了一下：“三十六啦！”

刘伯承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嘛，很年轻嘛。三十六岁属兔的，兔子灵活，跑跳都很行，特别是爬山。”

张国华笑了：“已经开始走下山路罗。”

“下山？还早得很呢。”他又握着谭冠三的手说，“这里除了我和你，他们几个都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嘛。朝气蓬勃，手脚灵活，又都是红军时期的，准备叫你们挑重担子。”

“请司令员下命令吧！”军领导们异口同声他说。

刘伯承敛起笑容：“这次是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十八军担任解放西藏的任务。”

张、谭等都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刘伯承点点头：“好，很好！共产党员就要有这股子劲头，这就叫做党性。”

15日，刘伯承再次用他那幽默的四川话说道：“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

邓小平又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进一步阐述。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如唐朝和番，以后用兵均未成。宗教在西藏有相当大的力量。达赖是其中有力量的，但其力量不会很大，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必须解决补给之公路。我需相当兵力，但力量过大，则引起以后问题不好解决，兵力确定人藏三万人，力求精干，补给线上一万，加强兵站线。为什么要十八军干？邓小平望了一眼张国华，笑了：“主要是干部问题，你们是地主大户嘛！”

张国华：这个刘结挺太坏了，他为什么合这么坏

谭冠三：他不去？我把他捆到西藏……

去西藏的消息传开，刚从战场转入和平的十八军像开了锅，逃兵数量猛增。严重的一个班只剩下班长、副班长，急得连长、指导员夜里不敢睡，轮流把门。营团领导天天晚上追问当天逃兵数。对于拍着胸膛无条件接下任务的高级将领来说，更是有苦难言：这支打日本、打老蒋的光荣部队，即使在挺进大别山那样艰苦、那样残酷的环境中也没有发生过逃兵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这支队伍变了！

最急的当然是军长张国华了。

他本来就年轻气盛，打起仗来连后退都是少的，如今看见有人开溜，气得虎眼圆睁，嘟起薄薄的嘴唇，双手打着膝盖骨，恨得直跺脚：“这些兵为什么要这样坏？去，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

下面的干部就等军长这句话。所以命令一出，“抓兵队”四面出击，一会儿就绑回来一串逃兵。憋了一肚子气的连干部有的就抽下了皮带，先是噼里啪啦敲桌子，没有效果就去逃兵后背、屁股上找突破点……

最使张国华痛心的是干部队伍里也出现了“逃兵”。本来他最欣赏的原十八军炮兵营政委、后提升为五十二师一五四团副政委的刘结挺（即文革中在全国都留有恶名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第一个向他和谭政委提出身体不好，不愿进藏。张国华拿信的手都抖起来了。眼睛闪闪地像烧着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去解恨了。说实在的，本来他很喜欢刘结挺那副文静样子，又有知识，聪明能干。他已经准备要提升他当政委了，并已兼任了宜宾县委代书记，张国华气得话说得不知是问还是答：“这刘结挺太坏了，想不到他这样！他为什么会这样坏！我这一辈子不想再见到他！”

“不！”谭冠三也气得七窍生烟，接过话头，“他不去就这么便宜他？给我把他捆来！不去？我把他捆到西藏！我到哪儿，就叫马把他拖到哪儿！”老将发火了。说他老，其实他也不过四十过二，也是正当气盛。

刘结挺是给捆回来了。可张国华思考再三，觉得进藏是件光荣的事，不

能让这些人败坏十八军的名声，规定凡是逃兵一律不准去藏，就地转退地方。新生的共和国和军队的历史，把“荣誉”两个字浇铸得十分鲜亮，大数人还是把荣誉看得比生命重要。另外地方也特别看重历史，“思想有问题的人”是不受欢迎的。今后翻身都难。于是开过小差的人急了，生怕被裁减，给自己或后代留下抹不掉的污点。所以表决心，写血书的人纷至沓来，干部们又转过来做安心留在地方的工作……逃兵还是一个不要。

毕竟以事业为重的人多。像参谋长李觉就是在得知部队要进藏后主动放弃大城市生活，向老首长刘邓提出归队的；副政委王其梅幽默地提出，要做共产党在西藏的“一世祖”。

邓小平：不懂藏话，一到西藏就成了聋子

张国华：老婆问题，有句老话叫“自古美人爱英雄”

动员会的时候，人们好奇地发现台上的张军长怀里坐着不满三岁的小女孩。她是张国华的第一个孩子难难。张国华与樊近真 1946 年 6 月结婚，三十三岁才得女，自然视为掌上明珠。孩子天真可爱，也不怕人，见爸爸在台上讲话，她戴着个扇形小帽，站起来向台下敬礼，翘着嘴说：“叔叔，阿姨，我给你们唱支歌！”说着就依依呀呀唱起来。台下的人都欢喜地鼓起掌。此刻张国华把孩子带进会场，一方面是疼爱，另一方面也有“背女出征”的味道。人员坐齐后，他把孩子交给旁人，站起来继续讲话：

“过去我们能协同兄弟部队解放一个省会，消灭几万敌人，就兴高采烈，觉得很了不起。而现在进军西藏是以我们十八军为主，不只是解放一个省会，而是解放全西藏，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还要由我们到那里去建党，开创党的工作，这还不值得我们自豪吗？”

台下的军人们鸦雀无声。军长的话很有些鼓动性。

“你把西藏看成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却从不嫌它荒凉，长期以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也在积极插手。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一省不保，四省不安，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疆会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

台下出现一些轻轻的骚乱，谁能说这番道理不对呢？可多数人更担心的是切身的家庭、婚姻、对象……军长的话锋一转，紧锣密鼓地敲到了人们心坎：

“个人老婆问题的解决，有句老话，叫做‘自古美人爱英雄’，我们去完成解放西藏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可以说大家都是英雄。我们只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精神愉快地进藏，找个老婆是不成问题的；不管是农村或城市的姑娘都会爱你们的。有人提出能不能和藏族姑娘结婚？大家都知道，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有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与西藏王松赞于布和赞普尺带珠丹结了婚，现在我们到了西藏，也可以同藏族姑娘结婚，而且藏族姑娘都非常勤劳和善良，也很漂亮。结婚条件，过去，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应当严一点，一两年后，我们国家实行薪金制，条件就会放宽，就可以允许干部带家属，战士婚姻问题，随着义务兵役制，也就很好解决。”

不知是谁起的头，会场里鼓起掌，掌声越来越热烈。许多紧绷的脸随之舒展。张国华用手势压了压掌声，脸色又严肃起来：

“必须看到，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同于红军长征，那时我们是作战略转

移，蒋介石派兵在前面堵截，后面追击，天上飞机跟着轰炸。而这次有全国人民支援，还有苏联人民的支援和帮助，比长征时的条件好上千百倍；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优越，我们的装备和供应将是建军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我知道还有一些老一点的同志不想去，认为胸前已经有了两三枚光荣纪念章了，就想躺在光荣上面睡大觉，不想再前进了，这是不对的。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所有的人思想都要通，要高高兴兴地去西藏！”

邓小平认为张国华这次讲得好，愉快地给十八军将士题了词：接受与完成党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尚的光荣！

题完词，邓小平让张国华坐下来，告诉他，十八军入藏部队以三万人为限。一切不健全人员应清理下来交川南接管。非战斗组织必须减少，或根本不要，“有些组织比如文工团，可以在打开局面之后再去做，以免增加不必要的吃饭人数。还有，听说你们要给每个师配个军乐队，我看不必。”

张国华急得从椅子上站起来，请求道：“政委，我还是希望保留这两支队伍。”

“根据现有的材料，你们每一战士的背负量将要达四十斤以上，到六十斤。光军械科所需的各种皮件，即达四万余斤，需要二百多匹牲口驮运，这怎么行！再加上那些吹吹打打的，运输困难太大，你回去再考虑考虑……”

临走时，邓小平又问：“你对西藏了解得怎样？”

张国华抽空已经看了不少有关西藏的材料，却回答说：“印象深的还是唐僧西天取经，过火焰山，通天河……”

邓小平叮嘱张国华：“你必须立即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要调查西藏的情况。同时各级都要动员起来学会几句藏话，以便应酬宣传。要沟通和藏民的语言，便于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便于开展工作。不懂藏话，一到西藏你就成了聋子，就要吃亏。”

回到军部，张国华和其他领导研究开来。秘书打来电话：“军长，难难病了。高烧不退，您是不是回来看一看？”

张国华怔了一下问：“什么病？”

“可能是肺炎。又咳又喘。嘴里不停地叫爸爸……”

张国华心口一热：“我抽不出身。你安慰她两句。”张国华挂上电话，又钻进烟雾缭绕的会议室，继续人员安排的话题。他当过文工团的政委，深知这支队伍在战争中的作用，所以坚持军乐队可以不要，但文工团减不得，更不能没有。他主张给刘邓贺打报告，申明理由。刘邓贺最后同意了他的要求，保留十八军的文工团以及各师的文工队。他们又研究起其他事项。警卫员慌慌张张来找，说难难情况不好，叫他快去。

张国华火了：“三万多人要进藏，百事都要有个谱，在这动辄千军万马之际我这个军长能离开吗！”警卫员憋着嘴，急急忙忙又往医院赶。

会议继续进行。晚上张国华稍得一点空，就催车去医院看一眼，告诉孩子就要去西藏去看火焰山，找孙悟空……走进医院门口时，他就发现气氛不对，有些熟悉的医生也躲着他。他快步往病房里走。当他站在病床前，他似被五雷轰顶，惊呆了！这种痛苦是那样锐利，又那样复杂，那样沉重。难难，这个总是睁着好奇亮眸的孩子，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手脚冰凉……

樊近真坐在一旁，已经泣不成声。她是山西平定人，1936年在平定师范学校时参加革命，她怀了难难后还接受组织的派遣，去开封执行打进国民党银行的任务。她化装成农妇，路过一个村庄时被敌包围，正好临产，只好躲

在老乡的牲口棚里分娩。那情景她后来在日记里描绘过：“瞎灯灭火，冷风习习，举目无亲，一边是驴的叫声，一边是我疼痛欲绝的呻吟声，真是难呀！”不久敌人进村了，她用被子把孩子一裹，放在床上。进来的敌人以为被子里裹着好东西，伸出刺刀就刺。樊近真急得心都跳到口里，又不好喊叫。房东大娘也急得扑腾一下跪下哭喊：“里面是我的孙子呀！”敌人总算走了，两人急忙打开包被，好在刺刀只刺破旧被子，没伤着孩子。军营里的人们都爱叫她“南南”。孩子死了，她呜咽着告诉别人：“其实她的名字是小难，我起的。她爷爷觉得难字不吉利，说是我们是南方人，就叫小南吧。我之所以给她起这难字，是要让孩子记住生她带她之难，记住共产党人度过的那些艰难岁月……”

她在川西银行当业务科长，又怀了孩子，本不想去西藏。张国华动员她：“一块去吧。把小军（一岁多的儿子）留下，怀着的带上。”她还没下定决心，正值此时，西南财委书记刘岱峰决定去西藏筹建银行，她只好服从组织决定，全身心地投入了进藏的准备工作中，没日没夜地开会，根本顾不上孩子难难。

张国华强忍着，咽下苦涩的泪水。他能说什么，只好把这作为进藏的第一个牺牲，只好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来抵住痛苦的回想。唯一指望的是更多的人能振作起来，工作能顺利一点。

1950年2月3日，由王其梅副政委、李觉参谋长率领的进藏先遣部队出发了。张国华把他们送出去很远，再次提醒部队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特别要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护寺庙，不住寺庙，不住藏民家中的经堂，即使风雨交加，冰雹乱舞，也不要进寺庙干扰喇嘛诵经，最多到寺庙的房檐下暂避一下……”

稍后，张国华、谭冠三率领十八军主力部队开拔，踏上了进军西藏艰险路途。

张国华：人不吃饭要饿死，这简单的真理竟如此灵验

毛泽东：你告诉他们，进藏对个人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

部队越往前进，运输和补给越困难。在高原缺氧的山路上，有的人走着走着就一头倒了下去，不再醒来。有的军马眼看着口喷白沫，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片刻之间就断了气。7月初，十八军终于抵达稍微富裕一些的甘孜。在甘孜城外约35里的地方，有一座远近闻名的白利寺，坐落在一片密林之中。张国华等马上去寺里拜望格达活佛。

格达活佛穿上崭新的黄袈裟出寺远迎。一直把他们让到经堂里，立即派人去张罗粮草。这位自称跟朱德是好兄弟的活佛，听说张国华长征时也到过此地，越加活跃，朗朗说道：“你们这些无神论者又来了，可是我这个有神论者要热烈欢迎你们，拥护你们。”张国华抬头一看，活佛在抗战时期派人到青海买的一张《八路军山西奋战图》还一直挂在经堂里。他从佛龕里找出多年珍藏的红军布告、标语等物，说起那段民主生活，说着说着放声哭了起来：“毛主席再不派队伍来，我们西藏民族快给毁灭了。”说罢用袈裟拭泪，连连向东方合掌念经祷告。

张国华向格达活佛说了政府已多次通知拉萨当局派代表来京谈判，却被置之不理。格达活佛自告奋勇，愿亲往拉萨劝和。于是，格达活佛一行打着

红旗，一路宣传，到达昌都时，被英国特务福特设下圈套，在饭里下了毒，格达中毒后腹痛不止，口吐黄水，五孔出血，格达死后，福特等人又将其尸体焚毁，并将其随行人员押送去拉萨。

紧接着又一个挑战来了。当张国华的部队行进到康北竹庆地区，周围的喇嘛寺忽然响起了钟声，一群持枪骑马的人簇拥着一个穿红袍戴狐皮帽的，奔上山岗，吹起法螺，顿时不明真相的喇嘛群众向解放军开枪射击。张国华叫部队停止前进，带上翻译去和拦路的人谈话，总算阻止了枪击。到了晚上，那一伙人卷土重来。张国华气坏了，一拍桌子：“把那个为首的家伙给我抓来！”

战士们一会儿就捉来一个穿红袈裟的指挥官。一审问，这个一身上层喇嘛打扮的人却是个汉人——陈立夫的亲信。他供认：1949年冬天，就有一些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拉萨当局的便衣武装护卫之下，从大风大雪里跌跌撞撞地过金沙江来了。他们利用喇嘛寺的钟声法鼓煽动群众，要截断解放军的进藏道路。现在西藏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直接策划下，将原有的14个代本（相当于小团），扩充为17个代本，从外国运进大批军火、美国电台，请来英国教官，调动、训练各地藏军，并下令各寺院念经诅咒解放军。不但关闭了和谈之门，又企图以金沙江为天险，要十八军就此止步。

十八军的将领们都认为，不打难以前进了。西南局根据张国华的报告，向中央请示实施昌都战役。毛泽东在三天后电告：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你们于占领昌都后只留3000人在那里过冬，今年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在西藏方面看来，可能觉得是我们向他们表示好意的一项措施。毛泽东细致地查问着一切有关事宜：你们16000人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其中3000人须有过冬粮食，准备撤回的主力13000人至少须有往返期间3个月粮食，部队及牦牛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仍望查告……

8月28日，张国华率领十八军主力第一批人员380余人，携带先遣支队的被装及粮食，从新津出发。他的行军生活变得非常简单，一杯开水，几块压缩干粮，就是一餐。商店的柜台上也能睡一觉。遇到寺庙他肯定要爬上山坡，进里访问，或者用刚学会的几句藏话和群众交谈……

路上，官兵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向张国华叫苦。张国华也不忍心看着部下挨饿，咬了咬牙，宣布每人每天增加二两粮食。可西南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又犯了愁，他哪里支得出这二两粮食，不得已，大家只好勒紧肚皮，少吃二两。到拉萨的时候，大军只剩三天的口粮了。张国华仰天长叹：“怪不得刘邓首长老说人不吃饭要饿死，这简单的真理竟如此灵验！”

昌都是顺利打下来了。这时满脸倦容的张国华和他的战友们才舒了一口气，张国华才说了句轻松点的话：“同志哥呀，这下我们才敢向中央、毛主席、刘邓首长报告说，首长们，请放心吧！”张国华舔着干裂的嘴唇，又说：“这七天七夜，吃不好睡不好，熬过来，全靠这个！”他举起手里的香烟比划着。也就在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得了严重的高血压病。

张国华是5月5日从康藏前线赶赴北京的。作为人民政府的一名代表，参与同西藏代表的谈判。5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协议》签订情况后，把目光转向张国华，按他平常的习惯，和一个不熟悉的人交谈时总要先问问对方的籍贯、经历，当得知张国华是江西人，曾在袁文才、王佐

的部队工作过三个月左右，眼神格外明亮起来。（以在后的多次接见中毛泽东有时开玩笑地叫他“井冈山”。）但毛泽东没有时间去回忆那段历史，他需要更多地面对现实：“进藏部队的情况怎样？”

张国华概括他讲了几句：“大部分同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每个战士负重七八十斤，有的党员和班长负重九十斤，连续十多天以每日一百公里的速度急行军。断粮了就忍着饥饿坚持……当然也有少数同志嫌进藏苦，把进藏看成是‘进葬’……”有些话他不好学，诸如“张军长执行上级指示太坚决，我们跟着倒霉”、“毛主席真小气，要个穷山恶水的破西藏干什么”……毛泽东也能感觉得到在全国胜利之时奔赴艰难容易出现的思想问题，深深地吸了口烟，用夹着烟头的手指朝张国华点了点：“你告诉他们，进藏对个人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但你是共产党员，党要你去，你去不去？！”

毛泽东看着将军们，见他们记下了自己说的几点，表情由严肃慢慢转为微笑，请他们谈谈困难。张国华强调筑路的重要，毛泽东点点头：“要筑路与生产并重。”毛泽东要求部队很快进军拉萨，为全部实行《十七条协议》而努力。

当毛泽东说完“你们去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时，将军们知道该是接见结束了，纷纷站了起来。

鲁康娃：过去满清有个人藏大臣也姓张
达赖喇嘛：汉官一路上辛苦了

1951年10月，张国华带着军直及一五四团到达拉萨时，依然是黑云压城欲摧的架势。到处都是谣言，说“解放军来了，大喇嘛杀死，小喇嘛丢到河里淹死。”“布达拉宫铜佛流泪了。”站在高楼台上的反动分子朝欢迎人群和入城队伍投石子、吐口水，咒骂开道的腰鼓队是“魔鬼”。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把张国华的部队全部安排在拉萨河北岸沙滩上，张国华、谭冠三等军领导住在宇妥院内。藏军在张国华部队周围三面安设军营，暗暗地将十八军主力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张国华对此哂笑一下，只是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抓紧时间休息。他自己去找噶厦的实际执政者藏王鲁康娃、洛康扎西，要他们卖粮食给解放军。鲁康娃鼻子一哼，扭过身去说：“过去满清有个入藏大臣也姓张（指张荫堂），只在拉萨设了一个衙门，没有带什么兵，你何必带这么多军队！”

张国华淡淡一笑：“天下姓张的人多，可姓张跟姓张的不一样。我们是来执行十七条的，希望你能配合，首先解决粮食问题。”

鲁康娃捻动着佛珠，讥笑道：“打败仗虽然难受，饿肚子比打败仗更难受吧？！”

张国华和谭冠三交换了一下目光，问：“你看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没有？”

鲁康娃耸耸肩环顾左右的贵族官员，眼里的凶光一闪，不作

“协议是双方代表签了字的，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你们应该协助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可你们采取的是什么行动？”张国华说着，要随行人把十七条协议藏文本摆到鲁康娃面前。

鲁康娃要拿又没拿，像盯着一团火，嘴里嘀嘀咕咕：“阿沛（阿旺晋美）

去北京，并未授权谈军事，十七条协议很突然……老百姓也不满意，应该修改……”当他的目光掠过张的随行人员，便有了话头，指着张国华突然狂叫起来：“姓张的，你好大胆，把军队带进来啦！”

按张国华的脾气早该发作了，可他只好忍着，耐心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末尾还是强调了一点：反对祖国统一的结果，将会和军事较量一样，在政治上再遭失败。希望噶厦合作，西藏地方政府也要悬挂国旗……

鲁康娃不肯让步，面色阴沉：“西藏是一个独立的佛国，不必悬挂中国国旗，挂上了，再拿下来也不好看！”

回到营地的张国华，气得心口“咚咚”直跳。本来他已经学会的抓糌粑，喝酥油茶，啃生牛肉，可饭端上来的时候，他难以下咽。一则顿顿是羊肉，膻味极大，总吃当然腻。二则有的连队连一天两顿稀饭都喝上不。“不行，看来我得去见达赖喇嘛！”

张国华和中央代表张经武商量，决定10月30日以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给达赖送礼为名，正式拜会达赖喇嘛，首先解决粮食问题。

噶厦政府却想借此杀杀张国华的威风。当张国华派出的代表徐淡庐和平措旺阶前去商谈拜会细节时，噶厦政府提出，张国华拜会达赖时，必须按照传统礼节，行磕头礼，即所谓朝拜。徐淡庐和平措旺阶当然不同意，说双方的风俗习惯都要照顾，互相尊重，解放军是不兴叩头这一套的，但一定会尊重达赖。噶厦政府想到张国华那一路拦不住的精兵强将，对拜会仪式只好作了让步。

他两人回来一说，张国华思索了一会儿，作了布置，于第二天上午9时半，带着庞大的送礼队伍，浩浩荡荡来到大昭寺前面。张国华率领徐淡庐、陈竞波、乐于泓和平措旺阶，和抬着送给达赖的十三件礼物的队伍走在前面，十八军的军乐队鼓号齐奏，文工团员扭着秧歌敲着腰鼓，寺前如过节一般热闹。为了不失礼节，张国华带领队伍按藏族人转经的方向绕大昭寺走了一圈，然后朝罗布林卡走去。

罗布林卡是达赖喇嘛的夏宫。张国华把礼物送给站在宝座前的达赖，然后开始宗教仪式。达赖重新登上宝座，张国华将噶厦事先准备好的宝塔、佛经、哈达等五件东西一一献上，徐淡庐等人也将哈达献给达赖。张国华目光转向平措旺阶。平措旺阶虽然参加了政府工作，张国华还是让他穿上藏族服装，并且给他做了工作，要他仍给达赖磕头。在这之前，邓小平曾有过细致的交待，到拉萨之后，会见达赖喇嘛时，如果他提摸顶，可以不受我们军队纪律的约束，让他摸顶。当平措旺阶上前磕完头，达赖又伸出手来给他摸顶。年轻的达赖受礼之后，显得非常激动，向司仪人员轻声说了一句藏语。司仪马上用汉语大声传达达赖的问候：“汉官一路上辛苦了！”

这个仪式结束后，藏方献上饭、酥油茶、面卷之类，品尝之后，其他人退下，只留张国华和平措旺阶，跟达赖进入他的卧室，稍坐片刻，又随达赖走上观戏阁。阁前装着玻璃，有一层薄纱遮住，十八军的文工团便在台前开始演出。张国华用余光看了一眼达赖，只见他手持望远镜，急急地调着焦距。看来，达赖被这新奇的演出吸引住了。

回到住处，张经武问起今天拜会，张国华把帽子往桌上一掬，喜不自胜：“文工团算是带对了，达赖喇嘛虽然是垂帘看戏，看得是目不转睛。嘿！原来他这么年轻，看来也有为呀！”

张经武点点头：“我看也是。他是个纯朴的青年。你看粮食的事有问题

吗？”

张国华扬起巴掌对着张经武手心击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丝诡秘的笑。

第二天，阿沛高兴地告诉大家，达赖已下令要十三个宗（县）各筹粮一万斗，另外布达拉宫仓库还能拿出五千斗……

张国华的笑脸还没持续两天，又挂上了乌云。各宗受到噶厦亲帝分裂分子的阻挠，并没把粮食交付解放军，布达拉宫粮仓拿来的粮食，一化验，全部霉变，根本无法食用。更令人不安的是，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不但不支持解放军，还搞起一个由商人和无业游民、流氓为骨干的所谓西藏人民会议，制造骚乱，形势进一步恶化……

张经武：我们再让就要掉下去了

张国华：我们与他们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私仇

1952年3月传统的大法会期间，几个打着“人民议会”旗号的人向布达拉宫递交了一份所谓的《西藏人民请愿书》，要求修改十七条，撤走解放军。4月1日上午，几个噶伦（噶厦成员）又带着三名伪人民议会代表前往张经武代表驻地，态度强硬地递交了这份“请愿书”。当晚，千余藏军和武装喇嘛突然包围了西藏工委和张经武住所，墙上、屋顶上都架起了机关枪，枪口直对着解放军。此前，鲁康娃、洛桑扎西已私自下令将日喀则的炮兵代本调入拉萨，反动分子还阴谋夺取布达拉宫内的藏军军火库……市民见状纷纷囤粮积水，商店关门，人心惶惶。

已经担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心如火焚，有时忍不住也要发脾气。出门寻不到司机，他骂一声“混蛋”，自己踩着油门就要把车开走……北京的毛泽东和西南局的刘邓贺关注这里发生的一切，一日数电询问情况。毛泽东下了决心：“必须将反动派痛惩一下，否则，西藏政局不能稳定，爱国分子不能抬头；生产、贸易、医药、修路、统战等各项工作均不能展开，我们将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对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挑衅，西藏工委要领导爱国僧侣人民进行有理有利的斗争，做好工作。”

张经武、张国华得到指示，商量好对策。他们把葛伦们召集来，张经武背靠着窗户，指着楼下说：“我们再让就要掉下去了，二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干了大量坏事，我们已经掌握了可靠证据，现在我们已无法与二司曹合作相处了，请把我的话向达赖喇嘛传达，请他做出处理吧！”

噶伦们互相观望，为二司曹开脱：“他们不会讲话，年纪太老，脑筋陈旧，说话方式不好，还请张代表原谅……”

张国华板着面孔，在一片沉静中用威严的声调说：“我们与他们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私仇，问题是亲帝国主义，还是拥护祖国？是执行协议，还是组织武装叛乱、破坏协议？对于你们内部无论什么问题，我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原则是非必须弄清！”

噶伦们只好表示同意撤销二司曹的职务。

张经武决定亲自上布达拉宫，会见达赖。午夜，将军们还在设想着会见的各种可能。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中，上布达拉宫无疑是凶险莫测的。张国华和其他领导都认为，如果他们加害中央代表，与中央彻底决裂，我们就有充分理由讨伐他们。但可能性不大。如果他们把中央代表软禁起来，迫使我们让步，要解放军撤出西藏，我们将据理力争。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如果

他们遵从中央意见，严肃处理伪人民议会，骚乱就会和平解决。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将军们都想防止第一种、准备第二种、争取第三种情况的出现。

4月8日，张国华将张经武送出门口，两人默默地重重地握着手，张经武宽慰张国华：“量他们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我杀害，我估计软禁的可能性大，如果我一时回不来，我将在布达拉宫的宫顶，和达赖一同看同志们自卫反击的情景。我预祝同志们反击作战胜利。你们胜利越快，我平安返回的可能性就越大。”张国华点点头，立即返回作战室。他办事细致周到，并作了最坏的打算。命令军区机关和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只要情况有变，能做到立即出击。

高耸的布达拉宫内外重兵布防，从山上到山下的长长的阶梯两侧，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藏兵。张经武只带了两个警卫员和一名藏语翻译，大步从容地迎着几百支枪口，一步一步地登上了布达拉宫……

军区作战室紧张到了极点。除了张国华，其他领导也都在座。没有人高声说话，只有话务员在轻声传讯号，会抽烟的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张司令员的眼圈被烟熏得刺痛，每隔一会儿，就叫参谋再出去看看。

李觉参谋长已让作战参谋杨一真带一架高倍望远镜和一支信号枪到军区西面广场小河边观察布达拉宫情况。如果张经武发生意外，跟随他的保卫干事一定会从布达拉宫顶上朝南的中间窗口里伸出一面红旗或发射三发信号弹，再由杨一真发三发信号弹，通知部队出击。

空气石块似的僵硬，将军们的呼吸都艰难异样。刚看完表，又去看表……

突然一声“报告”，打破了寂静。杨一真急切地跨进门，报告说：“张代表从布达拉宫出来啦！”

“确切吗？”

“是我亲眼所见，他已经骑上马朝山下走了。”

张国华大出一口气，朝谭冠三会意一笑，布置完部队继续保持警惕后，直起腰，朝副手们招呼着：“走，出去透透新鲜空气，可把我憋死了！”

邓小平：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

张国华：革命的两手，我们加紧准备

1955年，张国华和张经武、谭冠三、阿沛·阿旺晋美都被授予中将军衔。部队实行军衔制以后，进藏部队的思想工作也多了起来。原先毛泽东曾设想“三年一换”，许多人咬着牙坚持着，可现在五年都过去了，并没有换防的迹象，一些人便沉不住气了，想借精简机构、实行义务兵役制回内地，也有的把希望寄托在修通公路好回家……为此西藏工委做了许多工作。相比之下，许多战士爱听张国华的说法，他说的似乎更能服人：“长期建藏思想是否树立，并不单纯表现在来西藏干十年、二十年、或死在西藏的时限上，甚至对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地想都不想，对自己生长的家乡想也不想，对父母、老婆、孩子等想也不想，如果是这样要求，那就是对长期建藏的莫大误解。因为这样一来，就忘记了西藏是整个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一部分，没有把落后的西藏变成祖国的西伯利亚的决心和雄心……”有人觉得这种说法对部队太迁就。张国华坚持：“在西藏，吃苦甚至献身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必须从部队的现有觉悟水平出发。当前只要求在政治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人还是觉得这种调子太低。张国华就一遍遍解释：“总不能说

西藏不苦吧？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有的属于长期建藏的问题，有的不是，必须具体分析，分别解决，不能笼统说成是长期建藏思想不通，也不能乱提刺激性口号。有些同志向往内地，怀念家乡，怀念亲人，只要不影响工作，不必一概加以反对。”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达赖任主任，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张国华司令员任第二副主任。中央派了以陈毅为团长的代表团，在西藏，尤其在上层做了大量工作，西藏工作出现了新局面。后来，张经武调回中央工作，张国华在北京治病，工委在指导思想产生了急躁冒进情绪，大量宣传改革，摊子铺得过大，以至引起西藏上层的恐慌和反对，群众也有疑虑，西藏形势又逐步严峻起来。

已经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刚刚搬进中南海的邓小平，召见张国华。

张国华报告，西藏工委一方面从一些苦大仇深的农奴之中物色干部苗子就地锻炼培养，一方面在陕西的咸阳成立了西藏公学，另一方面保送优秀藏族青年到成都、北京民族学院学习……

邓小平把一份报告丢到茶几上，使劲地抽着烟，表情严肃：“主持工作的同志大量地发展党员，甚至不惜降低标准，这样必然刺激上层，昌都一线已经有叛乱发生。中央已令其马上停止，张经武仍回西藏主持工作，达赖对他有些意见，毛主席已经给达赖写了信，你回去后要继续做上层的工作。”

张国华皱了皱眉头：“对做上层的统战工作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见，说统战统战，送礼吃饭，下层不见，上层乱转；说我们的阶级立场有问题。”

“拿过去战场打仗的一套来对待民族问题，自然不行。我已经对经武同志说过，西藏今后六年不改是肯定的，西藏的人员、机构、事业、财政要大下马，下马越快越好。”邓小平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过些时候工委要整风，把所有的问题统统摆开，大胆地放，硬着头皮听两个礼拜，自己要引火烧身，都搞自我批评。”

辞别时，邓小平再次强调：“做上层工作就是要忍辱负重，达赖、班禅来京时，我和习仲勋同志都是亲自检查他们的住处，我跟陪同的徐淡庐说，两处如果有一个苍蝇飞进来，拿你是问，不是因为我是十八军的老上级才这样说，不管你过去是哪一方的和尚都要念统战这本经。”

回到西藏的张国华公开承认部队发生的问题，主要责任在军区。他号召大家在即将开始的整风中，积极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军区有决心通过整风纠正错误，改进工作。“六年不改”的方针实施了，机构、人员和财政下马了，多数上层人士对政策的疑虑消除了。可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却利用收缩之机，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想用扩大叛乱的方式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永远维持其封建农奴统治。

1957年5月20日，拉萨的伪人民议会，一变而成为反革命武装组织“曲细岗珠”即“四水六岗”，公然喊出“永远不改”的口号。1958年4月20日，“四水六岗”把邻近省区和昌都窜来的叛乱分子5000余人统一组织起来，与藏军、三大寺秘密签订了同盟书。6月15日，叛乱分子在山南哲古宗建立了武装叛乱根据地。毛泽东密切注意着事态的发展，在6月24日的一件报告中批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面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问。”

进入7月，“四水六岗”又组织了“卫教军”，发出“反对共产党，保卫宗教，西藏独立”等口号。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又从粮草、枪炮和人员上

予以支持，使得西藏形势如箭在弓上，一触即发。

7月14日，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应对噶伦们表明严正立场，告诉他们：噶厦对西藏地区的叛乱分子和从（金沙）江东逃入西藏地区的叛乱分子采取纵容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要实行武装平息叛乱。邓小平分析着事态的另一面，指出：“西藏当局万变不离其宗。现在不要发动群众，只搞整顿队伍，交朋友和学习。在社会上也不要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西康叛乱武装来西藏，除噶厦自己外，我们不派人去打。”张国华指挥部队尽量收缩到交通线和点上，有的调回内地。但由于外国反动势力的支持，噶厦的谋划，西藏境内的叛乱不断升级。叛军已经把地道挖到张国华爱人工作的银行地下，好在他们事先已得到准确情报，人员和资金已经安全转移。7月18日，张经武、张国华会见达赖，说明中央的立场。达赖没有更多的表示，张经武有些着急，但说得很诚恳，“你对我个人可以不喜欢，但中央不管派谁来，武装叛乱都会带来严重后果！”

张国华回北京汇报。8月9日，邓小平把张国华叫到中南海，再次说明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张国华询问最重要的原则：“总书记，你看打与不打的界限……”

邓小平似早有考虑：“叛匪威胁党政机关和主要交通就打，有把握就打，没有把握就不打。”

“您是说打则必胜，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

“对，双管齐下，先把交通要道保住。”

“我们是否仍提‘六年不改’？”

邓小平颌首，补充了一句：“六年不改，但出了乱子由他们负责！”

十天之后，邓小平再次召见要返回西藏的张国华和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邓小平询问过回藏后的军事部署，交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如威胁交通有把握就打。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不要轻易把部队拿上去。”邓小平掐灭了烟，朝前面空空的地方看着，继续说，“还有四年时间，长得很。收缩对了，现在主动。小据点加强一点，提高警惕，生产时把枪放到旁边。”

张国华说：“有些同志对收的政策还有误解，认为就是我们一收再收，一忍再忍，才让叛匪得寸进尺，气焰嚣张。”

“收是对头的。六年不改，收缩方针没有变化。”

“西藏上层可能会有些变化。”

“他们统治者要变是另一回事，与我无关。他们要变，我们就发动群众。总之，和平改革的方针是不会变的，但完全用和平的方法是不会的，我们要做准备。”

张国华和邓少东理解这个政策：“革命的两手，我们加紧准备。”

1959年3月20日凌晨3点45分，拉萨的叛乱指挥部自视胜利在握，下达了向西藏军区、中央西藏工委、自治区筹委会发起全面进攻的命令。几千名叛乱分子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分成三路向目标冲了上来……张国华向部队传达中央的作战命令：“全面反击，坚决平息叛乱，彻底消灭叛军武装！”他同时关照部队要注意保障上层爱国人士的安全。为了确保胜利，中央军委增派五四军一三、一三四师和兰州军区十一师等部队入藏平叛。

张国华在北京治病，昼夜关注着西藏的战事，不时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

正在武汉的毛泽东，也同意军委增调一三四师及其他配属部队火速汇于格尔木，并令张国华立即赶到格尔木，率一三四师等增援部队从藏北入藏，进行大迂回包围拉萨，令谭冠三牵制住拉萨之敌，严禁乱出击，以免打草惊蛇。

张国华接电，二话没说，揣上那瓶正在吃的治高血压的药片，从北京乘飞机飞往格尔木，准备实施围歼计划。

当收到军委重申作战方针的复电时，平叛部队对拉萨制高点药王山的炮火袭击已经开始，仅一个多小时，便攻占了药王山，切断了市区和罗布林卡叛乱武装的联系，打乱了敌人的统一指挥。19时30分，又迅速攻占了罗布林卡的指挥中心。21日，机动部队转入市区，逐个歼灭了盘踞在恩珠仓宅、朗加多吉宅、木鹿寺、小昭寺等据点的叛乱武装。22日，大昭寺叛军经政治争取而投降，布达拉宫之敌也打出了白旗。3月23日，军区宣布撤销朗子辖（市政府），成立了拉萨军管委员会，拉萨市的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还在武汉的毛泽东召见张经武、张国华。当他俩来到东湖的石屋别墅时，毛泽东穿着灰色呢制服，在三面窗户俯临湖水的大房间，走过来兴致勃勃地和他们握手。虽然这一年因中苏关系和党内一些不同意见，使他精神一直不很愉快，但对贯彻他意图并打了胜仗的下属，依然表现出他惯有的幽默风度。张国华和张经武坐在毛泽东对面的小桌两旁，毛泽东突然指着张经武问：“你给达赖磕头了没有？”

张经武嘴一撇：“我是代表中央会见他的，是中央代表，给他磕头？”

毛泽东咯咯笑出声：“为了全西藏人民的解放，你给他磕个头有什么关系？你不磕头，好，他跑了，想磕也磕不成，人家这也是‘先礼后兵’，菩萨得罪不起哟！”

毛泽东的玩笑使气氛轻松了许多。他的目光转向张国华：“你给军委的电报我看了，许多意见很好，有预见。在西藏的部队是一支能吃苦会打仗的好部队，有不怕死的精神。”毛泽东的面前飘着淡淡的烟缕，他用手赶了赶，把思路转向有关生死的问题：“前几天，我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和她的丈夫来看我，我同他们说，我已经66岁了，我可能会病死，也可能乘飞机遇难，或是被蒋的某些特务分子暗杀，总之，怕死是没有用的。怕死不能制止死亡，只能导致死亡。我并不希望死，我希望能亲眼看到帝国主义的末日。但是，如果我不得不死，我也不害怕。”

两位将军对这番谈话有些局促不安。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回平叛，询问部队伤亡和目前布防情况，张国华一一回答。毛泽东阐述平叛之后的总方针：“我早就说过，西藏的事情不能急，我们不急，达赖也不能急。叛了也好，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就缓改嘛。现在已经叛乱，就只好边平边改。总的方针是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少数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其结果带来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比较彻底的解放。叛乱，对于藏族是不光荣的坏事，但是中央正确处理的结果，对于藏族人民，却使坏事变成了好事。”

张国华飞回拉萨后，具体指挥西藏地区的平叛作战，于4月4日决定发起山南战役。军区以四个团又两个营的兵力，分进合击，迂回包围，向盘踞在山南地区之敌进剿。出师十日，奔袭千里，一举荡平了叛匪的老巢，封锁了亚东以东，米林以西的边境线，割断了叛乱分子与国外陆上联系的重要通道。鉴于叛匪在山南盘踞较久，很多寺庙都与叛匪有过瓜葛。部队正在复仇的火头上，许多人主张扫平这些寺庙。张国华特别强调：“不能，划叛乱寺

庙一定要有确凿的足够的证据。”他的一句话，使一些寺庙得以保留下来。

（尹家民）

